

#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第七十九期

2010年9月

## 編輯室報告

### 【一般論文】

社會保險的失敗：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陳政亮

台灣資訊電子ODM製造商的研發地理學研究／楊友仁、蘇一志

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柳書琴

從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之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劉名峰

當代台灣流行媒介的歷史想像／李依倩

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范雲、張晉芬

### 【其他】

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

保釣四十週年

《沖繩現代史》

送別溝口雄三先生

#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1988年2月創刊

第七十九期 2010年9月出版

本季刊每逢3月、6月、9月及12月月底出刊

肇創於戒嚴時期，誕生於80年代末社運烽火之中，多年來，《台社》持續力耕批判學術，在廣大中文世界中應屬獨特。關懷在地、立足區域、面向世界，賡續並創新批判傳統，是這個刊物繼續前進的動力與願景。

發行人——周渝

社長——夏曉鵬

總編輯——王增勇

執行編輯——蔡志杰

助理編輯——廖瑞華

編輯委員——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許寶強、夏曉鵬、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Gail Hershtatter (依姓氏筆劃序)

顧問——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徐進鈺、陳光興、陳忠信、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玠(依姓氏筆劃序)

榮譽顧問——王杏慶、成露西、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依姓氏筆劃序)

國際顧問——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網址——<http://web.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taishe.editor@gmail.com](mailto:taishe.editor@gmail.com)

零售——本期每本新台幣250元

ISSN——1021-9528

訂閱——每年四期1000元(一律掛號寄出)

劃撥帳號 0587838-5 唐山出版社

10647 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333巷9號地下室 電話：(02)23633072

海外訂閱：每年四期 個人美金90元(航空) 機構美金300元(航空)

請匯款至 swift code: HNBKWTWP 118

A/C No: 118100101281

Beneficiary: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發行所——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聯絡電話——(02)22360556

排版印刷——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未經本刊及作者同意不得轉載

感謝世新大學台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贊助部分出版費用。

1 編輯室報告

【一般論文】

5 社會保險的失敗：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

陳政亮

51 不僅僅是模組化：台灣資訊電子業ODM製造商的研發地理學研究

楊友仁 蘇一志

91 「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柳書琴

159 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從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之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

劉名峰

203 土懷舊與洋復古：當代台灣流行媒介的歷史想像

李依倩

259 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

范雲 張晉芬

【問題與討論】

291 「真實」的偏見：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

潘家恩 杜潔

319 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反思台灣農村陣線的行動與組織

蔡培慧

341 不跟傳媒玩同一場遊戲

魏鈞

349 想像國家的方式：從熱播的國產電視劇談起

羅小茗

365 金融危機與青少年一代的亞文化：以敗者(loser)文化的表像及特徵  
為中心

全盛源(張薇 譯)

377 陳映真對保釣可能提出的疑問

趙剛

【書介與評論】

399 在東亞敘述沖繩現代史的可能性：新崎盛暉著《沖繩戰後史》、《沖繩  
現代史》的意義

屋嘉比収(富永悠介、阮欣婷 譯)

409 沖繩：作為一個研究方法

鄭根埴(朴祐 譯)

427 側讀《沖繩現代史》

陳光興

【先行者】

441 送別溝口雄三先生

孫歌

1 **FROM THE EDITOR**

[ARTICLES]

- 5 **Failure in the Campaign for Social Security**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Labor Standards Act to Labor Pension Act  
Cheng-Liang CHEN
- 51 **Beyond Modular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of Taiwanese ODM Manufacturers in ICT  
Industry  
Daniel You-Ren YANG & I-Jhy SU
- 91 **Total War and Local Culture**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Revival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ofessor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LIU Shu-Chin
- 159 **Moder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Moral Horizon of Narrating China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LIU Ming-Feng
- 203 **Native Nostalgia and Western Retro**  
Historic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s Popular Media  
Yi-Chien LEE
- 259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Ethnic Differ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aiwan**  
Yun FAN & Chin-Fen CHANG

[ISSUES AND DISCUSSIONS]

- 291 **The True Prejudices**  
A Study of the James Ya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in Mass Media  
PAN Jiaen & DU Jie
- 319 **The Truth Is a Social Acti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aiwan Rural Front  
TSAI Pei-Hui
- 341 **Try Not to Play the Same Game with the Media**  
Ti WEI
- 349 **The Way of Imagining the State**  
A View from the Popular Domestic Television Dramas in China  
LUO Xiaoming
- 365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Youth Subcultures**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ser Cultures on Media  
JEON Sung Won (translated by ZHANG Wei)
- 377 **The Question that Chen Yingzhen Potentially Posed for the Baodiao Movement**  
Kang CHAO

[REVIEWS AND COMMENTARIES]

- 399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Okinawa's Possibility in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war History of Okinawa &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Okinawa* by Arasaki Moriteru  
YAKABI Osamu (translated by TOMINAGA Yusuke & Hsin-Ting JUAN)
- 409 **Okinawa as a Way of Method**  
JUNG Keun-Sik (translated by PARK Woo)
- 427 **Reading *Modern History of Okinawa***  
Kuan-Hsing CHEN

[OBITUARY]

- 441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izoguchi Yuzo**  
SUN Ge

## 編輯室報告

溝口雄三教授不幸於7月過世，他是台社編委會的國際顧問，他訪台的歷史記錄《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已於2010年7月底由台社出版，台社在9月10日舉辦紀念會將公開這本新書，懷念這位批判思想界可敬的長者。本期特別邀請長年與溝口雄三教授工作的孫歌教授書寫他所認識的溝口雄三教授，作為對這位前輩的紀念。

由於讀者的支持，台社的稿源相當豐沛，也因此造成通過後刊登的等待時間長達一年，為了縮短作品刊登的期間，我們決定提高這期研究論文篇數為六篇，也因此造成本期頁數高達五百頁之多。前兩篇論文以勞動與產業為主，陳政亮的〈社會保險的失敗：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從歷史角度分析了台灣勞工權益保障制度朝向新自由主義的發展趨勢，反省了台灣工運在政黨輪替過程中的限制。6月台灣廠商鴻海在大陸的富士康工廠相繼出現員工跳樓事件時，在媒體指責鴻海為「台灣之恥」而引燃喧然大波的楊友仁，他與蘇一志的〈不僅僅是模組化：台灣資訊電子ODM製造商的研發地理學研究〉，分析了台灣電子資訊業的運作邏輯與體系共生的關係，提供我們理解這個台灣明星產業的特性。

接下來三篇以文化研究為取向，柳書琴的〈「總力戰」與地方文化：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以日據

時期的台灣文化現象為焦點，檢視不同社會力之間的互動，以及學術工作者的角色，讓我們對皇民化政策有更細緻的思考。另外，在台灣如火如荼討論 ECFA 之際，對中國的想像成為主要爭議來源，劉名峰的〈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從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之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藉著蔡培火、牟宗三及龍應台的文本，分析了台灣社會在建構認同時，對中國的想像所參照之道德價值。李依倩的〈土懷舊與洋復古：當代台灣流行媒介的歷史想像〉選取近十年內在台發行之流行性書刊復古懷舊專題，試圖理解使復古懷舊得以形成的歷史動力與當下機制，並思考在全球經濟體系與西方文化霸權下的本土文化再現面臨何種困境與契機。最後一篇論文挑戰當下台灣民眾對於省籍的刻板印象，范雲、張晉芬的〈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試圖解釋外省族群子女的高教育現象，他們發現父親輩的高教育程度及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而不是省籍，才是最重要的解釋因素。

本期的「問題與討論」刊登六篇文章。前三篇文章以討論社運與媒體之間的關係為主題，這是一個新的嘗試。由大陸學者潘家恩與杜潔發表的〈「真實」的偏見：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為正文，我們邀請台灣積極投入農村運動與媒體改革運動的學者蔡培慧與魏玟，分別從他們自身的社運經驗與潘文進行對話。蔡培慧試圖以台灣農村陣線與獨立媒體的水平連結反思「真實」如何被界定、被呈現，她認為潘文所言的「批判媒體、評斷『真實的質地』，抑或檢驗報導者的現場參與」容或是有意義的評析，也僅僅是對媒體後設的被動理解。面對大眾媒體，批判知識份子應當意識到「真實」的再現是一場「介入」的過程，從而選擇行動的腳步。魏玟則認為重點不在於指出傳媒對社運的再現「不符真實」，而在於在某個特定社會時空、傳媒生態以及社運特性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社運與傳媒展現出什麼樣的互動型態？社運可以如何突破傳媒造成的負面限制，或善用傳媒的傳播力量，以有利於社運目標的達成？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夠從根本，創造



出新的、較理想的傳媒與社運互動關係？

接下來兩篇是由大陸學者與韓國學者分析各自的文化現象。大陸學者羅小茗〈想像國家的方式：從熱播的國產電視劇談起〉在中國崛起的脈絡下，從多齣大陸受歡迎的電視劇分析國家如何被想像。韓國學者全盛源的〈金融危機與青少年一代的亞文化：以敗者(loser)文化的表像及特徵為中心〉從韓國金融危機，勾勒崇尚大學文憑下被視為失敗者的青少年文化現象。最後一篇是趙剛的〈陳映真對保釣可能提出的疑問〉，延續上期陳映真專輯的努力，並在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的此刻，趙剛透過陳映真對保釣進行反省與提問。趙剛指出保釣運動所開展的「社會意識」，在短期間，被體制化為「關懷」、「愛心」與「服務」的格式化活動，再也找不到當初因保釣運動而萌生的社會意識，也失去了保釣運動作為60年代世界性青年反體制運動的有機歷史自覺。

「書介與評論」的三篇是今年5月底在沖繩大學開的討論會論文中邀稿的文章，這次討論會是趁著新崎盛暉《沖繩戰後史》、《沖繩現代史》中、韓譯本版的出版為契機，從東亞區域的視角討論沖繩的位置。這三篇文章分別是屋嘉比収的〈在東亞敘述沖繩現代史的可能性：新崎盛暉著《沖繩戰後史》、《沖繩現代史》的意義〉、鄭根埴的〈沖繩：作為一個研究方法〉以及陳光興的〈側讀《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先生將於11月間來台，參加台社在金門主辦以冷戰的歷史文化為主題的東亞批判刊物會議，我們歡迎他來跟台灣的批判圈進行深度交流與對話。

社會保險的失敗  
從勞基法到勞工退休金條例\*  
陳政亮\*\*

Failure in the Campaign for Social Security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Labor Standards Act to Labor Pension Act  
by Cheng-Liang CHEN

關鍵字：新自由主義、社會福利、社會保險、勞工退休、國族主義、企業廠場工會

Keywords: Neoliberalist, social welfare, social security, labor pension, nationalism, corporation-unionism

---

收稿日期：2009年2月25日；接受日期：2009年7月30日。

Received: February 25, 2009; in revised form: July 30, 2009.

\* 本文初稿原刊登在《工運年鑑2004.06 - 2005.05》，後發表於世新社會發展研究所所舉辦的「第一屆勞工研究研討會」，此處文字經過修改已有更動。寫作過程感謝孫窮理、陳信行、傅立葉、林明賢以及兩位匿名評審對本文的寶貴意見，他／她們各以不同的方式，開拓了我的視野；當然，本文有任何闕漏，是作者之責。

\*\* 服務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通訊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11號

E-mail: chencl@cc.shu.edu.tw

## 摘要

本文企圖透過分析勞工退休制度改變的歷史過程，探索曾經在1990年代初期，由勞工運動支撐住的社會福利想像，何以在推動過程中逐漸失敗，最後讓位給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自負風險論述，並在立法上形成了強制個人儲蓄制的勞工退休金條例。於此歷史書寫中，本文接合了三個面向的解釋，首先，在論述的面向上指出，當時的社會福利想像內在隱含了族群國族主義的邏輯，而當族群國族主義高漲時，其社會階級作為團結的號召便逐漸消失；從階級政治觀點出發則說明了，當國家與資本逐漸同盟的過程中，勞工運動仍陷於既有的企業廠場工會主義，無法發展出超越「會員身份」的認同與力量；最後，在個別行動者的層次上，則指明了社會福利的倡議者，如何為民進黨逐步收編，乃至於此左傾之社會理想與勞工運動漸漸脫節而失去動力。透過此分析，正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在台灣取得勝利的種種複雜且具體的歷史條件。

##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Labor Standards Act to Labor Pension 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idea of social security failed to be materialized. The idea, sustained by the labor movement in the early 90's, was defeated by the Neoliberalism, in the way which 'individuals-in-market', rather than solidarity within working class, became the principle in the enactment of Labor Pension Act. Three different dimensions have been stressed to explicate this defeat. First of all, it shows that the idea of social security encompassed ethnic-nationalist imagination, an imagination with exclusion that jeopardized the fundamental of solidarity.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 politics, it pointed out that, while the state was forced to align itself with the capital, the labor movement failed to go beyond its own historical restriction of corporation-unionism and, as a result, lacked the power against the

Neoliberalism. Finally, since DPP gained the power in 2000, some campaigners in the labor movement were, to some extent, incorporated into the regime whether deliberately or not, and disconnected themselves from the movement; as a result, the idea of social security lost its foundation, and played trivial role in the enactment of Labor Pension Act. Through this historical review, this article shows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f the Neoliberalist victory in Taiwan.

2004年6月11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勞工退休金條例，隔年7月1日開始實施，從此，台灣勞工的退休有了一個全新的局面。當時勞委會主委陳菊曾經認為，相對於過去「看得到領不到」的勞基法退休金，此條例的通過保證了勞工退休後皆能享有一定的月退金，這乃是「台灣勞工的福氣」<sup>1</sup>；而整個民進黨政府也與陳菊持相同的立場，認為此制度「將全面提升台灣勞工的價值以及產業的競爭力」<sup>2</sup>，台灣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本文並不贊同這種觀點。從社會保險或社會福利<sup>3</sup>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此勞退新制定案所代表的是：曾經在90年代中期由勞工運動間接支撐住的、具有左傾意義的社會福利想像，徹底陣亡。陣亡的原因頗多，本文將從三個不同的面向上來解釋，以期看到更為複雜的歷史圖像。第一，從論述上來分析當時所提出的社會福利想像，其在現實上乃是連結著族群國族主義的排除原則，亦即，社會福利的提出並非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2004年6月11日新聞稿。

2 民主進步黨第十屆第八十五次中常會(2004年6月15日)新聞稿。

3 本文對於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與社會保障(social security)的使用，採用比較寬鬆的定義，亦即，從「集體保障個人」的這個原則性判準出發，並不特別區分這兩個詞的使用狀況。雖然，前者比較是強調經由國家稅收的福利措施，因而接近北歐的社會民主制度；而後者則比較偏向階級與職業內在的集體保障的概念，因而接近德國的社會保險制度。不過，在後者的制度設計上，國家也未必完全不介入。由於本文分析的重點側重在「個人自負其責」的經濟倫理觀如何可能，以及「集體保障個人」勞工附加年金制如何失敗，從這個層次上來說，暫時性的混用，是一個方便的作法，當然這當中會衍申出一些問題(容下詳述)。最重要的是，在台灣特殊的政治脈絡下，對於這兩者的使用是不加以區分的，例如：福利國、社會民主、社會保險……等等用語，常常被交互使用，本文特別保留這個台灣特殊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可以呈現分析對象本身的想像，另一方面，則可以保留進一步追問「為何福利與社會保險的想像可以被放在一起」的可能性，我認為這便是上述所謂「衍申出來」的問題：在台灣當年左傾政治派系的主張中，北歐的社會福利提法何以逐漸轉變為社會保險的實踐？或者，更直接的發問，這兩者的區別的政治意義是否真正被討論過？無論如何，本文的分析焦點「勞退新制的轉變」，無能承擔這個更具挑戰性的提問，只好暫時將兩者皆先放在一個「集體保障個人」的框架下來進行分析。最後，值得說明的是，本文所指涉的社會保險是social security，具有社會保障的內涵，並非social insurance這個具有商業保險意義的概念。

是以社會階級內在團結為號召，反倒是以「方便的」族群福利分配不均為原則，來訴求對「軍公教」、「外省人」、「老芋仔」福利的不滿。這個以族群對抗為運動的核心，面對國族主義高漲的歷史時刻，其內在的階級團結傾向便逐步消失。

再者，從階級政治的面向上來看，當80年代末，國家力量消退，轉而與資本同盟之時，由於台灣整體勞工運動的狀態，過度依賴著大型廠場／企業工會的力量，而廠場／企業工會的文化限制，使得工運無法跨出工會的想像界線，導致運動能量被高度限制在個別工會的議題上，缺乏一個更為廣闊的聯盟基礎。現實上來看，對許多大型企業工會而言：一方面在經濟鬥爭上，退休金並非是個議題，這自然導致動員上的困難，另一方面，對於其他議題，特別是對於國家性質是左是右的辯論，也缺乏長期的關注與深入，這不免使得在退休金制度的訂定上，造成弱勢勞工更為弱勢的結局。與這一點相關的證據是，立法院通過勞退新制的當時，同時有著勞動三法修正案的戰鬥，這對於工會而言，是更為直接的議題，因此，便算有心對抗勞退新制，在現實的動員上不免將重兵集於勞動三法，力量分散。

最後，從個別行動者(以及團體)的角度來說，此福利國家想像的主要倡議者勞工陣線以及全國產業總工會，在後期的推動過程中，由於自覺或不自覺的為民進黨所吸納，轉而採取進入國家內部政策鬥爭的策略，某種程度上，放棄了連結其他的進步力量以便對官方持續施壓，甚至是最後關頭自我棄守，使得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自負其責」的思維高漲，「集體保障個人」<sup>4</sup>的社會福利或保險原則在法令制定過程

4 集體保障個人的想像，不見得是反資本主義的，也有可能是幫助了資本的再生產。這個福利(對個人的保障)與資本(掃除資本積累的障礙)的矛盾，的確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在學術政治上的爭論焦點。Gough認為，這類福利國家的困境，其實正反映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1995: 18)。不過在這裡，我們尚不需要進入這個辯論之中，因為在台灣歷史的發展中，集體保障個人這種思維幾乎不可得，也稱不上有什麼值得辯論的機會了。因此，本文暫且，相對於個人自負其責的右翼想

中，徹底被掃除。

無論如何，整體來看，2004年的盛夏，勞工運動無能在社會福利的議題上與國家相對抗，左傾的社會福利或保險的想像，宣告陣亡。而此一社會福利亡魂，在2007年7月20日所通過的國民年金法<sup>5</sup>，更煙消雲散，無能召喚，完全是個弱弱自助的法案。另外，隨著這個福利想像的逐步消失，則是國家的壯大與對社會穿透力的增強：從勞基法時代那個強弩之末的國家機器，在搖搖擺擺中藉著國族主義的動員，逐步自信的展現了分化與控制台灣社會的能力，今日更毫不遲疑的與資本共同拒斥了福利國家的計畫，甚至藉著「福利」之名，動員了勞工的儲蓄，而與資本分潤了整個勞工退休基金所帶來的巨大政治與經濟利益。

若從上述這個意義上看來，勞退新制當然並非代表著進步，相反的，還是一個糟糕的「反社會」政策。以下，本文想要透過說明勞基法退休金與勞退新制轉變的歷史過程，來看待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發展，從中討論國家、資本以及社會福利與保險的倡議者勞工陣線與全產總在這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且旁及其他工運與工會力量的各種作為，希望呈現出這些行動者在政策形成過程中，如何彼此對抗，以及如何想像的細節樣貌。不過，在闡明整個過程之前，值得先說明一點：這一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勝利本身充滿了歷史的曲折，它並非簡單的反映了資本全球化的腳步，雖然這是一個關鍵的力量；也不是階級政治的某種反射，雖然表面是有著勞資對抗的雛形；更不是一個自主的國家力量的完全展現，雖然在某些時刻國家展現了操控社會團體的高度影響力。由於，這整個鬥爭發生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舞台上，使得它充滿了在地的脈絡，特別是族群政治(乃至於國族主義的)、與廠

---

法，把這集體保障個人當成是個進步的概念。

5 參見一篇短文，苦勞社論〈殘缺的國民年金〉，網址：<http://www.cooloud.org.tw/node/5459>

場企業的工會的痕跡。以下我將先討論勞基法的失敗，以及之後各方力量如何面對勞工退休金的鬥爭。

## 一、勞基法退休金：國家幻想下的「單位責任」

勞工退休金條例主要是因勞基法的失敗而來的。正如眾人熟知，1984年所訂定的勞基法並非是國內階級政治的結果，而是美國企圖提高台灣生產成本所形塑的勞工法律。當時，國家雖然不斷的面對社會各種力量的挑戰，但也依然強而有力，他所訂定出來的、高於現實勞動條件的勞基法，正反映了他高於資本與勞工的力量，這部份形成了後來台灣工運順法鬥爭的條件<sup>6</sup>。無論如何，特別是關於勞工退休金的章節，更可以看到國家意志凌駕資本與工人的樣貌。

以勞工退休金來說，按照勞基法的規定，資方必須提撥一定的勞工退休準備金，以「專戶儲存」之，等到勞工達到退休的要件時（在同一個事業單位工作15年以上滿55歲，或工作了25年以上），就可以領到根據其年資計算的退休金<sup>7</sup>。原則上，這筆退休金的計算，是以勞工退休前半年的平均工資作為一個基數，然後與年資加乘，因此，不會因為通貨膨脹而導致退休金實質縮水。不過，由於規定此退休金只能一次領完，因此對於勞工退休生活的保障，當然是遠不如年金來得全面。

事實上，這個時候的台灣，只有軍公教人員的退休福利一支獨

---

6 「順法鬥爭」作為工運的重要策略，很大一部份的條件是來自於勞基法的立法。正如〈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一文所指出的，台灣80年代的勞工運動，「藉助並未落實的國家進步立法（即，勞基法），向資本提出訴求」（台社編委會，2003：7）。另外，關於台灣勞基法的訂立，參見《勞工看的台灣史》第三冊《經濟自由化與大量失業的年代》，頁7，這也應當放在美國（與英國）80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的脈絡下來理解，參見金寶瑜，2005。

7 參見勞動基準法第六章「退休」，第53到58條。



秀，其退休要件非常容易，只要工作滿25年，無論歲數，便可領取老年給付；無論年齡退休的職業軍人以及滿50歲的公教人員則可以請領年金給付；尚有公保與軍人保險退休給付，這個部份若一次請領還有優惠儲蓄利率(所謂18%)，其所得替代率可以到達百分之百(郭明政，2006：283-4)。從這個角度上來看，整個國家的福利政策是不當的偏向軍公教人員，並且是以稅收的方式來達成此「侍從關係」下的忠誠交換<sup>8</sup>。如果，所有公民都能享受到如此的退休景象，台灣的社會福利肯定是世界奇蹟。這，當然是個幻想，軍公教人員退休的高水準福利，乃是國民黨透過分化而控制台灣社會的一個要件，並不是社會對國家進行任何要求的結果。不過，透過勞工退休與軍公教退休的比較，我們卻可以看到勞基法的不切實際。

勞工退休準備金的財源來自資方(雖然國家擔保其在市場操作後一定的收益)，並且是以資方的「財產」(所謂專戶)方式儲存在國家的手上。按照勞基法的規定，它在未發放前屬於資方財產的一部份，只是資方不能動它而已。這個財源的設計與管理精神的問題在於，按一般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的原則，是由國家或(部份)社會共同擔保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條件(生、養、殘、病、老、失業)，不論是透過稅收還是所有被保險人共同支付其財源，本意皆是企圖透過集體的力量來保障個人的生存；而財源既然來自集體，透過一個合乎正義的再分配的過程，每個個人皆可獲得整個社會的保護。但是勞基法規定的退休準備金，卻仍然是資方名下的財產，除非達到一定條件的勞工，在一般狀況下，沒有人可以使用。這也是為什麼當勞工進行關廠鬥爭時，支領這筆退休準備金來支付積欠工資或是資遣費，仍然必須經過資方簽名蓋章的理由<sup>9</sup>。而既然這是屬於資方的財產，它便不具有「集體保障個

8 參見王振寰對「侍從關係」的解釋(1996：59)。

9 實務上，關廠時勞工要拿這筆錢得經過一個複雜的程序。首先，勞僱關係必須先行結束，這個時候，資方專戶內的退休準備金就會因為勞工人數下降(甚至到零)，而

人」的社會保險意義，事實上，這個制度設計的性質是：國家強迫的賦予了「企業照顧終身員工的責任」<sup>10</sup>。

很有意思的，這其實很類似中國1949年後，改革開放前的「單位」制—每個人在一個單位(企業、學校或其他機關)裡生老病死。然而，台灣是私有制的社會，國家強制性的賦予「企業責任」，並迫其繳交部份財產，存入企業自身名義之帳戶，這除了在憲法上出問題外<sup>11</sup>，在現實上幾乎是不可行。因為，如果(撇開所有權制是私有制或公有制不論)在國家力量完全凌駕資本、並向勞工傾斜的狀態下，這個制度或許還有點可行性，然則，1984年以降的台灣，資本相繼「出走」，1990年3月大資本家們更史無前例的聯名發表〈資本家之怒〉批評政府之無能(王振寰，1995：97)，國家的正當性正受到來自資本與政治／社會運動的巨大衝擊，他又有何能力保證這個制度的確實實施？縱使私營大企業在政策保護下能穩定成長且員工人數夠多而能確實提撥，但是，這也不依賴於國家之強制力，而是依賴於其在市場的獲利能力，因此，就如同社會上的一般認知，員工退休保障乃是大企業藉以吸引其所需之勞動力的條件，這正是典型的市場狀態，絕非是以社會福利或

---

變成「超額提存」。如此，資方才能拿回這筆錢，再用這筆錢來支付勞工的積欠工資、資遣費、預告工資、加班費……等等。

- 10 參見郭明政(1997：79-83)對勞基法中退休部份的批評。他亦提及了當時勞基法立法過程中，有關積欠工資優先於抵押權的討論。無論如何，他的立場是贊成(積欠工資墊償基金)保險制度，反對積欠工資高於抵押權的，他認為若是如此將會造成資方經營風險之增加。後來勞基法中對薪資保障的確是用保險制度來設計，參見以下對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分析。
- 11 參見《工運年鑑2003.06 - 2004.05》頁158，2004/05/21的條目，針對大法官第578號解釋的爭議。在一個私有制的社會中，國家對私有財產之干預，是否僅能以社會保險之名義為之，不僅是法理的問題，還是社會制度如何變革的問題，從後者來看，當社會力量足以要求國家對資本進行干預時，也未必非得要以社會保險之名為之；但是，若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機器之下，如此的干預，同時也會弱化社會力量，將集體個人化，勞退新制就是如此。關於這一點參見郭明政的說法，他對578號解釋非常不滿，認為這剛好呼應了後來勞退新制中，國家對勞工私有財產之干預，而又非以社會保險制度為之(2006：281-2)。

保險的形式與意義存在。簡單的說，國家在設計勞基法退休金制度時，過度放大自己對資本的控制能力，這是第一個不切實際。

第二個不切實際的是，勞工很難達到請領退休金的條件。立法當時工商普查數據(1981年)就已經證明，佔台灣廠商96%的中小企業(員工百人以下)其本身壽命就很難超過15年(單驥, 1987: 63)，而這還是經濟起飛中的台灣企業狀態，到了2002年，根據統計其平均壽命更降到了13年以下(詹火生、林昌勳, 2002)；在此狀況下，就算資方按期提撥，其勞工也無法依法領到退休金，更何況惡意關廠的企業所在多有，在退休請領條件到達前將員工解僱或誘使其離職者，簡直可說是社會常態，如此退休金的設計如何能保障眾多勞工的退休生活？事實上，在企業壽命偏低，且企業提撥比率僅有10%左右的狀況下，根據2002年的資料統計，真正領到勞基法退休金的勞工大約僅有10%上下<sup>12</sup>。換句話說，原先勞基法退休金乃是基礎在一個「企業穩定，終身僱用」的「單位責任」幻想上，這個幻想直接導致了現實上大多數勞工總是為其退休煩惱的苦境，或者說，煩惱其被提前解僱的厄運的到

12 1990年，當時勞委會主委趙守博表示，企業實際上提撥者只佔百分之十點多(趙守博, 1992: 358-9)。另外，詹火生、林昌勳引用行政院經建會的統計資料，認為至1998年3月底，企業依法提存比率僅占應提存的百分之十六(詹火生、林昌勳, 2002)。2002年10月9日立法院衛環及社福委員會召開勞退條例修改的公聽會時，工運團體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莊妙慈則認為，不到百分之十的企業提撥退休金(立法院公報, 91卷64期下, 頁15)。無論如何，提撥率僅有百分之十上下，大概是個事實。至於有多少人可以領到退休金，2002年時，根據當時勞委會主委陳菊自己的說法是，超過百分之七十五的勞工領不到退休金(Ibid.: 34)。她的屬下勞動條件處處長黃秋桂則說，從中央信託局所領取的退休金來看，不到百分之二十的勞工領到退休金(Ibid.: 62)。莊妙慈則認為不到百分之十(Ibid.: 15)。比較可靠的計算應當是，根據某年勞保請領老年給付人數與勞基法退休金請領人數來加以比較，根據郭明政的計算，在2001到2002年間，大約是百分之十的勞工領到勞基法的退休金(2006: 272)。這裡採取郭明政的數據。有意思的是，勞委會自己在2004年時，卻說2002年只有0.7%(26780人)的勞工拿到勞基法退休金，藉此推銷勞退新制，大概如郭明政所言，「與詐欺何異？」(Ibid.)。因為回推回去，若26780人等於0.7%，那麼，請領的勞工不就等於382萬人嗎？全國適用勞基法之勞工才六百多萬人，怎麼六成左右都是55歲以上了？這的確是個詐欺。

來。

在說明這兩個不切實際之後，為了釐清勞基法退休金的基本性質，我們還可以比較積欠工資墊償基金制度。基本上，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由所有資方每月提撥其勞保投保薪資總額萬分之二點五，儲存於勞保局的公積金。一旦企業關廠，還不出積欠工資時，勞工便可以請求這個基金來墊償(六個月工資為限)<sup>13</sup>。國家當然會要求資方必須要償還，不過一旦找不著人，國家便會以呆帳的方式消掉這筆支出。換句話說，這是由國家作證下的「資方互保制度」，用以保證勞動的報酬。

當然，從現實運作的角度上來看，資方所提撥的每一分錢都可能透過各種方式轉嫁到勞工身上，以降低勞動條件來作為自己人事成本的補償，這一點不管是勞工退休準備金還是積欠工資墊償基金的提撥，皆是如此。換句話說，作為「資方互保」的墊償基金，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國家作證下的「勞工互保」，且其基金並非企業名下的財產，而是公共基金，因而比較接近社會保險的精神，也許可以說是種變形的社會保險制。而勞工退休金制度卻非如此，資方可以透過轉嫁，從勞工身上提撥出退休準備金，但是最後卻以企業的財產出現，一旦企業關廠，也無公共基金來給付勞工退休金，國家更不負擔任何保證之責。這種奇怪的制度，既不是社會保險，不是勞工個人的儲蓄，更非在公有制下的公社老年安養，無以名之，只好稱之為「強制之單位責任」制。而國家可以說是不切實際的、過度高估自己能力，在幻想中實施了這個制度，當然，實施之後，很快的便面對了現實的挑戰。

---

13 參見積欠工資墊償基金提繳及墊償管理辦法。

## 二、福利的呼聲

勞基法實施五年後，也就是1989年，官方就承認了勞基法退休制度的「確有窒礙難行之處」，當時趙守博就任勞委會主委時後便不斷表明要研議勞工退休保險制度<sup>14</sup>。1991年，勞委會提出了附加年金保險制的勞基法與勞保兩個修正草案。現在看起來，這個法案是個典型的社會保險制。首先，修改勞基法退休專章，加入條文，使之成為附加年金制之法源，然後於勞保條例中增加附加年金之保險。後者的大概內容是：由僱主固定提撥一定的薪資比例(初期設定百分之四到七，僱主負擔七成，勞工三成)到年金基金裡頭，等到勞工退職時，若是滿60歲，且參與保險之年資已經25年者，不論是否在同一事業單位，可以請領最高30年之年資，亦即，以每一個年資換算為1%來計算，再乘以退休前半年之平均工資，因此最高每個月可以領到其薪水30%的年金<sup>15</sup>。

這個草案從社會保險的角度上來講，相對於勞基法，可以說是一個進步；不過，請領條件實在太過嚴苛，若未參與保險25年以上，竟然只能請領一次給付，而且還規定了最高以30年年資為限，對以上之年資不予計算，未免為德不卒。再者，眾所皆知，勞保投保薪資實質上遠低於勞工的實質薪資(大約薪資的一半左右)，如此計算下的最高30%的所得替代率，恐怕不如預期。而就因為這個理由，這個草案後來在工運團體的反對下停擺未審(吳也魯，2002：61)<sup>16</sup>。另外，此法

14 根據趙守博的說法，1989年勞委會完成了勞基法初步修正工作，其中就是要將退休金改為較為進步的、具有社會保險性質的附加年金制度(趙守博，1992：95-101)。

15 參見《勞動者》第52期，頁16。以及立法院公報，第81期，第10卷，頁58-72。

16 根據記載是勞動黨主席羅美文在1991年10月22日，立法院內政、經濟、司法三委員會審查「勞動基準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第一次聯席會議台下，抗議不準旁聽，後委員會內對開放旁聽與否有不同意見，於是宣佈散會(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84期，頁162)。這次散會，是行政院此波修法的結束。

稱之為勞工「附加」年金保險，然而，1991年的台灣尚無「基礎」年金的規劃，按照勞委會當時在立法院的解釋，似乎是將原來勞保的老年給付當作是基礎年金來想像<sup>17</sup>；但是老年給付畢竟是僅止於參與勞保的被保險人，而非所有國民，那麼，此「基礎」與其它「基礎」（例如公教人員）是否平等？退一步說，就算不管勞工與其它類屬的社會團體之間基礎的分配正義問題，光就勞保的投保人與勞基法所涵蓋的勞工就有極大的差異。參與勞保者基礎廣闊，涵蓋了許多自僱勞動者（以職業工會會員身分入保），而此附加年金既然在勞保條例下，理應包含這些無僱主之勞工，但是，其法源又來自勞基法，原先在勞保下頭的許多被保險人根本尚未納入勞基法中，此草案顯然無法整合不同的對象<sup>18</sup>。

無論如何，這個草案大概反映了一個事實：此勞工附加年金保險制是個「半套且草率的社會保險制」。雖然它取消了勞基法退休金制度下同一事業單位才能請領退休金的限制，並且也改為較有保障的年金制，但是，由於它請領的條件太過嚴苛，非得工作25年以上，而其最高的年資計數又嚴重受限，更不知道作為「附加」之「基礎」何在，這導致了此修正案，在尚未能引起社會討論，便直接在工運團體抗議下，於立院委員會中夭折了<sup>19</sup>。

平心而論，就整體的國家制度來說，這個草案透露出社會安全政

17 1991年10月22日，趙守博於立法院內政、經濟、司法三委員會審查「勞動基準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第一次聯席會議上表示，勞保老年給付不會因為此附加年金而消失，勞工將可領取兩份（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84期，頁161）。看起來勞保似乎是被當作基礎年金來理解。

18 勞保老年給付與附加年金保險制之間該如何整合的問題，在1990年12月22日的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就被同黨立委葛雨琴提出來了。當時趙守博的回答，針對附加年金制的部份，是以適用勞基法的勞工為納保原則（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77期，頁134-5）。而一年後其所提出之草案，對此問題依然不加以整合。

19 勞基法修正草案於1991年10月22日在羅美文鬧場停審後，12月2日的勞保修正草案中附加年金部份，也因為沒有法源，隨之喊停，說要等勞基法修正通過附加年金後再審（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98期，頁234-56）。不過從此之後，附加年金制完全不再跟勞保條例扯在一起，而是準備另立新法。

策立法能力的貧乏。這有下列幾個面向：第一，國民黨當時對於國民年金的想法據說是有著「制度分立、內容整合」的原則，亦即勞保、農保、軍公教等等各自獨立，但皆以國民年金的意義存在(郭明政，1997：231)。然則，正因為缺乏整體規劃而導致各自的制度設計在內容上無法兩相整合，這種草案根本禁不起任何細緻的討論，別的不說，連勞保被保險人與勞基法適用對象，這兩者之間的不同都無法整合，能說什麼勞工社會保險？更別提連勞保自身的老年給付都尚未年金化，農保與軍公教的退休又如何轉變的問題。第二，這個「制度分立」的原則，其實背後的心態還是一樣的：不肯面對社會上對福利重分配的呼聲，亦即，軍公教的過度福利仍然獨立於其他的社會保險之外，而不被納入一個完整的社會安全政策來考量，或者說，因為這樣，也不可能出現一個整體的社會安全政策。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此半套草率的勞工附加保險毫無社會重分配的效果，甚至還可以說是窮人們的自助方案了。

關於福利重分配的呼聲是以選戰策略的方式出現在歷史舞台。就在上述法案失敗的隔年，1992年年底立委選舉，民進黨籍台南縣立委參選人，新潮流系的蘇煥智在其助選者簡錫堦的規劃下，策動了養老年金運動，這個以社會福利之名作為選舉主軸的戰術，除了令蘇煥智成功當選立委之外，也引起了民進黨內的一陣風潮<sup>20</sup>。1993年縣市長選舉，民進黨新潮流系更在重陽節之前直接成立了「敬老年金行動聯盟」，發動了「重陽節送暖大遊行」，高喊著社會福利的口號<sup>21</sup>。其聯盟的召集人洪奇昌更於10月在立法院提出了國民年金法草案，雖然此草

---

20 事實上，關於「福利國家」的論述，在民進黨內存在已久。在1986年第一版的黨綱草案中就已經強調要建立「福利國家」。各派系中也有以「福利國」(謝長廷領導的)自我標榜的，雖然根據簡錫堦的說法，與美國殘餘式的社會保險沒有什麼不同(簡錫堦，1993：20-2)。

21 召集人是洪奇昌，副召集人為高植澎、蘇煥智、李逸洋。完全是新潮流的行動組織。

案在立法院委員會中就被國民黨「幹掉」<sup>22</sup>，但是觀察到於此同時、1993年復刊的《新潮流》雜誌，從第三期開始幾乎每期都有關於社會福利的文章，這一系列的事件顯然是一個政治派系的集體動員。在雜誌中的文章，或者批評軍公教福利、或者倡議國民年金、或者介紹瑞典的福利制度……等等，皆很明顯的展現了新潮流系有別於其他政治勢力的政治主張<sup>23</sup>。

很有意思的，這個由新潮流發動的運動策略，最後成為整個民進黨選戰的主要武器，「福利」儼然成為民進黨最高的實踐黨綱。例如，這類政治主張在1994年時，成為民進黨的戰鬥利器，當年7月1日，所有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開始發放排除退休軍公教的「敬老津貼」，發放前還舉辦一次靜坐(5月23日起一連五天)，一次大遊行(6月26日)，幾乎是全黨動員的規模，其訴求說：「你我攏會老，老來要按怎，誰人無父母，年金盡大孝」，在這裡，福利論述同時包含著具有「國家向老年人盡孝」之「道德運動」。事實上，新潮流所發放的《敬老年金運動問答手冊》中便提及為什麼使用「敬老」而不用「國民年金」這個標準的社會福利語彙：

第一、是為了凸顯「敬老年金」是由一群65歲以下的幹部，地方人士一起推動，以表示對我們的父母，長輩的尊敬……第二、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老人佔7%)……年輕人出外打天下，顧三餐，有時連父母都無時間去孝順，所以用「敬老」，是希望社會大眾及國家對過去貢獻社會的父老長輩，能以實際的行動來服務，

22 國民黨在內政委員會第一次審查洪奇昌、蘇煥智聯名的國民年金法草案時，就以非常手段七：二通過散會動議，根本連討論都不允許(立法院公報，第82卷，第59期，頁3-25)。當然，這天是1993年10月20日，距離縣市長投票日11月29日，剩下一個多月，這個封殺不過是選戰策略的對抗。

23 從第3期(1993.9.15)開始到第20期(1995.7.15)，除了第13期(1994.7.15)沒有提到社會福利、敬老年金、社會民主……之外，每期都在強調福利國家的好處。



孝順他們<sup>24</sup>。

看起來，此論述表面上看起來是福利主張與傳統家庭道德訴說的相互融合，國家同時扮演資源分配者，與「孝順的晚輩」的角色。當然，對比於1992年國民黨郝柏村內閣所提倡的「中國式老人福利就是家庭照顧」(王增勇，2005：95)，把公共的分配正義議題推回到私人的領域去解決的說法，民進黨的福利訴求似乎包含了更高度的「社會性」。然則，在具體的操作上，卻非如此。1992年蘇煥智的選舉，真正喊出的口號是「老芋仔(意指老榮民)每個月可領到四千多塊，我們為什麼一塊錢也領不到？」(傅立葉，2000：243)。換句話說，這個操作的真正效果不是社會性與公共性之建構，而是排他的「我群」宣稱。在此宣稱下，省籍作為社會切分線再度被動員起來，這是台灣典型的族群政治的一環，雖然表面上是福利的社會性主張。這樣看來，為什麼是「敬老年金」，而非「國民年金」，應當並不單純是某種「化文言而白話」的競選策略，比較像是在牽引我群中的特定的集體經驗(特別是：年輕勞動力從鄉村到都市的遷移的歷史經驗)與道德規範，更暗示著「新的國家將會完全代表我群的經驗與道德」。總結一句話，社會福利是表面的論述，背後則是族群政治的動員。這是為什麼國民黨的候選人在1993年縣市長選舉時也能喊出相同的訴求；這個相對於老榮民的「本省人」的經驗，在李登輝主政的國民黨下，暫時還無法被民進黨單獨的壟斷。

而當國民黨一方面把社會之責推到私人領域的時候，另一方面，卻與資本更緊密的攜手。1990年面對資本的怒火，國民黨開始企圖掃蕩社會運動，9月新上台的郝柏村指示行政單位以〈檢肅流氓條例〉對付「社運流氓」，更宣示重大經濟建設勢在必行。這一年，跨行業的

24 參見敬老年金行動聯盟所發行之《敬老年金運動問答手冊》第一部份問題四。

「中生代」資本家由於不耐「公權力不彰」決定加速集結，「主動出擊」掃除投資障礙，成立「工商建研會」<sup>25</sup>，在1991年12月1日，這個研究會研究出了一個「阻礙經濟發展」的二十幾條「不當法令」，其中勞基法相關的就佔了九條<sup>26</sup>。而1991年的勞基法修法失敗後，兩年後國民黨捲土從來，再度提出勞基法修正案，整體來看，此修正案回應了工商建研會的建議，順從了資本的意願，企圖降低勞動條件<sup>27</sup>。

面對國家與資本的聯盟，勞工運動在當時的修法鬥爭中提出了兩個對案(工委會版本以及勞工陣線版本)<sup>28</sup>，在1993年10月1日與勞委會公開的對勞基法修正展開辯論，10月5日以「撤回官方版、支持勞工版(勞陣版及工委會版)」為訴求，工運團體與自主工會全力動員，以將近三千人包圍了立法院。這個對抗的結果是10月16日立法院要求行政院撤回修正草案<sup>29</sup>。接下來則是11月12日由工委會單獨發起的秋鬥，三千人蛋洗了勞委會。這波勞基法的修正案被擋下來後，緊接著全民健保的鬥爭。這個從1993年纏鬥到1994年夏天(甚至延續到1995年)的大動員，引發了許多相關於福利國家議題的討論，例如對於憲法中如何定義人民醫療權、健保財源是稅收還是保費、保費的各種職業

25 見《中國時報》，1991年11月7日。

26 見《自立早報》，1991年12月2日。內容是取消資遣費(以保險為之)、取消退休金(以保險為之)、取消年終紅利與獎金、降低特休日數、取消假日工資、停發產假工資、取消婚假並停發喪假工資、病假由勞資雙方協商、取消會務假。亦參見女工團結生產線、勞工教育發展中心出版的《台灣工運》第1期，1992。

27 此次勞基法修正草案被稱為勞動條件降低法，主要內容是平均工資縮水、資遣與退休不溯及既往、資遣費以四個月為限、退休給付減少、增長試用期、曠工解僱更為容易、加班費可以用協商方式為之、變形工時、懷孕改調困難、產假可以縮短。參見《勞動者》第57期，1992年11月1日。

28 見《勞動者》第58期，1992年12月31日，以及《台灣工運》第3、4期，1993年12月31日。

29 見《勞動者》第65期，1993年11月20日。勞基法被擋下來後，關於勞保條例是否要繼續增加附加年金的條文，在1994年6月27日，連戰主掌的行政院決定另立新法單獨處理，不再與勞保掛鉤，見行政院函，中華民國八十三年6月27日台八十三勞字第 二四三六一號。。

團體與勞資政之間的分擔比例、以及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重分配效果……等等，雖然這些議題並非是整體的在面對國家性質的問題，而是在單一議題上的延伸，但是卻在效果上支撐了福利國家論述出現的時效性。

無論如何，在這個轟轟烈烈的幾年之中，國家在其力量衰退的同時，很快的便與資本形成了同盟，開始減緩了社會福利的行動。而資本的力量迅速壯大，不再避諱公開發表激烈言論，且形成新的行動組織，走上街頭，甚至包圍立法院<sup>30</sup>。勞工則在自身的運動中展現出對資本的批評，勞工陣線的刊物《勞動者》，以及工委會的刊物《台灣工運》，很大一部份關注工運的特定事件、關廠、以及其引發的退休資遣、大量解僱、單一工會鬥爭、民營化、職災、外勞處境……等等議題，當然，也因此多少觸及了福利國家或是社會保險的問題。整體看來，社會福利的大論述是以新潮流系為主而發動的。而這時的新潮流尚未與工運脫離關係，為新潮流雜誌撰寫社會福利相關文章者也包含了部份參與勞工運動的人，這些人大致上也是新系所掌控的台灣勞工陣線的相關人士。雖然新潮流系其中有部份的鼓吹者與工人運動重疊在一起，但是不能說是勞工運動完全跟著此政治主張而前進；但也不是說勞工運動堅決的主張福利國家的路線，因此帶動了政治部門的政策規劃。

回顧來看，這比較像是歷史上兩條偶然交會的弧線：勞工運動因為在退休金、失業、特別是全民健保等直接利益問題上與官資鬥爭，因此在效果上支援著福利國家的論述，而新潮流系所展開的論述也援引了工運某些的訴求，以成就自身對於(新)國家性質的規劃。問題在於，以族群政治作為福利論述背後的根基，其內在強大的我群想像，

---

30 1994年5月13日健保中關於保費勞資分擔比例大戰方酣，商總與工總到立法院陳情，要求五五比，並「留下了百餘台進口車包圍立法院的奇景」，參見《台灣工運》第7期，1994年8月10日。

很快的會抵觸福利論述真正的社會性，幾乎可以預見這個論述的衰退乃是族群政治不斷上昇的必然後果<sup>31</sup>。而從勞工運動這條弧線來看，這類福利國家的願景也並非是什麼堅定的政治主張，反而比較像是作為議題的「延伸論述」，真正能夠進行大動員的皆是現實且直接的（乃至「身體的」）利益鬥爭<sup>32</sup>。因此，1995年全民健保的鬥爭結束後，勞工運動也就沒有與福利國家的大論述產生進一步的關連。當然，在族群動員升高，而政治派系與工運漸行漸遠後<sup>33</sup>，工運也不可能逼迫它維持原有的主張，甚至到後來反而開始退潮，逐漸消失，最後僅在勞工退休金與失業等議題上，零星的出現某些論述，也同樣的集中在與勞工陣線相關的人士上。

1995年前後，當時工運的發展幾乎是與產業工會聯盟成立相關的（1993年銀行員工會全國聯合會、1994年北縣產總、1995年南縣產總、宜縣產總，全國公營事業工會聯合會、1996年高縣產總、1997年北市產總，高市產總，竹縣產總、1998年苗縣產總，全產總）：這個發展是在解嚴七、八年後，也是自主工會力量（以及數量）逐漸壯大的時

31 1994年省市長選舉時，民進黨的口號是「四百年來第一戰」。我想不在台灣脈絡的人，大概很難想像在過去一年內，整個黨還在談老人年金、社會福利，但從此時起，福利論述卻迅速消失。對活在這裡的人來說，這幾乎沒有什麼難以想像之處，因為背後族群政治的邏輯才是真正的力量。

32 例如保費分攤比、工時、休假、工會會務假……等等。這個直接的利益鬥爭，也是非常「身體性」的展現。這時出現的各種動員口號，都是「剝皮」、「踐踏」、「餓死」、「勞飢法」、「吐血」、「討一口氣」、「宰割」、「翻身」、「血汗」……等等。

33 1995年之後，新潮流系似乎很少再提什麼福利國家的論述了。至於整個民進黨大概是在1994年全民健保鬥爭（勞資政分攤比）的時候，不再懼怕跟資方站在一起。這個鬥爭的詳情請參閱《台灣工運》第7期，頁16-21，這裡詳細紀錄了民進黨與國民黨共同通過健保的過程。最有意思的是，勞工陣線的靈魂人物簡錫堉，既是新潮流成員、又是勞工運動的中堅，在1995年時選擇成為由新系配票支持的不分區立委，因而導致勞陣內部的路線爭議。1995年底勞陣將反對派逐一解僱，反對派也出刊物《紅燈左轉》猛烈批評（「紅燈派」由此得名），勞陣正式分裂。關於台灣社會福利運動的發展，這個分裂究竟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很難評估。不過，保守的說，新潮流系一方面逐漸不提福利國家的大論述，再加上勞陣分裂後，勞工運動內部對於新系的疑慮更深，這個議題恐怕在歷史上只剩下了選舉策略的地位。

刻。這些歷經大小鬥爭的自主工會，面對了既有體制下工會聯盟(包含著職業工會的總工會)的顛覆，加上自組的工會聯盟仍是以廠場/企業工會為基礎，對既有工會體制不至於產生太大的問題<sup>34</sup>，成立自主的產業工會聯盟順理成章。而在因反民營化而展現出高度動員實力的國公營事業工會聯盟的支撐下，與全國各縣市逐漸籌組成的產業總工會的成熟條件，在1998年勞動節兩萬人的新社會之夢大遊行後，全國產業總工會正式宣告開始運作——雖然遲至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才承認。無論如何，全產總的成立代表著台灣工運的一個新的階段，原先相關於勞工退休金的福利論述，開始集中成為兩個主要的議題：國民年金的立法，以及勞工附加年金保險。這兩個議題成為全產總公告的政治主張後，並不同幽黯潛蛟舞出驚人氣勢，倒是孤舟嫠婦的暗夜泣訴，原因不在全產總以及倡議者勞工陣線缺乏論述能力，而是在2000年執政後的民進黨逐步的滲透下，自我瓦解。

### 三、公積金制：強制個人儲蓄的正式出現

整個瓦解的過程應當從1996年的國家發展會議說起。透過國族主義的動員而在第一次總統直選囊括了54%得票的李登輝，意氣風發的在12月23日召開了國家發展會議，轟轟烈烈的邀請了各黨各派民間人士參加。會中對於勞工退休的結論是「建立妥適之勞工退休制度，增訂國民年金，勞工老年附加年金採保險或公積金制度」<sup>35</sup>。事實上，這個結論與1991年勞委會所提出的附加年金保險方案的一個重大的不同是：毫無社會風險分攤概念、完全個人主義的「公積金制度」的正式出

34 所謂「不至於產生太大的問題」是我的後見之明，在全產總成立後，民進黨就很有自信的操作著舊日國民黨拿手的侍從主義，事實上，產總體制對所有統治者而言都是很容易操控的。即便如此，1994年北縣產總，也仍是要靠民進黨縣長尤清下頭的勞工局長郭吉仁幫忙，才順利成立，可見當時國民黨仍然沒有自信面對工運。

35 引自詹火生、林昌勳，2002。

現。此後，勞工退休金的立法幾乎環繞在此制度上打轉，似乎很難再扭轉到社會保險的意義上。

所謂公積金制度其實就是國家強制個人儲蓄，亦即，國家規定勞、資或雙方按月提撥一定的薪資比例，儲存於每個個人的帳戶中，而整體之公積金有一定之利息收益，或可或不可的投入市場操作，而於勞工退休或達到一定請領與投資條件時，個人便得以年金或一次的方式請領、或投資於特定股市或房市等。在這樣的制度下，每一個人皆被認定是一個個獨立的經濟個體，其退休後的保障也完全取決於自身的工作生涯狀況，與他人無涉<sup>36</sup>。這樣的制度想像，完全反應了右翼新自由主義弱肉強食的政治哲學，百餘年來社會福利或社會保險對於風險由集體吸收的思惟，正是此公積金制的對立面。

這時候的國家力量壯盛且大步邁向新自由主義，1997年11月的勞委會所提出的勞工退休金草案正是典型的公積金方案，而不是國發會結論的另一個選擇：附加年金保險方案。在此公積金方案中，國家強制個別勞工按月儲蓄6%的薪資到個人帳戶裡，加上一定的收益，在退休後可以選擇一次請領、按月請領、或一次領取部份，餘按月請領的方式，將自己的錢領出來。這當然與1991年的規劃精神完全不同，此時，勞工所領用的是自己的儲蓄，便縱是按月領取，但其總數依舊不變；而先前版本中勞工所領取的，雖然是依照自身的年資與薪資比例來計算，某種程度上的確是跟著自己的薪資水平而定的，然而這卻是從勞工集體提撥的基金中，按月給付且直至死亡的年金，而不是在個人儲蓄累積到一定總額下的分月給予。換句話說，雖然先前版本問題重重，重分配的意義仍然微弱，然而這個社會保險的精神倒還是稀薄

---

36 公積金的英文 *provident funds*，有節儉、未雨綢繆之意，在香港，其英文更清楚的顯示其特色：*mandatory provident funds* 譯為「強基金」，強調這是依法強制性的、且具有節儉意義的個人儲蓄；因此，公積金的翻譯其實是值得檢討，這裡的「公」究竟從何而來？

的存在著，但在1997年的版本，則變成「由個人完全面對市場狀態」的立法了。

更進一步說，這個版本的給付水準甚至比1991年版還要差。若根據勞委會1991年的草案，最高每個月將可以領到其退休前薪水30%的年金，但若以此時版本來計算，在高估的狀況下，竟然也只有18%而已（以第一年投保薪資三萬，每年調薪3%，提撥率6%，銀行年利率／收益保證6%，來計算，30年年資將可領取總數兩百五十三萬兩千三百元左右，以60歲退休，1997年統計的平均餘命16年來計算，則每月僅可領取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元，其退休時薪資大約是七萬兩千八百元，所得替代率僅達18%）<sup>37</sup>。如果考慮通貨膨脹的因素，30年後的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九元，恐怕連低收入戶的補助都不如了，何況台灣的工資在殘酷剝削移住勞工勞動力的狀況下，要有每年3%的調薪水準，也不是容易的事，更別提銀行利率或收益要有6%，現在看來簡直是幻想，18%已經是極度高估了。另外，若以一次領取來看，也僅是舊有勞基法的77%而已（舊有勞基法可以領到三百二十七萬七千元左右）。最後，這個版本更荒謬的是，他對於新舊制轉換過程完全沒有任何的保障設計，若當真實施，舊制勞基法的退休金等於是付諸東流。

若要說1997這個版本有著「建立妥適之勞工退休制度」的安定社會的企圖，不如說是提供了國家往新自由主義傾斜的明證。1991年版本的社會保險精神，在這裡已經被一腳踢開，代替成「個人自負其責」的精神了。從勞工運動的角度來看，當時已成為民進黨不分區立委的簡錫堦除了要求提撥率必須到10%以上之外，也提出必須改以附加年金社會保險方式才是正辦，與簡錫堦相關的工運組織勞工陣線，除了要求當時勞委會主委許介圭下台之外，也提出了附加年金社會保險的訴

---

37 以上計算參見《勞動者》第92期，第二、三版，1997年12月15日。並加入退休後平均餘命的計算。

求<sup>38</sup>。

社會保險時運不濟，命途多舛。2000年的總統大選，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承諾了勞工退休金制度將會走向社會保險的原則<sup>39</sup>，於此同時，勞工陣線也出版了勞動政策白皮書，提出了附加年金保險的八項原則：社會保險、強制性、保費勞僱二八分攤、所得重分配、具一定給付水準、基金管理勞方佔半、保障既有權益、過度時期之彈性<sup>40</sup>。如此看來，只要陳水扁上台，社會保險的附加年金似乎有可能成為未來國家的基本社會政策。但是，很不幸的，陳水扁上台後卻是往相反的方向前進。2001年7月，陳水扁模仿李登輝召開國發會的手法，轟轟烈烈的召開全國經濟發展諮詢會議，宣稱要「拼經濟」。8月25日，針對勞工退休的部份又達成了一個完全不同於國發會的共識：「採行可攜式之個人帳戶制、附加年金制及其他可攜式年金制三制併行，供勞工自由選擇適用，不論哪一方式，不增加政府負擔」<sup>41</sup>，其中，勞方參與討論者有全產總的代表三人（黃清賢、白正憲、黃水泉）、全總一人（林惠官）。

這個共識內在問題重重。第一點必須說明的是，這個共識當中的個人帳戶制，跟1998年國發會的公積金制是一模一樣的東西，還是新自由主義的個人自行負責的政治哲學。第二點是，也是最嚴重的，社會集體分攤市場風險的精神已經「被吃了」。怎麼說呢？所謂集體分攤風險，或說某種程度的重分配，關鍵點乃在於「強制加入」，若沒有這點條件，社會作為一個集體共同保障每個個人這個理想，便如鏡花水

38 參見《勞動者》第91期，1997年11月5日，頭版標題為「許介圭下台」。後來，許介圭也真的很快就下台了。另外，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與勞陣都認為，若是按這個辦法實施，提撥率實在太低，應當提高到10%以上。見台灣青年之聲FM96.9與台灣青年成長團聯合出版的《青年之聲》第16期，頁14-5。

39 參見阿扁勞動政策白皮書第六章。

40 台灣勞工陣線出版的《台灣勞工的主張：2000年勞動政策白皮書》，頁：156-7。

41 經發會就業組共同意見編號410503。



月，毫無基礎。準此，若是採社會保險制的附加年金，本不該存在著「選擇」之自由，若有此「自由」，社會之集體性、互助性亦隨之消逝，反倒是個別個人如何精算自己在什麼制度下獲得最多利益的純粹經濟考量了。這是為什麼勞工陣線2000年提出的八大原則中，跟著社會保險後頭的第一要務便是「強制性」。眾人皆知，假設高薪勞動者，皆選擇個人帳戶制，以便藉此投入各式市場獲得更高之利益，那附加年金制難道不成為低薪勞動者自身的集體保險而已？換句話說，所謂強制性原則自然是排除自由選擇的，而此這個共識中，卻是在自由選擇下的「(假)強制性」<sup>42</sup>。說到底，這整個共識真正的原則只有一個，就是「在社會互助意義的消失下，個人有選擇對自己最有利之自由」，此「個人選擇」之右翼原則後來在立法院的立法過程中，無堅不摧，最終成就了個人帳戶制的勝利。

而參與者此共識的討論者有，全產總代表三人：黃清賢、白正憲、黃水泉，全總代表一人：林惠官。由於全總對此問題並沒有深刻的論述，這裡難以分析；僅以全產總的代表們來說，社會保險精神的附加年金制是其既定的政治主張，此三人長期以來，更是此主張倡議者勞工陣線的重要領導人，在此共識下簽名的確令人意外，而於經發會後一個月，全產總於第一期《工訊》上，完全沒有注意到這個共識的精神根本就不可能出現社會保險制，反倒是不斷的計算在「自由選擇下」的附加年金制中，(根本無從預估多少勞工會選擇下的)提撥率應當是多少的問題<sup>43</sup>。

不僅是全產總對這個不可能的附加年金制的提撥率，薪資替代率

---

42 大同工會理事長白正憲認為：「相信台灣的勞工獲得一定的訊息時，一定會選擇附加年金制」。再者，他強調，如果沒有妥協，以便把這個「選擇」加入，恐怕只有個人帳戶制之結論了(《勞動者》第120期，2001年10月，頁4)。不過，1996年的國發會一樣有「附加年金制」，但卻是清楚的以不可協調的「或」來表達的，可不是讓人「自由選擇」的；更何況，社會保險附加年金制還是陳水扁的勞動政策政見呢。

43 2001年9月20日出版，頁16-7。

的詳細計算，此共識通過後，陳菊主掌下的勞委會也義無反顧的繼續努力玩下去。很快的，勞委會在10月份將勞工退休金條例草案送達行政院，明白表示是根據經發會「自由選擇」的結論來規劃的。而根據其草案，針對附加年金制的部份，會是每個年資0.8%的所得替代率。草案中規定，勞工年滿60歲，參與保險年資達到15年即可請領，其請領金額的計算是：個人每月投保薪資除以所有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之百分比(A)，乘以全體被保險人退休前三年的平均月投保薪資，乘以投保年資，再乘以固定的年金給付率0.8%。這個公式看似複雜，其實A的意義是個人相對於集體的「比例」，亦即，如果一個勞工的投保薪資一直等於所有勞工的平均數值，那麼A這個數值就是100%，在這種情況下，若此勞工保險年資30年，將會有24%(30乘以0.8%)的所得替代率。當然，若是投保薪資長期低於平均值，那麼，自然也就達不到0.8%的所得替代了，而反之亦然<sup>44</sup>。

針對這個版本，勞工陣線很快的在當年的12月出版了一份勞動者特刊，其中不斷的反駁個人帳戶制在經過通貨膨脹後拿不到什麼錢，並且強調附加年金制的種種好處。勞工陣線認為，只要打破經發會共識中所謂的「選擇」，去除個人帳戶制，讓附加年金制出線，那麼應當可以將年金給付率0.8%提高到1.5%，也就是說，每個年資將可以有平均1.5%的所得替代率，這將會比1991年的版本更完美<sup>45</sup>。在這裡，勞工陣線清楚而明白的說明了這個「自由選擇」的不當，只是，由於已經在經發會中對於自由選擇制背書，在論述與行動上很難要國家撤銷這個「個人選擇」之「共識」；再者，如果沒有動員，也很難把給付率從0.8%提高到1.5%。

平心而論，對照著1996年底的國發會共識，此共識不能不說是個歷史鬧劇。至少前者清楚而明白的要在公積金制與附加年金制，這兩

44 以上計算參見行政院勞委會印製的《當前重要勞工法案說帖》，2002年3月。

45 《勞動者》第121期，2001年12月17日，頁12。

個不可能協調的政策當中選擇一個；而後者，竟然可以離奇的融合成一種方案。不過，也從這個離奇當中，我們看到了民進黨執政後的某些軌跡。首先，民進黨上台前後，與之長期關係密切的勞工陣線、以及後來的全產總的主張，能夠部份的進入政策形成的初步階段。像是陳水扁的社會保險主張，怕也是勞陣或全產總相關人士所促成的，而經發會中的共識延續到後來的勞委會的勞退金草案中的附加年金制，也都部份符合了勞工陣線與全產總的主張。看起來，社會福利或保險的部份精神也尋著這麼一條細細的線索，進入了國家政策形成的初期階段。第二，由於過去的關係密切，民進黨除了不敢公開的反對這些主張之外，也順勢吸納特定人士進入國家之中，不論是以現職國策顧問，或是以未來特定官位為籌碼來操作，一方面削弱了社會的反抗力量，另一方面，則可以進一步對社運團體穿透、分化、乃至於培養國家的人馬。最後，過去的主張並非是被粗魯的刪除，而是在技巧上讓其實質意義消失；令每個主張都銷融在更大的右翼框架下，再加以消磨。由此看來，1993年前後那種勞工運動與政治派系那兩條弧線的交錯情形已經不再，現在是勞方的主張被加以技巧性的收納轉化後，節節敗退<sup>46</sup>。

我們以下將會看到在「個人」的原則下，社會保險精神如何在現實操作上，被逐漸收納轉化，然後消磨掉的過程。

#### 四、個人帳戶制的勝利

根據2001年勞委會提出的草案，在2002年10月9日上午立法院的公聽會上，官方、學者、勞工團體、以及資方團體各自針對這個所謂的「三軌制」(其實是個人帳戶與附加年金兩軌制而已，所謂第三制「其

---

46 這時《勞動者》的主編夏傳位已經明白的批判勞委會遺棄了附加年金制的精神，見《勞動者》第122期，2002年1月，頁6-8。

他年金制」基本上就是企業內部的商業保險)提出批評與意見。而當日下午，立法院衛環與社福委員會則針對勞委會以及全產總版本(提出者周清玉，竟然沒有出席)進行討論<sup>47</sup>。觀察所有人大致上的發言，都集中在過去勞基法退休金的不切實際上，因此，皆希望能夠修改成為領得到的勞退制度。如同之前對於勞基法不切實際的批評，勞工陷入「單位責任制」之中，使得退休金也被綁在同一事業單位的帳戶裡。要鬆綁這個「單位責任制」，社會保險是一個方式，公積金的個人帳戶制也是一個方式，然則，如前所述，兩者的意義完全不同，前者代表的是一個社會的連帶，後者則是個人作為一個經濟體的存在而已。

首先，對於社會集體的強調僅有全產總的林明賢，以及幾位左傾的學者(王世鑫、吳慎宜、郭明政)，全總則認為只要將勞基法的單位企業限制去除即可，並沒有什麼社會集體的強調，而這也是全總面對任何重大政策的基調——不碰太難的問題，只求細節上能表現「照顧勞工」的誠意就好；而官方的立場則是不斷強調什麼制都比過去好、並且尊重勞工「自由選擇」的態度。不過，事實上，隔年4月30日，副主委郭吉仁便表明了就個人立場而言，自己傾向於個人帳戶制<sup>48</sup>；資方(工總)則表示了「個人帳戶才具有公平性」，反對「大鍋飯」的立場；商總則說如果兩者並存，根本無法計算附加年金的提撥率，這一點除了說明了商總腦袋清晰，也反映了資方計較的重點主要是「提撥率不要太高」而已。很有意思的，後來成為勞委會副主委、此時仍是新潮流系立委的賴勁麟則表示說，「全產總與勞委會版中的附加年金不是著重在所得重分配」，既然如此，「個人帳戶與附加年金都是個人存多少領多少，只是一次或分次領走」，因此兩者「可以整合在一起」(賴清德也是

---

47 參見立法院公報，第91卷，第64期(下)，頁1-64，包含了上午公聽會與下午衛環與社福委員會的記錄。

48 下詳見。

如此意見)<sup>49</sup>。最後，賴勁麟的「整合說」在委員會中成為主流意見，並要求勞委會重新思考制度單純化的問題——這多少預示了後來2004年通過的整合版本。

若觀察從公聽會到委員會的過程，一個主要的差異是：在公聽會上除了討論資方的勞工如何領到退休金、退休金又有多少、過去的年資如何彌補、以及提撥率的問題外，尚能在社會集體互助以及個人帳戶之間，何者具有公平性的問題上對話，亦即，尚能在哲學的高度上討論何謂正義；而到了委員會後，問題便顯得相當失焦，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政策意義的辯論，僅僅集中在提撥率、過去與未來制度的罰則、誰來管理退休基金、如何領退休金、退休金又有多少……等層次的問題上打轉，完全不論作為一個社會安全政策的根本性質為何。最為關鍵的是，在委員會上賴勁麟的「整合說」成為共識，當然，附加年金與個人帳戶制的意義根本不同，「整合說」很難站得住腳。

仔細的說，賴勁麟與賴清德所認為的「是個人存多少領多少，只是一次或分次領走」，事實上並不是附加年金的真正意義。固然，在附加年金制當中，的確是由資方根據個人薪資比例加以提撥，然則，其重點乃在於年金給付的所得替代率：亦即，是勞工退休到死亡之間的老年保障才是出發點，根據這個保障，才反過頭來計算提撥率該有多少的問題；抽象來說，個人薪資作為一個數學上的變數，乃是集體為了算出該如何有效的將其保障而存在的，因此，一旦社會條件改變，首先要討論的便是如何使保障落實（甚至擴大保障範圍），不一定要調高提撥率，例如：透過擴大社會連帶，再定義「勞動者」的範疇，而將整體的財源擴大，甚至透過社會整體的承擔，以特定稅收（例如：彩卷）加以部份補助……等等，換句話說，調高提撥率不過是眾多手段之一。這當然與個人帳戶制完全不同。個人帳戶制所提撥的，完全是個

---

49 立法院公報，第91卷，第64期(下)，頁60-1。

人的所得，與他人無涉，至於老年的保障，完全取決於個人生涯選擇的狀況，一旦社會條件改變，那也不過就是個人自身的問題而已，解決之道當然也僅能從個人下手，亦即調高提撥率而已，換句話說，在此，個人不僅是個獨立的經濟體，還是孤立的道德單位，在倫理的意義上，人人自負其責。

賴勁麟與賴清德的「整合說」，其實說的是這個「個人自負其責」的原則，與勞工陣線、全產總所提的附加年金制根本無關。只是，由於全產總所委託提案的周清玉根本不在現場（事實上，她似乎從來沒出現在與勞退新制相關的立院討論中），根本無人理解全產總版本的意義到底是什麼。當然，便算周清玉在場也未必會捍衛社會保險之精神；或者，換個方式講，全產總既然在民進黨上台後選擇了「進入民進黨內部，用以換取進步的勞工政策之機會」之戰略——這個延續著1996年勞工陣線簡錫堉與劉進興選擇成為民進黨立委的戰略<sup>50</sup>；那麼，如此公聽會、討論會可以說是關鍵的戰場，賴版的「整合說」成為共識因而過關，顯現這個戰略值得進一步檢討。按照實務經驗來推想，其所委託的周清玉，恐怕僅是因為與全產總的幹部相識而答應幫忙而已，當然不可能談什麼戰鬥與對抗了。

無論如何，此整合說，到了2003年4月與5月委員會開會逐條討論勞退金條例草案的時候，在勞委會副主委郭吉仁的說法中，露出了其意義的內核。當時立委高明見曾經詢問：「假如你要參加的話，不要考慮自己的身分，依你個人的利益，將會選擇哪一種制度對自己最有利？」，而郭吉仁的回答是：「個人帳戶制」，因為「我每個月都可以看

50 2001年5月全產總理事長黃清賢成陳水扁的國策顧問，宣告了勞工運動力量被收編的可能性，也宣告了戰鬥將會大幅受限在官場之中，如果有戰鬥的話。無論如何，這個戰略無論有多少的爭議性，在1996年勞基法修改時，至少簡錫堉還以犧牲勞動條件「換到了」勞基法擴大適用，這件事他稱之為「心中難以承受之重」。當然，這樣做對勞工運動本身的破壞，特別是在規範層次上對勞工自我價值認同的傷害，是很巨大的。參見陳政亮，2006。

到這些錢在銀行裡，而繳多少錢是根據公式計算出來……第二個制度比較複雜，幾千億或上兆元的錢是不是足夠，我們比較不能知道，因為很難去預測幾十年後的狀況」<sup>51</sup>。透過這個答詢，我們清楚看到「個人乃為經濟理財之行動者」的概念被上升為討論的原則與基礎。5月19日，委員會繼續討論，郭吉仁繼續以整合說來表達「兩者相同」，他說：「如果可以不讓(附加年金制的)提撥與領取的部份差距太大，那此精神是較接近個人帳戶制，幾乎可說兩者是相同的」<sup>52</sup>。這當然是個胡說。就算是附加年金制所提撥的與所領取的比例，與個人帳戶一模一樣，這兩者的意義也完全不同。問題不在於到底提撥了多少，或者領了多少，而在於整個制度的設計、實施、以及未來不斷的修改過程中，所展現的究竟是「集體保障個人」還是「個人自負成敗」的原則，就在這一點上，天差地別。不管如何，到此，郭吉仁的說法已經清楚顯示勞委會的企圖：「整合說」掛著「附加年金制」的門面，卻充滿了個人帳戶制的內容。

而也就在這天逐條審查的時候，整合說確定了其文字表達。立委沈富雄在不斷的發言中強調，這兩個制度有「六點不同」：給付方式、給付保障、提撥幅度、再分配、壽命風險分攤、政府保證之職能。而根據他的看法，給付保障、再分配、壽命風險分攤不甚重要，而且可以把兩者設計成一樣，因此不必討論；需要討論的就剩下給付方式、提撥幅度、以及政府保證之職能了。於是乎，他認為，第一、給付方式應採年金制，以免大家一次領光，造成對長命者不公平。第二、因為投資報酬率降低，若確定給付將造成債留子孫，因此提撥應當固定。第三、由於採確定提撥制，政府當然不必負擔最後的保證責任了。所以，經過這樣設計，「這兩個制度便可以一樣的了」<sup>53</sup>。

51 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27期，頁202。

52 立法院公報，第92卷第34期，頁124。

53 沈富雄的發言次數多，且非常冗長，但是支配了整個討論的方向。以上整理來自立

在其短短的發言中，層次錯亂到令人不知從何理解起。首先，這「六點不同」都是在更大的政治哲學範疇之下，相互關連、並且整合在一起的「技術性概念」，根本無法各自切割來比較；舉例來說，若從社會保險或個人帳戶制的角度出發，每一個概念就有不同的意義，因此，這些概念的比較，必須先被放回到更大的脈絡下來理解，否則無法比較。換句話說，若把這些技術性概念當成是問題核心，其實是把枝節當成重點，把基本討論變成技術討論了。那有意思的是，既然是失去脈絡的技術討論，在這裡，沈富雄又不知道是根據什麼樣的脈絡，竟能說「給付保障、再分配、壽命風險分攤」是「不甚重要」的？然後，同時又說「給付方式應採年金制，以免大家一次領光，造成對長命者不公平」這種直接關連到所謂「不甚重要」的「壽命風險分攤」概念的話？

不過，要理解沈富雄的邏輯也並非難事，事實上是：他一方面贊成了「個人自負其責」的原則，因此逃避了對「給付保障、再分配、壽命風險分攤」的討論，另一方面，他又想像所有繳交的錢皆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須想辦法，讓大家透過壽命的機制公平的領取，這樣一來，他又同時贊成了社會保險的原則了。不過，他又擔心如果現在年輕人繳交的收入，被老年人領走（所謂「債留子孫」），這樣似乎又對個人不公平，這時，他又硬是回到了「個人」原則。

就在他不斷的反反覆覆之中，本來應當是基本的討論，全成了枝節的、技術性的混戰，他說得層次錯亂，大家也囫圇吞棗，但是又隱隱然覺得可以這兩種制度似乎真的可以加以整合的樣子，於是乎，委員會竟在這種混沌狀態下，達成「文字上的共識」：將「三軌制」的字眼全部拿掉，改成籠統的「勞工退休金」。到此，不同制度的字眼完全消失，「整合說」獲得文字上的勝利<sup>54</sup>。

---

法院公報，第92卷第34期，頁119-223。是在127頁處他表明了此六點不同。

54 諷刺的是，文字上的整合說是沈富雄提議，新系賴勁麟附議，全總林惠官同意。立



2003年12月31日，委員會通過了非常接近最後定案的版本，僅保留了六條關連到新舊制度銜接問題的條文。此時，擔任主席的沈富雄公開說明，他與勞委會密集協商後，討論出了一個「個人帳戶為主、附加年金為輔」的制度，他更得意稱之為「附加年金插枝法」；這意思是說，以確定提撥的方式將一定比例的個人薪資，儲存到個人的帳戶之中，到了一定的退休要件，便將這些錢除以平均餘命後，以月退的方式領出，而國家保則證了兩年定存之利率，如此一來，他說：「附加年金制的優點幾乎沒有一個遺漏的」<sup>55</sup>。

這一次，勞委會終於顯現出自己的意圖，沈富雄也終於明白了自己真正的立場，也把整個委員會帶向了個人帳戶的方向。過去勞委會模糊的個人選擇說，衛環與社福委員會曖昧的整合說，這一次終於都被徹底掃除，彷彿是勞委會與委員會緊擁在一起，借著對方的口，說出了自己的心聲一般。

正確來講，沈富雄與勞委會所謂的「附加年金制的優點幾乎沒有一個遺漏的」還是在胡說。首先，附加年金的集體互助的優點幾乎根本就不存在：所謂以月退方式領出，如果還是領自己的存款，哪怎能說是附加年金制集體互助的優點呢？第二，所謂國家保證兩年利率也難以說服人，因為個別勞工把自己的薪資存到銀行，在15年後領取，其利率難道不會超過兩年定期存嗎？如此的政府保證，不就等於是沒有保證嗎？最後，條文上還說，超過平均餘命的錢，則是由勞工自己領月退時，又開始繼續花錢投保，亦即，還是要個人自己負責「超過平均餘命」的責任了。這樣看來，此處所謂的「插枝法」了，到底插入了什麼附加年金制的好處？其實，真正插入的不過只是個附加年金制的枝微技術而已，表面上好像是「年金」，骨子裡卻回到了1997年勞委會許介圭時代下所提出的公積金制了。2001年經發會以來，從「自由選擇」到

---

法院公報，第92卷第34期，頁134。

55 立法院公報，第93第6期，頁276。

「整合說」，到「去除三軌名字之文字整合」，到「插枝法」，繞了這麼一大圈，以勞工陣線與全產總為主，所提的附加年金訴求最後終於戰敗，被打回新自由主義的道路上。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從「自由選擇說」開始，「公平」的定義就已經被固著在個人自身的努力上了，彷彿所有的社會連帶已經消失不見，「個人」是此類論述的唯一起點與終點。在議會鬥爭中，如此預設幾乎沒有遭遇任何對抗，甚至根本沒有人心裡堅實的明白，這得加以對抗。社會保險制裡頭所得再分配的議題，被賴勁麟等人輕輕帶過，而在這個右翼的政治哲學話語之後的，便是典型的市場殺戮了。這大概也顯現出台灣缺乏對抗右翼的文化傳統，連社會保險所在意者便是重分配，所意欲挑戰者正是「個人自負其責」，如此基本的概念，都能夠在國會被荒謬的加以「詮釋」。

## 五、最後的戰鬥

2003年最後一天通過的這個草案，很快的引起了除了全總之外的工運團體不滿。當天，勞工陣線與全產總措詞強烈的批評這個制度是個「強制儲蓄又不確定給付的個人帳戶制」，勞工將自己承受退休的風險，簡直是「對勞工的欺騙」。工委會則認為如此一來，勞工的退休金將大幅縮水，並表明台灣勞工絕對不會接受這個制度。不過，全總則認為在這個制度下，勞工將會獲得比勞基法退休金時代下更大的保障<sup>56</sup>。這樣看來，除了全總之外，工運團體與工會聯合會——特別是長期追求社會保險的全產總與勞工陣線，當會戮力動員進一步擋下這個有嚴重問題的「強制個人儲蓄」法。但是，事實卻不是如此。2004的2月，勞工陣線只在自己刊物上寫了篇文章，說這個草案必須等到勞保

56 關於全產總、全總、勞陣與工委會的反應，參見《工運年鑑2003.06-2004.05》頁110，2003/12/31條目。

年金化後再審，完全沒有動員的準備<sup>57</sup>；而全產總僅在2月21日，作了一個呼應陳水扁飛彈公投的「工投救台灣」民意調查，說有69.55%的勞工贊成附加年金制<sup>58</sup>；然後，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辦了個記者會，表示將聯合民間團體推動「公投改造勞退制度與改革國會」<sup>59</sup>。此後，到6月勞退大戰，兩者並沒有其他行動。

其他的團體則一如往常的忙著許多重大議題：2、3月時，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正在組「廢票聯盟」，並且以此為主，對一般大眾進行政治上的教育與動員。3、4月地方產總則忙著因陳國樑會務假案延伸出來的「搶救工會大聯盟」。就幾個大工會來看，2004整個上半年，中華電信工會尚在為阻擋私有化進行最後的鬥爭；而2003年最具爆發力的台鐵工會已經在本年年初時，取得了具體的成果，暫時休養生息；銀行員則在合併浪潮中，捍衛即將被併吞的銀行員工的權益；教師會則針對教師不得組工會持續鬥爭中；其他尚有個別工會的零星動員，如宜興客運(欠薪)、豐達(裁員)、信立(年終獎金)、慶光(欠薪)、中客(欠薪與打壓工會)、左營醫院(打壓工會)、尊龍客運(打壓工會)、中鋼(釋股)、新光人壽(降低勞動條件)、北市捷運局(解僱)、台電(撤換董事)、桃勤(年終獎金)……等等<sup>60</sup>。

從如此記錄中，也許我們能夠明白台灣工人的力量此時何在。台灣勞工運動向來是以廠場／企業工會的利益與權益為主而進行動員的，或者說，為了「會員權益」在奮鬥，除此之外，難有他求；事實彷彿是如此：台灣的勞動者在此根本不能說是個做為工人階級成員的工人，而僅是以個別廠場／企業工會會員的方式存在而已。當然，這個上半年的工運狀況也無例外：沒有一個工會能夠超越自身的議題而有

57 《勞動者》第132期，頁49-51。

58 《工運年鑑2003.06-2004.05》頁131，2004/02/21條目。

59 《工運年鑑2003.06-2004.05》頁155，2004/05/01條目。

60 請參考《工運年鑑2003.06-2004.05》頁112-159。

所動員，其所組成之工會聯盟也大概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勞工現實而直接的利益，其實不過是會員的利益。工運團體與工會自然不同；不過，工委會似乎不把社會保險當成是既定的政治目標，當然並不會將之排在其政治議程中，也不會特別進行倡議與動員。勞動人權協會在五一時的動員焦點，則集中在兩顆子彈與對抗台獨法西斯。而長期推動社會保險制的勞工陣線，面對著自己所提的政策主張，在進入國家政策的制定過程中被逐步剷除，卻還是無法切斷與政黨勢力的連帶，而僅僅以寫文章來表達意見，如此的態度，等於是放棄了動員，因此，也就失去了團結其他組織的可能性。這個上半年台灣工運的整個狀態，宣告了勞退鬥爭必敗無疑。

2004的上半年就在紛紛擾擾的兩顆子彈中過去了，5月27日立法院衛環與社福委員會一讀通過了「插枝法」下的「個人帳戶年金制」，以「確定提撥制」與「個人帳戶」為其特點，僱主每月將提撥勞工薪資的6%進入勞工的個人帳戶，整個基金會進行市場操作以獲得利益，而政府則保證2%的利率，勞工等到年滿60歲，投保年資達到15年以上，可以請領月退，若年資未滿則是請領一次給付。月退部份，是以平均餘命來計算，超過部份，則如先前所言，勞工必須得在請領月退時再度花錢加保<sup>61</sup>。此時勞委會為了讓此新制能順利過關，還特別刊登廣告，宣稱在提撥率6%，勞退基金收益6%的狀況下，將來勞工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會是24%，加上勞保年金，所得替代率可以到達54%左右。不過，勞委會忘了計算通貨膨脹率，也高估了基金的收益，根據中華民國退休金協會的精算，如果加上1%以上的通貨膨脹率，基金收益僅有3%，以30年年資來計算，最後的所得替代率還不到10%<sup>62</sup>。就算先不論勞保年金化的問題，這個所得替代率比起1991年以來的各種

61 參見苦勞報導，2004/05/27。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3917。

62 苦勞評論，2004/06/12。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118。勞委會在報紙上的廣告(六月三日)請參見《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1。

版本都相差太過遙遠。

為此，27日當天工運團體開始動員施壓，立法院外聚集了兩、三百人，勞方除了批評確定提撥制無法保證「確定給付」的社會正義精神之外，也抨擊勞工會因為許多不確定因素(如通貨膨脹、薪資成長率、基金收益)無法獲得恰當的保障。不過，綜觀整個勞工運動的策略似乎是集中在「舊制退休金如何保障」的議題上，特別是面對到個人帳戶制幾乎是無法推翻的狀況下，舊制的保障成了唯一的題目。正因為這一個集中反對將舊制一筆勾消的火力，要求舊制退休金應當併入新制一起計算，使得整個爭議繼續延續，部份條文也無法通過而保留到朝野協商<sup>63</sup>。6月4日，整個條文除了國民黨與民進黨黨團簽字同意之外，代表全總／親民黨的林惠官，以及與工委會合作的無盟高金素梅皆拒絕簽字。林惠官信誓旦旦的表示，如果親民黨向勞委會妥協，他將要求新舊制銜接的條文記名表決，要「全國勞工看看是那個立委讓勞工損失上百萬元的退休金」<sup>64</sup>。高金素梅與工委會還要提出如下的修正條文：「將舊制年資併入新制中，由僱主三年內提撥完成」<sup>65</sup>。以後見之明來說，這策略似乎是無力翻轉整個勞退新制下的一種邊退邊打；不過，勞委會之所以會強力推動勞退新制，正是要一筆勾消過去勞基法下的退休金責任，這從1989年趙守博以來的歷任勞委會，立場都是一致的，歷史上看來，也許這反而是最難以攻破的城牆。

無論如何，這時行政院也推出了一個纏鬥多年的勞動三法修正案，由於其中對於教師組工會、會務假、與罷工等議題依然採取限制

63 苦勞報導，2004/05/27-2。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3927。

64 苦勞報導，2004/06/04。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65。另外，林惠官自己發出所謂「林惠官委員對於退出六月四日勞退條例黨團協商的主張」新聞稿說，這種法案「棄勞工如敝屣，親民黨怎可簽字？」見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61。

65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新聞稿，2004/06/04。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55。

的態度，迅速引起工運與工會的緊張與動員<sup>66</sup>。最耐人尋味的是，全產總就在6月4日這一天舉辦記者會，呼籲立法院儘速通過全產總版的勞動三法，讓勞工籌組工會能有更大的空間，為工會運動注入新的活力<sup>67</sup>，看起來，整個焦點轉向到勞動三法的討論，客觀上不利於集中勞工的力量。此時，全產總自己過去的主張即將失敗，實在不應當僅僅提出勞動三法的訴求而已。

6月7日中午，朝野重新展開勞退金新制協商的同時，勞委會現場提出一項對舊年資保障的修正案：「將針對舊制年資的提撥率進行精算，並要求僱主五年內足額提撥，如有違反將按月連續處罰」<sup>68</sup>。對此，林惠官則於下午表示，在「不滿意但勉強予以接受」的狀況下，他會簽署協商結果；同時，他也發出新聞稿說：「明定僱主五年內足額提撥的責任，勞工至少可以……嚴加監督把關……今天的結果，其實只是勞工的小勝」，並「相約下一步再戰」<sup>69</sup>。這裡所謂「勞工小勝、相約再戰」恐怕是個一廂情願的看法。因為過去勞委會無能處理勞基法下的退休金，更有心要丟開這個責任，加上這一條修正案也不可能處理這個問題的。勞委會這個作法基本上是欺騙的成份居多。

不過，真正高段的是資方與勞委會的雙口相聲。6月8日，工業總會等資方團體直接到立法院公開向立委們表示，新制中提撥率6%太高，很難立即達成，而舊制中五年內撥足的規定更將造成企業龐大負擔<sup>70</sup>。工總忘記了在過去三年的立法過程中，自己或其代理人們從來沒有一次提出6%提撥率太高的說法，這個時候來鬧場，恐怕是趁亂打劫

---

66 苦勞報導，2004/06/09-2。http://old.coo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28。

67 請參考《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0，2004/06/04條目。

68 苦勞報導，2004/06/07。http://old.coo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795。

69 全國總工會、立法委員林惠官辦公室。標題為「勞退金條例協商，不滿意但勉強暫予接受。協商版僅現職者舊年資獲保障，相約下一步再戰！」

http://old.coo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790。

70 請參考《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4，2004/06/08條目。

的成份居多。當天，陳菊馬上跳出來高分貝向社會喊話，說勞退條例已經空轉十年，倘若再不通過將難以向八百萬名勞工交代<sup>71</sup>。6月10日，繼工總之後，全國商業總會與中小企業協會也舉行記者會說，在未與工商及勞工團體針對勞退金新制充分協商、建立共識前，即讓政府以公權力強制規定企業將大筆資金投入閒置又沒有效率的基金中，是不負責任的做法<sup>72</sup>。與工總一樣，商總與中小企業協會，以及其代理人們，在立法過程中從來也沒有為此問題說過話，目的恐怕也是想看看能否不戰得利。這時，中小企業主代理人的台聯立委程振隆急忙跳出來演了一齣「盡忠報主」的好戲，他說，台聯希望資方的負擔不要太重，因此新制的提撥率應分三年逐步從2%、4%到6%，而舊制中五年足額提撥，也應改成七年，並以撤簽朝野協商作為挾持<sup>73</sup>。陳菊這天抖出重話了，說「誰阻擋勞退金新制，誰就是歷史罪人」<sup>74</sup>。這明的是對著資方晃刀，暗的卻是向著勞方開槍。當時勞委會已經放出耳語暗指無盟及工委會為特定政治利益，而阻礙廣大勞工受勞退新法的保障了<sup>75</sup>。

資方或許想在亂軍中撈到好處，但是與勞委會這場雙口相聲，不折不扣是記重手。過去勞基法無法保障勞工退休的錯誤，突然變成是勞方的責任，變成誰要不棄守，誰就是歷史罪人一樣。這一天，無盟發表聲明，除了新舊年資銜接條文將要求記名表決之外，會簽署朝野協商，這也意味著勞退金新制將在院會表決後通過了<sup>76</sup>。戰場已經清

71 見《聯合報》，2004年6月8日。標題為「陳菊指勞退條例拖十年未通過對勞工無法交代」。

72 請參考《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7，2004/06/10條目。

73 苦勞報導，2004/06/10。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63。

74 請參考《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7，2004/06/10條目。

75 工委會新聞稿，2004年6月10日。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46。

76 高金素梅立委辦公室新聞稿，2004年6月10日。文稿中說：「無黨團結聯盟不會簽署協商版本，但是無黨團結聯盟也不會技術擱置勞退新制，讓我們在院會中，記名表

理，剩下的不過是謝幕後的問題了。

工運團體以及具有動員實力的工會，包括全總、全產總、自主工聯、中華電信工會、全國教師會、台塑聯合會、高醫工會、台灣電力工會、台灣省自來水工會、左營海軍醫院工會、大台北瓦斯工會、欣欣天然氣工會、尊龍客運產業、新竹縣產總、勞權會……等等，於11日開始聚集在立法院外，主要目的不是反對勞退新制，而是反對限制教師組工會、不得罷工以及罷工冷卻期的勞動三法修正案。當晚9點15分，勞退金條例進行爭議條文的表決，通過了朝野協商的版本，明定了舊制年資保留不保障，舊制退休金五年內足額提撥，新制提撥率從第一年必須是6%的條文。作足戲的台聯於新制通過後，也沒忘記資方的利益，提出了附帶決議案，要求政府以低於金融行庫利率，將新制勞退基金提供給中小企業貸款。雖然，此附帶決議並未通過，但應當也足以令資方溫暖在心頭。而攸關全國勞工團結與爭議權的勞動三法，則在抗議聲不斷下，沒有通過<sup>77</sup>。單以勞工退休金新制來說，可算是大獲全勝的陳菊，自言：「回顧一生，曾經歷許多挑戰與艱苦……我還是不放棄希望」，並說此勞退金新制通過乃是「14年的爭議終於找到一個共識的新起點，是台灣勞工的福氣」<sup>78</sup>。

新制通過四天後，就在全國工運團體痛罵勞委會與立法委員的高聲之中，選擇不參與戰鬥的全產總，這時突然再度提出附加年金的主張。6月15日，應陳水扁之邀，全產總理事長盧天麟赴總統府表達意見說，未來對於以兆計的勞退基金的管理與運用必須要有嚴格的監督機制，而舊制中的五年足額提撥，全產總也對勞委會「寄予相當厚望」，另外，勞保老年給付的年金化「刻不容緩」。最重要的，全產總說

---

決」。亦即，除了新舊年資條文的協商版本之外，無盟不會拒絕簽署朝野協商，而使立法院無法進行三讀。<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36>

77 以上整理參見《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8-20，2004/06/11條目。

78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新聞稿，2004年6月11日。

<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031>。標題為「0611主委致詞參考」。



「仍然會持續推動附加年金的公投，從法律通過到勞工開始請領個人帳戶中之退休金還有一段時間，我們不放棄任何能夠扭轉制度的可能機會」<sup>79</sup>，著實令人錯愕。

無論如何，一個恐怕會令林惠官憤怒的消息是，根據苦勞網記者的實地採訪，2005年3月28日，在勞委會與人力資源企管顧問座談中，勞動條件處處長李來希竟然敢公開說，勞退休金條例所稱舊制中五年足額提撥的部份，關於足額的認定，並沒有統一的標準，事實上無法執行，請資方不必緊張。沒想到李來希說了實話，見了報，卻因此調了職<sup>80</sup>。

## 六、勞退對抗失敗之後

從1984年的勞基法到2004年的勞工退休金條例，整整20年來的轉變不可謂不大，以後見之明來說，從「單位責任制」變成「個人帳戶制」的轉折，也許可以直觀的說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但是，在這過程當中，社會保險並非一點機會也沒有。回顧歷史，我們看到的並不是社會保險制必然會落敗，而是在有機會推動的狀況下，不戰而敗；至少，1991年的勞委會版、1996年國發會的二選一、2000年陳水扁競選承諾、乃至2001年的自由選擇中，都曾經出現過這個主張（即便是部份的出現過），在全力推動的狀況下，也不見得無法激起有意義的社會辯論。可惜的是，議題的推動者在民進黨當權後，缺乏必要的堅持，乃至於後來一敗塗地，拱手將這些歷史機會白白浪費掉，也把這個議題「消費」掉了。當然，除了如此批評之外，最重要的是理解這個失敗

---

79 全國產業總工會新聞稿，2004年6月15日，題為「全產總向總統陳情，表達對勞工退休金之訴求」。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323。盧天麟這時所說的「不放棄任何扭轉制度的可能機會」，恐怕已經很難令人信服了

80 見《工運年鑑2004.06-2005.05》頁154，2005/03/28條目。這是經過苦勞網記者的證實。

背後更為歷史性與結構性的因素。

回到一開始所提出的，本文包含了三個分析的面向：論述的、階級政治的、以及個別行動者的。在論述分析的面向上來看，可以進一步看到福利論述消失的原因。當然，過去20年來高喊著「東方福利國」的民進黨政治派系，以及外圍攀緣者，在人們回過頭來檢視他們過去的主張時，可能看到的是一個政治欺騙的典型：他們可以很快把過去的主張丟到一旁，縱使這些主張曾經讓他們在大大小小的選舉中獲得人民的青睞，也絲毫不覺得難為情。這固然是一種檢驗方式，但是顯然還無法解釋民進黨政治派系的轉變。事實上，這些福利主張的實際運作過程裡，真正的原則是族群國族主義，福利論述可以說是個「附加的」、或是「額外的」政見，用以補充「新」國家的社會內容；而即便是額外的性質，福利國家論述中的社會性，都必須被修訂為「社群性」的，以免與族群政治內在的排他性相衝突。這是為什麼在1995年以來，族群國族主義一路跟著李登輝與陳水扁高漲後，在民進黨中的福利國家論述就一路消失的歷史結構<sup>81</sup>。

再者，從階級政治的面向來分析，首先是國家的角色問題。當它的正當性在80年代末被資本與工運挑戰的同時，逐步的與資本同盟，以掃蕩社會運動、降低勞動條件，順從了資本的意願。這個資本與國家同盟的狀況維持到了兩千年民進黨取得政權後，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了些許的不同，社會福利的聲音似乎可以在政策形成初期發揮影響力。不過，正如上述論述分析所言，民進黨的政治傾向從來就未曾真正經歷過左翼的挑戰，福利論述不過是曇花一現的、乃至於符合國族動員的選舉策略而已，期待這個政權會自然向左轉變，支持社會福利與保險的政策，恐怕也不太可能，更何況，如同本文之前所言，在1994年關於健保的勞資政分攤比的鬥爭中，民進黨已經不再懼怕與資

---

81 甚至到了民進黨執政末期，都還可以利用公教人員的「18%」來做族群動員。可見福利論述要出現是高難度的。

本站在一起了，那麼兩千年後的國家性質，也就不可能左傾而轉向社會福利。準此，表面上的些微轉變，並非是關聯到國家性質的意義了，相反地，具有一個「複製歷史」的性質。

所謂「複製歷史」是指國家統合主義的再生。在兩千年取得政權的民進黨，因為過去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密切，使得部份左傾人士、與所代表的福利聲音隱隱的保留在這個國族主義的政黨之中。這在兩方面都是有用的，第一，民進黨巧妙的運用了既有的工運關係，將工運頭人逐步收編，外在的瓦解了工運的對抗力量；更進一步的，扶植特定的人士，滲入工會聯盟之中取得領導權，從內在瓦解了聯盟的力量，直接對可能的反對者消音。這種透過利益與權位分配來操控著社會團體的動員(與反動員)的手法，看起來與國民黨過去的統合主義類似，唯一不同的是，當時國民黨背後聳立的是軍警暴力的恐怖監禁，這時民進黨肩上揹的則是國族主義的閃耀金刀；若要說國民黨是「威權侍統合主義」，這裡不妨說民進黨是「國族統合主義」(當然，這一點不是這篇文章所能完整論證的了)。第二，福利的聲音被統合進民進黨裡頭，卻一點都不保證它的擴散，反而見證其凋零；民進黨透過一個簡單的「自由選擇」概念框架，就可以把一個左傾的社會保險制度想像給悶死，在缺乏左翼傳統的台灣社會裡，把「個人」抬高到社會公平問題的起點的地位，然後透過在議會而非街頭的對抗，以精巧的措辭逐步的將法案文字轉向，乃至最終完全將意義掉轉，徹底取消了福利想像的可能性。

無論如何，在階級政治的分析上，除了國家與資本的同盟之外的力量，便是在企業／廠場工會制度下的勞工運動。正如一開始所說的，1984年訂定的勞基法實際上無法保障大多數勞工的退休生活；而所謂「大多數」也者，主要是指涉在私營企業以及中小企業裡頭的勞動者。當然，自主工會是保障勞工的重要機制，如果台灣的自主工會強盛，也許可以透過與資方簽訂團體協約來爭取更大的退休保障。但也

如眾人所知，真正具有力量的工會通常是傳統公營事業以及大型私人公司下的廠場／企業工會，這些勞工在舊制的退休準備金提撥上也大致沒有問題，換句話說，退休生活未獲保障之勞工，存在於工會組織力量最為薄弱之處。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景象，真正具有對抗實力的工會恰好是不須面對此次勞退制度轉變的工會，而沒有工會保護之勞工，也無能在歷史上為自己發聲，形同啞。這正是以廠場／企業工會為主的台灣工運最大的問題：無能去組織與保護那些未受組織保護者，使其在制度的更替之中，更形弱勢，更為邊緣，更受剝削。另外，由於這個特殊的組織形式，使得勞工對「工會事務」的想像，極為貧乏，會員與幹部兩相牽制，將運動能量緊緊鎖在自己會務的直接利益上，無法透過組織的擴大而產生思惟的交流與激盪，這種狀況下當然不可能對於整體國家性質有何種特定的看法。

最後，則是個人行動者（以及團體）的分析面向。在這整個制度的轉變過程中，無論是1991年勞基法與勞保修正案、1993年的勞基法修正案、1994年的健保鬥爭、到1997年的公積金方案、2001年的經發會、以及後來進入立法院的戰鬥，特定的行動者與團體在特定的時刻考慮了特定的因素，做了一些決定，產生了一定的效果，特別是在90年代幾次工運與資本、國家的對抗，都取得了某些成果，暫緩了新自由主義的擴張。當然，這些決定與行動並非是沒有限制的，更不是完全「自願主義」的，他們的行動，是在國族主義的威力下、在企業廠場工會的限制中、在勞、資、政三方架構裡、在資本與國家逐步夾擊之際、最後，是為（新的）國家統合主義架構所吸納，成為國家的一部分。正是因為作為行動者的力量，曾經奮力抵抗過新自由主義的實現，人們因而承擔了被批評的歷史責任；也正是因為作為行動者的力量，在結構困境下逐步退卻，人們因此更需看到遠為複雜的歷史面向，尋求超越的可能。

無論如何，總結台灣80年代末逐步浮現的左傾政治力量，在1994

年前後由勞工運動所支撐住的社會福利想像，與新潮流系的大論述兩兩交織，剛好形成了一場歷史的誤會：右邊是族群政治下的額外裝飾，左邊則是工會直接利益的勉強延伸，兩個既真實又虛偽的相遇，激盪出一場既豐盛又貧脊的福利風潮。而如果說此次勞退制度的歷史案例能夠提供我們什麼樣的省思或啟示的話，也許我們應當要先面對的不是國家與資本的同盟，而是工運內的廠場／企業工會的形態與想像，唯有先改變此體制，才有可能建造真正屬於勞工的聯盟，並從中創造新的認同。再者，如果福利論述要能夠真正發揮作用，還是得先面對台灣特殊的族群政治，除了得避免掉入社群排他性思索的陷阱，更得直接的對抗這個以族群作為切分線的國族主義。最後，在一個缺乏團結傳統的社會之中，「個人自負其責」之原則，正是個值得不惜代價直接對抗的重要課題。

#### 參考書目

- Gough, Ian (1995), 《福利國家的政治經濟學》，古允文譯。台北：巨流。
- 王振寰(1995)，〈台灣新政商關係的形成與政治轉型〉，見徐正光、蕭新煌編《台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
- (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 王增勇(2005)，〈社區照顧的再省思：小型化？規格化？產業化？〉。《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9期。
- 台社編委會(2004)，〈邁向公共化、超克後威權：民主左派論述的初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3期。
- 台灣勞工陣線(1999)，《台灣勞工的主張：2000年勞動政策白皮書》。台北：勞動者雜誌社。
- 吳也魯(2002)，〈退休金改制之探討〉，見苦勞工作站編《審判經發會》。台北：苦勞工作站。
- 金寶瑜(2005)，《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台北：巨流。
- 陳政亮等編(2006)，《工運年鑑2003.06 - 2004.05》。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苦勞網、台灣勞工資訊教育協會。
- (2007)，《工運年鑑2004.06 - 2005.05》。台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苦勞網、台灣勞工資訊教育協會。

郭明政(1997)，《社會安全制度與社會法》。政治大學法學院勞動法與社會法研究中心。

——(2006)，〈勞退新制之政策形成與立法中分析〉。《台灣勞動法學會學報》5期。

單驥(1987)，《勞基法中退休準備金提撥率之調查及研究》。中華經濟研究院。

傅立葉(2000)，〈老年年金、政黨競爭與選舉〉，見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台北：巨流。

詹火生、林昌勳(2002)，〈勞工退休金政策分析：國家干預的觀點〉。《國政研究報告》。網址：<http://old.npf.org.tw/PUBLICATION/SS/091/SS-R-091-020.htm>

趙守博(1992)，《勞工政策與勞工問題》。中國生產力中心。

簡錫堦(1993)，〈窮人互助會怎算是福利制度〉。《新潮流》5期。

### 官方資料

立法院公報：第80卷，第77期；第80卷，第84期；第80卷，第98期；第81卷，第10期；第82卷，第59期；第91卷，第64期(下)；第92卷，第27期；第92卷，第34期；第93卷，第6期

行政院函，中華民國八十三年6月27日台八十三勞字第二四三六一號。

行政院勞委會《當前重要勞工法案說帖》，2002年3月。

### 其他

《工訊》：第1期

《台灣工運》：第1、7期

《青年之聲》：第16期

《紅燈左轉》

《勞動者》：第52、57、58、65、91、92、120、121、122、132期

《新潮流》：第3至20期

《敬老年金運動問答手冊》

《中國時報》，1991年11月7日。

《自立早報》，1991年12月2日。

《聯合報》，2004年6月8日

苦勞報導，2004/05/27。<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3917>

苦勞報導，2004/05/27-2。<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3927>

苦勞報導，2004/06/04。<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65>

- 苦勞報導，2004/06/07。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795
- 苦勞報導，2004/06/09-2。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28
- 苦勞報導，2004/06/10。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63
- 苦勞評論，2004/06/12。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118
- 苦勞社論，2007/07/22。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459
- 工委會新聞稿，2004/06/04。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55。
- ，2004/06/10。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46。
- 民主進步黨第十屆第八十五次中常會新聞稿，2004/06/15。
- 全國產業總工會新聞稿，2004/06/15。
- 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323。
- 全國總工會、立法委員林惠官辦公室新聞稿，2004/06/04。
- 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561。
- ，2004/06/07。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790。
-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新聞稿，2004/06/11。
- 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5031。
- 高金素梅立委辦公室新聞稿，2004/06/10。
- http://old.coolloud.org.tw/articles/article.asp?id=94936

不僅僅是模組化  
台灣資訊電子業ODM製造商的研發地理學研究\*  
楊友仁\*\* 蘇一志\*\*\*

Beyond Modular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of Taiwanese ODM Manufacturers  
in ICT Industry  
by Daniel You-Ren YANG & I-Jhy SU

關鍵字：產業組織、生產網絡、模組化、協商式升級、非貿易性互賴

Keywords: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production network, modularization, upgrading by negotiation, untraded interdependence

---

收稿日期：2006年2月16日；接受日期：2009年10月10日。

Received: February 16, 2006; in revised form: October 10, 2009.

\* 本文的英文版本曾發表於AAG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05 Annual Meeting, Denver, 並獲得Asian Specialty Group學生論文競賽第二名，感謝Neil Coe對原始英文版本提供的寶貴意見，以及台社兩位審稿委員的精闢建議，讓本文更上一層樓，此外國科會研究計畫98-2410-H-029-060-提供相關研究經費，特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181號  
E-mail：yyren@ms34.hinet.net

\*\*\* 服務單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通訊地址：720台南縣官田鄉大崎村66號  
E-mail：suijhy@mail.tnnua.edu.tw



## 摘要

本文主要從經濟地理學的角度探討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產品研發行為，並和「模組化生產網絡」的觀點進行對話。本文提出一個「協商式升級」的觀點，強調台灣資訊電子業在產品研發上所扮演的技術協商整合角色，以及與品牌客戶、關鍵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技術互動與互賴關係。台灣資訊電子業的開發過程牽動著綿密的廠商之間以及廠商內部立基於「會意化知識」之複雜互動，技術領導性廠商所建構的系統架構以及原始技術規格僅僅是這樣的技術互動之起點，模組化理論取向並不能完全解釋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協力式創新動力，而品牌廠商與供應商之間仍然維繫著很強的相互依賴性。

##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IT system manufact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geography and dialogue with the model of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We argue that the modularization approach could not fully explain the “iterative collaboration” dynamics of Taiwanese ODM manufacturers. Even though the tendency of modularization is correct, the modularization process often mixed with non-modularizable process that required the face-to-face interaction, implicated frequently inter-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flows as well as non-arm’s length transactions. In this sense, the “upgrading by negotiation” model of Taiwanese ODM suppliers not only capture higher added value in the production networks, but also gain power from the brands and key component suppliers in the process of co-design, and result in the different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 前言

近來跨國的技術學習課題已經成為經濟地理學的重要研究課題 (Amin and Cohendet, 1999; 2004; Amin and Thrift, 1992; Boschma, 2005; Bunnell and Coe, 2001; Coe and Bunnell, 2003; Howells, 2002; Hsu and Saxenian, 2000; Kirat and Lung, 1999; Morgan, 2004; Saxenian and Hsu, 2001; Sturgeon, 2002; 2003)，而台商資訊電子業的生產網絡也逐漸成為國際經濟地理學界關切的一個研究領域 (Hsu 2005; Poon, Hsu, and Jeongwook, 2006; Sturgeon and Lee, 2005; Yang, 2006, 2007; Yang and Coe, 2009; Yang and Hsia 2007; Yang, Hsu and Ching, 2009; Yang and Wang, 2007; Yeung, 2007)，然而關於台灣資訊電子業的「研發地理學 (geography of innovation)」(Bunnell and Coe, 2001; Coe and Bunnell, 2003) 仍是一個有待進一步探究的課題。本文希望能在這個面向上做出貢獻，我們將透過台灣資訊電子系統廠商具體的產品研發行為之研究，特別是所謂「ODM (Own-Design Manufacturers)」生產模式下的研發模式，來和既有對於技術學習的組織及其地理形式之相關觀點進行對話。

舉例來說，「模組化生產網絡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模型認為台灣資訊電子業系統廠商的競爭力相當程度係因為若干核心國家技術領導性廠商 (例如 WINTEL) 建構了「模組化」的 PC 系統架構，使得品牌廠商 (例如 Dell, HP 等) 基於分散風險以及降低成本等考量而自由地下單給台灣系統廠商 (Sturgeon and Lee, 2005)，換句話說，這個模型認為台灣的競爭優勢是低成本製造，品牌廠商在選擇供應商上具有很強的彈性與開放性，而關鍵在於領導性廠商所建立的系統技術規格 (specification, spec.)，使得複雜的技術可以被「符碼化 (codify)」而廣泛流通，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以及競爭壓力，在先進大廠所設定的系統規格下，領導廠商主導了與台灣廠商的外包關係與技術規格。

本文基本上認同「技術規格」對於理解台灣資訊電子系統廠商的產品開發有相當的幫助，但對於技術模組化的具體社會過程以及台灣廠商與品牌廠商、技術領導性廠商之間的互動關係有不同的看法。在理論的層次上，這樣的辯論牽動到更深刻的產業組織演化之不同觀點，例如「模組化(modularization)」與「關係性外包(relational contracting)」等等。本文將以「技術規格」作為探討的平台，透過環繞著具體技術規格形構所牽動的研發相關社會一空間過程，來探討台灣資訊電子系統廠商的研發地理學，並與模組化生產網絡模式做一比較，希望透過具體的經驗研究，來豐富、參與產業組織演化之辯論這個重要研究領域。

本文認為台灣資訊電子業ODM製造商的研發特質比較無法用「模組化」的概念來理解，基本上台灣資訊電子業的開發過程牽動著綿密的廠商之間以及廠商內部立基於「會意化知識(tacit knowledge)」之複雜互動乃至於共同開發，而技術領導性廠商(如Intel)所建構的系統架構以及原始技術規格僅僅是這樣的技術互動之起點<sup>1</sup>，換句話說，具體的技術模組之形構牽動了複雜而動態的跨組織場域互動，品牌廠商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模式並不是「純粹市場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雙方仍然維繫著很強的相互依賴性(mutual dependence)。本文提出一個「協商式升級(upgrading by negotiation)」的觀點，強調台灣資訊電子業在產品研發上所扮演的技術協商整合角色<sup>2</sup>，以及與品牌客戶、關鍵零組件供應商等之間綿密的技術互動與互賴關係。基於深度的田野調查，本研究指出雖然後進國家的社會經濟體系很難支撐起環繞著全新技術規格的創新行為，但是這並不代表後進國家無法透過創新而在全球價值鏈當中升級。

---

1 這方面我們的觀點接近Gilson, Sabel and Scott(2009)提出的「綿密協力(iterative collaboration)」與「研發導向的締約(contracting for innovation)」之概念。

2 這個發現與Amsden and Chu(2003)所論述，後進國家廠商的技術升級相當程度是透過具有效率與彈性的系統整合來進行，有異曲同工之處。

## 技術發展的組織與地理

首先我們先回顧一個重要的技術發展之地理學辯論，Castells (1989;1996)認為80年代之後新的資本積累模型的重要特徵就是「標準化的組件」及「彈性化的定製生產」，透過電訊與電腦系統的整合，資本主義得以在一個全球性的、具彈性且相互連結的系統中，既整合又分散地進行積累，跨國公司在不對稱的交換網路中部署其功能性邏輯，而這也就是「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的歷史性浮現。然而另一方面，Storper (1997)卻認為區域的角色並沒有在技術發展與資訊流動過程中被抵銷，他從產業組織動力的角度指出基於投入—產出關係的交易聯繫所形成的區域產業簇集有可能產生它們自身的技術演化動力，廠商間的「非貿易性互依(untraded interdependence)」產生了區域特殊的「關係性資產(relational assets)」，包括行事規則、例行公事以及正式與非正式網絡，因此他認為全球技術—經濟體系乃經由地方的技術學習機制聯繫著「領域化(territorialization)」。

Storper (1997)的觀點是基於演化經濟學對於技術演化的看法，而這也是本文對於技術發展的基本觀點，特別是技術具有「會意化(tacit)」的特質，經常要仰賴無法條文化的知識，在嫻熟某些特定知識的廠商、研究單位及下游使用者間的網絡發展起來，而廠商往往必須依賴其他廠商或技術領域中主導者的決定來做調整，所以技術發展是聯繫著不同使用者—生產者之間複雜迴路的一系列互動、不斷學習與調適改良的過程，而這樣的互賴性具有某種有利於「適當追隨者」的外部經濟。而解決不確定性而能夠進入集體行動的方式是透過「慣習(conventions)」的機制，它是相對應於這些參與者之間被視為理所當然、不言而喻的通則，生產體系的技術演化是植基於其慣習而在特定的時空下被建構，因此具有相當的領域特殊性。

不過對於技術發展所牽動的社會—空間過程方面，學界有不同的

看法，其中Sturgeon(2002;2003)折衷地納入了會意化與符碼化(codified)知識的生產與跨地理空間傳遞的課題，提出了「模組化生產網絡(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 MPN)」模型<sup>3</sup>。這個模型認為在全球價值鏈之節點(node)內部依然仰賴於會意化的知識交流連繫關係，然而在這些節點之間的連結則是透過符碼化、經過共同認可的標準化知識與資訊，而使得生產網絡可以達到速度、彈性與生產成本降低的全球擴張。這個觀點特別強調資訊電子業界的技術標準與規格(specification, spec.)制訂課題，認為技術領導性廠商(如Intel, Microsoft)所訂定的技術規格與標準有助於符碼化知識的擴散，而且這個特點影響了企業組織間的治理模式，使得品牌買主無須過度仰賴與製造商之間的互賴、信任關係與社會文化鑲嵌的建立，而在供應商的選擇上有更大的彈性與開放性，可以達到「全球下單(global sourcing)」<sup>4</sup>。而在空間形式上，他以「專業電子製造服務(EMS, electronic manufacturing service)」廠商的發展為例，指出在知識的可符碼化基礎上，模組化生產網絡中產品研發可以和製造分離，使得生產網絡可以更容易地在全球尺度上拓展，而這個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的重要節點——矽谷的一個重要角色便是制訂產業相關的規格，亦將複雜的會意化知識轉換成共同的標準與規格，也就是將其符碼化，進而大幅簡化了品牌廠商與其供應商之間的複雜技術互動，降低了交易成本，強化了品牌廠商在全球尺度上搜尋、選擇供應商的能力。

模組化生產網絡論點的提出牽涉到「組織經濟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領域關於「後錢德勒時代(post-Chandlerian)」新的產業組織形式的辯論(Baldwin and Clark, 1997; 2000; Brusoni and Prencipe, 2001;

---

3 關於「模組化」的討論在組織經濟學(organizational economics)上有不少的研究，例如 Baldwin and Clark(1997;2000); Brusoni and Prencipe(2001); Chesbrough(2003); Linden and Somaya(2003); Malerba and Orsenigo(2000)，而在經濟地理學領域則以 Sturgeon(2002;2003)的研究最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就以Sturgeon的論述為對話對象。

Chesbrough, 2003; Helper, MacDuffie and Sabel, 2000; Gilson, Sabel and Scott, 2008; Langlois, 2002; 2003; 2004; Linden and Somaya, 2003; Malerba and Orsenigo, 2000), 當中一個很重要學派是「模組化(modularization)」學派, 例如Langlois(2002; 2003; 2004)試圖解釋錢德樂式的大型垂直整合企業何以興起、又何以衰退, 他認為一系列支援市場機制的制度出現破壞了垂直整合型企業建立其能力的整個體系, 產業標準的出現即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機制, 標準化了不同生產階段之間的介面, 因為技術介面的標準化大幅減低了廠商間協調所需之資訊, 所以新經濟的組織趨勢將會是更模組化以及可分解的(decomposable)系統。模組本身是可以多功用的, 因此可以大量生產並因應不同的需求而被再結合起來。換句話說, 技術標準和模組化使得廠商可以達到規模經濟與範疇經濟。

模組化生產網絡基本上可視為「模組化學派」的一個延伸, 其共同的論述有以下幾點:(1)強調領導性廠商以及核心國家在訂定技術規格與標準的角色,(2)認為模組化生產主導了當今的產業組織, 模組化與「趨近市場化(arm's-length)」的交易取代了階層式組織,(3)在技術模組化的基礎上, 廠商之間的互賴關係(mutual interdependence)會減弱, 並暗示著模組化的發展會導致生產組織朝向「市場化」的組織治理模式。

另一方面, 也有不少學者試圖指出模組化理論的限制(Ernst, 2005; Helper, MacDuffie and Sabel, 2000; Gilson, Sabel and Scott, 2008; Lamoreaux, Raff and Timins, 2003), 例如Ernst(2005)透過對於晶片設計產業的經驗研究指出, 技術快速發展與演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對於技術的模組化形成了相當的限制, 廠商間的密切協力合作對於產品開發仍然相當重要。而近來Gilson, Sabel and Scott(2009)則提出「綿密協力(iterative collaboration)」的觀點, 成為本文反思模組化理論之限制的一個理論對照。他們認為新經濟下廠商組之間研發互動的特點並非是立基於技術模組化的制式化互動, 他們指出技術規格與標準的訂定

者，對於新技術發展之軌跡的掌握度與預測能力是有限的，原始訂定的技術規格與標準其實留下許多可以進一步改良的空間；他們特別強調廠商間基於既有實務經驗之「共同設計(co-design)」，在重新界定、改良既有標準化之技術介面而達到新產品開發的角色；在這個基礎之上，廠商之間的交易關係是一種「研發導向的締約(contracting for innovation)」，在共同的研發目標下，雙方的協力關係是互惠的，甚至廠商的邊界也逐漸模糊了起來(Gilson, Sabel and Scott, 2009)。

Sturgeon (2002; 2003)將模組化的課題帶入經濟地理學的領域，的確點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課題，亦即全球生產網絡當中相關「規格與標準的建立」不僅影響其地理空間的拓展形式，也影響個廠商之間的互動、治理關係，然而其研究忽略了在IT產業界除了EMS這個生產模式之外的另一個重要的生產模式——ODM。基本上我們認為EMS與ODM在生產組織以及技術創新上有著相當大的不同，因為EMS這個生產模式所牽動的技術相當一部份是由委託代工者所加以界定，而EMS業者主要從事大量組裝生產的工作，而這與ODM所牽涉到的特殊創新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們認為忽略ODM的生產模式將會對全球資訊電子產業的技術演化與其地理形式的瞭解造成遺珠之憾，以筆記型電腦為例，目前全球筆記型電腦已經有超過八成的份額是由台灣ODM系統廠商所生產，可見這個模式在資訊電子產業界的重要性。因此我們的基本問題就是，**模組化理論取向可以解釋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創新行為與組織互動嗎(Sturgeon and Lee, 2005)？如果不是的話，又如何來理解ODM生產模式下的創新行為與組織互動關係？**

因此本文以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的研發組織與地理形式做個案，從研發地理學的角度來探討後進地區廠商的技術學習動力(Amsden and Chu, 2003)。我們的基本看法是**技術模組化取向無法完全解釋台灣ODM廠商的系統整合能力以及產品發展能力，而且簡化了技術規格形構的社會過程，也就是會意化知識與符碼化知識兩者之間**

動態轉化的社會過程，真正的技術規格之決定是在一個跨尺度的組織性學習與社會互動乃至於權力運作的過程中，不斷被創造、再界定、乃至於更替，並非單獨由技術領導性廠商以及核心國家決定；而北台區域的資訊電子系統廠商在「協商式升級」的基礎上，在產品開發所需的綿密廠商間技術互動過程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以下我們將扣著ODM模式中的各個產品開發階段，分四個面向，在不同的地理尺度(scale)上，來解析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研發地理學。第一是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間的互動關係與組織治理機制，第二是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第三是探究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人員的制度性互動學習網絡，第四則是探討全球IT產業之技術規格與標準訂定的組織運作，最後在結論部分，我們試著將本研究發現的「協商式升級」模式跟模組化模型作一比較，以進一步闡述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研發特質。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透過質化的企業訪談，研究時間為2004年5月到10月，共進行了67人次的訪談，包括廣達、仁寶、緯創、英業達、華碩、華宇、技嘉、大眾等28家台灣系統廠商研發與市場部門，以及包括DELL、HP、IBM、Toshiba、Fujitsu、Hitachi、IngramMicro、Nokia、Actibit、Dixon等16家品牌廠商在台採購部門(IPO)，和包括INTEL、AMD、Nvidia、Atheros、Philips、Seagate、TI、力晶、威盛等12家關鍵零組件供應商在台部門，受訪者職位包括了經理級至總經理，而研究者係過本身是台北市電腦公會顧問的角色進行訪談，並經由企畫技術論壇以及採購資訊服務等例行事務與這些受訪者之間產生著伙伴關係，而得以順利進行田野訪談。



## 台灣資訊電子業系統廠商的ODM生產模式與其研發特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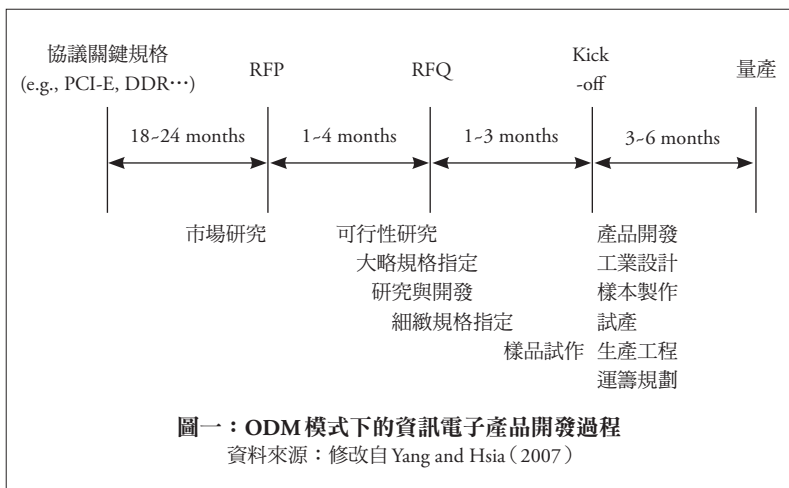
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研發模式有兩個基本要件，第一是參考其客戶以及零組件供應商所初步制訂的「規格」，第二的是在這些眾多相關規格的基礎上開發出整個系統，換句話說，台灣ODM廠商的研發行為並不是處於「真空」狀態下單憑本身的創意進行創新的行為，而是有相當多的參考資訊依據，而如何將這些零零總總的規格「整合」在一個最適當的架構中而成為一個整機系統是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行為的一個重要成分，此外，這些規格並非靜態不變的，相反地，其演化速度相當快速，是在一個動態過程當中被決定出來，因此探討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研發模式時，必須放在一個產業規格與標準經常變動的視角下來分析。而我們試圖提出一個基本觀點，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的研發行為基本上需要不斷地與相關廠商進行各種互動與資訊／知識交換，換句話說，「協商(negotiation)」是基本特質。

從「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的角度來看，這樣的基本視角強調三個後進地區廠商技術發展的重點，首先是廠商的「吸納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其次是「漸進式創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第三則是「設計能力(design capacity)」。「吸納能力」強調的是廠商體認到外在新資訊的價值，並加以吸納而運用到商業目的的能力其中衡量與吸收外在新資訊的能力被認為是廠商的學習能力，而導致了創新(Cohen and Levinthal, 1990)。「漸進式創新」強調的是在既有的技術基礎上增加新的特徵並加以改進，來調整、提升、改善既有的產品，而不是創造出全新產業、全新市場需求的「激進式創新(radical innovation)」(Garcia and Calantone, 2002)。「設計能力」強調使產品能夠達到廠商所渴望達成之功效的能力，關乎著技術與市場的結合能力，也是作為技術後進者即使在沒有掌握最先進技術的情況下，仍然能夠

在價值鏈上升級所必須能夠掌握的能力(Forbes and Wield, 2002)。

我們接下來要先釐清ODM生產模式的基本過程，這也是後續分析的基礎，圖一顯示ODM生產模式下產品開發的各個階段。首先我們來談談RFP(request for proposal)，這是國外品牌廠商客戶針對他們下一個產品定位對台灣可能的供應商(亦即ODM系統廠商)所提出的合作計畫書要求，而其中會就該產品的基本功能做出初步定位，也就是大致規格的定位。這裡所謂的「規格」是含括整個系統層面的整體規格，而同時台灣ODM系統廠商也會做所謂的「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ies)」，較全面、廣泛地去探索未來的市場趨勢、產品趨勢以及技術趨勢，並同時搜尋可能的技術提供者與可運用的零組件。換言之，台灣ODM系統廠商是在客戶的基本需求與供應商未來可能提供的零組件功能做一初步分析與規劃，而「兜」出一個基本的系統架構，再將其企畫回饋給其品牌廠商客戶做參考，在業界的行話叫做「回RFP」。

在經過「RFP」的階段之後，下一步就是等待國外品牌客戶的「代工合約要求(RFQ, request for quote)」，這時候更具體的系統層次規格就會出現，然而我們發現這些具體的系統層次規格不完全是由國外品牌客



戶主導，這些系統層次的規格是由許多的所謂「特徵列(feature list)」所組成，其中有一些特徵(feature)是客戶「開」出來，有一些是ODM廠商自己開的，而這個過程當中客戶與ODM廠商會經常有意見交換，而客戶端的RFQ對於ODM廠商的技術學習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因為這些品牌買主花了許多功夫去研究使用者的需求，換言之，其較ODM廠商更接近消費者，而其所提出的整體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往往有其過人之處。然而另一方面，台灣ODM廠商的強項是在於具體的系統整合技術能力，亦即把相關的零組件整合在一起的解決方案很強，所以另一種決定系統規格的方式是由台灣ODM廠商去與相關零組件廠商互動，而把整個系統「兜」好，甚至做出一個所謂的「mock-up」的原型機，再回給品牌買主，亦即所謂的「回RFQ」。

台灣的ODM廠商是有能力去提出整體系統解決方案乃至於主導整個機型的系統規格，但也可以因應客戶基於市場考慮的特定要求而加以配合，許多國外品牌廠商客戶與台灣ODM廠商已經培養出長期合作關係，甚至台灣ODM廠商會瞭解其特定客戶未來的需求，而同時進行相關的開發。而在這種模式之下，零組件廠商所能提供的效能支援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著整個系統架構的形成，所以台灣ODM廠商會持續地與零組件廠商發生互動，特別是關鍵零組件廠商，以瞭解其新產品的特徵與性能，並會在這些新零組件的基礎上整合出新的系統架構，而這個過程是不斷進行的，台灣ODM系統廠商大約一個月就會有一款新的系統樣品被開發出來，不管有沒有客戶的訂單，台灣ODM系統廠商都不斷地與零組件廠商互動，進行相關的「開發」。

但是不是台灣的ODM系統廠商的研發行為僅在於根據這些關鍵零組件廠商所提供的「規格」與「模組」進行組裝呢？我們認為台灣系統廠商的研發行為並非這麼簡單，台灣系統廠商仍然進行著許多的設計與研究，特別是在系統整合層次。一個系統並不是把幾個零組件組裝在一起就完成了，其間的零組件特徵、功能、相容性、安全性、成本

等等都需要相當程度的被瞭解，而這需要相當程度的廠商間技術/知識交流。至於關鍵零組件廠商的相關「模組化」的規格可以主導一切的研發路徑？我們並不這樣認為，我們的觀察是**電子業當中的研發需要相當程度的「整合」能力，而且零組件的規格與規格之間更需要被整合**，關鍵在於所謂的「解決方案」，這就牽動到許多組的零件如何互相支援、發生功能而不相衝突，亦即若以「模組」來看待的話，一個系統當中應該被視為有許許多多的模組，而不僅僅只有一個。

更直接的發問的話，我們要問的是「像INTEL這樣的關鍵零組件大廠的規格可以主導整個系統技術發展嗎？」，我們就以主機板這個PC領域中重要但並非技術密集度最高的產品來看，系統整合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INTEL亞太區負責晶片組的某位經理人提到：「……我們比較常需要的是，total solution對不對，我晶片做好了，客戶motherboard做好了，其他的呢？比如說PCI-Express好了，我們也能夠測主機板上的bug，可是你graphic card出來之後要怎麼測？我沒辦法測你啊，他們自己要測，對不對？Angilent那幾家做儀器的也要出來，Hard disk廠商要出來，Graphic廠商要出來，我們比較頭大的是需要這些，因為INTEL包不了所有的事情……」。

我們試圖指出**台灣資訊電子業ODM廠商仍然對於系統技術的發展有一定的自主性與主導性，並在品牌廠商買主與關鍵零組件供應商之間扮演了重要的「整合者」的角色**，而ODM廠商也會不斷地與零組件供應商互動，對於客戶決定要用的零組件進行研究，進而對一些關鍵零組件會有一定的決定權。換句話說，基於持續進行的技術市場研究，台灣ODM廠商對於零組件的研究甚至較國外品牌買主有更深入的看法，更瞭解產品和零組件的趨勢。

在初步描繪出台灣ODM系統廠商的研發行為特質之後，接下來我們就更進一步地來探討在這樣的研發過程當中，台灣ODM系統廠商與其相關廠商的互動方式，以逐步解構「模組化生產網絡」是否適用

於台灣系統廠商的研發特質。

## 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間的合作關係與治理機制

我們的探索先從台灣ODM系統廠商與其品牌客戶買主的合作關係討論起，這部分我們試圖論述的是這兩造之間的合作關係與組織治理機制特質，以及其對於產品技術發展的影響，我們將進一步論證以下這個問題：是不是國外大廠客戶主導了產品的技術發展與相關模組？是不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使得其與台灣ODM廠商的合作關係趨近於市場化的交易關係？放在具體的脈絡下，品牌客戶買主往往透過其在台採購中心(IPO)作為中介來開展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互動，所以首先我們就先來談談IPO的角色以及經其中介的品牌客戶買主對於台灣廠商技術發展的影響。由於我們試圖與主張「模組化生產網絡」是主流美國式生產網絡的論點對話(Sturgeon, 2002; 2003)，所以我們特別針對美系大廠的IPO進行訪調與分析，包括DELL、HP、IBM、Gateway、Motorola等等，並佐以日系以及歐系IPO的訪查。

IBM是最早在台灣設立IPO部門的國外電子業廠商，其在1966年即設立IPO，當時最主要的業務是採購相關零組件，以及做認證的工作。而1982年IBM開始推出PC之後，其IPO的角色也轉為搜尋台灣的廠商產品，並推銷給海外IBM公司的各個分支工廠，而且除了採購並行銷台灣廠商的產品之外，在80年代IBM的IPO還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輔導台灣剛萌芽的PC產業認識未來這個產業的趨勢，並引進IBM相關的管理與技術資源來輔導台灣供應商朝向技術升級，所以當時IBM的在台IPO除了扮演轉介IBM國外工廠訂單以及行銷台灣廠商產品的機能之外，還扮演了相當重要的技術輔導角色。

國際大廠在台的IPO對於台灣廠商早期的技術發展扮演了一定的

角色，而許多現在的台灣ODM系統大廠早期就是在這些外商的輔導之下，一步一步地從零組件提供者發展到OEM代工者，並進一步在90年代中期以後培養出本身的設計能力，而成為ODM系統廠商。早期台灣系統廠商確實曾經有一段時間是「追隨」其國外品牌客戶買主的相關技術系統規格來進行產品的組裝生產，台灣廠商在這個階段的「吸納能力」對於往後的技術能力相當重要，這個階段也就是我們所謂的OEM。然而我們也發現外商大廠的技術指導者的角色隨著台灣系統廠商本身的技術能力之成熟也逐漸淡化，我們以下就從90年代之後國外品牌客戶買主的IPO部門之角色轉化來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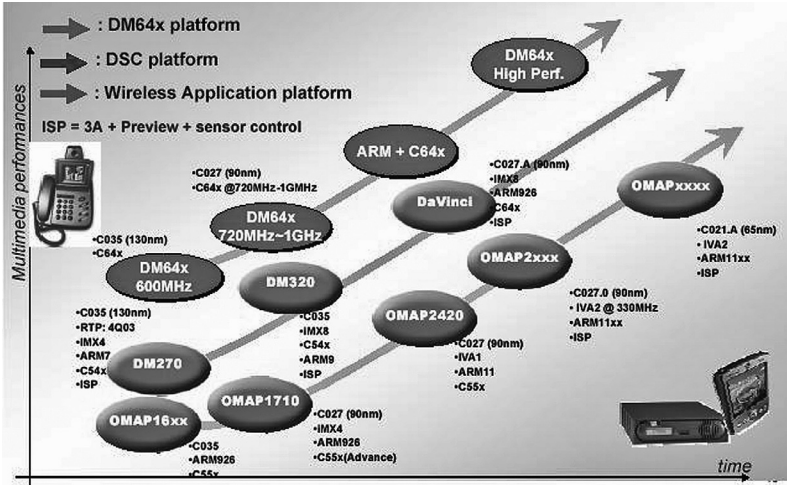
以DELL為例，其在台IPO設於1990年，基本上這個IPO是DELL全球採購系統(WWP, world wide procurement)當中的一個節點，這個系統基本上有三個功能，包括(1)GCM(global commodity management)，負責搜尋供應商、議價報價以及管理代工業務，(2)GSM(global supply management)，負責全球供應商供貨的運籌管理(logistics)、調節庫存以及確保即時供應(JIT)，(3)SQE(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ing)，負責全球供應商製造過程的品質管理、執行DELL體系的品管系統。基本上DELL在台IPO的角色隨著其全球業務脈絡的需求而在這三個環節當中比重有所不同，SQE的業務係隨著製造據點而移動，目前有移往大陸的趨勢，而過去DELL在台IPO較偏重在GSM，但目前這業務也隨著生產據點外移而有往大陸移動的趨勢。至於GCM部分，過去DELL在台IPO比較是扮演支援者的角色，主要是搜尋、掌握供應商的資訊並匯報其產品資訊至其全球資訊網當中，供母公司總部決策參考，但2000年之後，這部分的角色有自母公司總部下放的趨勢，換言之，DELL的某些產品的採購權以及代工業務管理已經由其在台IPO來負責，甚至在2003年時其重要的產品——筆記型電腦的採購決策以及RFQ的決定已經交由台北來執行，而為了支援這項新角色，DELL在台北成立了技術發展中心(TDC)，加重了工程研發的角色，其筆記型電

腦的相關規格與RFQ當中的feature就由IPO、TDC和代工廠商共同決定。

就母公司總部與分支部門的關係而言，HP這家公司下放到台灣部門的程度並不亞於DELL，我們的訪談顯示HP在台部門對其母公司的決策有很重要的建議權，包括產品的技術架構以及代工廠商的決定等等，而HP也在台灣成立了產品開發中心(PDC)，負責開發比較利基型(niche)的相關技術與解決方案，而決定一項產品的feature list是由HP與其ODM廠商共同決定，其分工模式是比較普遍化(或用業界的術語，即是「WINTEL base」的相關技術)、不需要一大堆專利的技術解決方案由代工夥伴決定，另一半則是納入HP自己設計的方案，如同HP亞太區採購中心負責代工業務的某位協理所述：「……拿他們的東西來看，以他們的東西為骨架，我們去要求他們做局部修改，把我們的niche加進去，不然大家都賣WINTEL有什麼好賣的……」。

那所謂「他們的東西」具體而言到底是什麼呢？基本上看的就是所謂各家廠商的「技術藍圖」。基本上HP在新產品開發的前段就會跟ODM廠商的研發部門就相關的規格密切討論，而技術藍圖就是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做溝通的基礎。基本上技術藍圖是各家廠商綜合產業面、產品面與技術面的趨勢而對其未來產品做出具體規劃的成果，可說是各家技術與相關解決方案的具體展現，也是各家的機密，其基本形式如下圖所示。

而本身具有技術設計能力的品牌客戶買主在規劃新產品的時候基本上都要求ODM系統廠商提供「符碼化(codified)」的技術藍圖，然而關於技術藍圖的討論往往需要面對面的溝通，因為光看圖是無法完全體會其中奧妙所在，許多特殊的解決方案會在技術藍圖當中被整合在一起，而面對面的溝通、討論才有辦法針對其中的奧妙所在進行意見交換。換言之，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在這個階段會進行「會意化(tacit)」的知識交流，而且這樣的交流並非是由品牌客戶買



圖二：TI 的 OSEP 解決方案技術藍圖

資料來源：TI 內部資料

主向 ODM 系統廠商單向的傳遞，反而是近年來由於台灣 ODM 系統廠商本身的技術與設計能力越來越強，使得品牌客戶買主反而成為知識的被提供者。而像 HP 這樣的廠商與台灣 ODM 系統廠商的合作關係已經深化到可以和主要代工伙伴互相交換技術藍圖，而進行所謂的「共同設計」。

從以上的經驗案例可以看出，在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 ODM 系統廠商就產品開發的互動關係上，並非完全由品牌客戶買主主導，基本上 PC 產業當中客戶端的利基型技術已經越來越少了，我們基於對十餘家台灣 ODM 系統廠商研發部門的訪談顯示自五、六年前客戶的技術就已經不再領先了，客戶所開出的三、五十頁「RFQ」當中，台灣 ODM 系統廠商所提出的設計方案基本上已經達到 80% 的可用量，其餘部分則再透過雙方的溝通而修改完成，而這也展現了 ODM 模式中所蘊含的「設計能力」。而就整個資訊電子業而言，對於台灣廠商比較成熟的 PC、主機板等桌上型電腦以及周邊，乃至於筆記型電腦，我們也



觀察到台灣廠商對於技術發展都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與主導性。

釐清這一點之後，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間的交易關係是趨近於市場化的交易？我們就系統層次的技術藍圖的形構與知識交換的程度，以及實際決定交易的機制來看，認為品牌客戶買主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合作關係至少有三種原型，而這三種原型當中彼此又有某些程度的重疊以及互動、影響關係。第一種是「長期合作關係(long-term relationship)」，第二種是「制度化的價格競爭(institutionalized price competition)」，第三種是「趨近於市場型交易(arm's length transaction)」。

基本上「長期合作關係」有兩個重要的特質，第一是台灣ODM代工廠商會提供其品牌客戶買主相當多的技術資源，而且其解決方案被其客戶接受比重越高、乃至於被納入客戶的RFQ之系統規格要求的廠商越容易得到訂單。這種合作方式在台灣ODM系統廠商與日系客戶之間經常發生，而且在美系客戶當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例如DELL以及早期的Gateway和如廣達、仁寶的合作關係都是如此。在這樣的模式之下，台灣ODM系統廠商所投入的研發資源會得到一定的回報率保證，但這又與所謂「簽技術合約」不同，因為也有少數中小型公司與日系客戶是「簽技術合約」在這種關係下進行合作，而在這種合作關係中，台灣ODM系統廠商的研發部門等同於日系客戶的企業組織當中的一環，其組織治理模式較接近階層式(hierarchical)，與我們所談論的「長期合作關係」有所不同，而且這種案例並不多。在「長期合作關係」這種模式下，台灣ODM系統廠商仍然保持的一定的自主性，而且也確保了其交易網絡以及技術參考資源的開放性。

至於第二種「制度化的價格競爭」的特徵在於品牌客戶買主透過價格競爭機制來決定代工業務的對象，最極端的例子就是HP，特別是其採取「線上競標」方式，導致台灣供應商之間的削價競爭，但是我們進一步瞭解其機制之後，發現這樣的價格競爭是建立在一定的制度安排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之基礎上，以減少交易所需的資訊搜尋成本，包括先前的合作經驗以及在前端系統規格決定階段的合作設計都是其重要考量，而制度化的具體形式就是透過彙整出符合買主基本要求的「供應商清單(AVL, approve lists)」。這套機制與「長期合作關係」相同點在於其前段的系統規格決定仍然牽動了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部門相當程度的知識交換、溝通以及前面所提到的技術藍圖交換，但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如HP很可能納入某家代工廠商的系統解決方案而彙整成HP的RFQ系統規格，但在下單時又採取新一輪的競標，亦即狡猾地擷取了某些台灣系統廠商的智慧財產權，而又回過頭來進行生產成本的比價。

而我們也觀察到部分美系與日系品牌客戶買主同時採用了「長期合作關係」與「制度化的價格競爭」這兩種交易治理模式，其特徵在於透過所謂QBR(quarter business review)這種組織監察比較(benchmarking)機制，挑選適當的幾家廠商進入其供應商名單(AVL, available list)當中，並與這些供應商保持比較密切的互動關係，之後再導入價格競爭機制，例如美系的Gateway在早期是和廣達採取長期合作關係，但在併購E-Machine之後，其採購政策有傾向於壟斷型競爭的趨勢，而日系的EPSON、HITACHI也在母公司面臨成本競爭的壓力下傾向於這樣的混合模式。

而第三種「趨近市場化」的交易治理模式也和上述兩種模式有關係，基本上當台灣ODM系統廠商所設計出的系統方案不被這些大型國際品牌買主接受而無法得到訂單的時候，台灣ODM系統廠商通常就尋找所謂的「通路市場(clone)」來將這些機型進行行銷，而這些通路市場的買主基本上是不開系統規格的，而是完全由台灣ODM系統廠商主導所有的技術與設計方案，而與這類型像Actibit、Dixon等歐系廠商進行行銷端的合作。根據我們的觀察，這類型交易最主要的場所就是全球第二大的電腦展——台北國際電腦展(Computex)，每年來自全

球各地數萬名國際買主就在展覽期間尋找合適的供應商，而台灣ODM系統廠商就根據本身的市場調查來決定哪些機型適合在哪些地方，並商談與哪些地方的通路商合作，但這塊市場所佔的份額並不是很大。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雖然早期國外品牌買主客戶對於台灣ODM系統廠商的技術學習的確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其對於產品系統規格的主導性已經逐漸降低，其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合作並非在其主導的模組之基礎上進行，而且其交易治理模式也並非趨近於市場化的模式。而雖然趨近市場化的交易模式確實存在，但此模式是作為「長期合作關係」以及「制度化的價格競爭」模式的補充，而且在趨近市場化之模式當中，反而是由台灣ODM系統製造商來主導相關的系統規格。

## 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與系統廠商研發部門之間的合作關係

接下來我們從供應面交度出發來探討關鍵零組件供應商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互動關係，我們試圖論證的問題是，是否關鍵零組件供應商主導了產業的相關系統規格，而台灣ODM系統廠商僅僅是根據這些供應商所提供的規格進行組裝生產？

基本上掌握關鍵零組件技術與應用趨勢是台灣ODM系統廠商積極致力之處，也是其核心競爭力的重要環節，而為了能夠在本身的設計上妥善地因應相關零組件的功能而整合出適當的解決方案以及「feature list」，台灣ODM系統廠商會經常跟相關零組件供應商進行技術方面的交流與溝通，以瞭解供應商所提供產品的規格能不能符合本身的需求。此外由於台灣ODM系統廠商較零組件供應商更接近市場應用端，因此其對於相關規格的建議也成為零組件供應商相當重要的參考資訊，而雙方的意見交換也成為其業務的例行公事(routine)。

基本上關鍵零組件廠商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間的交易也絕非

是趨近市場化的交易，關鍵零組件廠商推銷其產品的行動通常牽動著許多關乎技術發展與規格的意見/知識交換，而且這些意見交換往往需要面對面的溝通，因為其中有許多技術內涵是需要詳細地解釋才有辦法為其客戶所理解，而這樣的意見/知識交換也同樣會環繞著所謂的技術藍圖的發展，也關係到雙方面未來產品開發的技術路徑。而從知識交換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台灣ODM系統廠商基於產品開發與系統整合之基礎上所累積的知識對於關鍵零組件廠商本身的技術學習有一定的幫助，甚至會影響到某些關鍵零組件廠商本身的規格發展，而台灣ODM系統廠商這樣的能力基礎相當程度是來自於其對於眾多零組件技術趨勢的長期研究，其基於系統整合之需要所涉獵的技術知識範疇(scope)往往可以提供只專注於本身產品技術發展的關鍵零組件廠商一定程度的參考，也就是雙方的技術知識有互補性。而在這樣的互動關係下，台灣某些ODM系統大廠不僅僅是「跟隨」關鍵零組件廠商所提供的規格，而甚至會對其中部分廠商相關產品規格的發展有一定的主導性<sup>4</sup>。

進一步從產品規格訂定的角度來看，我們發現部分關鍵零組件廠商本身產品的規格即在其和台灣部分ODM系統大廠之間的知識交換以及共識建立的基礎上被決定，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其與台灣ODM系統大廠之間的技術交流成為重要的例行公事，這樣的時空場合也是雙方廠商內部進行研發的重要基礎，而我們的觀察是雖然有某些關鍵零組件大廠會有較多的研發資源來鞏固其主導技術規格的角色，但其仍須取得若干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同意與共識建立，而這些廠商就是Storper (1997)所謂的「適當跟隨者」，或者是我們所謂的「第一層跟隨者(first-tier followers)」。這些第一層跟隨者通常就是台灣ODM系統

---

4 如同廣達某位筆記型電腦研發部門主管即提到：「……像 Nvidia 的 CEO 會帶他們整個 RD team 的頭來跟我們接觸，看下一個 project 要怎麼構，要開怎樣的 Spec，會跟我們討論，我們會主導一些東西，只是大家看不到……」。

大廠，他們往往可以影響關鍵零組件廠商部分產品技術規格的決定，相對於其他較小的「第二層跟隨者」，他們也可以更早得知未來相關產品規格的發展，而有助於其研發效率。

是不是台灣ODM廠商的研發行為僅僅是根據關鍵零組件廠商所提供的產品特性來進行組裝？若從圖一所顯示的台灣ODM廠商產品開發過程來看，如果上述觀點成立的話，那到底從「kick-off」到導入量產中間這三到六個月台灣ODM廠商不就是在「混」嗎？而實際情況顯然不是這樣。

我們就先以無線網路的例子來說明，如同TI某位負責無線網路晶片業務的科技委員會委員所述：「……wireless LAN哪裡都可以用，但用在不同的地方你要把它做相當的customize，相當的修飾……」，而所謂的「customize」或者「修飾」就牽動到相當多的「開發」工作。以近來筆記型電腦所強調的多媒體應用功能為例，要將無線網絡模組整合進來所必須考慮的問題就有很多，例如中央處理器(CPU)以及作業系統(OS)的特性為何，其驅動軟體從本來的參考架構(reference)轉到新的平台上有許多問題要處理，資料在傳時針對影音的串流(streaming)也要做特別處理，在基本規格上要走IEEE-802.11a還是b還是g的各自利弊考量，以及像throughput部分都要關注，甚至連一些應用面端的解決方案都要含括進來，而提供無線網路晶片的公司(如TI、Atheros)往往必須協助其客戶的研發部門去開發基於其基本晶片設計的各種特殊應用產品，其可能性可說琳瑯滿目，各家有各家的設計方案，而不是晶片從原來的國際大廠設計出來就只有一種應用方式。換言之，從「模組化」的角度來看的話，最後相關關鍵零組件如何被整合在一起而成為新的模組並非完全由關鍵零組件廠商來主導，台灣ODM系統廠商的研發部門也在實際的解決方案上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而無線網路的互動式創研發之案例並非唯一，實際上在許多相關的關鍵零組件之開發與應用都有這樣的特徵，即使是外界一般認為最

具標準化規格的硬碟也不例外，從關鍵零組件廠商本身推出的原始設計到台灣ODM系統廠商實際的應用開發之間仍然有許多需要雙方面進一步溝通以及知識交換的過程，才能達到所謂的「解決方案」，而這就展現了「漸進式創新」之特質。台灣ODM系統廠商實際上扮演了一個重要的技術整合者角色，一方面將各個相關零組件供應商的產品以及解決方案整合成為可商品化應用的技術，二方面也從系統整合開發的角度將相關技術需求回饋給零組件供應商，而這些知識與資訊也成為相關零組件供應商（包括國際性大廠）重要的參考資源，甚至影響其本身技術路徑的發展。

我們藉由幾家關鍵零組件國際大廠在台分支部門的角色分析，進一步論證這個觀點。以TI的無線網路晶片為例，基本上TI這個跨國公司的晶片設計是全球性的分工，其中無線網路晶片的設計團隊在法國，其在台灣則設有行銷以及技術支援部門（FAE, field assistant engineer），將客戶的需求回饋給其設計團隊<sup>5</sup>。顯示晶片大廠——ATI在台分支部門則是該公司的亞太總部，該公司的研發中心在多倫多、矽谷以及波士頓128公路，而在台灣的技術服務人員共約60餘位，扮演著對該公司而言相當重要的意見回饋角色<sup>6</sup>。

而主要行銷該公司中央處理器的AMD台北分支公司也設有設計部門，在該公司內部稱之為TATS（Taiwan Applic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雖然該公司的CPU主要是由美國總部主導設計，但TATS也會參與到部分的設計意見與產品規劃，而INTEL的組織機能也與AMD

---

5 如同某位TI技術委員會委員所指出：「……老美有他的想法，基本上他還是覺得他是headquarter，如果wireless LAN這個產品focus不在台灣的話，他根本不會鳥你，但這個東西走了將近兩年了，經過這兩年來他發現到沒有直接接觸到市場的話，他出來的東西會有問題……」。

6 如同該公司某位主管所述：「……總部當然每一季都會有新產品的roadmap出來，我們在local這邊的話會將符合當地特性的產品相關資訊feedback回去，產品規劃是雙向交流……」。

相似，亦即除了行銷之外也具備一定程度的設計能力以及技術支援，而且這兩家公司的受訪者都認為本身也算是研發中心，其共同特點在於會協助客戶在其公司所提供的技術平台上做設計開發，並將台灣廠商未來的需求回饋回美國總部，以協助規劃未來的技術藍圖，而這樣的分支部門機能對這兩家公司產品的技術發展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在釐清品牌客戶買主、關鍵零組件廠商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間的技術層面互動基本模式之後，我們接下來的問題是，所謂的「台灣式研發」到底有什麼特色？接下來我們就從研發人員的日常生活實踐的角度出發，來探究其與技術發展相關的「例行公事(routine)」。

## 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人員的制度化學習網絡

我們試著從以上的分析初步揭露的「互動中學習(learning by interaction)」的角度切入，來探討台灣ODM系統廠商之研發部門的系統廠商之研發部門的日常生活實踐。我們從研發部門在廠商間與廠商內部的互動層面來做一個基本的角色區分，亦即區分出台灣ODM系統廠商研發部門經常存在但有時未做正式組織分工的「PM」與「RD」人員之角色分工與整合，來進行進一步的分析。

研發部門的「PM」有些公司稱之為「product manager」，有些公司則稱之為「project manager」，其主要業務是搜尋各種供應商所提供的技術資源與可能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做比較前端的技術資源搜尋與其基本的界定與整合。而大部分台灣ODM系統廠商的PM都是RD人員出身，而且多半都是比較資深的RD人員才有足夠的知識來擔任PM。PM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技術趨勢之研究與相關供應商的技術資源搜尋上，經常需要與供應商的行銷部門和客戶交換意見，特別是搜尋供應商最新的技術資源，並整合、「兜」成初步的解決方案，交給RD去做進一步的執行，而RD主要是把這些可能的解決方案具體地測試，其比

較頻繁的互動對象是供應商的FAE人員，解決一些更為細節的問題。

而PM的角色實際上扮演著廠商間技術交流的介面，也是與作為技術資源供應的的零組件供應商行銷部門「對口」的單位，而這樣的互動過程也成為公司與公司之間例行化的業務往來。而且這樣的例行公事不僅只是單向地由零組件供應商向系統廠商提供技術資訊，零組件供應商也可以在這樣的互動過程中得知系統廠商未來的技術發展規劃，以及市場面對於其產品的接受度，而成為本身產品規劃重要的參考。其間的互動不僅只是單純的產品交易，還牽動了許多技術相關知識的交換，特別是關於未來產品規格面的發展趨勢。

除了被動地等待零組件供應商的「技術行銷」之外，台灣ODM系統廠商勤奮的PM往往會「主動出擊」，廣泛地搜尋各種可能的技術資源，這具體展現在他們經常會與IC設計公司進行互動，而不僅僅與賣標準產品的IC大廠互動。台灣ODM系統廠商會有根據本身設計需要而開特殊用途IC(ASIC)的需求，因此與IC設計公司互動是其例行公事的一環，而放在與「模組化」論點對話的角度上，這也顯示出台灣ODM系統廠商的研發不僅僅只是把國際大廠所提供的關鍵零組件組一組就完成了，因為系統產品設計與關鍵零組件所提供的技術支援之間還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以及各種可能。

而要完成真正的「設計模組」，除了PM之外，還要經過RD這一關。如同廣達某位資深PM不諱言地指出，他們搜尋出來的東西有八成是廢物，不符合該公司的產品設計所需，這八成的零組件技術方案就其專業的分析上被淘汰掉了，至於剩下兩成可以用的東西，PM會根據其對於本身系統設計的瞭解來整合、規劃出基本的系統規格，再交由RD做進一步的開發工作。而放在圖一所示的產品開發過程來看，接下來的工作就是「kick-off」到量產之間的三到六個月之「開發」階段。

我們試著指出一個關乎其角色與台灣ODM系統廠商之研發能力之重點，亦即PM基於各種方式「全年無休」地搜尋出來的技術解決方



案對於ODM系統廠商的研發是至關重要的，而PM的「搜尋中學習(learning by searching)」以及「偵測中學習(learning by detection)」正是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研發特質的一個重要環節——吸納能力，PM具備了know-what、know-who以及較廣泛的know-why的能力，而其社會實踐過程所立基的是一種「立基於職業角色的社會網絡(occupational role-based social networks)」，而這樣的網絡之綿密性與開放性是台灣ODM系統廠商核心競爭力的一個環節，而且透過正式組織的互動機制建立(如與零組件廠商定期的更新技術藍圖)以及非正式的人際網絡資訊/知識交換而交織成為一種制度化的學習網絡，並且成為ODM系統廠商PM以及零組件供應商技術行銷的例行公事(routine)。

那麼「RD」人員在「kick-off」到量產之間的三到六個月到底在「開發」什麼東西呢？以電腦系統為例，裡面有幾千個零件，RD的開發工作就是讓這些零件「兜」在一塊會動，然後能夠發揮出預期的功能，這牽涉到對於各個零件之特性以及其整合在一起的模組之功能要能夠被有效地掌握，而且同時還要考慮到成本和效能之間的取捨，所以RD經常要嘗試各種不同零件之間的搭配組合，而且會根據實際的測試結果來決定最終採納的方案，因此我們認為所謂的「模組化」實際上是發生在ODM系統廠商內部的設計方案中。換句話說，經過PM篩選過的技術解決方案還得要通過RD這一關來「兜」成最終的系統整合方案，其中原始的設計模組也可能在RD的重新整合下發生「再模組化」了。

台灣ODM系統廠商的RD人員的技術學習機制與PM的制度化學習網絡有些不同，這可區分出「廠商內部」與「廠商之間」兩個層面來討論。首先就廠商內部的學習而言，我們的訪調顯示大部分的公司對於新進的RD人員都會安排一些訓練課程，但主要的技術學習是透過「實

---

7 如同精英電腦某位研發部門主管所述：「……有的公司RD能力不好就按圖施工，因為INTEL都會給你一個公版，懶的人就拿公版來改一改，那你的成本就很高嘛，像我們從頭到尾就按照我們的規劃設計自己來，就可以達到我們價格的要求……」。

做(on-site training)」來磨練，或者用俗話來說，就是「師傅帶徒弟」，以「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方式來培養，如同精英電腦某位研發主管所述：「……通常都是師傅帶徒弟，通常一個team裡面會有一個senior的帶兩個junior的，經驗這種東西是寫不下來的，我們是實做當中碰到問題來解決，邊做邊學，是用帶的……」。換句話說，每一家公司的資深RD人員扮演了重要的技術傳承角色，其經驗累積成了各家的know-how，而且這樣的經驗往往是無法加以符碼化的知識，而需要新進人員透過實做當中的摸索與識誤(trial and error)來慢慢掌握其中竅門。通常一個成熟的RD人員要經過三年的實做培養，才有辦法獨立主導新開發的開發。而在這樣的內部「做中學」機制下，面對同樣一個Bug，每一家會有每一家不同的解法，雖然部分零組件供應商會提供詳盡的設計指南乃至於線路圖，或者是INTEL所謂的「設計手冊(黃皮書，data sheet)」，但並不是所有的RD人員都只是「按圖施工」。

至於ODM系統廠商RD人員的「廠商之間」學習機制，與PM類似的是，其主要的機制是透過「立基於職業角色的社會網絡」，特別是與零組件供應商的FAE人員之間的社會互動，而其互動的目的主要是進行所謂的「debug」。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需要是因為零組件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效能經常會與系統廠商的整體設計架構產生不相容或者妨礙到某些功能的施展，也就是所謂的產生bug，這在新產品開發時會經常發生，如果供應商無法解決問題的話，很可能會被ODM系統廠商拒絕採用該項零組件。而ODM系統廠商的RD人員與零組件供應商的FAE人員之間在解決問題上的互動也對於雙方的技術學習都有幫助，例如以晶片組為例，基本上在INTEL架構下的同種晶片組效能是一樣的，但每一家ODM系統廠的系統設計很有可能是不同的，而晶片組廠商的FAE通常會在不修改其晶片組原始設計的前提下，會跟ODM系統廠商的RD人員共同研究如何修改ODM系統廠的系統設計，因此就ODM系統廠而言，零組件供應商的FAE人員等於扮演了ODM系統廠

商之RD支援者的角色，甚至可視為公司RD部門的一部份。而就零組件供應商而言，透過FAE與系統廠商客戶RD人員直接的實做互動也有助於零組件供應商更瞭解其本身產品的特性以及市場潛力<sup>8</sup>。

從廠商內部與廠商之間的技術學習機制來和PM的技術學習特質作一比較的話，台灣ODM系統廠商的RD人員之技術學習特質較傾向於「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和「互動中學習(learning by interaction)」，而且RD人員會有較個人化以及會意化的「know-how」和對於個別相關零組件之效能掌握更仔細的「know-why」。我們認為PM和RD的分工與合作讓台灣的ODM系統廠商得以快速地掌握新的零組件技術趨勢(吸納能力)，並透過不斷地系統整合(漸進式創新)，嘗試來開發出各式各樣的機型(設計能力)，以提供不同性質以及不同市場區隔的全球買主的相關需求，而我們要強調的是這樣的創新模式的一個特質以及社會基礎是廠商間例行公事化的制度性學習網絡，具體的設計模組決定也是在這樣有來有往的網絡式互動下被開發出來。

最後，我們要問的是，是否真正關鍵的規格都是由像INTEL這樣的國際大廠所「主導」呢？所以最後我們將視角拉到更大的尺度，來檢視全球性的IT產業規格與標準制訂的過程。

## 全球IT規格制訂組織的角色與運作模式分析

協議產業標準與規格的階段是整個產品開發過程當中最久的，而且一旦規格與標準被建立、成為主流規格與標準的話，通常都會持續被採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直到下一個新的規格與標準出現而取代

---

8 如同技嘉某位研發部門經理所述：「……譬如說有個bug，如果我們從他的data sheet看不出所以然，但產品設計出來確確實實有狀況，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FAE通常會過來，一起解決看看有什麼問題，但de-bug不能光靠FAE，很多FAE是靠我們去瞭解他們的產品……」。

之。參與規格訂定的主要作用者是半導體廠商，而且新的規格訂定所牽動著的是相當龐大的經濟利益，特別是這個新規格成為業界的主流規格的時候，能夠越早知道新規格的趨勢而趁早追隨開發相關產品、乃至於直接主導某項新規格的公司往往有機會能夠得到相當龐大的利潤，如同威盛電子某位熟悉產業規格運作的副總所述：「……像 TI 的 1394b 出來，一顆賣十幾塊，那個成本大概兩塊錢不到，因為這個規格是當時 TI 和 Apple 訂的嘛，根本沒有人有他的技術，你要就開始 license，或者你從我們的 consortium 裡面買什麼東西回去……」。

這位副總所述的「1394」就是一個產業規格，它是一種多媒體的傳輸介面，而之所以叫做「1394」是因為它是「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這個國際產業標準訂定組織第 1394 個訂定的規格，而 IEEE 是由全球 175 個國家當中超過 36 萬個會員所組成的非營利性專業技術協會，而國際上類似這樣的協會還有很多。這些組織在產業標準與規格之普遍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規格的普遍化正是相關參與開發之廠商所以能夠獲利的主要因素，有意開發新產品規格的廠商透過這樣的產業規格與標準訂定組織來取得共識並加以推廣是最有效率的方式。

我們接著透過 IEEE-1394 這個少數台灣廠商曾經有機會主導的產業規格之訂定的組織過程來一窺這些組織在技術發展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具體的運作機制。1394 聯盟可被視為有志於發展新產業技術規格之廠商間的策略聯盟，這個聯盟會先由參與廠商選舉出所謂的 board director，而在聯盟之下還成立了分工更細的 subgroup，然後會從 board director 去選舉 subgroup 的 team leader，而各個 subgroup 也會成立各自的 committee。在這樣的組織架構下，每個 subgroup 會有兩到三家具有基礎研發實力的大廠參加，以及其他緊密跟隨的廠商，而這兩到三家主導性廠商會負責做一些基礎的研發，讓基本的草案被開發出來，之後在運用到不同領域的進一步開發時各家廠商就開始進行應用

領域方面的分工協商。之所以會有分工的需要是因為如果要從基礎研發完全開發至應用端會耗費過多的研發資源，不是單獨廠商可以承擔，而且有些參與廠商會站出來反對，用曾經擔任一屆board direct的威盛電子某位副總的話來說，這種聯盟的運作可叫做「坐地分贓」，因為沒有一家公司有本事從頭到尾把所有的protocol都做完，比如說1394的protocol有七層，通常這兩到三家公司會做底下的兩到三層，其他就在這個聯盟裡面分掉。

這類型產業規格訂定組織實際上扮演著連結起不同地區之研發團隊共同進行新技術開發的角色，而各個地區廠商所開發出來的版本也會在這個聯盟裡面進行激烈而非技術性的討論，因為不是每個廠商的技術發展路徑以及對於未來技術趨勢的看法都類似，比如說TI跟APPLE在1394聯盟會議裡面對於未來要走的方向有很不同的看法，最後的解決方式就由board directors舉手表決，換句話說，在這種廠商間策略聯盟的規格制訂組織當中，關鍵規格的決定相當程度地牽動了政治的運作，所以有很多國際性大廠經常會去運作其中的選舉，而當初威盛電子之所以能夠被選上擔任一屆board director也是因為其號召了二、三十家台灣生產傳輸介面的廠商加入該聯盟，才有辦法被選上。

除了扮演著連結不同地區之研發資團隊的角色之外，這類型聯盟還扮演了研發資源之投入與回收的制度化角色，也就是把策略聯盟架構下之合作開發當中的財產權關係予以釐清，而且這個過程也同樣牽動了政治運作，如同威盛電子該位副總所述：「……比如說像1394我們收25%，25%回來大部分是被Apple拿走，一部份被TI、SONY跟INTEL拿走，要看當初fundamental的東西跟最後變成成品的東西比例上怎麼拿，其實board director裡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討論怎麼分這些東西，看誰投入多少以及誰拿多少回來……」，換句話說，在看似廠商間透過策略聯盟進行合作開發的組織互動過程當中，我們發現廠商之間的邊界最終仍然是清楚的，而我們也發現到最關鍵的新技術規格之

開發的組織間治理機制充滿著更高度的政治化與權力運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試圖指出IT產業技術標準與規格最核心的「模組化」過程其實是一個充滿政治化的社會過程，而且牽動了多方的角力。

為了進一步論證這個觀點，我們直接來看INTEL的例子。眾所皆知INTEL是電腦產業當中由中央處理器以及晶片組等關鍵零組件所架構起來的「平台(platform)」的關鍵廠商，但是不是INTEL本身就可以驅動該公司的規格呢？我們舉一個幾年前在INTEL的IDF(Intel Developer Forum)不列入記錄的一個內部重要會議當中，INTEL提出將推動所謂「big water」新平台的計畫(也就是現今以Centrino中央處理器為核心的作業平台)，但據某位參與其中的ACER主管所述，這個提案遭到以IBM為主的幾家國際品牌大廠的反對，認為太快推出新的平台會使得相關廠商必須重新更動其系統設計，在一番爭論之後，INTEL高層當場決定該平台在該年內不再討論、推動，而延後了該平台的推出。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到訂定產業規格的遊戲規格，就是有主導規格能力者至少必須具備基礎研發能力和市場佔有率這兩個要素的其中一個，像IBM這樣的系統品牌大廠之所以能夠影響規格的制訂在於其可以決定本身的系統產品要採用怎麼樣的規格，也就是我們前面所述的其對於系統規格的指派權力。

而從台灣ODM系統廠商的角度來看，以上所述的兩個要素正是其弱點，也是限制了其基於在地化學習網絡所發展出來之研發潛力的主要瓶頸。雖然我們也觀察到大部分的台灣ODM系統廠商都或多或少地參加相關的規格制訂組織的運作，但據我們的瞭解台灣ODM系統廠商都是處在追隨者的角色<sup>9</sup>。台灣ODM系統廠商主要是透過參與這些組織來瞭解未來的技術，然後回到公司內部跟上腳步進行相關的

---

9 如同華碩某位研發部門主管所述：「……大部分廠商參加的目的只是為了得到第一手資料，其實你要去發言你也要有一些斤兩，台灣其實大部分公司是有發展沒有研究……」。

開發，而且結構性的侷限在於ODM系統廠商並沒有決定系統規格的決策權，而且其研發資源主要都投注在產品面的開發，對於需要長期投入研發資源的新技術規格的發展無法釋出適當的研發資源來參與，而這也是台灣ODM系統廠商創新模式當中的結構性侷限，而這樣的結構性侷限具體展現在台灣ODM系統廠商在國際產業規格訂定組織當中僅能扮演「跟隨者」的角色。

然而由品牌與關鍵零組件大廠所主導的國際產業規格制訂組織透過其內部的運作是否就可以完全決定相關規格的发展？我們認為並非如此，因為一個新產業規格被制訂出來之後來需要經過一定的「推廣」過程，被接受成為主流的規格後才有辦法取得近乎壟斷式的經濟租金。但是一個類似的零組件功能很有可能幾種規格，而這些不同規格之間存在著競爭關係，而這個時候企圖主導主流規格的組織就必須得到一定的「追隨者」的支持。所以我們觀察到許多國際產業規格組織經常性地需要舉辦巡迴各地的研討會，目的在於取得其潛在使用者的接受，而台北區域這個技術節點更是這些組織急希望大力推廣其規格而得到相關廠商支持的地點，其中的原因在於台灣ODM系統廠商對於若干零組件的採用也是具有相當的建議權，而相關零組件國際大廠也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像INTEL相當重視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互動與合作關係。換句話說，我們認為台灣式的創新模式在全球分工與整合的趨勢下仍然有進一步促進本身技術升級的潛力。

### **結論：後近國家廠商的協商式升級(upgrading by negotiation)**

本文的研究發現模組化生產網絡的模型並不能完全解釋台灣資訊電子業ODM製造商的創新動力，我們指出實際的「技術模組化」係發生在台灣系統製造商內部的設計模組當中才真正形成，而在這之前需

經過相當多的廠商之間與廠商內部技術互動與會意化的知識交流，換句話說，所謂的「技術模組化」並不是單獨由核心國家的領導性廠商所單獨決定，相反的，廠商之間環繞在特定模組本身以及模組與模組之間的整合層次，所展開的綿密知識交流，是互動兩造重要的技術學習機制，台灣廠商在系統層次以及零組件層次的技術整合與規格制訂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就系統層面而言，台灣廠商對於其客戶的「技術藍圖」有相當的建議權，雖然在零組件層面的標準與規格建立上台灣廠商扮演的角色較弱，但台灣廠商的系統整合與開發/生產能力也使其成為這個層次標準與規格制訂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性資訊來源。此外在如手機這些更技術密集的IT產品當中，有更多專殊化的關鍵零組件，而且規格不固定，整合相當複雜，所以像INTEL這樣的廠商所能夠主導的模組化範疇更少，而且更需要廠商之間的密切合作<sup>10</sup>。因此，我們認為台灣資訊電子業ODM製造商的研發特質「無法」僅僅用「模組化」的概念來理解。

其次，我們認為「模組化」並不是一個自然發生的狀況，或者說，並不是如Langlois等人將技術標準與規格視作產業組織演化的「外生變數」，如上所述，模組化的過程本身就牽動了相當頻繁的廠商間組織互動與知識交流，而且其過程的組織治理，以及所影響的品牌客戶與供應商之間的交易關係，更非趨近市場化的交易模式，一方面，廠商之間的互賴關係仍然緊密，例如前文所討論的ODM系統廠商與品牌客戶買主之間的長期合作關係，以及與零組件供應商之間的技術合作伙伴關係，此外，即使是作為廠商間技術互動起點的原始技術規格設制訂，也是充滿動態的多邊互動之社會過程，如同前文所討論的，在國

---

10 Motorola就在2003年初在台灣成立一個smart phone的全球產品開發中心，深化與台灣ODM系統廠商的合作開發關係，如同該公司某位高階主管所述：「……絕對是partner，long-term relationship，我們希望我們的partner很強，是solution provider，我希望他們能夠自己去找solution……」。



際規格訂定組織內部的政治運作，換句話說，在產業組織演化之理論層次上，我們認為不應將技術標準的存在，視為既定的(*pre-given*)狀態，而是應該進一步打開這個黑箱(*Hess and Coe, 2006*)，將技術標準與規格之社會形構與產業組織演化與組織治理進一步扣連分析。

此外，我們認為台灣資訊電子業ODM系統廠商之研發模式所牽動之廣泛的組織間技術性互動，可以避免彼此陷入技術介面的標準化所形成的系統研發瓶頸，避免相關廠商被過時的產業架構所侷限，換句話說，透過頻繁而綿密的組織間互動與協商，台灣資訊電子業的研發模式還扮演著重組、更新這些「模組」的功能。我們將本研究所以總結出的台灣資訊電子業ODM廠商的研發特質，稱之為「協商式升級(*upgrading by negotiation*)」。我們強調這樣的研發動力背後牽動著制度化的社會實踐互動，特別是上文所討論的研發人員之制度化學習網絡，透過正式組織的互動機制建立以及非正式的人際網絡資訊／知識交換而交織成為的制度化學習網絡，這樣的網絡之綿密性與開放性是台灣ODM系統廠商核心競爭力的一個重要環節，而模組化生產網絡論述卻忽略了這個台灣資訊電子業廠商「協商式升級」的重要面向(*Sturgeon and Lee, 2005*)，使得這個論述無法完全解釋台灣資訊電子業的競爭力來源。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使台灣ODM製造商的生產基地都已經外移到中國大陸，但北台區域仍然扮演著重要的研發中心角色(楊友仁，2007; 楊友仁、夏鑄九，2004; 2005; Yang and Coe, 2009; Yang, Hsu and Ching, 2009)，中國大陸的生產基地是在北台區域系統製造商經由綿密協力而形構的設計模組之基礎上進行量產，這也顯示北台區域的制度性學習網絡之重要性。

經由以上的討論，我們將台灣資訊電子業ODM廠商的「協商式升級」模式與「模組化生產網絡」模式來做一比較，分別就這兩個模式在「後進廠商的創新能力」、「廠商間互動的特質」、「模組化的形構過程」以及「空間組織的特質」四個面向上的解釋做一比較，以進一步釐清

「協商式升級」模式的特點。

表一：「模組化生產網絡」模式與「協商式升級」模式的比較

	後進廠商的創新能力	廠商間互動的特質	模組化的形構過程	空間組織的特質
模組化生產網絡	由於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以及競爭壓力，在先進大廠所設定的系統規格下，領導廠商主導了與台灣廠商的外包關係與技術規格	產業規格有助於符碼化知識的擴散，品牌買主無須過度仰賴與製造商之間的互賴關係，生產組織朝向「市場化」的治理模式	變動不大的、由核心地區的領導廠商決定相關標準與規格，後進地區廠商僅僅是被動地接受既定的技術模組	技術模組化的特質使得廠商可以將研發與製造分離，並跨越地理疆界而在全球尺度上分散其生產活動
協商式升級	台灣廠商在規格制訂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對其客戶的「技術藍圖」有相當的建議權，其系統整合與設計能力也使其成為標準與規格制訂一個重要參考來源	綿密協力，牽動了相當頻繁的廠商間組織互動與知識交流，可以避免陷入技術介面的標準化所形成的研發瓶頸以及避免被過時的產業架構所侷限，並非「趨近於市場化」的交易模式	快速變動的、經由頻繁的組織互動才得以產生在廠商的設計方案中，環繞在模組本身以及模組之間整合所展開的知識交流是重要技術學習機制	產品開發所牽動的上下游廠商之間的頻繁互動與會意化知識交流，形構了台灣ODM廠與品牌客戶的密切協力合作，品牌廠商全球下單的自由度是有限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最後，台灣資訊系統廠商「協商式升級」的發展經驗也值得後進國家在技術學習的課題上做參考，相較於以矽谷為代表的先進國家技術地域，後進國家在特定規格下的創新行為，與矽谷的「創造新規格」之組織互動模式，以及其背後支持的社會經濟體系，是有所不同的，例如以研究者最近在對某些美商半導體公司曾經在矽谷工作的經理人的訪談中初步顯示，以半導體為例，矽谷的創新模式是要去開發全新的矽智財權(SIP, Silicon Intellectual Property)，或者開發全新的軟體工具，而不是像台灣用既有已開發出的SIP來參考或者授權，其開發成本與失敗風險顯然比起後進國家要高得多，也就是規格制定的領先者面對的是一個更大的不確定性，而降低此種不確定性需要一定的更廣泛社會經濟體系的支撐，所以在矽谷，創投(VC, venture capital)公司對於新

技術發展就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創投公司與高科技公司的互動成為理解矽谷創新體系裡面研發行為與組織網絡運作很重要的環節(Aoki, 2000; Feldman, 2001)。

而在缺乏創投這類「耐心資本(patient capital)」的後進國家而言，其社會經濟體系很難支撐起環繞在制定全新技術規格的創新行為，但這並不代表後進國家無法透過創新，而在全球價值鏈當中升級，這也是「協商式升級」所點出的線索，亦即後進國家仍然可以透過「吸納能力」、「漸進式創新」以及「設計能力」等等的整合，而在參考既有技術規格的情境之下，展開技術發展。

#### 參考資料

- 楊友仁，2007，〈產業網絡之領域化與組織治理的對話：以PC產業台商跨界生產網絡為例〉，《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4：15-30。
- 楊友仁、夏鑄九，2004，〈跨界生產網絡的在地化聚集與組織治理模式：以大蘇州地區資訊電子業台商為例〉，《地理學報》，36：23-54。
- ，2005，〈跨界生產網絡之在地鑲嵌與地方性制度之演化：以大東莞地區為例〉，《都市與計劃》，32(3)：275-299。
- Amsden, A. and Chu, W. W. (2003) *Beyond Late Development: Taiwan's Upgrading Polic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Amin, A. and Cohendet, P. (1999) Learning and adaptation in decentralized business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vol.17, pp.87-104.
- (2004) *Architectures of Knowledge: Firms, Capabilities, and Commun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min, A. and Thrift, N. (1992) Neo-Marshallian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16, pp.571-587.
- Aoki, M. (2000) Information and governance in the Silicon Valley Model,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Vives, X. (ed), pp.169-19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ldwin, C. Y, Clark K. B. (1997) Managing in an age of modular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5, pp.84-93.
- Baldwin, C. Y, Clark, K.B. (2000) *Design Rules: The Power of Modular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Boschma, R. A. (2005) Proximity and innov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Regional Studies*,

- vol.39, pp.61-74.
- Brusoni, S. and Prencipe, A. (2001) Unpacking the black box of modularity: Technologies, products and organization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0, no.1, pp.179-205.
- Bunnell, T. G. and Coe, N. M. (2001) Spaces and scales of innov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25, no.4, pp.569-89.
- 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London: Blackwell.
- Chesbrough H. (2003) *Open Innovation: 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Coe, N. M. and Bunnell, T. G. (2003) 'Spatializing' knowledge communities: Towards a conceptual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innovation networks, *Global Networks*, vol.3, no.4, pp.437-456.
- Cohen, W. M. and Levinthal, D. A. (1990) 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no.35, pp.128-152.
- Ernst, D. (2005) Limits to modularity: Reflections on recent development in chip design,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 12, no.3, pp.303-335.
- Feldman, M. P. (2001) The entrepreneur events revisited: Firm formation in a regional context,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0, no.4, pp.861-891.
- Forbes, N. and Wield, D. (2002) *From Followers to Leader: Managing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ilson, R. J., Sabel, C. F. and Scott, R. E. (2009) Contracting for innovation: Vertical disintegration and interfirm Collaboration,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109, no. 3.
- Garcia, R. and Calantone, R. (2002) A critical look a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ypology and innovativeness terminology: A literature review, *The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vol.19, no.2, pp.110-132.
- Hess, M. and Coe, N. M. (2006) Making connection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standards and embeddedness in the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industr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8, pp.1205-1227.
- Howells, J. (2002) Tacit knowledg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Urban Studies*, vol.39, pp.871-84.
- Hsu, Jinn-yuh (2005) The dynamic firm-territory nexus of Taiwanese informatics industry investments in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vol.37, no.2, pp.230-254.
- Hsu, Jinn-yuh and Saxenian, A. (2000) The limits of guanxi capitalism: Transnational collabo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2, pp.1991-2005.
- Kirat, T. and Lung, Y. (1999) Innovation and proximity: Territories as loci of collective learning process,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vol.6, no.1, pp.27-38.
- Langlois, R. N. (2002) Modularity in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 Behavior and Corporate Change*, no.49, pp.19-37.
- (2003) The vanishing hand: The changing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2, pp.351-85.
- (2004) Chandler in a larger frame: Markets, transaction costs, and organizational form in history, *Enterprise and Society*, vol.5, pp.355-75.
- Langlois, R. N. and Robertson, P. L. (1995) *Firms, Markets and Economic Change: A Dynamic Theory of Business Institutions*, London: Routledge.
- Linden, G. and Somaya, D. (2003) System-on-a-chip integration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firm strategie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2, no.3, pp.545-576.
- Malerba, F. and Orsenigo, L. (2000) Knowledge, innovative activities and industrial evolu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9, no.2, pp.289-314.
- Morgan, K. (2004) The exaggerated death of geography: Learning, proximity and territorial innovation system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4, pp.3-21.
- Poon, J. P. H., Hsu, J. Y. and Jeongwook, S. 2006. 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Asian latecom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6, no.4, 541-559.
- Saxenian, A. (2002) Transnational communities and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case of Taiwan, China and India, *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9, no.3, pp.183-202.
- Saxenian, A. and Hsu, J. Y. (2001) The Silicon Valley-Hsinchu connection: Technical communiti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0, no.4, pp.893-920.
- Storper, M. (1997) *The Regional Worl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Sturgeon, T. J. (2002)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A new American mode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vol.11, no.3, pp.451-496.
- (2003) What really goes on in Silicon Valley? Spatial clustering and dispersal in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vol.3, pp.199-225.
- Sturgeon, T. J., Lee, J. R. (2005) Industrial co-evolution: A comparison of Taiwan and north American electronics contract manufacturers, In Berger, S., Lester, R. K. (Eds.), *Global Taiwan: Building Competitive Strengths in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y*, Armonk, An East Gate Book, pp.33-75.
- Yang, C. (2006) Overseas Chinese investments in transition: The case of Dongguan.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47, no.5, pp.604-621.
- (2007) Divergent hybrid capitalisms in China: Hong Kong and Taiwanese electronics clusters in Dongguan. *Economic Geography*, vol.83, no.4, 395-420.
- Yang, Y. R. and Hsia, C. J. (2007) Spatial clustering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trans-border production networks: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IT companies in the Greater Suzhou Area, Chin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vol.39, pp.1346-1363.

- Yang, D. Y. R. and Coe, N. M. (2009)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PC production networks, *Growth and Change*, vol.40, no.1, pp.30-53.
- Yang, D. Y. R., Hsu, J. Y. and Ching, C. H. (2009) Revisiting the silicon island? The geographically varied “strategic coupl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 technology parks in Taiwan, *Regional Studies*, vol. 43, no.3, pp.369-384.
- Yang, Y. R. and Wang, H. K. (2007) The regional variations of farmland property rights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n institutional comparison between Suzhou and Dongguan, *Issues & Studies*, vol.43, no.4, pp.117-148
- Yeung, H. W. C. (2007) From followers to market leaders: Asian electronics firms in the global economy,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 48, no.1, pp. 1-25.

「總力戰」與地方文化  
地方文化論述、台灣文化甦生及台北帝大文政學部教授們\*  
柳書琴\*\*

Total War and Local Culture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Revival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ofessor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by LIU Shu-Chin

關鍵字：戰爭期、大政翼贊會、地方文化論述、外地文學、台北帝大、文化甦生

Keywords: wartime, the organization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gaichi literature,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cultural revival

---

收稿日期：2009年6月1日；接受日期：2010年4月8日。

Received: June 1, 2009; in revised form: April 8, 2010.

\* 本文初稿發表於愛知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哈佛大學東亞言語・文明學部主辦「帝國主義と文学：植民地台湾・中国占領区・満洲国」國際研討會（名古屋・2008年8月1-3日），並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NSC96-2411-H-007-017-MY3）補助。感謝提供研究支持及發表討論的上列機構，研究計畫案助理蔡佩均、黃懿慧專業協助，以及使筆者受益良多的本刊匿名審查教授們的意見。

\*\* 服務單位：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E-mail: scliu@mx.nthu.edu.tw

## 摘要

「地方文化振興運動」擴及台灣後，引發了以戰時國民精神建設為宗旨，指向「國民性」塑造的「官製地方文化論述」；關切台灣文化主體性與現代性，指向「地方主體」建立的「本土地方文化論述」；以及介於兩者之間，以在台日本人社會處境與未來願景出發的「外地文化論述」。各種立場與類型分歧的台灣地方文化論述，闡出多重文化勢力斡旋的空間，同時產生了間隔官方文化統制與本土文化界直接交鋒的緩衝作用。文化甦生的整體背景為文化動員，戰時台灣的文化復甦現象，乃是上述三者交相促進的結果。台北帝大教授在南進調查與台灣研究的權威，使他們對上述三種論述都產生影響。因此在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殖民地學術威權介入文化生產的特殊時期。本文將透由下列子題對此進行探討：(1)皇民化運動不同階段措施對台灣本土化造成什麼影響？(2)軍事擴張引發的地緣政治變化及帝國推動的「共榮圈」文化運動，如何活化殖民地在帝國中的既有文化位階？台灣文化菁英如何挪用「翼贊地方文化論述」，爭取戰時地方文化的存續與增能？(3)「本土地方文化論述」操作下，戰時台灣文化的復甦取得了哪些成果？「政策開口」下的本土策略，如何被統治階層所洞悉，並隨著政策的縮口被迫進行修正？(4)在台灣文化由「鄉土文化」向「地方文化」進行定位轉換，以及殖民官方推動的台灣學建構熱潮中，台北帝大教授們扮演了什麼角色？(5)學術分工投現於文化統制與文化動員體制的當時，技術性資本最低的文學科教授們，如何在島內文化的扶掖或統制方面有不同介入，成為文化自主性的屏障者或文化統制的協力者？

## Abstract:

After the movement of invigorating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originated in



Japan, was enlarged to cover Taiwan, three streams of cultural discourses were respectively but also mutually evoked in Taiwan: “the officially-mad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ith the wartime spiritual construction of people as its primary objective, referring to the issue of shaping proper identities that would qualify people of the nation; “the nativ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mainly concerned about the subjectivity and modernity of Taiwanese culture, referr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subjectivity; “the discourse on the *gaichi* culture” made by the Japanese in Taiwan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social circumstances and future vision, lying between the former two poles of cultural discourses. The divergent positions and patterns of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inaugurated a space for the media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multiple streams of cultural power and furthermore buffered the effects of direct confrontation that might be provoked in an encounter between the cultural policy enforced by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local cultural circle. Cultural mobilization served a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cultural revival in Taiwan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was the result of an interaction among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streams of cultural discourses.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interfered in surveys on 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and in researches on Taiwan, so they are involved in three kinds of the discourses and result in the impact on i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diverse cultural discourses in Taiwan through the following subtopics: (1) How did the various measures enforced in different phases of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assimilation of the local culture influence the trend of localization in Taiwan? (2) How could the geopolitical changes aroused by military expansion and the cultural movement around the Ring of Pan-East-Asian Collective Prosperity launched by the Japanese Empire revitalize the given cultural position of a colony ranked under the imperial standards of categorization? How did the cultural elites in Taiwan appropriate the local cultural discourse in support of the royal monarchy in Japan to strive for wartime maintenance and empowerment of the local culture? (3) Under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v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hat kinds of fruitful results were achieved during the wartime cultural revival in Taiwan? How did the ruling class eventually become aware of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the native discourse on the local culture,” which took advantage of the interstices within the official frame of cultural policies and later as a result was compelled to make amendments to its strategies in terms of the strictly modified cultural policies?

(4)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the “homeland culture” to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ese culture, as well as situated in a popular trend of constructing Taiwan as an academic subject of study officially espous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what kind of role did professors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perform? (5) During this period when an academic division of labor was effected under the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system of cultural mobilization, how did professors of the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in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as the lowest rank of the technical capital in the system of academic mobilization, interfere in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support or governance of culture in Taiwan so as to become either the defender of cultural autonomy or the collaborator of cultural governance?

## 前言

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文化界曾透過對地方特殊性的強調，掙扎於國民文化、日本精神的徵召面前，在有限條件中創造衍替，於「皇民化運動」下出現了本土文化於1937-40年間受抑，而後於1940-43年間復甦的文化轉折現象。

戰時台灣的文化甦生現象，起源於多種不同政治、社會、文化力量的交會。就文化層面而言，它是大政翼贊運動在台灣掀起的官方文化戰、1930年代中期以後浮現的在台日人文化意識，以及挪用翼贊論述獲得生機的台灣本土文化運動，交相促進的結果。促使三股性質與勢力不同的文化力量相互激發的觸媒，則是大政翼贊運動所主導的「地方文化振興運動」(簡稱「翼贊文化運動」)。肇始於日本內地的「地方文化振興運動」擴及台灣後，由於官／民、日／台及知識份子之思維差異，引發了以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台灣皇民奉公會文化部及與此附和的在台日人官僚、學者、文化人為主，堪稱為文化戰的「官製地方文化論述」；由台／日自由主義學者、文化菁英所建構，觸發台灣文化甦生的「本土地方文化論述」；及以在台日本人、「灣生」<sup>1</sup>世代為主，基於在台日人社會文化意識、外地文化定位渴望、外地文化消費需求而形成的「外地文化論述」，三種貌合神離的論述與行動。官方／本土地方文化論述在外貌上皆以「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形態顯現，不過內涵與精神卻有根本差異。前者的宗旨為戰時國民精神建設，指向「國民性」建立問題；後者關切台灣文化的主體維繫與現代性延續問題，指向「地方主體」的建立，亦即台灣性問題；最後，「外地文化論述」則介在「國民

---

1 「灣生」，日治時期對日本人在台第二世代的指稱，主要指移居者在台繁衍的第二代，廣義亦包括非台灣出生但幼年即在台成長者。以1930、1940年代文學界活躍的「灣生」為例，前者如中山侑、新垣宏一，後者則如三歲時即隨家人來台居住的西川滿。

性」與「地方主體」兩端之間。台北帝大文學科及關心人文藝術領域的其它學科教授，或主動或被動，在三者之間都有不同的介入。

1920、30年代以來蓬勃發展的台灣文學／文化論述，隨著中日戰爭後社會不穩情勢，趨於低沈。但是，與此同時，1930年中後期外地文學／文化論述的抬頭，以及1940年代翼贊地方文化論述的提倡，逐漸綜合出一股匯聚台灣內外資源、豐富多面的地方文化運動。包含複雜脈絡與源頭的地方文化論述，成為活化1937-45年間戰時殖民地文化發展的新動力。這股動力中，除了長期耕耘台灣文學、藝術，熟稔台灣文化議題的本土文化人之外，官方文化機構、台北帝大學術人員、在台日本民間文化人也開始走向文化場域中心。文化活動的發展與表現，因而顯得異常複雜。

此時殖民階層的文化菁英，成為文化界一股無法忽略的新勢力。其中，台北帝大教授(含研究人員)憑藉南進調查與台灣研究的學術權威以及對官方文化運動之接觸參與，對上述三種論述產生不少影響，尤為重要。無論是致力於在台日本人文化論述的生成；協助官方論述之宣導闡釋；或為本土文化運動請命辯護，他們都牽動了官／民、本土／外地論述的交鋒。1940年代活躍於台灣公共論述裡的帝大教授們，儼然具有戰爭期文化論述「火車頭」之地位。台灣文化史上，也因此形成了一個殖民地學術威權明顯介入文化生產的特殊時期。

對於戰爭期台灣主體論述建構具有關鍵影響的「地方文化論述」，即是總督府文化機關、在台日本人文化菁英、台灣文化人共同投入的三種論述，在不均衡的競爭與互利結構下，交叉共構而成的產物。本文嘗試梳理地方文化論述與皇民化時期台灣文化甦生之關係，聚焦台北帝大學界人士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藉以探討下列議題：(1)如何重新評價皇民化時期的文化運動及其與台灣本土化的關係？(2)伴隨侵略戰爭湧現的空間重塑、資源調查、地緣政治(geopolitics)變化、帝國境內文化流動，如何影響帝國與台灣之間的統治階序及文化論述？以建

立「大東亞共榮圈」為目標的翼贊地方文化論述存有怎樣的含混空間，台灣本土文化運動如何挪用其論述，模糊官民文化之表相，爭取地方文化的存續與增能？(3)地方文化論述在台灣引動的文化景氣及復甦現象，與朝鮮有何主要差異？在引發文化政策鬆動的統治意識形態與治理技術調整期，本土菁英及文化團體開創出哪些成果？「政策開口」下的本土活動，又如何隨體系緊縮逐步被納入統制？(4)在台灣文化由「鄉土文化」向「地方文化」進行定位轉換，以及受帝國擴張引動的台灣學建構熱潮中，素以南方研究、台灣研究為重點的台北帝大教授們，扮演了什麼角色？(5)由低迷而活絡、復又轉衰的台灣文化波動裡，學術動員體系中技術性資本最低的文學科教授們，如何在島內文化的扶掖、指導或統制方面，以不同專業介入，成為文化自主性的屏障抑或文化統制的協力者？

## 一、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本土化

濫觴於三、四百年前的全球化，今日已發展成由跨國企業、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所貫穿，踰越國家界限，涵蓋各種面向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全球動態連線。在網絡化的全球社區中，地方從國家或民族之下成為全球部落的一個單位，其價值、功能與角色也因而重新逐層定義、調整與發揮。全球化是一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現象，也是一個充滿矛盾的歷史過程。它是普遍性與特殊性、一體化與分裂化、集中化與分散化，國際化與本土化的統一<sup>2</sup>。此外，在地文化形式會將全球化的資訊、語碼、技術、形象等資源轉化，利用在地方式產生本土及全球的混合，形成全球性的在地化現象(global localization)<sup>3</sup>，亦即

2 參見，Rainer Tetzlaff主編、吳志成等譯《全球化壓力下的世界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94-99。

3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1992.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以二戰結束為分界，在漸進開展的全球化歷史進程中，早在以資訊科技為特點的當代全球化以今日面貌席捲之前，近代全球化及同步伴生的全球在地化現象，在帝國主義擴張的世界各地已有各自的演化及表現。帝國主義是近代全球化散播的首要動力，殖民體制為其界面與渠道。殖民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是近代全球化的顯著產物，它曾經影響全球化的成形，卻又為當代全球化步步瓦解。殖民主義刺激與之相對立的國族主義產生，殖民主義成了國族主義在全球擴散的工具；而國族主義壓抑內部多元文化促進同質性民族文化生成的作為，及其與殖民主義間的合作，則再製、再演化了殖民主義<sup>4</sup>。

近代全球化在殖民主義和國族主義的抵抗、合作及擴散中，於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前期達至頂峰。在東亞境內，國際商貿、多國資本與異國文化灌入的殖民／半殖民地節點都市；文化殖民主義透過同化政策、教育、出版、廣告、大眾流行的越境傳播；跨國移居／旅行／戰爭遷移人口的大規模增加；非本土之離地文化的出現與擴大；以及區域與區域、民族與民族間的跨文化交混，皆為常見的殖民主義全球化現象。置身於全球現代史中的台灣本土化歷史，與東亞地區的全球化歷程難分難解；和東亞境內不少地方相似，區域性的殖民主義與族裔性的國族主義，同樣扮演了台灣文化生成變遷的最大動力。然而，此時還有一股顯著的逆勢力，那便是屢屢以地方文化論述顯現的——全球在地化勢力。從荷西殖民、明鄭統治、清朝領有、日本殖民、國府接收以迄今日，台灣不斷被捲入東／西方帝國主義或亞洲民族國家的擴張史之中，被迫在政權更迭的不同政經條件與區域關係裡，演練其廝身多重地域空間的地方歷史。「台灣(地方空間)」作為不同地域社區單位的性質不變，然而「台灣(台灣性、台灣文化)」卻是一

4 參見，Arif Dirlik〈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年3月，頁23-43。

個變動性的歷史現實。四百年來不同政治隸屬引發的空間重塑過程，每每牽動繁複的政經、社會、文化、語言、認同之整建，使得台灣在東亞社區乃至全球社區中的主體位置、網絡屬性、社會風習、文化意識與日常生活，發生一次次遷移轉化<sup>5</sup>。

就文化角度而言，殖民統治與資本體系擴張伴生的地域聯繫與文化融合，卻也為這片土地引入了各種資源。殖民活動中發生的全球化現象與本土化過程，時而壓制對立，時而滲透循環。廖炳惠有關日治時期台北帝大第一任圖書館長田中長三郎的研究，即指出帝大購置歐洲早期重要植物圖志，並與東京帝大共同購買珍貴善本書，這些自外國引入的文化投資，後來成為台灣邁向南方研究及發展本土熱帶科學的基礎，甚至影響到戰後台灣熱帶人文學與科學的全球化<sup>6</sup>。在本文關切的「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等帝國戰爭白熱化時期，同樣可以看見全球化與在地文化之間的纏鬥、交會與辯證。

滿洲事變與蘆溝橋事變陸續爆發後，日本國內從日俄戰爭、朝鮮吞併、蘇聯共產革命之後長期對北方／北進的關注，由於台灣與中國的連帶性，再次被拉向南方。隨著1938年「國家總動員法」通過，以及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內台一體／內鮮一體、改姓名／創氏改名、皇

5 筆者曾以「節點都市」概念，選擇皆有漫長殖民都市歷史的日本第一個殖民地都邑「島都」台北，以及俄國中東鐵道附屬地中樞、「滿洲國」俄日權力更迭的「東方小巴黎」哈爾濱作比較。透過兩地1931-37年間達到高峰的都市書寫，探討小說語境下的殖民主義全球化現象，以及帝國／殖民地經濟結構、文學書寫與地方反應三者的關聯性。分析發現，滿洲事變到蘆溝橋事變之間，台灣從「日一台」南北單向聯屬逐漸被捲入「日一台一南支、南洋」之南方網絡。台灣人於殖民空間重塑過程中引發的歷史文化虛脫症、地域分工主義下的農業轉型困境、殖民資本怪獸的湧入與進退維谷的罷工者、離地農業引發的流離失所，以及價值與倫理變遷下的都市人迷亂感受，成為台北作家最矚目的題材。參見，柳書琴〈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1930年代台北與哈爾濱的比較〉，「日本台灣學會第11回學術大會」，東京：日本台灣學會，2009年6月6日。

6 參見，廖炳惠〈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知識感性〉，《中外文學》33卷7號，2004年12月，頁57-75。

民化運動、特別志願兵制度、徵兵制度……等系列措施，戰時動員體制的法制化在台灣、朝鮮具體而微地展開。包括中、日、朝、台的東亞各地，在中日開戰後都面臨了戰時體制化帶來的空前變化。30年代以後蓬勃的南進論及南方調查研究，隨著40年代香港、菲律賓、馬來半島、印尼、新加坡、大洋洲等西歐殖民地的實質奪取更加活躍，日本—台灣—南支—南洋的海洋聯屬關係，引發日本國內及台灣總督府高度想像與重視。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台灣產業開始轉型。步上1931-37年間工業產值飛躍的「北進基地」朝鮮後塵，被強化以農業經濟、原料加工為基礎的工業化。1940年6月德軍攻陷巴黎、7月日本「基本國策要綱」發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台灣更成為了南方作戰基地。此一時期，總督府延續30年代開始的工業化方針，進一步推展軍需工業，利用南方原料進行初級加工，輸往華南及日本等地。「大東亞共榮圈」概念，也透過殖民教育、國民教化、媒體傳播，在台灣人日常生活領域中傳播開來。「南進基地化」，在政治面與皇民化相呼應，經濟面則配合地域分工、跨境殖民資本配置、帝國經濟控制模式、台灣重點產業調整等，終極目標即為「南方共榮圈」的建設。南方共榮圈與東亞共榮圈，皆以殖民計畫經濟的施行及徹底控制為原則，乃是以帝國武力為前導的亞洲國際經濟分工體系。武力侵略配合區域經濟化，以政治及軍事手段，透過戰爭快速累積自國資本藉以改造日本經濟體制，正是日本解決1930年代經濟危機的主要策略<sup>7</sup>。

台灣在新戰略構圖中被設定的位置與機能，導致數十年來以「米糖倉庫」為主軸的社經體系，面臨結構性調整。轉型現象在1930年代前期萌露，後期日益明顯。聯繫台灣與南洋的吞吐口高雄港獲得建設，

---

7 林繼文《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稻鄉，1996年3月)，頁41-43。



高雄鋁業、化學、鋼鐵、機械等軍需工業也開始發展<sup>8</sup>。30年代中期以後，軍部、總督府、國策公司聯手，推動台灣、南支、南洋產業分工及生產的循環。1936年為南進政策創設，因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使事業觸角深入中國南方、菲律賓、英領馬來、北婆羅洲、蘇門答臘、西里伯斯與巽他島弧等地的「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其龐大軍需產業、航運等事業，亦是日本以台灣為中心建構華南／南洋勢力圈的實踐之一<sup>9</sup>。帝國海外擴張「先北後南」的進展，使台灣從1930年以前滿足北方地域需求為主之米糖經濟所形成的「帝國—殖民地」南北體系，進一步被納入「總力戰」多角互動的南方圈體系下。

由於這樣的大背景，日本殖民統治歷史最長久的台灣，於皇民化運動的籠罩下，產生了一段本土文化受抑而後又復甦的文化轉折現象。這股文化甦生憑藉的歷史動力，表面上乃文化政策轉變提供之契機；實則更是帝國「總力戰」地緣政治變化及動員體系引入的平行區域連帶概念，對上下隸屬「殖民地—帝國」體制，以及帝國的地理、權力和文化疆界，造成鬆動的結果。換言之，此一文化轉折與甦生現象有著極為特殊的世界大戰、亞洲戰爭之全球背景。它誕生於帝國內部一體性追求(文化統合、內台一體、皇民化)與區域軍事部署(區域戰略、產業分工、地方動員)的縫隙中；與日本帝國戰時國民精神總動員、大政翼贊運動、殖民地文化統制不同階段開合；殖民地官僚體系的外地化；外地文化意識的出現；官製／本土／外地文化論述的交混競合，有著錯綜複雜的關聯。

1930年代以左翼文藝思潮、鄉土文學論戰及文藝大眾化為主要動力，發展凝結的台灣島內文藝運動，隨著日本內地社會主義運動的受

8 蕭采芳〈1930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嘉義：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8年7月。

9 參見，張靜宜〈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6月；以及，蕭明禮〈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4年6月。

抑、「轉向」風潮的出現，本土文壇路線之爭，還有台灣話文書面化瓶頸等問題，於1935年後面臨困境。1935年底楊逵自「台灣文藝聯盟」脫退，創刊《台灣新文學》雜誌。該刊在楊逵主導下向日本內地式微的左翼文學界進行的聯結，可視為不願向滿洲事變後低迷環境降伏的台灣左派文化人的最後一搏。然而，楊逵力圖藉「殖民地文學」、「報告文學」等轉進策略，促進台日左翼文學者跨境合作的企圖，並沒有足夠的歷史條件促其成功。很快地，隨著中日戰爭爆發，台灣報紙漢文欄廢止，《台灣新文學》停刊，本土文學界陷入了空前的低潮。

1939、1940年開始隨著激烈的日華戰事告一個段落，本土文化界開始恢復；「大政翼贊運動」帶起「地方文化論述」之後，戰時文化界正式邁入春天。翼贊會成立之前，本土文壇中堅作家張文環已意識到戰事與地方文化的關聯性。他認為，因為「日本正在戰爭」，「在這個興亞大業下，當然中央文壇不能像從前那樣局限，為了更加擴張文壇，中央的空氣自然會容納地方性的東西進來。」他並將中央文壇帶來的這股影響，視為一種有利的「轉型期」。<sup>10</sup>地方文化論述展開之後，台灣作家對於地方主義的未來更顯得樂觀。王碧蕉寫到：「扛著『確定東亞共榮圈、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大纛，進行著國家總力戰的今日」，文化作為總力戰一翼，使命日益重大。「因此，最近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提出地方文化，倡導排除中央集中主義、主張地方分散主義，這真是可喜的事。」<sup>11</sup>

台灣地方文化論述不僅是推動戰時台灣文化前進的破冰論述，同時也對戰爭期乃至戰後的台灣主體建構產生了重要影響。從地方文化論述之公共論辯場域裡逐步開展的文化甦生現象，儘管存在官方論述與民間論述貌合神離的狀況，以及「本土地方文化論述」與「外地文化論述」堅持立場相持不下的情形；然而，彼此卻都已具備了必須參酌異

10 張文環〈台灣文學の将来に就いて〉，《台灣藝術》創刊號，1940年3月，頁10-12。

11 王碧蕉〈台灣文學考〉，《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頁21-24。

民族文化或連結不同地域文化的跨界思維。它們激烈交鋒的文化主張與社群競合關係，也脫出了官方地方文化論述推動「皇民化」、建立「國民文化」之期待，而有多種豐富的內容。殖民地學院機構日益重視這些討論，或介入兩者之間進行引導、協調，便是最好的證明。

過去在國族主義的視野下，容易將「皇民化」及其相關文化運作視為一種文化斷裂；同樣隸屬此框架，強調戰時「文化抵抗」的相關研究，也難以跳脫抵抗精神的平板解釋或固著於文化本質主義的迷思。上述觀點與評價真實指明了一定程度的殖民殘暴性，卻不免忽略1940年代「地方文化」與1930年代「鄉土文化」之間承繼、拓展及變形的關係；還有，1930-40年代在台日本人以外地文學為主軸的外地文化論述，以及殖民地學術機構從事的台灣·南支·南洋調查研究，所灌入的外來、異質性台灣論述資源。因而，也就遮蔽了對本土文化傳續力、能動性及跨文化交混現象的考察機會。

戰時文化現象扁平化的認知狀況，或許與對於具有曖昧性之皇民化運動的界定及其階段性變化，缺乏釐清有關。根據蔡錦堂的研究，「皇民化運動」沒有確切的開始時間及清楚統一的進程，也非由台灣總督府統一指導。1930年代後半期開始的一連串社會教化運動（譬如，1936年7月開始推行的「民風作興運動」等），可視為皇民化運動的序曲。「皇民化運動」一詞，誕生於當時台灣日系報紙與記者對這些運動的鼓吹中；中日戰爭爆發、「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之後，使用漸成風潮。直到1939年5月小林總督才首次於公開場合正式使用，並將民間炒熱的「皇民化運動」議題及成果，吸收為其施政方針和業績。此後直到1941年「台灣皇民奉公會」（簡稱「皇民奉公會」）成立以前，總督府掌理或地方州廳發起的精神動員、國民教化、同化政策，都被納入皇民化運動的指稱範疇。它被當作包含日語常用運動、禁止公學校漢文課程、廢止漢文欄、禁止台灣傳統音樂戲劇、敬神尊皇、強制神社參拜、家庭奉祀神宮大麻、寺廟整理、推行日本生活樣式、改姓名、強

化日本精神涵養、家庭正廳改善……等，一系列領域、脈絡、性質、策劃單位不同的運動之寬泛總稱。這種情形到了皇民奉公會成立後才有所改變。盛行一時的「皇民化運動」一詞，被官方命名的「皇民奉公運動」替代；先前步調不一的皇民化諸措施，此後正式由總督府統籌並擴大推動。<sup>12</sup>

換言之，廣義的皇民化運動，包含兩階段名稱、性質及統理操控不盡相同的運動。以皇民奉公會成立的1941年4月為界，前期以「皇國臣民化」為目標、由多種性質及目標不一的運動鬆散組成，可視為日本內地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延伸，時稱「皇民化運動」；後期則以「臣道實踐」為目標，除國民教化外亦重視勞動增產，為皇民奉公會統一策劃的「皇民奉公運動」。常被學者統稱為「皇民化運動」，或簡稱為「皇民化運動前、後階段」的此二者，其實並非同一個運動。不過，兩運動統括的多項運動中，確實有不少牽涉到文化領域，或隸屬文化界管理，前後具有相關性的事務。在指導理念上，前期的「皇民化運動」採行同化與控制的激進同化主義；後期的「皇民奉公運動」則著重彈性治理與文化動員的翼贊文化路線。

由於兩階段有所差異，文化界也相應產生了前後不同的波動。前期為小林躋造總督任內，從事變爆發到其任滿為止(1937.7-1940.11)，後期歷經長谷川清、安藤利吉兩總督到戰爭結束(1940.11-1945.8)。前期的總體目標為壓制帶有漢人色彩、潛行民族意識的本土文化及活動；此時期帶有消滅異民族文化立場的硬直措施，導致文化破壞、文化斲傷從此在台灣人的歷史記憶與學術論述中，成為皇民化運動難以抹滅的典型特徵。後期政策並未否定統制原則，反之由於官方主導文化轉型與整合，使得文化界在組織化與集團競爭方面，更加暗潮洶湧。但是細究而言，皇民奉公運動中某些時段由於「地方文化振興運

12 參見，蔡錦堂〈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第18期，2007年9月，頁227-245。

動」的推行，卻使文化治理模式一度出現轉圜。相對彈性的治理政策，在約莫兩、三年間提供了本土文化運行的合法性，活化了低沈暗鬱的戰時文化界。此時的文化界，一方面努力把握政策景氣推行活動；另一方面，則暴露在文化統制與檢閱體系下，逡巡於文化主體維護、傳統文化現代化及「大東亞文化」建設之間摸索出路。1942年中期之後，「大東亞共榮圈」論述勢力增強，台灣文化主體的建構、文化報國任務的徵召，使繼續堅持創作與活動的文化人，徘徊在「非國民／皇民」的火線上走鋼索。而當時發表、刊行的一些與皇民化及戰爭動員相關的時局言論、座談或書寫，戰後也成了台灣歷史與精神史上最敏感的爭議或罪證。

一般統而稱之的「皇民化運動」，有如上值得注意的差異與遞變。「皇民奉公運動」推行時間比「皇民化運動」稍長，在理念及政策方面出現了較為複雜細密的政治運作。然而，不論廣義狹義，前期或後期，任何階段與形態的皇民化政策由於殖民者內地文化本位的離地性格及文化帝國主義，對被殖民者本土文化都有嚴重破壞性。儘管如此，它卻也無法全然遏斷本土文化的運行慣性，以及內／外地文化的自由交混融匯。<sup>13</sup>因為這一連串促進帝國境內語言文字、國民精神、習俗、文化與戰時生活「一體化」、「集中化」、「同質化」的工程(皇民化、日本化、戰時化)，必須依賴「徵調」與「重編」本土人力、在地知識、社會資源與文化網絡來進行建構。然而，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雙方彼此合

13 2009年7月25-26日於清華大學召開的「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對於1932-45年間位於帝國南、北境的台灣與朝鮮人民，如何以不同方式承受、回應或轉化「戰爭帝國」引發的多元社會變遷，有相當多的討論。其中，石婉舜〈「台灣味」的發現與搶救—戰時布袋戲改造與台灣知識人的「地方文化」建構〉，以承攬官方布袋戲改造工程的黃得時為對象，檢視翼贊地方文化運動下台灣文化人藉戲劇活動建構台灣「地方文化」的努力。王惠珍〈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探討帝國圖書傾銷、戰時「支那」出版熱對台灣知識份子文化資本累積與知識建構的影響。兩篇論文中，也都指出了內／外地文化如何在權力不均衡的殖民體制下交互競爭、融匯的情形。

作，及統治階層人民散布於外地社會落地生根的過程中，已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特殊化」、「本土化」與「分裂化」。因此，皇民化運動非但未能在短時間內摧毀或改造已成為運動自身部分基盤的在地文化，不易改變一地長時累積的文化慣習及再生產能力；相反地，統治階層還必須面臨越境的日本人思鄉、文化貧瘠、精神衰弱、污名化等精神困境<sup>14</sup>，以及日本外地文化不斷熱帶化、混種化、去歷史化的危機<sup>15</sup>。皇民化運動充其量只能憑藉壓倒性的政策干擾，使台灣文化及習俗喪失在地人熟悉的外顯形態與傳承方式，甚或使它與在地人民原有的民族認同及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產生裂罅或剝離而已。(當然戰後台灣的歷史證明，這亦已留下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及社會文化危機。)

戰爭，引發大規模區域變動與社會變遷。戰爭期，往往也是全球化活躍、跨界網絡密集聯結、文化混合加速的時期。戰時凝塑了也釋放了文化的可能性，戰時下本土文化與區域文化的混合，對文化體內部的原有質素與發展趨勢，及其與區域文化或全球文化的後續互動，均會遺留某些影響。戰前台灣的「地方文化」乃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下的特殊產物，與當今全球化／全球在地化所產生的「地方文化」，有相當差異。然而，由於盛行於二戰之前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亦是資本主義極端發展下的產物，幾世紀以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引發的全球化及全球在地化現象，不只成為近代全球化歷程中的重要構成，及至當

14 在南進問題的討論脈絡下，南方外地日本人的體質及精神狀態問題，在1930年代後逐漸受到以台北帝大教授為主的殖民地醫學菁英關注。當時的學者們認為，熱帶精神衰弱的起因除了氣候風土、鄉愁等環境與心理因素之外，也和外地人遭內地人蔑視及其外地文化自卑情結有關。參見，巫毓芬、鄧惠文〈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李尚仁主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2008年10月)，頁88-89。

15 鳳氣至純平曾從「灣生」返回內地時遭遇「殖民地標準語」羞辱經驗、故鄉喪失情結、輿論界的「灣生」社會評價，指出灣生世代的認同焦慮與文化焦灼。參見，〈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2月，頁19-27。

代也還留下許多未被了解的影響。因此，我們有必要對它們彼此的關聯，以及它們在全球不同本土文化中投下的影響，進行更多檢視。

本土文化活動隨著皇民化政策的遞變而復甦，作為其復甦憑藉的地方文化論述產生的背景及基礎為何呢？以下將對此加以探討。

## 二、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產生的背景、資源與性質

構成戰時台灣地方文化論述核心的「地方文化振興論」，是「大政翼贊會」文化部揭櫫的文化治理原則。1940年7月，近衛文麿第二次組閣，解散全國政黨，推行「新體制」。9月與德國、義大利結為軸心國，10月成立大政翼贊會，以動員全國國民投入後方生產、支援前線軍事行動為目標。翼贊會的外延體制及推動機構，譬如「台灣皇民奉公會」、「國民總力朝鮮連盟」、「關東州／遼東半島」興亞奉公聯盟、「樺太（庫頁島）國民奉公會」等，也陸續成立。翼贊運動在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各領域展開的同時，「新體制」也成為最響亮的時代流行語。由翼贊會文化部主導推動的大政翼贊文化運動，便是在「舉國一致為戰爭效力」、「實踐臣道」、「滅私奉公」的新體制下出現的一種官製文化運動。1941年1月翼贊會頒布〈地方文化新建設的根本理念與當面的方策〉，同一時間台灣總督府《台灣時報》也同步推出了「皇民化的指導原理」特輯<sup>16</sup>；包括中村哲〈作為文化政策的皇民化問題〉，以及金關丈夫、東嘉生、增田福太郎、富田芳郎等帝大教授有關皇民化運動的言論刊出後，其政策效應逐漸明顯。

戰時體制的最新變化，影響了文化政策。大政翼贊運動雖為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調整與擴大，但就戰爭期日本文化政策而言，它卻啟動了中日開戰後一次最為重要的政策轉彎。作為翼贊文化運動的核

16 參見，「皇民化的指導原理」特輯，《台灣時報》1941年1月號，頁24-64。

心，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被視為「創造一個新時代的文化」、「建設新國民文化」的下手基礎。農村文化／地方文化論述，乃翼贊文化運動核心思維，除了日本內地之外也對殖民地產生重要影響。文化部主張，「日本文化的純正傳統」與其說存在於受外來文化影響的都市所形成的「中央文化」，不如說在以農村為中心的「地方文化」裡。因此，必須從地方文化的振興來建設國民文化。在此思維下，翼贊文化運動企圖借重地方文化及農村文化的振興充實、地方特殊性與鄉土傳統的尊重，達成鄉土愛、公共精神、集團主義及地域生活協同體的昂揚及確立。<sup>17</sup>

中村哲指出，在日本將要從「島國」邁向「東亞政治圈」的此時，文化與政治的關係受到重視，政治要有文化的內容，文化的政治性應予注意，因此屬於文化問題一環的皇民化運動也必須重新評估。思考以同化政策、國民統合為目標的文化政策，此時應如何更適切地發揮指導「異文化」、「他民族文化」的功效？台灣漢族文化日本化的過程，在未來東亞的建設中將是極為重要的經驗。因此，除了將日本人生活樣式引入以外，也應考慮熱帶風土氣候所形成的本島人文化形態及生活樣式，以及本島人心理、人心慰安等各種因素。<sup>18</sup>相較於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下，偏重形式主義的皇民化運動及本土文化壓制主義，翼贊文化運動改採開發非都市文化及尊重地方傳統的文化動員主義。故而，翼贊文化運動雖不脫文化政治、文化戰略性質，然而它對農村／地方文化振興與都會文化健全轉化的雙邊思考，以及內／外地一體施行的原則，卻使地方文化活動受到肯定，同時也賦予了本土文化人參與討論與推動的空間。

如上所述，透過振興地方文化內涵發揚日本傳統，促進國民文化

17 參考，吳密察〈『民俗台灣』發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中文版，參見《帝國裡的「地方文化」》，頁49-82。

18 參見，中村哲〈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941年1月號，頁6-12。



革新完成聖戰，乃官方地方文化運動的基本思維；然而在制度面上，帶有納粹文化政策色彩的此一運動，透由地方文化振興、戰時娛樂指導之名，卻積極介入文化界。此一介入產生了雙面性效應，一方面由於官方統制的施行，文化活動產生了朝向國策方向納編的變質現象；另一方面，則因為官方對文化的重視，舒緩了戰時文化界的緊張、低迷。除了日本內地、殖民地及「滿洲國」之外，侵華戰爭中的重要占領區（譬如，北京、天津、南京等），也受到翼贊文化運動不同程度與形態的影響<sup>19</sup>。各地翼贊文化運動通常先透過「新體制」座談會或報刊雜誌上的「新體制」專輯企劃，揭開序幕；接踵而至的則是各文化領域設置官方統制團體，對民間既有文化社群進行組織、教化、改造，引導各團體推動國策性文化活動。

翼贊文化運動引發的帝國、台灣同步文化活化現象，除得力於政策面注重地方潛力、地方差異的彈性特點之外，還包括帝國中央下達殖民地／占領區之在地承作機制的整體配合。在中央方面，翼贊地方文化運動構思與執行者有特定的知識人網絡，抱持國策文化之「農民文學」與「鄉土文化」等思維。在台灣的實際承作方面，則有皇民奉公會的設置、殖民地學術界／文化界的支援等，機構、政令、知識人及媒體的配合。吳密察曾從近衛內閣私人智囊集團「昭和研究會」與大政翼贊會成員的重疊關係；昭和研究會成員在理念規劃及推廣上扮演的角色；文化部長岸田國士（文學家、劇作家）、副部長上泉秀信（農民文學家）的文化人出身及鄉土文化觀點；台灣版「大政翼贊運動」施行的行政配套；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台灣官方宣言的出現；台北帝大副教授中村哲與昭和研究會重要成員東京帝大矢部貞治教授的師生關係等，

19 相關研究可參考，施淑〈大東亞文學共榮圈：《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新地文學》第1期，台北：新地文學季刊社，2007年9月，頁41-72；〈文藝復興與文學進路：《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二）〉，《新地文學》第4期，2008年6月，頁21-37。〈文藝復興與文學進路（下）：《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三）〉，《新地文學》第5期，2008年9月，頁53-60。

進行層層梳理。針對翼贊文化運動在台灣的再製、運行機構與承作人際，他揭示了該運動經由官僚／學術體系下達文化界，由台北帝大教授在台灣啟動公共討論與文化引導的政治擴張過程。<sup>20</sup>

在朝鮮，1940年10月成立的「國民總力朝鮮連盟」(簡稱「總力連盟」)，改組自1938年7月成立的「國民精神總動員朝鮮連盟」；12月「總力連盟」設立文化部，為翼贊文化運動朝鮮推動機構。在台灣，「台灣皇民奉公會」宣稱基於「台灣一家」理念，推動激發後方戰志、實踐決戰生活、強化勤勞態度、建立民間防衛等運動。與日本、朝鮮相同，「台灣皇民奉公會文化部」為翼贊文化運動的台灣推動中心，此後文化部主導的奉公文化運動取代國民精神總動員文化運動，成為戰時台灣文化治理的新方向。所不同的是，不論是1941年4月創立的台灣皇民奉公會，或是次年8月設置的奉公會文化部，其成立時間都較朝鮮方面晚了不少。

在政策彈性與推行技術等層面的因素之外，「地方文化」此一概念與戰爭地緣政治變化、殖民地地位上升、地方社會區域潛力、帝國境內跨文化流動相互關聯，也是考察翼贊文化運動何以引發殖民地迴響時，不可忽略的面向。除了1895年以來透過台灣總督府、殖民教育促進的帝國文化整合運作；民間商貿、大眾媒體帶動的殖民跨文化接觸之外；留學生<sup>21</sup>、翻譯<sup>22</sup>、旅行<sup>23</sup>帶動的知識交換與文化交流；1920年

20 參見，吳密察〈『民俗台灣』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

21 留日學生，在台灣近代知識引介中扮演重要角色。明治維新以後積極面向西方的日本，成為當時東亞世界中技術知識與西方現代性的最大轉運站；它同時也是東西文明交會、新舊文化轉換、東亞諸民族菁英合縱連橫的實驗場。筆者認為，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前期以中國、朝鮮、台灣為主流的「日本留學」現象，並非一般意義的知識輸入或文化交流而已，可說是影響著日本周邊國家及地區建構東亞現代主體、世界知識及技術體系的重要動力。在長達半世紀的東亞特殊歷史時期，「日本留學」是包含過去文化地位超勝日本的周邊國家(如中國、朝鮮)，以及被迫成為日本第一個殖民地的台灣，對「新興日本帝國」一種集體的、波段式、變動不息、情感複雜的知識交流行動。它是一個揉合了知識朝聖、現代文化傳播與帝國主義批判的複雜進程。中國、朝鮮、台灣的知識份子面對日本帝國及以日本為途徑進行的國際知識轉

代以後中國、蘇聯、印度、愛爾蘭、東歐各地民族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播散的世界視野；還有台灣文化協會等本土團體及政治結社在文化啟蒙、社會運動及台灣論述方面累積的在地意識……等，都為台灣在地文化的凝聚及其與區域／全球文化的接軌，提供了重要演練場。

日治時期，以存續地方文化、伸張在地族群利益為主要訴求的台灣本土運動，在約莫1930-36年左右，於台灣菁英發動的鄉土文學／語言運動、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地方自治運動中，出現了最為成熟、集中的展現。在文化領域，鄉土文學運動、文藝大眾化論爭、台灣話文運動、民間文學整理工作、台灣新劇運動、台灣現代美術的開展、台灣音樂與電影的嘗試，為其主要特徵。這一波帶有現代性、民族主義乃至社會主義色彩的鄉土文化運動，經常被置於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國族主義的框架中闡釋。然而，稍稍縱覽殖民政府透過各種政經、社會、教育、文化治理，蛛網密結擴大權力體系與文化改造的過程<sup>24</sup>，便

---

介，立場和態度不盡相同；不同留日世代置身相異民族處境，所抉擇的知識體系、吸收立場及訴求目的也有所差異。清末留日學生對於日本知識及透由日本汲取的轉手知識，存在著模仿、借鑑、批判及內省國民性各種辯證形態。台灣殖民地時期知識轉介的首要目標，則是以台灣人公民教養的提昇及現代文化水平的趨同作為武器，反擊以文明落差與文化差異為由的民族歧視、差別論述及台灣總督府特殊統治體制。

- 22 參見，鄧慧恩《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逵、張我軍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2009年12月）。
- 23 有關內地來台旅行者對台灣形象的再現與傳播方面，楊智景有多篇研究值得參考，譬如：〈日本領有期の台湾表象考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植民地表象〉，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08年3月。〈旅行記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エクリチュール：日本領台初期の台湾（蕃地）探検記から1930年代の山地ものへ〉（〈旅行記中の性別書寫：從領台初期台灣蕃地探險記到1930年代的山地文本〉），御茶水女子大學國語國文學會《國文》102號，2005年2月，頁26-38。〈戰時下殖民地台灣表象的生成：以1940年「文藝台灣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台灣文學學報》第8期，2006年6月，頁97-122。
- 24 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紀念台灣博覽會」中的殖民統治成果呈現，可謂重要指標。相關討論參見，呂紹理《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2005年10月），頁242-292；以及，馮瓊瑩《展示「統治時間」：日據時代「始政週年紀念博覽會」的治理技術》，新竹：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2006年5月，頁

可發現這一波鄉土文化運動恰恰也與台灣人日益正視本土社會網絡已從中國轉向日本，被編入日本及其統御的龐大東亞帝國時空，從而被捲入了近代全球化之中，因此引發的同化恐懼、現代焦慮及捍衛行動有關。

帝國以區域戰略強制殖民地產業升級的斷裂式轉型，尚未明確打出「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sup>25</sup>方針以前，1930年代前期產業界陸續施行的備戰調整與佈局，已使30年代中期台灣人的地方感與地緣網絡，從割讓前的台／中聯屬、1935年以前的台／日聯屬，逐漸被推向台灣／南方圈網絡之中。透過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記念台灣博覽會」的全島性宣傳與教化，台灣知識份子對隱藏在殖民政經矛盾及區域經濟壓力背後，更為深廣的帝國主義全球化的威脅也有了更多體認。帝國空間重塑，帶動殖民地空間與認同的重塑。至遲在1930年代中期左右，台灣大眾已普遍有了透過身體感官，體驗並內化新殖民時空的經驗。此外，不止於具體身體經驗，也不限於島內地理想像，即便是殖民都市裡的空間重塑或公共展示（譬如，市區重劃、博覽會等），往往也能向外擴延，在時人的社會意識中，升起充滿想像力與開拓性的「世界圖景」。這圖景既是殖民地式的、帝國式的，也是地域性的、全球性的。它帶著殖民地人民認知自我與世界的特定立足點、眼光與期盼，又難以逃脫對帝國擴張慾望及帝國階層式殖民世界觀的宿命接受與不自覺複製，因而不斷受到帝國領土所隱含的空間／權力／教化觀點所影響。此外，隨著戰爭報導密集飛向眼前、充斥生活周邊的遠方世界消息，也促使殖民地人民逐漸超越族裔或民族國家舊有共同體認知，形成疆界浮動的「地域共同體」或「東亞地域社會」之模糊想像。

台灣話文論爭中隸屬中國白話文派的作家朱點人，1936年發表於《台灣新文學》雜誌的小說〈秋信〉，便深切銘刻了受殖者覺察到殖民地

---

52-72。

25 此乃1936年9月小林躋造上任時，發表的台灣統治三原則。

物質建設及空間重塑被歷史化的那一剎那，所經歷的(殖民)現代性震撼，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認同、歷史記憶、身體感官的多重失落。老秀才「斗文先生」前往睽離十五年的島都觀覽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映入眼簾的是前清撫台衙故址蓋起了台北公會堂，在高唱「產業台灣的躍進」口號下，島都一切過去現在未來的城市建置、都會景觀、人文風貌、社會機能，乃至集體記憶，無一不被編入日本帝國的空間、時間、機能與評價當中。記憶中私藏的文化殘骸在遭遇新興殖民公共空間及據此展示的新世界圖景之後，驟然消殞成碎片。「斗文先生」不禁在陣陣秋風中，興起「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的唱嘆。<sup>26</sup>這充滿強迫性的殖民跨文化滄桑，其實也正是一次極具象徵性的殖民空間重塑震撼。文化焦慮，促成文化行動。1930年代台灣的鄉土運動雖緣起多端，卻也是對無限擴延、平直寬亮的殖民計畫性空間中反向彰顯的隱蔽政治與文化霸權有所警覺，基於批判、防衛與自我重建而生發的一種本土文化覺醒運動。意圖維護社會主體與文化慣習的台灣鄉土運動，追求地方自主與文化平權，與當時日本仿效德國「以愛鄉心涵養愛國心」的帝國主義鄉土運動邏輯，雖皆以「鄉土運動」名之，卻有天壤之別，則毋庸贅言。<sup>27</sup>

帝國日本的空間重塑，為近代全球化歷程在東亞區域的一段畸形展現，於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接連爆發，廣大占領區出現後臻於高峰。1940年以後台灣總督府的官方文書中，已經常使用「南方圈」來稱呼「南支」、「南洋」等地理範疇；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方

26 參見，朱點人〈秋信〉，原刊於《台灣新文學》1卷2號，1936年3月，發表時遭到當局削除。後收於《朱點人、王詩琅合集》(台北：前衛，1991年2月)，頁225-237。

27 除了朱點人的小說之外，王詩琅、徐瓊二、賴明弘、陳垂映等人發表於1930年代的小說，也體察到台灣作為南方共榮體系的節點與基地，看似加入了更寬廣的區域網絡，實則被置入另一個統制經濟的閉鎖空間。區域性經濟網絡的浸透與進駐，依據殖民治理需求設定的都市機能與階層式民族構造，對本土社會原有的組織架構、生產模式、聚落生態及文化倫理，皆造成難以估計的衝擊、割裂與破壞。參見，柳書琴〈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

圈」一詞蔚為流行。此時，「南支」所指的福州、廈門、汕頭等日本帝國領事館所轄地域；以及「南洋」所指的以馬來群島為中心的菲律賓、英領婆羅洲、英領馬來（馬來西亞）、蘭領印度（印尼）與帝汶、法領印度支那（越南）、暹羅（泰國）等<sup>28</sup>，上述廣大地域之戰略位置與豐富資源，已成為雄心勃勃的台灣總督府意圖外延其帝國使命與管轄勢力之標的。在被日本稱為「大東亞戰爭」的太平洋戰爭時期，所謂的「大東亞」地區，則泛指台灣、新南群島、關東州、樺太、南洋群島、朝鮮、滿洲、中國占領區、青島租界、東南亞、南亞、南洋及南太平洋等廣大地域。在占領區快速浮現的新領土視野與資源開發之現實需求中，台灣等「外地」逐漸從帝國邊緣向內部浮靠，成為帝國與戰地、新占領區之間的「中介」。台灣與「內地」的層位落差因而相對縮小，甚至被喻為「大東亞建設的左右手」<sup>29</sup>，成為帝國有機體內部至為重要的組成。「帝國最早的殖民地」台灣，儼然成了僅次於日本內地的——有歷史、有教化的「準國土」。

日本的「帝國化」歷程，在「南方圈」與「大東亞共榮圈」的擴張中，攀向巔峰。台灣人的社會感，也在「帝國擴大化」過程中，隨著地理想像、地域歸屬感，以及戰爭體制不同階段的開展，進一步去中國化，脫國族化，化約為帝國境內一個特殊的「地方」。一個具有從南方出發，聯繫更為南方之地潛力的「南進基地」。地方化、基地化之後，因為在南方地域具有特殊動員優勢，台灣被視為「總力戰體制」下的戰鬥配置，具有帝國一翼的新功能，不再只是帝國猜疑、警戒，必須予以「皇民化」的異己和負擔。雖然現實結構中的台灣人民處境未曾根本改變，但是在戰事宣傳與國策報導中，殖民地的奴屬標籤卻隨著國防

28 參見，周婉窈〈從南方調查到南方共榮圈：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法屬中南半島的開發為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27-28日，頁2。

29 此係中村哲在文藝對談的公開場合所言。參見，〈中村哲氏龍瑛宗氏對談會：台灣の文化に就て〉，《台灣藝術》4卷2號，1943年2月，頁8-13。

任務的徵用趨於淡化，公共報導的密集傳播更強化、擴散了這種幻影。

1942年7月《台灣文學》雜誌社舉辦的一場文學座談會中，甫來台數月的內地劇界名人松居桃樓的談話，便傳達了日本文化界對地方文化罕有的重視。受聘來台指導職業劇團，並擔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附屬團體、台灣戲劇界最高統制機關「台灣演劇協會」主事的他，在被問到「中央對地方文化蓬勃發展和對台灣文化運動的期待」時，提到「處在大東亞戰爭下的今天，在各層面都不能只侷限在日本式的狹隘思考中，而必須從大東亞共榮圈這個大範圍著想。」一旦從大處著眼，「東京文化只不過是大東亞文化的一環」，中央對於今後地方文化走向的期待，不是要「把東京的文化移植到地方去」，而是要「台灣率先創造新文化」、「要有啟發中央的氣概才行」。<sup>30</sup>

1942年底，「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作家代表歸台後，派遣單位「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矢野峰人，也特別以「台灣文學的黎明」譬喻、慶賀此一具有「文化史」意義的盛舉。他認為，原來不過「屬於地方性」的本島文藝，過去被內地當作「影子」般漠視，此次由於大會的參加使台灣的聲音透過文藝「傳到對岸及南方諸國」，本島文藝因而「首次被公認了存在的意義」。

如今因獲中央承認而成為日本的一份子，甚至躍昇到可與鄰國往來的地位。這些都真正是台灣的文藝史上從未有過的事，甚至文化史上亦未曾見過前例。<sup>31</sup>

30 參見，中村哲、竹村猛、松居桃樓〈文學鼎談〉（座談會），《台灣文學》2卷3號，1942年7月，頁103-109；彭萱中譯，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332-341。

31 參見，矢野峰人〈台灣文學的黎明〉，《文藝台灣》5卷3號，1942年12月，頁6-9；邱香凝中譯，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三冊，頁503。

帝國空間重塑、資源徵用需求、南方戰略地位，以及帶有儀式性的帝國境內各地文化代表的流動及串聯，多種因素都刺激地方文化的活絡，因此也為本土地方文化論述找到了超越民族主義或社會主義邏輯的新論述資源。一種從帝國擴張及殖民地統治歷史化的現實中，摸索出來的空間戰略，這個戰略也就是在「大東亞」共同體內部發揮多元文化演繹的——台灣地方文化。

相較於鄉土文化論述，透過話文實驗、黑暗現實揭發，對殖民政權傳達對立感與批判力的策略；(本土)地方文化論述，則將致力重點移向帝國範疇內地方文化潛能的闡釋，以及複數文化體並存價值的強調。於是，戰時台灣文化便以帝國境內的地方性、次級文化之形態，在不得質疑日本文化為帝國文化主流的前提下，鬆動皇民化運動異文化壓抑原則，爭取公開提倡地方傳統及論述台灣文化的微妙空間。

除了日本人之外，台灣作家也感知到戰時社會意識轉變、新政治地理出現，以及複雜的文化史構圖正在形成。1920-30年代受過社會主義洗禮、常於詩中批判殖民主義與外來資本的本土作家吳新榮，在中日戰爭初期充滿了憂疑愁悶。當時他曾於日記中寫道：「我們矛盾混亂越來越深，一切只待歷史的奔流解決，我們靜的行動只待外力而得動的前進。」<sup>32</sup>然而，到了太平洋戰爭後期，他卻寫了〈獻給決戰〉(1943年12月)，這樣酷似戰爭詩的作品。根據陳偉智的分析，吳新榮乃是在既有戰爭論述設定的論述空間與書寫形式中，透過以台灣為中心的泛亞細亞主義空間想像，將太平洋戰爭解讀為一個超越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亦超越現代的——「新文化創造」之「世界史歷史時刻」。藉由「前所未有的世界史變局」之視野，他找到了理解這樣一個無法迴避、充滿矛盾衝突的時代的角度。在世界性的時空重塑中接受這個變

32 1938年1月6日，吳新榮日記。張良澤主編《吳新榮日記，戰前篇》(台北：遠景，1981年10月)，頁62。



局，進而尋思新歷史時期中的台灣人角色及未來可能。<sup>33</sup>

在帝國南、北、東、西多向度擴張的需求之下，殖民地得以在某種程度內回復並拓展它與周緣地域的關係。譬如，台灣與華南、海南島、東南亞的關係，朝鮮與滿洲、蒙疆的關係。換言之，領土、資源、人力有限的日本，因應帝國的擴大，終究不得不面臨往昔為強化「殖民地—帝國」隸屬性、對其地方自主網絡予以壓抑的殖民地，重新伸展與原屬地域社會廣泛的聯繫。軍政界限的外擴，牽動民族與經貿疆界拓展，同時亦刺激了文化界限的躍動。侵略戰爭引發的多元變化，回擊了帝國原體制下的舊秩序與舊思維，緩和了皇民化運動下躁進的文化一元主義，殖民地地方優勢與文化資源因此而受到重估。

綜上所述，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起因與資源，既來自如上一種帝國規模的官製文化運動，以及擴張戰爭引發的空間重塑與「帝國—殖民地」位階縮小效應，其內涵自然不免帶有內置的「(帝國)中央文化／(殖民地)地方文化」階序關係。用當時最為普遍的意識形態用語來說，即文化上的「八紘一字」。然而，在另一方面，由於官製文化運動的推行無法排除殖民地文化條件的配合，故而殖民地文化勢力也有反向介入、穿透、干擾官製運動運行預設的機會與能量。不過，歸根到底，若不是台灣社會長期蓄積的在地文化基礎；那麼，非但本土文化界不易在皇民化政策下透過翼贊文化論述的「含混性(ambiguity)」開創地方文化的空間，即便是來自內地的官製文化運動意圖著陸傳播、帶動影響，恐怕也將有所困難。

1930-37年間台灣鄉土文化運動蓄積的批評能量與實踐成果，在戰時地緣政治變化、剛柔急緩不同皇民化政策以及翼贊地方文化運動的刺激下，萌露了繼續向前演進的契機。戰時文化甦生有何盛衰起伏、

33 參見，陳偉智〈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2009年7月25-26日。

特性與成果，將在下節中繼續探討。

### 三、戰時台灣文化甦生的盛衰起伏、特性、成果及其消退

大政翼贊會文化部啟動的地方文化論述擴及台灣之後，其運動理念在殖民地日本學者與文化人共同穿針引線的詮釋解讀下，很快便與1930年代累積到高峰的台灣鄉土文化運動，以及1930年代逐漸浮現的在台日人外地文化意識，產生了官／民文化論述的各自表述與混合匯聚。其結果是短暫擾亂了制度化尚未完成的統制措施之單向推進，在官方制約存在的前提下，催發了一股潛行於1940年底到1943年底之間，遍布戲劇、文學、民俗、民藝、音樂、廣播……等領域的台灣文化甦生。

戰時文化宣傳與文化戰引發的文化甦生現象，在戰爭期的其它時段亦曾出現。十五年戰爭時期，文化戰始終是由武力戰、資源戰、政治戰、心理戰共同構成的總體戰略之重要部份。「滿洲國」統治穩定、中日東北問題暫時達成協議後，1936年3月上台的廣田弘毅內閣，即開始廣泛宣傳「日華提攜」論述。此論後因日華開戰暫告沈寂，到1938年日軍控制東南沿海精華區及內陸樞紐武漢等地，迫使國民政府撤退至四川後又再次啟動，並且宣稱日華關係已由「戰爭期」進入「建設期」。當時的內閣總理大臣也正是後來翼贊運動的推手近衛文麿，1938年10月武漢三鎮陷落，11月他所發布的「帝國依武漢淪陷後的東亞新階段與處應方針」<sup>34</sup>，即赫赫有名的「東亞新秩序」聲明，後來成為「日華提攜」政策的定調。在此背景下創設、堪稱東亞文化戰第一媒體的《華文大阪每日》，也於創刊號刊載了具有近衛文化戰思維的相關言

34 參見，近衛文麿〈創刊詞〉，《華文大阪每日》創刊號，1938年11月1日，頁3；以及，〈日本真意不在滅亡中國，近衛首相演說要旨〉，《華文大阪每日》第1卷第2期，東京：東京日日新聞社，1938年11月15日，頁4。

論，特別重視「各民族共通文化傳統」在促進「日華提攜／東亞和平／東亞民族繁榮」方面的功效。為確保日本統治的絕對優位，「日華提攜」、「同文共榮」很快又與「東亞盟主論」結合。在以土肥原賢二為代表的「東亞盟主論」中，其發表於《華文大阪每日》的〈為創新新文化而戰爭·中日事變之最大標的〉<sup>35</sup>等論稿，正式將「戰爭」與「文化」作了崇高的推衍與接合。<sup>36</sup>龐大的文化戰於焉開始，新啟動的文化戰攻勢，很快便蔓延到了日本各殖民地及占領區。

在台灣方面，《風月報》在漢文欄廢止後逆勢發刊的案例顯示，台灣總督府因應對華戰事曾嘗試在不放鬆漢文控制的前提下，以極少數柔性刊物啟動漢文利用之「同文主義」文化政治。<sup>37</sup>此外，台北「鷺州吟社」1939年編纂的《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中，「宣揚國威、翼贊皇道，培養熱愛日本帝國」與「甦生文化，維護台灣漢學傳統」並存的二重表現，也反映了台灣漢詩人在「東亞新秩序建設」、「日華提攜」等國策概念下，藉由「吟詩報國」論述與創作，如何一方面回應日本官方同文主義論述，另一方面又在「不平衡的互利結構」中開發戰時漢詩創作空間<sup>38</sup>。總之，這是一個普遍把文化當成了戰爭武器及統治技術的可悲年代。不過，以大政翼贊運動發起為界，戰爭前後期的文化控制及利用模式仍有必須辨明之處。大致而言，同文主義論述以文化相似性（同文共榮）為動員基礎，地方文化論述則以文化差異（地方文化）為徵用資源。此外，日華提攜論述下復甦的文化部門以漢文文藝界為主，翼

35 土肥原賢二〈為創新新文化而戰爭·中日事變之最大標的〉，《華文大阪每日》第1卷第2期，1938年11月15日，頁11。

36 相關討論可參見，張明權〈翼贊皇道與甦生文化的互利結構：以《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論日治末期台灣漢詩壇吟詩報國論述〉，收於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編《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5年7月），頁411-436。

37 參見，柳書琴〈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收於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5年5月），頁63-90。

38 參見，張明權，頁426-433。

贊地方文化論述則全面帶動了文化領域的活絡。因此，後者的文化甦生規模及其意義，在戰爭期可謂絕無僅有。

翼贊文化運動觸發的地方文化活化現象，在日本內地最為顯著成功<sup>39</sup>。在台灣、朝鮮、「滿洲國」或中國占領區的效應，也受到各地施行政策與文化慣性差異的影響而有不同展現。<sup>40</sup>綜合台灣及各地情況來看，甦生效應維持短暫；不過其價值不在於時間短長，而在於特殊歷史條件下激起的能動思維。

以帝國境內另一殖民地朝鮮為例，1930年代的文化運動在「朝鮮學」領域累積了有關朝鮮語文與鄉土文化的成果；30年代中期朝鮮電影為向日本內地及滿洲出口影片，也採取「揭示地方色彩」的戰略。然而，中日戰爭爆發後，朝鮮被設定為「大陸兵戰基地」，開始施行「內鮮一體」的皇民化政策；遭到文化統制壓抑的朝鮮文化界，雜誌、結社、言論機關陸續解散，知識人遭懷柔、脅迫、監控的情形強化，自主活動空間嚴重被剝奪。中日戰爭是一場不在朝鮮發生、也非對朝鮮發動的戰爭。然而，它卻空前深廣地影響了朝鮮社會內外部結構。並木真人的研究發現，戰時體制下由於填補大多數日本人徵調上前線所留下的空缺，朝鮮人大量走入社會公共領域，因此出現了受殖者社會地位上升的現象。然而，「殖民地公共性」的擴大，並非促使朝鮮人民福祉增加，反倒由於殖民統治外顯的暴力性本質受到抑制與遮掩，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爭鬥或協力關係更加撲朔迷離<sup>41</sup>。

中日戰爭對韓國歷史產生的複雜影響，不僅在於戰爭牽連的社會

39 參見，北河賢三〈戰時下の文化運動〉，《歷史評論》第465期，1989年1月，頁57。

40 李文卿曾進行東亞文學與文藝體制之研究討論，探討大東亞共榮圈之建構概念及其欲形塑的東亞文學觀，與大東亞共榮圈各地域對於此文學建構所衍伸出的知識、權力、文化關係的接受與質變。參見，李文卿〈共榮圈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第三至六章，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年1月。

41 參見，並木真人〈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2004年4月)，頁96-100。

變化層面廣泛；更在於與它相關的皇民化政策與總動員體制，同時具有「民族抹煞」與「脫殖民」雙重效應。在「殖民地—帝國體制」朝向「總力戰體制」轉變的過程中，朝鮮人何以逐漸親日？他們願意接受皇民化、成為「帝國主體」的內在邏輯又是什麼呢？金艾琳的研究指出，戰爭帶來去邊界化的地區新結構，使朝鮮人在帝國一體化政策的引導及宣傳下，將在中國遼闊大陸上開荒、進軍、抗拒西方帝國主義等戰時口號，以及建立日、朝、滿、中之「東亞協同體」，當作一種脫殖民的出路與期望。這些縮短或泯除殖民地與宗主國位階的脫殖民想像與戰時慾望，對朝鮮集體認同的重構帶來了極端不同於1910-30年代堅持民族主義抵抗的思維模式。「戰爭本身成為了決定被殖民主體生活和思想方式的統治方式和結構，因此任何人都不能脫離於此」、「主體所有的自我決定權和社會關係都透過向戰爭或戰場的傾斜來實行」。非但朝鮮言論傾向出現變化，對自身及他民族（特別是日本、中國）的認知也異於先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時朝鮮人內部甚至出現了「民族總體轉向」的說法。<sup>42</sup>車承棋也強調，皇民化的提出使帶有強制性的戰爭動員衍生了「動員以外」的變奏。帝國利用皇民化運動及戰爭體制，賦予朝鮮人動機；藉由改善殖民地地位的允諾，調節脫殖民慾望的大小，引導朝鮮人民將「脫殖民的慾望」往「內化於帝國體制」的方向發展。朝鮮人的脫殖民想像或行動，因此逐漸從「抵抗」朝向「體制化」，亦即爭取制度性平等的方面轉進。<sup>43</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前進北支」、「東亞協同體」等思維中，追求朝鮮民族的地位改善之外；當時還有其它一些向內探尋可能性的模式，其中之一則與翼贊地方文化運動有關。中日戰爭後遭受諸

42 參見，金艾琳〈戰爭景觀(Spectacle)與戰場實感的動力學：中日戰爭時期帝國對大陸的統治與生命政治或者對朝鮮和朝鮮人的配置〉，「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2009年7月25-26日。

43 參見，車承棋〈搖墜的帝國，後殖民的文化政治學：皇民化的技術及其悖論〉，同上。

多檢閱與限制的朝鮮文化界，由於「新體制」政策及朝鮮知識階層爭取「總力連盟文化部」設置的相關議論，活絡了起來。針對地方文化議題，總督府官方、朝鮮知識人在「文化利用」與「文化建設」之間相互折衝，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儘管主導權始終握在官方手中，然而如何透過地方文化的保存與利用，發揮戰時防衛、教化、增產、民心撫慰、生活指導等功效，卻成為朝鮮知識階層介入公共論述的一個著力點。在這樣的殖民地公共論述空間裡，朝向內部權力結構進行省察和鬥爭、而非隨戰爭野心向外轉移解決方案的嘗試，才得以出現。

宮本正明曾以「總力連盟文化部」為對象，藉由文化部設置的經過、運行狀況、主要事業，探討朝鮮總督府與朝鮮知識份子對文化部機能的不同論述與期待落差，以及朝鮮文化人維繫民族文化的一些策略與思考。宮本勾勒朝鮮文化人在政策轉型之際與統治當局充滿策略的角力，藉此指出他們在戰爭期遭遇的最困難、也是最重要課題。亦即，在「日本化」(皇民化)臻於高峰的階段，朝鮮文化人該如何統整包含語言、習慣、生活方式乃至民族文化、民族性在內的——「近代化」、「日本化」與「傳統文化」之間的矛盾？他指出，雖然朝鮮文化人不可避免地被限制在揚棄朝鮮文化、邁向國民文化的框架內進行議論，他們付諸文化部的建議與期望獲得實現的部份也有限；但是卻不應忽略他們在皇民化體制下，透過附和官方論述維護民族利益的面向，以及鑽入體制內部加以掣肘或進行改良的努力。到1942年11月總力連盟文化部廢止前的兩年左右，朝鮮知識人針對朝鮮文化特殊性、朝鮮語存廢、農村娛樂及農村文化振興提出的不少討論，農村素人演劇的出現，地方文化部活動發表等成果，都是朝鮮文化難能可貴的活化現象。<sup>44</sup>

44 參見，宮本正明〈戰爭期朝鮮における「文化」問題〉，《年報・日本現代史》叢書第7號，赤澤史朗(等編)《戰時下の宣伝と文化》(東京：現代史料，2001年5月)，頁185-214。

概略比較翼贊文化運動在台灣、朝鮮的共同特徵及運作差異，可以得到如下發現。在共同點方面：首先，台灣、朝鮮總督府逐漸理解到必須放棄過去對文化界疏離、對立的態度，積極動員本土文化人作為統治階層與殖民地社會的中間階級，策發他們使用各種媒體及文化平台，投入殖民地大眾的動員、教化及慰勞工作。為了因應戰時殖民地軍事人力動員、後方防衛、增產、激勵戰志、穩定人心等宣導工作，國民精神總動員體制下消極的文化方針因而有所更張。其次，翼贊文化運動雖為總力戰體制一環，但是殖民地知識階層多將此「政策轉向」朝向活化民族傳統及地方文化的「文化轉向」方面，進行詮釋與挪用。第三，在「文化轉向」敞開的文化論述空間中，本土知識階層漸漸在「以鄉土及民族為指向」的民族文化（朝鮮文化、台灣文化）公開提倡方面讓步，轉而透過演繹官方之「地方文化、國民文化」，推動在地文化的存續及現代化。具體表現譬如，以提高國民文化或建設共榮圈為名，呼籲統治階層提升「國民素養」（譬如：教育普及、公民訓練、現代文化與藝術涵養）與扶助「地方文化」（譬如：民族語文、鄉土藝能）。第四，1930年代以「鄉土文學」為核心的台灣鄉土文化運動、以「朝鮮學」為核心的朝鮮文化運動，亦即殖民地累積的本土文化運動經驗與論述資源，是戰時「文化轉向」生發的養分，也是挪用戰術憑恃的基礎。第五，翼贊文化運動在1941年10月近衛內閣下台後仍持續推展，但在1942年中期各領域統制措施明確後，政策曖昧性引發的榮景也快速消退。在台灣，以1942年8月皇民奉公會文化部設置為指標，文化領域中最富批判傳統與論述影響力的文學部門，在此前一個月以「台灣文藝家協會」納為皇民奉公會傘下組織，象徵了文壇的戰時體制化。在朝鮮，由於小磯國昭朝鮮總督的就任，被寄望發揮官民文化意見斡旋機能的文化部，隨著總力連盟中央組織的改組，也在1942年11月遭到了廢除。第六，不論朝鮮或台灣，翼贊文化運動在殖民地引發的地方文化榮景、影響範圍及延續性，都無法與內地延續到1944年以

後的情況相比。在台灣，擁有新文學精神傳承、由中堅作家創設的《台灣文學》雜誌，在1943年12月被當局下令停刊，敲響了文化甦生的喪鐘。綜上可見，地方文化論述在內／外各地效應雖略有差異，不過它在殖民地帶動的文化景氣，皆以文化部的改組及廢除為界逐漸消退。

在相異點方面：第一，文化部的設置，在殖民地知識界掀起的回應與影響不同。1940年12月朝鮮總力連盟文化部設置同時，台灣總督府情報局下也設置了文化部，負責掌理文學、電影、演劇、藝術等文化活動。但是府情報局文化部隸屬總督府行政體系而非國民動員組織，因此未如朝鮮出現因文化部設置問題而引起本土知識人矚目、文化議題討論活絡的現象。遠遠落後於朝鮮兩年又八個月，「台灣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才宣告成立，此時政策景氣已在消退中，儘管亦有台灣文化人提出對文化部的期望，卻已不再有廣泛討論的環境。第二，文化部設置過程開啟的論述空間，規模不同。總力連盟文化部，在朝鮮知識階層的言論鼓吹與總督府文化利用的雙邊企圖中出現，存在著朝鮮文化人表達意見的空間；皇民奉公會文化部則在總督府單方面的規劃下設置，本土知識階層的意見表達非常有限。台灣知識階層針對政策調整的反應，集中表現於「新體制」議題而非文化部機構設置案上；而且文化社團的組織與同人誌的發行比起文化部設置問題，更加吸引此時台灣文化人貫注心力。第三，翼贊文化運動的事業引導，進展速度不同。1941年4月朝鮮出現了「文化部實踐要綱」與「年度事業計畫」；同年台灣只有半官民性質的文藝組織「台灣文藝家協會」提出年度事業計畫，且內容較為簡略寬泛。第四，翼贊文化的典範生產，官方介入速度與程度不同。1941年5月總力連盟文化部宣布將「翼贊小說」有獎徵文比賽，列為「第一事業」。同月又提出設立「文化賞制度」，在文化各領域表彰「足以幫助朝鮮國民文化向上發展的優秀作品」，年底舉行第一回頒獎。台灣「皇民文學」之提出與鼓吹，在時間上則晚了將近兩年，至1943年4、5月間才出現；在形式上，由在台日人文學者發動，



與朝鮮方面總力連盟文化部直接介入獎勵鼓吹的情況，也有所不同。此外，皇民奉公會主辦的「台灣文化賞」到1942年底才設立，1943年初舉行第一回頒獎，也比朝鮮晚了一年以上。

戰爭期文化政策變化對台灣、朝鮮文化界的影響，以及殖民地知識人越浪前行的掙扎，共同展示了地方文化甦生現象曾普遍乍現於日本戰時「新體制」中的事實。然而，翼贊文化景氣畢竟也有其極限與消退期。1941年10月第二次近衛內閣對美談判陷入僵局，在侵略計畫上又與軍部發生矛盾而辭職；繼之上台的東條英機內閣，旋於12月發動了太平洋戰爭。1942年6月，近衛內閣創設的大政翼贊會，在政治理念截然不同的東條政權中遭到改組，文化部的管轄歸屬與內部組織也受到調整。7月，對文化界有一定號召力的文化部長岸田國士，由於對翼贊會的官僚化不滿，同時有感於無力在1942年後思想界全面右傾的風潮中繼續發揮「文化統制防波堤」的任務，遂於改組時請辭。<sup>45</sup>以此為關鍵，「文化報國」與「大東亞文化」等概念凌駕翼贊地方文化振興概念，成為下一階段文化指導、文化人動員的主導原理。

文壇方面，快速反應了此一趨勢。中央文壇方面的具體措施包括：1942年5月成立的日本文壇最高統制團體「日本文學報國會」；以及，該會於同年11月為配合「大東亞省」<sup>46</sup>設置、以「東亞文學者為完成大東亞戰爭及大東亞共榮圈建設的協力方法」為議題，召開的「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等。在台灣方面，1942年7月台灣文壇戰時體制成形，文學報國論取代了地方文化振興論。11月「第一屆大東亞文學者

45 參見，安田武《定本戦争文学論》（東京：朝文社，1994年5月），頁61-65。

46 「大東亞省」乃日本為簡化新占領區及舊殖民地行政而設立的統合性行政機構。「大東亞省」設置後，廢除拓務省對滿事務局、興亞省及外務省的東亞局、南洋局，統合大東亞地區的公使、興亞院聯絡部等戰地機關，台灣總督府、朝鮮總督府及樺太廳事務，也由拓務省轉往內務省督理。參見，楠井隆三〈昭和十七年台灣政治經濟の概観〉，台灣經濟年報刊行會《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八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1943年8月），頁58。

大會」召開後，進一步跨入「建設大東亞文學」的全新階段。先前本土文化社群在政策開口下延續文化主體的策略，也被統治階層洞悉，透過統制組織的功能強化、政策理念的釐清，以及文化論戰的檢視，展開「真正(正確)的皇民文化」之論辯與正名。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台灣代表返台到1943年底的一年左右期間，不論「外地文學」或「台灣文學」都在「大東亞文學」的新原則下，進行了一波波名稱、內容、意識形態與文藝行動的再檢討與再改造。擁護本土地方文化論述或外地文化論述的台、日人作家，對台灣的文學主體與歷史詮釋爭奪，因而更趨白熱化。終於在1943年「冀現實主義論戰」中達到巔峰，其結果便是——「皇民文學」的登場。在日本統治的最後階段，作為「決戰文學」、「增產文學」等一系列政治文藝中最受爭議及矚目者，「皇民文學」具有對官方「外地文學」、「台灣文學」分歧現象予以統合，以便在「大東亞文學」的最高原則下，從「名」到「實」，進一步落實文壇統制、文化動員與精神改造之企圖。因此，「皇民文學」不只是一種名詞，一項指導政策，更是一波有特定目標的文壇改造運動。它的特徵是以文藝論戰扣連文藝統制，以文學者之間的內部批判遮掩官方改造文學典範與爭奪文壇領導權的介入。<sup>47</sup>

由於藝術屬性、群眾教化力、運行資本的差異，各種現代藝術的本土發展歷程和成熟度不一，還有台／日人主導程度不同種種因素，官方施行統制時的考量、緩急與成效，也就有其權衡，有所落差。因此，在戰時文化統制及冀贊文化運動下，不同領域的活動表現與榮景長短不盡相同。戰時台灣文化統制的進程，可歸納出下列特點：屬於強勢文化媒體的演劇、電影、音樂等被劃歸娛樂部門，其統制先於文學部門；而文學部門又早於隱喻性高的美術部門及發展遲晚的音樂部

47 參見，柳書琴《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2009年5月)，頁453-469；以及，〈誰的文學？誰的歷史？：論日據末期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爭〉，《帝國裡的「地方文化」》，頁175-218。

門。娛樂部門的統制，以1941年8月成立的「皇民奉公會娛樂委員會」為肇端，以演劇及電影的控制最為快速。1941年9月台灣最初的電影統制機構「台灣映畫協會」成立，次年3月「台灣演劇協會」、「台灣興行統制會社」陸續設置。文學部門的統制，則以1941年2月「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立為嚆矢，經歷1942年7月皇民奉公會、府情報局、軍報導部之介入改組變為官方外圍組織，到1943年4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台灣文藝家協會」成為其下組織，完成納編。美術方面，1943年5月成立了「台灣美術奉公會」。音樂方面，從1942年11月成立「台灣音樂協會」開始，到1943年11月「台灣音樂奉公會」設立後趨於完成。唯一未被納入專責統制的，是由台北帝大教授及在台日本文化人為發起者及核心份子的民俗學領域。儘管如此，1942年年底以後《民俗台灣》也必須標舉「建設大東亞民俗學」的口號，1943年之後則更進一步與日本內地民藝運動結合，被要求在思索具有共榮圈美學及實用目的之「大東亞民藝」中，貢獻於「民藝奉公」<sup>48</sup>。

總結來說，戰時台灣文化的甦生，以1940年10月「大政翼贊會」成立為起點，1942年6月翼贊文化部改組、7月文化部長岸田辭職、11月「大東亞省」設置為中間逆轉期，至1943年11月台灣文學奉公會「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召開後趨向消頹。在「地方文學」、「地方文化」、「民俗記錄與研究」、「新台灣音樂」、「新台灣國民劇」等名義下，戰時文化、教化與娛樂活動中，再次出現了台灣鄉土色彩與本土文化內容。文化復甦的成果，最具指標性的有《台灣文學》、《民俗台灣》、《南國文藝》等現代文藝、民俗採集研究、中文文藝陣地及作品的出現，以及「桃園雙葉會」、「台灣鄉土演劇研究會」、「厚生演劇研究會」等演劇團體的創設及演出等。它不止於菁英文化層面，同時也滲透到大眾文化與庶民娛樂中。運動的主要參與者來自官民兩方，包含台灣總督府文

48 相關研究，可參見廖瑾瑗〈台灣近代藝術的表徵：《民俗台灣》的光與影〉，《台灣美術》67期，2007年1月，頁24-25。

化機構及官僚、皇民奉公會中央及地方組織、青年團、台北帝大學者、台灣文化人、在台日本文化人、藝文團體、民俗研究團體、電影／戲劇團體……等；也涉及若干來台訪問、示範或指導的日本內地團體及文化人；此外，還影響了散布台灣都會及城鄉，包含台／日人在內，共同參與文化活動或戰時娛樂的廣大受眾。<sup>49</sup>

在戰時「殖民地地方化」的帝國整體趨勢下，台灣文化界在強烈運行的皇民化、離地性措施下蒙受震盪，卻未曾間斷地，以轉化性模式持續開展其「混雜的地方歷史」。1944年3月以後，美英增強反攻戰線，台灣被列入了「戰場」範圍。1944年7月台灣海域航空戰、全島大空襲等險惡海空決戰，一一登場。台灣的文化活動，才完全失去了環境。

戰時台灣文化轉折，顯現了惡劣條件下在地文化掙扎前進的靈活經驗。文化甦生現象中萌露了何種不同以往的思惟？台北帝大教授在戰時文化界的興衰中扮演怎樣的角色？將是下節探討的重點。

#### 四、戰時台灣文化轉折與台北帝大教授的文化介入

如前所述，戰爭期台灣文化的短暫復甦，由多重歷史條件，文化

49 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在台灣文學、戲劇、民俗、音樂等領域引發的政策調整與具體活動反應及成果，可參考下列研究：柳書琴〈戰爭と文壇：盧溝橋事變後の台湾文学活動の復興〉，黃英哲、藤井省三、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編）《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東京：東方書店，1995年10月），頁109-130。垂水千惠（著）、張文薰、周易儒（譯）〈1942年-1943年呂赫若之音樂、演劇活動〉，《戲劇學刊》第8期，2008年7月，頁55-87。石婉舜〈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建構（1895-1945）〉，台北：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2010年1月，頁105-142。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的戲劇理論：藝術理念和政策之間的協力關係及糾葛〉，吳密察策劃，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2008年12月），頁239-266。吳密察（著）、矢野充宏（譯）《『民俗台灣』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惠（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2002年12月），頁231-265。高沛秀〈皇民奉公會的音樂動員運動〉，台北：台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7月，頁6-38。

諸領域的累積，以及不同民族與族群的文化願景，共同造就。

構成戰時台灣地方文化論述主潮的官製地方文化論述、本土地方文化論述和外地文化論述錯雜並峙，同時對戰爭期台灣文化的發展、轉折與起伏產生作用。其中，本土地方文化論述提供戰時本土文化甦生的主要養分與關鍵動力，最為重要；官製地方文化論述、外地文化論述則引入了地方、南方、外地等概念資源，促成了論述平台及辯論動力，亦對戰時文化議題的更新與活化，提供了討論環境與催化觸媒。無論何者，對戰爭期本土文化的甦生均有不可忽略的影響。

隨著統治時間的不斷增加，以及大戰下帝國對殖民地的強力動員，不論在台日人或台灣人，整體殖民地社會都處於外地化／（帝國）地方化的變遷中。在統治階層方面，經過四十餘年的殖民統治，台灣總督府所屬官僚體系逐漸自足化、資深化，日本官吏在台灣形成了一個土產化的殖民地官海，台籍中低層官吏與職員也逐漸增加。特別是，戰時殖民地行政強調切合台灣特殊狀況之務實走向，導致出現了台灣政務必須從內地延長主義迷夢中醒來的論調。此時構成總督府戰時行政體制末端七成之多的下級職員，為官僚體系之重要組成部分，它乃是由在台任職時間長而有行政自負的內地人高級官僚，輔以台灣人下級官僚共同構成。長期居台、巡調各地的這些內地人官吏，擁有豐富的殖民地行政資歷，他們正是貫徹殖民地總力戰體制的旗手；而領受差別待遇的台灣下級職員，則從底層支撐著官僚體系的運作。在「學經歷／民族出身／官吏階級秩序」相互對應的差別結構維持不變的狀況下，總督府官僚體系在不得不正視行政特殊性的時代持續朝「外地化」演化；台灣人官吏儘管在數量與位階上始終存在弱勢，卻也緩緩向上流動，同時繼續在下擴充，並且不斷因接觸而加深了生活與意識上的「日本化」。<sup>50</sup>

50 代表研究可參見，岡本真希子《殖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年2月），頁366-375。

隨著外地統治階層與外地人社會的穩定成長，在台日人文化意識與文化消費需求也漸漸增長。「灣生」、「灣女」、「灣妻」、「二世」等說法，原是歧視殖民地日本人的用語，帶有污名化意味。1920年代後期開始「灣生世代」開始在文化領域展露頭角；1930年代中期以後「灣生世代」提出的在台日本人戲劇、文學、藝術運動觀點，以及對大眾文化、娛樂的討論，成為台灣文化界新興議題之一。<sup>51</sup>除了黃得時主編的《台灣新民報》學藝欄之外，《台灣日日新報》文藝欄(西川滿主編)、《台灣日報》學藝欄(岸東人主編)、《台灣新聞》文藝欄(田中保男主編)，幾份由在台日本人編輯的報紙文藝欄，則為台灣文化消息傳播、文學創作發表及文化議題討論的重要園地<sup>52</sup>。由於帝國南進方針的日益明確，1940年以後有關「灣生」、「第二代」社會角色與歷史任務的討論，或者以此為議題的小說、隨筆、文學評論，在台灣總督府機關雜誌《台灣時報》、西川滿編輯的《文藝台灣》上熱烈起來；1941年6月第一大報《台灣日日新報》上，也集中刊載了多篇討論<sup>53</sup>。

除了在台日本人的「外地化」，台灣知識階層、乃至一般民眾，也在長期的跨文化學習或抗爭中，透過既是學習窗口也是抵抗對象的日本，吸收各種現代性及異文化養分，開展混合式的台灣本土論述與現代文化嘗試。在台日人意識的形成、台灣人現代意識的強化，以及兩者之間的相互交涉或彼此激發，對殖民地政經、社會、文化的整體發展，都可能產生一些超越統治技術與規劃之外的影響。大戰中台灣位置的特殊性，以及戰時社會變動中各種必須跨越民族界限的公共議

---

51 在台日人外地文學論述的形成及其代表言論，相關研究可參見：橋本恭子〈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3年1月，第三至五章。邱雅芳〈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年7月，頁219-250。

52 參見，陳淑容〈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年7月，頁62-122。

53 參見，鳳氣至純平〈中山侑研究〉，頁27-34。

題，也刺激殖民地文化界開始以地方現實為基礎，思考整合性問題<sup>54</sup>。在種種島內外情勢、政治社會、族群及文化因素的共同累積下，包含帝國文化治理、外地文化意識、台灣本土意識等相異向量的「殖民地地方主義」，日積月累，為非常時期整體的地方文化論述及文化復甦提供了重要土壤。

戰時文化統制未曾停歇或退轉，戰爭期的文化環境是一個逐漸趨向變質的過程。只不過由於不同階段治理模式的變化，以及官方／本土／外地論述三者勢力的消長不一，遂產生了文化自主發展脫逸於統制之外、本土地方文化論述與外地文化論述熱烈競爭，抑或文化統制凌駕於自主發展之上，幾種不同階段的現象。戰爭期台灣文化的轉折，除指發生於1937-45年間台灣文化的盛衰起伏、統制下的文化質變，以及外地文化群體與先前擁有在地文化主導權的本土文化群體之間的競爭現象外；另一個重要內容即在於，台灣文化發展的主流、議題、概念及性質，與中日事變前產生了變異。

戰時本土地方文化論述，除了吸收部分30年代鄉土文化論述的成果之外，也隨著快速擴延的東亞占領區政經文化內容的出現，「外地文化論述」的日益盛行與對話刺激，發掘出與鄉土運動思維相異的一些新邏輯。「地方文化」一詞在1937至1945年間的新意涵，已使以地方文化論述為核心的本土地方論述，在暗承以社會主義或民族主義為基礎架構的30年代鄉土意識之外，增闢了另一面與戰時地緣政治變化相關的抗爭維度。那是台灣以「帝國下的一個地方主體」，參照持續擴張的帝國版圖與成員，所形成的有關「台灣」在「大東亞」的位置與角色之重新想像。空間重塑及日益嚴峻的準戰體制，以及戰時殖民地政經社會情

54 譬如在文學領域，當時即出現了不少思考日台混血、優生學、灣生、移民、皇民鍊成、內台融合的小說。相關討論可參見，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台灣文學學報》6，2005年2月，頁19-57。林慧君〈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9年6月。

勢，帶動了戰前文化意識、文化抗爭與文化想像的位移。文化關鍵詞的興衰，就是這種變化的顯著表徵之一。不同於30年代前期，「鄉土文學」一詞在1937年以後的台灣，已成為隱含台灣人反抗思想或民族主義的敏感用語。在「文藝大眾化」、「殖民地文學」等過渡性論題，亦未能順利承接「鄉土文學」成為替代性文化運動領導概念之際，事變後台灣文化論述的主流話語，便逐漸被帶有曖昧性的「地方文化」一詞所取代。

中日戰爭前後台灣文化論述思維與活動形態的轉折，一言以蔽之，即「鄉土文化論述」的退位與「地方文化論述」的登場。然而，兩者並非斷裂或對立，而是具有轉化與拓展的關係。就當時的概念指涉而言，「鄉土」一詞對應於民族／國家，「地方」則對應於具有全球性／區域性概念的帝國與共榮圈。本土地方文化論述不以「鄉土」而以「地方」命名，隱含著接受台灣歸屬帝國地方細胞之現實，據此「內部位置」對內欲延續文化特殊性，對外則爭取戰時殖民地的新權益與地位。故而，非僅名稱不同而已，在論述內容、批評位置與文化邏輯方面，本土地方文化論述皆與1930年代中期以前，以「帝國下的異民族主體」所構建的「帶有民族主義分離色彩或社會主義世界主義追求的鄉土文化」對抗話語，產生了某些變異。

針對此一變化，以馴化(皇民化)輕率評斷，或視地方文化論述為鄉土文化論述的偽裝，皆過於簡化。我們仍須回到「地方文化」論述出現的帝國／殖民地雙重脈絡，來進行理解。「地方文化」、「國民文化」及「大東亞文化」的內容定義及關係辯證，在帝國觀點與殖民地觀點之間存在著分歧。基於「建設大東亞新秩序」及「完成國防國家體制」之國策考量，帝國論述強調「國民文化VS.(複數)地方文化」以及「大東亞文化圈VS.(複數)地方文化」之間，一頭多體的「首／體」、「領導／支援」及「指導／回饋」關係。也就是，帝國論述意圖透過矯正「中央文化」之菁英主義、個人主義、都會中心主義，引動具有集體主義優點、



強調勤勞增產的「(新)國民文化」、「大東亞文化」、「國民精神運動」，進而廣泛策發日本內外地的國民總力。殖民地論述卻在「總力戰」這個無法違抗的國策前提下，朝「大東亞文化圈」中「地方文化體」的內部傳承以及差異體系並存的理由發揮，藉此爭取戰時地方傳統維護及多元文化主義扎根的最大極限。此一認知差距形成的曖昧地帶，為戰時下日暮途窮的台灣主體論述提供了變身發展與再生產的空間。

如前所述，地方文化論述的熱絡化，首先受到帝國空間重塑、中央文化政策轉向等外部因素的直接影響；其次則與殖民地官僚體系與旅台日本住民「外地化」、台灣菁英與本土社會逐漸「帝國化」，亦即兩者在不同背景下共同「地方化」的內部趨向，有重要關聯。十餘年間日本連續發動滿洲事變、中日戰爭及太平洋戰爭，幅員遼闊的戰爭以及鋪天蓋地的全區戰況報導，使台灣人的地理感與歷史文化認知在總力戰時期，加速被編入「帝國下的地方文化」一環。日本、台灣、朝鮮、「滿洲國」乃至中國淪陷區，全景式的大量報導資訊或帶有具體身體經驗的軍事人口流動，形成了各地程度不一的跨域共存想像，實質性的地域交流、資訊流通及文化連動也增多了起來。

空間重塑與跨界流動的現實基礎，為異國領土的攻擊與占領。除了「亞洲強國」、「東方帝國」等國際政治及象徵霸權的利益，帝國至為緊要的目的莫過於廣大資源的奪取。為了快速徵用陌生而豐饒的新占領資源，軍事控制還必須配合系統性的學術調查、開發研究與徵用計劃。此時分踞東南亞與東北亞大陸邊緣的台灣、朝鮮兩大殖民地之官僚機構、殖民地大學、研究機構、民間菁英乃至一般人民，依著地理與文化的切近性與親緣性，遂在新時代中被賦予了他們自明治時期承受「南進」、「北進」帝國使命以來，最為巨大而沈重的一次任務。

作為殖民地最高學術機構，1928年在台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與1926年朝鮮設置的「京城帝國大學」，除一般性學術目的之外，還帶

有強烈的政治性<sup>55</sup>、國策性(北進/南進)、殖產性(殖民地資源與產業之培育、利用與研發)，以及樹立「殖民學」等特殊宗旨。台北帝大為帝國境內唯一位居熱帶的大學，基於特殊地理位置，創校之初主要機能便定位於熱帶醫學、農學、理學等南方產業及熱帶科學方面，後來隨著侵略占領需要又擴及南方人文研究領域。這些可以泛稱為「綜合性熱帶殖民學」的學科，遍布了人文學、社會科學、基礎科學及應用科學等，多種領域<sup>56</sup>。直到日本戰敗為止，台北帝大設校18年內，最具影響力的講座、組織或學術成果，多與輔助殖民統治或侵略占領之各項調查、研究、徵用與開發事業有關。滿洲事變後，戰爭與學術相互配合的趨勢日益顯著，中日開戰後加劇<sup>57</sup>。此後直到太平洋戰爭末期，殖民地帝大教授們紛紛帶領助理及學生，投入調查事業及報告書編纂(譬如，1940-42年的南方學術調查)<sup>58</sup>，或組織學術調查團隊(譬如，京城帝大1938年「蒙疆學術探險隊」；台北帝大1940-42年「海南島學術調查團」)。此外，也開設新研究組織<sup>59</sup>，增設與南方作戰及資源開發講

55 譬如，回應社會要求、籠絡菁英、涵養國家思想，解消殖民地藉爭取高教設立而凝聚的民族運動等。

56 譬如，人種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文學、社會學、歷史學、民俗學、心理學、哲學、宗教、政治學、經濟學、風土氣候學、動/植物學、生態學、土壤學、農林畜產學、園藝學、作物學、造林學、水產學、農產加工學、農藝化學、製糖化學、釀造學、理學、工學、熱帶醫學、獸醫學、病理學、衛生學、藥學、昆蟲學、菌學、微生物學、地理學、地質學、能源科技……等。

57 1935年後台北帝大某些講座開始從事日軍中國新占領地之調查，1938年日軍攻打華中時為解決戰線過長的補給問題，決定開闢現地農場，也委任台北帝大教授進行實地調查，此一模式後來亦被日軍採用於南洋戰爭中。參見，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01年4月，頁218-219。

58 1940年後，配合日本軍事南進政策的議定，台北帝大配合時局的南方學術調查成果大量出現，截至1942年「南方關係印刷物目錄」統計為止，總計523輯的南方調查書中，有82輯由台北帝大師生完成。參見，葉碧苓〈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年6月，頁102-106。

59 譬如，京城帝大方面設置的有：1932年「滿蒙文化研究會」、1938年「大陸文化研究會」、1939年「生藥研究所」、1942年「高地療養研究所」、1945年「大陸資源科學研究

座<sup>60</sup>，或以顧問、理事等要職支援總督府官廳外圍團體的調查研發工作<sup>61</sup>（譬如，1939年成立的「台灣南方協會」）。總之，多方面投入並擴大對殖民地官廳施政及帝國軍事行動之專業協助與技術配合。

在理工農醫教職員、學生為配合戰爭調查及研發事業奔忙之際，科技應用性較低的文政學部同樣也受到殖民學熱潮籠罩。在包含文學、史學、哲學、政學四科，以及與南方／台灣研究為主的「南洋史學」、「土俗學·人種學」、「言語學」、「心理學」四講座在內的文政學部中，以史學科在1936年6月起為推動台灣關係史料蒐集整理與島內史蹟調查設置的「台灣史料調查會」，以及在「南支·南洋研究」方面擁有獨特成果的「南洋史學講座」（村上直次郎、岩生成一教授擔任）及「土俗學·人種學講座」（移川子之藏教授、宮本延人助手擔任）<sup>62</sup>，擁有最直接建置南方殖民學的技術資本。在禁止使用「台灣民族」、「台灣研究」一詞的當時，土俗人種學講座下以「南方土俗學會」為名於1929年設置的這個研究會，定期舉行例會，並發行《南方土俗》雜誌（1940年後改稱《南方民族》），聚集當時人類學者於一堂，成為台灣制度化人類學研究之開始。在各科學會方面，則以師生人數眾多、學術活動蓬勃

---

所。台北帝大方面則有：1939年「熱帶醫學研究所」、1943年「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及「南方人文研究所」等。這些機構都直接間接為帝國軍事行動提供了自然、人文、資源之情報蒐集，以及農學、化學、細菌學、藥學、醫學、能源科學等應用科學之實驗及研發成果。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頁210-255。

60 譬如，理學部於1943年增設植物學講座、農學部於1943年增設熱帶畜產學講座、家畜病理學講座，1944年增設家畜內科學講座，以及專攻「南方圈纖維資源技術與人才培養」的熱帶農學第五講座。參見，鄭麗玲〈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頁219-223。

61 參見，葉碧苓〈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頁88-90。

62 「南洋史學講座」強調西班牙文、荷蘭文訓練，以及南洋歷史及西、荷史料分析；「土俗人種學講座」由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出身的教授移川子之藏及慶應大學畢業的助手宮本延人等人擔任，史學科第一屆畢業生馬淵東一即為此講座訓練出的優秀學生，畢業後留校擔任副手；東北帝國大學畢業的台灣人陳紹馨，也於1943年受聘擔任土俗人種標本整理工作。參見，陳偉智〈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台灣大學台灣研究社，1997年5月，頁72-98。

的政學科「金曜會」最富凝聚力。對戰後台灣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有重要影響的這些教授，以史學科、政學科為主，亦包含言語學講座之小川尚義、淺野惠倫等。師生人數極少的哲學科教授，乃至理農學部教授<sup>63</sup>及帝大總長弊原坦等，也經常帶領助理及學生齊聚一堂，進行例會討論、演講等學術交流及推廣活動。在南方殖產及軍事應用方面功能較為間接的文學科教授們，雖亦偶爾出席這些研究會或討論會<sup>64</sup>，但是次數少，參與程度也較淺。

在日趨嚴峻的武力戰、資源戰或知識戰中，文學科多少顯得「無用武之地」。不過，在文化戰領域卻非如此。以翼贊文化論述在台灣推廣與傳播的過程而言，不論是文化措施、官方致辭、公開座談、媒體專輯、各式文論、創作實踐中鋪陳與開展的過程，或文化甦生潮流中具體湧現的大小活動裡，皆可觀見一股不可忽視的勢力，那就是具有文化指導優勢的——台北帝大教職生們對殖民地學術及文化活動的參與。

譬如，文學科在神田喜一郎教授領導、以中國古典文學為主的「東洋文學講座」中，便培養出了諸如吳守禮、田大熊、黃得時、稻田尹等，投入台語、台灣歌謠、對聯、漢文古籍、中國傳統文學、台灣現代文學、布袋戲、歌仔冊的蒐集、編譯、注解及研究的學生們<sup>65</sup>。帝大蓬勃的台灣研究及南方研究風氣，對各科師生們的地域關懷與研究議題，產生了一定影響力。除了一般性的台灣語言、文學、文化研究之外，文學科教授中也有對總督府南方政策及戰時熱帶學術潮流敏感，較早受到占領區文化工作或南方調查事業委託者，那就是前述的文學

63 哲學科教授，譬如主持「高砂族記憶」研究的飯沼龍遠；推動首狩原理、布農族家庭生活、士林祭祀圈研究的岡田謙等人；理農學部教授如山根甚信、早坂一郎等人。

64 譬如，英文學者工藤好美教授，即曾受邀前往演講。參見，陳昭如、傅家興〈文政學部—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創刊號，頁19、22。

65 參見，柳書琴〈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國家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5期，2007年10月，頁217-258。

科元老神田教授，以及擔當英／法語、文學概論等科目的中生代講師島田謹二。

出身京都帝大、師事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等名師，擁有家學淵源的神田喜一郎，因為精通中國古籍，在日本南支派遣軍占領廈門大學後，於1938年7月和擁有土俗學、考古學專業的移川子之藏及宮本延人兩位史學科學者，受命處理在戰火中受創的廈大圖書館及博物館珍貴典藏。後雖確認圖書室未受殃及，但神田仍基於「徹底清查需要」，將包含珍本線裝書、近代鉛版書及西文書在內的書籍運往台北帝大，這批圖書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後才被廈門當局索還。<sup>66</sup>島田則因精通法語，受命擔任台灣總督府外事部外圍團體「台灣南方協會」(1939年11月成立)「南方講習會」法語教學工作。神田的第一位台籍本科弟子田大熊(1929-33年在學)，畢業後則進入台籍生稱羨的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任職，1941年起轉往總督府外事部擔任雇員，負責華南／南洋調查文獻之翻譯工作。<sup>67</sup>此乃文學科教授及畢業生配合戰爭學術徵召的開端。

1943年神田再次受總督府委任前往占領區香港，擔任「市民圖書館」(原香港大學圖書館)館長，島田隨行赴任，相當於副館長。當時在館內擔任要職，言行內斂、敏於觀察的香港知名文化人陳君葆，由於業務關係頻繁接觸島田，對其私德、言行評價極為低劣，對神田印象稍好，但亦不乏批評<sup>68</sup>；日記裡不時流露出對於帝國主義學術侵略機器的日本學者之冷眼旁觀，以及深藏於內心的警戒、疏離及憤慨反

66 參見，葉碧苓〈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頁135-138。

67 譬如，《南方調查書》中就有他譯著的《南支の桐油事業》(1941年)及《戰前のシンガポール事情》(1942年)。

68 參見，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下冊(香港：商務書局，1999年4月)，頁62。譬如，他曾寫道「神田不住地在各書裡翻出他的名字來，似乎很怕我不認識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的神氣」。參見，陳君葆著、謝榮滾編《陳君葆日記》下冊(香港：商務書局，1999年4月)，頁62。

感。

戰時台北帝大整體的教研環境與學術潮流，明顯配合著戰爭調查占領需求與國策方向發展。帝大台灣／南方研究關係學者，在包含日／台人在內的殖民地知識群體中，舉足輕重。那麼，文學科教職員在殖民學領域或台灣文化界的地位、影響，特別是他們與戰時文化甦生現象之間的關係，又是如何呢？

## 五、文化甦生中的文學科教授們

如上所述，文學科及內部兩大講座「東洋文學講座」（神田喜一郎擔任）、「西洋文學講座」（矢野峰人擔任），以古典文學及西方文學為主的知識特性，較不具備快速提供軍事情報、資源分析與技術研發的功能，故而在帝大學術動員體系中，除了零星介入占領區圖書館行政、古籍整理、語學教授及情報翻譯之外，並沒有擔當長期性、系統性的大型計畫。不過，這卻不意味他們以及文學科其餘教授，能與熱烈的殖民學熱潮保有距離，或者沒有介入南方區域社會及台灣文化界一展所長的使命感和野心。文學科與投注龐大精力於島外，並以調查研發為主要形態的理工農醫學科不同；只要我們將眼光從匯聚學術大軍的南支、南洋相關計畫移開，便能發現文學科教授藉由學者之中介位置與學術優勢，位於官方文化機構與民間文化團體之間進行斡旋指導，而活躍於島內文化界的身影。可以說，戰時島內文化界的指導與統制，正是文學科教授不同於前述學科的特殊使命。在這方面，教授們不論是否出於自主意願，其背後都難以擺脫總督府統治當局的聘任、委託、暗許或期待。

以矢野峰人為例，曾任帝大圖書館長的他，擁有與神田不相上下之崇高名望。1935年以後力捧西川滿的他，在處女詩集《媽祖祭》發行後，對其南國情調、異國趣味大為肯定，更以「新時代的感性」高度讚

揚西川將充滿瑰麗與幻想的殖民地風土輸入中央文壇，開拓外地文藝的新動向<sup>69</sup>。次年，島田謹二也從「外地文學」作為一種「新藝術」、「新領域」的角度，對《媽祖祭》進行褒獎，推崇其迥異於台灣作家的南歐式鄉土主義風格，及其「使『台灣』首度被登錄在日本文學史」的劃時代意義<sup>70</sup>。1938到1941年間，島田陸續以外地文學觀點，撰寫以南島文學志、華麗島文學志、外地文學為主題的系列論文，並以比較文學方法持續關注法屬殖民地文學，成為對戰時本土文壇發出強大對話挑戰的「外地文學論」之理論化人物。憑藉學術界肯定及外地文學論的議題化效應，不斷增益文名與文壇資本的西川滿，則於1940年1月創辦《文藝台灣》以後，受到矢野、島田教授長期供稿支持。兩人儼然成為該志幕後的學術顧問。

在矢野與島田對「灣生」世代的西川外地文學創作熱情及出版成果的讚譽聲中，可以看見此時普遍瀰漫於學者與文化人之間，一種立足於外地，以混雜性地方文化之異國情調與特異文體，前進中央文壇的共識與自負。這種概念與情緒的背後，除了1920年代以來萌露於文藝創作、日益成長的在台日本人社會文化意識之外；不能否認地，也包含了台北帝大學者對戰時南方殖民學新興趨勢的敏銳認識，以及對殖民學在帝國文化圈中不斷躍升的地位之樂觀自信。然而，儘管帝大教授與「灣生」文化人之間呈現彼此肯定與相互推崇的循環，然而進一步分辨，則可發現帝大學術權威正逐漸壓倒外地文化自主的發展規律與論述空間，納編民間日本文化人在論述、創作或出版方面的資源，意圖掌握論述方向，建立新的文化軌則。

回首在台日人現代文藝的形成史，帝國統治下的「外地」台灣直到1920年代，日本現代文學才以現代詩形式在這塊新領地著床，比起內地可謂相當遲晚。論其開啟，則灣生世代功不可沒。1926年「台灣詩

69 參見，矢野峰人〈「媽祖祭」禮讚〉，《媽祖》第6號，1935年9月，頁20-21。

70 參見，島田謹二〈詩集『媽祖祭』讀後〉，《愛書》第6號，1936年4月，頁45-56。

人組合」中已有上清哉、藤原泉三郎、西川滿、中山侑等活躍的灣生參與其間。上清哉、藤原泉三郎後來接觸左翼思潮，1931年結合台灣左翼青年王詩琅、賴明弘等人發行《台灣文學》，成為島內最早的台日新文藝共同社群<sup>71</sup>。1927年起，包含許多灣生在內的台北高校學生，陸續發行《足跡》、《南方文學》、《風琴と壺》（《風琴與壺》）等刊，1935年又創辦了發行至1943年，刊行時間數一數二的學生文藝刊物《翔風》。而叱吒戰時文壇的西川滿，亦於1934年進入《台灣日日新報》就職，同時擔任《愛書》雜誌編輯，並創辦了十足彰顯外地文藝獨特風格、促其文藝事業自此飛躍的個人詩誌《媽祖》。除了文學領域，1930年中山侑組織劇團「螳螂座」公演，1934年又參加由藤原泉三郎與張維賢等日台青年劇團共組的「台灣劇團協會」新劇祭<sup>72</sup>。「灣生」亦在戲劇方面，展露其社會批判與創新實驗性格。

戰時台灣文化界最富影響力的「灣生」文化人，首推西川滿、中山侑。兩人相識甚早，20年代青年時期一同創辦詩刊、發表詩作，熱衷於社團組織與刊物編輯。中山侑比起熱愛創作、編輯的西川滿不遑多讓，1920-30年間也創立或編輯過《青桐》、《水田と自動車》（《水田與自動車》）、《赤い支那服》（《紅色支那服》）、《水晶宮》、《蜻蛉玉》、《モダン台灣》（《摩登台灣》）、《ネ・ス・パ》等文藝刊物<sup>73</sup>。其次，兩人皆曾因升學或工作因素歸返日本，並因內地經驗激起身為灣生者建設外地文化的使命感。此外，他們都未曾就讀台北帝大，卻因編輯刊物而與台北帝大教職員生有許多接觸。然而，相當不同的是，1930年

71 該刊意圖以文學發展共產主義、與日本左翼文化團體聯繫，翌年遭取締而廢刊。參見，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台灣文藝作家協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卷）》（台北：南天，1995年6月），頁296-303。

72 志馬陸平（中山侑）〈青年と台灣—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三）、（四）、（五）〉，連載於《台灣時報》198號，1936年5月，頁63-69；199號，1936年6月，頁69-75；200號，1936年7月，頁56-61。

73 參見，裏川大無〈台灣雜誌興亡史（二）〉，《台灣時報》第184號，1935年3月，頁101-106。



代中期以後，中山侑不僅將熱情從詩刊、純文藝轉向童話、歷史小說、大眾文藝、戲劇、廣播劇及戰時歌謠創作，文化觀點也日漸認同本土文化人，並與之密切合作。在皇民化運動下藝術戲劇、左翼戲劇逐漸滑向大眾戲劇、國民演劇的年代中，中山侑也曾因社會信念及藝術追求遭遇的矛盾，受到良心煎熬。後來則透過青年演劇、都市演劇的投入，及其任職於「台北放送局」接觸的廣播、唱片、歌謠等大眾教化及娛樂事業，將其早期帶有左翼色彩與公共關懷的「藝術大眾化」理念，結合到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各種形態的社會教化、娛樂改善工作裡，並與台灣文化人組織的「厚生演劇研究會」所代表的本土新劇運動一脈細流交會<sup>74</sup>。

由此，他摸索出既響應官方方針，也注重不同階層大眾文化之提升普及；關切日本外地文化發展，同時融合日台元素優點的戰時大眾文化實踐。這使得他後來不僅與西川滿漸行漸遠，甚至成為西川滿「藝術至上」主義、濱田隼雄「討好中央文壇」作法的強烈批評者。他發表的〈作品と文章〉(〈作品與文章〉)(1942.4)、〈趣味雜誌《文藝台灣》〉(1942.4)、〈西川滿論〉(1943.1)，和《台灣文學》同人黃得時〈台灣文壇建設論〉(1941.9)、中村哲〈昨今の台灣文 について〉(〈論近日的台灣文學〉)(1942.2)、呂赫若〈羅漢堂雜記〉(1942.7)、田中保男〈南郊雜記〉(1942.7)等文章，形成一股批評西川耽美、貴族風格的言論。這些日、台人批評者的觀點雖不無內部差異，卻一致標舉「地方文化」之大義名分<sup>75</sup>，以「地方文化之確立」、「地方文化全體向上」、「時局下正直純粹的心情」、「日本文化要求地方人成為地方文化的戰士」等語，明指或暗諷西川作品之幻想性、自慰性及其方向錯誤。

活躍的灣生文化人，依憑文化活動經驗的漫長累積、強烈的文化

74 參見，鳳氣至純平〈中山侑の戲劇理論〉，頁239-266。

75 參見，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2002年2月)，頁197-203。

使命，以及對混雜文化的敏銳感受，合縱連橫，展演各自理念。然而，由於戰爭動員及文化統制的特殊環境，最後他們同樣被納入時局方針的糾正與制約之中。文化指導，最後成為教授天下。比起灣生文化人，早在1928-29年創校之初，由文政學部內年輕助教等相關教職生創立的《水田と自動車》、《THE FORMOSA》、《赤い支那服》等短歌誌或文藝雜誌；乃至1936年發行，一年後從自主性學生刊物轉變為學部內學術雜誌的《台大文學》，皆顯示台北帝大教職生投入殖民地文藝界的時間比起西川、中山等「灣生」並不算晚。從中山侑創設並參與編輯《水田と自動車》、《赤い支那服》等刊物，新垣宏一、中村忠行等灣生帝大生對帝大文藝刊物的參與，或者西川滿透過《愛書》編輯與帝大師生的接觸，也可得知此時「非帝大生的灣生文化人」與台北帝大師生（含灣生、內地人及台灣人）之間的文藝活動，有所連接。但是整體而言，直到1930年代後期，在台日本人文藝活動仍呈現散立、偶有鬆散交疊的狀況，分屬不同脈絡的學院菁英或灣生文化人並未整合。而且，此時學院刊物雖標榜以文藝與學術革新台灣文化等使命，學院權力及教授影響也已介入其中，但學界人士畢竟尚未對文藝界產生廣泛影響。然而，隨著1940年翼贊文化政策的推行情勢漸轉，帝國大學學院權威多方面涉入戰時台灣文化各領域。張文薰曾考察以台北高校—台北帝大為頂點的殖民地最高教育體系中的文學活動，說明了這種變化。她指出，自1930年代後半開始，台北帝大逐漸形成對於台灣文學及文化活動的影響力。在形式上為介入文藝愛好者、文藝青年之組織與刊物並與其結合，在內容層面則以在地知識的形成與擴散予以影響。因此，台北帝大文政學部對於戰爭期台灣文學的影響，不止於與政策或外地性唱和而已，更廣泛而實際地影響了戰時台灣文壇之形成<sup>76</sup>。

76 張文薰針對1920-40年代台北帝大教授、「灣生」群體、在台日本人之間文學活動的成長、整合、分化，以及他們對殖民地文壇的介入和影響之研究，可參見〈從「內地」

1939到1940年間在西川滿、黃得時等民間文化人主導帶動下凝結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在1940年翼贊文化運動展開、1941年「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為官方團體、1942年8月「皇民奉公會」文化部設置後，逐漸被介入其中的學院菁英後來居上。由總督府官方禮聘、徵詢或授意的專家所形成的「文化指導」群體，漸漸凌駕了包括西川、中山等灣生文化人在內的其餘在台日本文化人。

與多數台北帝大教授一樣，前述精勤於外地文學論述的島田畢竟未曾露骨地躍入文化界，直接介入文壇統制或強勢干涉文藝生產。但是，他權威、多產、篇幅龐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學院式討論，以及在綜合雜誌、文學雜誌中發表論文等特殊作風，卻對本土文學與外地文學的論辯競爭，增添了不少影響與緊張感。相較於在外地文化、外地文學理論的建構方面高度曝光，擁有理論代表性的島田謹二，資深教授矢野峰人則擔當了更多文化組織負責人及政策宣導者角色。

1940年1月由作家與文藝愛好者自主凝結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宣布解散，1941年2月同名的新協會在情報局策動下成立，矢野在堪稱統制機關雛型的新協會中出任會長。此後類似任務不輟，直到戰爭末期。1942年8月「皇民奉公會」文化部成立，矢野以「台灣文藝家協會」會長，出任文化部文藝班班長，成為皇民奉公會文化部轄下外圍組織主幹。1942年12月，「大東亞省」設置及「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後，他密集在《文藝台灣》、《台灣時報》發表〈大詔渙發〉（1942年11月）、〈台灣文學的黎明〉（1942年12月）、〈台灣的文學運動〉（1943年1月）等文論，以巧妙精到而不失學術教養的談話，指示時局下台灣文學的應行方向。〈台灣文學的黎明〉一文中，他指出「大東亞文學者大會」

---

到「外地」：戰爭期台灣文學之主題／主體轉換」，「THE CULTURES OF EMERGENCY: CULTURAL PRODUCTION IN TIMES OF TURMOIL 國際學術會議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辦，2009年8月14-16日。以及，〈帝國大學之文化介入：1940年代台灣文壇形成史〉，「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2009年9月10-11日。

確立了將來本島文學的進路，台灣文學應從過去在「外地」之名下的自我設限中解放出來，全力邁向「作為日本文學一翼」的「大東亞文學」之路。<sup>77</sup>這些帶有政策宣告性質的文論，否定了潛藏於外地／地方等名義下任何游離於國策思想之外的文化特殊性論述，同時也強化了帝大教授在官方文化統制中所扮演的發言人、指導者角色。1943年4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後，矢野擔任常任理事。1944年5月，台灣文學奉公會統合兩大民間文學雜誌成立《台灣文藝》後，他一方面發表戰爭詩，一方面撰寫具有文藝指導功能的文論或後記，直到1945年1月該誌停刊為止。

不過，受到官方委任而協助文藝統制推動的矢野峰人，卻非引導、傳播或規範戰時文化方向及文化統制輿論的關鍵人。在推動地方文化振興與協助官方文化統制這個易於失衡的天平上，企圖透過概念宣導及批評引導，盡可能追求兩者平衡的學界推手，乃是前述協助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啟動台灣傳播的「憲法講座」教授中村哲。在此我們可以看見學術分野，也投現於文化統制與文化動員體制的分工當中。除如前述，他曾發表具有翼贊地方文化運動台灣官方宣言性質的論文之外，早在近衛第二次內閣成立的1940年7月，中村也已發表了〈外地文學の課題〉一文，透過「外鄉人文學」與「外地文學」的性質釐清，呼籲外地文藝界進行方向調整。他認為外鄉人文學與外地書寫對象保有距離，有助於外地文學者知性之眼的開啟，卻易耽溺於特殊性的過度強調淪為異國情調式的獵奇文學，因此應作為外地文學的「前車之鑑」。「外地文學」須致力於「外地人生活實情」的務實描寫，避免陷入都市文化崇拜的一味盲從，或刻意規避都市文化而故步自封之兩極狀態。<sup>78</sup>這篇於內閣更迭之際發表，帶有地方文化與都市文化機能辨證

77 參見，矢野峰人〈台灣文學の黎明〉，頁503-505。

78 參見，中村哲〈外地文學の課題〉，《文藝台灣》1卷4號，1940年7月10日，頁262-265。

以及外地文學發展方向檢討意圖的文論，同樣能佐證中村哲在新體制文化政策的理念宣導方面，扮演的指導性角色。

認同翼贊地方文化運動理念，並不等於同意當時官方文化論述中甚囂塵上的文化政治化或文化統制政策。1940年新體制運動啟動到1943年文化甦生現象萎縮之前，中村哲所發表的多篇文藝評論，皆流露他支持翼贊理念、卻排斥膚淺的過度政治性與偽地方主義的一貫立場。肯定地方文化價值及寫實精神的他，認為「外地文學誕生期」首應培育寫實精神，他明言異國情調文學，不是寫實主義的「超越」而是其「逃避」，可謂外地文學的「邪道」，並以此暗貶西川滿的唯美主義，讚揚張文環作品雄渾有力<sup>79</sup>。不過，批判異國情調的他，同時也反對地方特殊主義。他認為「漫步大稻埕街上，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特異之處。大家都過著具有世界性的生活」。此外，基於帝國性的地方文化運動之向下扎根精神，他提倡「腳的文學運動」，認為欲振興台灣的文學，「與其振興台北等都會的文學，還不如培育台中、台南、佳里這些地方的文學。」對過於直接表達作家意圖與露骨奉承政治的濱田隼雄，他則毫不客氣譏之為「高級作文」<sup>80</sup>。當濱田躊躇滿志地發表《南方移民村》之際，中村也以冷語期許他自我省察、盡量排除政策性的文學、不要忘了作家的立場。言辭犀利卻熟諳尺度的中村哲，企圖透過文藝評論指導地方文學走向，同時對於作品口號化的現象加以勸導。另外，他更暗示由於文壇政治化、本土文學類型化，以及缺乏新世代作家等因素，台灣文學界兩三年來令人刮目相看的復甦現象恐將萎縮，文學活動將在一年之內(1943年)達到極限<sup>81</sup>。事實證明，中村所言並非杞人憂天，而是精準的文化觀察與誠實的政治警語。中村哲自詡為無黨派

79 參見，中村哲〈昨今の台湾文学について〉，《台灣文學》2卷1號，1942年2月，頁2-6。

80 參見，中村哲、竹村猛、松居桃樓〈文學鼎談〉，頁332-341。

81 參見，中村哲〈台灣文學雜感〉，《台灣文學》3卷1號，1943年1月，頁2-5。

的業餘文藝評論家，但是從他對發表刊物的選擇及其批評內容來看，他對台灣作家為中心的《台灣文學》集團較為認同且抱持期待。若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後到1943年初，他與矢野峰人兩人的文藝評論或公開談話相比，更可以看出對於1943年以後台灣文學發展分別抱持「黎明論」與「極限論」的兩人，對文化統制、國策文學不同的態度與立場。

站在《台灣文學》集團背後的學者，除了中村哲這位勇於批評、善於議論的政學科活躍教授之外，還有行事風格相對低調、與台灣作家更為親近的文學科助教授工藤好美，以及擔任國文學課程、關注台灣戲劇發展及演出技術的助教授瀧田貞治。透過吳濁流回憶錄、呂赫若日記所載，1940年代工藤好美與張文環、呂赫若、龍瑛宗、吳濁流、王白淵等台灣作家交往密切，曾多次在工藤住宅或研究室舉行讀書會<sup>82</sup>。事實上，工藤好美除了被視為理解台灣文化人的親近人士之外，在1942年「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召開到翌年4月「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之間，這段最為敏感的文藝政策縮口期裡，工藤好美也曾對文藝政策及外地文藝進行批判。戰爭期規模最大、也是日據時期最後一次的文學論戰——「冀現實主義論戰」，即由他擔任台灣總督府第一屆「台灣文化賞」評審後發表的文評中爆發。〈台灣文化賞與台灣文學〉充分流露工藤精湛的學院派評論風格，以及深厚的文藝認知與批評功力。極少在一般雜誌上發表文論的工藤，在篇幅不小的這篇評論中，首先全面檢討第一屆「台灣文化賞」獎項設計上的缺失，批評台灣總督府對文化領域認知的貧乏。他特別提出，當局應對台北帝大堪稱獨步全日本的台灣文化研究專業予以正視。接著，則集中火力指摘台灣詩壇上世紀末頹廢風格及墮落化的浪漫主義，以及逃避現實的不良趨向；並且

82 參見，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1988年9月），頁148-152。呂赫若（著），鍾瑞芳（譯）陳萬益（編）《呂赫若日記》（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年12月），1943年5月6日記事，頁339。

暗示這種封閉腐化、自我陷溺的詩派中，隱含著應當清理的軍國主義淵源。在進入得獎作家評論時，他仔細針對作品與現實的聯繫程度、聯繫技巧及作品的歷史觀進行分析。透過比較與烘托的方式，突出張文環現實主義文藝的特質與成就，藉此左諷西川滿，右譏濱田，同時闡述他個人所主張的「歷史性的現實主義」文藝主張。<sup>83</sup> 工藤認知到，「歷史的大轉換期」已經到來，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不論日本文化也好、殖民地文化也好，都將面臨艱鉅任務。工藤中肯的論述相較於誇大的官方文化宣傳，或外地文學派在幻想與浪漫中對殖民地歷史的編造，顯得穩重而富有條理，卻難掩其對硝煙中台灣文化未來發展憂慮的心情。

類似的心情，也流露於瀧田貞治有關台灣戲劇的評論中。瀧田曾針對1943年9月「厚生演劇研究會」在台灣戲劇史上聞名的演出，進行接近演出指導的詳盡評論。他不畏某些「黨派」的反對議論，精準指出此次公演「堪稱台灣新戲史上劃時代事件」。他嚴正斥責以向當局投書、向刑警密告等「貼標籤」方式打擊文化對手的卑劣行徑，也反對藝術一味遷就口號，淪為政策「公布欄」的現狀。瀧田在接獲停刊命令後推出的《台灣文學》終刊號上，給予該誌姊妹團體「厚生演劇研究會」高度歷史評價，同時大膽批判不良藝文風氣的作法，對雜誌陣地殞失，「台灣文學決戰會議」又發生「台灣有沒有『非皇民作家』」等質疑，因而意氣消沈的本土作家而言，可謂雪中送炭吧？儘管公開聲援，瀧田依舊提醒「在台灣從事文化運動的朋友們」，停止殖民地「特殊性」的強調，因為那是「妨害台灣文化向上的文化之癌」；此外，未來演出也應避免〈閩雞〉之類帶有「懷舊」風格、「與現實走向不合」的劇目。然而，試想如果把〈閩雞〉這齣最受好評的劇碼刪除，那麼這一次的公演是否依然能夠如此轟動呢？很顯然地，瀧田的專業眼光及其建議不無自相

83 參見，工藤好美〈台湾文化賞と台湾文学〉，《台灣時報》279號，1943年3月，頁98-110。

矛盾與現實相違之處。對此，他的理由只有耐人尋味的寥寥數語，「只要正視現實的嚴苛，就應該明白我的意思」。<sup>84</sup>

隨著戰事急轉直下，瀧田還面臨到如何以學者立場對「增產與文學」提出務實建議，對總督府相關事務當局、軍人家屬或文學者，就書刊購置、創作及閱讀提示方向的嚴酷時刻了。他提到，對以血肉之軀在數百架敵機襲擊中，搏命於前線，以布滿老繭的雙手種植蔬菜與地瓜的生產戰士而言，究竟選送怎樣的書刊才能給予安慰呢？脫離時局的戀愛小說、令人屏息的血戰之作、刻板的時局說教讀物，與軍士險峻的處境或緊繃的心情隔閡，絕非切合之選。因此，「擁有札實力量的作品反而能打動人心，對一寸光陰一寸金的勇士來說，只有這種作品才能慰勞他們，給予他們活力。」所以，關鍵不在於作品類型，而在「作家本身的見識與態度」。倘能如此，即便是「非時局」題材，也不會產生與國家方向悖離的作品。<sup>85</sup>他誠直的論述中顯露決戰下少數保有文化發言權的帝大教授，在非常時局的學術良知。1944年3月，呂赫若出版其生平唯一的短篇小說集。在戰事吃緊、紙張限制，各種狀況皆不利於文藝出版的時期，想必歷經不少爭取與波折的過程。為《清秋》寫序，挺身為「冀現實主義論戰」中遭到「暗的文學」污名化的呂辯護，同時以日語教育、慰勞前線戰士等功用吹揚該書價值的<sup>86</sup>，也正是在戲劇與文學方面都與呂赫若有所交流的瀧田教授。<sup>87</sup>

綜而言之，台北帝大教授與台灣文壇的交流，在現代文藝領域有傾向支持《文藝台灣》集團的矢野、島田等人，以及親近《台灣文學》的

84 瀧田貞治〈演劇対談：厚生劇団公演細目評〉，《台灣文學》4卷1號，1943年12月，頁70-75；吳豪人中譯，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395-402。

85 參見，瀧田貞治〈增產と文學〉，《台灣公論》9卷3號，1944年3月，頁91-95；邱香凝中譯，收於《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四冊，頁460-465。

86 參見，瀧田貞治〈呂赫若君のこと〉，呂赫若《清秋》（台北：清水書店，1944年3月），頁1-4。瀧田在署名前，還特別注明「寫予台北帝國大學國文學研究室」。

87 此外，有關兩人之戲劇交流情況，另可參見垂水千惠《呂赫若研究》，頁300-301。



中村、工藤、瀧田等不同網絡。除上述集團之外，戰爭期漢文文藝雜誌的創刊及發行更為困難，必須爭取各種資源，神田喜一郎在《南國文藝》創刊過程中，亦扮演了支持及引導的角色。林荊南透過與致力於台灣歌謠採集、整理的稻田尹之交往，協助其《台灣歌謠集》編纂、日譯，直接間接獲得稻田恩師神田，以及稻田任職的台北帝大「南方土俗研究室」同人宮本延人講師的發言或撰文支持。<sup>88</sup>1941年2月，神田、稻田受《風月報》邀請，與該社編輯、重要份子在顧問家中舉行「台灣文學縱談會」。次月，有關該聚會的消息以卷頭言形式醒目地刊載於《風月報》上，文中可以推測，神田等人對《風月報》經營方向或同人其餘發展計畫，曾提出一些指導與建議。<sup>89</sup>爾後，1941年7月，《風月報》為響應統制潮流改題為《南方》，改題發表會上神田、稻田與宮本延人等帝大學者連袂出席。1941年12月，以「整理台灣未整理的文獻」為名，《南國文藝》終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發刊，創刊號上稻田、宮本也都提供了文稿加以支持。

如上舉例，在台灣文化發展與官方文化統制的纏鬥過程中，以文學科為主關心人文藝術的學者們，依據個人政治觀點或文化關懷，以不同的論述與行動，展現與官方文化機構、外地文化人或台灣文化人不同的聯結。不論台灣文學或外地文學，都必須在「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文學報國」、「大東亞文學」、「皇民文學」前仆後繼的文化統制原則催迫下，掙扎於國策要求與文化創造之間，接受一波波的檢討與改造。本土文學界蒙受的壓力，遠甚於外地文學界。在文化改造的每

88 參見，柳書琴〈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頁232-255。

89 文中寫道：「我們看見神田教授和稻田先生對我們的文學的熱心，真給我們感激而且慚愧！我們很想實行神田教授和稻田先生所指示的那幾個方針。可是，回顧我們的園地不能繁榮的原因，未免起了一陣戰慄！」最後亦提到：「神田教授和稻田先生鼓勵我們的話，給予我們的勇氣和毅力；於是我們決意認定目標，來提倡我們的文學，改造我們的園地；或者我們的理想在不久的時候會實現吧？」參見，〈台灣文學縱談會的感言〉，《風月報》第125期，1941年3月3日，卷首。

一道激流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基於不同動機和立場關心台灣文化議題的台北帝大文學科教授們，以一種(偽)中立、旁觀的學術角色，俯視島內文化運動的姿影。他們的學術權威、社會名望與專業批評，對戰時台灣的文化論述與活動發展產生了推波助瀾的效果。抱持不同政治立場、文化觀點及文藝信念，擺盪於維護、引導及規範地方文化的多重角色之間，帝大學者們對於地方文化的影響同時存在著正反兩面，其影響力越到戰爭後期越是明顯，部分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

## 結論

籠罩在日本連續性戰爭下的台灣文化界，有其獨特的文化背景，以及據此發展出的文化論述與活動形態。然而，它卻也不脫以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動力的跨文化交混及全球在地化現象之一環。它既在十六世紀歐洲帝國主義掀起的東亞系列歷史裡，也在十九世紀後期到二十世紀前期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的特定波峰中，在帝國勾勒的「東亞性」符號結構與政經軍事行動中衍生。

戰爭與文化疆界的變化，息息相關。「總力戰」帶動了時空重塑與文化重編。以上依序從「皇民化運動與台灣本土化」、「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產生的背景、資源與性質」、「戰時台灣文化甦生的盛衰起伏、特性、成果及其消退」、「戰時台灣文化轉折與台北帝大教授的文化介入」，以及「文化甦生中的文學科教授們」五方面，進行了翼贊文化運動與戰時台灣文化甦生現象的梳理。綜上可知，翼贊地方文化振興運動訴求的首要對象為內地文化界，後來沿著「外地亦即帝國裡的地方」之思路，才擴延到殖民地及其它外地政權。意外的是，由於此一官製運動正面肯定地方文化振興在總力戰體制中的價值，因而提供了在硬直皇民化政策下受到壓抑的殖民地本土文化運動復甦的契機。以文化差異、地方價值為訴求，不刻意強調民族本位的戰時本土化運動，藉

台灣地方文化論述之面貌呈現，正是在「東亞／大東亞戰爭」所捲動的東亞全球化歷程加速之際，寄生於翼贊文化運動有限資源下綻放的奇葩。

戰爭期地方文化論述及其相關活動，受到官方殖民地文化政策、殖民地學術機構，以及在台日人文化意識的拉扯，或以戰時「國民文化」建設為宗旨，或以「外地文化」發展為目標，反映濃厚的國策思維、自由主義外地知識人之文化願景，抑或擺盪其中兼而有之。它最重要的意義在於，產生了間隔戰時統治權力與本土文化界直接交鋒的緩衝作用，闢出一隅多重文化勢力斡旋的空間。姑且不論政治動機的輕重，日人中心觀點的深淺；值得注意的是，外地學者與外地文化人日益成長的地方文化意識，他們對異文化的獵奇、關注、介入、競爭、反省、扶持或合作，以及他們在殖民地文化界注入的另一種台灣文化論述，已在當時產生了激發異民族相互競合的文化公共空間出現的功效。在皇民化文化改造、總力戰文化動員，以及複數民族文化活動錯雜競合的新文化情境下，由於此一空間的出現，不論是總督府官方文化政治的操作，或者台灣文化人與官方的互動周旋，也因而變得更為複雜、更具政治性。在權力及資本不均等、文化理念及願景分歧的殖民地文化界，特別是戰時文化界，文化公共空間的規模有限，並非現代市民社會發展下的產物，更不具有無分出身族群階級、言論自由的民主性格。但是，它仍具備連結超越私領域之外的公共生活、提供差異意見接觸空間、聯繫都市陌生群眾的某些基本功能；此外它對戰時台灣文化的甦生、台灣文化的跨界想像以及本土文化自覺的強化，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與助益。

殖民統治非能全然依循帝國企劃，朝帝國所願方向進展，而往往是雙向變質的過程。外來政權的本土化與本土社會的殖民化，在不均衡的勢力下，透過某些反抗結構或互利結構，以不同形態與速率發生，然而不可逆轉的步履卻同步邁開。不論是基於文化相似性或文化

差異性的操作，帝國失控的野心，除加速兩者異化、交混與轉化的進程，也干擾了殖民主單向預設的路徑。許多超乎期待，於壓抑中創造、於控制中逃逸的曲折文化情節，於焉展開。透過本文的探討，不難明瞭，不論是以寬容與敬意回顧日、台雙方共同構建的殖民遺產，或者以殖民主義清理的角度檢視諸如「皇民化」、「大東亞論述」等負面傷痕，都同樣未跳脫將殖民遺產籠統化、一體化，從而加以意識形態評斷的後設觀點。唯有潛入歷史脈絡，方能使有限文獻遺留中，值得警惕的殖民暴力、文化侵略，和足以珍視的現代文化生成經驗、跨文化交混啟示，同等獲得昭顯。

在皇民化運動中被捲入新政經社會脈絡，重新網絡化的台灣文化交混歷程，並未因為政策勢力的介入與傷害而中止。這固然是因為本土文化人在官方論述中創造了轉化性論述，使本土化得以在曖昧含混中勉強運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全球各地的本土化從來就不是封閉、自發的鄉土現象，而是跨域交流、跨文化聯動或刺激下的一種回應與湧現。往往由於跨界流動造成的頻繁接觸，流通的跨國資訊與跨族裔接觸累積的衝擊，地方社會對內確認本土性的需求升高並且變得急迫之後，人們才會感到擁有自己在地文化的需要，甚至逐漸洞悉與此需求相關並存的其餘實際權力、利益與尊嚴問題。日本殖民統治催發了台灣本土文化的自覺，帝國戰爭與版圖擴張激化了多元異文化交流之間的複雜度與緊張感。台灣地方文化的發展與想像，在這個充滿變動的時代，有許多驚人進展。最後必須指出，由於殖民治理係以不公義的威權與暴力介入，因此殖民跨文化接觸中激起的本土運動，與一般跨文化情境，有著極為不同的過程與訴求，其意義不可輕率而論。這是我們時時不可或忘的。

戰時文化史，乃是殖民者與受殖民者，在同一個公共空間中交互建構的結果。台北帝大經過為期十年的累積，在1938年開始廣泛介入殖民地社會，一向與殖民地文化界有所距離的文政學部教授也紛紛走

出象牙塔；然而，他們的社會參與卻因為戰爭時代的來臨受到種種制約與限定，沿著帝國失控的野心，夾擊在學術徵用與文化良心之間。這一批動盪時代中的學人背影，可說是以「後帝國」與「後殖民」立場進行帝國近現代史或殖民地歷史研究的我們，共同的「前車之鑑」。

**參考書目：**

一、中文文獻

Arif Dirlik, 2006,〈建築與全球現代性、殖民主義以及地方〉。《中外文學》34(10)。

Rainer Tetzlaff(編)、吳志成(等譯), 2001,《全球化壓力下的世界文化》。南昌：江西人民。

土肥原賢二, 1938,〈為創新新文化而戰爭·中日事變之最大標的〉。《華文大阪每日》1(2)。

不著撰人, 1941,〈台灣文學縱談會的感言〉。《風月報》125。

王惠珍, 2009,〈戰前台灣知識份子閱讀私史：以台灣日語作家為中心〉,「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

石婉舜, 2009,〈「台灣味」的發現與搶救：戰時布袋戲改造與台灣知識人的「地方文化」建構〉,「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

———, 2010,〈搬演「台灣」：日治時期台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1895-1945)〉。台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

朱點人, 1936,〈秋信〉。《台灣新文學》1(2)。

吳新榮, 1981,《吳新榮日記, 戰前篇》。台北：遠景。

吳濁流, 1988,《無花果》。台北：前衛。

呂紹理, 2005,《展示台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麥田。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陳萬益(編), 2004,《呂赫若日記》。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

巫毓芬、鄧惠文, 2008,〈氣候、體質與鄉愁：殖民晚期在台日人的熱帶神經衰弱〉。李尚仁(編),《帝國與現代醫學》。台北：聯經。

李文卿, 2009,〈共榮圈的想像：帝國日本與大東亞文學圈(1937-1945)〉。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車承棋, 2009,〈搖墜的帝國, 後殖民的文化政治學：皇民化的技術及其悖論〉,「總

- 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
- 並木真人，2004，〈朝鮮的「殖民地近代性」、「殖民地公共性」和對日協力〉。若林正丈、吳密察(編)，《跨界的台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台北：播種者。
- 周婉窈，2001，〈從南方調查到南方共榮圈：以台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法屬中南半島的開發為例〉，「台灣資本主義發展學術研討會」。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主辦。
- 林慧君，2009，〈日據時期在台日人小說重要主題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 林繼文，1996，《日本據台末期(1930-1945)戰爭動員體系之研究》。台北：稻鄉。
- 近衛文麿，1938，〈日本真意不在滅亡中國·近衛首相演說要旨〉。《華文大阪每日》1(2)。
- ，1938，〈創刊詞〉。《華文大阪每日》1。
- 邱雅芳，2008，〈南方作為帝國慾望：日治時期日人作家的台灣書寫〉。台北：政治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
- 金艾琳，2009，〈戰爭景觀(Spectacle)與戰場實感的動力學：中日戰爭時期帝國對大陸的統治與生命政治或者對朝鮮和朝鮮人的配置〉，「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
- 垂水千惠(著)、張文薰、周易儒(譯)，2008，〈1942年-1943年呂赫若之音樂、演劇活動〉。《戲劇學刊》8。
- 施淑，2007，〈大東亞文學共榮圈：《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新地文學》1。
- ，2008，〈文藝復興與文學進路：《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二)〉。《新地文學》4。
- ，2008，〈文藝復興與文學進路(下)：《華文大阪每日》與日本在華占領區的文學統制(三)〉。《新地文學》5。
- 星名宏修(著)、莫素微(譯)，2005，〈「血液」的政治學：閱讀台灣皇民化時期文學〉。《台灣文學學報》6。
- 柳書琴，2005，〈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台北：麥田出版社。
- ，2007，〈文化遺產與知識鬥爭：戰爭期漢文現代文學雜誌《南國文藝》的創刊〉。《台灣文學研究學報》5。
- ，2008，〈誰的文學？誰的歷史？：論日據末期文壇主體與歷史詮釋之

- 爭)。《新地文學》4。
- ，2009，〈殖民都市、文藝生產與地方反應：1930年代台北與哈爾濱的比較〉，「日本台灣學會第11回學術大會」。東京：日本台灣學會。
- ，2009，〈荊棘之道：台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台北：聯經。
- 高沛秀，2009，〈皇民奉公會的音樂動員運動〉。台北：台灣大學音樂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文薰，2009，〈帝國大學之文化介入：1940年代台灣文壇形成史〉，「交界與游移：近現代東亞的文化傳譯與知識生產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哈佛燕京學社主辦。
- ，2009，〈從「內地」到「外地」：戰爭期台灣文學之主題／主體轉換〉，「THE CULTURES OF EMERGENCY：CULTURAL PRODUCTION IN TIMES OF TURMOIL」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辦。
- 張明權，2005，〈翼贊皇道與甦生文化的互利結構：以《現代傑作愛國詩選集》論日治末期台灣漢詩壇吟詩報國論述〉，「第二屆全國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 張恆豪(編)，1991，《朱點人、王詩琅合集》。台北：前衛。
- 張靜宜，2003，〈台灣拓殖株式會社與日本軍國主義〉。台南：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陳君葆(著)、謝榮滾(編)，1999，《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書局。
- 陳昭如、傅家興，1997，〈文政學部一政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1。
- 陳偉智，1997，〈文政學部一史學科簡介〉。《Academia-台北帝國大學研究》1。
- ，2009，〈戰爭、文化與世界史：從吳新榮〈獻給決戰〉一詩探討新時間空間化的論述系譜〉，「總力戰的文化事情：殖民地後期韓國跟台灣比較研究」跨國工作坊會議。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韓國聖公會大學東亞研究所主辦。
- 陳淑容，2009，〈戰爭前期台灣文學場域的形成與發展：以報紙文藝欄為中心(1937-40)〉。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 馮瓊瑩，2006，〈展示「統治時間」：日據時代「始政週年紀念博覽會」的治理技術〉。新竹：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 黃英哲(編)，2006，〈日治時期台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一~四冊。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籌備處。
- 葉碧苓，2007，〈台北帝國大學與日本南進政策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

研究所博士論文。

廖炳惠，2004，〈打開帝國藏書：文化記憶、殖民現代、知識感性〉。《中外文學》33(7)。

廖瑾瑗，2007，〈台灣近代藝術的表徵：《民俗台灣》的光與影〉。《台灣美術》67。

鳳氣至純平，2005，〈中山侑研究：分析他的「灣生」身分及其文化活動〉。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8，〈中山侑的戲劇理論：藝術理念和政策之間的協力關係及糾葛〉。

吳密察(策劃)，石婉舜、柳書琴、許佩賢(編)《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

蔡錦堂，2007，〈再論「皇民化運動」〉。《淡江史學》18。

鄭麗玲，2001，〈帝國大學在殖民地的建立與發展：以台北帝國大學為中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

鄧慧恩，2009，〈日治時期外來思潮的譯介研究：以賴和、楊遠、張我軍為中心〉。台南：台南市立圖書館。

橋本恭子，2003，〈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志》研究：以「外地文學」論為中心〉。新竹：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蕭明禮，2004，〈戰爭與海運：戰時南進政策下台灣拓殖株式會社的海運事業〉。南投：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蕭采芳，2008，〈1930年代後期的高雄港與軍需工業〉。嘉義：中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

## 二、日文文獻

工藤好美，1943，〈台湾文化賞と台湾文学〉。《台灣時報》279。

不著撰人，1943，〈中村哲氏龍瑛宗氏対談会：偏坳の文化に就て〉。《台灣藝術》4(2)。

王碧蕉，1942，〈台灣文學考〉。《台灣文學》2(1)。

中村哲，1940，〈外地文學の課題〉。《文藝台灣》1(4)。

———，1941，〈文化政策としての皇民化問題〉。《台灣時報》1。

———，1942，〈昨今の台灣文學について〉。《台灣文學》2(1)。

———，1943，〈台灣文學雜感〉。《台灣文學》3(1)。

中村哲、竹村猛、松居桃樓，1942，〈文學鼎談〉。《台灣文學》2(3)。

北河賢三，1989，〈戰時下の文化運動〉。《歷史評論》465。

矢野峰人，1935，〈「媽祖祭」禮讚〉。《媽祖》6。

———，1942，〈台灣文學の黎明〉。《文藝台灣》5(3)。



- 安田武，1994，《定本戦争文学論》。東京：朝文社。
- 呂赫若，1944，《清秋》。台北：清水書店。
- 吳密察（著）、矢野充宏（譯），2002，〈『民俗台湾』発刊の時代背景とその性質〉。藤井省三、黃英哲、垂水千恵（編）《台湾の「大東亜戦争」：文学・メディア・文化》。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志馬陸平（中山侑），1936，〈青年と台湾：新劇運動の理想と現實（三）、（四）、（五）〉。《台灣時報》198、199、200。
- 岡本真希子，2008，《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台湾総督府と帝国日本》。東京：三元社。
- 垂水千恵，2002，《呂赫若研究：1943年までの分析を中心として》。東京：風間書房。
- 柳書琴，1995，〈戦争と文壇：盧溝橋事変後の台湾文学活動の復興〉。黃英哲、藤井省三、中島利郎、下村作次郎（編）《よみがえる台湾文学：日本統治期の作家と作品》。東京：東方書店。
- 宮本正明，2001，〈戦争期朝鮮における「文化」問題〉。《年報・日本現代史》7。赤澤史朗（等編）《戦時下の宣伝と文化》。東京：現代史料。
- 島田謹二，1936，〈詩集『媽祖祭』読後〉。《愛書》6。
- 張文環，1940，〈台湾文學の将来に就いて〉。《台灣藝術》創刊號。
- 楊智聖，2005，〈旅行記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エクリチュール：日本領台初期の台湾〈蕃地〉探検記から1930年代の山地ものへ〉。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國語國文學會。《國文》102。
- ，2006，〈戦時下殖民地台湾表象の生成：以1940年「文藝台湾銃後運動講演會」的訪台為例〉。《台灣文學學報》8。
- ，2008，〈日本領有期の台湾表象考察：近代日本における植民地表象〉。東京：御茶水女子大學人間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 楠井隆三，1943，〈昭和十七年台湾政治經濟の概観〉。《台灣經濟年報（昭和十八年版）》。東京：國際日本協會。
- 裏川大無，1935，〈台湾雜誌興亡史（二）〉。《台灣時報》184。
- 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編，1995，〈台湾文藝作家協會〉。《台湾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編：領台以後の治安狀況（中巻）》。台北：南天。
- 瀧田貞治，1943，〈演劇対談：厚生劇団公演細目評〉。《台灣文學》4(1)。
- ，1944，〈呂赫若君のこと〉。呂赫若《清秋》。台北：清水書店。
- ，1944，〈増産と文學〉。《台灣公論》9(3)。

三、英文文獻

Roland Robertson,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現代性與國族認同的建構  
從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之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  
劉名峰\*\*

Moder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Moral Horizon of Narrating China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by LIU Ming-Feng

關鍵詞：自我東方化、國族敘事、現代性、道德視域、認同

Keywords: self-orientalization, national narrative, modernity, moral horizon, identity

收稿日期：2008年12月2日；接受日期：2009年5月9日。

Received: December 2, 2008; in revised form: May 9, 2009.

\* 本文首先於2008年5月23-25日在美國加州的Menlo College發表，筆者得到許多人的協助，特別感謝張茂桂教授、鄭路教授、祁冬濤博士與林玉琪小姐，以及提出了中肯、深入之建議與評論的兩位匿名審查人。當然，所有文責仍由筆者負擔。

\*\* 服務單位：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候選人

通訊地址：台北縣淡水鎮八勢一街63巷24號9樓

E-mail: mf60129@hotmail.com

## 摘要

認同的建構本身是個對我群道德化，或污名化敵對他者的過程。道德化或污名化所參照的道德視域，在不同的時期裡也就有不同的內容。本文藉著蔡培火、牟宗三及龍應台對中國的想像，來了解台灣社會在建構認同之際，所參照之道德視域的內容及其變遷。透過他們的作品，本文指出自日治時期到民主鞏固期間，對中國的想像可分成四個時期：(1)日治時期裡以「友善的東方化他者」來想像中國，其道德基礎是「參照於現代性的社會道德」，即不同於列強的軍事擴張，中國是個愛好和諧與和平的悠久文明；(2)國民黨威權時期裡的中國是個「東方化的自我」，而以「參照於現代性的經濟道德」來想像，即儒家倫理與新教倫理一樣有效，甚至更有利於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發展；(3)民主轉型期裡的中國是「敵對的東方化他者」，參照著「現代性的政治道德」來想像，這使得中國對台灣的主體性與民主自由來說是個威脅；(4)民主鞏固之際，中國是種「東方化的多元想像」，除了是威脅，也是全球化時代裡的世界工廠與市場。本文指出不同時期裡對中國的想像，是參照著現代性的不同面向，而了解其間的內容與變遷的方式，不僅可理解台灣當下的認同處境，而有助於社會的溝通，在理論上也可消解原生論與建構主義的對立。

##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is a process of moralizing the 'We-group', and stigmatizing the other. However, modernity stands as the moral code behind this moralization/stigmatization on the one hand; it emphasizes different criteria at different time on the other. According to the narrative about China of three famous writers, that is Tsai Pei-huo, Mou Zong-san and Lung Yin-tai, this study aims at presenting the content and change of modernity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the colonial

period, China was imagined as an 'amicable orientalized other' in order to contrast China with the modern hegemonies by establishing a binary metaphor system, i.e., peace-loving and long-lasting civilization with military power. In this regard, China was moralized by its 'modern societal morality', because it accentuated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harmony. After 1945, China turned into an 'orientalized self' in the eyes of Taiwanese people because of KMT's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its Sino-centered Weltanschauung. Given that Taiwan's economy performed relatively well after the 1970s, a revised and positive 'Confucius ethic' was presented in comparison with the 'Protestant ethic'. Accordingly, China represented a 'modern economic morality'. During the democratization period, China was perceived as an 'orientalized antagonistic other' in that it was thought as a menace to Taiwan's autonomy and democracy. In this regard, the way to see China was a 'modernized political morality'. While the democracy was consolidated, the perspective to imagine China has been plural in that China is not only considered as a threat, but also an opportunity to Taiwan because of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erencing to the modern moral system helps not only comprehe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 and its identity politics, but also bridge the theoretical gap between constructivism and primordialism.

## 前言

台灣，是屬於東方，還是西方？這裡所說的東西方，主要是道德上的意義，即在台灣民眾建構認同之際，是藉著哪些「東方」的要素，如儒家倫理，或是哪些被認為是「西方」的價值，像自由民主，來界定自身的特質？不過，本文的目的不在於界定台灣是東方還是西方，而是想了解那些被認為是「東方」或「西方」的象徵，在台灣民眾建構認同時所扮演的角色。<sup>1</sup> 回答此一問題，首先是將這些想像的內容，當作是種與認同相關的社會想像(imaginaire social)(Ricoeur, 1986a: 228-236; Lafuente, 2006)。其次，讓這些想像聚焦在「中國」這符號上，不只因為中國在台灣的國族想像裡據有重要的地位，也因為它在「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中，往往即是「東方」。再者，選擇具有重要性的人與事，其中對中國的想像即可說是種與國族建構相關的事件(événement)。而且，它不僅具有回應當時情勢(conjuncture)的策略能動性，還參照了現代性而具有長時期(longue durée)的穩定性。<sup>2</sup> 藉著其對中國的想像(事件)，本文將指出自日治到民主鞏固期間(情勢)，台灣民眾道德化自身認同的依據，可區分出四種參照著現代性(長時期)而生成的道德

- 1 這種理解認同的方式，即是 Charles Taylor 所說：「關於自身的敘事」(The narrative of individual self)(Taylor, 1989: 27)。這些敘事不可能抽象地形容為某些特質，也不是冷靜靜觀的事實，而是在人們陳述自己時的道德領域中表現出來。就 Taylor 的觀點，在此一認同敘事背後的道德架構(moral framework)(Calhoun, 1991: 234)，即與本文的道德視域相近。
- 2 事件、情勢及長時期是年鑑學派用來分析歷史的三個層次。長時期是年鑑學派所關心的課題，它所對比的事件，則是傳統史學的重點。近年來年鑑學派重新理解事件的意義，但還是在長時期的角度下來進行，即一方面仍強調長時期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也重視個體在歷史中的能動性(劉永華, 2006)。由於「穩定性—能動性」的關係是道德視域用來「超越認同」時所側重的特質，即一方面以長時期裡具穩定性的現代性，作為道德的基礎；另一方面又重視在事件中，行為者藉著對象徵的操作(manipulation)(Lévi-Strauss, 2006: 213)，而展現的能動性。因此，介於兩者之間的「情勢」，就變得相當重要，它不僅將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像分成四個時期，也讓其中的認同敘事從個體再現，轉為社會的集體再現。

視域(moral horizon)(Chang, 2003: 23)。它們分別是：

日治期間是「友善的東方化他者」，對比於列強的軍事擴張，中國以「參照於現代性的社會道德」被想像著，它有漢族重視和諧的傳統，是個愛好和平的悠久文明；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是「東方化的自我」，中國從「現代性的經濟道德」來想像，即儒家倫理與新教倫理一樣有效，甚至更有利於資本主義與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在民主轉型期被當作是「敵對的東方化他者」，從「現代性的政治道德」來想像，它對台灣的自由民主與主體性是個威脅；民主鞏固期裡的中國則呈現了「東方化的多元想像」，除了威脅之外，也是全球化時代裡的世界工廠與市場。

## 一、以道德視域的概念「超越認同」(beyond identity)

歷史是異質而多元的，台灣民眾在特定時期對中國的想像，也不會獨尊某一道德視域。但這並不代表支配性的道德視域不存在，而科學研究的目的也在找出思想或行動在特定時期裡的模式。因此，本文試圖在有限的篇幅裡，呈現認同建構的道德內容及變遷—這將由「道德視域」來理解—藉此，將可在國族研究的層次上回應「超越認同」(Brubaker & Cooper, 2000)的要求，即不落入原生論(primordialism)的固化與本質主義，又不會陷在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虛無與流動。然而，在本文之前已有「族群—象徵主義」(ethnic-symbolism)試圖回應此一要求(Smith, 2006)。其研究策略一方面以與國族的關係密切，又具有本質性的族群作為出發點；另一方面，則是透過象徵來了解族群的國族建構。

但是，此一研究策略仍有問題，其中主要是批評它對國族與族群的區分不清楚(Özkirimli, 2000:184-185)。然而，認為兩者可區分，即先驗地將它們視為實體，才有不同的本質可資區分。基於此一實體主義(substantialism)的批評，也就會認為國族與族群兩個概念，應該得

要、並且能夠區分，但「族群—象徵主義」並未滿足此一要求。這質疑確是有效的，因為族群在「族群—象徵主義」的研究策略裡即被當作實體來理解。因此，雖然它透過象徵來研究國族的建構，但是當以族群作為研究的起點時，仍擺脫不掉原生論的色彩；其次，社會生活裡的象徵非常的多，為什麼（不）選擇特定的象徵，又為什麼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詮釋被選擇的象徵，也是「族群—象徵主義」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象徵不能任意選擇，又意向地將象徵都往國族的建構來解釋；最後，象徵為什麼有（無）效？又能否促成國族的建構？此一象徵有效性（*efficacité du symbole*）的問題是個重要，但常被忽略的課題（Lévi-Strauss, 2006: 197-219; Bourdieu, 2001a:173），而「族群—象徵主義」也沒有清楚的說明。本文從「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出發，試圖回應「超越認同」的要求，並克服「族群—象徵主義」的不足。這策略即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

### （一）以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來發展道德視域的概念

與「族群—象徵主義」相同，本文也採用了長時期的概念，並強調象徵在國族建構中的重要性（Smith, 2006: 86）。在長時期的歷史時間中具有穩定性的認知架構，無疑是結構主義所研究的對象，而「西方—東方」的隱喻不僅在現代具有長時期的穩定性（Hall, 1992），還有結構主義分析所偏愛的二元性（Lévi-Strauss, 2005: 119-123; Barthes, 1991:135）。其次，結構分析強調的不只是「西方—東方」的隱喻，更重要的是此一隱喻與其它二元隱喻之間的換喻關係（Lévi-Strauss, 1989: 33; Hénaff, 2008: 20）。那麼，透過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來了解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像，不僅可消解「族群—象徵主義」的問題—將族群實體化及有關象徵有效性的疑問—同時，以中國這象徵為焦點，再配合著「西方—東方」的隱喻與現代性，還可減少選擇與詮釋象徵時的任意性。那麼，現代性的內容是什麼？「西方—東方」的隱喻又如何生



成，與它換喻的其它隱喻又有哪些？回答這些問題，得從現代文明歷程(modern civilization process)出發(Elias, 1999)。而且，它不僅可回答上述的問題，從中也可了解現代社會的認同建構。

文明歷程的核心是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Elias, 1999, 2003)。它將人變成了「個人」，打造出疏離、失序(anomie)的心理狀態與社會情境，並讓有機連帶成為人們追求的目標及組成社會的要素(Durkheim, 2002a)。此一「個人—社會」之間的高度緊張，即是「自我—我群之認同平衡」(I-We identity balance)的基礎(Elias, 2003)，而以有機連帶為基礎所建構的社會單位是種現代的我群(we-group)，它是種帶有想像性質的社群(community)，其中有國族，也有其它社會分類下的範疇，像是族群(漢—和)、階級(有產—無產)，或是在「西方—東方」的隱喻裡所提到的西方與東方。它們不是虛構的(imaginary)，而是種被想像出來的(imagined)社群，因為這些想像與對應的社會情境之間有「結構上的同形性」(homologie structurale)(Bourdieu, 1987:168; 1989: 7-11; 2001a: 228)。這些具有建構現代社群的想像，不僅是在「內—外」，或「我群—他者」的互動之間生成，它們所述及的我群也總有令人願意與之同一的道德意涵(Durkheim, 2002b:40)。至於什麼是道德的，則參照著現代性來理解(Somers & Gibson, 1994: 45-47; Jalata, 2001; Barclay, 2006)。上述三者—結構上的同形性、二元關係下的社會想像，及道德作為社會單位之所以可能的基礎—都是在關係主義(relationalism)的脈絡下來理解。<sup>3</sup>

文明歷程裡存在著「文明—不文明」的隱喻，而兩者間還是線性的關係—「西方」被認為是文明的，而非西方，或本文討論「東方」則不(夠)文明，得向「西方」學習—從關係主義的角度來看，首先會認為在

3 關係主義是近年來逐漸發展的存有論(Emirbayer, 1997; Somers, 1994)。本文引用的幾位主要的學者(Norbert Elias, Claude Lévi-Strauss, Pierre Bourdieu)，都強調關係主義的立場，其中也包括了提出「社會事實」的Emile Durkheim(Emirbayer, 1996)。

建立「西方—東方」之所以是「文明—不文明」的對比時，必然還有個統攝兩者，並為雙方承認而具有主體間性的總體(whole)，而部分(part)則會在接受了總體道德所規定下的階序(hiérarchie)之後，認知並接受自身的道德性：或高尚、或低劣(Dumont, 1992: 417-425)。這個涵蓋東西方的總體，也就是現代社會，而現代性則是排定現代文明階序的判準。其次，此一在理念層次上的換喻關係並非憑空出現，而是生成於文明歷程之中，隨著「文明的西方」在向「不文明的非西方」擴張之際，現代性的價值不僅讓「西方人」，也讓「東方人」認同「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以及西方在上、東方在下的文明階序。因此，就出現了「東方人(中國人)」自我東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現象，而在其敘事中所呈現的「東方(亞)」，則是種東亞現代性(Dirlik, 1996)。

再者，附著於特定社會單位，如「西方」或「東方」的認同，還是種道德事實(fait moral)，它表現了社會事實(fait social)的集體性與強制力，也強調了可欲性(désirabilité)(Durkheim, 2002b; Pharo, 2004: 49-52)。至於在認同敘事裡的欲望，關係主義則指出了其中帶有「較他者優越」的意向(Calhoun, 1991: 238-239; Somers, 1994: 629; Mucchielli, 2003: 30; Jaffrelot, 2003: 43)。於是，社會連帶即在「道德的我群—不道德的他者」的互動中形成(Douglas, 1966; Said, 1999; Stasch, 2006)。其中還會生成種種帶有「魅力」(charisma)與「恥辱」(disgrace)的象徵(Elias, 1997: 104-112)。由於「較他者優越」的意向具有集體性，因此在道德競爭中被思及，並帶有魅力或恥辱的種種象徵，首要的並不是真假，而在於它們能否在與認同建構之「根隱喻」(Turner, 2007: 14)，即「道德—不道德」的參照換喻時，能有效地成就我群的優越，並建立「我群—他者」間的界線(Lamont & Molnár, 2002)。然而，誰具有魅力，或帶著污名，並不是隨意的，得考慮社會中的權力分配。佔有重要發言位置的社群一如在「原—漢」對比中的漢人—可較有效地宣揚其道德視域，藉此道德化其認同的社群，並讓劣勢的社群接受自身的污名(Elias &

Scotson,1965; Mennell,1994)。

最後，被污名的社群也會反抗，而不是無力地接受貶抑。問題在於這些反抗是否有效。反抗的方法中，也包括了提出另一種道德視域來界定階序、建構自身的榮耀與魅力—原住民即使被認為是「不文明」而備受污名，但在「番刀出鞘」之際，即以「勇士」之姿來成就其榮耀。也就是說，道德化或污名的背後總根據特定的視域，在「文明」的社會中被認為是「粗暴」、「血腥」的行為，在「不文明」的世界裡，卻可能是「英雄」的特質。在特定的道德視域可看到諸多符號在對應的平面(horizon)上，彼此換喻、類比，生成意義，而與平面外的符號串連、產生意義的可能性則比較低—此即象徵有效性。不同隱喻系統之間的象徵是否處於親近的平面而能夠進行換喻，得參照著對應之社會空間(espace social)裡的生活慣習(habitus)(Bourdieu, 1986a; 2001a: 293-323)。由於道德視域是階序的後設，如果階序的正當性未受挑戰，道德視域即宛如自然秩序般地被接受了。但是當挑戰出現了，即可看到新的道德視域串起了許多的符號，以格式塔(Gestalt)的方式生成意義(Kultgen,1975; Lyotard,1999: 59-60; Turner, 2006b: 82)。總的來說，應用到認同建構的道德視域，會在「我群—他者」的二元關係中，參照現代性地在「較他者優越」的意向中生成—這也就是參照著現代性之結構主義現象學的內容。

## (二)以道德視域來回應「超越認同」的要求

雖然都是回應「超越認同」的策略，但不同於「族群—象徵主義」的實體主義，道德視域是從關係主義的立場出發。於是，族群不會被實體化，也不是象徵生成與運作的起點。從現代性及「西方—東方」的隱喻出發，族群將只是象徵在特定時空中所附著的載體：中國，有時以「漢族」被想像著，但也有以「中華民族」來表現的時期。因此，首要的不是以漢族(族群)或中華民族(國族)的形式來想像中國，而是想像時

的實質內容。然而，他者不同，對中國的想像也不同。因為對應著不同的他者，會有不同的策略來道德化自身：選擷什麼象徵、為其賦予特定的內容，而創造我群「較他者優越」的形象。不過，自台灣進入現代之後，國族建構時的「我群—他者」的關係不僅經常變動—在情勢上，時而為日本殖民地(台灣—日本)、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自由中國—共產中國)，或是以台灣為名的生命共同體(台灣—中華民國)，以致於時而威權、時而民主—甚至想像中國時所參照之「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也有變化：或者西方稱霸(如二戰之前與之後初期)，也有東方反撲(如亞洲經濟奇蹟之後)。因此，雖然台灣總與「東方」親近，但「東方」的意義卻是變動的。因此，當以「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及道德視域來回應「超越認同」的要求時，不見得是從族群出發來研究象徵對國族建構的意義，而是參照著現代性、對應於情勢，從「我群—他者」的關係來掌握國族在歷史動態中的道德化。此時，即可更精確地說明本文的研究目的了。

首先，前文提到的研究目的一呈現認同建構的道德內容及其變遷—如今可用更精確的方式來說明：在台灣民眾建構認同、道德化自身之際，中國在「西方—東方」的隱喻裡，與哪些象徵做類比，而這背後又是基於什麼道德視域，使得「西方—東方」的隱喻可以，也會與那些隱喻進行換喻，遂使得加在中國上的意義是「合邏輯的」、「被接受的」，而具有象徵的有效性？從「西方—東方」的隱喻及其換喻之間，了解到想像中國所參照之道德視域的內容，是本文的第一個目的。其次，作為「東方人」的台灣民眾，在想像中國時的自我東方化也應是動態的：在長時期的現代性上，「東方(中國)—西方」的不同關係，所思及的中國也呈現不同的台灣現代性；在情勢的層次上，自日治以來到民主鞏固期間，台灣所面對的政治體制多有更迭，也影響了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像。而且，在台灣社會裡想像中國的方式，也不是鐵板一塊。想像的不同即呈現了不同社會空間之間的角力。總的來說，想像

中國時的台灣現代性會變—如東亞是否發展？—而想像中國時的他者也會變。他者的變化不僅會因為歷時的(diachronic)情勢不同—或日本殖民、或兩岸對峙—也肇因於「我群—他者」在共時(synchronic)層面上的競爭。於是，對中國的想像及其道德視域都是動態的。了解此一動態是本文的第二個目的。

因為與國族建構有關之道德視域的內容及其變遷，均參照並體現了現代性，而現代性則一方面表現了長時期的心態及情勢的結構特質，另一方面又是行為者在操作象徵，道德化自身或污名他者時的依據。因此，藉由道德視域的概念，將能呈現認同建構中的穩定性及能動性。如此一來，不僅可了解台灣民眾複雜多變，又深具動態的認同建構過程，也可達成「超越認同」的目標。

### (三) 文本選擷的方法

呈現對中國的想像得依據具體的文本，而文本的選擷也要對應於研究的目的，即達成「超越認同」的目標。於是，藉著道德視域的概念，文本一方面將呈現台灣民眾的國族想像具有穩定性，因為它不僅參照著具有長時期的現代性，還鑲嵌在特定的情勢裡，並生成於「我群—他者」的關係之中。另一方面，文本也要表現認同建構中的動態：歷時面上，動態將表現在情勢變遷所造成的差異裡；共時面上，動態則由於不同的社會空間在「我群—他者」的關係裡，競爭道德上的優越所致。為能更系統地說明文本的選擷，茲先說明道德視域的內涵。

理解道德視域的概念，首先得依賴「我群—他者」的關係，它一方面在特定時期裡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則由於認同的建構是兩者間的道德競爭，遂使得道德視域還具有動態性。基於此一關係，可確認的是台灣社會在同一時期裡，想像中國的道德視域並不是單一的，因此才會有「較他者優越」的競爭，並出現「道德的我群—不道德的他者」的二元關係。於是，筆者雖以特定社會單位的文本為對象地呈

現其道德視域，但同時卻也隱約地可以看到對立的道德視域。其次，在「我群—他者」的關係中所呈現的認同建構，不僅是在「道德—不道德」的二元隱喻中進行，其中還涉及了「支配—反支配」的關係，及對應之政權的正當性。於是，道德視域在歷時層面的動態，還能透過制度來掌握具有主體間性之「我群—他者」關係的變化(Crossley, 2004: 98-99)。就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像，從政治制度上來分期，也就有日治時期、威權時期、民主轉型期及民主鞏固期等四個時期，它們不僅表現了「我群—他者」的關係在對應時期中的情勢，也因為參照著政治體制而讓歷時的動態有了相對的穩定性。

其實，「我群—他者」的關係及四種政治情勢的分期，不僅讓道德視域的概念能同時呈現認同建構中的穩定性及能動性，它還強化了作為個體再現之文本的集體性。因為文本的選擷，不僅要對應於不同時期裡的「我群—他者」關係，對它們的詮釋也要放在兩者間的道德競爭中來理解。筆者將以蔡培火、牟宗三及龍應台等人的文本，來呈現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及其中認同敘事裡的穩定性與能動性。他們各自的代表性將在下文中說明，而選擷的文本雖不能完全地呈現特定時期裡的道德視域，但以「情勢」來分期並配合「結構上的同形性」來說明，仍使得文中所述的道德視域具有相對的重要性。之所以藉著道德視域來檢視他們對中國的想像，將有「超越認同」的可能，首先是因為他們均具有跨時期的特質—蔡培火是日治時期及威權時期、牟宗三是威權時期及民主轉型期，而龍應台則是民主轉型期及民主鞏固期—於是，認同建構的穩定性與能動性，將因此而進一步地強化了：一方面，可從不同的人在同時期裡想像中國的一致性，以道德視域來呈現認同建構的穩定性；另一方面，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裡對中國之想像的差異，也就呈現了人們會由於道德視域的不同而表現在認同建構中的能動性。

## 二、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及其動態

### (一) 從日治到國民黨的威權統治：殖民體制到東西冷戰間的動態

台灣在1895年的馬關條約之後，成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1945年二戰終了，結束了台灣的殖民體制，而台灣民眾在國籍上也從日本轉為中華民國，國族的認同就體制上出現了重大的變遷。中國在此時是如何被想像的？國族歸屬的轉移在道德視域上出現了怎樣的變化？而且，情勢的變遷不僅發生在台灣內部的國籍轉移，在國際層面上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證成殖民體制之正當性的帝國主義，在戰後受到猛烈的挑戰。相對的，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大陣營間的東西冷戰，則成為國際社會運作的主軸。於是，台灣民眾對中國的想像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此一動態過程中之道德視域的內容與變遷，是這一小節裡試圖回答的主題。

戰前殖民台灣的日本，並不同於當時其它的殖民帝國，它是個「東方殖民帝國」(吳叡人, 2006)。它一來是東方的，再者是個殖民帝國。於是，在殖民體制下所出現的「日本—台灣」階序，不僅是「統治者—被統治者」的政治關係，也是文明上「進步—落後」的對比。不過，即使日本相對於台灣是「進步」的，但對進步的理解仍以西方為宗，東方的日本在演化的階段上，還是亦步亦趨地跟著西方。面對東方，日本要不是想「脫亞入歐」，就是以「東亞共榮」為名，企圖領導其它的亞洲國家邁向現代。於是，「西方」與「東方」之間不僅存在著線性演化的差距，「東方」還帶了種讓人急欲擺脫的污名與屈辱。東方，對當時的日本來說，即具體化在「中國」的符號上，但這污名並不必然為殖民體制下的台灣民眾所接受，特別是那些反抗日本統治與同化、具有台灣意識的人們。本文選擇了蔡培火的〈漢族之固有性(1921)〉與〈中華文化之特色(1969)〉兩篇文章作為分析的對象，除了因為蔡培火

是日治時期「台灣派」的代表人物，並在戰後國民黨政府中備受重用。<sup>4</sup>也因為兩篇文章均提到了「中國」，並分別出現在戰前與戰後。因此，對它們的分析即可呈現二戰前後道德視域的內容及變遷。

### 1. 日治時期：以「參照於現代性的社會道德」來想像中國

在日治時期裡，那些帶有台灣意識的民眾所想像的中國，很容易會以「友善的東方化他者」出現。這首先是因為在日本的統治下，中國並不是自身，而是他者；其次，對中國的想像是在「日本—台灣」的階序裡來理解的，因為一個落後、污名的中國，有助於日本官方的「去中國化」，藉以實現其同化政策。因此，在抗日的論述裡，中國即反向地以正面的形象出現。茲以〈漢族之固有性〉為例，來呈現其間的道德視域。

固有性之由來，原因環境之感化。抑漢人之數，現呼三萬萬，約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而其所佔據之區域，又係世界一流大陸，且閱四千餘年歷史，足見其環境之複雜矣。夫人眾，則彼此之關係自煩，設人人不相尊重而守其分，勢必無有寧日，眾必不得以聊生，於是和平之性自發，故忠恕為漢族道德之大本，禮樂供王者治民之要諦焉。以此和平之性，漢人之所輕者武力，所重者文化，故曰以力服人者霸，以德行仁者王。文化主義，係漢人之標榜；軍國主義，確非漢族之所與。又因此性之存，漢人自昔已有平等博愛之念，所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曰「舜

4 蔡培火是「台灣派」，是依據王曉波的界定（王曉波，1993）。「台灣派」與「祖國派」對應，兩者都是後代史家分析日治時期之抗日運動時的分類，唯其區分不能與當下的統獨直接類比，而是以在抗日運動中，對中國的依賴來分辨。前者認為應該自主，而後者則較仰賴中國（吳三連、蔡培火等，1971：頁161-162）。但是，由於情勢的結構性因素，兩派所想像的中國基本上都是「友善的東方化他者」，並帶有現代性的社會道德。只是為能更清楚地呈現二戰前後想像中國的連續與斷裂，遂以「台灣派」的蔡培火作為研究的對象。



亦人予亦人」，又曰「四海之內皆兄弟」，僅此數語，便足窺其思想之大概。況漢族四千餘年之政治史中，若唐虞之禪讓、商周之交代、元清之入關、五族之共和等，非漢人之社會不能行，是其偉大之固性以致者也。予稱愛和平為漢族固有性之一，似非不可也。（蔡培火，2000a，90-91）

對中國的想像，蔡培火先從一些「客觀」的要素出發。不過，這些客觀得加上現象學的括號，因為這些「事實」是種選擇性的引用（selective appropriation），而它們的組合與詮釋還呈現出為了特定意向而設定的情節（emplotment）（Somers, 1994: 617-619），即：在道德化中國之際，讓台灣民眾所認同之我族有相對於日本的優越性。首先，中國據有「一流」的地理環境，及「悠久」的歷史文化。這些被述及的內容已具有道德意涵，因為它們具有可欲性。自清季中葉以來，中國飽受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欺凌，處於「次殖民地」的狀態，並在甲午戰後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因此，台灣民眾如要透過中國來證成自身認同的道德性，得先以漢族來建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連結，再透過漢族來呈現台灣民眾相對於日本的優越性。不過，見諸當時中國困頓的地位，創造優越性的方法則是將時間向前及向後延伸，即能生成可欲的中國：有「過去」悠久的中國文化，還因為一流的地理環境與龐大的人口，而將在「未來」復興的中國。如此一來，中國在過去與未來都充滿了可欲性，至於不可一世的列強，也只是短暫的「現在」而已。這是當時台灣民眾想像中國時常見的模式（吳三連、蔡培火等，1971：頁161-162）。

其次，文中還認定了當時的列強是不道德的，而「道德—不道德」的根隱喻，則是以「和平—戰爭」的對比來呈現。從人口密度推論出漢族自古以來重關係、愛如平的特質，而強調王者的文化主義與重視霸權的軍國主義之間，則是在文章裡直接提出來的二元隱喻。此外，經由對關係的重視所聯想到對平等與博愛的強調，不只應用在國際間的

政治，像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被認為實踐在國內的治理之中，如「己欲立而立人」及禪讓政治。強調平等與博愛及對社群價值的重視，都再現了對社會連帶的需求。它們之所以被思及為具有道德的，與文明歷程的個體化及自由的擴張是同步的：自由造成了失序與衝突，對非西方社會來說更是如此。這些衝突不僅出現在社會關係裡，還赤裸裸地表現在國際關係中——中國受欺凌、台灣被殖民，正是最直接的感受。「個體—社群」的二元隱喻，可與「自由—平等／博愛」及「戰爭／衝突—和平」的隱喻進行換喻，而這幾組隱喻所對應的也就是「列強—中國」，或「西方—東方」在當時的道德關係。

在歷史悠久、重視關係，及強調和諧的文化大國中所呈現的中國，首先再現於「列強(西方)—中國(東方)」的隱喻裡，是種試圖藉著對後者的道德化來證成自身之優越感的情態。其次，在備受政經剝削與文化壓迫的殖民情境裡，對社會連帶的強調，不僅相當重要，也與重視關係、強調和諧等的價值相契合。這不只是由於社會連帶因為個體化的文明歷程而更加重要，也因為其它參照著現代性的道德，是此時中國這符號裡所看不到的。於是，對社會連帶的強調成為台灣民眾想像中國時的核心，並具體化為漢族，而漢族還擁有強調忠恕、重視關係，及對應著現代性而轉化成平等、博愛，及愛好和平等的特質。其實，寫出〈漢族固有性〉的蔡培火，還是當時的「台灣派」，可想見當時的「祖國派」對中國的友善更是熱切。總的來說，在「列強—中國」的對比間所想像的中國，是個「友善的東方化他者」，它具體化為漢族，並具有魅力。至於其魅力的來源，則出自於反抗列強、強調和諧，而對應著現代性的社會道德。

## 2. 戰後「中國」的「自我化」

二戰結束之後，蔡培火在重慶，並在1946年加入國民黨。1948年的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中，他以台灣省最高票當選立委；1949年返台，擔任東南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1950年，出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是中華民國內閣中的第一位台籍部長級政務官。如此看來，蔡培火對中國的想像將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但這並不意味了筆者認為戰前的「台灣派」與戰後的中華民國官員之間，在認同上是對立的。其代表性與研究目的相關，即在情勢變遷之後，從反日同化的在野主力，到反共復國的國民政府要員之間，對中國之想像的連續與斷裂。由於其所在位置的重要性，自我東方化的轉變也就更具代表性。此外，就生成自我東方化的情勢來說，它在戰後的變遷還不僅在東亞的區域裡，由於殖民帝國的瓦解及美蘇兩極體系的出現，它還是全球性的變化。於是，國民政府來台所造就的，不只是對中國的想像，從「他者」向「我群」的轉換(即「自我化」)，對於「西方—東方」之二元性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從「對抗」轉為「合作」)。茲以〈中華文化之特色〉一文，來呈現此一情勢變遷對中國之想像的變化。他寫到：

我們中華國族，先受國際共產勢力的侵害，而今正在圖謀要來反攻復國，其最大力量是在我們的固有文化，是在我們中華文化的特色，因此我們舉國同胞要來展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我中華文化的本質，是精神的倫理的是以敬天愛人為依歸，是敬神明而重人道的，在平常尤愛自由而重和平，在亂時則以殺身成仁為志尚。(蔡培火，2000b：頁138)

對中華文化的描述，如今在強調和平之外(這一點也被認為是漢族的特色)，還有「在亂時則以殺身成仁為志尚」。之所以再區分出平時與亂時，並指出亂時的中華文化特質是以「殺身成仁為志尚」，意謂著蔡培火如今肯定了武力之使用的必要性。至於其原因不僅是中國在戰後隔著台灣海峽，分裂成國共雙方，而且中國在此時還被當作是「我群」此一「自我化」的現象，不僅可在「漢族」變成了「我們中華國族」的轉變中發現，還有文間一再重複地使用「我」或「我們」等的措詞來確

定，這在〈漢族之固有性〉裡是看不到的一於是，統一中國具有高度的道德意涵，因此也就有了「反攻復國的大行動」。甚至，此一行動還嵌在東西對立的情勢裡，而國民黨政權則是與西方陣營合作，共同抵禦「國際共產勢力的侵害」。其實，不只是合作，如今蔡培火對西方的態度也不同了。他在戰前控訴列強的武力，但在戰後卻也指出了「中華文化」有「殺身成仁為志尚」的特質。此外，他也認同西方文化對發展的貢獻。他寫到：「西方歐美文化，是以科學的物質文化為其特色，而比較對倫理的精神文化有遜色。」(蔡培火，2000b：頁139)該文的寫作是為了呼應當時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他提到：

不過我們要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我們應該承認，中華文化亦有其缺點，就是缺乏科學的成份。因為缺乏科學的成份，我國民的生活，對物質方面的開拓活動就比較微弱，以致利用厚生的表裡就比較落後，我國族的力量就比較單薄了。因此 蔣總統在提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就很明白指出「倫理」、「民主」、「科學」是復興運動的三大基本要綱。(蔡培火，2000b：頁138-139)

西方強調科學，而東方則重視倫理。此時「西方—東方」所換喻的「科學—倫理」與「物質—精神」等隱喻，已不同於之前「戰爭—和平」或「霸道—王道」的對比。在東西方之間，新的隱喻沒有明顯的階序性，且都是文化復興運動中的綱要。不過，對中國的想像仍有東方化的痕跡，因為「西方—東方」還是想像中國時的基礎。唯如今作為我群的中國，已隔海分裂為自由與共產兩方，遂使得文化復興運動還有「自由中國(民主)—共產中國(專制)」的對立。戰後的情勢使得蔡培火一改戰前對西方的態度，並以「東方化的自我」來想像中國—此一即威權時期裡的主題。

## (二)從硬性威權到軟性威權：「中國—台灣」之階序的建立及其轉化

從戰前的「友善的東方化他者」到戰後的「東方化的自我」，一來並不是理所當然的，它是由對應的政經社文體制所造作的，也就是威權體制與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主張；再者，也不是單線與決定論的。威權政府一方面打造了中國的國族，另一方面則壓抑反對的聲音。前者可以在蔡培火的身上看到效果，後者則流亡或遷居海外，或在白色恐怖下身亡或入獄。奠基在此一硬性威權(hard authoritarianism)(Winckler, 1984)的體制下，「中國—台灣」的二元隱喻建立了，並帶有階序的色彩：政治上的「中央—地方」與文化上的「高雅—低俗」或「進步—落後」類比(Chang, 2003: 47-48)。強調國家(中央)高於地方，不僅是國族建構的主題，其間還透過現代性，以「高雅—低俗」與「進步—落後」的隱喻區分兩者。此一階序的建立與區分的有效，是因為戰後的國民黨政府控制了台灣社會裡的主要資本—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及文化與象徵等(Bourdieu, 1986b)一所致。然而，隨著台灣經社的快速發展，親近於中國的社會空間對種種資本的控制力也減少了。70年代中後，還出現了強調台灣意識的政治運動：「中國—台灣」的階序有所轉變，對中國的想像也就不同，因為背後的道德視域發生了變化。從硬性威權轉向軟性威權的動態中，道德視域如何變遷是這一小節裡的主題。

「中國—台灣」的階序是與威權體制並存的象徵秩序，其正當性除了受「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政治主張所證成，也需要其它文化層面的支持，如儒家倫理。透過對儒家的敘事，將可適當地呈現戰後對中國之想像的動態。這不僅是因為儒家與中國之間的關係密切，70年代中後的東亞經濟奇蹟還使得儒家倫理的道德性出現了翻轉：之前，儒家經常被想像成是傳統的，並且是阻卻現代化的因素；之後，儒家倫理成了經濟發展的文化動因。本文的主題不在於儒家倫理是否有利於資

本主義的發展或現代化，而在於經社結構的變遷，與象徵意涵之變動間的「結構上的同形性」。因此，牟宗三一這位戰後來台的新儒學大師一在1958年所發表的〈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下稱〈宣言〉）及1983年於《中國文化的省察》中的文章，即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在一前一後以儒家為主題所想像的中國，再現了的是硬性威權體制軟化過程中之道德視域的內容與動態。

### 1. 硬性威權時期：以「東方化的自我」作為想像中國時的立足點

儒家早在1945年之前即已存在，它當然不能直接等同於中國，或至少不是國民黨政權。這裡討論儒家的重點，在於它與國家的關係。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即大力推動儒學，如規定師範學生必讀《四書》。自1956年之後，全台高中生還必修以《四書》為內容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1958年，徐復觀、牟宗三、張君勱、唐君毅等四人聯名發表了〈宣言〉，其中寫到：

我們首先要懇求：中國與世界人士研究中國學術文化者，須肯定承認中國文化之活的生命之存在。我們不能否認，在許多西方人與中國人之心目中，中國文化已經死了。……百年來中國民主建國運動之著著失敗，及今十分之九的中國人之在列寧史達林之像前緘默無言，不及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之漂流于台灣孤島及海外。……然馬列主義思想本身，總是歸於被否定，而中國文化之客觀的精神生命必然是向民主建國之方向前進。……西方人應向東方文化學習……（牟宗三等，1958）

在新儒家宣告其時代任務的同年，Joseph R. Levenson的《儒家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也出版了（Levenson, 1958）。後者以博物館中的收藏品來比喻儒家在現代的命運，內容與前者所提的「中國文化已經死了」，有異曲同工之妙。在「肯定—否定」、「活的生命—死的收藏」的對比之

問，反映了此時中國文化的困境。實際上，中國文化所受的挑戰不只來自於全盤西化派，中華民國的首任教育部長蔡元培，也要求全國各級學校自1912年起，廢除讀經書、祭孔子的儀式。於是，儒家失去了傳統上在國家文教中的地位；再就〈宣言〉中的「懇求」看來，此時的儒家也是時不我予，因為不能否認在西方人及中國人心目中，中國（儒家）文化已死，而承擔復興責任的中國人，則有「十分之九在列寧史達林之像前緘默無言，不及十分之一則漂流到台灣孤島及海外。」就此一困頓的情境，儒家的道德性在想像的「未來」，即馬列主義將被否定，而西方人還會向東方文化學習。

此時儒學大師們想像中國的方式，不僅生成於「西方—東方」的隱喻中，還鑲嵌在兩岸的敵對裡。在「自由（中國）—共產（中國）」的對比之間，中國文化被想像成具有「客觀的精神生命」，而且還「必然地向民主建國之方向前進」。如此急切地想要確定中國文化與自由民主的親近，及敵對的共產政權終將垮台，與兩岸競爭、東西對立的情勢直接相關。此外，此時想像的中國與蔡培火所寫作的〈中華文化之特色〉之間，也沒有太多的出入：在「西方—東方」的隱喻裡，西方與現代較為親近，不管是出於科學與物質的發展，或是自由與民主的實現。因此，政經上的發展即以西方為依歸，而中國（中華）文化的內容，則帶了種策略性的價值，或者整合倫理與科學，或者向著民主建國。總之，它們一來均與共產世界（中共）對立，並親近於西方自由國家；再者，都寄托於未來，因為現在很膠著、困頓。此時中國的道德性尚不明顯，得等到70年代之後才有清楚的變化。但可先指出的是，「東方化的自我」都是蔡培火與牟宗三在想像中國時的立足點。

## 2. 「參照著現代性之經濟道德」的儒家倫理的出現與效果

70年代正當西方國家出現經濟危機之際，東亞卻快速地發展。1979年，Herman Kahn先提出了「後儒家倫理」，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東亞的發展（Kahn, 1979:122）。隨即，儒家倫理被當作與新教倫理之於西

方的地位一樣，這不僅翻轉了韋伯的儒家命題，還強化了儒家及中國文化的道德性。這裡所說的道德，源自於附著在(後)儒家倫理的經濟性，也就是種參照於現代性的經濟道德。有鑑於此，儒家的地位已大相同於1958年發表〈宣言〉時的不堪。1983年牟宗三出版了《中國文化的省察》，其中在論及〈文化建設的道路(下)〉時，提到：「三十八年撤退到台灣來，至今已過了30多年，現代化已漸漸走上軌道。……這個時候，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是很當機的，而且有客觀實效性。」(頁32-33)現代化已走上了軌道，因此可以否定馬列主義、推翻共產集權，而統一中國變得是當機的，至於其中造就現代化的力量，牟宗三即清楚地指出了是儒家倫理(頁112)。儒家倫理有效地為中國文化賦予了道德性，使得中國文化的光榮不必寄望於未來。但即使如此，中國文化在80年代之初所在的也不是坦然大道。書中，牟宗三以〈中國文化大動脈中的現實關心問題〉再提到：

就中國來說，共黨的專制統治，實比三代以下君王專制更為封閉而嚴酷。……鄧小平上台後說要「開放」，只是對西方科技的開放，對西方之所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等敞開社會的政治觀念不唯不開放，而且扣得更緊。(頁74)

提到開放，再談自由民主與人權，是因為後者在牟宗三看來是政治現代化，而「政治現代化，必從經濟現代化著手，而由經濟現代化進至政治現代化時，所表現的自由民主，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於是，「第一步要做的是，經濟的現代化……」(頁34-35)政治現代化不在中共的四個現代化裡，而不僅政治現代化需要經濟現代化的支持，經濟現代化也要「某種程度的政治現代化為基礎」(頁94)。這些論證一方面試圖證明中國的開放是不足的，因為就戰後的現代化理論來說，政治現代化得從經濟現代化著手。現代化理論指出了「西方—東方」之間



是線性的演化關係：西方的自由、民主與人權是政治發展的方向，而此一政治現代化還需要有經濟現代化為基礎；另一方面，在現實上還可注意到兩岸競爭的情境對現代化理論的修正——經濟現代化要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現代化為基礎——此一修正所代表的是自由中國——也就是台灣——不僅已有了經濟的現代化，也有某種程度的政治現代化。其實，之所以在經濟現代化之外，再補上政治現代化的面向，是因為國民黨政府不僅得面對1979年中共「改革開放」之後，兩岸之間道德競爭的新局面，還得處理台灣內部在80年代之後愈來愈強烈的民主化要求。

70年代的現代化，儒家倫理道德化了中國文化，而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即由於其中所對應的經濟奇蹟而強化了；相對的，中國文化在中國大陸仍經受著馬列主義的破壞，而經濟上沒有自由體制，政治上又比三代以下的君王專制更為封閉而嚴酷。於是，不僅以自由中國來統一中國變得當機、具有客觀的實效性，還由於中國文化的道德性，使得「人人皆必自覺地為一具中國文化生命的中國人。這時，你要他左傾，他也不左傾；你要他『台獨』，他也不『台獨』了。」(頁127)這一幅光景與1958年發表〈宣言〉、「懇求」世人承認中國文化時的處境，已是大不相同。此外，不同的還有在與中共競爭之外，得跟台獨做比較。對台獨議題的關心所再現的，是「中國—台灣」與「中央—地方」的換喻關係逐漸失效了：此時，台灣意識正在台灣社會裡快速發展，台灣被認為不該是中國的一省，而是個國家。於是，牟宗三試圖強化中國的道德意涵，並指出其中已有「某些政治現代化」。然而，此時對中國的想像主要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經濟道德，但是對要求台灣獨立，或80年代新生的民主運動來說，「某些政治現代化」是不夠的。

### (三) 從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政體轉型過程中的動態

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在70年代中後出現軟化的現象(Winckler, 1984)，而「中國—台灣」的階序也逐漸失去了正當性，其原因除了是

70年代中後的黨外論述，還有當時的外部因素：一來，自由中國失去了聯合國的席位，如今受質疑的不僅是它與自由的關係，連代表中國也有問題了(Wang, 1999)。再者，儒家倫理的論述將台灣當作是東亞四小龍的一員來看待，這使得台灣不再以自由中國被想像，而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分析單位(Shih, 2007)。匯合了這些外部因素，台灣作為獨立之政治實體的認知與要求，進一步因為本土化而被強化了。而且，本土化不只來自於黨外及民進黨等的反對勢力，還包括了蔣經國在70年代之後的政策，及繼任之李登輝對台灣主體性的強調。其實，不只是行為者的策略促成了本土化，它還有結構性的因素，即70年代的外交危機與80年代的民主轉型。因此，政權的正當性即須向內地，以台灣民眾的需求為依歸。而為了取得政權，不管哪一個政黨都要回應本土化的要求。有鑑於此，「中國—台灣」不再是「中央—地方」，而是延續著冷戰以來的緊張，以及出於對台灣主體性的要求，變成「敵國—我國」的關係。中國變成了敵對的他者，並且一樣是東方化了的。不過，此時想像中國的情境比之前更為複雜。

首先，就國內層面來說，民主化使得台灣民眾不必面對日治及戒嚴時期的威權體制。民主在轉型期間是追求的價值，在鞏固期裡則是種生活方式。因此，對中國的想像不僅較為多元，在威權時期裡以中國為我群的行為者，也可能在民主自由的情境裡繼續發聲，而之前對經濟道德的重視也仍然有效；其次，後冷戰時期的國際社會所強調的是合作與發展，而中國則經歷了改革開放，在經濟上還表現突出。不過，中國崛起不只是經濟上的，也是軍事上的。因此，除了因為民主的環境，使得台灣社會對中國的想像較為多元，後冷戰的情境、中國的崛起，都讓台灣民眾在更高度的張力裡來想像中國—「我群—他者」、「友善—敵對」的勢力都在，而「經濟合作—軍事衝突」的緊張也高一於是，即使將中國當成「敵對的他者」成為新生的，甚至支配性的視野，但在民主體制裡對中國的想像也較為多元，而此一多元的情境

在民主鞏固期裡還更加明顯。於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一即自民主轉型到民主鞏固—中國如何被想像、其背後的道德視野是什麼，出現了怎樣的動態等的問題，將是這小節的主題。筆者將以龍應台作為研究對象，不僅因為她在民主轉型之前即已引人注目，在民主鞏固時裡對「去中國化」的批評也受到重視。<sup>5</sup>此外，她曾以「中國人」發聲、寫作，之後又說到：「如果明天就公投台灣前途，我一定會投下贊成『獨立』票。」(蔡惠萍，2002：頁155)因此，研究其間對中國之想像的變化，將可相當有效地展現本文的研究目的。

### 1. 民主轉型期裡的「敵對的東方化他者」：政治自由之道德視域的出現

民主化的力量早在70年代中後就已出現，但體制上的民主轉型則得等到80年代中の一連串變化之後，如組黨、開放黨禁等。民主轉型期間，「中國中心」向「台灣主體」的轉化更加迅速，而在「中國—台灣」之階序轉型的同時，對中國的想像也必然跟著轉變。在威權晚期，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而聲名大噪的龍應台，在評論小說時寫出了這樣的一段話：

作者以極端羅曼蒂克的眼光看中國的「文化」：媳婦對公婆的百般依順、妻子對丈夫的言聽計從、女人對男人的馴服屈就等等，在她眼中都是「美」；這個制度所隱藏的黑暗一面——個人意志的解體、感情壓抑的痛苦、女性內心的挫折等等，對於作者而言，就完全不存在。(龍應台，1985a：頁165)

龍應台在文化一詞上加了括號，一方面是她指出了中國文化是被這樣理解的，另一方面她又不認為這就是中國文化。對理所當然地以「中國人」發聲的龍應台來說，想像中的中國當然是好的，就像是該小

5 就龍應台及民主轉型期間的道德視域，還可參考筆者的另一篇文章(劉名峰，2009)。

說的作者也認為她所看到的文化是美的一樣。兩者的衝突源自於判斷什麼是「美」與「好」時的道德視域不同：前者以個人為道德的基礎，自由與平等是美善的判準；後者用社群為分析的單位，階序及秩序就成為道德的具體化。「個人—社群」、「自由—秩序」及「平等—階序」之間的衝突，即表現了80年代社會轉型的「闕限階段」(liminal phase) (Turner, 2006a: 95-97)。此時人們經驗到既成的社會分類和文化規則系統被破壞，以階序為基調所組成的社群，會以平等的個人來重組。而且，龍應台所依據之自由平等的價值，挑戰的不只是「婆—媳」、「夫—妻」、「男—女」等的階序，還有保守威權的中國文化。這過程再現了「中國—台灣」之階序的水平化，而在自由主義的價值逐漸具有正當性之際，也促成了「威權—民主」之對比的出現。此一對比在民主轉型之際益加強烈，並與「中國—台灣」的隱喻建立對應。其實，造成兩組隱喻對應的原因，不只是台灣內部的民主化，後冷戰時期裡西方國家對中國民主化的想望，也強化了民主台灣與威權中國之間的對比(石之瑜，2002)。

然而，不同於西方國家，「中國—台灣」的二元隱喻對台灣社會來說還與「敵國—我國」的關係相對應，而此時敵我的軍事緊張也不同于冷戰時的國共內戰。之前，作為「復興基地」的台灣得「光復大陸」。這類內戰情境的語言在1992年之後快速消失，它對應的是資深民代全面退職、國會重新改選的事件(石之瑜，2003)。於是，以台澎金馬為範圍的生命共同體意識逐漸生成，而中國與台灣之間的「中央—地方」關係也跟著瓦解。這造成了兩岸的脫內戰化，並進而生成了「敵國—我國」的關係。1996年當台灣舉行首次的總統直選之際，中國對台發射導彈。龍應台當時寫到：「我以台灣人的立場為文，籲求國際的了解與支持，但是我同時是一個中華文化的女兒。」(龍應台，1996：頁366)這位曾經寫作〈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的作家，如今以「台灣人」的立場為文，並且是「中華文化的女兒」。從她的語言中，看到的

不僅是90年代中後，中國的意涵已分化出政治與文化兩種不同的範疇，還有台灣成為龍應台之政治認同的現象。

如此看來，以「敵對的東方化他者」來想像中國的視野逐漸地生成。敵對的原因，一來是保守威權的中國文化不利於公民意識的養成（龍應台，1985b：頁94）。再者，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主體性的威脅。龍應台就說到：「什麼時候台灣人才能大夢初醒，理解他們是同舟共濟的一體。……面對這樣強大有野蠻的敵人在外，台灣人還需要在島內從自己人製造敵人嗎？」（龍應台，1996：頁50）。前者是個體公民層次上的政治自由，後者則是總體國家層次上的政治自由。在台灣民主轉型期裡，政治自由是核心的價值，據此而生成的「威權—民主」二元隱喻，不僅與「中國—台灣」對應，也與「東方—西方」之間具有換喻關係。因此，對中國的想像仍有東方化的痕跡，但已帶著污名而不具有過去的魅力，因為此時是參照著現代性的政治道德來想像中國，不是之前的經濟道德或社會道德。以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來想像中國，在公民的層次上建立了「中國—台灣」與「威權—民主」的類比，在國家的層次上則生成了「中國—台灣」與「敵國—我國」間的換喻。於是，中國的可欲性大幅地消解了，不僅未能如牟宗三所期待的，「人人皆必自覺地為一具中國文化生命的中國人。」相反地，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還強化了台灣這符號的可欲性，進而生成了台灣意識。

不過，「威權—民主」／「敵國—我國」的隱喻也對台灣內部親近於中國之社會空間中的人們，如龍應台所提到的外省人，造成相當大的壓力（龍應台，1999：頁136）。於是，不滿中國受污名的社會空間也就在民進黨執政之後，提出了新的論述，進而出現了多元的中國想像。這就是接下來的民主鞏固期了。<sup>6</sup>

---

6 不同於「由上而下」地從制度的層面，如以「二次輪替」為準準地來界定民主鞏固，本文以「由下而上」的方式，從日常語言裡再現集體的心態，並以此理解民主鞏固。

## 2. 民主鞏固期裡的多元想像：以經濟自由挑戰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

民主轉型是個闕限時期，威權體制下的階序，如「中國—台灣」所對應的「中央—地方」、「進步—落後」、「高尚—低俗」等等，在這過程中都受到挑戰，並出現「交融」(communitas)的現象(Turner, 2006b: 96-97)。交融形成了新的共識，如「新台灣人」的概念，但也有衝突，像是經常提到的族群問題。龍應台就寫到：

「新台灣人」最後的成熟—不論他屬於哪一個族群，一定是在他給自己的歷史記憶和情感重新找到了安身之處以後，絕不在於把自己的過去粗暴地斬斷。而每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感，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龍應台，1999：頁136)

「台灣」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成為外省族群與本省族群(之前的「台灣人」)的上位概念—就像威權時期的「中國」所處的位置一樣—於是，會有「新台灣人」及「在台灣人重新凝聚的過程中……」的語言出現。在「總體(台灣)一部分(外省及本省)」的包含關係裡，據有總體地位的台灣即有不證自明的道德強制力，而外省人也就從「中國省籍(如湖南人)」變成了「台灣族群(外省人)」(王甫昌，2005)。不過，與中國這符號較為親近的外省族群，其社會空間受到壓縮。自1996年的總統直選之後，「愛台灣」之類的語言即不斷出現，並強化了「台灣」的正當性。在「愛台灣」的同時即是「恨中國」，因此可理解龍應台何以會說：「面對這樣強大野蠻的敵人在外，台灣人還需要在島內從自己人製造敵人嗎？」。一方面，政治上的中國(即中共)被當作是強大野蠻的敵人；另一方面，文化上親近於中國這符號的外省族群，雖是「在島內的自己人」，但在愛台灣的急切裡被質疑了忠誠度，而被當作是與在外敵人對應的「在內的敵人」。於是，她說到：「每個族群的歷史記憶和情

感……，都是必須受到尊重的。」受尊重，其實不只是外省族群在「中國—台灣」之階序翻轉時，面對中國這象徵受污名時的要求，也是過去在「中國—台灣」的階序中，被當作是「次級」、「劣等」的「台灣人」的期待(張茂桂、吳忻怡，2001)。此時對多元文化的強調，是以政治自由的價值來對抗在以政治自由為道德視域之際，中國被污名化的現象。然而，以政治自由來想像中國—即與「威權—民主」／「敵國—我國」的隱喻換喻—中國終究是帶著污名的。

於是，一種強調經濟自由的道德視域也就逐漸地浮上檯面，它不僅挑戰了政治自由的主流觀點，也重新建構了中國的道德性。這種更多元地想像中國的情境，是在一個民主不只是價值，也是種生活方式的脈絡中，即民主鞏固期。此時，龍應台仍區分著政治與文化的中國。首先，就政治上的中國，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她以全球化／國際化的概念寫到：

今天國際化的整體趨勢之一是，各國都在調整自己的位置，加深它對中國的觀察研究和接觸了解，台灣是不是反而執意地將自己排除在這個國際趨勢之外呢？把自己排除在國際之外，我們贏得什麼呢？與國際接軌指的是，我們不但要把自己的國內事務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思索，我們也必須將自己與中國大陸的關係放在全球的格局裡去判斷，必須將中國放在全球的大趨勢、大版圖裡去做最深刻、最冷靜的認識。否則，已經處在夾縫裡的台灣就是自己將自己「隔離」掉了。(龍應台，2005/3/17)

在批判「隔離」的背後，參照的是「國際—本土」的隱喻。藉此，不僅帶了批評民進黨政府的目的，也有脫離以政治自由作為道德視域的效果。因為國際化在此時被認為是種理所當然的道德律令，再加上中國大陸傲人的經濟表現，使得龍應台得以建立「國際—全球化—經濟自

由一中國」的連動，並與「本土—民主化—政治自由—台灣」對比。於是，以經濟自由為主題的道德視域形成了，同時挑戰著重視本土的民進黨政府及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而且，不同於先前從政治自由的觀點所想像的「強大野蠻的敵人」，政治上的中國在「與國際接軌」之際被道德化了。至於文化上的中國，她則說到：

第一，它不曾經過馬克思主義的切斷與文革的摧殘，因此和自己的文化傳統沒有巨大的撕裂。……第二，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使得台北有了北京上海還不夠成熟的市民社會。中國的傳統價值在這裡與現代化接軌……，產生出華語世界中市民自主意識最高的城市；第三，自由是創造力的必要條件。台北，不同於新加坡香港、北京上海，它沒有不能出版的書……。它是華語世界中創作最自由的城市；第四，沒有一個華語城市比台北更豐富多元。原住民之外，中國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加上西藏蒙古，濃縮呈現在一個小島上，像一個色彩鮮艷的調色盤。它是華語地圖上的紐約。（龍應台，2003：頁29-30）

龍應台呈現中華文化的方式，首先仍延續著冷戰時之「共產—自由」的二元隱喻。不過，現在已不再是「共產中國—自由中國」的對立，而是「共產中國—自由台灣」的比較：台灣沒有馬克思主義及文革的摧殘，有的是經濟的發達、教育的普及，及成熟的市民社會與充分的言論自由，而傳統與現代還在此接軌，創造出華語世界裡最多元的文化。其次，她不是以四大族群來呈現台灣的文化，而是沿用了中華民國的行政建制—「三十五個省份的人，三十五種不同的文化……」—不過，它們仍是文化上的意義，如此處理的原因除了是為了更強烈地表現中華文化在台灣的多源性，也是對民進黨政府之「去中國化」的反抗。最後，台灣與台北先在華語世界裡與其它國家與城市做比較。在



突顯了台灣有生成中華文化的優越性之後，不僅說到「中國文化是台灣在國際競爭上最珍貴的資產，我們搶奪都來不及，遑論『去』！」(頁30)並進一步地指出中華文化可讓台灣在國際社會裡被看見，而讓世界看見台灣則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生存的唯一辦法(頁30)。

如此看來，中國在民主鞏固的情境裡是以多元的方式被想像著，而在這些想像中，自由仍是台灣民眾想像中國時的道德視域，其中有政治自由，也有經濟自由。然而，這並不代表擁護政治自由與支持經濟自由的是不同的人，而首先是不同的人對兩種道德視域的感受有不同的強度；其次，是不同的道德視域之間處於競爭的狀態—這是民主鞏固時期裡的多元情境—其實，道德的競爭總存在著，自日治時期到現在均是如此。唯由於自由的價值在民主鞏固期裡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而道德的競爭又與政權的正當性直接相關。因此，支配與反支配的鬥爭不僅搬上了檯面，還在「中國—台灣」的隱喻中進行著：親近於中國之社會空間的行為者，之所以強調經濟自由，不只是因為它本身在現代的情境裡即具有吸引力，可從經濟自由來道德化中國，它也是為了反抗以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對中國的污名化；親近台灣之社會空間的行為者，則從政治自由的道德視域來想像中國，除了因為政治自由是現代社會的重要價值，也因為如此一來可提昇台灣在「中國—台灣」之二元關係中的道德性，並強化台灣主體的地位。因此，道德多元不僅是種實體的情境，也是關係中互動的結果。然而，這種互為他者的情境，不僅讓中國的想像出現了多元的狀態，也可能落入了獨我、自戀的極端：對方總是妖魔，而自己則是天使。

然而，自由總是兩者間共同的價值與溝通的基礎，但也正因為如此，民主鞏固期裡仍參照著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想像中國：在政治上以「民主—威權」／「西方—東方」來思考「中國—台灣」的關係；在經濟上則將中國等同於國際，而發展中華文化的目的是為了讓西方看見台灣。於是，此時中國所再現的是種「東方化了的多元想像」。

### 三、想像中國時的斷裂與連續

從前文的研究裡，可將四個時期裡對中國的想像，以「表一：不同時期裡想像中國之道德視域及相關要素(下稱表一)」來表現。

表一：不同時期裡想像中國的道德視域及相關要素

時期 道德意涵	日治時期	威權時期	民主轉型期	民主鞏固期
想像方法	友善的東方化他者	東方化的自我	敵對的東方化他者	東方化了的多元想像
道德視域	參照於現代性的社會道德	參照於現代性的經濟道德	參照於現代性的政治道德	參照於現代性的多元道德
基本主題	愛和平、重和諧的悠久文明	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	台灣的主體性與民主自由	多元社會與全球競爭
地區性的他者	日本帝國	共產中國/台獨勢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獨勢力
想像中國時的性質	烏托邦	意識型態	意識型態	烏托邦及意識型態

不過，「表一」雖然呈現了不同時期間的差異或斷裂，但它卻沒能表現本文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即連續性。本文雖在三個小節的標題中強調了動態，但在動態間所想像的中國，又總參照著現代性並對應於「西方—東方」的隱喻，因此具有連續性。斷裂與連續不僅是歷史的實然，也是筆者藉由道德視域的概念來研究認同之建構時，所試圖呈現的特質。

首先，道德在本文中並不具有超越性，而就只是生活慣習的表現：它一方面是外在性的內化(*l'intériorisation de l'extériorité*)，因而具有社會事實的特質；另一方面，它是內在性的外化(*l'extériorisation de l'intériorité*)，使得行動的結果呈現了行為者的可欲(Bourdieu, 2003: 80-81)。因此，對中國的想像—即行動的結果—不僅呈現了特定時期的集體性，也再現了當時行為者的可欲，而可欲的內容還分成「烏托

邦」與「意識型態」兩種模式。前者具有反抗現存秩序的性質，而後者則相反地以鞏固現有秩序為目的(Mannheim, 2005; Ricoeur, 1986b: 194-197)。蔡培火在日治時期裡對中國的想像是烏托邦，因為想像中國的道德中具有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意圖，而龍應台從經濟自由來想像中國，也有批評民進黨政府的目的；威權統治與民主轉型期裡的中國想像是意識型態，因為它們都具有整合及鞏固政權的效果。這不僅在牟宗三的想像中看得到，就是蔡培火在1969年呼應文化復興運動，或龍應台在1996年面對中國導彈的威脅時所寫的文章裡，也都可以發現。而在多元想像的民主鞏固期裡，對中國的想像裡有烏托邦，也有意識型態，兩者共存的情境即反應了當下對中國的想像。

其次，從生活慣習而具體化為論述的過程中，道德並不是在二元關係(dyade)中被思及的，而是生成於三角關係裡(triade)(Racine, 1999)。也就是說，在我群與他者這兩個部分之外，還有個包含兩者的總體，就如同在「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之外，還有個「現代(世界)」。藉此，部分才得以安置在總體中的階序裡，並根據其中的道德視域來定位先進與落後、高尚及低俗。於是，日治時期對中國的想像，不只生成於「西方—東方」及「日本—台灣」兩組階序性的隱喻裡，中國這符號還參照著現代性，才從歸於落後的象徵轉為具有道德性，並藉此反抗日本的殖民。此時參照的現代性與日本政府不同，強調的是重視社會關係、愛好和平等的社會道德。70年代中後，「西方—東方」的階序出現了變化。變化的力量是經濟性的，因為在東亞的經濟奇蹟與西方的經濟危機對比之下，造就了儒家(中國)的道德性，不僅使得復興基地能在「自由中國—共產中國」的對立中，宣稱統一中國是當機的，還能在「中華民國—台灣」的關係裡，讓人覺得「要台獨也不台獨了」；不過，中國並沒有統一，而台獨的聲浪也愈來愈高，兩岸間的脫內戰化及台灣的民主轉型，讓中國成為「敵對的東方化他者」。它仍在「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裡被想像著，只是此時換喻的是「民主台

灣—獨裁中國」的隱喻，並參照著在第三波民主潮裡備受重視的政治道德。

掌握了道德的意涵，及道德意涵的生成是在三角而不是二元的關係中，將可更清楚地呈現歷史的連續性—這是本文探討歷史的分期時，同時強調的特質—因為在二元的衝突之外，作為總體道德的第三角仍維持著相對的穩定性。這第三角在本文中即是現代性，並在不同時期裡更細緻地化為不同的道德視域。也就是說，文章中所呈現的中國想像，即使具有針對性地是為了鞏固或挑戰特定政權的事件，或於特定的情勢裡在「我群—他者」的關係中從事道德的競爭，但競爭時的道德視域及其論述—不管是以意識型態，或烏托邦的方式表現出來—都參照著具有長時期性質的現代性。現代性具有穩定性，由它所生成的道德視域，即使會由於共時的「我群—他者」之關係的變化而不同，或在歷時的不同時期之間有所差異，但其中仍具有連續性。因此，文中提到的個人雖然面對著不同的情勢，提出的論述也分屬不同的事件，但仍可依據現代性而看到其中的連續性：蔡培火在威權時期裡想像的中國，仍與日治時期一樣，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社會道德，即愛好和平。唯對應著國共內戰的情勢，在中華文化裡再加入「亂時則以殺身成仁為志尚」的特質；從硬性威權到軟性威權之間，牟宗三雖然在「自由中國—共產中國」的對抗之外，加入了「中華民國—台灣」的軸線，但經濟發展還是其中的核心價值；民主轉型前後，龍應台分別強調了政治自由及經濟自由兩種不同的道德視域，但自由仍然是主題，並都生成於「西方—東方」的隱喻之中。

此外，加入了現代性的第三角、配合著「西方—東方」的隱喻，不僅可理解現代性何以能解決東方主義的困境，也能回答自我東方化是如何進行的：Said雖在《東方主義》中區分了不同時期裡對東方的想像，但因為欠缺了一個具有連續性，又能讓東西雙方並置的整體，因此得要一再地辯護他對東方主義的研究不是反西方，甚至不是為了消

解「東方」與「西方」兩個單位，而是反對本質地、實體地思考兩者，進而促成雙方的溝通與理解(Said,1999: 496-497)。因此，具總體意涵、統攝東西雙方，又有連續性的現代性，即可達成他的目的；Dirlik認為自我東方化的論述是不同於西方的東亞現代性，這雖是呈現了現代性的多元，但如果著眼於兩者的不同，而欠缺社會脈絡、沒有歷史動態地理解現代性，則正好實體化了「西方」與「東方(亞)」，繼續本質主義地思考「西方」與「東方(亞)」。自我東方化是個過程，「西方—東方」之隱喻的實質內涵會由於情勢的不同而改變，因此東亞現代性也會不同。「西方」與「東方(亞)」的內涵(現代性)是兩者在互動中的集體再現，這種關係性、動態的視野，不僅有助於呈現「東方(亞)」及「西方」之現代性的內容，還可以解釋它們為什麼會這樣或那樣地被想像著。

於是，儘管台灣民眾在不同時期裡，會因為不同的「自我東方化」，而想像出不同的中國，但種種想像均參照了現代性，並都生成於「西方—東方」的二元隱喻。基於這些具有穩定性的要素，不同的社會空間仍有溝通的可能性。另外，種種在東方化的想像中所參照的現代性，也不是客觀外在的實體，它不僅得考量「西方—東方」的隱喻在對應情勢裡的實質內涵，還要參照共時面上特定的「我群—他者」關係。於是，道德視域在不同的時期裡也就不同：日治時期，中國以參照著現代性的社會道德來想像，不僅因為當時的中國在政經層面上不容易具有道德的形象，也因為社會道德有抗日的效果，能翻轉「日本—台灣」的階序；東亞經濟發展之際則是透過儒家倫理來道德化中國，參照著經濟現代性的道德視域不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的對比裡，強化了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也試圖壓抑親近於台灣的社會空間對台獨的想望，及其背後強調政治自由的道德訴求。民主化是政治自由擅場的情境，而「中國—台灣」的階序也因此加速翻轉，並在生成台灣意識之際，也壓縮了親近於中國的社會空間。於是，參照著經濟自由的道德視域即藉著全球化的術語出現，試圖消滅台灣這符號的道德

性，並強化對中國的想望。因此，道德視域所參照的現代性不僅與當時「西方—東方(中國)」的二元性有關，更重要的是敘事者所思及的他者是誰：反日的蔡培火強調了現代性裡的社會道德；反共反獨的牟宗三，則強調其中的經濟道德；具自由主義情懷的龍應台則時而以政治自由出發，將中國當作是敵人，時而從經濟自由出發，中國變成台灣的出路，其間的差別也是因為對抗的他者不同所致。

他者不同，想像中國時所參照的現代性也不同。然而，並不能因此認為道德視域可以任意操作，沒有穩定性。道德視域所參照的現代性，具有長時期的穩定性，而「我群—他者」的關係，也不會輕易地改變。現代性一方面是「我群—他者」之間道德競爭的依據，另一方面也是兩者溝通的基礎。因此，即使道德的競爭是以爭取現代性裡的不同平面—即道德視域—作為界定象徵之有效性為目標，但這些平面終究是在同一個空間中，要道德化自身或污名他者，也都要以雙方能理解的價值，即現代性來進行。於是，即使在當下多元的情境裡會有不同的道德視域來想像中國，但現代性及其衍生的自由價值，仍是當下台灣民眾溝通的基礎。而且，本文中述及的現代性不僅是非實體、去本質的，由於它還進一步地概念化為各種道德視域，再加上「結構上的同形性」，因此讓現代性的呈現具有動態，也就不會有「無庸置疑」的價值，像是西方現代性，以理所當然的方式建立起了支配的階序，及隨之而來的傲慢與壓迫。如此一來，參照著會變動、並具有脈絡的現代性，除了能呈現不同時期裡的「東亞(台灣)現代性」，也可以現代性為理解與溝通的中介，讓不同的社會空間—不管是「西方」與「東方」，或是台灣社會裡的不同社會單位之間—的道德競爭，不致於落入眾神喧嘩的鬥爭裡。

## 結論：以參照著現代性的道德視域來「超越認同」

為能「超越認同」，本文採取、並試圖超越「族群—象徵主義」的策略。筆者一來採取了長時期的概念，並進一步以現代性來補充其內容，而「族群—象徵主義」所重視的象徵，則以結構主義現象學來詮釋。再者，根據關係主義的存有論，並結合參照於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筆者從「道德—不道德」的根隱喻出發，來理解象徵如何在「我群—他者」之間建構認同。於是，道德視域也就再現於統攝著我群與他者的總體裡，或兩者的競爭之中。道德視域參照著現代性，而現代認同的生成則是種參照著現代性的道德事實。如此一來，藉著道德視域的概念，不僅由於它與現代性的關係，而能表現認同建構中穩定的一面，還因為與他者競爭道德上的優越性是認同建構中的主題，遂使得道德視域還能呈現認同建構時的動態。如此一來，認同的建構與轉變將可藉由道德視域來理解，並以此補充「族群—象徵主義」的不足，完成「超越認同」的目標：一來，不會落入原生論或建構主義的極端，也就是固化或虛無；再者，又不會走入折衷主義的模糊，因為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不僅可在具體的方法論上，以相當科學的方式理解象徵與國族建構之間的關係，而且還緊密地結合了存有論上的關係主義。於是，不必在原生論或建構主義—兩者都可說是實體主義下的產物—之間尋求折衷，也可由於對反思的重視，而強化研究的科學性。茲以道德視域為中心，簡單說明本文在理論上的貢獻。

首先，它可回應對「族群—象徵主義」的批評，即國族與族群兩個概念的區分不清楚。認為國族與族群可以區分，即先驗地將兩者當作是實體，才有不同的本質可茲區分。本文認為，各種我群的單位都在關係中形成，並沒有先驗的本質，區分它們得回到對應的脈絡裡（Somers, 1994: 622-627）。因此，本文透過人們自身在對應情境中的想像，來呈現這些具有國族性質之我群的內容。接著，再分析那些與國

族具有換喻關係的符號，並解釋它們之所以在對應的情境裡，會讓人們思及的原因：中國在日治時期以漢族被想像著，除了它不同於和族，也因為當時對文明與否的判準，與演化論中的種族有關；在威權時期裡，中國以儒家倫理的方式被思及，不只是儒家倫理在當時被用來討論東亞的經濟發展，也因為可藉此對比中國大陸的文革，而強化國民黨政權在文化上的正統；民主轉型及鞏固時期遇上了冷戰的結束，中國威脅論與文化中國等的概念跟著出現，遂使得不同的立場借用了不同的概念來想像中國。因此，什麼象徵能有效地成就台灣民眾所認同之國族的優越感，不必非得是族群，就是以族群一像是漢族一的方式呈現時，重要的也不是漢族，而是在道德化漢族之際，是與哪些象徵進行換喻的，而它們又之所以有效的原因。

其次，特定象徵的有效性得從對應的脈絡來理解，其中不只包括了社會與象徵之間在「結構上的同形性」，就是在社會及象徵兩個各別的層面裡，也有對應的結構關係：社會層面上，是不同社會空間之間的支配與反支配的結構；象徵層次上，是「道德—不道德」的二元隱喻與其它隱喻間的換喻關係。更有進者，由「漢族—和族」、「儒教—新教」，「自由中國—共產中國」，或者是「文化中國」及「中國威脅論」等概念所組成的種種二元隱喻，不僅都生成於特定的社會結構，並對應於種種「道德—不道德」的隱喻及道德視域裡，它們還會回過頭來，試圖重構、再生產，或挑戰既有的社會結構，參與對應情境裡的支配與反支配的鬥爭。在鬥爭之間，道德視域不只是組織符號、生成意義的框架，它也界定了道德與不道德，或正當與不正當的內容。於是，行為者即宛如修補匠(*bricoleur*)般地操作符號，他們不僅是能動的、還多少是有意識的(Lévi-Strauss, 1989:23; 2006: 213)，因為行為者會從工具箱(*tool kit*)中拿出種種的象徵，進行鞏固、重組或翻新道德的工作(Swidler, 1986)。因此，一方面不會有文化決定論的問題，也避免了國族的界線在原生論的視野下固化的危險；另一方面，種種對道德的生



產與重組，也都有象徵有效性的問題，即對應於象徵內部、社會關係，及象徵與社會之間的「結構上的同形性」。因此，也可消滅建構主義之分析策略的流動性。

接著，道德視域還能回應當下社會科學裡試圖超越「結構—行為者」之二元對立的想望。道德是種結構，但它不是客觀、外在的社會結構，而是具主體間性的認知架構。基於「人的道德雙重性」(Homo duplex)(Durkheim, 2006:177-188)，道德視域即於外在性內化與內在性外化的流轉之間，不似社會結構般的生硬，但又能呈現時代的集體性。於是，行為者並不能化約為單純的個人，而蔡培火、牟宗三或龍應台所述及的中國，也不是私人的妄想，而是種具有公共性的集體再現。這不僅因為其想像在社會中生成，且為公共敘事(public narrative)(Somers,1994: 619)，也由於本文對這些想像的詮釋，還參照著具有集體性的長時期與情勢等的概念。另外，再加上象徵有效性的說明，也讓道德視域具有超越「結構—行為者」之二元對立的可能，因為人是在對應的情境裡，操作者為社會所給定了意義的象徵；更有進者，道德視域雖是生成於具有一般性的文明歷程，但也照顧到了台灣的特殊性，因此可有效地消解「一般性—特殊性」的對立；最後，與中國這符號換喻的其它隱喻系統，不僅得考慮到它們在台灣社會裡的有效性，還需參照著現代性。因此，在符號運算間所呈現的道德，不會像理性或利益的概念一樣包山包海，總可以後見之明地為某個行為找到理由，將其界定為理性的，或符合利益的。於是，參照著現代性的結構主義現象學，將可避免「回溯史學」的問題，並由於其對反思性的強調，使得道德視域的概念能進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sup>7</sup>

7 現象學方法所強調的擱置、還原，即具有反思性，而在結構主義之二元的隱喻與換喻之間，不僅清楚地看到了概念的關係性，還在哲學的層次上就明白地提醒著研究者，社會生活的運作背後有個認識的框架(Hénaff, 2008:13-14)。此外，當意識到「現代性」之際，也就必然地帶有反思性。基於此一反思性的自覺，不僅提高了研究的科學性，還讓人能成為知識的「主人與擁有者」(maîtres et possesseurs)(Bourdieu,

強調人在對應情境中的道德判斷，還是反思當下認同政治的策略：理論上，它試圖掙脫出相對主義的虛無與種族中心的偏執兩個極端；實務上，是為了讓台灣社會能跳出統獨的對抗、不再膠著於「中國—台灣」二元參照的糾結。道德是相對穩定的，這是脫離虛無的出路。但這並不代表道德就是正確的，得要去接受，而是要理解、體會，以致於去承認不同世界裡的道德視域，這是良善溝通的基礎。這時候的良善溝通，已不只是人際之間的「互動」(inter-action)，因為對不同道德視域的體會，是主體間的「交互行動」(trans-action) (Emirbayer, 1997: 283-287)。此一交互行動之所以可能，除了要認識到「自我(我群)—他者」的關係性之外，還是以「開放人」(Homines aperti)的角度來理解人的存有。<sup>8</sup>然而，人的開放性並不一定會去認識與承認不同立場的道德視域。對世界的開放也可能相反地造成了人的恐慌、不安，及對他者的憎恨，並在道德的競爭中，藉由妖魔化他者來道德化自身，而在「我群—他者」之間建立起本質的、生硬的界限，從社群中得到安全感。於是，諸神戰爭、你死我活，這將是最壞的情境。較好的情境，是因為開放而認識世界的多元，從中了解並接受差異、進行文化的融合與創造。此時，也就需要認識在場的種種道德視域。

#### 參考文獻

- 王甫昌，2005，〈由「中國省籍」到「台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台灣社會學》，9: 59-117。
- 王曉波，1993，〈日據時期「台灣派」的祖國意識〉。收錄於王曉波，《台灣史與台灣人》，頁11-67。台北：東大圖書。
- 石之瑜，2002，《後現代的政治知識》。台北：元照。

2001b:8)。如此一來，即可更有意識地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更良善的溝通。

8 「開放人」是個與「封閉人」(Homo clausus)對立的概念。前者是關係主義之存有論的基礎，而後者則是實體主義對人的預設(Elias, 2005: 28)。

- 石之瑜，2003，〈「復興基地」論述的再詮釋：一項國家認同參考指標的流失〉。《遠景基金會季刊》，4(4): 37-66。
- 牟宗三，1983，《中國文化的省察》。台北：聯經。
- 牟宗三等，1958，〈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民主評論》第9卷第1期。
- 吳三連、蔡培火等著，1980，《台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
- 吳叡人，2006，〈福爾摩沙意識型態：試論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民族主義運動「民族文化」論述的形成〉。《新史學》，17(2): 127-216。
- 張茂桂、吳忻怡，2001，〈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收錄於林佳龍、鄭永年主編，《民族主義與兩岸問題》，頁147-180。台北：新自然主義。
- 蔡培火，2000a，〈漢族之固有性〉。收錄於張漢裕主編《蔡培火全集(二)：政治關係——日本時代上》，頁89-94。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蔡培火，2000b，〈中華文化之特色〉。收錄於《蔡培火全集(七)：政雜文及其他》，張漢裕主編，頁137-140。台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蔡惠萍，2002，《龍應台當官：一個記者的三年採訪實錄》。台北：聯經。
- 劉永華，2006，〈費雷、夏蒂埃、雷維爾：「超越年鑑派」〉。收錄在Burke, Peter, 劉永華譯，2006，《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 1929-1989》，頁1-XXIV。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劉名峰，2009，〈台灣民主轉型前後對正當性的認知及其變遷：以龍應台作品中對「中國—台灣」之象徵形式的再現為例〉。《台灣政治學刊》，13(1): 225-268。
- 龍應台，1985a，《龍應台評小說》。台北：爾雅。
- 龍應台，1985b，《野火集》。台北：圓神出版社。
- 龍應台，1996，《乾杯吧，托瑪斯曼》。台北：時報出版社。
- 龍應台，1999，《百年思索》。台北：時報出版社。
- 龍應台，2003，《面對大海的時候》。台北：時報出版社。
- 龍應台，2005/03.17，〈請問雅典在哪裡？(下)〉。查閱時間：2009/04/01。  
<http://forums.chinatimes.com.tw/report/lonin/94031710.htm>
- Barclay, Kate (2006) Between Modernity and Primitivity: Okinawan identity in relation to Japan and the South Pacific.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2(1): 117-137.
- Barthes, Roland, 李幼蒸譯，1991，《寫作的零度》。台北：時報。
- Bourdieu, Pierre (1986a) Habitus, code et codificatio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64(1): 40-44.
- Bourdieu, Pierre (1986b) The Form of Capital. pp. 241-258,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Richardson, J. G., New York: Greenwood.
- Bourdieu, Pierre (1987) *Choses dites*.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1989) *La Noblesse d'Etat: Grandes Ecoles et Esprit de Corps*. Paris: Minuit.
- Bourdieu, Pierre (2001a) *Langage et pouvoir symbolique*. Paris: Seuil.
- Bourdieu, Pierre (2001b) *Science de la science et réflexivité*. Paris: Raison d'agir.
- Bourdieu, Pierre, 蔣梓驊譯, 2003, 《實踐感》。北京: 譯林。
- Brubaker, Rogers & Cooper, Frederick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1-47.
- Calhoun, Craig (1991) Morality, Identity,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Charles Taylor on the Sources of the Self. *Sociological Theory* 9(2): 232-263.
- Chang, Mau-Kuei (2003) On the Origins and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ese National identity. pp.23-58, in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aiwanese Identities*, edited by Katz, Paul R.& Rubinstein, Murray 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rossley, Nick (2004) Phenomenology, Structuralism and History: Merleau-Ponty's Social Theory. *Theoria* 51(103):88-121.
- Dirlik, Arif (1996)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 *History and Theory* 35(4): 96-118.
-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 Dumont, Louis, 王志明譯, 1992, 《階序人: 卡斯特體系及其衍生現象》。台北: 遠流。
- Durkheim, Emile, 渠東譯, 2002a, 《社會分工論》。台北: 左岸文化。
- Durkheim, Emile, 梁棟譯, 2002b, 《社會學與哲學》。上海: 人民出版社。
- Durkheim, Emile, 汲喆等譯, 2006, 《亂倫禁忌及其起源》。上海: 人民出版社。
- Elias, Norbert (1997) Group Charisma and Group Disgrace. pp.104-112, in *The Norbert Elias Reader: A Biographical Selection*. edited by Goudsblom, Johan & Mennell, Stephen, Oxford: Blackwell.
- Elias, Norbert, 袁志英譯, 1999, 《文明的進程: 文明的社會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北京: 三聯。
- Elias, Norbert, 翟三江、陸興華譯, 2003, 《個體的社會》。南京: 譯林。
- Elias, Norbert, 劉佳林譯, 2005, 《論文明、權力與知識》。南京: 南京大學。
- Elias, Norbert & Scotson, John L. (1965)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Frank Cass & Co.
- Emirbayer, Mustafa (1996) Useful Durkheim. *Sociological Theory*, 14(2):109-130.
- Emirbayer, Mustafa (1997) Manifesto for a Relation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3(2):281-317.
- Hall, Stuart (1992)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pp. 275-320 in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edited by Hall, Stuart & Gieben, Bra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Hénaff, Marcel (2008) *Claude Lévi-Strauss: le passeur de sens*, Paris : Editions Perrin.
- Jaffrelot, Christophe (2003) For a theory of nationalism. *Questions de Recherche* 10:1-51.
- Jalata, Asafa (2001) Ethno-nationalism and the global 'modernising' project. *Nations and*

- Nationalism* 7(3): 385-405.
- Kahn, Herman (1979)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79 and Beyond*, London: Croom Helm.
- Kultgen, John (1975) Phenomenology and Structuralis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71-387.
- Lafuente, M. A. C. (2006) Social Imagination and History in Paul Ricoeur. *Analecta Husserliana* 90:195-222.
- Lamont, Michèl & Molnár, Virág (2002) The Study of Boundar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8: 167-195.
- Levenson, Joseph R. (195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évi-Strauss, Claude, 李幼蒸譯, 1989, 《野性的思維》。台北：聯經。
- Lévi-Strauss, Claude, 渠東譯, 2005, 《圖騰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Lévi-Strauss, Claude, 張祖建譯, 2006, 《結構人類學(1)》。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Lyotard, Jean-François (1999)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 PUF.
- Mannheim, Karl, 張明貴譯, 2005, 《意識型態與烏托邦》。台北：桂冠。
- Mennell, Stephen (1994) The Formation of We-images: A Process Theory. pp.175-197,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alhoun, Craig J., Oxford: Blackwell.
- Mucchielli, Alex (2003) *L'identité*, 6th edition. Paris: PUF.
- Pharo, Partick (2004) *Morale et Sociologie*, Paris :Gallimard.
- Özkirimli, Umut (2000)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Y: St. Martin Press.
- Ricoeur, Paul (1986a) *Du texte à l'action: Essais d'herméneutique II*, Paris: Seuil.
- Ricoeur, Paul (1986b)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edited by Taylor, George 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aid, Edward, 王志弘等譯, 1999, 《東方主義》。台北：立緒。
- Shih, Chih-yu (2007) Constituting Taiwanese Statehood: the World Timing of Un-Chinese Consciousnes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3): 699- 716.
- Smith, Anthony, 葉江譯, 2006, 《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型態、歷史》。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 Somers, Margaret R. (1994) The 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Identity: A Relational and Network Approach. *Theory and Society*, 23(5):605-649.
- Somers, Margaret R. & Gibson, Gloria D. (1994) Reclaiming the Epistemological 'Other': Narrative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dentity. pp.37-99,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ited by Calhoun, Craig J., Oxford: Blackwell.
- Stasch, Rupert (2006) A Society through Its Other.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9(2): 325-334.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73-286.
- Racine, Luc (1999) Les formes d'action sociale réciproque :dyades et triades.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31 (1) :77-92.

Taylor, Charles (1989) *The Sources of Self*,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Victor, 趙玉燕等譯, 2006a, 《象徵之林：恩登布人儀式散論》。北京：商務。

Turner, Victor, 黃劍波、柳博贊譯, 2006b, 《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Turner, Victor, 劉珩、石毅譯, 2007, 《戲劇、場景及隱喻：人類社會的象徵性行為》。北京：民族出版社。

Wang, Horng-luen (1999) *In Want of a Nation: State, Institutions and Globalization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inckler, Edwin A. (1984)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n Taiwan: From Hard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The China Quarterly* 99: 481-499.

土懷舊與洋復古  
當代台灣流行媒介的歷史想像\*  
李依倩\*\*

Native Nostalgia and Western Retro  
Historic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s Popular Media  
by Yi-Chien LEE

關鍵字：懷舊、復古、歷史記憶、文化資產

Keywords: nostalgia, retro, history and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

收稿日期：2008年2月14日；接受日期：2009年2月16日。

Received: February 14, 2008; in revised form: February 16, 2009.

\* 感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兩位匿名評審的諸多犀利提問與中肯建議，使本研究能以較為充實與完整的樣貌呈現。

\*\* 服務單位：東華大學華文系

通訊地址：974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1號

E-mail: salisbury@mail.ndhu.edu.tw

## 摘要

二十世紀末興起的全球性懷舊風潮在本世紀初繼續延燒，成為當代大眾歷史想像的重要來源。在台灣的媒介舞台上，兩大懷舊主題並肩而立，本土常民懷舊與西洋時尚復古——簡稱土懷舊與洋復古。本文檢視近十年以此兩者為主題的書刊文本，分析其形式內涵之異同，探討兩者各為何種當代需求所形塑，而這對本土歷史想像的建構又有何啟發。本研究發現，懷有本土主體重構與記憶恢復等宗旨的土懷舊注重地方產製、傳統建構、常民文物與歷史延續，而資本主義利潤追求導向的洋復古則強調區隔明確的十年斷代及其各自之風格、元素、象徵以及速成歷史和即食記憶。土懷舊與洋復古雖各有追求，但當代流行性印刷媒介的主要形式卻對兩者帶來齊一化效果，產製出大量光鮮亮麗的歷史擬像。最後，由於土懷舊與洋復古之間的關係可類比於歷史與個人懷舊，兩者共同呈現出一幅分裂而混雜的過往全景，同時亦指出當代台灣歷史圖像的匱缺與潛能何在。

## Abstract

The nostalgia trend that emerged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ultural theme in this century. In Taiwan's popular media, there are two major nostalgia themes: the native nostalgia that looks back on the "old Taiwan" of the 1950's-1980's and the fashion retro that features the 20's-90's Western styles. This paper examines popular texts published in this decade, analyzing the similarities of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ative nostalgia and the Western retro, looking for the forces that help shaping them, and consider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historical imaginat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are as the following: First, with the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native subjectivity and history, the native nostalgia emphasizes artifacts, places, traditions, and historical continuity, while the Western retro that is mainly driven by capitalist profit pursuing motives focuses



on clearly differentiated periods with unique atheistic elements, symbols, and styles, as well as instant history and fast food memory. Secondly, regardless of nostalgia's and retro's individual motives, the dominant format of contemporary popular print media has a homogenizing effect on the appearances of both types of texts, thus producing numerous glossy images of historical simulacrum. Third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ative nostalgia and the Western retro is parallel to that of personal and historical nostalgia; together, they form a hybrid and fragmented topography of the past that points to the potential and the lack of Taiwan's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imagination.

## 一、導論：研究緣起、問題與方法

1990年代末期，人們一面提出各種新世紀願景，同時卻又不斷回望二十世紀，懷舊之情油然而生。二十一世紀初的今天，先前描繪的新烏托邦尚無可跡可覓，懷舊風卻越演越烈，成為當代流行文化的特色之一：報章雜誌、影視動漫、餐飲娛樂、觀光旅遊等各部門競相提供各種以懷舊為主題的內容、商品與服務。

這股新世紀懷舊風可根據其時空架構粗分為兩大主題：一邊是民國四十至七十年台灣本土常民的，另一邊是西元20至80年代歐美流行時尚的——為利於討論，之後將分別簡稱為土懷舊與洋復古。

社會趨勢觀察者、文學批評者、傳播研究者皆對上世紀末懷舊主題的風行加以評論(Stern, 1992)。根據Evans(2000)，持負面看法者認為在復古懷舊之類的歷史迷醉中，80與90年代歷史被剽竊來製造後現代嘉年華，被淘空意義的歷史因而破產，只能為古裝劇與幻想所用，但亦有學者認為：與其批評復古懷舊對某一被假設為客觀實存的歷史造成扭曲與破壞，不如從中觀察當下的我們基於什麼需求而建立何種框架以回顧往昔。

約半世紀前 Halbwachs(1950/1992)談論集體記憶時就曾提出，對過往的回憶受限於當下的框架，而當下的框架又往往是基於現今的集體需求而建立。較晚近的時尚研究中，亦有多位學者發表類似看法：Zenderland(1978)曾討論非歷史學者如何召喚過往以便訴說當代關懷，Lehmann(1999)則認為時尚利用歷史引述法在裁縫式記憶中重書自己的主題和母題、在當下活化過去，而Evans(2000)亦主張當代時尚是透過對現今趨勢的精準目光來選擇歷史影像的——研究雜誌時尚書寫如何透過符號組構表達意義的學者曾對此一過程加以說明，並探討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Barnard, 1996)：在時尚這個高能見度的文化工業部門，作為文化創新者的設計師以及擔任文化仲介角色的編輯、

記者、買家等，秉持相仿素養、沈浸於相同事物中，並在同樣地點尋找靈感來源、試圖捕捉當下情懷，因此不約而同扣入同樣的文化潮流；文化仲介者捕捉新興品味後，透過傳媒設定風格、賦予意義並加以促銷，對消費者日常穿著的選擇給予建議，並提供合理化基礎(p. 238)。

受到上述論點啟發，本研究欲探討復古懷舊風潮中大眾歷史想像的媒介建構；確切研究問題如下：(1)土懷舊與洋復古皆回望過去；交互對照下，兩者展現出哪些內容與形式上的異同？(2)土洋復古懷舊是由何種全球性與地方性因素所推動的？(3)整體來看，在當代流行媒介的歷史想像版圖中，土懷舊與洋復古關係為何？從中可以發掘出哪些有關本土歷史建構的議題與潛能？

本研究終極目標並非解構媒介復古懷舊，而是試圖理解使復古懷舊得以形成的歷史動力與當下機制，並思考在全球經濟體系與西方文化霸權下的本土文化再現面臨何種困境與契機，而我們在此種狀況下應有何種思維與作為？

為回答上述問題，本研究選取近十年內在台發行之流行性書刊復古懷舊專題，從事比較性文本分析。採取比較法的理由如下：(1)可對全球文化政治下本土的當代大眾歷史想像有較為全面的關照；(2)土懷舊與洋復古交互對照，將使兩者各自特色與相互差異清晰浮現，有利於對兩者關係及動力的後續探討；(3)可藉洋復古的對照以及土洋兩者間的互動，發掘本土歷史圖像的發展潛能與侷限。

復古懷舊主題廣見於各類媒介，由於媒介為當下大眾歷史認知的主要來源，我們有必要對這個呈現方式所建構出的歷史想像詳加檢視。雖然本文後半段討論本土整體歷史圖像時，會旁及其他各相關部門如教育與學術、政治與法律、網路媒介與文化創意產業等，但還是以書籍與雜誌類印刷媒介為主要檢視對象。<sup>1</sup> 從方法層面來看，此類文

1 報紙出版量與資訊量極大，報導過於龐雜、繁瑣與零散，故未被設定為本研究主要

本具有可大量複製、持久穩定、圖文並茂、提供足夠篇幅供復古懷舊情愫開展等優點。在理論方面，對當代懷舊這種嘗試建構國族意識的歷史想像(李依倩, 2006)，印刷媒介有其特殊性：根據Anderson (1991；吳叡人譯, 1999)，資本主義將形形色色的口語方言組合起來，創造了機器複製與市場擴散的印刷語言，使想像的共同體成為可能——以報章雜誌而言，人們在約莫相同的一個短暫時期內大量消費同類書刊，對一個匿名的共同體滋生「不尋常的信心」(p.36)，長久下來奠定了民族意識的基礎。

由於當今復古懷舊具有強烈的流行性，因此並未平均分佈於各類書刊中，而是以雜誌為最多數，其次是與雜誌性質相近的MOOK<sup>2</sup>，且此兩者亦為土懷舊與洋復古分庭抗禮的共同平台。至於書籍類數量極少，且多懷舊少復古、出版年代較早、執筆者年齡較長、形式相對單純(較未如雜誌與MOOK般受當代跨國媒介高度影響)，可為土懷舊提供些許歷時性的觀察，至於土懷舊與洋復古間則大致上是共時性的對照。

復古懷舊主題的雜誌與MOOK多為消費導向，但當今消費不只滿足民生需求，也是產製、維繫與再製社會關係的手段。由於人們的消費選擇是對某個價值體系之體現與維繫，所有物品都有意義；對物件的選擇既源自文化，也具有創造與改造文化的潛能，故消費行為的累積可構成文化的產製與變遷(Storey, 1999)。至於文本的大眾流行性，可分兩個層面來看。在文化與傳播層面，復古懷舊被文化創新者與仲介者視為當下主要情愫之一而加以捕捉與重構，接著透過享有一定銷售量的生活休閒或流行時尚類刊物廣為流傳，並經由風格設定與日常

---

檢視對象。

- 2 MOOK為magazine與book兩字所重組而成，即所謂「慕容」或「雜誌書」，為日本所創之文少圖多、論述少資訊多的流行情報誌。本研究中的《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7-Watch 情報誌》、《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等皆屬此類。由於土懷舊比洋復古具有更強烈的在地生活實用性，故MOOK以前者為主。

消費性選擇而影響大眾的物質與精神層面，使復古懷舊得以體現與延續。

在主題與銷售層面，復古懷舊專題最常刊載於生活休閒與流行時尚類雜誌，而根據新聞局歷年出版年鑑所引用的全台最大連鎖書店金石堂之銷售排行榜，<sup>3</sup>此兩類長期分居一、二名，兩者共佔整體銷售量至少45%；另，本研究分析部分所引用之文本範例，除凝聚與體現眾文本共有特色外，其來源刊物往往在月刊或週刊類之整體或分類年度銷售排行榜名列前茅。<sup>4</sup>

為說明復古懷舊在各雜誌中的出現頻率、比例與所屬單元類別等概況，本研究檢閱2007年《壹週刊》、《Taipei Walker》、《Here》、《VOGUE》四本雜誌(請見附錄一)。<sup>5</sup>《壹週刊》從2001年出刊以來，每期都有「老字號」專欄，報導全台各地的傳統飲食店家之歷史故事、經營策略與產品特色，2007年從293至344共52期亦不例外。而《Taipei Walker》一年十二期中有五期含有明確的復古懷舊內容，多數位於有關餐飲、時尚或旅遊的專題或特集且有關於台灣特定地點(台南、三峽、鶯歌、湖口等)；《Here》雜誌及其特刊《Here Plus》於2007共出版十五期(例刊十二期，特刊三期)，其中至少六期含有復古懷舊內容，多位於有關飲食與休閒旅遊的特集或專題中(沒有時尚)；有三期在主題就已設定懷舊基調，另外四期則於子題點出懷舊；除有一期關於香港外，其餘皆報導台灣各地。《VOGUE》一年十二期中至少十期出現有關復古懷舊的報導，大多有關於復古時尚(時裝最多，珠寶髮型化妝其次，偶有餐飲休閒)；60年代最多，20、30、50、70、80亦曾出

3 2003年至2007年出版年鑑，請見<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18902&CtNode=3760&cmp=3>

4 如《壹週刊》在週刊雜誌類向來高居第一；《美人誌》、《Elle Girl》等居月刊雜誌總排行前十甚至前五名；《Taipei Walker》與《Here》為生活休閒類一、二名。

5 第一本為週刊，其他三本為月刊；前三本為生活休閒類，最後一本為流行時尚類，但前兩本每期皆有時尚報導。

現，其他還有歐洲中世紀、日本江戶時代、十五至十七以及十九世紀等；標題多半未標明地點(尤其關於美國者)，少數有標明者(如日本、越南、荷蘭、巴黎等)於內文中亦少見對該地之詳盡報導。

復古與懷舊的競爭與分工，也可從後三本雜誌窺見：因潮流設定者多為歐美設計師，流行時尚多為復古所主導；旅遊因以國內為主，懷舊在此佔上風，雖旅途中各餐飲住宿據點也可能走復古風；餐飲則為復古懷舊分庭抗禮之地，從菜色口味至空間裝潢兩者均各有擅場又相互競爭；至於這三本雜誌較少提及的休閒娛樂亦同，如音樂方面的西洋老歌與台灣懷舊金曲，另外在影視動漫電玩等則另有東洋勢力浮現。

最後要說明的是本研究分析要點：流行媒介復古懷舊文本大多是一系列編輯策略與意識型態構成的框架所形塑的，而此框架可從文本的結構形式加以觀察，本研究因此向結構敘事學與符號學尋求分析工具與策略。但因欲從事全面性關照，故不傾向於套用一整組既定方法步驟對單一文本從事細部分析，而是從大量龐雜文本中揭示出共通、整體的原則及架構。

敘事學方法針對故事敘述與敘事素材這兩個層次各建議了一組分析重點，前者包括順序安排、節奏、頻率、行為者／人物、地點／空間與聚焦，後者則有事件、行為者、時間(內在時限)、場景(Bal, 1997)；Stanford(1994；劉世安譯，2001)突顯歷史敘事特色時檢視的敘事成分包括：主題、事件、角色、場景、系列(即順序安排)、情節、逼真、內在時限等；而Stern(1992)分析廣告如何運用個人懷舊與歷史懷舊主題時，曾顯示兩者差異如何表露於場景(時間與地點)、情節(事件序列)、角色(有所行動的人物)、行動(事件本身)、價值(角色道德特色)與調性(作者或角色對人已與社會整體的態度)等結構形式面向。本研究參考上述作法，再依據當代台灣復古懷舊文本的特質，將結構形式的觀察重點調整為時空策略(其中包括了地點、空間、

內在時限與順序安排)、年代建構、氛圍(並論及場景)、人物與訴求，並據此分析土懷舊與洋復古各自與共通的形塑框架與呈現策略。

由於本研究試圖揭示復古懷舊的意義如何經由某個特定再現系統、某些特殊文字與影像建構而出，因此也參考了Barthes(1957/1972)的神話解讀方法，因其有助於指出大眾文化的文本與實踐中流行神話之表意過程，以及在精心安排的看似不言自明事物中，可能有何隱而不顯的意涵。根據Barthes，神話有三種解讀法：(1)神話製造者聚焦於空洞的符號具，讓概念穩固地充斥於形式中；(2)神話讀者將符號具視為意義與形式所構成的不可分割整體，得到模稜兩可的表意；(3)神話學家關注飽滿的符號具，區辨出意義與形式，以及一方加諸於另一方的扭曲。雖然本研究源起於第二種讀法，但分析時主要仰賴第三種的解碼式讀法，並將神話還原至兩端：較少論及的一端是神話原貌，較重要的一端是第一種讀法，亦即神話製造者的意圖與方法。至於確切的符號分析步驟，茲簡述如下：對於文本表面，先建立外延意義(denotation)清單，盡可能包含所有文字與影像，並突顯其建構過程；接著據此繼續探索更高層次的內涵意義(connotation)、迷思及其指涉系統等問題：哪些外延意義構成了內涵意義？這些文字與影像指涉了什麼？而促使它們如此被詮釋的文化結構是什麼(Penn, 2000)？礙於篇幅，分析之執行過程將不一一詳列，而以摘要方式報導結果。<sup>6</sup>

雖然文本在內容意涵或結構形式面向均提供豐富線索，但不能完全藉此推知帶動復古懷舊風潮並建構回顧過往框架的當代需求。由於復古懷舊不僅是建構於文本中用以表意的符號系統，也是一種社會經濟實踐，因此亦需將文本置於外部情境下考量其論述性質。根據

6 儘管採摘要式報告，由於結構式分析力求詳盡完整，而本研究又採比較法，必須在復古懷舊間持續往返，因此本文仍不時有繁瑣之嫌；且在結構式分析下，亦可能有化約含糊曖昧、幽微精深之處並過於突顯二元對立的疑慮，雖研究者於執行分析時對此保持警惕，但終究難以完全避免，是為本研究可能限制之一。

Titscher (2000)等學者，作為可數名詞的論述是一種「從特定觀點將經驗加以表意的方式」(p. 148)——本研究首先將關注文本最大發行平台之國際中文版時尚雜誌，探究其宗旨目標與策略方針所產生的影響，接著將耙梳近代全球普遍性與台灣本土性歷史脈絡，尋找土洋復古懷舊得以生成的動力所在，以利最後對全球文化經濟體系下當前與未來的本土歷史想像發展進行全面性的思考。

## 二、分析

### (一)關鍵字：「懷舊」與「復古」

土懷舊與洋復古的異同首見於兩者關鍵字及其概念。土懷舊偏好的首要關鍵字當然是「懷舊」，而「懷念」、「老」、「古早」、「台灣」這幾個確立時空與傳達情感的字詞也頻頻出現，和「懷舊」排列組合、交互運用於書名、標題、內文、圖片說明等各處，例如《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尖端編輯部，2003)、《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劉立雯等，2003)、〈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探索小城故事》，2004)、《台灣老字號》(張尊楨，2004)、《老台灣柑仔店》(蕭學仁，2003)、《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黃金財，1998)、《看見老台灣》(張建隆，1999)、《懷念老台灣》(康原、許蒼澤，1995)、〈訪古懷舊情〉(《Taipei Walker》，2002.8)、《Here》雜誌的〈大台北懷舊地圖〉(藍麗華等，2003.2)。文本藉由這些關鍵字的排列組合宣示其所回顧、再現與重構的人事物均奠基於本土歷史記憶，和讀者的親身經歷息息相關——尤其是食衣住行等常民文化層面。

相對的，以歐美流行時尚姿態現身的洋復古，除了不時穿插運用「懷舊」這個字眼，更常使用的是「復古」，或是由此變化衍生而出的「仿古」、「玩古」、「玩舊」：如〈秋日復古嬉遊記〉與〈流行玩復古〉(《Elle Girl》，2004.10)、《壹週刊》的〈玩舊穿新〉(邱冠旭&沈家如，



2004.2.5)、《DIY玩佈置》的〈50's-70's Retro Styles復古佈置新風潮〉(莎琳娜, 2003.9)、《Holiday》的〈復古追擊全記錄〉(CAT, 2003.11)、〈閃耀復古浪漫〉(《Elle》, 2003.9), 〈Reprint 60's復古四色輸出〉與〈Reissue復古球鞋時髦大步走〉(《GQ》, 2004.4)、《美麗佳人》的〈時尚特輯: 60復古狂潮A-Z〉(楊茵潔、陳為樂, 2007.3)。

那麼, 在土洋兩派中各領風騷的兩大關鍵字「懷舊」和「復古」各為何義? 有何異同?

「懷舊」(nostalgia)一詞在十七世紀首度出現時原指思鄉病, 表達的是出征在外的士兵對家園的渴切懷想(洛楓, 1995; Boym, 2001; 張英進, 2001), 至十九世紀時為了描述現代化進程中劇烈社會變動所引發的普遍心理反應, 轉而指涉對已消失事物或過往黃金時代的眷戀(Frijda, 1994; 廖炳惠, 2003)。這一層因應時代變遷而衍生出的新義在韋式大字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有著細膩的解釋: 懷舊是一種帶點感傷意味的憧憬; 明知不可能卻依然渴望的是回返並再次體驗記憶中的某段快樂時光……

另一方面, 復古(retro)相形之下就只是較為單純地「向後看」或「往回看」, 其引伸義在英文上要不是「直指過去風格的時尚」, 再不然就是「和過去的風格、時尚有關的」, 或是「將過去的風格、時尚加以呈現」; 法文意義亦同, 若非表示向後追溯的意思, 就是「仿古式(的)」、「舊潮(的)」、「老式(的)」(可做名詞或形容詞)。

由此看來, 懷舊和復古的差別首先在於後者較傾向於時間性, 前者則由於時代變遷而累積及衍生出地理空間與歷史時間的多重意涵。然而, 更重要的差異卻是在於前者有相當程度的情感涉入(某種難以釐清但又黏稠濃密的複雜情愫)以及明知不可能但仍意欲回歸的慾望, 相形之下復古較像是不帶多餘感傷的冷靜回顧, 對過往的態度並非渴望回歸與恢復而是加以創造性再現或重構, 且其再現與重構並非全面性的, 往往僅限於時尚風格, 而非時代與生活的整體。

## (二)時空策略

基本上同樣回望過往的土懷舊與洋復古，在關鍵字的選用上帶出了基調的差異，此外，兩者建構過往年代的策略亦呈現多種異同。首先，在時空界定上，洋復古多以一或多個十年斷代或時尚風格和美學意識作為主題，很少說明其所回顧之過往的地域範圍或國家屬性。如〈時尚特輯：60復古狂潮A-Z〉(楊茵潔、陳為樂，2007.3)、〈50年代甜美淑女〉(《美人誌》，2004.9-10)、《壹週刊》的〈武車飛仔火拼偉士牌少年〉(沈家如，2003.11.6)、《Madame Figaro》的〈回到復古的未來〉(Hu & Wang，2003.10)。但觀其內容，以歐美為主軸的文化象徵充斥其間，如〈時尚特輯：60復古狂潮A-Z〉中的貓王Elvis Presley、披頭四(Beatles)、安迪沃荷(Andy Warhol)、普普藝術、倫敦名模崔姬(Twiggy)、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伍斯塔克(Woodstock)演唱會、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電影《2001太空漫遊》、紐約的契爾西旅館(Hotel Chelsea)。看似時尚無國界的普遍性標題下，其實是帶有特殊地域與國家屬性的年代回顧。

相對於洋復古，土懷舊在地理空間上就有著明確的標示，文本通常會在書名或篇名上標示著「台灣」，如《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黃金財，1998)、《懷念老台灣》(康原、許蒼澤，1995)等，其內文若非對台灣做整體性的過往回顧，就是對台灣各縣市鄉鎮從事個別回顧，例如《Here》雜誌的〈大台北懷舊地圖〉對淡水、三峽、九份、深坑、士林、金山、平溪等地進行分區探索(藍麗華等，2003.2)，而《7-Watch 情報誌：探索小城故事》(2004.5)則造訪鶯歌、美濃、埔里、大溪、北埔等地，兩者都可被視為土懷舊空間產製的典範：總是將台灣某一區分為數個地方，各自敘述其歷史、描繪地景、介紹名勝古蹟、老字號、傳統文物、地方特產等。

上述作法中，年代圖像或許因而繁複多元，然而區域的整體性卻也遭到壓抑，且某些地區如淡水、九份、鹿港、台南等似乎成為台灣

歷史記憶的慣常負載者；地方彷彿自成一小型封閉體系，各具獨特文化傳承與歷史記憶，然而最終所呈現出來的眾多過往間其實有相當程度的一致性（表現在常民文化各層面），只不過文本卻以一種未必斷裂但卻互不相干的方式加以鋪陳，使原先企圖經由懷舊營造的本土歷史延續性面臨被空間的切割加以破壞的危險。

概括而言，洋復古與土懷舊在空間策略上呈現了有趣的對照：前者在標榜台灣在地性之餘，尚將之切割為眾多地方分區處理，使年代圖像更為繁複繽紛，但歷史延續性與區域整體性可能因此削弱；洋復古則將地域與國家屬性隱藏於普遍性的外衣下，消弭地理疆界，試圖以缺乏明顯空間性格的鮮明時間層次建構出看似全球共通的過往，而歐美近代在全球地緣政治上的主宰性以及流行文化上的霸權力量則被裹覆其間。

除空間組織外，土懷舊和洋復古在時間策略上也呈現了微妙的異同。兩者回顧過往年代時皆常以十年為單位，後者探索20至80年代（甚至可延伸至90年代），前者所追憶的是50至80年，大約是從戰後國府遷台直至解嚴前後，和後者比起來，似乎短少前三十年與後十年。其實，50年代前的日治時期並未被排除在回憶框架外，但或許是早年戒嚴時期長久壓抑而延續至今的習慣性沈默所致，通常不予標明，而是含糊籠統地概括於「古早」一詞下；至於後十年，是洋復古在晚期資本主義流行時尚瞬即汰舊換新的機制下，永遠渴求新文化資源的挹注，因而連才過沒多久的90年代也迅即成為可回收利用的「古老過往」。

土懷舊和洋復古似乎都將十年斷代視為理所當然，從未說明其源由或合法性，且往往從連續性的歷史時間中任意抽出一或多個十年進行個別探討，例如〈新摩登60〉（《Men's Uno》，2003.11）、〈重返美好60's〉（蕭景引，《柯夢波丹》，2007.4）、〈50年代的懷舊氛圍〉（《時報週刊》，2003.10）、〈打造50's 甜美淑女〉（《美人誌》，2004.9-10）等。即使

連續的兩個十年同時出現，其前後關連亦甚少被探討。

若數個十年斷代同時出現於同一文本，則時序往往是混亂的，並置、斷裂、錯時者居多，順時排列者反而是少數，而且通常只出現在位居版面邊緣的年表中。土懷舊可以《老台灣柑仔店》(蕭學仁，2003)一書為例：日治時代的菸酒專賣櫃、黑松企業1955-1971年間所使用的鐵牌標誌、1960年代紙糊積木、1970年代棒球玩偶、1980年代出產的木馬在書中並非如此順時排列的，而是以物件為分類準則而年代在其下交錯零散，類似例子尚可見於以玩具、漫畫、電玩、音樂、服裝流行與機車分類的《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尖端編輯部，2003)，還有以古早行業、民俗活動、民間技藝、鄉土特產等分類的《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黃金財，1998)。

洋復古時序混亂的程度較土懷舊為高，這有相當程度源自於時尚本身的運作，以2006年各品牌為例：

Gucci 本季的印花禮服延伸自1940年代的風格，到了06-07秋冬，它則是懷念起1970年代、David Bowie 的搖滾精神；Cacharel 的06-07秋冬系列，有1960的味道；Fendi 與 Vuitton，一起回到1980；懷抱著未來主義的Prada，將1920年代的線條，融進光冷的色系裡。(方惠宗，《自由時報》，2006.5.16, E2)

洋復古文本中，年代很少服膺在一個共通的非時間性準則(如物件類別或地理區域)下，從《GQ》(2004.4)的目錄來看，60年代之後是30，接著依序是50與70：〈60's 太空美學〉→〈rebirth 30+ 紅橙黑白設計經典〉→〈reprint 50+ 復古球鞋〉→〈reissue 70's 網球運動風〉。其排列原則，只能勉強說看似最具普遍性與規模最宏大的較為優先，較為特殊性與物件導向者排列在後。在此，洋復古對時間的處理是空間性的：將年代從連續時間中切割而出，各自獨立而互不相干，彷彿每個十年

斷代都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度，這種手法和土懷舊的地方產製有異曲同工之妙。

儘管有著將時間空間化與時序錯亂等共同特徵，土懷舊和洋復古在十年斷代的運用上還是有所差別。比起土懷舊來，壓抑區域性質的洋復古更為仰賴時間上的標記作為劃分過往以利個別探討的準則。洋復古對十年斷代的運用相當徹底，每提及復古必引述或探討一或多個十年斷代，各年代間有著精心建構的明確區隔，各具獨特風格與樣式、元素與象徵。

至於土懷舊則未如洋復古般對十年斷代高度仰賴，其年代指涉較為含混籠統，年代層次感較不分明（各十年斷代間無法以獨特風格元素區分），常以從前、早年、古早、老、舊、傳統、日治時期等概括性詞語作為過往事物的時間副詞，如〈老東方思古幽情：1960-1980 流行史〉（《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2003：64-71）。就算是標示出年代，其涵蓋範圍也常大於十年，如〈50年代-60年代阿嬤古早風〉（《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2003：14），跨越數十年者亦常見。

總之，從時空策略上來看土懷舊與洋復古，前者強調地域屬性，以模式化手法繁衍與產製空間，將區域屬性遮蔽於普遍性外表下的後者則將相仿機制貫注於年代的區隔與建構，且運作得比前者更為精密與徹底。至於土懷舊與洋復古對十年斷代的運用差異，本文將於探討兩者如何以元素或物件建構年代後再加說明。

### （三）年代建構：元素 vs. 物件

繼時空策略後，土懷舊與洋復古建構過往時亦呈現數項差異。

表面上，洋復古或土懷舊都是以繁多瑣碎物件來標記與建構年代。詳加檢視後，發現前者所運用的與其說是物件，不如說是元素，而後者仰賴的則以常民文物為主。

對洋復古而言，在服裝造型等面向，20年代是捲捲頭、優雅娃娃

裝與蕾絲亮片，<sup>7</sup> 40年代是煙燻眼，50年代是上揚的眼線，60年代是電影「芝加哥」中女伶的性感紅唇、名模Twiggy的濃妝大眼，90年代是「回到未來的銀河光感眼線」；<sup>8</sup>就風格與美學而言，20年代是Art Deco、30年代是紅橙黑白四色、<sup>9</sup> 40年代則是一種「典雅高貴」的氣質，<sup>10</sup> 60年代是普普藝術、太空美學、70年代則吹起優雅網球風；<sup>11</sup> 若是綜合觀之，則50年代是甜美與純真、叛逆與性感、奧黛莉赫本與葛莉絲凱莉、詹姆士迪恩與瑪麗蓮夢露、珍珠與蝴蝶結、百褶裙與露趾高跟鞋；60年代則是太空元素與普普藝術、幾何線條與迷你裙、金屬與塑膠、披頭四與電影《2001 太空漫遊》。

對土懷舊而言，過往是由三大類常民文物所構成的：古早常民文物、傳統生活用品與晚近文化商品，其中以前兩項佔多數。古早常民文物指過往曾實際使用的器物，年代從日治時期直到民國七十年不等，民國四十年至七十年左右最多，如《老台灣柑仔店》（蕭學仁，2003）一書中「日據時代『健腦丸』木製鑲金廣告招牌」或是60年代「天香雪泡」洗衣粉，或《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中「多桑懷舊小館」裡的光復初期美軍老收音機、40年代結婚照、50年代紅木衣櫃 以及「尋寶跳蚤屋」中50年代化妝品收納盒、60年代彈珠台、70年代尤雅唱片與美女月曆（劉文雯等，2003：57）。

傳統生活用品指的是從數十年至上百年前起持續生產、流通與應用至今的某些日常性質本土產業暨商品，如〈大台北懷舊地圖〉（《Here》，2003.2）裡的迪化街補中益氣湯、加味四物湯、咖哩肉餅、布燈、瑞香燈、烘手爐、魚簍、燕窩、小磨香油、黑麻油、芋粿等。

7 〈20's復古混搭風〉，2004（10月），《Elle Girl》，14：20。

8 〈40's 60's 90's 秋冬彩妝放映中〉，2004（9-10月），《美人誌》55：85-90。

9 林純雅、陳添壽，2004（4月），〈Reprint 60's復古四色輸出〉。《GQ》，91：223-227。

10 〈Nostalgia of 40s：看見2003年的'40s〉，《美麗佳人》，2003（10月），126：306-317。

11 莫乃健、楊珮詠、蔡智鴻，2004（4月），〈Return 70's優雅網球大風行〉。《GQ》，91：240-243。

雖然某些物品如魚簍、布燈之類在當下已經不若往昔般廣為流通與頻繁運用，但另外一些則歷久不衰，在目前生活中仍佔有一席之地，尤以飲食類為最，如同樣呈現於〈大台北懷舊地圖〉的九份老街綜合魚丸湯、茶香麻糬、脆梅、魚丸湯、紅燒牛肉麵、草仔粿、芋頭圓、芋粿等。

晚近文化商品距今最近且涵蓋年代最短、商業流行性最重，並有青少年次文化導向，多為媒介與娛樂產品如《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中的50-80年代玩具、漫畫、電玩、音樂、服裝流行及機車等。

由上觀之，土懷舊區隔較不分明的因素，除了在於對歷史延續的強調，就是在其常民導向：功能性的生活必需品即使歷經數十年也可能未曾發生劇烈變化，尤其在那個相對於現今台灣或與其同時期之歐美國家來說算是貧窮匱乏的年代而言更是如此。相形之下，洋復古則可被視為跨國資本主義商業機制下刻意建構與區隔的人造年代。在快速更迭的時尚場域，每個十年斷代各自擁有不同的樣貌、風格、元素與象徵符號，不同年代輪流走上時尚舞台。一套年代導向的復古技術被操演得無比細膩純熟，已發展出一套相當完整而固定的體系，擁有豐富的資料庫、完備的產製模式和華麗的演出，全面而精準地將人們對一個「全球性」過往的想像加以框架。

雖說洋復古所運用的與其說是物件不如說是元素，但將之納入土懷舊的物件類別一併探討，將更能看出土洋在建構過往時態度上的根本差異：儘管實際的、功能性的「服裝」中當然會有古早常民文物、傳統生活用品與晚近文化商品等類別的存在，但求新求變的「時尚」盡量避免提及，若有機會就設法將之轉化為時尚新品，不管其距今遠近——在流行時尚的觀點，就算只是過去一天也已成「古」、「舊」，均成為可供汲取靈感和進行元素拆解的材料。相對於洋復古，土懷舊將常民文物視為年代圖像的重心，鮮少將之拆解為足以明確標示某一年代或地區的一組美學元素與象徵、以利不斷排列組合並構成新物件。

其實，先前的關鍵字比較早已隱含上述土洋差異的因素：兩者打從一開始就以不同的目光看待過去，一邊是土懷舊以感傷的目光凝視過往，將之視為某種可虛擬重建或心理重返、彷彿獨立存在的空間，因此將過去當成較為完整的存在，洋復古則無意恢復過往，而是將之視為資源，欲從中挖掘出可供當下拆解利用的風格、樣式與元素。

不過，這並非意味土懷舊就比洋復古更為貼近所謂真實過往。其實，從前者的物件類別亦可看出過往是如何被人為打造的：古早常民文物、傳統生活用品、晚近文化商品等三大類的物件內容顯示出，用來標示年代與充實其內涵的並供讀者眷戀懷想的，其實新舊雜陳、土洋交錯，尤其像是《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所列舉的漫畫與電玩等晚近文化商品，源自歐美日者佔多數。然而，在大眾流行性書刊文本的平面上，並置、組合、拼貼、美化與齊一化等編輯策略將土洋新舊的界線掩蓋與消解：古早文物、傳統產業新製品、新產業的古風新品等縱橫交錯，並在稍後會探討的「刻意塑造之古老氛圍」籠罩下，共同營造出「本土過往」的感覺。

上述情況正如Crang所言(1998；王志弘等譯，2003)：「傳統」看似為一套傳承數代的言行與習俗，其形式其實不斷歷經演變，而當下所認定為傳統者，常為當代需求如恢復國族文化或建立本土認同等之驅使而進行的回溯性重構，所產製出的「傳統」可能如本文分析所顯示的，是土洋雜陳與新舊交融的「大雜燴」，和「客觀、實存、經驗性」的「歷史真實」關連稀微，就像Crang所進一步指出的：「要緊的是過去(pastness)的念頭；古代的象徵遠比真實的連續性還要重要。」(p. 220)。

#### (四)敘事與氛圍

土懷舊或洋復古雖秉持不同的動機，在媒介文本中無非就是要塑造出一種「過去的感覺」，此種感覺的塑造有時訴諸於文字，例如兩者



利用物件或元素回顧與建構過往時，都暗示其後隱含一段深邃悠遠的故事，像是土懷舊的《童年柑仔店》：「每一件事物背後都有一段精采的故事」（蕭學仁，2003：4）、「老東西代表著過去一段歷史的點滴，將這些點點滴滴串聯起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故事。」（p.5）。洋復古亦然，如《GQ》雜誌的〈Reprint 60's復古四色輸出〉：「紅、橘、黑、白這四色從以前火到現在，無論是豔麗或簡約都有一段復古故事」（2004.4：222）。然而土洋兩者也無一例外地讓敘事的承諾落空，從未試圖將這個所謂的「故事」完整道來，多數時候根本是什麼也沒說。所謂「故事」，始終只是一種姿態與說法、暗示與誘惑。

洋復古在省略故事這一點上相當徹底，土懷舊有時候還會行禮如儀地抄上一段像是導遊背給觀光客聽的制式說辭，例如介紹萬華時就寫道：「古時大稻埕為北台灣貨物進出口集散地，帶動迪化街的繁榮興盛，霞海城隍廟至民生西路之間舊稱南街，現為中藥材的集中地，歸綏至台北橋之間的北段，又稱尾街，其閩南式的洋樓，也成為特色之一！」（《Here》，2003.2：39），這些文字敘述並非真的是什麼懷舊事物背後精采故事，和當地所提供的許多有「對當下懷舊」之嫌的各種商行與產品如參藥行、餅店、商行、粿店、麻油店、霞海城隍廟或是補中益氣湯、加味四物湯、咖哩肉餅、布燈、瑞香燈、烘手爐、魚簍、燕窩、小磨香油、黑麻油、芋粿等物的直接實質關聯亦無法窺知，甚至無意中使原本可能是緊密相關的地方歷史與常民記憶在文本中各自為政。

相對於偶爾提供些微敘事的土懷舊，洋復古則是乾脆地放棄說故事的企圖，轉而致力於營造某種若有似無的氛圍，此氛圍缺乏和任何特定過往時空與當下認同緊密連結的具體指涉，如《GQ》雜誌在〈Reprint 60's復古四色輸出〉中所強調的：「混來混去的結果，Retro 已經很難用某種固定的型態來規範，最後變成一種抽象性的感覺」（2004.4：222），這種「抽象性的感覺」就像是透過黑色與金棕色的結合

表達出「奢華感十足的復古眼神」、或是「利用眼尾倒三角的畫法，呈現濃濃的復古妝感……搭配厚厚的瀏海並且選擇棕色系的眼影……立即呈現出60年代奢華、華麗感十足的迷濛眼神」。<sup>12</sup>

要說明復古懷舊文本中過去氛圍之塑造，圖像或許比文字更適切，因為多數文本中文字都相當簡短，圖像卻佔據大部分篇幅。Hartman(1997)曾說過，強而有力的影像是當代這種奇觀社會(society of the spectacle)最常被提及的特質，也是培育此社會的土壤——此種特質在流行性復古懷舊文本中充分顯現。

大致上，文本中的影像再現可粗分為和前述土懷舊物件類別約略對等的四大類：(1)古早記錄類，(2)古早文物類，(3)傳統事物類，(4)古風新品類。土懷舊中四類均有，二、三類居多，洋復古則以第四類為主。

其中，第一類「古早紀錄」數量不多，較常見於文化、歷史導向的書籍，較少出現於大眾流行性雜誌，多半是以黑白照片拍攝的早年生活情景，偶有繪畫，如《懷念老台灣》(康原、許蒼澤，1995)中所見。和其他三類有別的是，圖像常以人為主、物件為輔。

第二類「古早文物」指的是脫離原時代生活情境與應用功能、但以良好品相保存至今的古早物件之現今彩照。

第三類「傳統事物」照片所呈現的是自古延續至今的某些行業暨產品，有的歷久不衰，有的幾經變革，有的苟延殘喘，但彩照主體多為持續流通與應用中的物品，或是仍在營業中的商家行號，偶有人物但不多。這一類影像常有「對當下懷舊」之嫌：意即被當成歷史遺跡來看待的事物，其實幾經蛻變，仍活躍於當下。

第四類「古風新品」是洋復古中居首要地位的時尚商業攝影，畫面重心多為作復古懷舊打扮的當代人，以模特兒為主，有別於第一類的

---

12 〈優雅復古魅眼〉，2004(10月)，《Elle Girl》14:70-71。

平民百姓與第三類的店家與客戶等生活寫實型人物；模特兒的彩妝服飾與場景的燈光陳設等皆是為傳達某種難以言喻的時代氛圍而精心設計的，以標題為〈優雅復古魅眼〉的彩頁為例（《Elle Girl》，2003：67），模特兒頂著50、60年代女伶的髮型妝容（金棕色調底妝、上鉤眼線、齊眉瀏海），裹著指涉50年代時尚的皮革，擺出彷彿40年代女星周璇的姿態（微挑眉、旋身側頭、下巴頂肩），顏面也浮泛著彷彿舊時肖像攝影的霧面柔焦。

另外又如《美麗佳人》雜誌跨頁時尚彩照中，<sup>13</sup>場景中醒目地安置著歐洲宮廷風的絲絨椅背金銅扶手雕花座椅，模特兒穿著華貴的復古風名牌服飾：灰色斗蓬式外套，水藍色絲質A字裙，綠色小圓點手套、花卉蝴蝶鑲鑽別針——其中，斗蓬、A字裙、小圓點等皆為典型的60年代經典元素，而沈鬱的灰、藍、綠等色彩組合也被指稱為50、60年代流行色；彷彿以服裝道具營造復古風情還不夠，連模特兒都透過刻意擺放的姿態一起古董化：雙手交握置於胸前，一臉古董娃娃般的漠然無謂，雙腳也呈O形娃娃腿狀。

前述兩例的圖文搭配與視覺呈現可被視為典型的洋復古文本模式：用簡短文字說明物件名稱及品牌；傳統懷舊那種環繞著年代歸屬、歷史記憶、情感訴求的敘事，在此均未以文字鋪陳，而是透過物件與視覺元素營造出朦朧的氛圍，以挑動觀者慾望並開啟想像空間。尤其是第二例，可說是將物件的承載功能徹底發揮：將擬仿古董娃娃的模特兒當作畫面主體，以物件（古董娃娃）承載更多的物件（服飾），將往昔記憶、回望的目光與敘事潛能層層裹覆在無盡的物件循環中。

上述「以新擬舊」的再現模式常見於洋復古引為主力的古風新品類，土懷舊亦偶有。與此對照的是土懷舊再現古早文物時的「飾舊如新」：距今年代久遠的古早文物呈現於文本彩頁時，皆以完好如初、甚

---

13 〈Nostalgia of 40s：看見2003年的'40s〉，《美麗佳人》，2003.10，126：307。

至是光鮮亮麗的形貌呈現。此種鮮麗樣貌首先來自於收藏家與編輯對物件品相的篩選，其次是打光、攝影、電腦影像處理與印刷的效果。這種做法的心態頗堪玩味：既期待物件能再現某個已逝的「古早」年代，或勾起對該年代的回憶與情愫，又要求該物其貌若新，因此而對物件篩選修飾、掩藏歲月痕跡。

古早文物類的「飾舊如新」與古風新品類的「以新仿舊」看似背道而馳，實際上卻是殊途同歸。正如先前所言「要緊的是過去(pastness)的念頭」(Crang, 1998; 王志弘等譯, 2003: 220): 當代復古懷舊的「過往」或「傳統」, 其實是一組事後回溯、人為建構的大雜燴, 其中土洋雜陳、新舊交錯, 但印刷媒介並置、拼貼、美化等齊一化等編輯手法隱藏差異、消弭界線, 營造出一種整體化的光鮮亮麗古早氛圍。

上述現象除顯現媒介對過去的產製, 也展露出Jameson(1991)所稱的「對當下懷舊」(nostalgia for the present)——亦即從投射出去的未來回頭注視被歷史化的現在, 並將當下錯認為已失落的過去。無論是為新品增添古早味, 或是將尚活躍於當下之物視為歷史遺跡, 皆為此種說法的體現。根據Appadurai(1996)對廣泛運用此一手法的當代時尚廣告之觀察, 其意圖是要將消費者安置於一個已歷史化的當代, 使其滋生「若不快趕上流行就為時已晚, 因為吾人的年代轉瞬即逝……」之焦慮(p. 77), 如此一來, 將使消費者更易受時尚流轉之剝削。

### (五)歷史延續 vs. 速成歷史

雖然土懷舊與洋復古都致力於營造「過去的感覺」, 但前者的企圖不止於此; 先前曾提及, 「事後回溯之傳統」可能是為了回復國族文化與重構在地認同而建立的, 此說對洋復古可能解釋力有限, 但卻指出了形構土懷舊的一大動力: 從沿時間軸一路堆疊的物件與再現類別、以地方為基礎而任時間連綿而下, 以及運用較悠遠的時間副詞等, 或許已可窺見其歷史延續的企圖。此外, 土懷舊介紹常民事物如產業、

商品或地方信仰中心時，都強調其源起清朝、日治時期或其他古早年代，流傳久遠（百年、數十年或家族數代），在商品部分強調獨家古早配方加上嚴選材料及以老師傅精純手工，使商品是如何地保用耐久云云，<sup>14</sup> 上述特質和機械大量複製與隨晚期資本主義快速周轉率而來的可拋性與易變性（Harvey, 1989）恰成對照。

在視覺呈現上，亦見土懷舊不遺餘力地縫合古今以建構歷史連續性，如《Here》雜誌〈大台北懷舊地圖〉專輯中（藍麗華等，2003.2），各懷舊景點如迪化街、華西街、深坑、九份、淡水、三峽、金山等，皆各以一張跨頁地圖加以介紹；抹除現代都會標記的現今市街圖上，安置了各種美學化的「傳統」符號以構築瀟灑古早氣息的當下地景：大小標題與圖形字樣大都以傳達沉穩、溫暖、樸實、古舊、鄉土等意涵的金黃、正紅、土黃與咖啡等色為主；有別於當今一般地圖工整精確的現代感，在此是透過手繪質感試圖傳達刻板印象中屬於古早鄉土的質樸粗糙，雖圖面上的文字說明還是電腦打字所構成的；街道名稱及一般店家用方正纖細的黑色字體標示，將予重點介紹的懷舊店家則用較為粗厚渾圓的紅字書寫，並蓋上記載創始年份（大多是1940年代）的紅色圓形戳印，極力強調歷史感與延續性。

以迪化街、三峽、華西街、深坑老街等地圖為例（p.40-50），大片土地是以土黃色進行水彩手法的暈染塗覆，白色街道上刷了一點水漾咖啡色，四處點綴的小建築若非古式的斜屋頂瓦房，就是平房或是帶點洋樓風味的兩層高樓房，屋宇間除了飾以幾株綠樹，還點綴了稻草垛之類和當代台北頗有時空距離的鄉土符號，而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與車水馬龍的交通等現代都會的表徵自然是不見蹤影；作為此次懷舊專題重心的胡椒餅、肉圓、粉圓、碗粿、蚵仔麵線等傳統小吃之手繪圖樣也散佈於地圖各處：有趣的是前述樓房屋宇草垛路樹等雖並非按

14 〈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2004（5月），《7-WATCH 情報誌：探索小城故事》。台北：樺舍，頁27-41。

比例描繪，卻未如這些小吃般誇大——它們的尺寸若非與房屋相等，就往往是更大。

土懷舊是如何縫合古今以強調歷史延續性、建構出瀟灑古早風味的當下，至此應已充分展現。相形之下，洋復古似乎缺乏此種歷史延續的企圖，既不沿著時間軸一路鋪陳各種物件與再現，而是以十年斷代切割歷史，亦鮮少縫合古今以塑造歷史延續性，而是拼貼新舊、化古為新或以新擬舊；此外，也缺乏土懷舊回顧過往時不時湧現的情感，如時光不再的感傷或艱困年代中打拼的辛酸。

簡而言之，洋復古提供清爽便捷無負擔的速成歷史與即食記憶，正如東芝EMI所出的「RVG」系列CD：「每張的外包裝都採高彩印刷，以仿古LP紙套加內裡膠膜包覆……連唱片封套背面的字體排列，全重現當年50、60年代的老唱片復古風情……」；<sup>15</sup> CD新品一穿上擬似數十年前黑膠老唱片的外衣，歲月薰陶、經驗累積與歷史傳承彷彿藉由復古包裝瞬間移轉，大幅提昇商品附加價值。類似案例在洋復古中比比皆是：如〈北歐溫暖系中古玩家〉中，家飾店主建議讀者利用有著原創花紋的老布料「作成復古椅子、復古條紋抱枕、或是繃在沙發面上」，或以復古花色的壁紙裝飾牆面，如此一來，「Vintage的氣味馬上油然而生」；<sup>16</sup> 服裝彩頁亦宣稱其秋冬新品：「彷彿是四十年代優雅套裝的重生！特別是胸前那軍裝般的雙排扣設計，加上那張輕掩臉龐的黑色薄紗，更呼應出一種大戰時代的強悍而保守的浪漫。」<sup>17</sup>

總之，只要依循某些預設步驟將復古元素或物件組合運用，「古老」氛圍亦可現做速成。至此，復古懷舊已經不再是歷史記憶或情懷感懷，而是某種構成流行樣貌、個人風格的當代素養；「古早」、「老舊」、「過往」或歷史延續已非重點，「新」、「前衛」、「現代」、甚至「未

15 朱中愷、葉智鴻，2004（4月），〈最有黑膠味藍調爵士盤〉。《GQ》，91：48。

16 〈古老卻摩登發燒熱賣中〉，2004（4月），《GQ》，91：120。

17 〈The Last Seduction 衝突魅力〉，2004（3月），《Elle》，150：316。

來性」才是——雜誌標題所慣用的矛盾修辭法將此充分表露：如〈復古流行風暴〉、〈媽媽舊衣的時髦穿搭〉、〈秋冬最發燒的復古眼線〉(《Elle Girl》, 2003.10)、〈復古最時髦〉(《GQ》, 2004.4)、〈老樣子新流行〉(方惠宗,《自由時報》, 2006.5.16: E2)、〈玩舊穿新〉(邱冠旭&沈家如, 2004.2.5)。

## (六)復古懷舊背後的形構力量

直接形塑洋復古且近年對土懷舊發揮日益強烈影響的，當屬其主要發行平台，即國際中文版時尚雜誌。土懷舊散見於各類書報雜誌，本土導向與跨國出版者兼有之，近年以生活娛樂和時尚流行性報章版面與雜誌居多，洋復古則多刊載於國際中文版時尚雜誌，如本研究所檢視之《Elle》、《Elle Girl》、《瀟灑》、《美麗佳人》、《Taipei Walker》、《Here》等皆為1990年代以來，歐美日跨國出版集團以授權、合資或分公司等方式在台陸續發行者，<sup>18</sup>出資比例中外各半者較多，<sup>19</sup>內容(圖片與題材)翻譯比率則為20%至70%不等，50%上下者稍多(陳柔均, 2006; 林千玲, 2007); 洋復古文章有直接翻譯者，有改寫歐美版本者，也有以本國文案搭配歐美照片者；全由本地製作的較少，且即使如此，其主題依源起歐美，雖取材可能轉向本地。

為顯示與比較洋復古及土懷舊在製作上的本土與跨國分工，本研究檢閱了七份雜誌與一份情報誌，其中五份為國際雜誌中文版，三份屬本地；報導洋復古者有五份，懷舊三份；前者多出自國際雜誌，而

18 《ELLE》於1991年由法國Hachette Filipacchi 和台灣樺樹公司合作發行；《美麗佳人》先後由時報出版與農儂文化公司和法國Marie Claire 集團合資發行；《GQ》是1996年起樺舍文化與美國Conde Nest 合資經營的；《柯夢波丹》為美國Hearst 集團與台灣華克公司合作發行；《Here》與《Taipei Walker》分別為日本東販與角川書店在台灣成立分公司所發行出版者。

19 以《Elle》為例，Hachette Filipacchi 與樺樹出資比為51:49；《美麗佳人》的農儂公司與法國Marie Claire 集團出資比則為各百分之五十，但出版《Taipei Walker》的台灣角川，日資高達79%。

後者本土，只有一份國際雜誌報導懷舊而本土雜誌報導復古(請見附錄2)。雜誌報導的產製是種需要精密分工的團隊合作，從企畫、採訪、撰文到攝影、插畫、影像合成、版面構成等，均有專人負責；攝影與構成版面所需的商品、服裝、場地與圖片等，則由外部廠商所提供(請見附錄3)。

土懷舊報導文字與影像大多由本土團隊一手包辦，即使國際雜誌亦不例外，連文物、商品與場地提供者亦多為本地業者與收藏家等。而洋復古的文字與影像則分別源自本土工作人員與跨國業者<sup>20</sup> 撰文多為前者所負責，但「撰文」常意味著根據母公司版本或相關資料加以編譯與改寫；而構成整體影像的各種圖片大多來自跨國業者，包括國際通訊社(如美聯社與路透社)、專業影像或圖庫經營者(如Corbis, Bettmann, 代理歐美日圖片的達志影像及台灣名人影像等)、跨國公司(Gucci, Chanel, Louis Vuitton, Cartier等)、跨國商品的本地代理商(如BMG、EMI、台灣Adidas、得利影視等)以及國際雜誌之母公司(如香港蘋果日報)。上述業者直接提供圖片者多，亦有部分提供商品供本土人員拍攝者。值得注意的是復古時尚報導中，文字與影像往往不成比率，後者佔大部分篇幅，前者往往只提供些許背景與商品說明。精密分工所導致的複雜情況使得確切比率難以推估，但由上述說明應可看出洋復古時尚報導中跨國勢力的高度介入。

國際中文版雜誌所譯介的文章，日系是針對母國原版，歐美系者則從其全球發行之數十國版本中篩選，最常被轉譯者多來自英美法澳；雜誌架構與版面與來源國版本間維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日系雜誌一致性相當高，歐美雜誌雖自由度較大，但基本型態不脫當代流行雜誌的主要範式；至於出版方針、整體風格與市場定位，若非總公司主導，就是各區分公司和總公司協商後所產生的共識——通常是號

20 少數例外來自洋復古系列報導中少數一兩篇有關在地情況者，為純本土團隊所製作，如《GQ》案例所顯示。



稱兼顧全球與本土的折衷定位：如《美麗佳人》試圖兼具本地化與世界性女性觀點；《Elle》則強調「國際感覺、本土神韻」。<sup>21</sup>

除了兼顧全球與本土，國際中文版雜誌同時也是個人化的、資訊的、務實的，且其全球性往往優先於地方性：例如，出版《Walker》系列的角川書店標榜提供與全球市場同質的實用都市資訊給本地讀者<sup>22</sup>而和美國Hearst集團合資出版《哈潑時尚》、《柯夢波丹》等雜誌的華克文化則以「全球華人女性時尚生活的領導者」自居，試圖在時尚、美容、精品、兩性關係與自我成長等各方面提供「精緻與豐富的資訊，以提昇國人與世界接軌的生活新視野」。<sup>23</sup>

上述說明有三項要點：(1)洋復古雜誌文本多來自歐美版本的譯介；<sup>24</sup>(2)國際中文版和總公司原版無論在宗旨或形式上都維持相當程度的一致性；(3)國際中文版致力於為個人供全球性實用資訊。這些要點有助於解釋洋復古相對於土懷舊的數項特色：「全球性」暗示著過往的區域性質將遭到壓抑；對個人化實用資訊的追求意味著若將歷史拆解為元素，將有利其以資訊形態流通，並供消費者任意運用。地域性被壓抑而歷史時間遭分解後，以時空為根基的傳統歷史敘事無以為繼，現今國際時尚雜誌之宗旨與形式遂主導洋復古的形構：多影像少文字、重氛圍輕敘事、錯時拼貼、以新擬舊、以舊築新、歷史速成遂成為其主要特徵。

21 陳信元，(無日期)，〈全球化浪潮下的國際中文版雜誌〉，取自 <http://www.fgu.edu.tw/~literary/hsinyuan1.htm>

22 角川歷彥，1999(4月)，〈成功地創辦一本新雜誌的步驟及方法〉，《1999台北國際雜誌研討會》發言稿；轉引自陳信元。

23 請見華克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網站：<http://www.104info.com.tw/hotcompany/84490282000.htm#01>

24 日系雜誌在此扮演某種文化中繼(relay)的角色：生活休閒類以日系情報誌風格製作本土懷舊專題，休閒時尚類則是將日本對歐美時尚的介紹及演繹進行二手傳播——這部分並非洋復古在台傳播主力，對本文論點影響不大，故暫時點到為止，但日系媒介作為歐美文化轉介者此一角色，是個值得另闢專文探索的議題。

儘管國際中文版此一媒介平台直接影響了當今洋復古甚至土懷舊的形式特徵，但當今復古懷舊風潮的深層動力還是要從全球與本地的近代歷史脈絡中探求。

雖然Halbwachs(1950/1992)指出人們向來認為過去的時光較為美好，但近年的復古懷舊根源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隨後殖民活動、新社會運動及其歷史追尋而於興起於西方的記憶論述(Huyssen, 2003)。至於1970年代早期的博物館文化及當時初萌芽的「遺產工業」，則可視為歷史記憶商業流行化之發端(Harvey, 1989)，而世紀末至今文化工業對復古懷舊的大力行銷更強化此一傾向。

學者大都認為二十世紀後半葉逐漸勃興的歷史記憶與復古懷舊與現代化有密切關連：「進步」(progress)與「懷舊」或許是現代性的一體兩面(Boym, 2001)。Huyssen(2003)指出，傳統的衰微、民族性的失落、穩定持久的生活經驗之消散皆隨現代化而來，我們對世界的瞬息萬變與時空壓縮深感焦慮，遂以公共暨私人回憶作為生存策略，在日常生活外尋求可供喘息的另類時空。

上述過程中，媒介成為可資對抗遺忘的時空寶庫，並提供某種程度的時間連續感。具體而言，媒介在復古懷舊潮中扮演了以下多重角色：首先，晚近數位媒介以強大的資訊處理、複製與傳輸能力，將許多原本可能湮沒的過往或以許比原初更為精緻的樣貌一波波持續送回大眾眼前。另，由於二十世紀後半葉起媒介高度充斥於眾人生活中，故其當今所重現的過往內涵，有相當程度即源於自身，從懷舊老歌、電影與卡通等影視產品的再度流通即可窺見。

媒介對復古懷舊尚有推波助瀾之效，除本研究所檢視的書刊所顯示外，2000年的電影《花樣年華》、2001年的《紅磨坊》(Moulin Rouge)、2002年的《芝加哥》(Chicago)與2004年的《2046》相繼掀起一波波復古風潮；在台灣，較早有自1989年《悲情城市》上映以來所帶動的懷舊旅遊風，稍晚則有因2005年紀錄片《無米樂》與大愛、三立、公

視等電視台相繼取景而成為著名觀光老街的後壁菁寮地區。

此外，由於當今電腦與網路的普及，使用者得以在各種公共、私人、甚至商業平台如BBS電子佈告欄系統、電子報、網頁、論壇、部落格、網路拍賣等，集體抒發與交流復古懷舊情愫並帶動風潮，著名案例如夏綠蒂所言：「一群五年級老同學上網奮筆直書自己《科學小飛俠》、「自強活動」年代的美好泛黃記憶……」(2003：78)，後來甚至集結出書，如《五年級同學會》(Mimiko等，2001)、《五年級青春紀念冊》(Mimiko，2002)等。

最後，媒介對人們感知結構的改變亦間接引發了復古懷舊需求：高度時空壓縮使人一方面得以穿梭於各年代與國度間、任意擷取象徵資源，另一方面卻因資訊超載與瞬息萬變而焦慮、試圖從過往尋求安全感；暴增的媒介頻道一方面使人目不暇給、開拓眼界，另一方面又令人懷念過去因缺乏選擇而使大多數人接收相仿內容所塑造出的集體性與共通回憶。

1990年代中期在全球資訊網、圖形瀏覽器、搜尋引擎與DVD等各項科技陸續登場後，媒介對人類過往的儲存、複製與傳輸能力達到新高，而另一項懷舊動力亦於此時登場，即所謂世紀末效應——指人們在世紀末此一象徵性死亡的過渡時刻，擔憂自己被捲入不可知的未來，因而大規模回望過往以尋求撫慰及支持，因此次世紀末適逢千年之末，懷舊效應更為強化(Stern, 1992)，而世紀交替之際所接踵而至的天災人禍亦加深前述「被捲入不可知未來」的憂慮：從90年代晚期網路泡沫化及隨後的經濟不景氣、至2001年美國九一一恐怖事件、2002-3年的SARS疫情，以及2004年的南亞大海嘯等，均一再削弱大眾對新世紀的信心；台灣除亦受上述世局影響外，尚有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及2000年政黨輪替等重大事件。

在此同時，一項人口因素也使懷舊效應更為顯著，即數量龐大的戰後嬰兒潮世代(指出生於1946-1964者)在世紀末步入中年，市場行

銷遂針對此一面臨老化前景的族群推出能供其向青春歲月尋求溫馨回憶與安穩認同的產品。

上述多重交織的全球性因素(記憶論述的勃興及其商業化、現代化的影響、媒介所扮演的多重角色、世紀末效應及戰後嬰兒潮的中年焦慮等)，對台灣多少都有影響，雖程度與面向可能有所差異，如現代化為台灣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焦慮，還有傳統文化暨產業的衰微，及亟欲保存與回顧的反作用力，如侯硐煤礦博物館的籌建與瑞芳金瓜石黃金博物園區的成立，均多少源自於對當地歷史遺跡湮沒於歲月的擔憂，而台南五條港文化園區的活動背後，亦有地方耆老將家鄉過往與宗族傳統即時傳述給下一代的心願(康俐雯，2003)。

全球性因素的台灣效應，尚可見於貿易逐漸自由化後，以歐美日為主的跨國商品與服務相繼湧入台灣，而本地業者為了提升己身的市場的能見度並與各國商品抗衡，一方面採用跨國資本主義的產銷模式以便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利用本土歷史文化資源來營造在地特色與訴求。<sup>25</sup>在此種情況下，古早台灣懷舊的符號堆疊與氛圍塑造成為市場競爭的利器之一。

至於較屬台灣自身的懷舊動力，主要是解嚴後恢復歷史記憶與建立文化主體性的努力。邱貴芬(1995)和陳芳明(2002)都曾指出，歷史記憶匱乏症是被殖民社會的共同經驗，台灣亦不例外：數百年來的被殖民經歷使本土歷史記憶遭到壓抑，而其恢復與重構則是解嚴後去殖民工作的第一步。

對於台灣歷史與文化主體的省思，雖於70年代即可見、至80年代更受重視，但1987年解嚴後其力道才充分展現：從二二八事件的回顧與平反、文學遺產的整理、文化資產的建立、文史教科書的修訂等，都可以看出恢復歷史記憶與建立本土文化的努力。在上述情境下，包

---

25 這種情形在鄧景衡之〈土餅、洋餅的戰爭與和平〉(2002)一文中有著詳盡描繪。

括懷舊在內的歷史記憶因具有建立國族傳統、將新政權合法化、或是對定位仍在協商中的國族提供歷史延續性及文化一致性、並療癒先前殖民時期的創傷等種種政治與社會力量，因而受到官方的提倡、民間的歡迎與商業的採用。

換言之，世紀交替之際所興起的本土懷舊，除了前述全球性因素的影響，尚可視為本土文化主體性總體營造之延伸，但其基調與表現手法和70年代鄉土文學與二二八歷史追憶與有別：從悲情走向甜美、從政治與文學轉向流行文化、從社會批判而至消費娛樂，從文字與敘事朝物件與影像偏移、從寫實轉為想像。

上述轉向除了是當代文化想像在長久以來的悲情敘事外另闢蹊徑，以及全球性流行文化後現代風格的影響所致，也回應了社會大幅變動後大眾尋求撫慰的心理。Boym (2001) 指出，懷舊潮常伴隨社會劇變而來，因為人們在變革後發展停滯與動盪不安的時期，會緬懷想像中相對安穩與繁榮的過往年代。較早的西方顯著案例包括法國大革命、俄羅斯革命與東歐革命，而晚近中國大陸歷經80年代的動盪後，90年代於傳播與文學等領域均出現回歸傳統的論述，試圖透過瑣碎的日常生活提供溫暖家庭氣氛和可抒解焦慮的擬像(張頤武，1995a)。

至於台灣，在以1987年解嚴與2000年政黨輪替為里程碑的前後20年間歷經了重大政治社會變遷，公共領域持續喧嘩擾攘、國族認同與文化主體性歷經無數折衝與協商，再加上新世紀之初的經濟不景氣，浮動不安的民心亟需撫慰，而溫馨純樸的古早台灣懷舊適時加以回應。

值得注意的是，雖有上述整體因素，各世代或族群間的懷舊效應還是有著微妙差異，正如7-Eleven「童年福利社」網路行銷活動所顯示的(林宏達，2003)：雖然目的都是希望閱聽眾能關注當時所推出的懷舊食品，但卻針對不同世代而設計了「小時候大代誌」與「青春大車拼」兩個單元，前者為出生於60至80年代者整理其童年時期具有集體象徵

意味的事物，試圖喚起此世代的記憶與認同，而後者則呈現70至90年代年輕人的流行時尚，除供現已步入中年者回味青春，尚可讓較晚近世代增進對先前世代當年生活的瞭解，並鼓勵其擷取可供創造性再運用的過往文化資源。

其實，眾多印刷暨網路懷舊文本的作者背景及其所召喚的世代顯示，台灣的懷舊族與歐美有所差異，後者的主力是生於1946-1964年間的戰後嬰兒潮世代，前者則是生於50至70年代的所謂四、五、六年級生，其中，懷舊效應最顯著的當屬生於60年代的「五年級生」（指出生於民國五十至五十九年，即西元1961-1970年者，以下簡稱「60世代」）。

除先前提及的普遍性因素，此世代特有的懷舊動力來自下列歷史狀況：首先，60世代從出生至成長的時期剛好歷經台灣從相對匱乏至經濟起飛的年代，而物質觀亦從著眼於基本民生物資逐漸轉為重視消費娛樂，至世紀末懷舊潮興起時甚至有發展成商品戀物的趨勢。此世代追求嗜好的意願與能力都高於先前世代（張夢璣，2003），步入中年時面對現實壓力以及因政經情勢與科技進展而瞬息萬變的世界，自然轉向過往與物質尋求撫慰與安全感。對懷舊事物的依戀除尋求心靈歸宿外，還雜揉著滿足童年未圓之願、追求美好事物、或將之視為夢想的痕跡與剎那感動的印記（夏綠蒂，2003）等種種心態。

和60世代相比，先前世代由於歷經更長久且更艱困的年代而勤儉務實，即使懷舊亦著重往昔人事物的整體而非只檢視個別物件，如《看見老台灣》（張建隆，1999）、《懷念老台灣》（康原、許蒼澤，1995）、《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黃金財，1998）等40、50世代作品所顯示；而60之後的70、80世代戀物傾向更強，回顧往昔時較少依戀與感傷，而是更強調個人興趣、審美與娛樂。

由上可見，這一波懷舊的物質傾向，除了跨國資本主義與全球流行文化的影響，也有一定的本土世代因素交織其間。但除物質條件與

觀點的轉變外，60世代尚因處於某種歷史過渡或夾縫，而使懷舊效應特別顯著。

首先，1987年解嚴時，此世代約18-27歲左右，這意味著他們在此之前人生多數時光都處於威權時期的國族教育籠罩下，但剛成年或甫入社會之際這套架構隨即崩解，必須面對一套嶄新的、有時甚至顛覆先前所學的人文認知。上述情況引發價值混亂、認知失調、甚至情感衝突。這對該世代而言，除前述社會整體懷舊因素外，更加了一層欲遁入似乎質樸溫馨的過往以尋求安全感與撫慰的動力，而此種「美好舊日」也是商業性生活娛樂雜誌所最常呈現的過往圖像。但若觀察網路中部落格、個人網頁、電子報、電子佈告欄等非商業性的私人書寫或公眾討論，亦常見到的是對戒嚴時期種種昨是今非之描寫：例如對反共復國大業的堅定信念、對國歌、國旗、元首等國家象徵的無比崇敬、獨尊國語而壓抑方言的政策、甚至「蔣公」逝世時報紙電視均改為黑白、軍公教人員著素配黑紗、以及「出殯當日全校跪在校門口」等往事。<sup>26</sup> 此類回顧並非為了尋求慰藉，而是以當下目光重新審視過往，將失調的認知與混亂的價值觀加以調整，並在舊信念瓦解後，尋求符合現今框架的新意義，並試圖與過往和解。另外，這些網路言談常引起未曾經歷該年代的較晚近世代之嘖嘖稱奇，對60世代而言，除建立屬於自己的世代認同外，亦對增進跨世代瞭解有所助益。

與60世代相較，較年長的40、50世代的懷舊傾向較不顯著。這可能如Boym(2001)所指出的，對於某些失落太過嚴重的族群(例如第一代移民)，懷舊是種禁忌，因為一旦從事追憶，可能因為過度悲痛而無法前進，只有無負擔的人(如第二、三代移民)才懷舊，而何榮幸(2002)亦曾指出，太過艱苦的過去反而使得完整經歷艱困年代的40、

---

26 可參考《五年級同學會》一書，或下列網頁：<http://blog.sina.com.tw/3387/article.php?pbid=3387&entryid=2981>；<http://blog.chinatimes.com/karl6406/archive/2007/12/07/224397.html?page=3>；<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walawala/3/1116340/20020629120027/>

50世代難以懷舊。反觀60世代，因當年尚未進入社會，才能用童稚的懵懂目光看到似乎純樸甜美的過往。

世代差異的另外一個可能原因在於歷史進程的參與與否。在後來普遍被認為是晚進台灣政治文化變遷關鍵階段的70年代，主要行動者多為40與50世代(蕭阿勤, 2005)，而60世代在此風起雲湧之際尚處於童年至青少年時期，未能即時躍上舞台，留下屬於自己的印記。這種失落一方面可藉Baudrillard(1988)所描述的後歷史心態加以瞭解：亦即，從前我們活在生死攸關的歷史進程當中，當時有革命或對革命的期待與恐懼，其後卻陷入一片政治衰微、價值崩毀、歷史退卻的停滯中，為了逃離這片空虛，此時懷舊重裝上陣……；另一方面或可藉海峽彼岸狀況相仿的《六十年代氣質》說明：「當世界正處於激變的時刻我們還不懂事，等我們長大了，聽說著、回味著那個大時代的種種激動人心的事蹟和風景，我們的遺憾是那麼的大……」。<sup>27</sup>此種失落卻也使60世代從過往尋求可為自己定位的集體象徵，從五花八門的常民物件、到威權教育下種種怪現象、再到野百合學運等，皆成為世代與年代標記。

總而言之，60世代成長過程中歷經從匱乏務實到消費娛樂的轉變、初入社會之際面臨認知架構的全面重整、並與重大歷史變動擦身而過。以上種種歷史過渡的交會，皆使此一世代在世紀交替之際有更強的懷舊動力。

整體看來，推動世紀末回望過往風潮而較屬全球普遍性的因素，包括文化工業的成功行銷、媒介的推波助瀾、現代化的反作用力、世紀末暨千禧年效應、嬰兒潮世代的中年焦慮等，而較屬台灣本土的，則有恢復歷史記憶與重構文化主體的企求、對傳統文化暨產業的衰微之警惕、跨國商品進駐所激起的自我定位、社會劇變後渴求安穩的心

---

27 參考<http://www.amazon.cn/dp/zjbk362808>



理、以及種種歷史過渡引發的60世代效應，

在或許有二元對立與簡化之嫌的對照下，前者可說是趨向於西方霸權的、全球與商業的、科技與創新的、個人心理的、物質安逸的，後者則較屬於後殖民的、地方與國族的、傳統與延續的、群體與社會的、認同與主體的。受這些因素所影響的文本性質，在先前分析的時空策略、年代圖像、敘事與氛圍中都曾提及，但並非構成直接而完美的對應，而是以複雜而間接的樣貌交錯其間。

### 三、討論與結語

#### (一) 土懷舊與洋復古的分工與共構

本研究發現，土懷舊與洋復古文本呈現以下差異：前者繁衍空間而後者遮蔽地域性質；前者時間範圍較籠統寬廣、年代層次較不分明，後者徹底運用區隔鮮明的十年斷代；後者透過過往元素所重構的時尚新品塑造年代擬像、產製速成歷史，前者則沿著時間軸一路鋪陳各種物件與再現，構築事後回溯的傳統，並巧妙地縫合古今；後者期待「對當下懷舊」的機制能使消費者更易受時尚流轉的牽引，而前者在商業動機之餘尚有建立歷史延續的希冀。

上述差異的因素首先來自兩者的不同出發點：復古將過往視為充滿風格樣式與符號象徵的文化資源，可供重新利用與再創造；懷舊則以感傷目光回顧往昔，將之視為某種獨立存在，希冀重返或再體驗。至於兩者各自的較深層動力，對土懷舊而言是台灣近代歷史發展下多重脈絡所交織而成的複雜因素，包括記憶恢復與主體重構等本土導向追求、後/現代歷史斷裂、政治社會動盪與世紀更迭所帶來之亟需抒解的焦慮等；而洋復古除資本主義與流行時尚運作機制之影響外，其主要出版平台國際中文版雜誌之理念與型態不但對洋復古發揮形塑力量，其影響甚至延伸至土懷舊——尤其是晚近文化商品導向者。

當今流行性印刷媒介主要形式對土洋復古懷舊的共同影響可見於文字與影像的比例、年代的拼貼與交錯、繁瑣元素或物件構築的歷史圖像、對「過去的感覺」而非歷史敘事之注重，還有：透過種種美化與齊一化的編輯手法將新舊雜陳、土洋交錯的元素物件加以統整，使之共同營造出一種「光鮮亮麗的古早氛圍」。總之，媒介形式對不論是土懷舊或洋復古的歷史建構與過往想像均發揮高度形塑作用。

探究土洋文本相異與共同動力之餘，尚有一點值得注意：那就是此兩者的相對關係和羅曼史於十八世紀落幕時所發展出的兩種主題型態——歷史懷舊與個人懷舊——約略對等。根據Radway(1984)，前者是遁入過去堡壘的歷史羅曼史，後者是返回個人原初家庭的感傷小說，兩者都表達對過去的一廂情願或烏托邦幻想，但各具獨特形式，表現於角色、場景、情節、目的與價值等面向；Stern(1992)發現當代廣告分別運用這兩大懷舊主題形式風格以滿足消費者不同的心理需求；本研究則發現，此兩大主題在現今台灣大致上是以上懷舊與洋復古的型態呈現，接下來將對兩組共四個主題間形式風格的對應處加以說明。

根據Stern，歷史懷舊的要角是神祇、準神話式角色、歷史人物與卓越人物，與之呼應的洋復古常見的是後兩者，如影星奧黛麗赫本、<sup>28</sup>瑪琳黛德麗、<sup>29</sup>美國前第一夫人賈桂琳歐納西斯與名模崔姬、導演希區考克<sup>30</sup>藝術家安迪沃荷；<sup>31</sup>個人懷舊的主要人物是平民百姓與親朋好友，與之對應的土懷舊亦然，充斥其間的多為一般人印象中街頭巷尾常可見的典型人物(雖不免有刻板印象之嫌)，如《懷念老台灣》中擦拭及修補皮鞋的小販、牽豬哥的男子、放牛的小孩、寺廟的彩繪師、牽

28 邱冠旭、沈家如，2004(2月5日)，〈玩舊穿新〉。《壹週刊》，141：132-134。

29 〈The Last Seduction 衝突魅力〉，2004(3月)，《Elle》，150：312-320。

30 楊茵潔、陳為樂，2007(3月)，〈時尚特輯：60復古狂潮A-Z〉。《美麗佳人》，167：190-200。

31 〈新摩登60〉，2003(11月)，《Men's Uno》，頁78-93。

著孫子逛廟會的老阿媽(康原, 1995)以及《老台灣柑仔店》中戴著老花眼鏡撥算盤的雜貨店老阿伯、操濃厚口音而臂上刺有「反攻大陸」的外省老鄉;知名人物雖亦有但少見,其名聲限於本土,且常隨時間流逝而從大眾記憶中消褪,如漫畫家劉興欽、綜藝節目五燈獎的主持人阮翎與丘碧治、電影海報手繪師陳子福等等(蕭學仁, 2003)。

在場景的面向,歷史懷舊的特色是利用服裝、道具、建築等裝置精心打造富時代氣息的場景,而洋復古可從本文先前討論年代氛圍的建構時所檢視的範例看出其手法之類似;至於個人懷舊,重點在於富感傷氣息的童年家園,與之對應的土懷舊亦同,以家宅與社區鄰里為主。

就目的而言,歷史懷舊致力於將過去重建為黃金時代,把日常消費的現實世界轉變為失而復得的天堂(Louv, 1985; 轉引自Stern, 1992),提供因當下種種情勢而焦慮不安的大眾逃遁之處,而從洋復古慣常瀟灑的奢華濃豔氣息——這點在不時懷想台灣早年艱困與匱乏的土懷舊對照下更為鮮明——也可觀察到相仿企圖;雖然洋復古所回顧的年代間,歐美國家經濟狀況確實優於台灣,但文本中的富麗堂皇與其說是反映史實,不如說是和歷史懷舊採用了相仿的「將過去重建為黃金時代」的策略。至於個人懷舊,其目的是重返與再現過去,讓當代人能將從前與現在的自己有所聯繫以建立認同,而沿時間軸呈現一連串物件與再現的土懷舊亦流露類似期盼。

最後,就物件的價值與功能來看,歷史懷舊將過去的光環籠罩於現在的商品上為其增值,與此相關的商品通常是社會能見度較高者如時尚精品與汽車房屋等;個人懷舊裡,物件被視為時代的符號與個人過往的紀念物,相關商品社會能見度相對有限,通常以居家生活為重心。前述對比亦可見於洋復古和土懷舊,時尚導向的前者以過往氛圍為當下新品加值——不論在符號或交換價值上;常民導向的後者雖亦

常有行銷目的，<sup>32</sup>但較未使過往臣屬於當下，而是透過物件再現與年代氛圍提供接收者重返過往的契機，或是連結當下與過往。

前述比較顯示出土懷舊和洋復古的關係，與「個人懷舊相對於歷史懷舊」相當類似。值得注意的是先前羅曼史(Radway, 1984)與廣告(Stern, 1992)的案例中，個人與歷史懷舊是取自於某一國族或區域歷史的前後兩段，前者回顧的是距今十年至七十年者，後者則源於自七十年前一直回溯至上古的這段時期，因此兩者不僅是對照性的，也是互補性的——不僅在於兩者的連結可構成完整的歷史時間，亦在於兩者表達了某個文化的多種面向：高雅的與常民的、歷史的與記憶的、想像的與經驗的、集體的與個人的。

反觀土懷舊與洋復古，雖在形式風格尚可與個人／歷史懷舊平行類比，也表達前述的多種文化面向，但最根本的差別在於，此兩者並非源於同一歷史的前後期，而是分別取自不同國家／區域的同一時期。

那麼，台灣自己的歷史懷舊或復古呢？根據廖炳惠(2001)，台灣自50年代以來受制於國民黨的文化政策，一方面提倡現代化，另一方面維護中國傳統，後者除「大中國意識型態」制式歷史教育外，在大眾傳播的領域表現於廣播與影視媒介中反覆播送的古裝俠義與明、清、民初的宮中秘辛，這些節目使觀眾一方面對中國文化有所認同，另一方面沈醉於歷史虛構或擬像中而遺忘現實。古裝俠義與宮廷秘辛或許稱不上是復古(就創造性運用過往風格樣式以產製新品或為新品增添年代氛圍而言)，但和歷史懷舊有著共通基調：是從遠古至距今七十年前的、神話傳說的、卓越非凡的、富麗堂皇的、失落天堂與黃金年代的。

然而上述這些在解嚴後本土化、去中國化、多元化等成為當下發展趨勢後，雖不至於聲消跡匿，但先前聲勢與光環都一起消褪；其後

---

32 知名案例如2003年7-eleven超商「童年福利社」行銷活動與「原味覺醒」懷舊零食系列。

大眾傳播場域的歷史想像中，除繼起的土懷舊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外，大中國擬像消褪後所留下的歷史懷舊之空缺，政府有關單位所曾採取的種種文化保護與建立措施，一時看來似乎有助於本土歷史文化的進駐與填補。相關措施像是於2002年開設探索三萬年來台灣人生活的史前文化博物館、次年建立台灣五千年至一千八百年前十三行人文物的十三行博物館，或是修訂文化資產保存法，強調國民文化素養的培育及對鄉土文化認識的增進，並將文化景觀、文物及文獻、以及民俗、傳統藝術及語言等列為重點保存的對象。<sup>33</sup>教育、學術與民間文史部門亦有類似活動：對本土歷史文化的整理與探討、呈現與推廣，相關機構與系所的成立、中小學文史教科書的大幅修訂(包括降低文言文與中國史比率、收錄台灣文學作品、將台灣史獨立成冊、編寫「認識台灣」教材、實施鄉土語言教育等)。

儘管有諸多相關措施，但某種較全面性的本土文化認知乃至於本土歷史懷舊的區塊，並未就此順利形成，癥結在於新舊文化架構的持續角力以及本土歷史在敘事規模、完整性與正典地位等方面的相對弱勢。

自國府遷台後，台灣有形無形的政治與文化資本皆由大中國主義者所掌握，即使在解嚴甚至政黨輪替後，本土意識仍和大中國情節在各場域持續角力，如中小學文史教科書的爭議至今未歇：近來高中教科書九八課綱因文言文比率、論語孟子等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是否列為必修、中國史的比率與是否排除於本國史外等議題未能取得共識而暫緩實施。

此外，大中國取向的歷史再現向以大敘事為主軸，著重大時代、大人物與大事件，意圖開展出波瀾壯闊的氣勢，在此種文明觀(Willams, 1977)之下，數百年的台灣史與動輒數千年的大中國史相

---

33 該法最早於1982年公佈施行，從2001年起開始修訂，最後在2005年通過。

較，看似「狹隘的、地域性的小歷史」，在史觀或美學上都難以和後者相提並論(陳芳明，2002：112)。

由於長久的殖民壓抑，台灣史在學術研究、教育推廣、產業運用、大眾認知等面向均有所不足，儘管近年積極發展，但上述目標畢竟非一蹴可及，遑論形成有助本土歷史懷舊滋生的神話、傳說與偶像——不論是遠古神話、或是洋復古那種近代大眾流行神話。

歷史懷舊的空缺，就在大中國擬像消褪，而台灣本土歷史文化又無法充分填補的情況下，使得乘跨國資本主義之勢橫向移植的洋復古替代性進駐，反而成為懷舊版圖中歷史部分最顯著的區塊。如此看來，土懷舊與洋復古之間有著某種互補性：各司其職的兩者，合併來看勉強為當代拼湊出一個看似多元但其實稱不上完整的歷史想像，雖然其中的洋復古源自歐美，但並非與台灣過往全無實質聯繫：台灣的西化進程從日治時期就已開展，50年代起由於中美協防關係以及美援挹注等因素，美式商品與美式西方文化隨之大舉入台，80年代跨國資本主義經濟將台灣更進一步嵌入進以歐美日為主要脈絡的全球化消費文化網路中，本地讀者因此對洋復古的年代圖像具有一定的熟悉度；對較晚近的世代而言，洋復古有時或許比土懷舊更貼近經驗與記憶。

不可否認，洋復古的確可能在當代歷史想像的場域上和土懷舊相互競爭，但影響土懷舊最劇的，與其說是洋復古本身，不如說是其所體現的跨國資本主義模式下當代流行媒介的主要樣態，可見於拼貼裁剪、時序交錯、元素拆解、氛圍瀰漫等形式策略。

此種影響未必是負面的，若以時下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所積極投入的文化創意產業之觀點來看，洋復古頗多作法值得借鏡：以過往為文化資料庫，將其中的歷史記憶從時間與敘事中抽離，分解為元素與符號、重組為風格與樣式，以利不限時空的傳布與消費者的自由選用。

不過，上述作法應用於土懷舊會引發一些問題。首先，洋復古雖

與土懷舊共同呈現出多面向的年代風貌，和本土過往亦非全無實質聯繫，但是當代台灣流行媒介平台上的本土歷史圖像在先前所言之「歷史懷舊」面向依然有所不足，無論對文化資產的運用或主體重構的追求而言，其完整性、豐富度與凝聚力都將可能因此折損。

然而，最根本的問題或許在於，洋復古為開發與運用歷史文化資本提供了快捷有效的模式，但其中某些機制(美化、片段化、氛圍化、擬像化、去敘事、去脈絡、壓抑地方屬性等)卻可能使土懷舊與原初目標如歷史延續、記憶恢復、主體重構等背道而馳。但無論如何，洋復古的對照畢竟為土懷舊指出其不足之處與所可能採取或迴避的道路。

## (二)文化資產與後殖民語境

西方由於文化工業的行銷、現代化的反作用力、世紀末與千禧年效應、媒介的推波助瀾、嬰兒潮世代的中年焦慮等因素，使其對歷史記憶的運用與呈現傾向於產業與商品的、個人與心理的、美學與創新的，而台灣由於對傳統產業暨文化衰微的因應、全球化所帶來的競爭、重構本土歷史記憶與主體性的努力、以及60世代的認同追尋，而使得懷舊較偏向集體與國族的、傳統文化與歷史延續的、生活與務實的。但上述相對性的差異在跨國流行媒介的運作機制與形式風格影響下有趨同之勢，而且是趨向於前者。此種歷史商業化所帶來的影響，不只限於大眾流行媒介，亦可見於亦嘗試創造性運用歷史記憶的國家型文化創意產業計畫。

根據官方定義，<sup>34</sup>此計畫試圖透過創意或文化積累形成可資運用的智慧財產並創造財富及就業機會。此種價值創造的前提雖未必導致法蘭克福學派所指稱的那種標準化機械量產，但還是難免基於對利潤與效率的追求，透過資本化、組織化、機械化及產品研發與規模經濟

---

34 請見文化創意產業專屬網站<http://www.cci.org.tw/>

等機制加以發展。歷史文化被賦予營利目標並納入產業體系後，常經由一組序列化的模式，化為大同小異的象徵符號，產製出易於消費、流通與複製的商品與服務。除流行媒介的復古懷舊外，連國家型文化創意產業計畫列為指標的幾個案例亦然(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建於1908年的紅磚洋樓式市場建築西門紅樓成為舉行藝文表演、販售文化商品、提供餐飲消費的綜合平台；以建於1926年的美國駐台領事館為根據地的光點台北則從事電影院、書店、咖啡廳、展覽館的複合經營；而建於西元1914年、舊名圓山別莊的台北故事館，配合其英國都鐸式建築風格而提供相襯的室內裝潢與英式點心茗茶，另有法式料理及各項藝文展覽。這些案例可能是成功的歷史運用與文化行銷，但其隱憂與媒介懷舊相仿：空間與物化為時髦的消費商品與服務、成為流行文化的一環後，是否逐漸脫離原先的地方歷史脈絡而趨向同質、消弭歧異、呈現一組標準化的「特色」、並成為浮光掠影的嘉年華？這對歷史記憶又有何影響？

Harvey(1989)曾指出，在產業機制下，歷史記憶常以商品的型態加以保存、產製與行銷，而在綜合運用被Hewison(1987)稱為試圖建造「一個介入我們當前生活與過往歷史的膚淺平面」之文化產業機制與後現代形式風格後(p. 135)，歷史記憶往往淪為影像與模擬、仿作與古裝劇。透過媒介與產業，我們發展出剝削與剽竊歷史記憶的非凡能力：過往成為一個「龐大的資料庫」，按個鈕就可以立即存取並一再消費(Harvey, 1989: 85)；歷史被視為「相等事件的無盡累積」(Taylor, 1987: 105)，被無差別地大批重新挖掘出來，以創新或緬懷之名任意組合運用，轉化成當代某種面向。學者曾對此皆有所批判，Harvey指出：懷舊無止境地累積下，所有事物都以同樣的復古迷戀無差別地混合在一起；Jameson(1991)感嘆：我們只能用自己製作的歷史流行影像與擬仿物來尋找歷史，但它本身永遠遙不可及；Huyssen(2003)則認為：在文化工業的剝削下，市場上的歷史記憶過度飽和；原先是要用



來對抗當代跨國資本主義媒介環境下的瞬息萬變，到頭來歷史記憶自己卻也成為轉瞬即逝與破碎不全的。

本土懷舊在台灣書刊暨其他文化產業項目中逐漸如西洋復古般化為消費商品、影像與擬仿物的此一情形，或許可用「後殖民語境」的觀點來看待。根據張頤武(1995b)，後殖民語境指第一世界西方國家經由強勢經濟文化機制(如以跨國資本主義為後盾的文化工業與大眾傳播媒介等)對第三世界發揮主導作用，把自身的知識與權力觀點如消費神話與現代化論述等傳輸給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因此面臨再現危機：在尚未發展出切合時代需要又符合本地文化特性的機制與形式前，其建立文化主體性與恢復歷史記憶的努力往往先面臨歐美文化想像的競爭、吸納與覆蓋；其歷史文化若非被壓抑，就是循其模式重新組構，化為如西方流行文化所常見的那種光鮮亮麗的消費商品與視覺奇觀。

這種西方資本主義的媒介再現霸權並不是壓制性的，而是生產性的；其運作方式主要是加諸於形式而非內容(Wilk, 1995)，雖然此兩者到頭來終究難以切割。資本主義的商業與媒介體系提供了利潤動機、運作機制與結構形式，我們將之策略性挪用以滿足本地政治經濟與社會心理需求，為正形成的歷史圖像與文化想像提供形式與框架，將「地方」、「歷史」與「國族」加以發掘、組織及呈現，而某種本土的年代圖像與文化風貌得以浮現。此種藉由歐美形式框架組構本土歷史記憶的新文化敘事與想像，利用了商品戀物、視覺愉悅與創意玩樂的機制，讓過往生活點滴與當代消費娛樂結合，成為某種流行趨勢；在不與原先國族敘事正面衝突的情況下，不著痕跡地消解尚部分籠罩於既有架構者的可能抗拒，協助形成某種新歷史想像。

雖說本土意識並非因抗拒西方文化霸權或受其引導而生，但其產業機制與形式框架的策略性挪用的確可能對本土文化發展產生某些正面效應。除了協助新歷史想像形成外，尚能喚起公眾對傳統產業與文化的關注，並助其轉型為以象徵資本為發展基礎的新事業(王玉豐編，

2004)；更為理想性地，就是藉此喚起公眾的文化自覺並激發問題意識、促使大家共同發掘、累積與創造文化資源，並將文化向前推展(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

上述期待以及一些初步成果，或許是台灣社會對西方文化這一波進駐的反應有別於三十年前的部分原因。台灣在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時候，曾就資本主義對本土的影響及以現代主義為代表的西方思潮對台灣文學的主導作用加以思考及批判。在世紀交替前後，我們為了重構本土主體性、抗拒意識型態與實質上的大中國、並加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而在文化呈現上廣泛運用西方產業機制與媒介形式，但卻少見從前那種規模的自省，而是積極與上述當代架構混融並形成跨文化雜燴。

跨文化雜燴在台灣由來已久。台灣自十七世紀以來歷經殖民政權的數度更迭，較晚近則在韓戰爆發至60年代中期的美援時期大量吸收歐美文化，雖於70年代對過度西化加以省思，但80年代中期後卻隨解嚴而大量引進西方思潮並迅速全球化。數度被殖民所造成的複雜歷史脈絡與歷史斷裂、殖民遺產至今猶存的影響，以及因政治與地理上的邊緣地位而對外來事物的包容與接受(劉亮雅，2007)，在在都使台灣文化總是在與各國文化的交流與對抗、妥協及轉化間推展，向來呈現「跨文化」混雜(邱貴芬，1995)。其間，土與洋、新與舊、傳統與現代之間難以明確劃分，而是以不同程度相互滲透、揉合與折衷。

跨文化雜燴既是全球與本土的共存與交融，也是後現代與後殖民的角力與混雜——根據劉亮雅(2007)，此即解嚴以來主導文化的思想氛圍；後現代的多元化、去中心的精神與後殖民重構文化主體的嘗試持續對抗與協商(廖炳惠，2002)。將前者策略性挪用或許對後者有所助益，但前述「後殖民語境」的問題依然潛存。因此我們對西方形式架構可能對本土歷史文化帶來的影響必須密切注意，並設法自行建立較為全面的文化論述。

即使最終還是要將歷史記憶產業化，但產業化是對大眾提供更廣泛的認知、更多元的接收形式之手段，要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展現出具有本身特色的過往，還是要先對自己的歷史有更透徹的認識，一方面開發其多元面貌與價值，另一方面保留其植基於地方與人民的深厚根源。這種歷史記憶是動態的、有機的、體現於社會性中的，正如曾吉賢(2004)所言：人與物件的關係、物件背後屬於人的故事，這些點點滴滴的常民史才是足以揭示時代意義的歷史記憶。此種有機觀點下的過往並非只是由孤立物件或眾多元素所組成，而是體現於地方與群體中、並保有原先的日常多樣性；不再只是錯時斷裂的、物件元素的、美學風格的、商品與影像的、齊一與扁平的。對本土歷史文化有更透徹的認識後，若再加以精密多元的運用與廣泛的傳播，除達成產業目標外，或許亦可部分解決前述歷史匱缺的問題——因其癥結一方面在於因執著於某種純粹的本土過往而無法正視多重被殖民經歷所帶來的跨文化歷史遺產，另一方面則在於對歷史文化的發掘與其後的運用與傳播不夠徹底。

除了持續強化本土認知外，我們對於西方文化霸權亦需要更完整的剖析。產業機制與形式框架的結構與操作面必須透過政治經濟、社會歷史、思想美學等脈絡加以耙梳、深化、透視與揭露，無論是為了要更有效利用或是思索抗衡之道。另外，我們過度聚焦於歐美日等強權，因而對全球的見識有所侷限，應使目光更為開闊，以尋求啟發與聯盟的契機。

至於對歷史文化的運用，可採取多重且分歧而非如當今般單一卻折衷的路徑。這意味著，在具有較全面與透徹的本土與全球認知的前提下，可考慮以下就本文討論範疇所能提供的策略：

1. 若繼續朝恢復歷史記憶與建立文化主體的目標努力，最重要的是發展出能與自己過往、當下及可預見未來的文化型態、思維模式、生活實踐相稱、映現與突顯的獨特形式框架、美學論述與敘事模式、

甚至是傳播體系與產業機制；若如現今懷舊般將自己的歷史文化內涵安置於橫向移植的外來框架中，將如本研究對書刊復古懷舊的分析所顯示，對預設目標的達成將效果有限；採取折衷作法，所得到的效果也是折衷的。

2. 將恢復歷史記憶與建立文化主體的抱負暫時擱置，以產業模式對歷史文化加以經營、運用、與塑造，將之轉化為可供自由運用的創意元素與美學風格，並設置可供日後持續擷取與建構文化資源的豐富資料庫。恢復記憶與建立主體雖非預設目標，但還是有可能透過此路徑迂迴達成。

3. 可考慮將上述兩種作法結合，或是將兩者皆予捨棄。前者是以自行建構的獨特形式框架承載從自己的歷史文化中提煉出的創造性元素與風格，後者則是將建構框架與產業經營的任務一併擱置，純粹就歷史文化的本身加以認知。

上述途徑中，第一種作法雖於晚近流行文化中有印度寶萊塢歌舞片、日本動漫、拉丁美洲的電視連續劇telenovela等前例，且形式框架與論述模式可能已蘊含在既有的文化實踐中、尚待挖掘與提煉，但畢竟非一蹴可及者，不過卻具有最強的文化主體建構與文化衍生暨延續的潛力。雖然形式框架和文化內涵到後來難免逐漸分離，但後者卻會程度不等地內化於前者，而所有以前者來負載內容者皆受其影響。

第二種作法其實含有兩個可能會起衝突的力量：商業利潤以及美學創意。兩者都可分別主導歷史文化的運用，或是各自與第一種作法結合——後者可在較早期介入，而前者若過早介入可能會阻礙其發展。至於第三種途徑，需要注意的是後面那種作法並非暗示有「純粹」或「原初」的歷史與文化，重點是不以利潤、藝術或建構國族認同等目標或意識型態作為看待歷史文化的主要視角。

本文在復古懷舊那種以外來形式承載本土內涵的取徑外所提出的三種途徑其實各有侷限，所發展出的文化再現或主體性可能是多重、

不一致、甚至衝突矛盾的，<sup>35</sup>但整體而言後殖民語境或新文化霸權的疑慮較低，且有助於保持產業、文化與社會的活力，並激發多元的歷史圖像與豐富的文化想像。

---

35 當今主流商業媒介的古早台灣懷舊中，歷史記憶與文化主體的多重異質性是遭到壓抑的；此類懷舊所呈現與召喚者以閩南族群為主，客家與外省族群穿插點綴其間，而原住民族群往往缺席。上述作法迴避了同樣時空框架下不同族群歷史記憶的分歧與對立。這種對立不只是論述性而也是經驗與物質性的；除了文化差異外，其中還牽涉了權力衝突與歷史傷痛，具有顛覆主流懷舊與破壞單一國族主體性的潛能。以「古早台灣」重要象徵之一的「柑仔店」為例：在商業流行懷舊中，它除了是供應各項民生物資的早年重要生活場景外，對當今主流族群青壯世代而言，更是充滿童趣的溫馨記憶之所在。然而，同樣時空在原住民報導文學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樣貌與意義：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曾在《永遠的部落》(1990: 24)中控訴：「當小小的雜貨店持續收回族人的健康與財富，部落卻愈來愈衰弱貧窮。當貨幣物質的慾望陸續膨脹族人的眼睛，部落的心靈卻一寸寸萎縮」；達悟族的夏曼藍波安亦曾在〈原初的相遇〉(2004年3月31日)一文中描述作為主流族群壓迫機制之一的雜貨店對原住民帶來了何等物質與精神、文化暨生態的剝削及破壞：雜貨店(pananazangan)於1957年出現於蘭嶼，引進便利的勞動工具(keilamnai)和廉價的消耗物資，不但在價格與品質上欺壓島民，並帶來消費慾望以及多金為富的價值觀，誘使當地人以島上羅漢松、海芙蓉、蝴蝶蘭、珠光鳳蝶等原初物種進行交易；經營者致富後揚長而去，島上珍稀物種卻已遭搜刮殆盡，族人亦步向真正貧窮的命運。不可否認，懷舊向來有著美化過去的傾向，因此即使在主流族群的經驗中，柑仔店也絕非只是特定世代在懷舊氛圍下所「懷想」的童年樂土。然而，原住民的受壓迫記憶卻將懷舊為過往所塗覆的糖衣剝除，暴露其下的矛盾衝突。不過，這些威脅懷舊情愫與單一主體性的記憶，在消費娛樂導向的流行媒介中難以取得一席之地。但若是在以恢復歷史記憶與建立文化主體(且非單一國族主體而是正視歷史與當下的多元記憶與主體)、或是純粹就歷史文化本身加以認知的前提下，以前述柑仔店案例為冰山一角的潛在記憶或許能有更高的再現可能。

## 附錄一：

## 2007年《Here》、《Taipei Walker》、《Vogue》三份雜誌之復古懷舊報導一覽

《Here》				
月份	單元	主題	子題	備註
1月號	Shoots Here	年節親子在「懷舊卡通嘉年華」同歡		
3月號	特集	人氣經典小吃60家		卷首專題
5月號	專題	品味香港	體驗香港新舊文化	
7月特刊	專題	2007東台灣新登場NEWS!	花蓮縣創意文化園區	「玩樂東台灣」特刊
9月號	HEBO 美食館	流金歲月古早滋味		
12月特刊	專題	玩家長帶路 名人的旅遊紀事	吳睿哲的鐵道紀實旅程	「溫泉」特刊
		一泊二食 玩樂新主張	懷舊山城人文旅	
《Taipei Walker》				
月份	單元	主題	子題	
2月號	專題	中南部高鐵主題之旅	台南站：古都懷舊風情	
3月號	特集	設計感餐廳	巴洛克：以文藝復興時期華麗風格為設計概念的美味餐廳	
	What's up	懷舊下午茶		
4月號	特集	私房旅遊景點推薦	開車旅遊達人×鶯歌三峽私房景點 巴士×彰化古意美景愜意遊	
7月號	特集	悠閒夏遊一日間 避暑老街	湖口藝文風：在老街體驗藝文氣息， 品嚐冰涼的古早味 勝興復古味： 復古的夏季之旅悠閒又自在	
10月號	特集	秋冬造型全都在這裡	針織材質(厚實粗針+懷舊感) 漆亮皮 (復古+金屬材質未來感的漆皮)	
《VOGUE》				
月份	單元名稱	標題	相關內容	
1月號	Talking fashion	Chloe 復古別墅派對		
	Vogue's view	奇幻圖騰交響曲	春夏潮流中的古老的科學幻想	
	Good buys	復古圓點、冬日暖意		
2月號	In style	60年代再復活	深受60年代的影響的春夏鞋款。	
	Trend	閃亮的日子	60年代銀色系	
	專文	春韻迷情 Shortcuts	60年代迷你裙	
	專題	Glorious 60s 解密60年代	60年代的各種風格	
3月號	Vogue Gioiello	四元素的時空模式	復古四元素	
	Vogue Gioiello	立體球型	60年代珠寶設計風格	
	In style	成人式性感	60年代迷你風格與八〇年代性感訴求	
	Beauty 101	假睫毛技三步驟	復古假睫毛	
	Beauty now	春天變髮術	20年代髮型	

4月號	專文	迷你年代 Glitterati	60年代時裝
6月號	Hot now	特寫 土屋安娜	有關江戶時代煙花女子的電影《惡女花魁》
	Mode	越南行旅	造訪廿世紀許多歷史的縮影
7月號	專文	東方形廓 Soft structure	50年代復古早秋服裝
	Vogue Gioiello	穿梭風格年代	十九世紀末期至當代的珠寶設計風格
8月號	Vogue Gioiello	搖滾哥德風	歐洲中世紀 Gothic 哥德風格珠寶。
9月號	Vogue Gioiello	龐克搖滾	70年代龐克風格
	Beauty	發現古典	十五至十七世紀荷蘭畫風所影響的最新時尚
	Beauty focus	John Galliano的童話故事	十九世紀華麗氛圍的服裝秀
	Must buy	復古亮秋色	
10月號	專文	巴黎我愛你 Paris, je t'aime	20、30年代巴黎咖啡館風格的時裝
	專文	窈窕淑女 The new look	60年代時尚
	Gioiello	重返30年代	
	Trend	秋冬廣告蒙太奇	各種主題的廣告：復古、都會、未來
12月號	Food	港點翻新	加入西式點心創意的港點老師傅新作
	Beauty	新式古典	新式古典色系
	專文	早春氣息 Retro chic	50年代時裝風格

## 附錄二：

### 復古懷舊雜誌文本製作團隊之本地與跨國屬性(簡表)

雜誌	出版時間	母公司	類別	內容	形式	製作團隊
《壹週刊》	2004.03	香港	綜合	復古	專文	本地與跨國
《美麗佳人》	2007.03	法國	時尚	復古	專文	本地與跨國
《柯夢波丹》	2007.04	美國	時尚	復古	多篇專文	本地與跨國
《GQ》	2004.04	美國	時尚	復古	專題	本地與跨國
《DIY玩布置》	2003.09	台灣	生活	懷舊	專題	本地
《Men's Uno》	2003.11	台灣	時尚	復古	專題	本地與跨國
《Here》	2003.02	日本	生活休閒	懷舊	專題	本地
《7-Watch 情報誌》	2004.05 2006.09	台灣	生活情報	懷舊	專刊	本地

## 附錄三：

## 復古懷舊雜誌文本製作團隊之本地與跨國屬性(詳細分工)

刊物	篇名	製作團隊	
《壹週刊》 2004.02.05	玩舊穿新	本地	撰文、攝影、攝影協力、設計、影像合成、編輯、資料
		跨國	部分圖片提供：AP、AFP、©REX、corbis、聖諾漢、香港壹週刊、香港壹本便利、香港蘋果日報
《美麗佳人》 2007.03	時尚特輯 60復古狂潮 A-Z	本地	撰文
		跨國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Top Photo、台灣名人影像、Louis Vuitton
《柯夢波丹》 2007.04	復古春裝	本地	撰文
		跨國	圖片提供：Gucci、Emporio Armani、Diesel
	穿出 60's 自由風采	本地	撰文、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www.showbits.com、TDI、Lavin、Salvatore Ferragamo、Chanel、Yves Saint Laurent、Moschino、Cheap&Chic、Bvlgari、Cartier、Make Up Forever
	Back To 60's	本地	執行撰文、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Bally、Sole Alliance、Moschino、French Sole、Chanel、Salvatore Ferragamo、Max&Co
《GQ》 2004.04	Retro is future 復古最時髦 專輯		
	Remix 過往年代的美好	本地	撰文
		跨國	圖片提供：BMG 唱片、新力音樂、馬雅唱片
	Retro is future	本地	撰文
		跨國	攝影：Nathan Willock Michael Bells 圖片提供：A Space Odyssey/MPTV/Orion Press, Marc Newson, Eero Aarua, Snowcrash, Bettmann, Corbis, 法新社
	Reprint Retro color (復古四色輸出)	本地	執行(文)、攝影
		跨國	商品提供：Artemide, Flos, Rexite(喝采), Propaganda(青石), Alessi(冠文), Live(北歐櫥窗)
	Remix French Lounge Music (70's 節拍電擊法式沙發)	本地	撰文、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EMI唱片、映象唱片
	籃球鞋	本地	撰文、協力、插畫、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路透社、達志正片	



《GQ》 2004.04	走路鞋	本地	撰文、協力、插畫、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路透社、達志正片、moviestone collections
	足球鞋	本地	撰文
		跨國	圖片：達志正片 商品：台灣阿迪達斯、斐樂、蓋世威、美商必爾斯藍基……
	Return tennis 70's 優雅網球大風行	本地	撰文、圖片、攝影
		跨國	圖片提供：Corbis, LV, Gucci, 台北麗娜、中盛
	古老卻摩登發燒熱賣中	本地	文、攝影
The Young Time-Being 青春飛揚	本地	攝影、企畫製作、演出	
The Original Man in Black 原汁原味黑衣人	本地	撰文	
	跨國	攝影：Fred Woodward	
《DIY玩 布置》2003.09	新潮復古(布置懷舊空間新鮮入門)專題		
	童年柑仔店 台味舊物蒐集風	本地	撰文、攝影、版面構成；場地及蒐藏品提供：蕭學仁、黑松世界、陳華成、張文維、昭和町
	摩登普普風、復古洋風情調	本地	撰文、企畫、製作、攝影、版面構成；場地及商品提供：兔子聽音樂義式餐廳
	老實年代 意難忘往和風家居	本地	文、企畫、製作、攝影、版面構成；商品提供：尋寶跳蚤屋
	重拾十里洋場懷舊氣氛	本地	文、空間布置、情境攝影；空間提供：流蘇餐廳；珠繡作品示範、步驟攝影：快樂陶兵
《Men's Uno》 2003.11	Dandy 60's 新摩登60	本地	執行、文字企畫、攝影、化妝髮型
		跨國	服裝提供：中盛、LV、雅尼私比、Gucci、Prada、Joyce、Celine、Oliver Peoples；圖片來源：/9. Farbige Wohnfibel by Wohnzirkel Detmold (H.C.K.W. private collection)、Kiefer Wang
	60's issue: flashback	本地	撰文、攝影
		跨國	資料圖片提供：egg magazine, JOYCE, PRADA, H-PARK, ESLITE Gallery, Wooden Drawer, Mike Wholesale, H.C.K.W. private collection
	60's issue: trend	本地	撰文、商品攝影；商品提供：Working House
跨國		資料圖片提供：PRADA, MIU MIU, MOSCHINO, Pringle, LANVIN, LOUIS VUITTON	
60's issue: groovy	本地	文字、攝影、圖片提供：雅士、德亞	

《Men's Uno》 2003.11	60's issue: Movies	本地	撰文
		跨國	圖片提供： 貓頭鷹出版、二十世紀福斯、得利影視
	60's issue: Rock Is Back	本地	文字、攝影
		跨國	唱片、資料提供：誠品音樂敦南館、新力音樂、EMI維京、書籍提供：滾石文化
《Here》 2003.02	大台北懷舊地圖	本地	文字採訪、插畫、攝影、版面(風崗文化)
《7-WATCH 情報誌》 2006.09	漫步舊時光	本地	撰文、攝影；圖片提供：禪園花園景觀餐廳
《7-WATCH 情報誌》 2004.05	小城故事：全台15老鎮新生探密	本地	撰文、攝影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王玉豐主編，2004，《現代考工記，台灣產業文化資產調查與再生實務座談會專輯》。高雄：科工館。

方惠宗，2006(5月16日)，〈老樣子新流行〉。自由時報，E2。

瓦歷斯諾幹，1990，《永遠的部落》。台中：晨星出版社。

〈打造50's甜美淑女〉，2004(9-10月)，《美人誌》，156：46。

〈古老卻摩登發燒熱賣中〉，2004(4月)，《GQ》，91：118-120。

朱中愷、葉智鴻，2004(4月)，〈最有黑膠味藍調爵士盤〉。《GQ》，91：48。

尖端編輯部，2003，《懷舊商品情報誌：童年古早味》。台北：尖端。

李依倩，2006，〈歷史記憶的回復、延續與斷裂：媒介懷舊所建構的「古早台灣」圖像〉。《新聞學研究》，87：51-96。

何榮幸，2002(6月2日)，〈五年級要幹什麼？〉，《中時新聞專輯——五六七年級大門陣》。取自<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generations/50year/htm/91060201.htm>

沈家如，2003(11月)，〈武車飛仔火拼偉士牌少年〉。《壹週刊》，128：150-154。

林千玲，2007，《台灣女性時尚雜誌封面視覺設計之研究》。銘傳大學設計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宏達，2003。〈7-Eleven「童年福利社」讓王子麵大賣20萬包！〉。《e天下》，36。取自<http://www.techvantage.com.tw/emarketer/content/emlong2-1.asp>

- 林純雅、陳添壽，2004（4月），〈Reprint 60's復古四色輸出〉。《GQ》，91：223-227。
- 邱冠旭、沈家如，2004（2月5日），〈玩舊穿新〉。《壹週刊》，141：132-134。
- 邱貴芬，1995，〈「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頁169-192，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
- 阿推、蔡智鴻、陳添壽，2004（4月），〈Reissue 復古球鞋時髦大步走〉。《GQ》，91：230-239。
- 洛楓，1995，《世紀末城市》。香港：牛津大學。
- 〈秋日復古嬉遊記〉，2004（10月），《Elle Girl》，14：118。
- 〈流行玩復古〉，2004（10月），《Elle Girl》，14：22。
-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2004，《文化創意產業實務全書》。台北：商周。
- 夏曼藍波安，2004年（3月31日），〈原初的相遇：雜貨店〉。自由時報，第47版。
- 夏綠蒂，2003，《發燒的城市》。台北：聯合文學。
- 〈訪古懷舊情〉，2002（8月），《Taipei Walker》，64：54-58。
- 莎琳娜，2003（9月），〈50's-70's Retro Styles復古佈置新風潮〉。《DIY玩佈置》，5：14-44。
- 莫乃健、楊珮詠、蔡智鴻，2004（4月），〈Return 70's優雅網球大風行〉。《GQ》，91：240-243。
- 陳芳明，2002，《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週邊》。台北：麥田。
- 陳信元（無日期），〈全球化浪潮下的國際中文版雜誌〉，取自<http://www.fgu.edu.tw/~literary/hsinyuan1.htm>
- 陳柔均，2006，〈國際中文版女性雜誌內容本地化策略研究之分析〉。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2006年會」，台北，7月12-14日。
- 康俐雯，2003（6月28日），〈全台第一例民間自行建構文化園區：台南五條港再現生機〉。自由時報，49版。
- 康原、許蒼澤，1995，《懷念老台灣》。台北：玉山社。
- 張英進，2001，〈游離於香港與上海之間〉。《中外文學》，29(10)：51-67。
- 張建隆，1999，《看見老台灣》。台北：玉山社。
- 張尊楨，2004，《台灣老字號》。台北：上旗文化。
- 張夢瑞，2003（1月），〈不捨的青春：中壯族懷舊風引領流行〉。《光華雜誌》。取自[http://www.sinorama.com.tw/ch/print\\_issue.php?id=200319201082c.txt&mag=past](http://www.sinorama.com.tw/ch/print_issue.php?id=200319201082c.txt&mag=past)
- 張頤武，1995a，〈「人民記憶」與文化的命運〉。頁247-268，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
- ，1995b，〈全球性後殖民語境中的張藝謀〉。頁401-420，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

- 曾吉賢，2004，〈從保存到異化：談糖業鐵道的再利用與在生產〉。頁92-95，收錄於王玉豐編，《現代考工記，台灣產業文化資產調查與再生實務座談會專輯》。高雄：科工館：92-95。
- 黃金財，1998，《台灣懷舊之旅：古早台灣人的生活紀實》。台北：時報。
- 楊茵潔、陳為樂，2007（3月），〈時尚特輯：60復古狂潮A-Z〉，《美麗佳人》，167：190-200。
- 〈新摩登60〉，2003（11月），《Men's Uno》，78-93。
- 〈復古懷舊〉、〈閃耀復古浪漫〉，2003（9月），144：封面。
- 廖炳惠，2001，〈台灣當代公共文化的回顧與展望〉。頁82-106，收錄於盧建榮編，《文化與權力：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82-106。
- ，2002，〈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頁85-100，收錄於周英雄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
- ，2003，《文學與批評研究的通用辭彙編》。台北：麥田。
- 鄧景衡，2002，〈土餅、洋餅的戰爭與和平〉，《符號、意象、奇觀：台灣飲食文化系譜（下）》。台北：田園程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529-547。
- 劉文雯、蔣文宜、黃杰德、陳陸琳，2003，《懷舊：復古餐廳、酒吧、柑仔店》。台北：朱雀文化。
- 劉亮雅，2007，〈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解嚴以來的台灣小說〉。頁317-401，收錄於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
- 藍麗華、許麗娟、菜頭標、黃南禎、黃勝煌、盧大中、黃國政、風崗文化，2003（2月），〈大台北懷舊地圖〉，《Here》，64：38-62。
- 蕭阿勤，2005，〈世代認同與歷史敘事：台灣1970年代「回歸現實」世代的形成〉。《台灣社會學》，9：1-58。
- 蕭景引，2007（4月），〈重返美好60's〉，《柯夢波丹》，195：69-78。
- 蕭學仁，2003，《老台灣柑仔店》。台北：上旗文化。
- 〈優雅復古魅眼〉，2004（10月），《Elle Girl》，14：67-73。
- 〈懷舊正流行 老店展新生〉，2004（5月），《7-WATCH 情報誌：探索小城故事》。台北：樺舍，頁27-41。
- CAT，2003（11月），《Holiday》，87：41-47
- Hu, Christian, Wang Kenneth. 2003（10月），〈回到復古的未來〉，《Madame Figaro》，001：220-235。
- Mimiko，2002，《五年級青春紀念冊》。台北：圓神。
- Mimiko等，2001，《五年級同學會》。台北：圓神。

- 〈Nostalgia of 40's : 看見2003年的40's〉, 2003(10月), 《美麗佳人》, 126 : 306-317。
- 〈The Last Seduction 衝突魅力〉, 2004(3月), 《Elle》, 150 : 312-320。
- 〈20's復古混搭風〉, 2004(10月), 《Elle Girl》, 14 : 20。
- 〈40's 60's 90's 秋冬彩妝放映中〉, 2004(9-10月), 《美人誌》, 55 : 85-90。
- 〈50年代的懷舊氛圍〉, 2003(10月21日-27日), 《時報週刊》, 1339 : 75-78。

#### 英文部分

-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Press. (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 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台北: 時報)。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l, Mieke. 1997.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Second Edi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 Barnard, Malcolm. 1996. *Fashion as Communi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Barthes, Roland. 1972. *Mythologies* (A. Lavers,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57).
- Baudrillard, Jean. 1988.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by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Boym, Svetlana. 2001. *The Future of Nostalgia*. New York: Basic Books.
- Crang, Mike.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王志弘, 余佳玲, 方淑惠譯2003, 《文化地理學》。台北: 巨流)。
- Evans, Caroline. 2000. "Yesterday's Emblems and Tomorrow's Commodities: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Fashion Imagery Today." Pp. 93-113 in *Fashion Cultures: Theories, Explorations and Analysis*, edited by S. Bruzzi and P. C. Gibs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rijda, Nico Henri. 1994. "Emotions Are Just Functional, Most of the Time." Pp. 112-122 in *The Nature of Emotion*, edited by P. Ekman and R. J. Davids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bwachs, Maurice. 1992. *On Collective Memory* (L. A. Coser,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1950).
- Hartman, Geoffrey. 1997. "The Cinema Animal." Pp. 61-76 in *Spieberg's Holocaust: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hindler's List*, edited by Y. Loshit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Hewison, Robert. 1987. *The Heritage Industry*. London: Methuen.
- Huysen, Andreas. 2003. *Present Past: Urban Palimpsests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redric. 1991.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ehmann, Ulrich. 1999. "Tigersprung: Fashioning History." *Fashion Theory: The Journal of Dress, Body and Culture* 3.3: 297-321.
- Penn, Gemma, 2000. "Semiotic Analysis of Still Images." Pp. 227-245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with Text, Image and Sound: A Practical Handbook*, edited by M. W. Bauer and G. Gaskell. London: Sage.
- Radway, Janice. 1984. *Reading the Roman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Stanford, Michael. 1994. *A Compan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劉世安譯, 2001。《歷史研究導論》。台北：麥田)。
- Stern, Barbara. 1992. "Historical and Personal Nostalgia in Advertising Text: the Fin de Siecle Effect."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1: 11-22.
- Storey, John. 1999.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Arnold.
- Taylor, Brandon. 1987. *Modernism, Post-modernism, Realism: 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Art*. Winchester: Winchester School of Art Press.
- Titscher, Stefan, Michael Meyer, Ruth Wodak & Eva Fetter. 2000. *Methods of Text and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Sage, 2000.
- Wilk, Richard. 1995. "Learning to be Local in Belize: Global Systems of Common Difference." Pp. 110-133 in *Worlds Apart: Modernity through the Prism of the Local*, edited by D. Miller.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 Raymond. 1977.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enderland, Leila, ed. 1978. *Recycling the Past: Popular Uses of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viii.

# 再探台灣高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

范雲\*\* 張晉芬\*\*\*

##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Ethnic Differ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aiwan by Yun FAN & Chin-Fen CHANG

關鍵字：省籍、教育階層化、高等教育、教育補助費、軍公教部門

Keywords: ethnicity,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public sector

---

收稿日期：2008年3月14日；接受日期：2009年3月5日。

Received: March 14, 2008; in revised form: March 5, 2009.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週五論壇，感謝當初與會者，以及之後譚康榮(Tony Tam)、林南(Nan Lin)、陳婉琪與曾熾芬對於本文初稿所提出的批評與建議。作者也要謝謝葉盈蘭與江淑琳協助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張逸萍與張譽馨細心地協助製作表格與校稿。最後，非常感謝匿名審查人的詳盡指正。當然，所有的疏漏，概由作者負責。

\*\* 服務單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106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E-mail: fanyun@ntu.edu.tw

\*\*\* 服務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通訊地址：115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E-mail: chinfen@sinica.edu.tw

## 摘要

在討論台灣戰後教育的階層化時，如何解釋外省族群子女的平均高教育成就持續成為重要的研究課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經常被簡化為外省族群長期受雇於軍公教部門，因此軍公教部門所提供的教育補助，是造成外省族群子女較易獲得高教育成就的主因。本文借用西方族群研究以及國內教育階層化文獻，從省籍間社會結構位置的差異性，試圖檢證這個說法的有效性。利用1999年「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的資料，本文檢視軍公教部門及教育補助政策的效果，及相對於家庭背景的解釋力。以是否取得大學或更高學歷作為依變項，本文發現，在加入父親的階級和教育變項之後，軍公教部門的效果變得不顯著。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的領取持續具有顯著效果，但解釋力偏低。整體而言，由於外省籍父親輩的平均教育程度較閩南及客家族群高，同時也有較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因而提高了外省籍子女取得較高教育成就的機率。根據分析結果，本文認為，關於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應該更細緻地去理解族群集體生命歷程的差異、移民後社會結構位置、以及在特殊情境下族群特殊社經組成的影響。更多對於教育機會平等的關心應放在探究如何改善農民及勞工階級子女的教育機會。

##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studied topics in Taiwanese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has been how to explain the relatively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of mainlanders in post-war Taiwan. Some researchers argue that, since public sector employees are entitled for educational subsidies for their children and mainlanders seem to concentrate in public sector, the second-generation mainlanders are able to achieve higher educational status because of the political favor. Other studies show that family background is still important in



explaining ethnic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Analyzing the data of “Basic Social Survey of Taiwan Ethnic Relations” conducted in 1999, we find tuition subsidies to have significant but limited power in the equation. Father’s education and class status a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respondent’s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We conclude that past argument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uition subsidies need to be questioned and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working and farmers classes.

## 一、前言

關於台灣的教育階層化研究，過去學者已累積相當豐碩的成果。在這些研究中，省籍與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持續成為關注的重點。多數研究發現，與其他族群相比，外省族群子女擁有平均較高的教育成就(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王宏仁 1999；駱明慶 2001；陳婉琪 2005)。即使有研究者發現這個差異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甚至變得不顯著(陳婉琪 2005)，但是，如何解釋省籍之間的教育成就差異仍然是個焦點。這些研究結果，大約可以區分出兩個不同的方向：多數的研究發現，在控制父母親教育成就、家庭社經背景、城鄉差距、家庭子女數，以及公部門的效應後，族群身分本身不具有影響力(Tsai and Chiu 1993；吳乃德 1997；王宏仁 1999；駱明慶 2001；陳婉琪 2005)；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即使控制了上述家庭社經背景之後，族群身分仍然具有獨立的影響力，例如族群的語言資本等(蔡淑鈴 2001)。隨著新資料庫的建立，這些持續不斷的學術對話也出現更細緻的發現。例如：晚近陳婉琪(2005:1)藉由較大的樣本數進行拆組與次群體比較分析後，發現「對高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來說，並沒有統計證據顯示，省籍對於任何出生世代之上大學機會有影響；但在低教育家庭背景的子代中，則存在相當顯著的省籍效應」。

綜合過去研究的發現，對於父母教育程度、社經背景或家庭手足、城鄉差距這類涉及社經背景的變項，較無爭議。公部門效應及教育補助等具有政治排除效果的變項效應，則似尚無定論。過去台灣社會關於族群正義的討論，集中在政治領域內權力分配的不均。將省籍與教育成就取得的差異歸因於「政治力」，則是將族群正義的關懷從政治領域擴及到社會流動的公平性。有些研究者在詮釋為何任職於公部門會影響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時，將公部門效應等同於政治性教育補助的結果。例如，吳乃德(1997：164)在發現公部門變項具有顯著效果

時，做了以下的結論：「除了教育補貼外，我們實在無法找出其他具有說服力的理由」。「本文的結論是：政治力量是造成本省籍民眾和外省籍民眾在社會地位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吳乃德 1997：136）。針對這個政治力的解釋，之後的研究者卻較傾向於現有教育階層化文獻的說法，也就是將教育成就歸因於個人所屬的家庭經濟地位。例如，王宏仁（1999）發現，由於小學與初級中學是義務教育，因此在這兩個階段公部門教育經費補助的影響並不大。針對公部門有哪些特性會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駱明慶（2001）則提醒除了教育補助之外，還可能有社會資本的效果，例如公部門內的社會網絡可能提供有利於子女升學的資訊。整體而言，這些針對公部門特質以及其是否等同於教育補助政策的討論，雖具有啟發性，但由於資料的限制，也都僅止於作者的推論。

本文作者認為，針對族群間教育成就差異是否源自於政治力這個敏感議題，研究者應當盡可能細緻、反覆地討論。沿著現有文獻發現的線索，本文想要探討的實證問題是：到底什麼是「公部門效應」？公部門是否即代表「教育補助政策」？公部門和教育補助政策是解釋台灣省籍間高等教育差異的重要因素嗎？

## 二、文獻探討

由於研究成果相對較為豐碩，我們首先回顧西方學者關於族群間教育成就差異的相關解釋，作為本文的借鏡。其次，我們將藉由整理國內的文獻，提出本文試圖檢測的幾個解釋機制。

早期西方學者傾向於從生物遺傳的觀點解釋族群之間教育成就的差異（van den Berghe 1967）。這樣的解釋方向，隨後很快就被族群文化特質論反駁與取代。後者主張，並非所有的族群文化與信仰都會鼓勵或壓抑子女的學習，其中有極大的差異存在；但這些文化特質論者卻

又同意，隨著移民時間的增長，在移入族群逐漸被「同化」後，族群間的成就差異會逐漸減少(Bodnar 1976; Child 1943; Goldscheider and Zuckerman 1984; Warner and Strole 1945)。延續這條辯論軸線，多元文化論者批評文化趨同論的說法是一種「文化中心主義」。多元文化論強調移民會主動地形塑自己的文化以適應所移入的新社會(如，Greeley 1976)，未必完全採納「主流文化」的意識型態或價值觀。

事實上，每個不同的族群移民到新社會後，都會因為該族群座落在新社會中不同的結構性位置，而展露出一些獨特性。就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而言，相對於前述各種文化論者採取單一決定性因素解釋移民子女的教育成就，Joel Perlmann (1988: 219)認為：「族群是獨特歷史的產物。我們不需要尋求單一的主要變項來解釋族群的特質，也沒有一種單一的概化可以囊括幾個因素之間的所有關係。更好的方法是以比較的觀點，著眼理論，來探索個別的族群歷史。」他與幾位研究者因此主張，族群間不同的社會結構位置才是造成子女教育成就差異的主要原因。他們所提出的「社會結構位置」概念包括該族群的第一代階級組成、教育背景、家庭資產與經濟生產模式、家庭人數、以及居住地區的集中與分布等(Hirschman and Falcon 1985; Perlmann 1988)。

為驗證社會結構位置的解釋，Perlmann (1988: 203)針對美國普羅威頓斯地區(Providence)的住民進行研究，發現不同族裔子女是否進入高中、所受的教育年數，或是之後所擁有的職業，有極大程度是受到該族群原生家庭社會結構位置的影響。家庭階級身分、經濟生產模式，家庭資產以及家庭子女的數目，共同解釋了普羅威頓斯這個地區1880年之後，族群間的重要教育成就差異。Perlmann的發現和他所提出的解釋與後來台灣或國外社會學家使用全國性抽樣調查資料分析後的結果相當類似。根據過去的研究發現及台灣的特殊性，本文將台灣教育階層化中省籍差異的因素分成四個機制，包括外省第一代移民者的人力資本、階級特性、軍公教人員的特殊部門優勢、及群聚的現

象。以下我們分別論述這些機制的內涵。

### (一)政治移民的高人力資本

親代教育背景對於子代教育成就的顯著影響，早已經獲得研究的支持，且是跨文化、跨時間的社會現象；有些研究顯示，教育背景代間傳承的機制甚至是獨立於階級之外。以台灣的研究為例，Tsai(蔡淑鈴)與 Chiu(瞿海源)(1993)即發現，在中學以上學歷的取得上，族群身分的效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親的職業、教育程度以及居住於都會區與否。孫清山與黃毅志(1996)則發現，在控制職業背景之後，父親或母親的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的教育成就也較高。這兩位作者指出，在台灣的教育體系中，升學的篩選是以考試制度為主，考試成績的評定也多符合公平原則，教育的取得與廣義的文化資本有關，包括家中讀書環境以及父母對子女教育資源的投資程度。

放在台灣族群組成的發展脈絡中來看，外省與本省父母間的平均教育成就差異，一直被認為是解釋省籍間教育成就差異的重要原因。以較近期的一項研究為例，Chen(陳玟君)與 Lin(林毓玲)(2005)指出，控制父母親的社經背景，特別是教育程度後，外省族群相對於閩客族群的教育優勢幾乎完全不存在。<sup>1</sup>她們因此論述，影響外省族群教育成就高於其他族群的是父母的「偶然性的族群組合」(incidental ethnic composition)，而非政治排外(political exclusion)政策。後者指的即是教育補助費政策，前者指的則是台灣族群組成的一個特殊現象：外省移民的平均高人力資本。

外省族群在1945年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遷徙來台超過一百萬人，並不是當時中國人口的隨機選樣。<sup>2</sup>這群政治移民或難民(political

---

1 她們所分析的依變項是教育年數。

2 根據王宏仁(1999)整理的資料，從1946年到1957年期間，由大陸移民來台灣的平民超過了一百萬人，大部分是在1949年之後來的。

refuges)的組成中固然有被抓來充軍的大量低階士兵，但也包括國民黨政府的大批文官或將領，或是為了躲避戰亂的地主家庭子女、商人、文化工作者等；這些人的共同特徵之一即是平均教育程度高於當時的中國大陸民眾(齊邦媛、王德威 2004)。如果親代的教育程度是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外省移民的高教育程度自然也會提升其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

## (二)外省移民的階級特質

另一個幾乎與教育程度同等重要的家庭背景因素是職業階層；或者用更結構性的說法，即是階級。階級如何影響教育成就，有幾種解釋。其中之一是「期望論」，強調父母所屬階級的經驗會影響到其本身對於教育的價值觀，以及對待子女的態度和管教方式(Kohn 1984)。白領階級對於子女的教育期待較高，也較可能用啟發的方式，引導子女的學習興趣；相對的，藍領家庭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較低，也較可能以直接訓斥的方式，要求一時的成績。另一種說法則是強調「職業的傳承」，白領家庭較可能期待子女繼續從事白領性質的工作，而這些工作通常需要較高的學歷作為進入的門檻。藍領家庭也較可能傳承較為熟悉的技藝或行業給下一代，相對而言，他們也比較不會特意鼓勵子女追求較高的學歷。另一個晚近興起的說法則是「文化資本論」，認為上一代的社會階級背景對下一代教育成就的影響，至少有部分機制是透過對子女文化資本的直接傳承或投資(Bourdieu 1977)。

當然，階級的差異不只是展現在文化面或價值觀上，還有經濟面的影響。階級結構的內部區隔除了資產或所得之外，也包括經濟活動的參與方式，例如被雇或是自雇；穩定的經濟來源，或是變動性較大的生存模式；生產方式屬於勞力、技術、或知識密集等。這些區隔會影響家中成員參與經濟活動的可能性、性質、或程度。Perlmann (1988)即發現，對於經濟生產模式是以勞力投入為主的第一級產業或

工人階級家庭而言，較需要子女提早進入就業市場，分擔經濟生產工作，以維持家中的經濟水平。因此相對於其他階級身分的家庭，農業或勞工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機會成本較高，下一代的教育成就即可能受到負面的影響。他比較美國愛爾蘭裔、義大利裔，猶太人以及非洲裔的教育成就後發現，個別族群對於子女教育重視與否是其移民前的文化特質與移民後的社會結構位置共同作用的結果。例如，猶太人對教育的重視，會因為其移民後中產階級的社會位置而更被強化，而義大利觀念中孩童應當貢獻於家庭經濟的想法，應是反映父母親成長於工人或小資產階級背景的經驗。父母親的階級及所擁有的資源多寡，會影響其對於子女工作前景的認知、對教育的價值觀以及小孩是否應立即貢獻於家庭經濟的判斷，進一步形成子代教育成就族群化的差異（Perlmann 1988: 217）。<sup>3</sup>

在台灣戰後的歷史中，不同省籍間的階級區隔也頗明顯。先從產業的分布來看，本省籍就業人口主要集中在第一級產業(45%)，其次是第二級產業(18%)，從事第三級產業的比例相當低。以農業而言，閩南人是主要的就業人口；這個族群屬於小資產階級的比例也較高。相對於外省人中有高比例是白領階級，閩南或客家族群則較集中於藍領階層。根據王宏仁(1999)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所做的分析，在1950年代外省人的職業分布中，有將近18%是軍人，同時也有較高比例屬於資本家與中產階級。依據社會結構位置的理論，此一本、外省族群階級位置的差異應該也會反映在對於子女教育的重視程度和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

3 曾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 Gary Becker 所提出的新家庭經濟論(1993)也持類似的論述。認為父母在考慮是否讓子女繼續升學時，會理性地評估家戶內的資源分配，做最有效率的運用。但我們認為，Joel Perlmann 的說法及發現更細緻地呈現了階級的作用。

### (三) 公部門作為族群主要經濟模式

在台灣的社会及政治結構中有一個特殊的現象，即是外省人高比例出現在軍公教部門；這當然也是與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有大批軍公教人員跟隨來台有關。其次，作為新移民，其個人和親屬網絡的限制，使得這些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外省人較難看到或找到公部門以外的就業機會。除了網絡限制與公部門的直接誘因效果之外，缺乏農地、資金、其他的謀生技能、及不諳閩南語或客家語等因素，也可能促使外省族群認為離開公部門不易得到發展機會。鍾基年針對外省第一代的訪談，即透露出外省族群對子女未來工作機會的認知及評估：

沒有事業基礎，沒有土地、沒有錢、基礎差，你不做公教人員做什麼？假如我們有田地、有工廠、那麼幹嘛做公教人員。第二代也是一樣受這個影響，最主要就是沒有田產……（鍾基年 1993: 34）

……眷村的人喔，沒考上大學，都會回到軍校。（鍾基年 1993: 68）

鍾基年發現，由於缺乏祖產與廣大的親族網絡作為風險的緩衝機制，外省第一代傾向於認為私部門不穩定、或外省人在其中可能沒有發展，而希望第二代繼續往公教部門發展。如果其子女沒有高教育成就或是進不了公教部門，就傾向於選擇到軍校或軍隊發展。讀書進公教部門，或是去當軍人成為外省族群的主要職業選擇。

由於公部門的升遷、薪資結構皆與文憑高度相關，如果父母期望下一代進入公部門，也可能更為重視子女的學歷高低，因而對子女會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期待。由於外省人有高比例出現在軍公教部門，這些人對子女的高教育期望自然也會提高外省族群的整體期望值。林鶴玲（1998）即發現，在控制其他背景條件後，外省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



望是各族群中最高的，其次是客家，然後才是福佬族群。<sup>4</sup> 這個發現間接地支持了這樣的觀點。

然而，如同我們前面所述及的，過去的研究皆發現公部門背景是解釋外省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變項，即使這個因素隨著歷史的演進已漸趨緩和，<sup>5</sup> 在資料不足的限制下，在解釋何謂公部門效應時，部分研究者傾向於推論為這是單一教育補助政策的效果(蔡淑鈴、瞿海源 1992；吳乃德 1997)。他們認為公部門效應主要是因為公部門福利政策中的教育補助使得外省人的子女更有能力升學(如，吳乃德 1997)。另一方面，王宏仁(1999)卻指出，造成省籍間教育成就差異的原因，與其說是教育補助造成的，不如說是個人所屬的家庭社經地位。他認為由於小學與初級中學是義務教育，因此國家的教育經費補助影響並不大。<sup>6</sup>

關於公部門的勞動待遇，如果暫時不區分組織內等級或職位差異，公部門的共同特性是穩定性高、有固定的經濟報酬。此外，還附有一些固定收入以外的福利(fringe benefits)，如早期的食物配給、及直到如今還存在的退休金及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因此，教育補助費在軍公教部門受雇者的勞動報酬中的重要性其實相當有限。整體而言，公部門對教育成就的影響是相當清楚的。只是這個影響是否完全是透過單一教育補助政策所造成，則是本文將試圖釐清的。

---

4 根據她的統計分析，回答男孩應受到大學教育的福佬人有 19.9%，客家人與外省人分別是 24.7% 與 27.3%；回答女孩應受到大學教育的福佬人有 13.0%，客家人有 14.4%，外省人則有 19.6%。

5 駱明慶(2003)的研究發現，由於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的制度，1950 至 1961 年間參加高普考的外省族群有進入公務體系的優勢。隨著公務人員錄取機會的修正，此一優勢逐年遞減。

6 台灣是從 1947 年開始實施六年國民小學的義務教育，1968 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教。

#### (四)外省族群在台北市的群聚效應

族群社區(ethnic neighborhoods and community)是晚近西方族群研究發展出的重要概念。無論是出於自願選擇或是被迫決定,族群在居住上的特殊性,往往界定了一條看不見的線,創造出有形或無形的社區隔離。族群的社區群聚往往會形塑出特殊的文化態度與社會網絡,形成族群內部同質的教育或職業價值觀。當然,並非所有的族群社區效應皆是正面的,它可能有助於成員或其下一代的向上流動,卻也可能反向捆綁其流動的機會,端視其整體的社會處境是否擁有足夠的優勢資源。William J. Wilson(1987)即指出,非裔族群之所以無法脫離劣勢,主要原因之一是群聚於貧窮的族群社區,使其較少接近「主流」的工作典範,因而阻礙了其在教育與工作的期許及向上流動的機會。M. Patricia Fernandez-Kelly(1995)指出,被隔絕的邊緣性社會網絡限制了非裔子弟走出族群貧民窟的可能性。相對的,Zhou(周敏)(1997)援引社會資本的概念,指出族群社會網絡作為社會資本的一種,為子女的學習提供了社會支持與社會監控的正面力量。她發現,族群網絡中的亞裔移民家庭及其子女,由於經常相互激勵與監督,有助於克服外在環境的不利因素。而此一網絡的建立也與族群群聚現象有關。

如果族群社區與都會優勢重疊,也可能產生加乘效果。以美國為例,大紐約地區是全美國文化資源最為豐富的核心地帶。Barry R. Chiswick(1983)的研究即曾指出,猶太裔美國人有48%集中在紐約、紐澤西以及康乃狄克州這三個大紐約都會區,相較之下,其他族裔的美國人居住於此的比例則只有20%;原本就較為重視子女學校教育的猶太族群因而有較高比例的人口可以受惠於紐約的人文及社會資源。

在台灣,由於外省族群作為政治移民的歷史特性,使得它比其他的族群更為集中居住在都會區,特別是首都台北市。根據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的一項調查(2004),外省族群的人口總數中有將近六成(59.4%)集中在台北縣市、高雄縣市以及省轄市都會區;閩客族群居住

於都會區則僅有四成多(44.0%)。如果僅就台北市來看，這項調查也顯示，外省族群中有20.8%居住在台北市，其他族群的相對比例則只有10.7%；外省族群居住在台北市的機率比其他族群高出一倍。也有學者計算1966年時不同地區的族群人口分配，發現外省人中居住在台北市的比例更是高達36.3%(王甫昌 2002: 35)。外省族群因而有較高比例的人口可以利用台北市豐厚的經濟及社會資源，有利於下一代的學習，以及認知到高等教育對於在都會區找到理想工作的重要性。

再從機會結構的觀點來看，過去的研究也發現，由於資源的差距，都會區的高等教育機構較多，都會區上大學的機率遠高於非都會區，台北市又高於其他都會(駱明慶 2002)。<sup>7</sup> 因為外省族群有高於其他族群的比例集中在台北市，首都所擁有的多樣化及高數量的高等教育機構也是其子女高教育成就的重要作用機制之一。Tsai與Chiu(1993)的研究發現在中學以上學歷的取得上，族群身分的效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父親的職業、教育程度以及居住於都會區與否。Wang(王宏仁)(2001)也有類似的發現。Lin(林南)(1997)控制居住地以及農業與非農業部門(某種程度反映城鄉別)的差異後，發現族群身分對教育取得並無顯著影響。

綜合前面的討論，至少有四個重要機制可用以解釋台灣外省族群子女與其他族群之間在高教育成就上的差異：(1)由於政治移民的特殊歷史，外省族群的父代，平均而言擁有比本省族群父代較高的教育程度，這種優勢也會傳遞到下一代；(2)除了士兵之外，許多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族群原先的職業特性是屬於白領階級，其中有些人隸屬於公教部門，有些則屬於民間人士。外省族群特殊的白領階級特性，對子女教育成就也形成一定的正面影響；(3)作為許多外省族群的主要經濟模式，公教家庭的收入穩定以及對文憑的強調會使得父母對子女

---

7 駱明慶(2002)所定義的都會區包括台北市、台北縣、高雄市、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新竹市以及基隆市。

有較高的教育期待，其子女也可能有相對較高的教育成就。由於教育補助僅為軍公教福利中的一環，即使有助於子女升學，也無法完全取代公部門的影響；最後，(4)由於台灣中央政府所在地為台北市，高比例任職於公部門的外省籍家庭於是較有可能集中居住在台北市，同時也帶動其他外省人聚集在台北市的機率。再加上高等教育與文化資源集中於台北市等結構條件，均有助於外省籍後代獲取較高學歷。以下我們將說明本文的資料來源、分析策略、及所使用的變項。

### 三、資料來源與研究假設

#### (一)資料來源

台灣多數關於族群教育經驗差異的研究是利用「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如，黃毅志 1999)，或是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的資料(如，駱明慶 2001)。雖然都是全國性的抽樣調查，但由於並非專門為族群研究設計，這兩項調查可使用的變項因而受到一些限制。本文所使用的資料是一項在國科會專題計畫下所進行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以下簡稱「台灣族群調查」)(王甫昌 2000)。這項於1999年所進行的調查是對全國20到70歲的人口進行隨機抽樣，總共訪問了3,500個樣本。由於該調查主要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族群研究，有較多題目反映族群經驗的差異。與本文相關的題目即包括受訪者父親任職單位的部門別、是否領取過軍公教子女的教育補助費、及是否居住過眷村等。

在研究策略上，本文的依變項是完成大學教育與否。除了義務教育之外，台灣高中職以及專科教育也頗為普及。但至少在近幾年大量擴充之前，大學教育機會仍然有限，而且就讀成本較高，大學文憑仍然是台灣社會高教育成就的一項指標。因此，以是否擁有大學或以上的教育程度作為依變項，應可更敏銳地呈現造成外省族群教育優勢的

原因。利用2000年「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蔡淑鈴(2004: 73)探討獲得大學及專科學歷與否的分析，發現父母的教育成就和職業地位均有顯著的影響。雖然與本文所使用的大學學歷與否有些差異，但由於這是較相近的研究，作者將在之後的行文對照本文與其之分析結果。

## (二)變項的操作化與研究假設

**父親的教育程度對於子女的教育成就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幾乎已經是文獻上的一致發現。本文的假設也是如此(假設一)。平均而言，移民來台的外省族群第一代擁有較優勢的教育背景，預期會有利於其下一代整體的教育水準。

階級位置是代表台灣族群之間社會結構差異的一個重要指標。過去的研究顯示，由於處於經濟上的弱勢以及職業傳承的影響，農、工階級的子女在教育階層化的結構中最有可能處於下層的位置。相對的，白領階級較重視子女人力資本的養成。而資本家階級雖然擁有最優勢的經濟地位，但期待下一代具有承接家庭事業的能力可能更勝於對教育重視的程度。因此，我們預期在所有的階級位置中，**父親為白領階級的受訪者，獲得大學或以上教育成就的機率也較高(假設二)**。

為了與現有的研究對話(如，吳乃德1997；駱明慶2001)，關於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的測量，我們將受雇於政府或公營企業的工作者列為一類，其它的就業部門則合併為另一類，以突顯受雇於軍公教部門者的子女教育成就可能具有的特殊性。前面提及，軍公教部門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結構位置，受雇者具有穩定的工作，子女的教育較不會因為家庭經濟狀況的不穩定而無法升學或被迫中途輟學。再從職業傳承的效應而言，由於學歷是進入公部門的重要條件之一，尤其是大學文憑，父親任職於軍公教的**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應會有更高的期望**，其子女的教育成就也會相對較高。由於資料的限制，過去的研究無法釐清

軍公教部門對教育成就的影響是否等同於軍公教補助政策的影響，驅使我們著手進行這個研究。我們認為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必須被實證資料檢驗的命題。根據過去的研究，本文首先假設領取軍公教補助這個變項對於教育成就具有正向的影響。這是本文的第三個假設。因此，「台灣族群調查」中關於受訪者是否領取過軍公教補助費的題目，將用於分析模型中。至於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與教育補助單一政策的效果之間，是否為完全重疊的關係。我們的假設是：**即使控制了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這個變項，由於穩定的經濟生活及父母的期望，軍公教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應還是有獨立的影響(假設四)。**

最後，本文也將檢驗族群群聚效應的影響，所使用的變項是「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這個變項同時代表教育機會結構的區域性差異和族群群聚經驗。就第一個意義而言，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區，由於人口較多、經濟條件較佳，中級和高等教育的機構通常也愈多，即使成績不好，學生也相對有較多的升學機會。再就族群群聚經驗的差異來說，本文的第二節提到，外省族群集中於台北市的比例高於其占全國人口數的比例，教育文憑也是在都市內尋求發展的重要籌碼。我們預期居住於台北市對於受訪者獲得高教育成就有正面影響(假設五)。

整體而言，作者認為在台灣的外省族群家庭所具有的特性是：集中於軍公教部門、高比例從事白領工作、高比例居住於首都台北市，以及遷移到台灣時即擁有平均較高的教育水準。控制這些因素之後，即使族群類別(閩南、外省、及客家)依然呈現顯著效果，其解釋力至少將大為降低。本文的第六個假設是：**在控制這四個機制之後，族群的影響將會呈現不顯著或是解釋力有限。**

在變項的操作上，父親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分成小學／國小或以下，初中／國中畢業(或肄業)、高中／職或專科學校畢業(或肄業)、及大學或以上畢業(或肄業)，而以最後一項為對照組。受訪者父親的階級測量主要根據生產工具的擁有與否及工作場所的特性區分，所依

據的資料是受訪者15歲時父親所從事的職業。<sup>8</sup> 本文將階級位置分成資本家、白領階級、小資本家、農民、及藍領階級五類。在分析時，是以白領階級為對照組。「台灣族群調查」也詢問了受訪者父親的就業身分及部門別。在本文的分析中是將任職於政府部門、公營事業單位、及學校者均列入軍公教部門，至於領取教育補助費的變項，在調查中回答曾經領取過軍公教補助的受訪者被歸為一類。為了凸顯外省人集中於台北市的現象及可能因而產生的教育優勢，本文將居住於台北市視為一類，住在所有其他地區的受訪者合列為另一類。另外，受訪者的年齡與性別是一般教育階層化研究中常用的變項，在本文中也將被當作控制變項。一般在分析薪資或教育年數時，為控制年齡效果的遞增或遞減，除了年齡之外，研究者會加入年齡的平方值。由於本文的依變項是虛擬變項，並非一個連續值，使用平方值以呈現增、減效果並無實質意義，因此在分析模型中未加入年齡的平方項。最後，Perlmann (1988)提到影響教育成就的結構性位置不只是社會面的，還包括家庭結構，主要是指人口組成。在「台灣族群調查」資料中，有一個題目詢問受訪者的兄弟姊妹人數。本文在分析時也加入此一變項。

#### 四、研究發現

表一所列的是各變項的次數分配，我們僅扼要討論幾個關鍵性變項的結果。受訪者的教育程度主要分布於高中、高職、或專科學校層級。受訪者父親的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國小及小學以下」者，占全體樣本的71.0%。父親的工作屬於農、工階級者，合計為65.7%。至於就業部門的分布則相對較為分散：超過40%的受訪者父親屬於自雇階級，另有接近15%擁有雇主的身分，超過22%的受訪者父親受私人企

8 若父親已經去世或退休，「台灣族群調查」則詢問去世或退休前的工作。

表一：變項描述統計

變項名稱	百分比	樣本數
受訪者性別		3,496
男	50.1	1,752
女	49.9	1,744
受訪者平均年齡	41.2	3,495
受訪者父親省籍		3,365
閩南	75.9	2,554
客家	10.3	347
大陸各省	13.8	464
受訪者教育程度		3,487
國小(小學)或以下	27.1	946
國中(初中)	13.1	456
高中職、專校	46.3	1,616
大學或以上	13.4	469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3,364
國小(小學)或以下	71.0	2,389
國中(初中)	9.8	329
高中職、專校	13.8	464
大學或以上	5.3	182
受訪者父親階級		3,057
資本家	9.1	278
白領階級	17.6	538
小資產階級	7.6	232
農民階級	34.1	1,042
勞工階級	31.6	967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		3,115
自己一個人，沒有雇用其他人	40.3	1,254
為政府或公營企業工作	17.5	544
自己當老闆，且雇用其他人	14.7	458
為私人雇主工作	22.2	692
其他、幫家裡工作	5.3	167
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3,496
是	7.1	248
否	92.9	3,248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		3,432
台北市	10.6	365
其他地區	89.4	3,067



業雇用，超過 17% 受雇於軍公教或國營事業部門。而僅有 7.1% 的受訪者回答曾領取過軍公教子女的教育補助費。

由於本文的研究主題是關於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針對族群和其他自變項之間的關係，我們也做了交叉分析，結果陳於表二。根據表中的數據，在教育程度的分布上，閩南籍的受訪者有超過四分之

表二：族群與各變項之交叉分析結果\*

變項名稱	閩南族群	客家族群	外省族群
受訪者教育程度**	(2,546)	(346)	(464)
國小(小學)或以下	29.5	24.3	8.8
國中(初中)	13.8	12.1	7.3
高中職、專校	45.2	50.3	56.7
大學或以上	11.5	13.3	27.2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2,471)	(333)	(442)
國小(小學)或以下	76.2	72.1	38.0
國中(初中)	9.0	11.7	13.6
高中職、專校	12.2	12.9	25.3
大學或以上	2.6	3.3	23.1
受訪者父親階級	(2,237)	(319)	(392)
資本家	9.3	7.8	10.5
白領階級	12.6	16.3	50.5
小資產階級	8.2	8.2	5.4
農民階級	36.0	42.3	7.9
勞工階級	33.8	25.4	25.8
受訪者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	(2,279)	(321)	(393)
是	11.6	16.5	45.5
否	88.4	83.5	54.5
領取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	(2,554)	(347)	(464)
是	3.2	4.6	32.3
否	96.8	95.4	67.7
受訪者 15 歲以前居住地	(2,552)	(346)	(404)
台北市	9.9	5.8	22.0
其他地區	90.1	94.2	78.0

\* 括號內為樣本數，其餘為百分比。

\*\* 根據  $\chi^2$  檢定結果，表中各自變項類別間的族群差異均達統計顯著 ( $p < .0001$ )。

一、客家籍則有接近四分之一具有國小或以下程度，外省族群僅有該項學歷的比例只有8.8%。但後者中有27.2%是大學畢業或擁有更高學位，閩南及客家籍擁有同樣高等教育的比例分別只有11.5%及13.3%。外省族群受訪者擁有大學文憑的比例是閩南族群的2.4倍、客家族群的2倍。這三個族群在中學教育階段的分布也有差距，但不及小學及大學階段明顯。

至於父親教育程度的族群分布，閩、客籍受訪者的父親輩中超過70%只有國小或低於國小程度的學歷，外省籍擁有這項學歷的比例幾乎只有這兩個族群的一半，為38.0%。在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分布上，族群差異也十分明顯。外省籍的父親輩中有四分之一具有高中(職)或專科的學歷、接近四分之一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外省籍父親輩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接近閩南籍的九倍、客家籍的七倍。和受訪者相比，不同族群之間上一代教育程度的差異更為明顯，高教育程度確實為外省籍第一代的集體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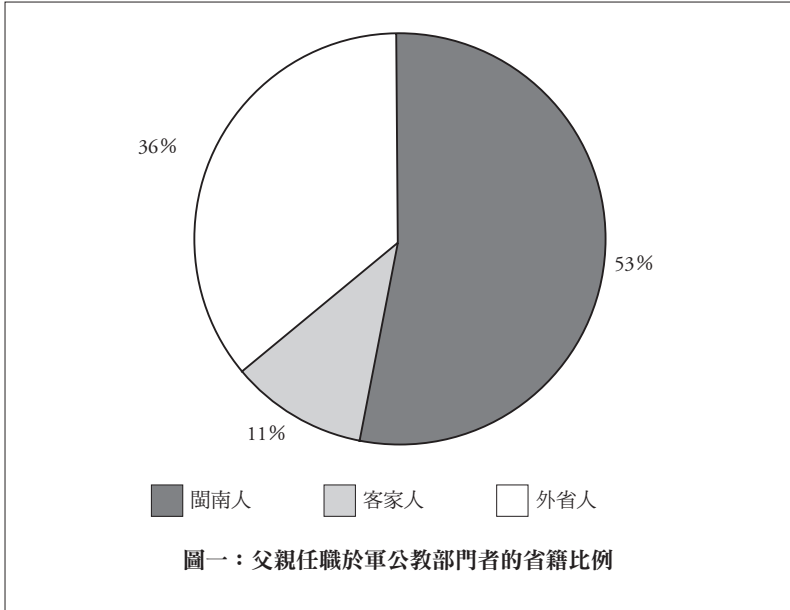
在階級分布上，有接近七成的閩、客受訪者父親屬於農、工階級，外省籍的比例只有33.7%，還不及這兩個族群的一半。相對的，外省族群父親輩屬於白領階級的比例為50.5%，遠高於閩(12.6%)、客(16.3%)族群，族群間階級位置分布的差異也十分明顯。

外省籍受訪者父親的就業部門也顯著地集中在軍公教部門(45.5%)。此一族群受訪者曾領取過軍公教補助費的比例也相當高，為32.3%，也成為外省族群的特色。

相對於另外兩大族群，外省籍受訪者15歲之前居住於台北市的比例高達22.0%，也遠高於閩南和客家籍受訪者(分別為9.9%及5.8%)。

為了釐清教育補助費與公部門之間的重疊性，在呈現多變項分析的結果前，我們先用圖形說明族群、軍公教部門、及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否三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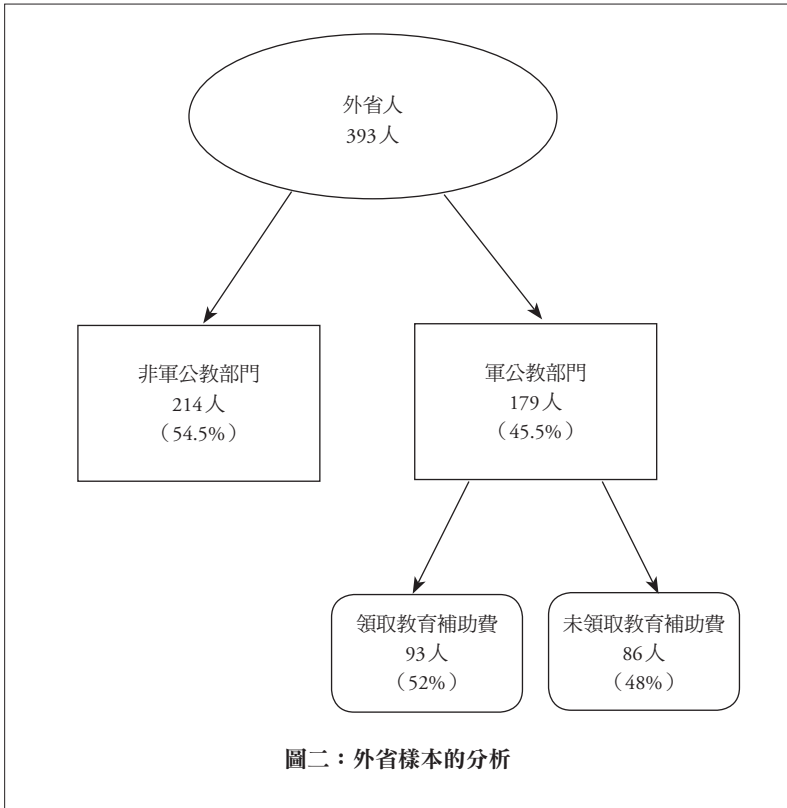
圖一顯示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者的省籍比例。在這個部門中，



53%的就業者為閩南族群，其次為外省(36%)及客家族群(11%)。因此，外省人當中進入公部門的比例雖然相較其他族群為高(見前面的表二)，不過，外省族群占軍公教部門所有受雇者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將這個部門等同於外省人，並非正確的推論。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與其他兩個漢人族群相比，客家人父親輩屬於公部門的比例明顯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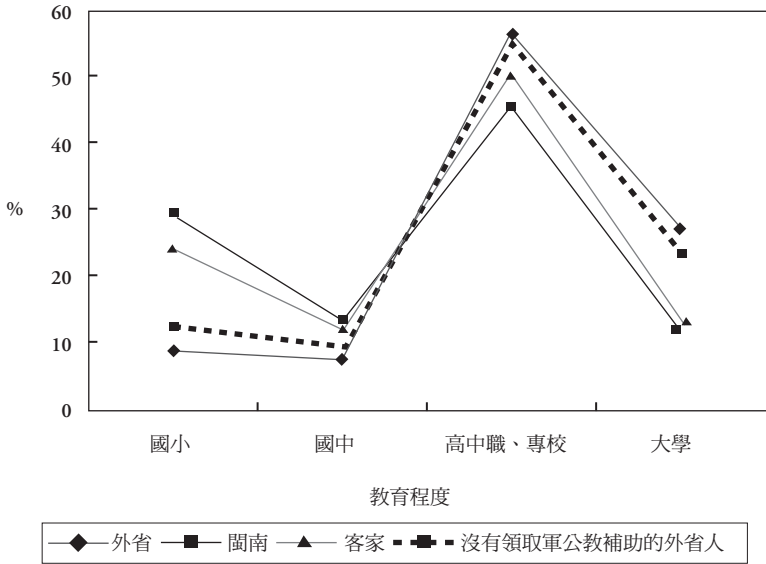
圖二是針對393位外省人樣本分析的結果。<sup>9</sup> 在這個樣本當中有45.5%其父親曾經或現在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而在這些受訪者中，有略超過一半的人曾經領取過教育補助費。兩者相乘，父親在軍公教部門、同時拿過教育補助費的外省人比例為23.7%。因此，一方面超過一

9 根據原來的調查資料，外省樣本有464人，其中有37人回答其父親沒有工作，另有32人回答「不知道」父親的工作或拒答。而在剩餘的395人中，又有2人被列為「不適用」。



半的外省受訪者，其父親並不任職於軍公教部門；另一方面，並非所有父親在軍公教部門工作的外省人都領取過教育補助費。當然，家庭中母親或是其他監護人也有可能任職於軍公教部門，使得受訪者可以領取教育補助費。不過，軍公教部門中的約聘人員、在私立學校任職的人員、或是領取單一薪俸者，是不能領取子女教育補助費。父親任職軍公教部門確實不代表就必然會領取教育補助費。過去的研究將父親任職軍公教部門的顯著效果推論為是因為領取教育補助費的關係，有可能是過度推論。

至於圖三則是比較不同族群受訪者在各教育階段的比例，及去除



圖三：不同族群受訪者在各教育階段的比例

領取過軍公教教育補助費樣本後的結果。在實線部分，三個族群在國、高中的比例相當接近；但是在小學的階段，閩、客族群的比例明顯高於外省族群，而在大學部分則外省籍的比例明顯高於另外兩個族群。<sup>10</sup> 虛線部分是未曾領取過補助之外省人在各教育程度的比例。即使未領取教育補助，這些外省籍受訪者擁有大學或更高學歷的比例仍明顯高於閩、客族群；而國小畢業的比例則明顯低於閩、客族群。這個簡單的描述性分析顯示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外省族群高教育程度之間並未如過去一些文獻所宣稱的是高度相關。由於這三個漢人族群在大學教育階段呈現明顯的差異，本文在研究策略上決定使用具有大學或更高學歷作為依變項，也是符合圖三結果所示。

合併這三個圖所顯示的訊息有兩個，第一，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

10 這也是表二所呈現的結果。

門並不同於子女領取教育補助費。第二，扣除領取教育補助費的受訪者之後，外省族群仍然擁有相對於其他族群較高的教育成就。以下的多變項分析將試圖進一步釐清四個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機制的各自效果。

表三所示為影響受訪者高等教育成就的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的結果。我們將獲得大學或碩博士學位者視為一類，其他學歷的當作參考組。為比較主要變項對於模型解釋力的影響，表中的模型是逐步加入預測變項。最後一個模型則包括所有的變項。為了驗證過去關於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對於外省族群教育成就的影響，我們首先放入這個變項。<sup>11</sup> 模型一顯示，領取過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費的受訪者，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高於沒有領取過的受訪者。但此一變項的解釋力約只有4%。

模型二的結果顯示，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受訪者，確實有較高的機率獲得高等教育學歷，符合原先的假設。需要注意的是，教育補助費的測量是限定為軍公教類別，因此與軍公教部門這個變項之間有一些重疊，應是可以被預期的(亦請參考圖二)。根據模型二，領取過教育補助費與父親任職於軍公教部門均有顯著影響。這顯示了軍公教部門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機制並非與教育補助費的作用完全重疊，而是另有其他機制。

事實上，在整體分析中，解釋力最高的變項是父親的階級位置和教育程度。我們首先說明加入階級後的效果。根據模型三，和白領階級相比，小資產階級、農民與工人階級家庭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率顯著較低(後續的分析將顯示，即使陸續加入其他家庭和個人變項之

---

11 本文作者在處理分析模型時，試過許多組合，包括將族群作為第一個放入的變項或是先考慮軍公教部門等。由於教育補助費的領取被有些研究視為造成外省子女高教育成就的關鍵，本文所使用的調查資料也有這個變項。為凸顯此一變項的重要性，我們於是將領取過教育補助費與否作為分析模型中第一個放入的變項。

表三：影響高等教育成就之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大學或以上程度=1)

自變項	1	2	3	4	5	6	7
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無=0)	1.580*** (.142)	1.014*** (.174)	.735*** (.177)	.498** (.186)	.456* (.189)	.426* (.197)	.401* (.203)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非軍公教部門=0)		.834*** (.136)	.156 (.164)	.122 (.169)	.143 (.171)	.168 (.173)	.321* (.180)
受訪者父親階級(白領階級=0)							
資本家			.043 (.192)	.399* (.205)	.366* (.208)	.394* (.210)	.441* (.215)
小資產階級			-.744** (.236)	-.182 (.254)	-.212 (.259)	-.203 (.260)	-.224 (.226)
農民階級			-2.206*** (.218)	-1.415*** (.244)	-1.356*** (.249)	-1.322*** (.252)	-1.121*** (.259)
勞工階級			-1.077*** (.160)	-.436 (.182)	-.417* (.183)	-.398* (.184)	-.444* (.190)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大學或以上=0)							
國小				-1.714*** (.213)	-1.751*** (.218)	-1.783*** (.223)	-1.509*** (.234)
國中				-1.258*** (.235)	-1.299*** (.240)	-1.329*** (.243)	-1.187*** (.252)
高中職、專校				-.804*** (.197)	-.824*** (.200)	-.842*** (.206)	-.787*** (.213)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非台北市=0)					.474** (.154)	.450** (.155)	.466** (.159)
受訪者父親省籍(外省=0)							
閩南						-.005 (.169)	-.063 (.175)
客家						.179 (.233)	.110 (.238)
受訪者年齡							-.023** (.007)
性別(男=0)							-.407** (.120)
兄弟姊妹數							-.016 (.036)
常數項	-2.039***	-2.112***	-1.061***	-.156	-.207	-.192	.695*
Log-likelihood	-1,322.4	-1,191.1	-1,081.7	-1,027.0	-1,001.2	-985.5	-951.4
Pseudo R <sup>2</sup>	.040	.052	.123	.152	.160	.159	.166
分析樣本數	3,487	3,097	3,029	2,950	2,907	2,809	2,765

\* p&lt;.1; \* p&lt;.05; \*\* p&lt;.01; \*\*\* p&lt;.001.

後，農、工階級的弱勢狀況仍持續存在，而農民階級的子女尤其處於不利的位置)。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入階級變項之後，獲得教育補助費與否的影響固然減弱，但父親所任職的部門別卻變得不顯著。關於公部門與階級變項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會在最後一節做仔細的討論。整體而言，階級變項的加入使得模型的解釋力增加了一倍以上。

第四個模型顯示關於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符合原先的假設，同時也與過去教育階層化的研究一致：父親的學歷愈高，子女的學歷也就愈高。父親教育程度的影響同時減弱了階級和領取軍公教補助費的部分效果。

模型五的結果顯示，受訪者15歲以前是否居住於台北市在統計上也有顯著效果。幼時居住在台北市的受訪者獲得高學歷的機會大於居住在其他地區的受訪者。<sup>12</sup> 加上此一變項後，勞工階級子女的教育成就不如白領階級的現象再度在統計上出現顯著。

在模型六中，我們加入族群類別，以檢驗在控制其他重要的影響機制後，族群本身差異的效果。這與之前研究所得到的結果，包括Tsai與Chiu(1993)、Lin(1997)、及Chen與Lin(2005)，都相似。顯示父親的階級、教育程度、和幼時居住地等，是區分族群身分差異的重要因素。

最後一個模型則是將其他控制變項，包括年齡、性別、及兄弟姊妹人數，全部放入後的結果。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與否、父親的階級位置和教育成就、受訪者幼時居住地的效果依然顯著。年齡及性別的影響方向也大致符合一般的預期：年輕世代及男性，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較高。意外的是，在考慮個人特徵後，軍公教部門的效果反而提升：顯示部門別效果的變異性相當大。和最初的模型一相比，模型

---

12 這個結果也與駱明慶(2001)的發現一致。此外，本文也曾嘗試分析眷村的效果。在單獨放入「居住於眷村」後，效果是顯著的；但在加入族群變項後，眷村的居住效果即不再顯著。且由於居住於台北市已足以反映族群的群居效應，於是在模型中未加入居住於眷村的變項。



七的解釋力增加了13%，達到了17%。表三的結果一方面顯示了決定高等教育成就的因素相當複雜，還有很多的因素未被本文所掌握；另一方面，則指出家庭背景與子女教育成就之間的密切關係。

雖然軍公教部門的效果在模型三之後並不顯著，然而由於有將近一半的外省人集中在此一部門、其他族群任職於此部門的比例偏低，部門別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是否在族群內部造成差異，也值得做些檢測。我們於是利用同一模型對各族群進行分析。由於本文的重點是在比較族群間而非族群內教育成就的差異，因此本表的結果將只是陳於附錄。分析的結果顯示，在外省受訪者中，影響受訪者教育成就最重要的因素是父親教育程度、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及性別。而除了(農民)階級外，此一模型沒有其他變項能夠顯著說明客家籍子女間教育成就的差異。相對於領取教育補助費在外省人及客家人各自族群內部都沒有顯著效果，模型中所使用的許多變項可以顯著的區分閩南籍的受訪者之間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例如領取教育補助費與否、父親階級、父親教育程度、和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整體來說，不論是在哪一個族群的內部，任職於軍公教部門都沒有顯著的效果，教育補助的效果也只出現在其中一個族群(閩南族群)。

## 五、結論與討論

根據本文的分析結果，即使教育補助這個變項有顯著影響，其重要性仍遠低於父親階級背景、父代教育程度，甚至是15歲以前居住於台北市等其他族群特徵。有領取補助者也是樣本中的少數，即使排除這群受訪者，外省族群獲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遠高於另外兩個漢人族群。值得注意的是，領取教育補助與否的本身，也是一種成績的篩選。子女如果沒有繼續升學，就不會得到補助；教育補助金確實讓子女升學後可以減少家庭中的經濟壓力，但如果家中的經濟需求更迫

切，則子女甚至缺乏升學的機會或可能性，遑論領取任何形式的教育補助。

大體而言，本文的主要發現與既有文獻吻合。父親作為白領階級、擁有高教育程度、或受訪者幼時住在都會區等，對於下一代獲取高教育成就均有正面的效果。既然外省族群父親輩有高比例屬於白領階級及擁有高等學歷，並且集中居住於台北市，這些族群身分特徵有助於其下一代獲取高等教育成就。本文的貢獻則在於有助於釐清過去研究推論上的一些迷思。第一，藉由分析較為細緻的族群調查資料，使我們更為瞭解教育補助與公部門這兩個變項之間的關係，讓爭議已久的猜測，有了被經驗資料檢證的機會。我們的研究發現，教育補助及公部門的影響其實是獨立運作，公部門的影響又遠不及父輩的階級屬性與教育背景。任職於軍公教部門的父親對於子女的教育期望較可能是建諸於家中較穩定的經濟來源及對子女職業的期望，但是階級傳承的機制是對子女直接的教育期望，這與父親輩任職於私部門或公部門無關。因此，就社會整體而言，部門別並非是一個重要的區分，階級更能夠區隔父親輩對於子女教育期望的差異。階級可以凸顯農工家庭的弱勢及子女升學機會的缺乏。公教部門雖有穩定收入，但是有穩定經濟來源的家庭並不只限於軍公教部門。就教育機會的傳承而言，階級的區隔比部門別差異更重要。本文的發現證實階級以及教育程度的重要性，這與蔡淑玲(2000)使用具有大學及專科學校程度與否為依變項所得到的結果相似。過去的一些文獻似乎誇大了部門別的影響，而對於外省族群的高教育程度有錯誤的歸因。外省籍父親輩有許多的族群特徵或身份，有些身份是有助於下一代的教育成就，有些則效果相對有限。

由於階級和教育程度是影響下一代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當外省族群的父輩有較高比例屬於白領階級及高教育程度時，這些背景上的優勢自然會惠及下一代。根據陳婉琪(2005)的說法：「教育程度佳、資

源豐厚的家長無論如何都有辦法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提供適時的支援與彌補」，而且這項結果不分省籍。因此，根據本文的分析，閩南族群有較高比例處於上大學的教育機會最為弱勢的農民與勞工階級，族群整體平均教育程度因而低於其他族群。如何從結構面改善農工階級家庭子女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應該是教育階層化的學者未來關懷的焦點。

如同前面所提及的，族群是獨特歷史的產物，我們不需要尋求單一的主要變項來解釋族群的特質，也沒有一種單一的概化可以囊括多重因素之間的所有關係。移民社群的社會組成特質，移民的原因、過程與路徑，以及遷移到新社會中所座落的社會結構位置，都會影響他們對生存機會的認知，以及相對應的各種適應策略和生命態度的修正。因此，我們對台灣外省族群高於其他族群的教育成就的解釋，必須被放置在這樣的族群脈絡化中來理解。

在台灣，過去的研究者已經解釋了族群間的教育成就差異。我們應當努力的方向是，除了更細緻地理解以及詮釋這些差異之外，未來也應進一步去探索不同脈絡下個別族群獨特的歷史經驗，是如何與階級、性別等因素交錯形塑他們今日的風貌。如何以比較的觀點，著眼理論，來解釋個別族群內部異質的歷史，是值得繼續努力的方向。

## 附錄：

影響高等教育成就之二項式邏輯迴歸分析(大學或以上程度=1)：依族群別分

自變項	閩南	客家	外省
領取軍公教教育補助費 (無=0)	.801** (.309)	.820 (.737)	.093 (.294)
受訪者父親就業部門 (非軍公教部門=0)	.348 (.235)	-.247 (.547)	.232 (.382)
受訪者父親階級 (白領階級=0)			
資本家	.480* (.261)	.182 (.662)	.573 (.524)
小資產階級	.058 (.312)	-.980 (.785)	-.920 (.866)
農民階級(註)	-.874** (.303)	-1.328* (.702)	
勞工階級	-.258 (.237)	-.833 (.551)	-.698 (.459)
受訪者父親教育程度 (大學或以上=0)			
國小	-1.939*** (.329)	-.946 (.892)	-.814* (.427)
國中	-1.608*** (.359)	-.656 (.905)	-.591 (.426)
高中職、專校	-1.075** (.314)	.456 (.765)	-.851* (.355)
受訪者15歲以前居住地 (非台北市=0)	.495* (.198)	-.623 (.683)	.585* (.306)
受訪者年齡	-.025** (.008)	-.031 (.021)	-.005 (.016)
性別 (男=0)	-.413** (.146)	-.304 (.387)	-.552* (.272)
兄弟姊妹數	-.011 (.041)	.004 (.114)	-.003 (.102)
常數項	.880 (.389)	.743 (.895)	.069 (.677)
<b>Log-likelihood</b>	-667.2	-101.0	-169.6
<b>Pseudo R<sup>2</sup></b>	.157	.196	.100
<b>分析樣本數</b>	2,141	303	303

\* p&lt;.1; \* p&lt;.05; \*\* p&lt;.01; \*\*\* p&lt;.001.

註：由於樣本中外省族群屬於農民階級的人數相對太少(表二)，因此分析時這個類別被統計軟體自動排除。

### 參考文獻

- 王宏仁，1999，〈1950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 1-35。
- 王甫昌，2000，《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88-2412-H-001-012。
- ，2002，〈族群接觸機會？還是族群競爭？：本省閩南人族群意識內涵與地區差異模式之解釋〉。《台灣社會學》4: 11-78。
- 吳乃德，1997，〈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167。
- 林鶴玲，1998，〈省籍性別文化的經濟影響：台灣家庭資源配置策略的省籍性別分析〉。《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4): 611-659。
- 孫清山、黃毅志，1996，〈補習教育、文化資本與教育取得〉。《台灣社會學刊》19: 95-139。
- 張晉芬、蔡瑞明，2006，〈勞動力與勞動市場篇〉。《台灣全志·社會志》，9。南投：國史館台灣文獻館。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 117-152。
-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147。
- ，2003，〈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的省籍篩選效果〉。《經濟論文叢刊》31(1): 87-106。
- 蔡淑鈴，2001，〈語言使用與職業階層化的關係：比較台灣男性的族群差異〉。《台灣社會學》1: 1-44。
- 蔡淑鈴、瞿海源，1992，〈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2 (1): 98-118。
- ，2004，〈高等教育的擴展對教育機會分配的影響〉。《台灣社會學》7: 47-88。
- 黃毅志，1999，《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北：巨流。
- 齊邦媛、王德威，2004，《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台北：麥田。
- 鍾基年，1993，《族群特質與職業生涯：外省籍族群從事軍公教行業原因之探討》。新竹：清華大學社會人類研究所碩士論文。
- Becker, Gary Stanley, 1993[1981],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odnar, John, 1976, "Materialism and Morality: Slavic American Immigrants and Education, 1890-1940." *Journal of Ethnic Studies* 1: 1-19.

- Bourdieu, Pierre, 1977,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Culture*. Beverly Hill, CA: Sage.
- Chen, Vivien Wen-chun and Evelyn Yu-ling Lin, 2005, "Political Exclusion or Socioeconomic Reproduction? Ethnic 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 in Taiwan." 教育階層化與家庭研討會論文。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Child, Irwin Long, 1943, *Italian or American?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Conflic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hiswick, Barry R., 1983, "The Earnings and Human Capital of American Jew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18: 313-335.
- Fernandez-Kelly, M. Patricia, 1995,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 in the Urban Ghetto: Implications for the Economic Sociology and Immigration." Pp. 213-247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dited by Alejandro Portes. New York: The Russell Sage.
- Goldscheider, Calvin and Alan S. Zuckerman, 1984,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J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ley, Andrew M., 1976, "The Ethnic Miracle." *The Public Interest* 45: 20-36.
- Hirschman, Charles and Luis M. Falcon, 1985, "Th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of Religious Ethnic Group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earch i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ocialization* 5: 83-120.
- Kohn, Melvin L., 1984,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on Parental Values and Practices." Pp. 119-132 in *Work and Family: Changing Roles of Men and Women*, edited by Patricia Voydanoff. Palo Alto, CA: Mayfield.
- Lin, Nan, 1997, "Persistence and Eros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Capit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in Taiwan." Pp. 103-145 in *Taiwanese Society in 1990s: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Symposium Series II*, edited by Ly-Yun Chang, Yu-Hsia Lu and Fu-Chang Wang. Taipei: The Preparatory Office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 Perlmann, Joel, 1988, *Ethnic Differences: School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among the Irish, Italians, Jews, and Blacks in an American City, 1880-193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sai, Shuling and Hei-yuan, Chiu, 1993, "Education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22): 188-202.
- van den Berghe, Pierre L., 1967, *Race and Racis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 Wang, Hong-Zen, 2001, "Ethnicized Social Mobility in Taiwan: Mobility Patterns among Owners of Small- and Medium-Scale Businesses." *Modern China* 27(3): 328-358.
- Warner, W. Lloyd and Leo Strole, 1945, *The Social Systems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William Julius, 1987,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hou, Min, 1997, "Segmented Assimilation: Issues, Controversies, and Recent Research on the New Second 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1(4): 975-1008.

「真實」的偏見  
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  
潘家恩\*\* 杜潔\*\*\*

The True Prejudices  
A Study of the James Yan Rural  
Re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in Mass Media  
by Pan Jiaen & Du Jie

---

\* 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成立於2003年7月19日。是一所為當代農民帶頭人提供免費培訓和進行鄉村建設各方面實踐研究的非營利組織，學院針對各地農民帶頭人、具有實踐意願的鄉村工作者和關注農村發展的各界志願者開展農村合作經濟、農村工作方法、生態建築、生態農業和鄉村文藝等方面的理念和技能培訓。在此基礎上，學院鼓勵學員返鄉後在家鄉開展鄉村建設實踐工作，目前已通過多期培訓和各種後續支持而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數十個新農村建設試驗基地。通過與學員及基地的充分互動，積極收集整理各地鄉村建設實踐經驗，並以此為基礎開發符合農民及農村工作者接受特點的課程體系。2007年4月12日，學院因不可抗力暫時停止工作，學院主要工作人員及志願者以其他形式繼續從事鄉村建設及城鄉互動工作。關於鄉村建設實踐的新開始請參考：[www.littledonkeyfarm.com](http://www.littledonkeyfarm.com)。鄉村建設諸多同仁近年並延續至今的實踐工作，是本文嘗試的總結反思得以進行的最主要動力與素材來源，在此深表謝意！但本文文責自負。

\*\* 服務單位：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博士候選人  
通訊地址：香港新界屯門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E-mail: [panjiaen@gmail.com](mailto:panjiaen@gmail.com)

\*\*\* 服務單位：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博士候選人  
通訊地址：香港九龍紅磡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E-mail: [dujie33@gmail.com](mailto:dujie33@gmail.com)

正如傳媒學者 Roger Silverstone 所指出的「媒體揀選、形塑了每日生活的樣貌，媒體所呈現出的多元景觀，成為一種檢驗標準與參考指標，引導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並且定義、維持了人們的『常識』」。

而無論在歷史上<sup>2</sup>，還是當代的鄉村建設實踐中，媒體都無疑是影響這場運動的重要力量。因為在如此一個以現代化和城市為中心的發展進程中，「鄉村」和「改良」要想擠進人們的視線，並獲得應有的關注和參與，媒體似乎是最方便和主要的途徑，其的確起著十分重要的「仲介」(mediation)作用，同時媒體自身也以特有的方式極大程度上參與了這場運動。

所以，如果我們能在當代鄉村建設不同階段選擇不同的媒體「敘述」，它無疑既可以讓我們看到當代大眾傳媒在鄉村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及社會大眾對這場運動的各種想像、期望與態度，同時它也更可以「症候性(symptom)」地讓我們看到媒體語言、敘述方式所隱約折射出的現代社會邏輯——它正如此深刻的控制並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整組文本中，我們將發現其中既有十分嚴厲的「爭議／批評／質疑」，也不乏言過其實的「過譽／追捧(對當下現實不滿的另種『投射』?)」，而這些都將不過是各種「表徵(representation)」而已，本來不是最為重要的。但重要的是，在什麼樣的時代和社會裡，為何如此「傳媒幻象」竟能成為評價一場社會運動的主要標準，及社會公眾對之發生興趣、「想像性參與」及隨之「質疑」的唯一仲介？這些文本又是如何聯結起參與者的日常經驗、當前的社會現實和彼此內心的焦慮、期待與不滿？

---

1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六講》，韋伯文化，2003，第8頁。

2 此處主要指民國期間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



## 命名、修辭與想像

雖然出於職業限制和行業特點，大眾媒體都自我要求或對外包裝為所謂的「客觀、冷靜、中立」這樣一些基本形象。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些被建構出來的基本形象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將會發現其中充滿了無數並不冷靜的「命名」、並不中立的「修辭」和並不客觀的「想像」。

如果從新聞價值、媒體受眾接受習慣等角度出發，一個新穎和「切中要害」的命名無疑能讓我們的素材在競爭激烈的「媒體戰」中脫穎而出，它可以充分體現出媒體的參與感和作為評判者的社會功能，並贏得「文風犀利」、「直面社會」、「敢說話、勇承擔」等美譽。因此，類似的各種「命名」突顯於大眾傳媒新聞報導或深度評論的各大標題中，似乎以此才能與日益誇張並越發誘人的商業廣告分享同樣的「眼球經濟」，所以，不管表現著什麼樣的內容，對事物的狀態、變化和趨勢做出最快速的「命名」，無疑是當代大眾傳媒最樂意去做的。

而這個自我定位為草根民間社會實踐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一創始，它就在最短時間內被最快速地命名著：

一方面是各種歡呼，以及在歡呼和興奮下進行的事實判斷：如「晏陽初重返定州<sup>3</sup>」、「溫鐵軍：鄉村建設運動的復興者<sup>4</sup>」、「翟城試驗：尋找夢中的諾亞方舟<sup>5</sup>」、「晏陽初鄉建精神猶在新鄉村試驗紮根定州<sup>6</sup>」、「追隨晏陽初的腳步<sup>7</sup>」……

面對大眾傳媒如此一種熟悉的「興奮」，我們似乎很好理解：與其

- 
- 3 康雪，〈晏陽初重返定州：晏陽初鄉建學院成立現場採訪〉，北京人民廣播電台，2003年8月。
  - 4 〈溫鐵軍：鄉村建設運動的復興者〉，《國際金融報》，2004年1月。
  - 5 黎光壽，〈翟城試驗：尋找夢中的諾亞方舟〉，《中國改革（農村版）》，2004年2月。
  - 6 安文聯，〈晏陽初鄉建精神猶在新鄉村試驗紮根定州〉，《燕趙晚報》，2005年7月24日。
  - 7 〈追隨晏陽初的腳步：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簡記〉，《河北人民廣播電台新聞頻道-燕趙風采》，2004年7月31日。

說當日益不公和劇烈變化的社會現實派生出「三農」問題、知識份子卻「逃離」應有的承擔，這樣的新生事物不管怎麼說，似乎都可能給我們一個可供「消費」的新希望；不如說如此命名，正是近年傳媒對各種社會實踐所發生第一階段的報導「策略」與慣用手法。因為其新鮮、其剛開始、更有各種可能（發展／結局？），因此能喚起大部分被現實和千篇一律的新聞折騰地疲憊不堪之受眾的注意。所以，當在整個社會都向「錢」看並向「城市」擠的這個過程中，忽然出現「知識份子到農村去！」這樣的口號和實際行動，它無疑可以成為頗具新聞價值並凝聚受眾關注的載體。

但另一方面則馬上也是基於當下主流社會運作邏輯而做出的質疑。比如，在我們剛剛開始這項實踐（準確的說，當我們正在籌備第一次農民培訓班的時候），就有記者用不到半天的時間、根據他「豐富」的經驗得出一「中國第一所村辦學院生存憂患調查」、「辦在村裡的學院還能走多遠<sup>8</sup>」這樣「發人深省」的報導。

帶著使「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期待，各種形形色色和充滿矛盾的命名始終伴隨著鄉建學院的不同發展階段（事實上即使主辦方非常不認可其中的一些命名，比如所謂「農民黃埔軍校」等等，但操作中媒體的一廂情願卻巧妙地讓讀者沒能感覺出任何的暴力與不妥。）如：「烏托邦」實踐<sup>9</sup>、「農民黃埔軍校<sup>10</sup>」、「後定縣試驗<sup>11</sup>」、「新上山下鄉運動<sup>12</sup>」、「溫鐵

8 聶道先，〈辦在村裡的學院還能走多遠？〉，新浪網財經頻道，2004；《溫鐵軍翟城試驗：中國第一所村辦學院生存憂患調查》，2004。

9 〈「烏托邦」實踐 溫鐵軍把「另類」進行到底〉，《亞太經濟時報》，<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7月9日，12:35。

10 盧韻、曾子墨，〈鄉村建設學院：中國農民的「黃埔軍校」〉，2004年第13期，《鳳凰週刊》；〈打造新農民的「黃埔軍校」〉，2006年5月12日，《中國青年報》；馬海偉，〈「農民黃埔軍校」試驗三年之感〉，《中國商報》，2006年5月23日。

11 姜古迪，〈值得關注的後定縣實驗〉，《燕趙都市報》，2003年8月24日。

12 黎光壽，〈新上山下鄉運動：我們能為農村做什麼？〉，《公益時報》2003年11月6日。

軍的鄉村星火<sup>13</sup>」、「田園牧歌」似的鄉村建設<sup>14</sup>、「秀才下鄉<sup>15</sup>」等等。

更有意思的是，一位元記者在「實地採訪」了一天一晚後，得出如下推斷：「眾所周知，農民最缺乏的是物質利益，即改善生活，而不能改善生活的根本在於其權利的貧乏，農民尚未獲得充分的發展權利，然而，這些厭煩于西方高度民主自由社會的人卻來大陸用最貧窮的群體做後現代的實驗，這豈不荒唐？豈不可笑<sup>16</sup>？」

在首先表達對實踐者充滿尊重後，這篇題為〈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載得動三農幾多愁？〉的文章，先把學院這樣一個小小的民間草根實踐安放到要「『載得動』三農幾多愁」這樣的預期中，然後再以「後現代實驗」的命名來證明其荒謬和可笑。值得一提的是，他先以博客這樣一個好像很自由平等的空間（網路），發表一些好像是很個人的觀點，來襯托其觀點的超然，但這樣的博文也自然隨之在各種網站進行迅速的轉載和討論，產生了和傳統媒體一樣的效果。

某種命名可能可以將你「捧上天」，只是這樣一個「傳奇」的神話需要你們自己去維護，如果在現實中不能符合媒體或由之引導的受眾的期待或想像，媒體則會及時地挺身而出，用「實地訪談」和對「不同聲音」的代言，戳破那個不久前剛由自己或同行所製造的神話；

某種命名可能提前宣判你的死亡，在充滿「憐憫惋惜」的面具下，命名者似乎無需在乎錯綜複雜的現實和其在效果上可能給予受眾所帶來的誤導，更無需在乎這樣的命名是否等於間接推翻了「失敗者們」出發時的理由（之前還被不遺餘力的歡呼和鼓吹），是否承認行動者們為之反抗的社會問題依然存在？

無論是歡呼，還是質疑。命名似乎意味著某種完成——以此為標

13 〈鳳凰衛視財經點對點〉，《溫鐵軍的鄉村星火》，2004年4月。

14 張志，〈翟城鄉村試驗遇困局〉，《小康》，www.gutx.com，2006年5月6日。

15 〈秀才下鄉〉，鳳凰衛視，2005年9月。

16 譚翊飛，〈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載得動三農幾多愁？〉，中國選舉與治理網，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

誌，媒體的任務已經結束。除非還有更為爆炸性新聞的出現，媒體將暫告退場，剩下的事，該誰幹誰幹！

除了對社會行動的狀態、趨勢、問題進行簡化與命名外，大眾傳媒還巧妙地使用了大量的修辭手法，它將配合「命名」，更為有力地達成敘述者所希望的效果。

表面上可能佈滿各種客觀事實的描述或以人物為中心的白描，作者的聲音似乎保持著難得的克制，但我們仍然將可以從新聞標題等處看到無數充滿濃郁感情的修辭，如：「定縣實驗」新登場<sup>17</sup>、鄉建學校的「荒蕪英雄路<sup>18</sup>」、「步履蹣跚中的鄉建運動<sup>19</sup>」、「晏陽初到溫鐵軍：知識份子百年鄉戀<sup>20</sup>」、「中國知識份子的鄉村衝動<sup>21</sup>」、「新「定縣實驗」終局<sup>22</sup>？」、「改良主義者敗局<sup>23</sup>？」……

除了上述這些文章的標題外，一些評論文章正文中的一些句式和表達方式，雖然看似是讓讀者回答和思考的開放性問題，但實際答案、作者傾向和可能達到的閱讀效果已經了然若揭，如：「（晏陽初、梁漱溟）是否都是糊塗的好人？鄉建是惟一希望？還未鄉建的農村，希望何在<sup>24</sup>？」

通過對上述幾組大眾傳媒呈現片段的分析和比較，我們發現這些看似「真實」背後的明顯態度和希望傳達出的豐富資訊，同時它也讓我們對大眾媒體所包裝出來類似於「監督者／第三只眼睛／旁觀者」的超然姿態保持應有的懷疑和警惕。

17 白紅義，〈「定縣實驗」新登場〉，《小康》，2004年9月。

18 胡印斌、王小波，〈鄉建學校的「荒蕪英雄路」〉，《燕趙都市報》，2004年7月18日。

19 曹海東，〈步履蹣跚中的鄉建運動〉，《南方週末》，2007年7月。

20 曹筠武，〈晏陽初到溫鐵軍：知識份子百年鄉戀〉，《南方週末》，2006年3月9日。

21 何忠洲，〈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第七期。

22 翁仕友，〈鄉建學院關閉 新「定縣實驗」終局？〉，《經濟觀察報》，2008年1月7日。

23 林海，〈改良主義者敗局？〉，<http://blog.sina.com.cn/rwzk>，2007。

24 林海〈溫鐵軍：改良主義者敗局？〉，《南方人物週刊》，2008年1月21日。<http://blog.sina.com.cn/rwzk>

正如學者雷啟立在《傳媒的幻象》中對90年代來以來中國各種傳媒事實研究後所指出：「邊緣」反而可能是消費旋流的「中心」，是中心的另一種修辭性表達<sup>25</sup>。

在消費社會與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sup>26</sup>，以及以發行量和收視率為競爭手段的傳媒資本面前，「邊緣」姿態所造成的主流效果往往更加明顯，「旁觀者清」所賦予的「超越性」似乎並不先在的存在，所有的這一切無疑都是敘述所需及權力-利益結構中的一部分，它同時還服從於其特定的內在運作邏輯。

在學者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看來，任何一種傳播方式都擁有自己的「語法」規則，這些規則既來源於人類各種感覺的混合交織，同時又和人們平時對於語言的使用密切相關。雖然人們會有意識地把注意力的重點放在媒體所傳遞的資訊內容上，但就個人對資訊的理解而言，媒體所使用的「語法」是一個更關鍵的因素<sup>27</sup>。

而這樣的「語法」與我們日常所使用的語言同構，更和我們這些被現代性形塑過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及「單一化」想像結構高度相關。

雖然我們可以看出，上述的命名和修辭可謂形形色色，但卻基本可以分類為兩種對立的聲音，它既消解遮蔽了各種中間狀態和其他可能性的存在，同時也讓我們多樣的修辭呈現出「類型化」的貧乏。正如當「三農」矛盾尖銳，越來越多的學者和行動者慢慢浮出媒體的「地表」時，就有媒體高調指出這是「三農明星」的出現！似乎在他們的詞彙和想像中，除了明星的意象(光彩／隕落)，我們已經很難有更好的詞彙可以解釋我們對「他們」的想像與期待。

而這樣的想像與判斷，還將存在於大眾傳媒對歷史、傳統、社會

25 雷啟立著，2008年，《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第33頁。

26 王曉明主編，《在新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江蘇人民出版社。

27 羅崗，〈網路公共空間：可能的與不可能的〉，轉自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運動整體運作方式、村民需求等方面的看法上。

正如前文所述，引導記者在鄉建學院正在蹣跚學步時期就寫下「辦在村裡的學院還能走多遠<sup>28</sup>」如此「狠話」的現實基礎，是當時因其處在起步階段的物質困難階段——沒錢、沒人、只有一所始建於50年代破舊校園以及村民和外界如此高的預期。雖然對於草根民間運動來說，這樣的現實困境再正常不過，但對於這位只能呆上半天並進行「印象派」報導的媒體朋友來說，腦袋中充滿的無疑更多是主流社會對社會運動的「想像」——社會運動應該什麼樣子（轟轟烈烈、萬象一新……）？應該具備什麼樣的條件才能成功？成功後的社會運動能帶來多大程度的改變（載起積重難返「三農」幾多愁！）？能夠帶給旁觀者以多大程度上的希望與衝擊（耳目一新）？

以這樣一些「想像性」圖景去校驗一個剛剛起步的草根社會實踐（當下的大社會困境難道不應該也自然存在於其中？），希望能滿足自己心中的某種期待，這的確是我們所不得不面對的主要輿論環境。

同時，我們也面對著另一種「想像」——正是帶著對現實行動的失望、不滿和更高的期待，這種想像讓我們把眼光朝向了過去和歷史。想像的特質讓它充滿著無盡美好的懷舊情感與對歷史連續性的偏執迷戀。

就在前述直接揭示出「知識份子鄉村衝動」、「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的同期報導中，當談到這場實踐的地點時，媒體會用充滿嚮往依戀和抒情完美的筆調寫下：「翟城：在這個北方的村莊，知識份子求解鄉村問題的探索已承續了近百年。<sup>29</sup>」，而與該想像中連續性相伴隨的更大斷裂及翟城村一直以來所發生的各種內在變化似乎被輕輕的略去，在我們「想像」中的舞台中央似乎只留下「一路沿續的百年鄉建史」，對

28 聶道先，〈辦在村裡的學院還能走多遠？〉，新浪網財經頻道，2004；〈溫鐵軍翟城試驗：中國第一所村辦學院生存憂患調查〉，2004。

29 何忠洲，〈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第七期。

於知識份子來說，那是多麼「整齊迷人」的敘述，然而實際上，其間充滿著多少裂縫張力，前後兩場社會運動發起背後又有著多麼複雜的不同利益訴求，這些都將在如此的抒情中隱去。

除了該行動地點所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源，歷史鄉建運動所動員起來的廣泛知識份子群體無疑也是媒體所強調的重點所在。也是在一篇對當代實踐的批評文章中，記者客觀的描述如下：「從當時留下的照片看，跟隨晏陽初的知識份子，臉上總是帶著興奮與高興的笑容。據統計，最高峰時期，晏陽初在定縣團結了多達500名『願意和農民在一起』的知識份子。<sup>30</sup>」

這些敘述當然是事實，然而我們仍然可以找出可以與之相互印證的另外一些事實。比如，當年晏陽初來翟城村的頭一年，根本就沒能做什麼，而是先在村小學教了一年的書，以此熟悉村莊情況。而當其從大城市照搬一套「成人識字教育」到村裡後，過了一段時間，則有村民向晏陽初提出，「晏先生，你老的好心腸，可是幫不了我的餓肚皮！」晏陽初才發現問題的存在，以此進行了調整。類似的問題、不足和衝突都同樣的佈滿當年的鄉村建設實踐，而絕不是像我們後來人所敘述的如此流暢整齊！

同時，作為在當年和現在的一個「奇觀」，當我們懷著「廉價」的敬意敘述當年的定縣是如何凝聚了一大幫的「博士、教授」時，大眾傳媒敘述所造成的效果是讓我們感覺一這群人如何作為一個「集體」出現，同時更是一個完整並完美的整體。但實際上，當年他們之間的各種內部矛盾同樣頻繁，並且很多人來了不久就走了，據晏陽初回憶，他自己在定縣的近三分之一時間是在做這些人及他們家屬的工作……另外一個我們今天不能忽略的事實，則是當年鄉村建設實踐也是面對著很多的批評聲音，並同當代的實踐一樣存在著各種困境和現實中的張

---

30 曹筠武，〈晏陽初到溫鐵軍：知識份子百年鄉戀〉，《南方週末》，2006年3月9日。

力。

但在我們的想像中，所有這些複雜的脈絡都被我們簡化成為封閉的幾句話，並使之成為當代敘述者展開自己論證的前提性說明。要麼在浪漫化中成就讀者對那個逝去年代的無限懷戀與嚮往，要麼讓其部分結論(成績)成為對當代行動中所存在問題進行批判的有效對照。

或許，「重要的不是神話講述的年代，而是講述神話的年代」！在想像中，這樣的歷史銜接與往事敘述是如此的光滑，充滿了凝固的神話和整齊光鮮的質地，它們好像凝固在那裡，成為了一個「等待」發現與使用的工具。

總之，通過「命名、修辭和想像」，大眾傳媒抽離了事實發生的脈絡，其對事實進行「簡化」和「問題化」的處理習慣，背後更暗含著一種未曾說出，但已然說出的媒體邏輯。通過各種暗含的對比，雖然很多看似「開放」的書寫方式，卻總能讓大部分讀者產生「敘述者」所希望達到的效果／感覺，並因此得出「一言以蔽之」的「解碼」習慣。

## 「傳奇」開局與「個案」結尾

既然製造「效果」是必需而且重要的，更是這個職業所要求的基本素養。那麼讓各種呈現的「事實」變的輕鬆活潑一些，則是沉重壓力下艱難生存的現代人所產生的內在「審美」需求。大眾傳媒無疑正紮紮實實地順應了這樣的選擇——當現實社會充滿著焦慮平庸、無聊慵懶時，「眼球經濟」或「超女民主」已經逐步讓「通俗／庸俗」征服了大部分的嚴肅意義，「我們」是多麼期待著一個可以被消費、並更方便記憶、傳播、再生產的「動聽」故事啊！所以就有了各種「傳奇」般的「開局」。

在媒體的視野中，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或當代鄉村建設運動從一開始就充滿著「奇觀」，幾乎所有媒體都以那樣的一個故事為開頭——2003年春節，溫鐵軍時任中國改革雜誌社總編輯，雜誌社編輯劉湘波



與邱建生帶大學生們去河北定州翟城村調研，因為恰值大年三十，大學生們即興在所住農家寫了一副春聯：「平民教育誠可嘉，鄉村教育慨而慷，（橫批）繼往開來」，這副春聯很「偶然」地被村黨支部書記米金水看見並引起了注意，雙方一拍即合，決心在翟城重續晏陽初的夢想……<sup>31</sup>

不僅平面媒體對這樣的情節進行了大量的複製與再生產，很多電視台「紀實」形式專題片或紀錄片都要重新「再現」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場景，編導們重新刷上墨蹟未乾的對聯，可謂用心良苦；觀眾們更看的「如臨現場」，更可謂「效果」不俗。

當然，從普通受眾的接受習慣來說，這樣的情節和表達方式接受起來容易，並且其表現內容的確真實的發生，本就無可厚非，但問題是其產生了什麼樣的實際效果？其表現了媒體們什麼樣的「選擇性」關注？為何是這些才被反反復復地強調？

如此模式與套路，自然將問題簡單化、戲劇化和扁平化！「儀式性」的開局和期間的各種偶然，似乎更預示著事件本身的「故事」性質，從那一刻，故事開始了！而各種更深層次的議題，如此「故事」得以發生的土壤、此版本「故事」以外的「故事」卻可能被輕鬆和不無「狡狴」的遮蔽。

如果具體到這個「故事」，實際上，在2003年春節之前，溫鐵軍所領導的《中國改革》雜誌社就已經在該村以外的很多地方開展了鄉村建設和大學生支農；翟城村想利用「晏陽初」進行「文化搭台、經濟唱戲」的想法也是由來已久，而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則是當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農產品出口受很大的影響，這不禁讓依賴辣椒出口的該村村民們產生了很質樸的想像「假如晏陽初還在，就好了！」；而催成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創立的更重要社會背景是，當時「三農」矛盾加劇，

31 何忠洲，〈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第七期。

「三農」問題一時成為包括學界、官方、民間的共同「熱點」，正是有了這一系列的條件與「土壤」，那個戲劇性的場景才可能發生。

然而，這些似乎都從多數的媒體敘述中擱置，為了服從我們讀者／觀眾的閱讀習慣及偏好，也為了滿足「說故事」人的其他需要。所以，更多嚴肅話題必須接受裁減，更多「人性化」的細節必須進行添加。

既然「傳奇」開局需要個性鮮明主人公的登場，而隨之為達到讀者們「感同身受」及「想像性參與」的目的，作為實現「現代民主」重要手段的大眾傳媒當然需要將這些「傳奇」主角「還原」為日常生活中活生生的「個人」。所以，以「個人」的行為、選擇、失誤、喜怒哀樂去理解判斷這些「公共事件」的成敗得失無疑成為強調「個人自由與權力」的現代社會下我們理所當然的重點角度。

於是，越來越多經過層層「包裝」的事件／行動同時還充滿著「悲情／悲壯」色彩。如果成功，那是個人道德的崇高，敢為人先，正義「化身」……；如果失敗，那是個人的「感性」、不切實際、「烏托邦」、「道德瑕疵」……總之，不管是成功和失敗，都是作為「個人」的「他者」的問題！

而如果說其間對如此複雜面向的社會問題進行簡化及悲情化處理，其可能有調動更多人關注參與之目的；不如說其中的「同情和欣賞」成分將多過「參與或分擔」，「看熱鬧」將多過「感同身受」。因此那無疑是脆弱的，其在最快時間內可能產生的反彈和「清算」也將早在預料之中。

不妨，按照如此格式與敘述風格對歷史上的同名運動進行一次「重新報導」，鄉建前輩的光環也必將不在——第一年，我們可以對這位「海龜」博士（晏陽初先生）的生存狀況進行「憂思」（剛回國時，「平教會」活動經費是非常困難的）；第二年，我們可對其解決不了「餓肚皮」（參見前文中村民對晏先生到農村後照搬大城市掃盲做法的抱怨）進行

反諷與反證；第三年可以對運動內部博士及家屬們的種種矛盾和隨時的退出進行曝光揭秘或悲情預言。最後，我們將以「花了那麼多錢，做了這麼多年，今天的定州農村比起周圍農村來說，又有什麼明顯不同？」作為最有力的審判，以得出「不過如此！」式的「深沉」結論……

可見，不同角度的「客觀」敘述其可能達成十分不同的效果。同時如前文所述，不同的命名本身也已對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引導作用。如「秀才下鄉」的命名和嘲諷當然可以讓我們對那幾位「當代秀才」的蹩腳實踐進行輕鬆和不無譏諷遺憾的談論，但被同樣輕鬆「打發」掉的我們有多少人會進一步追問—除了這些「秀才」外，當今「下鄉」的還有什麼人／力量？這些「秀才」很多本來就是來自農村，為何他們回鄉後會如此「蹩腳」？是什麼讓他們成為我們結論中的「秀才」？既然他們可能更知道自己的「蹩腳」並感受到輿論的壓力，為什麼他們還願意？那些本來的「在鄉秀才（本地能人）」都到哪裡去了？「秀才下鄉」和「鄉下人進城」是否同樣深刻的體現著城鄉二元對立下「城市（人）」對「農村（人）」的可怕偏見？

而就在我們自以為「是」的命名或提問方式中，真正嚴肅討論背後深層次原因及反思被自覺不自覺地轉移了，它造成再次回到「就事論事」的敘述效果——似乎在我們面前的只是一堆供我們評論的「材料」，它可能是事件，也可能是個人。

從「傳奇」開局，到「個案」結尾的處理方式，為何都是重重的舉起，然後又總輕輕的落下！

## 「真實」的質地

媒體(Media)，作為一個舶來詞彙，最重要的一層意涵或功能即是「仲介」。正如Roger Silverstone所言，我們應該把媒體當作一個過程來進行思考，也就是把媒體視為一個「仲介」的過程，因此，我們應該拉

大視野，不僅把「仲介」的意義局限在媒體文本與閱聽人之間的接觸，而應把仲介過程視為媒體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與對意義的運作<sup>32</sup>。

而其「仲介」了什麼？為了達到更好的效果，它無疑需要借助受眾的日常生活經驗，並以更多的細節和「個人化」體認去貼近「真實」，用人物和事件去充滿「真實」，再以「真實」的質地成為說服讀者的有效手段。

正如有人指出，作為當今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週報」——《南方週末》，其很多文章都有「華爾街日報體」的風格和特點。而「華爾街日報體」在結構上一般由四部分組成：第一部分，人性化的開頭，即與新聞主題有關的人物故事；第二部分，過渡，即從人物與新聞主題的交叉點切入，將真正的新聞內容推到讀者眼前；第三部分，展開，即集中而有層次地闡述新聞主題；第四部分，回歸人物，即重新將人物引入新聞，交代此人與新聞主題的深層關係<sup>33</sup>。

如此成功的《南方週末》當然以這樣的「仲介」方式很大程度地影響著其他兄弟媒體，讓對主流官方媒體持有怠倦厭惡的廣大讀者產生「久旱遇甘霖」般的酣暢。但就在這樣一些表面上的真實「質地」下，如果我們認真進行分析，仍然可發現許多巧妙的置換、推測、邏輯混亂與內在矛盾。

在此，我以一則特別容易讓讀者產生反應的報導為例，討論「真實」表像的裂隙。

為了證明農民是如此不接受「下鄉秀才」及我們做法的不得人心，有媒體記者如此寫道：「2004年夏天，學院實驗田裡開始出現害蟲。學院想盡辦法用辣椒、煙葉汁等土辦法來殺蟲，結果害蟲繁衍愈甚。村

32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六講》，韋伯文化，2003，第19頁。

33 劉工昌，《南方週末》的前世今生，<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41256>

民實在看不過眼了，拎著噴霧器就要向學院的試驗地裡打農藥，『你們不打，害得蟲子都傳到我們地裡來了。』<sup>34</sup>

我們都知道，當前發展有機農業的重要擔心和現實困難是，因為周圍的農田環境都用大量的農藥，如果僅僅對那些「被包圍」的農地實行有機農業，旁邊的蟲子出於躲避「農藥」並獲取更安全的「食物」，會大舉遷徙過來。所以，是否可能那些被「秀才們」所「縱容」出來的蟲兒，會頂著濃烈的農藥，越過院牆「自投羅網」呢？的確有村民有類似的想法，那是幾位在學院工作的大叔及一些關心學院的村民（實際並未付出行動），但是否如文章中給我們所造成的直觀效果一樣：幾位「大公無私」的外面村民自掏腰包背著噴霧器，為了阻斷「污染源」徑直朝學院走來？正是如此生動客觀的「細節」再現，才有筆者腦袋中這幅不無荒謬的圖景。

而由於篇幅的限制，各種報導評論往往只能舉幾個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但它無疑造成可以將問題轉換或擴大的效果。透過它，我們更似乎看見村民們個個不滿憤怒地背起農藥向學院走去……如此「動感」但實則靜態的「如村民說」，抽離了事情發生的具體脈絡。而同樣是村民的嘴巴，在學院長期志願者劉豔博士的記錄下，翟城村退休小學教師米珠貴卻口述回憶了村裡的農耕實踐和生活方式是怎樣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改變的：

村裡的老年人都還記得在解放前，每家每戶都用騾子或馬犁地，運東西。人們在冬季來臨之前翻耕土地，好在冬天凍死蟲卵。天空有成群的烏鴉在飛，人們可以聽到烏兒歌唱。

中年人也都記得解放後土地都分給了各家各戶，每家都有驢子或耕牛來拉犁。土地在冬天之前就被翻耕。人們用大的樹枝來做燃

34 何忠洲，〈新農村的理想與現實〉，《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第七期。

料燒飯，小的就用來堆肥。沒有足夠肥料的農民就到處撿樹枝和樹葉。秋天的時候，人們很早起床跟在牲口車後面撿糞。

1958年前，人們以米飯為主食，搭配以其他種類的穀物。那些都是綠色食品。

1985年後，每過秋天，那些種小麥的(農民)就會翻耕土地，不種的則不會。害蟲數量逐年增加，人們開始使用殺蟲劑。棉花都被害蟲吃掉，所以產量很低。村裡雇來的技術員要求村民們使用農藥殺蟲劑，許多村民農藥中毒被送進醫院。幾年之後，人們已看不到鳥兒在空中飛翔。1996年後，主食仍然是大米，可它們不再是綠色食品了。

為了提高產量，村民使用更多的化學肥料和磷肥，同時為了殺蟲也用更多的殺蟲劑。路修了，煤氣罐被直接送到村民家門口，他們用煤代替樹枝來取暖，燒飯。為了省事，大部分村民不再堆肥。他們很滿足於吃飽穿暖。一些人失去了工作的熱情，即使他們並不富裕，他們每天吃喝玩樂，等待別人的幫助。那些買了拖拉機的富裕農家也不會在冬天土地凍結之前翻耕土地了。

現在的土地是成片相連的，如果你翻耕了土地而其他人家沒有的話，害蟲就會飛到你的田地裡。如果你不用殺蟲劑的話，害蟲同樣也會飛到你的田地裡。現在要產出綠色食品是很困難的……

口述記錄者最後總結到，「這段回憶非常生動地反映了這些年農耕傳統喪失的具體過程。人們不再把自然當作一個生命體系，而只是靠它來謀生。追趕現代化步伐的渴望取代了對現實生活及土地的關心，但土地卻是農民們僅有可以依賴的東西，他們無疑是對自然集體剝削和掠奪的直接受害者。<sup>35</sup>」

---

35 Liu, Yan. (2008). *Ecological Education in Rural China: Rediscovering Traditional Knowledge. Diaspora, Indigenous & Minority Education*, In press.

可能在那個十分矛盾的村民「口述」中，記者朋友或許因為時間和採訪人數有限，或因定州老鄉有一定的口音。然而，重要的不是「真實」本身，而是其產生的「真實」效果！——即使發現了事實上可能的出入，我們仍然更願意將其認為是在誤差範圍內，似乎這些細節的「失誤」並無礙于文中所表達出的基本判斷。

所以，在一定範圍內，「真實」是允許「製造」的。製造「真實」既是可以強化並突出某些言說者需要的「差異」，同樣也可以遮罩轉移那些言說者不希望被看見的「差異」。正是這些由各種「真話」所構築成的謊言效果讓我們看到，所謂「真實」光面實際是佈滿無數的裂隙！

正如台灣學者夏曉鵬結合當地媒體對「外籍新娘」及「外籍新娘識字班」的敘述策略後指出，雖然媒體都聲稱「客觀」，但它們取樣、強調及省略的重點都是高度選擇性的<sup>36</sup>。同時，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下，電視公司必須設法獲利以維持並繁榮自身。結果，「為受壓迫者說話」的人道主義理念變成了具有市場區隔價值的特色商品<sup>37</sup>。

更進一步說，英國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圖爾特·霍爾(Stuart Hall)指出，大眾傳播媒介憑藉凝結社會的霸權符碼的生產而發揮作用，看起來反映現實但實際上是構建現實，這樣的大眾媒介本身就是當代資本主義主要的意識形態<sup>38</sup>。

而在那些「自由空間」下媒體力量高亢的聲音和急迫的姿態裡，或許還有他們自己的若干私利所在——「在煽情的高亢而急迫的嘯聚裡取得社會的話語霸權，讓自己在社會的聚光燈下起舞，同時借此收取

36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第137頁。

37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第151頁。

38 雷啟立著，2008年，《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第16頁。

印數加大、收視率提高之後的利錢，為下一次的出場凝聚力量<sup>39</sup>。」

因此，許多媒體表面上是在提出問題或者探討答案，但實際上，通過各種修辭，案例選擇、書寫方式，其想要受眾「自己得出」的答案已昭然若揭！

或者說，在鎂光燈所營造的眩暈面前，燈光、音樂、修辭這些通通都需要隱藏，正是需要「新聞中立」「實地現場」這樣的表像和姿態，才可以對照出更為「真實」的效果及敘述者觀點的「超然」。

但媒體代表誰？對誰說？誰更構成媒體的讀者？那些是誰的「真實」？無疑都將是同樣值得分析和討論的。

## 流動參與和「缺席審判」

既然部分人的「真實」和大眾傳媒的利益結構不斷召喚出——「相信我，我就是事實！」這樣的「真實」效果。那麼，進一步讓這樣的「真實」不斷被無數媒體人所堅信並擁有十足底氣的，則是一種充滿「流動＋想像＋短暫」的特殊傳媒介入形式。

它通過「直擊、第一現場、跟蹤、揭秘、記錄……」完成某種形式的輿論監督，再以命名、煽情、「擺拍」體現並完成著某種方式上的「間接」參與。據我們接待媒體的一些有限經驗，其中有許多「專業」採訪，目的十分明確，當要求和工作人員或志願者們一起勞動時，除非有特殊的新聞線索或希望從特定場景中表現我們的言談行動，否則多會被形色匆匆的拒絕。與其因為時間不夠，不如說懷有更為「重要」和「神聖」的使命，其要去更為「獨立」地「發現」真實，因此絕不是簡單枯燥和不斷重複的體力勞動。

即使有些媒體朋友願意直接參與，但為了堅持「獨立」與「中立」，

---

39 雷啟立著，2008年，《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第94頁。



也必須刻意的保持距離。且不說這種參與同樣存滿了「他者化」和「問題化」的可能，如此參與更改變不了包括「同情、好奇、欣賞」等幾類的定型化認識與想像。

雖然其中充滿著各種矛盾與可被質疑的地方，但以「第三只眼睛、民間、輿論監督」為掩護的參與姿態，無疑是當下最能進退自如的某種位置／策略。這一次報導，可以借助面目模糊的村民張三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下次報導我們仍然可以借助另一位「看似(或就是)」真實的村民李四說出截然不同的觀點，前後矛盾效果背後與其說是「讓事實說話」、「我的攝像機不說謊」的職業道德，不如說是十分「安全、狡猾」之媒體行動的充分施展。

如此「參與」不僅沒有任何危險，更沒有真正的利益損失——不管是捧上天、還是踩下地，不管是抨擊政府還是揭露個人，廉價熱淚及擯棄唾罵的同時都只讓我們感激「媒體」那直面罪惡的勇氣與敢說「真話」的大膽品質。它更是如此高效地符合於當前的社會主流運作邏輯——該是觀眾柔軟的情感處，則低沉煽情；該是同仇敵愾的憤怒處，則高亢對外；其餘時候，惜墨如金。

如此「參與」的最後一道工序無疑是「書寫」。根據現代傳媒工業的生產要求，如此的「快速」呈現著實令人佩服，可能「調查、跟蹤」不過兩小時，洋洋灑灑幾千言就可以出來。其間當然充滿著十分突出的權利不平等，不僅在發稿前徵求被採訪者意見幾乎不可能，在發稿後也很少有媒體願意將發表後的文章／電視片與被採訪者分享。這裡既不可能有人類學所要求的學習「被研究／書寫者」語言，以此才能盡可能站在他們的習慣和角度考慮問題般的謙虛與對差異的承認；更別說像著名記錄片創作大師小川紳介那樣十幾年如一日的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真正的向農民學習「種地」，然後才「收割」電影<sup>40</sup>。

40 小川紳介，日本最著名的紀錄片導演之一，「山形電影節」創始人，關於「收割電影」請見《收割電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最後一招，當有人指出這是他們自己說的，與真正當事人的「真實」有出入時。書寫者則會十分自信的擺出「現場、見證人」資本，似乎這已經完全充分地證明其「代言」的客觀，而不管他是以什麼身份，帶著什麼樣的目的去見證！

它讓我想起，隨著「三農」問題的日益升溫，在各種討論進行的不可開交、難分勝負的時候，經常會看到有爭論者或旁觀者忽然跳出來說：我就是從農村來的，我(爸)就是農民！……這最後一招似乎特別有效，表態者立馬就能佔據一個十分有力並自然而然的道德(討論)制高點……<sup>41</sup>

於是，不顧日常生活的瑣屑、現實複雜的張力與其中可能存在的各種現實利益或權力關係，一個接一個的陌生記者「接力」並延續著實踐的發展，以「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傳統故事模式「對接」想像著十分不一樣的實踐邏輯。在發行量和「眼球經濟」的引導下，一方面為「成功者」迅速命名並找尋著其之所以成功的各種理由，另一方面在同樣的命名中完成著對「失敗者」的徹底審判，並在放逐告別中完成著某種程度上的祭奠。

其間不變的卻是老練筆法、「客觀」角度、「代他者言」的現代民主參與方式，及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的選擇標準，但我們仍然可以遺憾的發現其所努力掩蓋的陌生、不耐煩與自以為是！

就這樣，通過一樁樁的事件及所建構出來的各種「發出者／參與者／反抗者」，作為行動「主體」的傳媒獲得了想像中的「存在感／行動力」。雖然它似乎剛剛還不遺餘力地批判那些「外來者」，但卻也同時不自覺地將自己放在一個「啟蒙者」的更大結構中。

在這樣的一個結構裡，「真實」就像一個已然存在、邊界清楚的物件。只要到了現場，採訪過當事人並獲得不同的聲音，在書寫上「站

41 潘家恩，〈象牙塔與泥巴牆：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三年培訓總結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七十二期，2008年12月。

在／藏在「弱者」一邊，似乎「真實」已自然在手！且不說前文所述，真正的被採訪者或參照者（如普通村民）與採訪者具有完全不平等的權力。更為重要的是，如此敘述得以成立的一個基本假設是一被採訪者無疑是「異常的」（要麼是如此的「好／突出」，要麼是那麼的「有問題」，否則新聞價值何來？）。同時，敘述者更有很強的「證據意識」，而那些參照者（如普通村民）無疑都成為「舉證者」，因為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法律調查，所以不需要認真的「證據」核對，但敘述者無疑都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證據和有說服力的細節，因此，才可以依據線性的思維讓「真相大白」！

如果我們可以跳出來，將媒體視為一種大的社會環境，正如加拿大著名媒體學者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認為每一個媒體都是人的延伸，是四肢的延長，認為媒體增加了人的力量和感知範圍。但在另一方面，人類作為媒體的主體與客體，愈來愈依賴具有防禦性的媒體建立與社會的密切關係網絡，在此情況下，媒體既增強我們的力量，卻也同時削弱我們的力量。因為媒體改變了這些力量運作的環境<sup>42</sup>。

我們置身其中，因此既是意義的生產者，也是意義的消費者：既參與意義的產制，也不斷地交流互動，我們急切地尋找事物的意義，探索真實的生活世界、媒體世界，以及媒體所呈現的世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運用媒體所製造的意義來逃避這個世界，逃離了應付的責任，無法感受存在於彼此間的差異<sup>43</sup>。

如此的媒體環境同時也和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判斷邏輯與行事邏輯高度的同構。

所以，上述的行為和表達方式自然不止於媒體，同時也是各種參觀來訪者的習慣所在——比如，有來訪者根據媒體中獲得的印象，帶著一堆自己的期待、想像和已有觀點，希望「眼見為實」地獲得驗證，

42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六講》，韋伯文化，2003，第5、30頁。

43 Roger Silverstone 著，陳玉箴譯，《媒體概念十六講》，韋伯文化，2003，第20頁。

前後到校園不過兩個小時，發現這裡與想像中差距甚大，「受騙」般地憤然離去，然後利用網路的便捷、匿名與廉價的「主體性」批發，洋灑灑幾千字的「印象派」評論便可獲得傳播與再生產。的確，隔著螢幕我們都成了「指點江山」的英雄，這難道不也是媒體「想像性流動參與」的另一種延伸。

「現實」無疑是複雜並充滿矛盾張力，同時也是生動豐富的。當真實存在的多樣聲音在大多時候下卻被呈現為不能為外人知的「缺席在場者」時，我們用什麼來保證這些以「真實」和替「底層」發言為名義的言論，不致淪為掌控話語權者們的自我言說與自我陶醉？

## 「真實」的理由

在我們的視覺記憶中，台前幕後對於媒體來說都是可能公開的，神通廣大的媒體似乎可以從幕後潛入，或者破門而入，對權力說「不」，這無疑讓我們大快人心！並以此相信，它一定比我們掌握更為充分的資訊。

然而媒體是否也有自己的「後台」？是什麼賦予「權力媒介」以權力？「真實」為何是大眾傳媒所如此刻意營造和宣傳的？在新聞造假頻頻曝光（無疑是個諷刺，我們仍然不得不依靠大眾傳媒的力量去「挖掘／修復？」傳媒自己的問題）的今天，廣大消費者為何仍然會發自內心地去呵護這樣一個「天下無『假』」的世外神話？

如果我們需要更多的理解，無疑必須將當下大眾傳媒現實放在其興起的90年代以來之社會文化現實中。如文化學者戴錦華教授所指出的，90年代中國繁複的文化格局稱之為一處「鏡城」，一處文化的「共用空間」：國家、跨國資本、中央、地方、企業、個人，在極端不同而間或共同的利益驅動下，彼此劇烈衝突抑或「無間」合作<sup>44</sup>。與其說大

44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31頁。

眾文化或大眾傳媒開始形成中國社會的公共空間，不如說它比其他領域更為真切地展現出90年代轉型期中國社會、文化特有的共有空間的特徵<sup>45</sup>。

而在工業、「後工業社會」，傳媒早已成為新的權力中心之一。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傳媒所顯現的空前力度，事實上是「權力的媒介」與「媒介權力」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相互結合、彼此借重的結果<sup>46</sup>。

所以，如果說在1990年代之前，傳媒更多處於被動和從屬地位，不同的思想和聲音需要抵抗著各種形式的管制、禁錮以及不由分說的律令，因此，對於中國公眾而言，媒體的自由仍然是通往自由、民主、公正的理想社會的橋樑，媒體象徵了陽光，是知識、理性、現代、進步的同路人。但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化改變了這樣的媒體功能和定位。每逢危急關頭，這種從民粹的立場出發，以底層的智慧尋找事實依據，進而從民間收集力量，成為新的權力結構中的一極<sup>47</sup>。

因此，當代傳媒所具有的雙重功能就十分明顯了，一方面，它要適應市場要求，保證其收視率和發行人量，從而獲得更多的廣告收入，這時它需要文化民粹主義的立場和實踐(如《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另一方面，它又必須擔當起「喉舌」和塑造國家正面形象的職責，在這時，它又需要文化精英主義的立場和實踐<sup>48</sup>。

而當我們進一步去發現當前媒體從業人員組成時，我們又將發現其與9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群體的分化和出路高度相關。在那個中國社會急劇變動的年代裡，與精英知識份子日漸邊緣化同時發生的，是知識份子群體的再度分化；部分昔日自我定位為精英的知識界人士，通過對「大眾」傳媒系統及文化工業製作流程的介入，迅速脫身於

45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37頁。

46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36頁。

47 雷啟立著，2008年，《傳媒的幻象：當代生活與媒體文化分析》，上海書店出版社，第4-5頁。

48 孟繁華，《眾神狂歡：世紀之交的中國文化現象》，中央編譯出版社，第184頁。

漸趨邊緣的地位，分享著正在即位中的主流文化的光環與恩澤<sup>49</sup>。

因此，一方面，大眾文化內在地組織出其無所不能的精英生產者，另一方面，其將召喚出能適應並追逐這些文化的廣大「消費者」和亦真亦假的需求。同時，任何主流敘事也必須要經過大眾文化的改寫才能被「廣大人民群眾」這個匿名然而卻無處不在的「超級讀者」所接受<sup>50</sup>。「意義」(meaning)也就是在如此的互動中產生，它無疑又從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地鞏固了現有秩序。

所以，支撐起「真實」包裝和如此媒體敘事策略的其實是消費者的內在需求及現代社會的運作邏輯。

這才能解釋為何大家都對這樣或那樣的故事有興趣？為何大家對媒體擁有著如此相近的期待？或如此習慣於接受那樣的結局？

媒體如此辛苦「賣力」地「代為」跟蹤和「直指本質」，讓觀眾(更準確說應是消費者)跟隨攝影機或媒體人的眼睛，不需要很費勁，盡可能輕鬆、快速、便捷地「挖出」真相或享受到這樣的一種感覺！與其說是媒體運作的成功策略，不如說也是觀眾讀者早已習慣的認識事物方法——我們已經不習慣模模糊糊，更習慣於爽快地給出一個「黑白分明」、更為「準確」的答案。

而如前文所指，很多人似乎只是以「鄉村建設」為由頭，利用弱勢群體的位置，以反抗者的姿態說出自己一直想說或在說的話。我們似乎聽到各種問題，但與其說是提問，不如是一種對提問者觀點的再次驗證與一貫立場的再次強調，而很少有人真正進入那個討論脈絡，逼視產生出如此社會行動及困境的現實問題。

比如，在那篇至今可算是對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最為嚴厲的批判文章中，核心論點其實還是對溫鐵軍院長「解構現代化」所產生刺耳與

49 戴錦華，《隱形書寫：90年代的文化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第38頁。

50 黃平，〈縫隙密佈的「盛世神話」：2006年春節晚會語言類節目文化研究〉，當代文化研究網：<http://www.cul-studies.com>

不和諧效果的「攻擊／清算」。論者的邏輯正是，如果溫教授宣導的微觀實踐有問題，那麼無疑其「路越走越窄」，以致「他（溫鐵軍）老以為可以用行動給那些知識份子一記耳光，結果卻是每個人都給他一記耳光！<sup>51</sup>」，這些再自然不過的證明瞭他所不斷警醒的「我們到底要什麼？」、「防止土地『私有化』」得不到實證經驗的支持，其對社會現實的宏觀批判與主張自然「載（不）動三農幾多愁（儘管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認為只是一種小小的行動，沒有任何人會天真地認為此舉可能達此「重任！」）」，因此，也就不具有那麼大的「危險／危脅」。

如此言論當然可以在公開與自由環境下更為直接的行銷，但為何不勇氣可嘉地直言不諱，而非要代表性地借助各種不同階層的嘴巴去發出同樣的聲音，這本身就值得進一步思考！

另一方面，消費時代下的犬儒文化已經讓我們接受了這樣的一種邏輯——從一開始，我們不切實際地期待著有一群「崇高／傳奇」的「他人」，有可能將我們共同的問題得以解決。似乎如學者夏曉鵬所言，「他者」是「自我」的反射。其在心理層面的效果是，凡是「自我」所不願承認的性質，都收錄於對「他者」的描繪之中。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藉此將「自我」從面對社會問題的焦慮中解脫出來，因為他／她已找到問題的原因<sup>52</sup>。

但如此處理卻也間接的在我們內心深處埋下不種程度的「道德焦慮」與「不安」，所以「需要」用一種「庸俗及犬儒」的處理進行釋放，以讓自己的內心獲得某種平衡與「輕鬆」——哦、原來如此！難怪……不就那麼回事、又能怎麼樣？

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是「復興學校<sup>53</sup>」，當昔日被我們冠以道德光

51 相關引文參見林海〈溫鐵軍：改良主義者敗局？〉，《南方人物週刊》，2008年1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rwzk>

52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第245-246頁。

53 無疑是「成也媒體，敗也媒體！」的典型案例，先是「志願者神話」的傳奇／悲壯開

環的「英雄」被我們遲到的發現為「竟也是普通人」——原來如此！難怪！……隨著這樣一些深沉的感慨，似乎極大程度上釋放了「我們」的「道德壓力」與深層次的「心靈失衡」。

如此「透明化」的事件處理無疑也將事件「扁平化」了，當我們在對道德英雄進行輕鬆「消費」時，也消解了原來我們曾為之關注和感動的嚴肅社會問題，除了意味深長的各種唏噓聲外，又一扇可以引發嚴肅思考的門，不無遺憾的被關閉了。

這是一個不斷「生產」英雄，同時也以更大的熱情在最短時間內去拆解、質疑和汙名化「英雄」的時代！如果說前者是出於當下我們拒絕平庸的需要，後者仍然也是如此需求與不自覺表達所產生的畸形「效果」，兩者卻是同樣的真實，同樣可供「消費」，如果前者可能上頭條，後者更可能充滿「鬧劇」色彩的登上雜誌封面！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做著大幅汽車與中產階級生活方式廣告的傳媒集團們能恪守「言行一致」的與真正「底層們」站一起，但我們至少要對那些巨額利潤「尾數」般的廉價同情與剩餘希望保持著某種必須的拒絕！

而對另類社會實踐的媒體呈現，我們則需要有更多迎接「汙名化」或從「雲端」墜入「谷底」的準備——作為主流社會的批判行動，將永遠是這個社會中的「他者」，只有進行遙遠的放逐，才讓其中那部分更有話語權的人感到安全——而這也正是另類社會實踐的真正價值和力量所在。

## 有效與有限

行文至此，相信很多人已經按捺不住憤怒、失望與不滿。筆者不

---

局，然後是對「神話主人公」也即道德楷模的個人進行嚴厲的道德指責，客觀上令這樣一場廣泛的志願者事業遭到很大挫折，具體細節請參考網路相關報導。



是在為自己或這場運動進行自我辯護，在如此一個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裡，辯護有用嗎？而相似的反思和自我批判在運動內部同樣存在並被我們所期待，而筆者心中社會運動的最大挑戰恰恰在於正在固化形成中的另一種「利益集團」。同時，該文也不是因此而否定我們需要改進和調整很多工作。在這裡，我們只是希望能結合具體的實踐與社會脈絡，進一步打開社會運動本土化的討論空間。

就如學者汪暉所認為，「如何理解公共領域和媒體，絕不應該被歸結為要不要公共領域或要不要新聞自由，而應該被歸結為承認不承認公共性背後的權力關係，要不要去揭示那些公共性宣稱背後的利益關係。在今天，對任何權力的分析都必須置於一個權力網路的關係之中，從任何一個單一方向上將自己塑造成反對者都是可疑的<sup>54</sup>。」

當大眾傳媒榨取苦難，使其成為表像，但那些產生苦難的社會基礎仍然存在，現實和生活都在繼續。

同時筆者也不是否定傳媒在社會運動的動員宣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只是希望指出，其在一定程度上無疑是有效的，但其效果也是有限的！

因此，社會運動將面臨著這樣的一種兩難：如果與媒體疏離，他們的聲音則發不出去，因為當前這幾乎成為唯一的傳播管道；如果通過媒體，除聲音將會被扭曲外，更重要的是，屆時將會有無數形形色色的虛擬參與和不同力量，如前文所述，其間將投射拉扯上媒體及主流社會的各種邏輯，不僅可能吸納消解著現實社會的批判或積極的建構力量，更將在最需要耐心與支援的時候，迎來各種「落井下石」或提前到來的「死刑判決書（或者『死亡證明』）」。

如此的困境，既提醒我們需要對媒體可能產生的短期效果和積極作用保持必須的清醒，更提醒我們一建立開拓出不一樣之評價標準和話語體系是多麼的重要，否則

---

54 汪暉、許燕，〈「去政治化的政治」與大眾傳媒的公共性：汪暉教授訪談〉，《甘肅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

當然只能任由「社會公器們」所隨意塗抹。

需要同樣提出的是，除了對新聞媒體們「代民請命」的真實動機與效果進行必要的質疑外，我們發現主流學術機構／學者的敘述書寫與媒體竟存在著相似的問題，其基本的運作邏輯都是「客觀化、他者化」，以此突出「書寫者／敘述者／觀察者／總結者」超越「經驗／感性」的「實證」立場，並以「科學的」研究為由，刻意保持和物件間的距離，然其背後無疑是更多的知識霸權與不對等關係<sup>55</sup>。

當學術著作背後的各種致謝（特別是對於自己的研究物件）成為某種學術規範或修辭的時候，它似乎更是建立作者形象的某種表演或軟廣告。當「致謝者」的世界和「被謝者」的世界仍然是如此的隔絕，當他們的生活仍然只能成為我們筆下的素材並可以隨著作品的發表而從我們視野中消失時，「我們」如何真正的和「他們」站在一起？

最後需要提醒的是，本文無疑是某種對敘述進行解構的嘗試，但正如夏曉鵬所提醒，「同樣，敘述分析的建構論分析作為一種批判的矛，很容易地反向刺穿作者本身的建構與敘事：亦即，作者對媒體的解構說穿了不過是以另一種敘述（故事）來置換其他敘述（故事），以自己的聲音消解其他聲音<sup>56</sup>。」

所以，作為另一種「敘述」的該篇文章，其本身的意義也是十分有限的，重要的是，這樣的批判或解構能否為我們的實踐增加某種的「維度」，當我們看到各種以「中立客觀」或「為弱勢群體鼓與呼」為名，但實則「批發兼零售」民眾的苦難或反抗時，能多一份清醒，少一分盲目！

2009年6月1日

55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第23頁。

56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09，第155頁。

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  
反思台灣農村陣線的行動與組織\*  
蔡培慧\*\*

The Truth Is a Social Acti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Ac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aiwan Rural Front  
by TSAI Pei-Hui

---

\* 作者特別感謝林樂昕、鍾怡婷、許博任於行文過程的討論與協助。

\*\* 服務單位：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通訊地址：116 台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一段111號  
E-mail: peihui@cc.shu.edu.tw

這是一場表現在論述的生存之戰。論述爭奪的壕溝戰發生於行動之中，「真象」是不斷透過行動定義、建構、修正、消解、再重新定義的迂迴過程，社會的改變來來回回地折衝，就發生在壕溝的近距拉扯間。然而論述也不是憑空發生，它鑲嵌在組織者的行動網絡中，因此本文以台灣農村陣線水平網絡式的組織為例，說明農陣如何在農運的戰場上開闢一方「圈地」論述的公眾討論，也將分析農陣水平組織模式對於社會連結、擴展行動、生產論述的可能性與限制。

## 一、「圈地」成為媒體語彙

2010年7月中旬以降，台灣主流媒體常以「圈地」一詞指涉政商合流奪取農地的行為，著名的評論家南方朔專文探討圈地的中西歷史(2010)，更擴展了社會大眾對圈地理解。「圈地」的古典解釋，意味著國家法權與壟斷資本合謀奪取基層農民生存權最重要的依附——土地，是一場架構在資本主義擴張原始積累，沾滿血腥的歷史進程(馬克思 2004〔1867〕)。何以主流媒體選擇、運用「圈地」一詞，或者「圈地」如何具象的反應了政商合謀的惡行？表面看來，「圈地」一詞的運用見於2010年七一七全台農民凱道夜宿，所標舉的行動目標「土地正義 圈地惡法立即停止」(朱淑娟，2010)，也表現於2010年六〇九苗栗縣政府派二百餘名警力(國家法權)與二十多台怪手(資本財團)深夜駛進良田，鏟土毀田所引爆的強烈震撼(清大農村讀書會，2010)。然而，仔細探究，2010年4月，反對「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立法的農民串連行動已經指出「產業園區」形成「圈地」的不當(呂茂榕，2010)，2009年11月，相思寮後援會也使用「相思寮悲歌：面板業吃人的中科圈地運動」<sup>1</sup>做為議題宣傳與社會動員的語言；更早之前苦勞網

---

1 <http://www.dfun.com.tw/?p=19868>

2008年12月刊載反對「農村再生條例」(以下簡稱「農再」)行動的相關文章(徐沛然2008;蔡培慧2008),即已出現「圈地」一詞。

「圈地」作為政商合謀驅趕農民的具體象徵之所以成為主流媒體的語言,並非偶然,它是將近二年的抵抗行動所觸發的社會認識反應於主流媒體語彙,它是一場運動組織與獨立媒體水平連結,共同擴大社會認識的過程,這個過程容或有方向性,但並非全然有架構的組織推展,它或許很大程度的仰賴某種偶然事件,然而偶然事件能擴展或觸發深層結構的討論,則必需建基於日常組織工作的必然。

因此,本文主張大眾傳媒所報導的「真實」、所認識的「真實」,並非單向的主流媒體的擷取或傳佈,應當視之為雙向理解與滲透。本文試圖以台灣農村陣線與獨立媒體的水平連結反思「真實」如何被界定、被呈現,並與〈真實的偏見〉一文所關注的傳媒能否再現真實的論點對話。本文認為「批判媒體、評斷『真實的質地』,抑或檢驗報導者的現場參與」(潘家恩,2010),容或是有意義的評析,也僅僅是對媒體後設的被動理解。面對大眾媒體,批判知識份子應當意識到「真實」的再現是一場「介入」的過程,從而選擇行動的腳步。

本文將以台灣農村陣線自關注「農再條例」立法進程而集結,<sup>2</sup> 擴及

---

2 台灣農村陣線(簡稱農陣)是一個水平連結的組織,它泛指2008年12月起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立法過程中,參與討論、擴展組織及介入修法等行動的社群。這股力量的集結,本來並無集體的名稱,直到2009年2月為了號召連署的需要,經討論定名為「台灣農村陣線」。由於它的水平連結是透過網路社群、基層組織、讀書會及工作小組等方式形成,因此大抵分為二層相互交錯的社群關係及一個支持此一行動的連署對象。

關注農再立法並且支持農陣的社群,主要指實際連署者,它指12,290連署者,包括數百個團體與近12,000名個人,這個社群是農陣議題得以在短時期受到關注並且持續擴散的基礎;二層相互交錯的社群指:一,它在網路上成立一個廣泛討論農民農業農地農村議題的社群,成員443名,包含農民、社區工作者、立法委員、記者(主流與獨立媒體)、學生、學者專家以及關心農業的各方人士,這個社群通常也是各項抵抗行動動員的基礎,並且透過此一社群,促發新的社會連結的管道;

二,它指稱一個實際執行工作的社群以及連帶的數個工作小組,由於關注農村再生條例,及其引發的農業議題爭辯,使得農陣至少參與農地政策、糧食安全、農村社

與獨立媒體的互動；反對「產創條例」制定，以至於近期怪手毀田所引發的反圈地運動，以「圈地」概念的擴展為例，敘述「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的具體實踐，並就此反思迂迴緩進的社會介入過程。接著從社會行動的三個面向：公共宣傳、組織工作與立法遊說，探討台灣農村陣線本身的水平網絡組織以及與獨立媒體的水平連結，擴及組織與行動兩者之間的關連及結果。

「圈地」此一詞彙，基本上反應台灣在長期的資本主義擴張與土地管制失控之下，新一波的逐利手段，表現在都市地區為「天價競標國有地」、建商主導的「都市更新」等形式；表現在農村地區，則是國家主導為資本服務的大型開發案（竹東竹科周邊、竹北樸玉園區、竹科竹南基地周邊〔大埔〕、苗栗後龍科技園區〔灣寶〕、二林中科四期〔相思寮〕）驅逐世居斯土的農民。「圈地」一個百餘年前出現的歷史名詞，在今天仍然具有解釋效力，反應出當前台灣處於壟斷資本擴張，國家職能商品化的壟斷資本主義社會結構。因此台灣農村陣線對於現行結構所做出的批判，引用「圈地」概念，既非標新立異，也非見解獨到，無非是將潛藏在社會結構中的壟斷權力給突顯出來罷了。

---

區工作、農村社會調查、小農復耕、國際農運團體串連與台灣進步社運連結等多面向的工作，承擔起這些工作的行動者計有77名，這個社群成員包含農民、社區工作者、空間專業者、紀錄片工作者、青年學子及專家學者。

前述三個社群中僅第一個社群被動的接受訊息，後二個社群則透過網路展開討論、對話；第三個社群則在網路討論之際，依據工作的推展有綿密的不定期會議，隨著工作的地域重心之別，不定期會議分散於高雄、彰化、新竹與台北等地，透過網路群組及不定期的會議，第三個社群形成「自願自覺、有機連結」的工作關係與集體意識。隨著組織工作的開展，農陣已成立秘書處擔負最低限的行政工作，秘書處由義工及一位專案人員協助。

同時，農陣因社會行動的擴展，與三類組織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第一類為受土地徵收迫害的農村聚落、第二類為農陣支持的小農復耕聚落、第三類為關注農村議題的學生青年團體。

看似繁花盛開、積極行事的同時，農陣成員也深知目前的動能，建基於行動的急迫以及投入者的熱情，也理解「水平、彈性」組織的去中心特質，所可能衍生的結構缺點（Freeman 2007），這個部份有賴農陣成員深刻反思與具體評估，目前尚無定論。

那麼「圈地」一辭如何從運動團體的分析、獨立媒體的報導擴展為主流媒體的討論？從「關注農再立法」、「反對產創條例」及以「七一七土地正義凱道守夜」三波行動可見端倪。

2008年，農陣成員針對院版「農村再生條例」的分析時指出：「該草案第二十五至二十七條，揭露了這是一部假農村再生之名的『土地開發法案』。所謂的農村再生，不過是以法律程序行圈地之實。（蔡培慧2008）」隨著「農村再生條例」立法進程的擴展，「農村再生條例」以再生之名行圈地之實的解析，逐漸被關注農村、社區的社群理解，不過，這仍停留在國家法權放任土地開發、炒作土地的層次。

2010年4月，農陣成員為反對「產創條例」，<sup>3</sup> 邀集台灣受土地徵收之苦的農民齊聚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力陳政府強制徵收農地以開發工業區、科學園區的不當，此際「圈地」不再是推論，而是具體的現實，論述的厚度已逐漸在組織者與獨立媒體的互動中，相互學習與滋養，然而主流媒體的報導仍然偏重土地開發，而尚未運用「圈地」一詞。

事件的關鍵轉折是大埔事件，2010年6月9日苗栗縣政府放任警察、怪手恣意毀田、6月19日各地聲援者齊聚大埔扶稻，各自救會發出「一方有難、八方來援」聲明<sup>4</sup>；6月23日農民北上總統府、監察院陳情，6月28日怪手全面鏟土、破壞良田，6月30日農民再度北上，求告無門，苗栗縣政府堅稱「依法行政」，7月6日全國受土地徵收之害

3 台灣農陣陣線與各地反徵收自救會反對「產業創新條例」，旨在反對無端開放設置產業創新園區。具體要求：一、刪除行政院版草案第九章延續獎勵投資條例與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的租稅減免，繼續豢養財團企業的相關條款（行政院版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及三十一條）。二、刪除草案第十章，特別是：變本加厲放寬各種產業園區的設置條款（行政院版第三十三條），以及，政府機關以及不問公、民營事業或興辦產業之私人均可以輕易透過徵收奪取弱勢人民安身立命的家園條款（行政院版第三十六、四十一及四十二條），或要求公有土地逕行讓售，企圖藉此攏絡地方派系條款（尤其非都市土地分區變更審議的權限，已在去年大幅下放給地方政府）（行政院版第四十一條）。

4 <http://www.df.com.tw/?p=27870>。

的農民組成聯盟，決議7月17日夜宿凱道；7月12日農民反徵收自救會聯盟與台灣農村陣線發出動員聲明，再次強調反對政商合謀的「圈地」惡行；7月14日夜宿凱道活動定調「土地正義：圈地惡法立即停止」，7月17日全國農民走上街頭，當晚齊聚凱道民眾達3,500人，夜宿農民近1,000人，夜宿之後農民齊力在凱達格達大道上種起一畝青翠稻田，之後將命名為「凱稻」的秧苗，移植到彰化溪洲、高雄美濃由當地農友接力護持；7月18日的主流報紙大篇幅報導這場不靠政治力動員，純然社會力展現農民意志的運動，7月19日起國家機器意識到社會動能，行政院長出面與苗栗竹南大埔農民會談，7月20日行政院長與農民反徵收自救會聯盟及台灣農村陣線成員會談(行政院新聞局2010)。至此「圈地」一辭佔據主流新聞版面(林新輝2010、陳慧萍等2010、單厚之等2010)，農民反圈地的運動主軸廣為社會週知。

## 二、真實如何實踐？

### (一) 公共傳播：界定內容的必要

如果我們將台灣的媒體，依能見度分為四個層次：商業主流媒體、公共媒體、獨立媒體與「網路及社群傳播」。那麼，批露「關注農村再生條例」及其相關新聞以公共媒體及獨立媒體為大宗，討論也較為細緻，「網路及社群傳播」則是不可忽視的力量。至於商業主流媒體則難以一言論斷，主流媒體中的電視媒介，僅僅報導了過程中的激烈場面，主流媒體中的平面媒介，《聯合報》的社論、《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民意論壇」持續的刊載議論農村再生的公眾意見(徐世榮等2008、蔡培慧、吳音寧2008、向家弘2008、蔡培慧2009、鍾秀梅2009)，《自由時報》則於2010年4月上旬，連續五天進行一系列的「專題報導」(陳曉宜2009、鍾麗華2009)，《天下雜誌》(彭昱融2009)、《今週刊》(陶曉嫻2009)也出現了多篇專題報導，本文不在解析報導內



容，而想藉著行動的進展，分析報導的後續影響，主流媒體的報導對於運動的擴展有正面的助益，除了擴大社會討論之外，最為重要的是變成溝通說服的媒介。

《聯合報》(2009)的社論〈為何農村再生的美景使農民深感疑慮〉一文，清楚的點出了農再條例不談產業政策的缺失，僅及景觀工程造成農民的疑慮。《聯合報》的社論，成為農陣對公部門與立法院遊說的利器，由於台灣公共議題論辯，很容易陷入藍綠之爭，農陣在運動之初即有此警覺，盡量避免被標籤化，以造成與公部門對話及立法遊說的障礙，因此，運用聯合報社論論點，有助於立法遊說的進展。

另一個例子是2009年4月29日農陣與馬英九總統會談的場合，農陣成員提供《天下雜誌》的報導作為佐證，馬總統直言他已看過了。這件事令人印象深刻，主流媒體之所以主流，在於它所傳佈的不特定對象層面極廣，超越受議題本身影響的群眾，同時擴及所欲說服的國家機器的象徵者及國家法權的執行者(各級官僚)。

第二波界定圈地論述的重要行動過程，是產業創新條例的爭議，一般對此條例的關注重點集中在稅制的減免，但是農陣成員已注意到產創條例開放中央各部會得以徵收土地設置產業園區，又將開啟圈地的惡行，然而直到2010年3月公平稅改聯盟邀請農陣成員討論共同行動之後，農陣方才正式加入反對「產創條例」的行列，彼時已是立法院針對「產創」朝野協商，行將三讀的關鍵時刻。正因如此，農陣的動員工作僅及專家學者，以及長期協助的地方反徵收自救會，並即刻於4月5日召開以專家學者發言為主的第一場記者會、4月7日召開以受土地徵收之苦的農民為主的第二場記者會，值得一提是第二場記者會，農陣邀請竹南大埔、苗栗灣寶、台中后里、台中烏日、彰化二林相思寮等受土地徵收之害的農民齊聚立法院，這一場名為「圖利財團、慘創台灣、農民的怒吼！」記者會，農民以自身真實的案例，將「圈地」的現實置於社會大眾面前。這二場記者會獲得《中國時報》、《聯合報》及

《自由時報》等主流媒體的報導，不過針對產創條例最為深刻的分析，則是獨立媒體苦勞網於法案三讀通過之後所寫的特稿，指出向下修正的稅改之害，以及「『產創條例』更可怕的地方，除了『革命性』的稅制改革之外，就是『土地』。」抨擊「『噬土』的政權、資本和地方派系」，文中點出：「『產創條例』與其說是『租稅優惠』的條款，不如說是一部『噬土』的條款，參與併吞公有地、侵奪私有地的，將會是本土財團、外(中)資，還有從土地中獲得養份、再滋長茁壯起來的地方派系。也許我們都習慣了用全民資產換取經濟發展的模式，不過，現在，當全球競爭者一一浮出，賠上了所有，可能也換不到經濟發展；在資本自由流動的環境下，『產創條例』充份體現了全球到在地的掠奪與災難。」(孫窮理 2010)。

當時農陣發出的新聞稿的再次界定內容，突顯徵收背後的結構問題：「這些強奪民地的劇碼，不但不是個案，而是官商聯合以剝奪性積累的手法，成就台灣經濟的結構暴力！這不僅僅是產業創新條例的立法，它反映了國家職能嚴重往財團傾斜，當國家職能商品化，當國家被壟斷資本綁架，市井小民生存無著困境歷歷在目，農民發出怒吼，它要告訴橫徵暴斂的政府，它要告訴貪得無厭的財團，人民不會永遠沉默，抵抗的號角已然響起。」(台灣農村陣線 2010) 容或新聞稿寫著抵抗的號角已然響起，然而任誰也無法料想，駭人的圈地暴行已在眼前，農民的集結已是必然。

前兩波行動已為圈地論述鋪上肥沃的土壤，大埔事件則是敲醒社會看清政商噬土真相的春雷，6月9日凌晨，20多部怪手在二百多名警力護衛下開進苗栗竹南大埔，以整地之名，放任怪手搗毀良田，怪手鏟起稻穗、護田農民卻遭警察駕離、幼兒苦泣、婦人無告，一幕幕國家暴力威嚇農民的畫面震驚社會大眾。此一事件，透過公民記者「大暴龍」的報導短片，由網路媒體與公民的轉寄，傳送到許多人面前。事實上，即使怪手毀田的畫面驚人，此事件一開始並不受主流媒體重視，

當6月19日各地農民及聲援者齊聚大埔，6月23日北上總統府、監察院陣情，都未受到媒體重視、遑論政府具體回應。苗栗縣政府甚且於6月28日再行開出怪手，全面性的破壞良田，一車又一車載走田中的良質土，當6月30日大埔農民二度北上發聲，商業主流媒體仍然無動於衷，新聞報導集中於公共媒體與獨立媒體，以及部份政論節目的闡述。與此同時，則是臉書、噗浪、PEOPO等網路媒體的自主串連。<sup>5</sup> 隨著七·一七夜宿凱道的有效動員，引發主流媒體廣泛的報導，政府部門停頓了一天之後，積極回應，象徵國家行政法權的行政院院長連番會見農民與運動團體成員，至此，怪手毀田不再是大埔事件，它是壟斷資本主義與國家法權合謀「圈地」的具體象徵，它也是農民反圈地行動的第一聲號角。

以上大致敘述圈地論述從組織者間的小眾運動語言，到成為主流媒體語言的經過，此一戲劇性的論述搶灘過程乍看頗有進展，但本文認為主流媒體的報導有二點值得審慎觀察與反思。第一點，農業議題的背景結構複雜，並非即時性的新聞所能處理，即時性的新聞僅僅切割式的呈現衝突畫面，雖有嫻熟有線電視新聞運作的主管級人員告訴我們，透過電子媒體的報導只要能讓社會大眾擷取「農再條例問題很大，有人反對」、「徵收過程太粗殘」的印象即可，想要理解的社會大眾，自然會進一步去找尋資料！即使明白此點，還是讓身處其中我們感到不安與忐忑，這也讓我們深思，當下台灣電子媒體新聞內容的取材如此偏狹，因而，就運動而言，迎合當前主流電子媒體口味恐怕是一條不歸路，愈來愈嗜血的媒體口味，只會擠壓了議題的論述空間。是以如何撐起有意義且深廣的討論空間有賴多元媒介，公共媒體與獨立媒體的角色因而益發重要。

第二點，主流的平面媒體仍然值得期待，作為一個亟待拓展的公

---

5 限於篇幅，在此無法細述大埔事件公民記者報導之後，媒體突圍始末，請參考劉冠呈、陳為廷(2010)。

共議題，也不能迴避主流媒體的報導。運動擴展的過程中，組織必需擔起「界定內容」的角色。一般說來，傾向於視媒體為新聞內容的生產者，然而，當前的記者在媒體經營的壓力中，養成時間很短，供稿的壓力很大，記者所擔負的路線又多，以致多數記者未必能全盤掌握住所採訪的主題，因此，假設一位記者被要求「平衡報導」之際，他未必能夠掌握住議題的內含，僅僅做到平衡報導的初階，也就是正反意見並陳。若需深化，有賴運動組織者清楚的描繪議題的結構因素以及當前爭議的背景脈絡，如此，通常有助於記者理解議題，從而下筆為文時理出適切的報導與分析，這就是所謂的「界定內容」。當然，運動團體不能天真的以為記者會單向的接受內容，同時也非否定記者客觀報導的自我要求，而是如何清楚的界定論述核心，運用多元媒介（講述、文字、影片……），並且在有限的時間，釐清議題所反應的結構因素，正是運動組織者的自我訓練的重要環節，也是農再、產創、反徵收等圈地議題得以獲取深入報導的關鍵。

## （二）組織串連：擴大行動的連結

在行動中建構的不只有論述，組織也是產生於行動之中，組織形式與論述建構具相輔相成作用，組織生產論述，論述強化組織。農再、產創、七一七不只是三波新聞事件，同時也是農陣組織與行動者再集結的重要過程。

2008年12月18日當天立法院場外的組織串連也初步展開，當天早上農再一讀通過，民間團體下午二點，隨即召開「反對滅農三部曲」記者會，到場發言的代表包含地政學界、社區大學、農學市集成員、農業研究者與農村文化工作者。電視媒體的播報與隔天的報導，使「農村再生」四個字，跳脫選舉語言及立法議事，傳佈到社會大眾面前。

隨著農再討論的擴展，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網路群組逐步開展，12月22日中華民國社造學會與旗美社大於農村願景會議，廣邀正反意見

與會，農陣成員於會中並邀請關注此法案的朋友，共同參與民間版修正案的討論，於是在12月24日當晚假社造學會召開民間版修正案的討論會。與此同時，網路討論社群也已建立，確立此一行動，將分為立法遊說、公共宣傳與草根串連三個面向並進推展。

就草根串連部份，農陣成員積極的結合地方性的組織，辦理多場說明會及演講，說明會的部份計有東勢、美濃、石崗、花蓮、台南等，公開演講部份有台大校園、北投社大，學界也展開多場論辯，與此同時，農陣成員意識到農再議題的討論必需再行擴大，因而構思辦理種子師資的培訓，定名為「春耕工作坊」的培訓於台北、台南及花蓮舉行，三場計150名基層農民、社區工作者與會的種子培訓工作坊，承擔起擴展基層公共討論的使命，同時也逐步擴展農陣的工作隊伍。此波種子志工成為後續擴展討論的發動機，並且開始第二波的草根說明會：苗栗、屏東、高雄、嘉義各地團體主動召集農民、地方人士辦起說明會來。關注農再條例的討論，就這麼一波波的漫延至草根基層，由草根基層得到最多的啟發與能量。還記得台中石崗的謝美麗於理解農再條例後，說了一句：「農民就是黑乾瘦、偏偏政府只想來抹粉點胭脂！」高雄美濃的曾啟尚在公視的鏡頭前流下淚來，表示菸樓是我的祖先留下來的，我不想翻新難道也不可以？台南白河的薛弘明要求政府做好產銷，再來談再生。正是源自於勞動的理解、草根的語言，有力的駁斥政府部門宣傳的假象，同時帶來抵抗運動豐厚的底蘊。

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的行動過程中，農陣成員很有意識的透過各自過去長期來的社會關係串連草根組織，在這個過程中，也逐步認識到許多農村面臨著急迫的土地徵收壓力，若說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的土地活化專章以法的形式授予政商合謀圈地的權力，那麼土地徵收則是透過國家法權形式已然完成的「土地徵收條例」，以大型工商開發為名的圈地事例。因而，當時正在立法院討論的「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又明文授予各部會開發產業園區得以徵收土地的權力。是

以，為了反對產創立法，農陣積極連結受土地徵收迫害的農村聚落為主。

農地財團化是一個非常實際的現實，對於身處其中的農民而言，失去土地也就生存的基礎、失去社會的連結。失根的焦慮，使反粗殘徵收成為農民社區認同的基礎，因此，反對產創條例是農陣反圈地組織串連的關鍵起始點，此波組織工作奠基於前一年農村再生條例的串連，除了個別協助參與，農陣於2010年1月23日於土城召開「農地保護與土地徵收座談會」，邀集土城、大埔、相思寮、二重埔、灣寶等地農民共同理解彼此，探討對策。2010年4月立法院產創條例審議期間，農陣與各地反徵收農民團體很快的集結於立法院召開「圖利財團慘創台灣 農民的怒吼」記者會。此次行動也是受土地徵收迫害的農民有力集結，過去僅是個別農村的議題發聲，直到反對「產創條例」的記者會才出現集體發聲，同時記者會進行後續聲援與彼此經驗的討論。

到6月9日大埔怪手毀田事件之後，各地自救會互相奧援的氛圍更為濃烈，6月19日「一方有難 八方來援」(大埔自救會等 2010)的聲明之後，結盟的態勢已起，此後六二三、六三〇的行動，各地農民皆相互聲援，7月6日在新竹二重埔的聚會上，農民反徵收自救會聯盟成立，設置秘書處，當天議決七一七凱道夜宿行動。凱道夜宿的訊息發出後，各地受強制徵收之苦的農民紛紛與自救會、農陣聯絡；凱道夜宿受到媒體廣泛報導又引發了更多農民團體集結。

持平而言，組織工作起於平常時期的理念溝通與組織教育，擴展於非常時期的突發事件，農民能否從個人的經驗，看到他者經驗的普同，再擴展為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坦白講，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以目前的組織情勢看來，僅僅是個別經驗與他者經驗的連結，從而產生同仇敵愾的集體感，日後如何轉而對結構進行批判，則有賴組織與自我再教育。

### (三)立法遊說：介入實質政策

除了媒體發聲與基層組織工作，進入正式代議體制的遊說工作也是論述爭奪的主戰場與改變社會結構的支點。國家機器非常微妙，它並非鐵板一塊，看似一個整體，卻有許多個別的部門，反應著彼此的本位，彼此或許仍有其扞格，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遊說並不只偏重於「立法院」議事進程（一讀、公聽會、朝野協商、正式提出修正案），也積極擴及行政部門的溝通、遊說，在這個過程中，農陣成員正式拜會國家權力的象徵馬英九總統，進行三小時的實質會談（吳音寧 2009）。並且也與農委會主委、經建會主委會談，同時爭取於國土規劃全國研討會發言，至於其他非正式的透過種種脈絡的遊說更是頻繁。立法遊說是一張綿密的論述網絡，在擴大討論之餘，也質疑中央部會角色交疊的灰色地帶的隱藏衝突，例如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第三章的土地活化直接牽涉到農村土地重劃、建築與地政，觸及內政部的土地規劃、地政司、營建署部分管理體系。因此種種的遊說、拜會及會議，都會交集成一個模糊性的論述網絡，<sup>6</sup>進而有效的起了對「農村再生條例」的批判作用。看似模糊的論述空間，實則有益於立法遊說的進展。當農陣於 2010 年 3 月拜會國民黨團核心立委，要求院版「農村再生條例」第三章土地活化應允刪除，事涉農地管理另定專法之際，獲得了允諾。雖然，2010 年 7 月 14 日三讀通過的「農村再生條例」仍保留了院版土地活化專章中的「農村再生發展區」，然而，直接圈地與開發公有地的「整合型農地整備」條文則已刪除。

隨著法案通過，以及連日來對大埔怪手毀田的質疑，對於農再與土地徵收的抨擊來到高點，逼得象徵國家法權的馬英九總統宣稱：農

6 論述網絡的狹義解釋為對「事物的討論素材」，舉例來說，一位研考會科長級的公務人員曾告訴筆者，2009 年初，時任研考會主委的江宜樺注意到農村再生條例所引發的爭議，要求幕僚提供資料專題報告之際，該幕僚所準備的資料來源近九成為農陣成員所發表的相關文章。廣義則可以視之為對「事物的既成印象」。

再條例非綁樁、也無圈地問題(繆宇綸 2010)。農民持續務農的堅持，農運團體的農業與工業並重，鄉村與都市具有相同價值的主張，也讓向來站在經濟發展那一端的經濟日報發出社論：「農村、農業和農地是一體不可分割的，農村發展必須植根在農業發展及農地永續利用上……」(經濟日報2010)

立法遊說的進展，有賴組織深化。農陣的腳步仍需踏實前進，一方面協力組織各地反徵收自救會，持續的針對個別案例尋求解決之道，同時著手土地徵收條例的修訂，加強立法的壓力，同時藉著「凱稻」播種彰化溪洲、高雄美濃，進行南部農民團體的串連與動員，並且展開一系列的農村草根調查，擴大農民運動的文化行動戰線。

### 三、台灣農村陣線的水平連結

#### (一)農陣水平組織擴展的基礎

農陣的組織串連之所以可能，與全球化壟斷資本主義擴張下，不斷被犧牲的農業與愈來愈艱困的基層人民處境有關，它是一種集體意識的反彈。這不是單一個人或單一議題，而是整體而言，社會大眾普遍意識到日子不太好過、經濟發展好像未必帶來更穩定的生活、每天都在經歷環境的破壞。這些日常生活的感受支撐著農民以及關心農村的人意識到「農再條例」仍然延續著發展主義的思維，無法回應當下農業的根本問題，也無法解決發展失衡的結構弊端。因此，持續務農的農友、參與社區營造的地方人士、返／入鄉工作的農村青年，很快的形成橫向串連。關注農村再生條例的立法進程與地方說明會的舉辦，是一個重要的觸媒，反映著農村的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所累積的、對國家政策的不解與不滿，就此集結行動的動能，因此農陣的組織網絡並非只是網路媒體，更是實實在在的個人與社區。

Wallerstein (2008)論及當前社會運動組織時，提及兩個重點，其



一社會運動議題的擬定，必須正視短、中、長等三個時程，社會議題的擬訂之所以混淆往往是對議題與議題進程時間的認識不夠所致；第二個重點則是「水平(horizontal)連結」與「垂直(vertical)整合」的組織模式之別，他以世界社會論壇(WSF)為例，作為一個水平連結的組織，WSF沒有長期服務於組織的行政人員、沒有科層結構、沒有政治職位，有的只是持續性的論辯與行動。農陣無意圖形成的水平連結組織，此類組織模式，究竟是一種網路溝通工具進步所導致的應然，或者是運動組織中的對於科層結構的警醒並且在網路社群溝通中摸索出的實然，筆者身處其中仍難論斷，想來兩者兼而有之。但是，筆者也必需承認，作為一個論壇的水平連結或許足夠，作為一個自我認定必須承擔起政策介入與深化組織串連的農陣在組織形式上仍然在摸索中，況且時勢所逼，農陣如何維時開放性，同時又能提出有品質的政策遊說文件，並迅速反應時勢變化，凡此種種都持續的考驗著組織。

## (二)網路特性與社會行動

一開始農陣成員視網路為連絡的工具，未曾想到網路社群的組織作用。2008年12月針對農村再生條例的討論仍以農民團體與社區團體為主，因為當時的組織想像認為草根團體才是根本，是以較為積極進行地方說明會，從東勢、石岡、美濃到苗栗，訴求對象都是農民。

網路所能帶來的組織性是隨著運動擴展而逐步認識的。2008年12月19日，關注農再立法的行動初步展開，深深感到對此議題的討論太過粗淺與太少議題，因此，尋求運動媒體苦勞網的協助，農陣成員透過向苦勞網的特約記者與實習記者仔細分析農再條例不當的過程，討論如何深入淺出的進行農再議題的報導。隔天，苦勞網刊出了徐沛然(2008)的文章，與此同時，部落客Munch(2008)本於自主觀察，也寫一篇〈三分鐘搞懂農村再生條例〉，從此農再的討論持續於網路擴展，此時，農陣才開始意識到網路媒體的力量。

農陣與獨立媒體處於相對主體性的水平連結模式，比如說小地方（台灣社區新聞網），環境資訊電子報，立報都積極的進行報導，經常的刊載農陣的第一手消息，此一互動是本於對農村議題的關注，自主的進行報導專區設置，甚而農陣的官方網頁發佈消息的時間點，經常晚於獨立媒體。因而農陣此一運動團體專注於事件與地方組織的串連，而獨立媒體的報導往往有助於議題的擴散與地方民眾的認識。換句話說，農陣的組織工作擴展與獨立媒體的自主報導結合在一起，開拓了一個公共議論的空間，直白的說，農村工作的社群與獨立媒體自覺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撐起廣泛的農民農業農地農村議題的討論平台，有助於力量與行動的擴展。網路的工能因而有了「聯繫工具」之外第二個功能：「議題擴散」。

網路的第三個功能：讓農陣社群有機會跳脫既存的人際紐帶，因議題認同而結合為更龐大的社群。例如，目前負責農陣官網的工研院研究員，之所以參與農陣，就是因為他寫了一篇科技入鄉的文章，農陣的組織工作者看到之後直接留言，因而取得聯絡，並且參與2009年2月的春耕工作坊之後，開始承擔工作。因為網路，擴大了人際連結，沒有網路的話，人際紐帶有賴直接的關係，然而藉由網路，農陣組織的擴展，得以跳脫人際紐帶，人們因為共同關注的社會議題而參與公共論述，進而共同行動。

網路對於水平連結幫助很大，它讓農陣溝通的成本降低、組織動能提高，並且形成一個氛圍——「自願自覺」變成可能，因為所有的行動、議題、討論都非常公開，只要願意多參與一點，就會涉入多一點，因而形成有機的連結，自主的參與，而不需像以往的組織形式，需有特定的關係、脈絡才能參與，網路可以超越原來的人際紐帶，此一超越除了是工具性的超越也是階級性的超越。

任何一個組織，一定具有思想的溝通，行動的連結，人跟人的聯繫紐帶，這些都是組織的基礎，但是在這個基礎上，網路社群是一個

特殊的工具，它並不像電話等等單向的溝通，網路社群的議論是全面性的，發一封信出去，看到並參與討論有四百多人，行動分工有七十多人，網路工具的獨特性有助於形成水平連結、腦力激盪、協力分工。如果是過去的組織模式，或許有個理事長或是小組長之類的角色來議決或聯繫。可是農陣組織並非如此，農陣的網路社群，若是有人提出一個議題，這裡有人給意見，那裡有人也給意見，就會形成新的節點，形成新的工作項目。例如，筆者對於關注農再修法議題涉入的非常深，足以掌握立法院議事過程的細節，然而對於小農復耕或是農陣成員於工研院與二重埔發展的社區支持型農業就無法全然掌握，而是以新竹為主的成員另成一個工作小組，甚而類似相思寮後援會由於議題過於複雜，討論日漸密集，因而另行籌組新的網路社群。換句話說，農陣網路社群提供一個豐富多元的平台，它讓很多議題同時出現，形成小群體、小群體的發聲，小群體的成員並非固定，而是在某些議題上集結與行動，下一個新的議題來了，組織成員又有一波流動。

農陣水平連結的優點在於自願自覺，缺點也在於自願自覺。因為農陣參與者皆為志願者，每個人都有其不同參與重點，農陣所面對的局勢緊張，大家就會集中把心力放在這裡，一旦這個壓力消退之後，參與者未必能維持持續的參與。此外，由於農陣網路社群是一個開放的討論平台，任何議題被提出來之後，若是有人很積極討論，這個議題就會成為議題從而有所行動，若是無人回應，這些議題就會被一直排到後面，最後無人關注，網路帶來彈性的同時，也可能將某些議題彈出而散逸。

### (三) 實體組織與網路媒介的落差

然而，就農陣組織而言，網路社群最大的缺點，恐怕在於如何將網路社群的討論與基層草根組織工作連結在一起。由於多數農民並未

直接使用網路，因此網路社群的討論往往無法擴展至基層草根組織，這是網路的工具性限制，也反應了工具的階級性，僅以數位落差名之，無助於解決這層困境，農陣的作法採取聯絡人的模式，例如苗栗後龍灣寶則由一位返鄉青年參與工作群組的討論，以維持連結、其他地方如二重埔、大埔、相思寮皆由農陣青年協助連結。然而，這並不能完全避免資訊的落差，因為農陣群組討論議題既廣且深，群組成員未必全然投入其中，因而掌握網路的人如果他積極參與，將全面理解農陣，可是沒有掌握網路的人，則必須透過中介來理解，而這樣的理解事實上已經有中介的選擇性，假若基層草根組織工作者中無法有全然掌握網絡工具的人，那麼就會產生很大的資訊落差，這是最為棘手的情況。由此，數位落差不僅顯現在資訊的掌握，也將顯現在藉由網路作為社群溝通工具的水平組織之上。雖然，農陣目前以定期聚會（各類行動、工作小組討論、共識營），以及各地反徵收自救會輪流召集會議的方式，藉著實體會議，人與人相遇的溫度增強彼此的連結，然而，水平連結的數位落差將會一次又一次的考驗組織動能。

#### 四、反思——真實是一場社會行動

反對農村再生條例立法行動的最根本意義，是將對農業生產的結構性的批判擴展開來，並因此而產生農村再生的根本思維的辯論。延續此一分析，進而在反對產創條與七一七凱道夜宿，主張土地正義、圈地惡法立即停止等論述。從論述而起的爭戰，建基於對社會現實的分析，也要回到社會現實的變革與否加以檢驗。仔細觀察農村再生條例與產創條例的立法進程與大埔事件的起伏，以及這一段期間以來社會大眾對圈地、對農業的認識，雖然在近期，運動團體已介入論述的壕溝，然而，我們知道這一場爭戰的近距拉扯，來回折衝仍在持續，面對情勢、冷靜分析、有機集結、持續介入，才有趨近真實的可能，

這是一場持續不斷的戰鬥。

水平連結的組織模式所具備的開放性、彈性與及時性，讓農陣各地夥伴可以快速回應社會現實，共同生產論述實踐，掌握社會議題方向，試圖改變主流媒體語言。並且再透過網路傳播：臉書、噗浪、部落格、公民記者的影音報導等多元媒介的論述再生產更進一步與外界及社會大眾溝通，對內則強化組織關係與橫向串連。然而，水平連結的組織模式相較於剛性組織對於組織目標、組織結構與組織認同的形態迥異，類似農陣此類水平連結組織模式對於集體意識、組織深化、議題經營的可能與長時期的組織延續，都有待更長的觀察與醞釀。

社會運動容或可以透過網絡媒介而達成對話的開放性，然而面對結構與身處結構中的個人，仍然要有真實的連結跟真實的理解，行動才厚度跟基礎。Harvey分析當前左翼社會運動，認為至少有五大面向：(1)非政府組織；(2)無政府主義者與草根組織、(3)傳統勞工和左翼政黨；(4)反迫遷(displacement)和反剝奪(dispossession)所引爆的社會運動；(5)身份認同形成的各類組織，此五大面向未必互斥，某些組織還包含多種面向(2010, pp. 256-260)，彼此能否在思想、政治與社會秩序上落實改變，擴展新的社會可能，是此波運動的總體方向。台灣農民反「圈地」運動無疑與長期以來全球資本擴張，公共資源為壟斷資本所獨斷，激起新一波抵抗相關，它展現了多面向的組織型態的靈活結盟。雖然，參與其中的行動者能否如Harvey所期待的從經驗中建立對資本主義的共同的認識，深化有機知識份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自我教育，落實為持續變革的動能，仍待檢證。然而，農陣近兩年的經驗顯示了，行動加強認識、認識擴展論述、論述激發反思，從而召喚改革的動能，進而影響具體政策，創造新的局勢。在新的形勢中，人與人、人與物、人的思維再行組織，這是迂迴緩進社會過程，長此以往，方能在現實的礫石中，澆灌出一方沃土，行動帶來改變的可能，唯有實踐方能揭露真相，改變現實。

### 參考文獻

- Freeman, Jo 2007-12-26,〈陳信行譯〉〈無架構暴政〉, 取自: <http://blog.roodo.com/dkchen10/archives/4728841.html>。
- Harvey, David 2010, 'Organizing for the Anti-capitalist Transition.' *Interface: A Journal for and about Social Movements* 2(1): 19.
- Munch, 2008-12-19,〈三分鐘搞懂「農村再生條例」〉, 取自: <http://blog.yam.com/munch/article/18854630>。
- Wallerstein, Immanuel 2008, 'Remembering Andre Gunder Frank while Thinking about the Future.' *Monthly Review* 60(2): 50.
- 大埔自救會、灣寶自救會、二重埔自救會、相思寮後援會、台灣農村陣線, 2010-06-20,〈農民反租徵收聯合宣言: 一方有難八方來援〉, 小地方新聞網。取自: <http://www.dfun.com.tw/?p=27870>。
- 王光慈、李明賢, 2010-07-19,〈反圈地 促修法「上告五穀大帝」農民凱道種稻〉,《聯合報》。
- 台灣農村陣線, 2010-04-13,〈圖利財團 慘創台灣 農民的怒吼〉, 取自: <http://www.taiwanruralfront.org/node/141>。
- 向家弘, 2008-12-23,〈釐清真實的農民與農村〉,《中國時報》。
- 朱淑娟, 2010-07-17,〈凱道月亮為證, 還我土地正義〉, 取自: [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18.html](http://shuchuan7.blogspot.com/2010/07/blog-post_18.html)。
- 行政院新聞局, 2010-07-20,〈吳揆接見農民聯合自救會及台灣農村陣線等一行〉, 取自: <http://info.gio.gov.tw/ct.asp?xItem=67876&ctNode=3852&mp=1>。
- 吳音寧, 2009-05-09,〈4/29之夜: 與馬總統談農村再生條例〉, 小地方新聞網, 取自: <http://www.dfun.com.tw/?p=12188>。
- 呂苡榕, 2010-04-08,〈產創圖利財團, 農民反到底〉,《台灣立報》。
- 林新輝, 2010-07-20,〈圈地後座力 藍綠都看見〉,《聯合報》。
- 南方朔, 2010-07-24,〈鰲拜、康熙、反圈地農民運動〉,《聯合報》。
- 孫窮理, 2010-04-16,〈「產創條例」過了, 恭喜大家〉, 苦勞網, 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51624>。
- 徐世榮、賴宗裕、顏愛靜, 2008-12-22,〈農村再生為了誰〉,《中國時報》。
- 徐沛然, 2008-12-21,〈細說「農村再生條例草案」悲慘小農的未來際遇〉, 苦勞網, 取自: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2434>。
- 馬克思, 2004[1867],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編譯, 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資本論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清大農村讀書會, 2010-06-14,〈哭泣的6月9日: 竹南大埔危城記〉, 取自:

<http://www.dfun.com.tw/?p=27735>。

陳慧萍、顏若瑾、彭顯鈞，2010-7-21，〈綠營促重修農再「圈地」條文〉，《自由時報》。

陳曉宜、鍾麗華，2009-05-08，〈農村再生條例專題報導——農村再生條例爆民怨 政策將再修正〉，《自由時報》。

陶曉嫻，2009，〈粗糙立法 農委會主導「失控的進步」 兩千億農村再生條例 富不了農民〉，《今週刊》，642期。

單厚之、羅融、管婺媛、江慧真，2010-07-18，〈農民反圈地，吳揆：地方處理不周〉，《中國時報》。

報合報社論，2009-04-08，〈農村再生的美景，為何讓農民深感疑懼〉，《聯合報》。

彭昱融，2009，〈兩千億大紅包 對農村是福是禍〉，《天下雜誌》，420期。

黃國樑，2010-07-20，〈大埔反圈地事件 學者要求停徵地 內政部說不可能〉，《聯合晚報》。

經濟日報社論，2010-07-19，〈農業、農村、農地豈能分割〉，《經濟日報》。

劉冠呈、陳為廷，2010，〈大埔事件下媒體突圍〉，《當代雜誌》，復刊3期。

潘家恩，2010，〈「真實」的偏見：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

蔡培慧，2008-12-21，〈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解讀行政院版「農村再生條例」〉，苦勞網，取自：<http://www.cooloud.org.tw/node/32395>。

蔡培慧，2009-04-19，〈農村再生 制定最適農地〉，《聯合報》。

蔡培慧、吳音寧，2008-12-24，〈農村再生 二千億的誘惑〉，《中國時報》。

繆宇綸，2010-07-28，〈馬英九：農再條例非綁樁，也無圈地問題〉，《中國時報》，取自：<http://news.chinatimes.com/politics/0,5244,130502x132010072801232,00.html>。

鍾秀梅，2009-04-05，〈新保守主義幽靈在農村：回應「農村發展不要怕介入」〉，《中國時報》。

鍾麗華，2010-7-18，〈農再條例過關 學者憂加速農村圈地〉，《自由時報》。

# 不跟傳媒玩同一場遊戲

魏均\*

## Try Not to Play the Same Game with the Media

by Ti WEI

---

\* 服務單位：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通訊位址：300 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E-mail: tiwei@mail.nctu.edu.tw



閱讀〈「真實」的偏見：以大眾傳媒中的「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為個案〉這篇文章，很直覺地讓人聯想起美國社會學家吉特林(Todd Gitlin) 1980年的名著《舉世矚目：新左的傳媒建構與消解》(*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sup>1</sup>在這本剖析1960年代晚期美國學運與大眾傳媒之間複雜關係的書中，吉特林以一個當時的學運親身參與者同時也是社會學家的身份，指出了傳媒的新聞報導絕非如鏡子般在反映真實，而是在構成(composing)真實。但是傳媒所構成的「真實」對整體社會而言，仍具有「事實」的效果，進而回過頭與社會真實緊密互動、交互影響。後來美國60年代學運的消退，傳媒的介入正是其中關鍵因素。

無論是吉特林所觀察到的美國案例，或者其他諸多傳媒研究文獻所指出的，主流傳媒的意識形態框架大都偏向統治集團而不利於社運，尤其是以挑戰資本主義社會根本邏輯和價值為目標的社運，更是幾乎不見傳媒善意。不過吉特林的著作之所以有價值，更在於他同時也很謹慎地強調，這並不是一套「傳媒污衊異議者並摧毀社運」的簡化通俗劇碼，社運本身和傳媒運作的變化有太多內、外因素在作用。而且社運本身並不具有不受批評的道德制高點，社運並非永遠是對的，而傳媒也不必然是錯的。

無論如何，吉特林所指出的一個事實非常明確：自從大眾傳媒發展——特別是電子傳媒的普及以來，社運的組織、宣傳和社會動員就進入了一個新的場域；「傳媒在經濟層面的集中化，以及傳媒在傳布新聞和敘說故事上的速度和效率，讓企圖想要改變現有社會秩序的社運，面對了嶄新的情境和條件」。對於社運組織者，或者從事相關主題的評論者和研究者來說，傳媒都是一個必須考量的因素，無論它是善是惡。於是，更重要的課題，可能不在於指出傳媒對社運的再現「不符

---

1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真實」(因為我們已知無論是對社運或是其他社會事件，傳媒從來不提供「真實」)，而在於在某個特定社會時空、傳媒生態以及社運特性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社運與傳媒展現出什麼樣的互動型態？社運可以如何突破傳媒造成的負面限制，或善用傳媒的傳播力量，以有利於社運目標的達成？最後要問的是，如何能夠從根本，創造出新的、較理想的傳媒與社運互動關係？

〈「真實」的偏見〉告訴我們的社運與傳媒互動案例，是目前在中國大陸上，同樣是逐漸擺脫嚴密黨國控制、也同樣是方興未艾的各種民間社會行動與傳媒二者之間的互動樣貌。不過我們在文章中看到的主要還是對於傳媒「真實偏見」的舉證和指控，較少對於這種互動關係的系統性的政治經濟或社會學分析，也還沒有讀到對於社運從事者來說，這樣的互動型態，可以有什麼改變或是利用的契機。其實這裡面透露出社運從事者對於傳媒又愛又恨的倫理學矛盾，放到學術分析上，則形成了一種認識論矛盾。

我要說的是，面對傳媒，我們既指出他們所呈現的社運「不真實」，是加工過的「真實」，而且我們甚至用很多的研究文獻和理論來證明傳媒「果然」只是在建構真實。但是我們批評的同時似乎又隱隱傳達出，社運本身是存在這樣的一個「較真的真實」或者「較好的真實」，而且期待傳媒應該正確呈現，讓這「較真、較好的真實」得以公諸於世；可是這樣不就與上述對於傳媒「不能傳達真實」的體認互相抵觸了嗎？我們如何能一方面指陳傳媒從結構上來說必然扭曲事實，卻又同時主張或期待傳媒應該傳達事實？

在這篇回應文中，學術上的問題，先暫時擱一邊。回到社運，我們可以怎麼辦？這確實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也不是這篇回應文能夠完成的。不過稍微談一下台灣的狀況，或許可以提供一點線索。

伴隨1987年解嚴，以及隔年報禁解除，台灣媒體中曾有部分平面媒體對於當時蓬勃的社運表達支持和善意，或主動提供非主流或邊緣

觀點。不過，隨後在媒體產業正式進入資本主義市場的現實廝殺世界，較具獨立與批判精神的媒體陸續結束短暫生機，而同一時間台灣民間社會的社運力量和組織也逐漸削弱。整體而言，從1990年代中期至今，台灣主流傳媒對待社運，可以從幾個方面來概述。第一是忽略或低度呈現。台灣擁有舉世無雙的八個全天候新聞頻道，但是如此大量的新聞節目時間卻極少眷顧大大小小的社運活動，讓絕大部分社運的訴求無法傳達給更多的公眾。第二是煽情主義式的處理（尤其是電視媒體）。衝突、脫序事件或扮裝、行動劇等手法，才比較有可能進入極少的傳媒社運報導之中，而再現特徵要不是負面化就是零碎化，社運訴求的主張很難被完整呈現。第三是明顯但莫名其妙的敵意。主流傳媒經常在報導中毫不客氣地對社運抗爭提出質疑，卻不見他們用同樣的態度對待政府或既得利益者。以今（2010）年6月部分大學教授針對富士康連續自殺事件，集結抗議鴻海企業的行動為例，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新聞台TVBS有一則相關報導的導言這麼說：

富士康連續發生12起員工墜樓事件，**雖然**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已經提高員工薪資，**不過**，今天**仍有**學者站出來召開記者會，抗議鴻海是血汗工廠，**痛罵**郭台銘是「台灣之恥」，此外，**還大動作**發動連署，參與的學者超過150人，**不過**我們仔細翻閱名單，**發現**名單內參與連署的學者，像是民族學系、體育學院，**甚至還有**性別研究所教授，都參與連署，**不但**要求政府不要讓這種企業回台，**甚至**政府基金都該拋售鴻海股票，才不會變成殘害大陸勞工的幫兇。

從我標上黑體的幾個字詞使用和言語脈絡來看，不需要什麼語言學或符號學的分析，我們也可以清楚看出，該則報導對於社運行動的不以為然，以及對鴻海和政府的袒護。而且，報導者竟把參與連署的

教授專業當作一個質疑點，似乎暗示著「民族、體育、性別」這些專業的教授沒有資格參與抗議，因此這場社運行動的正當性是有問題的。最後，即使好像是把社運的訴求說出來了，卻利用負面的語意，讓合理的訴求變成了看似不理性的要求。

舉例不需太多，台灣社運吃主流傳媒的虧，已可見一斑。一如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其他地方，社運組織者對傳媒恨極，卻又不能沒有它。很多社運為了能夠獲得傳媒的些許青睞，絞盡腦汁設計行動手法：平和一點，找個名人站台吧；花俏一點，沒有戲劇細胞也硬著頭皮演個行動劇吧；激烈一點，冒風險跟警察先生動動手腳吧。但這些辛苦付出的成本，往往得到的僅僅是一點點的或甚至是負面的報導，實是社運推動的一個普遍難題。而這個難題同樣反映了前述的行動和認識矛盾：社運組織者不得不陷入傳媒的邏輯，卻又希望傳媒的表現不要遵照這個邏輯。

反思至此，或許只有一個解決之道，那便是改變傳媒運作的邏輯；除非改變這個邏輯，否則只能繼續陪傳媒玩那不符成本的遊戲。當然我們並無須預設另一個不可能之事：有某一種傳媒運作邏輯可以百分之百傳達真實；只是說，與其單面向地批評、期待或道德性地呼籲傳媒能夠傳達某種「較真的真實」，倒不如企圖創造出另一種社會條件，讓傳媒從運作邏輯就發生改變，降低扭曲事實的可能性、避免有利於主流卻不利於弱勢的事實建構框架，甚至積極提供另類的、批判的框架供社會知曉、辯論和反思。用更明白的話來說，在當今這個傳媒已成為核心社會構成的條件下，任何企圖改革社會秩序的社運要成功，必定同時也需要進行傳媒改革的社運。<sup>2</sup>

台灣組織化的傳媒改革社運主要興起於1990年代，參與者主要是

---

2 跟其他社運相較，媒改運動有一個更致命的弱點值得在此一提。亦即：因為改革的對象即是傳媒，那麼我們所提到的關於傳媒對於社運的所有忽視、歧視和打壓，在媒改運動上必然是更加嚴重。

傳媒相關的學院知識份子以及部分的傳媒實務工作者，代表性的組織像是「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與筆者所屬的「媒體改造學社」。這類媒改運動因為參與者的特性，改革主要聚焦於傳媒法令、制度和資源分配，也多少有學門專業化的特性。<sup>3</sup>這樣的取向雖然取得一些成果，但影響力和動員力未能有效擴及較廣大其他社會組織或一般公民。另一方面，媒改運動之外的其他許多台灣社運組織者也逐漸意識到各類社運與媒改之間的密切關係，可是一方面因為自身從事的社運事務已足夠繁忙，無暇關心或涉入傳媒改革；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種錯誤認知，認為傳媒的政策或制度議題是專業議題，除了不滿和批判傳媒對他們的再現，剩下的問題只能留給傳媒學者專家和媒改運動者（其實這樣的「錯誤認知」主要應該歸咎於傳媒學者、專家以及前述的媒改運動者）。不過，這個侷限在晚近也有了一點突破。

2005年7、8月間，基於再也無法忍耐長期遭到主流傳媒（尤其是衛星電視新聞台）的漠視和歧視對待，橫跨人權、兒福、性別、勞工、移民、身心障礙、原住民多個領域的21個民間團體結盟，對主流傳媒發出抗議，並成立「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簡稱「公民媒改聯盟」），在自身專注的議題之外，開始參與傳媒改革行動，主要是針對衛星電視台進行施壓，並訴求傳媒管制機關的立法和執行必須結合公民團體參與。這個集結促成了衛星電視業者於隔年成立的公會組織（衛星廣播電視事業商業同業公會）中設立「新聞自律委員會」，以及邀請公民團體代表和傳播學者組成「新聞諮詢委員會」。雖然電視業者仍相對強勢，傳媒新聞報導對弱勢團體和社運的報導歧視依舊存在，但是不能說完全沒有改善。更重要的是，至少傳媒改革的實踐面向已經擴展開

---

3 可參見相關文獻，如馮建三（2002）〈台灣媒體改革運動80年：1921-2002〉，《世紀中國》，下載自 [www3.nccu.edu.tw/~jsfeng/80yearsofmediareform2002.doc](http://www3.nccu.edu.tw/~jsfeng/80yearsofmediareform2002.doc)；馮建三（2007）〈台灣公共電視的建構與擴大：1990-2006〉，《傳播與社會》，第1期，頁47-67；管中祥、劉昌德（2000）〈媒體反對運動〉，《台灣史料研究》，第16期，頁24-27；林麗雲（2003）〈坐而言，起而行：無盟的實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0：145-169。

來，而媒改運動必然是整體社運中不可或缺之一環的這項關鍵，也已經逐漸被認識。當然，台灣媒改運動的困境和問題還有很多，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想像國家的方式  
從熱播的國產電視劇談起\*  
羅小茗\*\*

The Way of Imagining the State  
A View from the Popular Domestic Television Dramas in China  
by LUO Xiaoming

---

\* 本文宣讀於2010年7月10日第三屆上海—首爾青年學者論壇「危機、社會與文化在東亞」。本研究受上海大學「211工程」第三期專案「轉型期中國的民間文化生態」資助。

\*\* 服務單位：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  
聯絡地址：上海市上大路99號A樓506B, 郵編200444  
E-mail: manmandu@163.com

2009年，陳冠中出版了一本有關中國的政治小說《盛世：中國，2013年》。<sup>1</sup>他撰寫這本小說的基本假設十分清楚：中國正在崛起，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大國」，但構成這一大國的基本條件卻是黨國的威權、無所不在的言論和思想的監控、民間信仰的缺失與空白、知識份子與政府之間的共謀或妥協，以及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社會中大多數人安於物質生活，主動遺忘歷史或放棄自身的記憶。作者這樣歸結小說的潛台詞：「如果盛世出現，中國尤其是知識份子將如何自處？包括老百姓應該怎麼自處，這都是需要有人發問的：到底怎麼樣才是對的？」<sup>2</sup>

有意思的是，就在陳冠中想要更有力地提出「記憶」這一問題的時候，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和老百姓正興起一股觀看國產電視劇的熱潮，其中的家國史、抗戰史以及敵特故事等，更是受到了格外的追捧。這當然是因為國產電視劇有無可替代的優勢——「事實上，也就中國電視劇還在過中國日子……還在傳銷中國生活。」<sup>3</sup>不過，更為要緊的是，通過觀看這一類國產電視劇，人們開始重新「記憶」，收穫對「理

1 《盛世》的故事梗概如下：金融危機之後，中國陷入混亂。為了控制局勢，政府啟動「冰火盛世計畫」，在28天的嚴打之後展開經濟復甦計畫，和日俄聯盟，成功使得中國在2013年進入盛世。有意思的是，此時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變得有點嗨，他們嗨嗨地享受著盛世中國的美好生活，感到由衷的幸福，並對從金融危機開始到中國進入盛世之間的那段嚴打時期集體失憶。無論是官方的記載還是人們腦海中的記憶，都認為在世界金融危機的同一天，中國進入了盛世。這樣的「遺忘」，讓一小撮對嚴打記憶猶新的人感到不安，他們想要搞清楚這背後到底隱藏著怎樣的陰謀。最終通過綁架負責盛世計畫的國家領導人，真相被揭示出來：人們之所以變得hi-lite-lite，覺得生活很幸福，是因為政府在自來水中加了讓人興奮的藥品，而那28天的嚴打則被人們主動遺忘，國家意識形態部門所做的不過是順水推舟，「冰火盛世計畫」的順利執行，是「天佑我黨」。該小說出版後，在港台地區引起較大的關注和反響，在中國大陸則被禁止出版。陳冠中，《盛世：中國，2013年》，台北，麥田出版，2009年。

2 陳冠中，〈「盛世」裏的知識份子〉，《東方早報》，2010年2月7日，B03版。

3 倪文尖、羅崗、毛尖、張煉紅、王曉明，〈「中國電視劇」的「中國氣息」〉，《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2010年3月9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0-3-9/167890.html>。



想」、「家國」乃至「中國」新一輪的認同。

這樣的觀劇熱潮以及由此呈現的社會精神狀態，自有其根源。08年以來，雪災、奧運聖火事件、汶川地震、奧運會、金融危機……各種「盛事」和災難紛至遝來。對中國來說，這不僅考驗著政府的應變能力、社會自身積蓄的能量，也檢驗著人們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和世界、國家與社會、國民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能力，並提出了更為複雜地理解和想像它們的要求。人們敏銳地感覺到中國正處於重新理解和想像國家的十字路口，中國人自己的生活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得到了格外的重視。不過，僅僅是這樣，還不足以打發陳冠中的問題。如果說老百姓是否「記住」，是其追問「到底什麼才是對的」的基本條件，那麼當觀劇熱潮重構人們的「記憶」之時，首先需要檢驗的是它所給出的是何種構造記憶的模式。在這一記憶模式中，人們如何定位和理解自身，形成自我認同的機制？如果說對近代以來中國歷史的記憶和理解，直接關係到對「國家」的認同和想像，那麼當前的記憶模式所映襯或喚起的又是怎樣的對國家的基本看法？這一國家想像，是否構成對現實政治的集體嘲諷和制約？畢竟，無論怎樣的社會記憶，都無法任意地穿越時空送抵我們手中，它必須接受現實的檢驗和磨礪，以便在其中更好地生根發芽。

倘若從這一角度，打量這些企圖更新「記憶」的熱播電視劇，便會發現，較之於直接討論現實問題的作品，它們往往傾向於提供一個重新感受個人和國家關係的新空間，而提供的方式則主要分為兩種。

一種是以「家」為線索，每一個家庭成員的個體選擇乃至家庭的聚散離合，都與國家命運重合在一起，變得意味深長。在這一重合之中，個人的悲歡被賦予了辨認何為家國「正道」的責任。這正是《人間正道是滄桑》這一類電視劇的魅力所在。清末民初，一個傾向於新政的父親養育了三個孩子，當他們分別投入到中國革命的歷史潮流中去時，各有各的選擇，每一種選擇都代表著中國可能的道路。此後家庭

內部的紛爭友愛，也就成了一個國家歷史內部的對話與此消彼長的命運鋪陳。對身處其中的年輕人來說，「國家」是有待構想和創造的模糊的未來，個體的選擇、愛情的取捨、事業的權衡、良心的掙紮、政治的判斷，都可以被編織進對新的國家的敘述和構想之中。此時此刻，國家構想或革命理想本身也不是現成的，而是經由各自的選擇、決裂與合作、熱愛與憎惡，方才清晰起來的結果。於是，在這樣的敘述中，國家長成的歷史，幾乎被等同於個人生長的歷史，家庭自身的變遷。

當然，在革命話語中，「家」並不僅僅意味著血緣關係。為了同一項事業聚集到一起、共同奮鬥的人，同樣處在一個革命的大家庭之中。可以說，講述50年代敵特故事的電視劇，比如《暗算》、《誓言無聲》、《誓言永恆》之類，正以此為線索，使「家」進一步延伸為「國」，「國」不過是需要人們一同來守護的「大家」。在這一類敵特片中，最為重要的主題就是辨別「誰是自家人」，誰在危險的鬥爭中，始終和自己的同志／家庭／國家站在一起，承擔起捍衛它們的義務。在此過程中，主人公所表現出的個人品質、忘我精神，往往成為觀劇者認同於其所獻身的那一個「大家」的最佳仲介。

顯然，無論是單個家庭的變遷，還是保衛共和國這個「大家」的戰鬥故事，這樣的敘述都提供了一種強烈的個人與家國的共命運感。這種共命運感，既非一般意義上的家庭故事所能比擬，也非社會動盪中的個人沉浮所能獲得。<sup>4</sup>顯然，由這一類「家」所構造的「記憶」，恢復的是一種早已失落的個人和國家之間的感覺模式。在處處受到國家的監

---

4 比如《王貴與安娜》、《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這一類相當優秀的電視劇，都講述了70或80年代到90年代的整個家庭或個人命運的變遷，卻顯然無法提供這樣的個人與國家之間的共命運感。相對而言，這些電視劇的敘述模式是90年代以來人們更為熟悉的，即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避而不談，將其縮減為個人性情品格的高下之別；這樣做的結果，是進一步加深了個人被國家限制或籠罩的無力感，再一次提醒人們，作為社會的一員，個人和國家有著遙不可及的規定距離。

管卻又往往表現為「沒有關係」的現實生活中，這種個人與國家發生關聯的想像方式也就顯得格外誘人。<sup>5</sup> 對人們來說，當代生活愈是缺乏相對應的生活信念和非功利、非個人的目標，愈是瑣碎無聊，就愈加反襯出這樣一種個人與國家之間共命運感的吸引力。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有評論者認為，這樣的講述歷史和革命的方式，即便是封閉性的，也值得肯定；因為這樣的封閉與現實生活之間的反差，足以激發起新的想像力。<sup>6</sup>

不過，問題在於，這一類「記憶」的封閉性是如何形成的？在我看來，其中很重要的一點便是，無論是從革命歷史劇還是從敵特片中，觀眾所感受到的信仰和理想的力量，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歷史知識的保證；余則成、瞿恩們信仰的可貴、經歷的動人，從來不僅僅立足於劇情本身，而是貫穿著一個明確的畫外音：「新中國」。同時，對大多數生活在當下的中國人來說，「新中國」既是一個歷史事實，又是他們生活在其中卻無法調動自己的記憶和經驗去思考的一個歷史結點。相

5 在當下，這樣一種關係的誘人之處，可以從下面這段評論中感覺到：「革命歷史題材電視劇之所以受歡迎，我看也是因為其中展現了一種現在已極為罕見的生活態度和人格精神吧。《人間》裏的主要人物，他們的人生都被理想的光輝照亮了，顯得那麼有精神、有活力。不用說瞿恩，就連楊立仁這樣的反面角色，也有自己的信念和一份擔當，是讓人無法輕視的。這樣的人生的確夠迷人，即使你不接受他們的那種精神信念，但也不能否認那是一種轟轟烈烈的人生吧。相比他們，我們的確活得太蒼白、太孱弱了，我們已很難說服自己去為一種主義而獻身，無論它聽上去有多麼正義、多麼美好。」雷啟立、毛尖、王曉明、張煉紅、孫曉忠、倪偉，〈「中國電視劇」的「時代之痛」〉，《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2010年3月16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0-3-16/168845.html>。

6 「(電視劇)這種封閉性本身是有生產性的……現在的連續劇無論在深度和廣度上都相當有水準，而有意思的是，這些連續劇不僅從過去汲取能量，還能轉換出當代的一些被壓抑的被否定了的能量。」同上。

7 余則成是《潛伏》中的男主人公，原本為國民黨情報人員，後成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情報機關內的臥底，整個電視劇講述的就是他如何逐漸轉變，和「妻子」翠萍獲取和傳遞情報的故事。瞿恩為《人間正道是滄桑》中的一名出色的共產黨員，在網路評論中，人們一般認為，這一角色融合了瞿秋白、周恩來、蔡和森等早期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革命經歷。

比之下，所謂的反派人物，倒要親切得多。李涯的「因公殉職」，楊立仁的值得敬佩，吳站長的情有可原，謝若琳的玩世不恭，<sup>8</sup> 觀眾對這些人表現出的寬容和理解，是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總能調動起 80 年代以來的社會記憶，或者說打開被歷史教育或愛國主義所封閉的空間。比如，人們對李涯的喜愛，很大程度上便來源於對多年以來歷史教育的反感。在這一教育中，信仰往往被單一化，只有選擇了共產黨的人，方才具有信仰，他們的形象也才高大完美。於是，李涯這樣忠於職守的國民黨特務人員，變得格外可愛。人們突然發現，原來國民黨人也有信仰，共產黨人也可以滿嘴髒話。

正是在這裏，出現了革命信仰和日常生活經驗的一種有趣的並置。在面對革命者的理想和信仰時，觀眾將它與當下生活的無意義感，做最為激烈的對比與感喟。而在面對通常意義上的反派角色時，人們則依靠改革開放以來的日常生活經驗，會心一笑。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觀眾通過這一類電視劇對當代生活展開的一次雙重和解，既依賴於革命者的崇高理想，也依賴於反派人物所彰顯的日常經驗，人們與平庸的當代生活達成和解。這樣的和解之所以可能，恰是因為在這一通過重述「家國」構造記憶的模式中，「新中國」被抽離出歷史的真實，成為一個符號性的存在。<sup>9</sup> 這一模式也由此短路。究其原因，卻

---

8 李涯，《潛伏》中國國民黨安插在延安的情報人員，之後為抓捕余則成殉職。楊立仁，《人間正道是滄桑》中的國民黨人員，在絞殺共產黨時毫不留情，而其在抗日戰爭中的對日情報工作，也做得十分出色。吳站長，《潛伏》中余則成的老師，卻再也不相信自己當年的政治理想，積極投入到為自己積累財富的事業之中。謝若琳，《潛伏》中的職業情報販子，對他而言，情報只是買賣，在網上流傳著他的名言：「這裏兩根金條，你說哪一根更高尚？」

9 其中最為典型的是《人間正道是滄桑》中瞿恩的一句名言，在網路上它與謝若琳的名言一樣廣為流傳：「理想有兩種，一種是我實現了理想；另一種是理想通過我而得以實現，縱然犧牲我的生命！」這樣的對於「理想」的概括，自然讓聽聞者心潮澎湃，儘管它並沒有真正觸及如何判斷「理想實現」的歷史過程，以及理想受挫之後必然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蔓延這樣一些問題。這意味著，在理想受挫或失敗之後，在不追究其過程和後果的情況下，重新將其高度符號化，這樣的做法在今天的中國也許仍然具

並非源於新中國前後三十年之間的斷裂，<sup>10</sup>而是因為「新中國」一旦被歷史化，則勢必構成對革命的信仰和理想、新的國家、當代生活以及個人的種種質詢。要避免這樣的質詢，保持理想的豐潤，溫暖和激勵今天的社會人心，「新中國」就只能被濃縮為一個抽象的符號。正是在這一符號之下，一切變得無害。對高尚的革命情操的體驗與現實的生活邏輯並行不悖，所有的衝突都在「新中國」這個歷史終點裏提前消融。對活在今天的人們來說，這顯然是一種頗為安全的方式，既可以感受到革命信仰的光環，又可以包容現實生活的經驗種種。革命者的信仰不再構成對當下生活的挑戰，觀劇者所享用的，是曾經的革命勝利留給今天的安慰獎。但與此同時，在既有的歷史經驗中展開對國家的新一輪想像的可能，也在這樣一種抽象和安全裏被終結。

也許是為了跳出這一「新中國」的安全模式，人們企圖講述更為遼遠的故事，一個精神性的「中國」。在這裏，遼遠並非時間上的，而是指其象徵和概括的程度。這一類的敘述，往往具有高度的隱喻性。革命，或者說中國如何生存下去的問題，不再被精英或知識份子的思考所壟斷，而是成了絕大多數人必須參與的生死之戰。抗日戰爭往往成為這一類敘述的大背景。在這一模式中，主導和推動歷史的，是社會上絕大多數的普通人。他們的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卻有著對生活本能的判斷；他們的信仰沒有被理論化，甚至無從命名，只是根植於自身的生存狀態，在生死愛憎的指引中做出自己的選擇。可以說，《我的團長我的團》、《生死線》都屬於這一模式。《我的團長我的團》一開頭，就是一群傷兵，他們渾渾噩噩，毫無鬥志，組成了一個弱肉強食的微型社會。然而，正是這樣一群「炮灰」，構成了想像「大多數」的基

---

有強大的衝擊力和感召力。

10 當前的對電視劇尤其是革命歷史劇的分析，往往集中在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的斷裂之上。參見張慧瑜，〈彌合斷裂與暴露傷口：關於「建國六十年」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兩種歷史敘述〉，<http://zhwm.cupl.edu.cn/newsinfo.asp?newsid=178>。

調。<sup>11</sup>此後40集所展開的，是他們在民族存亡的抗日戰爭中，如何保存生命眷戀生活，如何直面彼此的生死，如何看待敵人和友軍，如何識別草莽和精英，如何聲張民族大義，如何理解自己生命的價值。《生死線》則講述了日軍的無情殺戮，使越來越多原本毫不相干的人聚集到一起；鄉裏村民、留洋博士、國民黨軍官、共黨分子、拉車的小混混、地方富商、女學生、黑幫頭目，如果沒有殘忍的日軍，這些人的生活也許永遠沒有交集，更不會走到一起並肩作戰。在這樣的作品中，路線之爭、主義之辯，變得不再重要，沉默的大多數成了家國想像的主角。由此，一個國家的「人民究竟何以構成」，作為最重要的問題被提了出來。有評論者這樣寫道：

大概是先入為主的緣故，再加上心裏一根筋，就讓《士兵》和《團長》奠定了我看其他電視劇的情緒、眼光和精神基調，可這也並不專屬於我自己，事實上我更願意讓自己真正從屬於這一切。那這一切究竟是什麼呢？要我說，就是中國氣息、中國生活、中國感情。這裏無論現實還是歷史，都在試圖重新講出中國人自己的故事，講出那個比正在崛起的中國更深入人心的「中國」是什麼，那些比自己活得更真實更堅韌也更有尊嚴的「中國人」又是什麼樣的？尤其在危難中，在困境中，赤手空拳窮途末路的中國人到底怎麼辦？<sup>12</sup>

對於我來說，觀看《我的團長我的團》的過程，就是在理解個體、

---

11 在一個嚴酷積弱的社會中，人們彼此冷漠、相互欺壓，卻又懷著某種從不輕易表達但熱烈赤誠的情感一同生活下去。這幾乎是中國現代文學表現現代中國人的一大主題。無論是在蕭紅還是路翎的筆下，都可以讀到這樣一群卑賤而高貴、鄙俗而真摯的人物群像。而這一類電視劇的敘述，所恢復或依循的正是這樣一個主題。

12 倪文尖、羅崗、毛尖、張煉紅、王曉明，〈「中國電視劇」的「中國氣息」〉，《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2010年3月9日，<http://www.21cbh.com/HTML/2010-3-9/167890.html>。

個體的組織以及那組織背後的精神依託之間的糾纏。作為一部電視劇，《我的團長》未必能把這其間複雜的關聯整理得非常清楚，但它作為一種大眾文藝的樣式，也的確用感性的方式，重新結構著這三者之間的關聯。當代中國的精神狀況，在這三者之間是一個逐漸剝離的過程，是將家國、組織逐漸從個體之上剝離的過程。這剝離曠日持久。而在《我的團長我的團》中，我看到的是一種逆向的縫合，縫合著從個體到個體的組織，再到這組織背後的精神依託之間的內在聯繫……在這個縫合的過程中，我看到的是那些已經被現代人棄置的「大詞」，比如「家國」，比如「責任」，比如「希望」，比如「理想」，等等，在這裏找到了新的落腳點。<sup>13</sup>

這兩段評論，充分說明了這一模式在想像國家時運用的要素及其發揮的功能。首先，在這一模式中，人們的政治感覺，往往在困境或者說「赤手空拳」的狀態下被激發起來。置於死地而後生，這讓每一個人都無法抽象地運用哪一種主義來構想自己的選擇<sup>14</sup>；在更多的情況下，也來不及用主義或理論武裝自己，而是必須憑著生活的本能去探索。其次，這樣的困境，往往需要一個外在的共同的敵人。反過來說，一旦失去敵人，人們很可能也就解甲歸田，各自重回原來的生活軌跡。因此，這種在民族存亡的危難時刻獲得的政治感覺，一旦失去了現實中的敵人，往往也就只能籠統地指向精神性的「中國」。在《生死線》裏，日本戰敗後，六品沒有成為一個戰士，而是想要回到家鄉

13 陶子，〈重構個人、集體與家國的思想關聯：當代中國人精神狀況中的《我的團長我的團》〉，<http://www.niwota.com/submsg/7045939>。

14 當然，在一部優秀的作品中，也會為歷史上存在過的「主義」留下位置。比如，《我的團長我的團》中那個背著一箱書想找隊伍打鬼子的青年學生，在「炮灰們」眼裏他顯得非常幼稚，他的口號和大道理也沒有人搭理。但他最終找到了中共的遊擊隊組織，投入了戰爭並付出了生命，贏得了人們的敬意。不過，《我的團長我的團》顯然希望指出，這樣的選擇只是選擇之一，還有其他許多乃至更多的並存的選擇，同樣讓人們付出了鮮血和生命，並以此凝聚我們彼此的精神。

去；四道風也沒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而是毫無生趣，償還了欠他叔叔的那一條命。《我的團長我的團》中這種精神性的「中國」的意圖，更是在結尾處顯露無遺：曾經傷痕累累的禪達，變得美麗而現代，每一個在戰爭中死去的人都在當下這一刻復活，他們不再是炮灰團的戰士，而是社會中的普通一員，以各自的方式，隨著生活的節拍，在這片土地上繼續生活下去。國家、敵人和戰爭一同退出了鏡頭，此處綿延的只是生活本身。最後，這樣的精神性的「中國」，在隱隱約約中希望與現實中的國家劃出清晰的界限。因為只有在這種清晰的界限之中，精神性的「中國」才能保持其完整性，也才最有力量，而一旦遭遇現實中的國家，這樣的精神則不得不面臨被官方的大國崛起的意識形態收編的尷尬局面。

如果說通過「家國」來構造記憶的模式存在著太過安全以至於無法真正展開新的國家想像的嫌疑，那麼在這種通過「大多數」來構造精神性的「中國」的模式中，問題則進一步凸現出來。倘若革命者總是指那些擁有自己的政治感覺，並由此主動參與在國家命運創造之中的人，那麼對當前中國社會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依賴於生存的本能，缺乏必要的政治感覺，也許是更為普遍的狀況。可以說，正是這一狀況，連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不斷堆積起的對社會中精英群體的高度失望和不信任，對現實中的國家機器的不滿和譏諷，構成了認同這後一種模式的心理基礎。在這裏，「赤手空拳窮途末路」，不光指向被正規師所拋棄的炮灰團的戰士，指向被日本人侵略的中華民族，更是指向了當前中國社會大多數人所感受到的社會精神上的赤貧狀態，弱肉強食和人心渙散。在這樣一種赤貧狀態中，孕育和煥發出新的精神認同，無疑可以給人以極大的鼓舞和安慰。但問題在於，如此被構想出來的「人民」，其精神上的合力對於極端狀態——比如戰爭——的依賴，對於現實國家的鄙視和排斥，究竟會在當前所急需的新的國家想像中發揮怎樣的作用？在一個什麼都不相信的時代裏，政治感覺的重新界定，是



想像國家十分要緊的步驟。但這種對精神性的「中國」的想像，當真可以為重塑今天的政治感覺提供必要的基礎嗎？

在這裏，劉小楓對《暗算·聽風》<sup>15</sup>中「阿炳」的解讀，或許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他顯然對這部電視劇偏愛有加，一上來就讚歎這部片子的最大優點在於，讚頌革命歷史英雄的技巧或者說手法有歷史性突破，因為前兩部的革命歷史英雄（《聽風》的主角阿炳和《看風》的主角黃依依）都不是黨員，而「這就突出了人民群眾在革命歷史中的重要作用。」與其說《暗算》沒有意識形態語言，不如說在塑造新的意識形態語言。這跟時勢很合拍呵：國家正在『和平崛起』，《暗算》激勵人們為國家的第二次『翻身』獻身。」而在這「第二次獻身」中，阿炳身上所體現出來的「自然道德」是最重要的基礎：

比如基本的是非感——什麼是什麼，什麼不是什麼。僅僅作為一個聽覺天才的離奇命運，阿炳的故事並不會讓我感動，哪怕他年紀輕輕就死了——如今，有是非感這種自然道德死了，才讓我感懷系之，唏噓再三……在我們的後現代社會，稀缺的難道不是最基本的是非感？阿炳耳朵忒尖，尖在哪里？尖在能分清誰是誰家孩子、誰是哪村人，總之，能分清最基本的什麼是什麼、什麼不是什麼……阿炳容不得最最基本的是非不清，否則他沒法活，一聽見有人想當然地不分是非——比如究竟是母狗的崽還是公狗——阿炳就跟人急。阿炳死於聽見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孩子的聲音，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孩子，難道不是最最基本的自然道

---

15 《暗算·聽風》的故事梗概：50年代中國大陸在破譯台灣方面的電台時，急需一個耳朵特別好、能夠識別敵台的人。安同志找到了瞎子阿炳，一個天生有些傻氣但耳朵比誰都尖的天才。阿炳本來是個鄉間的沒有父親的孩子，自從跟隨安同志從事監聽敵台的工作後，就成了「國家的人」，成了這一部門的英雄人物。安同志張羅著為英雄娶妻生子。一個女子自願嫁給阿炳，因為他是個英雄。最後，女子生了一個孩子。從孩子的第一聲哭聲裏，阿炳聽出他不是自己的孩子，於是自殺了。

德問題？

與這種天然的是非感相匹配的是阿炳的好人直覺——阿炳沒政治覺悟，他僅僅為母親、為安同志工作，而非為國家……因為他天生的直覺告訴自己，自己的母親和安同志是好人。什麼叫「好人」，如今你這個自由主義哲學博士說得清楚？新左派文人說得清楚？你問阿炳，什麼叫「好人」，他一定也說不清楚，但他憑自己天生的直覺知道誰是好人，而且憑這直覺懂得，惟有信賴好人，自己的生活才可靠、安全，他誰都不信，只信靠自己覺得的好人——安同志是黨員，阿炳的媽不是，所以，好人是自然而然的，阿炳與這「自然」有一種天然聯繫，如今各路啟蒙知識份子切斷的就是這種聯繫——你這個哲學博士讀書比阿炳多，卻不一定知道誰是好人，而且，離了好人，你恐怕覺得活得尚好吧，因為你有「主義」……<sup>16</sup>

將個人的自然道德或好人直覺視為構成國家的基石，使之擺脫或「不需要」對現實政治的認識，甚至更進一步，只有那些自認為擁有自然道德和直覺的人，才能壟斷對現實政治的解釋和對理想國家的想像，這恐怕正是劉小楓從《暗算·聽風》中捕捉到的最讓他滿意的想像國家的方式。

不難發現，無論是偏於革命理想——主要是由安同志所代表的為了國家利益不惜犧牲一切的大無畏的革命氣質，還是偏於人民自身的質樸德行、自發的生活感覺——主要是由阿炳所代表的天真善良和好人直覺，都無從抵擋劉小楓這樣一種解讀邏輯的成立。這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暗算·聽風》恰是上述兩種模式的結合，其中既有以「家」為單位的革命歷史敘述，在這樣的敘述中往往有著高度政治覺悟

16 劉小楓，〈密……不透風：關於《暗算》的一次咖啡吧談話〉，《南方週末》，2007年4月5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6481>。

的精英分子，是他們主導著歷史進程，也有更為樸素的對「人民」的想像，這一想像以社會中的大多數人為依據，最終導向精神性的「中國」。在這裏，革命的現實果實「新中國」和由社會中大多數人所支撐的精神性的「中國」合為一體。同時，也因為有了這樣的結合，也就有了它們之間的對峙和縫隙。當劉小楓如此自然地導出他對人民、國家和政治的理解時，這樣的對峙更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想要打破他的這一套說法，就需要從《暗算·聽風》所描述的擁有自然道德的普通人和現實國家之間的關係入手。

顯然，一開始，瞎子阿炳不過是個耳朵極好但有些呆傻氣的人，他儘管可以敏銳地聽出村子裏每一個人每一條狗的聲音，但這樣的識別除了成為茶餘飯後的談資外，沒有絲毫的意義。也就是說，沒有安同志所代表的國家，阿炳的才能沒有用武之地。只有在監聽敵台的國家安全部門，他才成了天才和英雄，享有很高的榮譽，接受人們的敬意。人們因為愛這個國家，也就愛上這個可以保衛國家的英雄。之前已經說過，在革命話語中，國家和革命隊伍本身就是一個大家庭；也只有在這樣一個「大家」中，人們才會來關心和張羅一個英雄的婚事，哪怕這個英雄是一個有些呆傻的瞎子。而阿炳的妻子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嫁給了一個國家英雄，她的任務就是照顧英雄。同樣地，也只有在這個大家庭的支持和英雄的光環之下，阿炳才會對妻子具有絕對的權威，這讓他的妻子對自己的地位感到岌岌可危，並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sup>17</sup>

需要追問的是，在阿炳的故事裏，國家到底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當一個沒有政治覺悟只有自然道德的人和國家的權力結合在一起

---

17 人們以及阿炳自己都認為她應該為英雄生一個孩子，實際上阿炳生不出孩子，卻因此遷怒於妻子，威脅說要休掉她，因為他是國家的英雄，沒有什麼事情是他做不到的。妻子並不知道英雄的特殊才能，在給阿炳治療無效的情況下，無奈之中，她找了別的男人幫忙生孩子。但阿炳一聽孩子的哭聲就知道孩子不是自己的，於是自殺。而他的妻子和那個男人，則被為阿炳主持正義的安同志驅逐出了單位。

的時候，他是否有能力拒絕國家權力的誘惑，重新界定這一權力，還是只能束手就擒，放縱國家對自然道德的侵蝕和佔用？阿炳的悲劇，與其說是由他的自然道德所構成，不如說是這樣一種太過自然的道德，在面對國家權力的時候毫無辨識和抵抗的能力，從而迷失了自身。而一旦他加入到不假思索地享用國家權威的過程中去，則不過是加速了自身的毀滅。<sup>18</sup>

看來，阿炳的故事並不通向劉小楓的迷與密的王國，而是指出：在當前重構國家想像的過程中，國產電視劇所採用的這兩種構造方式，儘管看起來並行不悖，互為補充，卻各自回避了其所喚起的那一部分國家民族的記憶與當前的國家想像之間的實際關聯。對前一種「家國」想像而言，只要不願意去打開「新中國」這一符號，所有的信仰和革命理想就無法重新落實，其所喚起的革命激情不過是對現實和解乃至妥協的另一種表達方式。而對後一種精神性的「中國」來說，擁有是非感的大多數，其精神的集合體如果只是致力於撇清與現實國家以及國家權力之間的聯繫，那麼它就無法將自己轉化為真正理解和掌握權力的人民，也就無法避免被懸空為自然道德的個體，乃至被現實中既有的種種國家論述所利用的命運。

如果說陳冠中的《盛世》讀來讓人覺得不舒服，是因為他用頗為搞笑的手段譏諷了中國知識份子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感覺和思考的能力，也一併取消了在當前社會中呼喚意義的真實渴望和構建意義的實際努力。那麼當正視乃至契合這些願望而熱播的國產電視劇在其構造記憶和重新想像國家的過程中出現上述思考中的盲點時，我們又應該如何對待呢？顯然，對今天的中國來說，重新構建民族國家的記憶，確立新的意義體系，完成中國的自我論述，是當務之急。而這種構建和自我論述，很大程度上便依賴於對國家的重新想像。這首先是因

---

18 這一問題對安同志這樣的精英分子來說同樣存在，只是表現的方式不同。

為，就中國內部而言，在構成中國現實的諸種力量中，由黨和政府所壟斷的國家是最為強勢的一股，所有的資源和權力都由現實中的國家管理和分配，並給出自我解釋。想要討論中國問題，重新構建社會中的價值和意義體系，就不可能繞開這一現實基礎。而任何認真的討論者，也不可能任由黨或政府的意志壟斷對國家的想像，滿足於給出條件反射式的非此即彼的呼應。其次，就外部來說，現代國家往往與資本主義互為表裏，與資本市場的擴張過程相互促進。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而言，倘若不能正視或無法說明其不同的國家性質，就不可能打消別國對其對外擴張的疑慮和不安，更不可能脫離了外部世界對它的看法或想像獨存。然而，較之於這兩條相對外在的原因，更為重要的是，如何重建意義體系，既關係到如何理解國家的構成、理解國民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也直接關聯到如何認識和把握國家在轉型時期所面臨的基本困境，尤其是權力的重新界定與分配。所有這些，並非騰空而來，而是必須切實地針對現實的國家狀況一一展開。其中，人民如何想像自身又往往佔據格外重要的位置，因為只有它才能賦予國家想像以最基本的格局。

倘若以上述要求來檢驗當下國產電視劇所呈現的構想記憶和國家的方式，便會發現，一方面，其努力樹立和表彰的正面理想、國家和人民自身的形象，頗能迎合這一時代精神的需要，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樹立和表彰仍太過受制於時代的基本心理，其自發性遠遠多於自覺。因為缺乏當下生活的意義感而流連於無害的革命理想，因為無力面對現實的國家機器而傾心於精神性的「中國」；這樣的社會精神狀態，既發生在知識份子身上，也囊括了普通百姓的心理。較之於陳冠中所描繪的完全被物質生活所收買和籠絡的那一種，這樣的狀態自然是要好一些，但如果僅僅是這樣，便不足以構成和培育這一時代所需要的真正健壯的社會精神。顯然，想要通過大眾媒體教育，孕育這樣的社會精神，還需要幾重的勇氣。首先是直面中國革命歷史的勇氣，

而不是飛快地將它們打包成理想或信仰；尤其是直面「新中國」歷史的勇氣，而不是將其濃縮為一個革命成功的符號。其次，則必須擺脫那種只有立足於「一窮二白」方才能夠展開自我肯定和自我想像的敘述方式。這是因為，今天中國所面臨的意義重建和國家構想的條件，不再是過去的那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貧困的國家，而是一個有著不小的經濟進步卻也有著難以處理的革命失敗經驗的現代國家。其所遭遇的，不再是是否革命，而是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中重新確立國家的理想乃至確立革命目標的問題。而其重新確認理想的現實條件，不僅包括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官僚資本集團的日益壯大，國家意識形態機器的運轉失靈，還包括過去的好壞參差的革命傳統和歷史記憶，改造國家機器的所有經驗和教訓。倘若無法明確這些既有的條件和問題，習慣於從被動挨打、一窮二白的狀況出發，去構想國家、想像人民，那麼由此獲得的政治感覺本身就不可避免地有其虛假的一面，在製造出民族主義的同時，缺乏面對現實的實際能力，很難針對現實中的國家問題，展開真正的辯駁。最後，在大眾媒體——由媒體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組成——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構造社會記憶這一功能的同時，也必須勇於承擔起對社會記憶的責任。如果說在過去，我們總是認為「遺忘」是教育灌輸和資訊管制的結果，是權力意志在我們身上的實施，仿佛「遺忘」是被迫的，和自身的選擇無關，那麼在今天看來，社會記憶的構造正越來越多地和大眾媒體結合在一起。而任何喚起記憶的模式，又總是或多或少地包含著社會遺忘的集體惰性。在現實中對國家感到無能為力，以至於在想像和重構記憶的過程中巧妙回避，便是當前這一集體惰性的集中表現。而這也就需要我們在越來越依賴於媒體語言，通過各種敘述模式來安撫或創造自身的精神的同時，對此類社會集體情緒或記憶的惰性保持充分的警惕。

2010-6-8 初稿

2010-7-18 修改

# 金融危機與青少年一代的亞文化

以敗者(loser)文化的表像及特徵為中心

全盛源\* (張薇 譯)

## The Economic Crisis and Youth Subcultures

Representation of the Loser Cultures on Media

by JEON Sung Won

(translated by ZHANG Wei)

---

\* 服務單位：《黃海文化》雜誌編輯部

通訊地址：803, Shinguan, Jeongseok Bldg., Sinheung-dong 3-ga, Jung-gu, Incheon, Korea  
400-712.

E-mail: windshoes@naver.com

跟你說點你聽了十有八九會不爽的事情  
保證你今晚不能舒展兩腿就睡著  
要問是什麼 也就是我無所事事的活著 無所憂慮  
我無所事事 沒什麼憂慮

——選自張基河和那些臉〈無所事事的活著〉歌詞

## 一、青少年一代敗者文化出現的經濟背景

朝鮮戰爭及南北分裂後，直至上個世紀80年代初，韓國的經濟持續增長。然而1997年，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韓國遭遇了史上最大的外匯危機。此後，金大中政府通過一系列經濟結構調整和制度改革，提前償還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借款，宣告了金融危機在韓國的結束。儘管如此，韓國的經濟結構卻再難恢復至金融危機前。1997年的金融危機雖然由政府與大財閥企業的過失而引發，其惡果卻像民眾聚金運動所顯示的一樣被轉嫁到中小企業和普通民眾身上。

今日韓國的經濟狀況看上去大大好轉：不僅出口額突破4,000億美元，彼時不過幾十億的外匯儲備到2010年4月也增至2,788億7,000萬美元，是世界第六大外匯儲備國。但金融危機以後，韓國的經濟結構卻呈現出內需弱化、過分依靠出口與大企業的畸形狀態，而資本市場對外資的依賴程度也越來越高，外資的流入與流出甚至可以動搖韓國金融市場的根基。金融危機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大型企業借助全球化生產基地，大力開拓全球銷售市場，卻也與國民經濟越走越遠。如三星電子這樣全球知名的韓國企業雖創造出銷售額高達100兆億、盈利達10兆億韓元的驚人成果，在改善普通老百姓實際感受的經濟狀況上卻並無多大建樹。這便是韓國社會的現狀。與國民經濟相關的經濟結構即使在出口業好轉的情況下，仍不能避免雇傭危機的深化；政府傾斜於大企業的財政資助與勞動政策動搖了韓國勞動市場的穩定性，造成



800 萬人次非正規職業大軍的存在以及韓國社會 20 比 80 的兩極分化。

## 二、敗者的表像：母友兒（母親友人的兒子）與我兒友（我兒子的朋友）

據 2010 年 5 月 4 日韓國統計廳發佈的《2010 青少年統計》記載，以 2008 年為準，年紀在 15-24 歲間的青少年中，有 24.1% 的人回答「就業」是他們最大的苦惱，僅次於「學習」（38.5%）選項。而當被問到上大學的理由時，50.9% 的青少年回答「是為找份好工作」，充分顯示出韓國當下嚴峻的就業形勢。而 2002 年的同類問卷調查中，以「就業」為最大苦惱的青少年應答者比例不過才 6.9%。這一代是親身經歷並體驗 1997 年金融危機後父母失業與貧困，並已將長期的經濟危機內化的一代。

韓國社會對教育的關注與人們對身份上升的渴求曾是解放後普通民眾擺脫絕對貧困的驅動力。但隨著教育風潮越演越烈，父母對子女教育的投入與支出節節攀升；截止 2008 年，韓國的大學入學率高達 83.8%，如今的韓國社會已成為「大學生主流社會」，成為講求大學出身的「學閥社會」。父母一代為了守住自己辛苦創下的基業並將之傳承給子女，從幼年起便對子女實施早期教育。金融危機後，韓國社會所謂的好職業就是指收入高且穩定的公務員或大型企業員工，而學業成績則是獲取理想職業最基本的評選條件。金融危機前，據說只要進入名牌大學就等於是為畢業後的就業找到了保障。具備如此條件的人，被稱為是「母友兒」。

「母友兒」是「母親友人兒子」的縮略語，與其意思相近的還有「母友女」（母親友人之女）。這個用語最早出現在韓國門戶網站 NAVER 上的網路漫畫《小屋幻想曲》第 8 集「優越者」（2005/12/12）中，作品裏的「母友兒」被描繪成「人長得帥，念一流名牌大學，孝敬父母，不受就業難影響獲得年薪二億韓元職位」的出色人物。而與此相對的用語則是

「我兒友」(我兒子的朋友)。這個用語最早也出現在《小屋幻想曲》中，第200集「原因」裏「我兒友」被描繪為導致「頭腦聰明的我家兒子不用功念書的原因」，是「將我聰明的兒子拖向墮落的罪惡根源」。為了子女成功而犧牲自我的韓國父母在子女不盡如人意時，常會用自己(或假想)的朋友子女為例來教訓並鼓勵子女，而上述這些用語正體現了不成功的子女一代(敗者)在父母的這種比較裏所承受的壓力。韓國的父母在對子女就高考與就業進行強調時，無形之中讓子女把朋友當作潛在的競爭者，也因此妨礙了青少年在成長中，學會發展正常的社會關係網路。這些不過17、18的青少年，在高考競爭中失利便大批地淪為社會定義的敗者(loser)。

但另一方面，長期持續的經濟危機也讓父母與子女都渴求的「母友兒」實體與父母們積累物質財富的幻想赤裸裸地表現出來。以2007年資料為準，韓國的年勞動時間為2,316小時，居所有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年勞動時間為1,770小時)之首。2010年的韓國每10萬人中就有24人在工業災難中喪失，是OECE國家中工業災難死亡率最高(為OECD國家平均值5.1人的5倍)的地方。這些資料顯示的韓國勞動強度雖高，他們(「母友兒」與父母一代)卻仍處於不知何時就會因為結構調整而成為「敗者」的恐慌中。「母親友人之子」和「我兒子的朋友」遵循父母要求，出沒於各種補習學院，在沒有朋友只有競爭的教室裏苦讀並最終考取名牌大學，然而他們所夢想的安穩的未來卻依然得不到保障。學閥社會的傳統則通過以父母資金為支撐的「私教育」得到強化，並因年輕的一代從名牌大學畢業後能夠獲取理想職業的機制而得到維持和延續。但是，金融危機以後的韓國企業卻不曾大量招聘，即使就業成功，結構上愈發惡化的勞動穩定性也無法保障正常的退休年紀。

「托廢人」(以為托業考試是求職的萬能靈藥便只專注於此卻最終因找不到工作而頹廢的人)、「駱針生」(如駱駝穿過針眼一樣艱難就業

的人)、「38線」(民營私企的退休年紀通常為38歲)、「早期」(早期退職者)、「李太白」(與「二殆白」同音，指20多歲的年輕人近一半是沒有職業的「白手」)、「二九白」(20多歲的年輕人90%是沒有職業的「白手」)、「十將生」(10來歲便要考慮將來會找不到工作)、「沙悟淨」(與「四五停」同音，指私人企業的退休年紀為45歲)、「五六盜」(在私人企業工作至56歲的人簡直是強盜)等近來出現的流行語充分體現出他們的就業壓力與惡化的工作環境和條件。1997年金融危機以後，韓國經濟、社會的兩極分化讓社會所謂的「敗者」(loser)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 三、大眾文化中呈現的敗者文化——「放下那種偏見！那等於是兩次將我殺死。」

在高考競爭、身份上升的競爭中，無論是因為自身原因還是因為社會結構被淘汰或邊緣化的就業失敗者(青少年失業現象)越來越普遍，敗者文化作為青少年的亞文化現象不僅出現在金愛蘭(音譯)的《唾液聚集》(2007)、林貞妍(音譯)的《下酒菜 我的人生》(2006)、樸岷圭(音譯)的《Sammi Superstars的最後一個球迷俱樂部》(2003)等文學作品中，也以多種形式在商業化的大眾文化中屢屢登場。而在商業化的大眾文化中，最明顯的敗者現象則主要集中在無線與有線電視台推出的各種脫口秀及綜藝類(real variety)娛樂性節目中。

#### (一)綜藝類娛樂節目的成功秘訣

自從電視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無論哪個社會的電視螢幕上都不難發現「窩囊廢」或是被社會當作失敗者的笨蛋人物形象。韓國上個世紀60年代代表三龍的「踉踉蹌蹌的三龍」、70年代「長得對不起觀眾的李周逸」、80年代沈炯來的「營九」、90年代李滄勳(音譯)的「盲九」等最具代表性的窩囊廢形象深受普通民眾的喜愛，成為反映各時代氛圍的

重要文化元素。例如，不久前離世的裴三龍就以「城市化進程中的韓國下泥巴人、工業化進程裏的村農、越來越西化的首爾的草包、朝向近代化發展的韓國社會所有變化中總是為時代落下的落伍者」形象讓觀眾時而捧腹大笑，時而心酸流淚，是當代最耀眼的大眾文化偶像。但二十一世紀的韓國大眾文化中，卻再也找不到這樣以一個人為象徵的窩囊廢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無限挑戰」、「二天一夜」、「男人的資格」等若干人同時以窩囊廢形象登場的娛樂節目，通過展現敗者的挑戰經歷而為觀眾喜愛。例如目前在韓國有著「國民MC」(主持人)之稱、人氣如日中天的劉在錫曾度過一段幾乎沒什麼知名度的喜劇演員生涯。文化評論家李鐘范(音譯)在評價劉在錫時稱，雖然他「長得又土、在鏡頭前又緊張，只是強調跟蚱蜢長得像」，但卻在擔任被稱為綜藝類節目始祖的「無限挑戰」主持人之前就為能擔綱主持人而不斷努力，在大眾看不到的地方付出了大量心血。「無限挑戰」如今是韓國家喻戶曉的綜藝類節目的代名詞，但以主持人劉在錫為首的所有演員卻都有段沒什麼名氣的過去。從「無限挑戰」演員在節目中的綽號大致就能瞭解他們在節目中是個什麼形象。首先，劉在錫因外貌被人稱為「蚱蜢」，又因身為主持人而照顧並瞭解其他演員，所以獲得「劉班長」的稱號。朴明洙是所有演員中年紀最大的，體力相對最差，因而被稱為「懶懶兄」、「奄奄之身」、「爸爸」；而他稀疏的頭髮也為其帶來「黑彩(生髮劑)演員」的綽號。鄭俊浩曾有段8年多的無名經歷，因總是遊蕩在主流之外而被樸明洙叫作「陪襯頭」，又因為貪吃、能吃，他也被人稱為「食神」、「胖嘟嘟」或「社區傻蛋」。河東勳(HAHA)個子矮，而這是當今社會最明顯的敗者特徵之一，他也因此被叫作「小個子」、「小孩兒」。入行喜劇表演已有不短時間卻沒有什麼建樹的鄭型墩被人稱為「彗扭的胖子」、「傲慢的胖子」；喜歡追趕潮流卻不能獲得正面效果的盧哲昶則成為「劣質娛樂人」的代名詞，擁有「外國人」、「瘋子(偶像)」、「快嘴」、「盧基籠」(音譯)等綽號。這幾個演員雖然也都像過去螢幕上的

笨蛋形象一樣，會因犯錯或是說些與氣氛不符合的話而挨批，但卻不會因此就心虛或退讓，反而會更大聲、更理直氣壯地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正體現著青少年一代善於自我表現的特點。

與「無限挑戰」齊名的「二天一夜」、「天下無敵棒球隊」、「男人的資格」、「哥哥樂隊」等娛樂節目也都通過演員刻畫的敗者形象而受到觀眾喜愛。參加演出這些節目的演員雖然確實是人們喜愛並崇拜的藝人，但卻在某個方面讓人有種「窩囊」的感覺：他們的事業巔峰期早已成為歷史，或許因為年紀大了體力又不濟；要是這些人都聚在一起，互相之間總是小氣地鬥嘴，讓人難以相信這是一群成年人，卻自然聯想到「烏合之眾」。雖然「二天一夜」裏也有李勝基這樣的「母友兒」，但他在節目中卻是被「窩囊廢」哥哥們欺負的「模範生」和最小的弟弟。這些深受觀眾喜愛的娛樂節目有個突出的共同點，那就是明星不再像過去那樣高高在上的只能讓人仰視，反倒是那些具有親合力、在某一方面有缺陷因而不那麼完美的藝人更受觀眾追捧。這些兼具敗者特點的藝人的存在就好像是喊出了敗者們「放下那種(以為明星都是完人的)偏見！那等於是兩次將我殺死。」的心聲。

## (二)敗者的叛亂——獨立樂隊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徐太志和孩子們」曾高聲宣揚要與物質豐裕的舊時代文化決裂，開創屬於自己的文化。2000年下半年出現在韓國樂壇的「張基河和那些臉」有著獨立樂隊的徐太志之稱，被評價為是物質富裕如泡沫般破滅後的「(月薪)88萬元一代」的代言人。如果說他們與徐太志的音樂有一脈相通的地方，那就是在音樂裏充分體現著自己那一代的特性與自我意識。二十世紀末的徐太志曾連續發行數張銷量過百萬的唱片，並成功轉型向娛樂企劃業發展。張基河雖出現在徐太志之後，他的歌卻有過去經濟條件困難時(二十世紀70年代)期歌手的青澀感。張基河最廣為認知的專輯《廉價咖啡》與現代的流行曲風截然不

同，卻有著30年前「山鳴」樂隊一般單調的節奏與質樸的旋律。張基河獨特的嗓音和他滿不在乎的神情，將直白書寫青少年失業與非正規職勞動現狀的歌詞到位地傳達給了每個聽眾。

像「張基河和那些臉」一樣的地下樂隊通常以弘大為中心開始他們的表演生涯，經過一些時間的歷練便能在民眾中獲得不亞于主流歌手的聲望。他們的音樂旋律幽默，歌詞內容則多是對作為失敗者的自己的嘲諷。歌手李長赫(音譯)在名為《二十歲》的歌裏唱道，「我認識的哥哥們一個個都收起翅膀，悄無聲息地走進那些他們曾不以為然的地方……看著猶如解不開的難題的我，你已厭煩得說不出話了吧……我想要走出去抓住你，卻漸漸醉倒在這裏面」。「飛蛾明星香腸俱樂部」(樂隊)在《西西里》寫道，「我的愛，西西里……一起去吧，樂天利！烤肉漢堡，我請客」。「月光妖精站前滿壘全壘打」(歌手)也在《下酒菜我的人生》中唱道，「體育新聞般的我的歌，像社區巴士一樣飛奔吧，下酒菜一樣，我的人生」。

#### 四、青少年亞文化——敗者文化的特點

出現在大眾文化裏的敗者與其說是青少年或失敗者們自己發出的聲音，不如說是通過畢業于名牌大學社會學專業後自發選擇獨立樂隊的張基河，以及那些已經融入主流的藝人所間接呈現的表像。以青少年一代為主體的敗者文化則主要形成於廉價網際網路上的各種網路社區。對那些從小就為了能在激烈的就業競爭中取得優勢而參加各種資格證考試或外語進修，但到真正進入社會時還是無法證明自己價值而淪為多餘者的青少年來說，網路是他們接觸社會的最主要管道。在這個無異于第二現實生活的空間裏，他們盡情地表達自我，從而展現出比現實更好的自我。主頁、部落格、社區、推特等都是他們展現自己色彩、表達自我價值的管道。其中，DC Inside稱得上是青少年亞文化

的聖地。

### (一)自我沉迷(Self-Holic)

如今的青少年一代是每個小家庭珍貴的寶貝，集父母恩寵于一身；但同時，他們從小就對激烈的競爭耳濡目染，缺乏構建與他人的關係、培養社會共同體意識等方面的經歷，哪怕是學生時代的志願者活動也是為了換取學分的手段。對他們來說，社會就是一個角鬥場，身邊的朋友都是潛在的競爭者。他們的生活從小就因父母的期待與奉獻而成為「備受關注的生活」，「為了自己，為了更好的自己，只為自己」(for me, better me, only me)是他們人生的哲學。為了守住父母一代創下的基業，青少年們自小就接受各種訓練來提升自己的資歷。在他們的世界裏，「我」是意識的中心，所有的自我表達都以此展開。「自拍」就是他們最喜愛的自我展示的遊戲。

大眾文化當然也充分體現著他們的要求。2009年的熱門流行歌曲中，「我變了，你會離不開我」(褐眼女孩，Abracadabra)，「我在哪裡都不退縮，還是有些用處的，沒被打倒」(G-dragon, Heartbreaker)，「我是讓男人哭泣的壞女孩，如今不掉一滴眼淚嘲笑你」(2NE1, I don't care)，「我不討厭人們看我的眼神，因為我漂亮」(see ya, 女性時代)等歌詞都體現了如今年輕一代不理會他人看法，「光明正大的自戀」情感。

### (二)數位土著民(digital native)時代

在數位土著民時代，人們對電腦和網路的理解以及為增添資歷而努力獲取的專業知識較以前任何一個時期都高。大學畢業以前，這個時代的人們將接受50萬個以上的廣告、20萬個以上的電子郵件及短信的洗禮，用在手機與電子遊戲的時間在1萬小時以上，收看電視的時間則在2萬小時以上。對青少年一代來說，使用網路空間不是後天習

得的能力，卻更像是與生俱來的本能。通過網路社區、部落格及推特等管道，青少年一代在搜集、加工與傳播資訊方面的能力與專家相比也毫不遜色。韓國社會的種種熱門話題，如2009年「密涅瓦事件」所顯示的一樣，除了主流媒體的輿論和政府的公告外，線民也積極參與其中。密涅瓦曾提前一個月準確預言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破產，被線民稱作「網路經濟總統」。主流媒體在以「密涅瓦」網名活動的朴大成被捕後，宣稱其根本不是先知，在韓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究其原因，不過是因為朴大成並不具備韓國社會普遍認定的經濟專家所應具備的學歷、學識及能力，而只是一個畢業于專科大學理工專業的待業者。

### (三) 游走於冷靜與熱情兩端的敗者文化

經濟蕭條的日常化讓青年大學生們從未來的預備勞動者，被迫轉變為潛在的失業者。新近出現的用語「剩餘人」指「用剩的，用不了的人力資源」，在20來歲的年輕人中十分流行。張基河歌曲中的主人公因為沒錢，只能喝「廉價咖啡」，整日足不出戶，蜷在「濕潤的被子」裏度日。沒有經濟來源的支撐，對他們來說外出就等於消費。即使沒有不久前某咖啡廣告中所說的「出門就遭罪」那麼誇張，但他們也知道，難逃精神上的折磨。

青年待業者們大都具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畢業後都會花上一、兩年時間準備就業。但隨著時間的消逝，這些人中不少漸漸淪落為就業複讀生、二次複讀生，慢慢地就放棄了對未來的投資。人們將這樣的青年待業者稱為「袋鼠族」。「袋鼠族」自願與社會脫節，離開父母的經濟支援便難以生存，但卻對父母一代(所謂的「386一代」)懷有複雜的雙重情感。因為這些身體與年齡雖已跨入成人行列，卻不能在經濟上獨立的青少年們總無法回避將父母的財力(富足=能力)與自己(失業=無能)進行比較。20:80的兩極分化讓駱駝穿針眼般艱難就業並因而得到物質保證的階層，和在挑戰中失敗的階層間的懸殊越來越大。對青



少年一代來說，可以當作安穩靠山的父母日漸老去，贍養父母的責任與壓力，以及費勁心力還是無法就業的自我懷疑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

就如張基河歌裏所唱，當感到自己的人生像「幾年間聚在盥洗池裏的水」一般漸漸腐臭時，他們雖然有種「不該是這樣」的憤怒，卻找不到健康發洩這種憤怒的管道。青少年一代就這樣游走於冷水與熱火之間，他們的感受性讓他們對同樣身為社會弱者、敗者及少數群體心時而懷有深切的理解與包容，並通過「癡迷」(fandom)的方式——這樣的癡迷有時以對社會無法容納的行為的讚揚形式出現——來表達這種理解與包容，時而卻又對比自己更不堪的敗者進行攻擊。少女時代的「迷」比過去的「哥哥部隊」更為積極，不僅直接參與宣傳自己喜愛的藝人，更將他們認為不當的事情(如不公正的合同條約)直接報告給人權委員會，以群體方式參與各種活動。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在網路上查找並公佈所謂的「大醬女」、「狗糞女」、「失敗女」、「概念女」等引發社會論爭的普通人(主要為社會弱勢的女性群體)身份，表現出他們極具攻擊性的一面。有時，他們甚至還會毫無是非立場的創建罪犯粉絲俱樂部，如殺人王劉英哲(音譯)粉絲俱樂部、連續殺人犯姜浩順(音譯)粉絲俱樂部、誘拐殺人犯金吉泰(音譯)粉絲俱樂部等，在網路上讚揚這些罪犯的行為。

## 五、寄希望於敗者們最後的緊急出口

敗者文化存在於任何時代與社會，即使在韓國經濟最鼎盛的二十世紀80年代，依然有敗者的身影。可那時的敗者即使倒下還能懷揣希望重新站立起來，如今的環境卻讓失敗者很難對未來再有期待。因為，不改變韓國社會現有結構，便無法解決當前的金融危機、青少年失業、非正規職及兩極分化等問題。敗者文化作為青少年的亞文化，

帶有挑戰權威與渴望安穩兩種傾向。敗者文化若能引導青少年一代關注衍生敗者的現實環境，並進而推動他們尋求自身發展，則這種亞文化就可能成為創造新文化與現實的推動力。這也許便是敗者們可以逃生的最後一個緊急出口。

# 陳映真對保釣可能提出的疑問

趙剛\*

## The Question that Chen Yingzhen Potentially Posed for the Baodiao Movement

by Kang CHAO

---

\* 服務單位：東海大學社會系  
通訊地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E-mail: kchao@thu.edu.tw

## 一

今年是保釣運動四十週年。根據鄭鴻生的《青春之歌》，1970年入秋之後，釣魚台列嶼的問題開始浮現，9月，日本警方將《中國時報》記者插在釣魚台島上的國旗強行拔除，並驅逐來自宜蘭的漁船，舉國為之譁然。<sup>1</sup>釣魚台雖是彈丸大小的無人之島，但卻足以把中國近現代史成片的屈辱和傷痛意識聚焦起來。戒嚴之下，島內青年無法先行達到燃點，倒是太平洋彼岸的留學生率先燃起憤怒之火，年底開始運動串連。1971年4月10日，台港澳留美學生在華府發動了一場大遊行，有來自全美各地約兩千五百名同學參加，是台灣戒嚴時期成長的青年學生的頭一次自發的、自主的，有政治意識的集體行動。這個以學生為主體，以反帝、民主與民族主義，為主要思想內容的保釣運動，於是把火炬從新大陸傳遞回台，在首善之區的大學校園中，爆發了1949年以來的首波學運。

可以這麼說，保釣運動是一個微型五四運動；這可以從路徑與後果這兩方面來講。它本來是人民起來保衛國家主權完整，反抗美日帝國主義霸道行徑的運動；出發點是支持政府的。但是，在過程中，國民黨政府對捍衛領土的荏弱反覆，在青年學生看來，實為喪權辱國的國賊之行，更何況威權統治下政權對於抗議學生無所不用其極的誅心、分化與恫嚇伎倆，更讓青年寒心。於是運動在外抗強權之旁另樹內除國賊之幟，而尤以海外保釣運動為然。於是，海外釣運出現了國家認同的分歧，而有了左右二翼的對論衝突。

若從後果而言，保釣也可以是一個文化覺醒運動，因為它試圖挑戰長期以來國民黨政權的正當性，喚醒在戰後國民黨思想催眠術下長大的青年學生。某些開了眼的青年，不但反省到自身在思想上、感情

---

1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第78-79頁。

上的長期禁錮失能，更受到整個60年代的新左「反文化」氛圍的薰染，而從對「西方的」、「現代化的」、歐美日的單一認同中走出來，企圖聯繫上自身的歷史傳統，儘管這個聯繫單薄、有限。對這些所謂左翼的釣運參與者而言，這更是一個反省自身階級與菁英位置，重新思考自身與民眾的關連的契機。在初度甦醒的社會意識中，企圖以實踐介入社會現實，例如校園民主、政治批判與社會參與。<sup>2</sup>像這般的知識份子青年主體，就算是三、五年之前，也是不可想像的。陳映真在1966-67年的小說，好比〈最後的夏日〉以及〈唐倩的喜劇〉，所描寫的知識份子，就是平生浸泡於歐美哲學與文學的溫水中，昏昏沉沉地鎮日欲想如何出國……。但經歷過保釣運動的大學校園，則首次出現了大學生的社會調查與服務社團，在寒暑假期中，上山下鄉，足跡遍於農村漁港山地部落。鄭鴻生回憶這個70年代初的新氣象，指出這些社團「名目上是走出校園去扶助社會弱勢者，實質上卻起著重新認識自己社會的作用，有如當時大陸的『知青下鄉』」。<sup>3</sup>

保釣運動的更深一層的文化意義，體現在它搖晃了國民黨戰後長期以來所構築的思想與意識型態霸權。這個霸權有兩大禁區，分別是反共與家父長威權統治。因此，知識份子的思想、文學與藝術的表達只要不涉及這兩塊，那麼，倒是能給他們留下兩張「平靜的」書桌，放任他們幻想、瑣感、懷舊與呻吟的。以文學為例，回首50到70這二十年間，似乎也只有反共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這兩塊花園施著固定的肥，開著固定的花。是在好比如此的脈絡下，我們得以瞭解保釣運動的意義。根據陳映真，如果沒有反帝、反西方、有中國傾向的左翼保釣運動的思想衝擊，那就沒有70年代初由海外學人所發起的「新詩論戰」，而這個論戰首度飛越了那由現代主義與反共文學二十年來所共築

---

2 請參考前引書，特別第4與第5章。

3 鄭鴻生，〈陳映真與台灣的「六十年代」：重試論台灣戰後新生代的自我實現〉，《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23頁。

的思想堤防。而數年之後所發生的「鄉土文學論戰」，根據陳映真，其實也不過是「新詩論戰」的延長。<sup>4</sup>就此而言，「鄉土文學論戰」其實也是保釣運動的延長，因為這是同一個精神的延續，都在對冷戰結構、國民黨政權、現代化意識型態，以及表現在文學藝術上的現代主義，進行質疑與批判。

## 二

但是，我們今天若要紀念保釣運動四十週年，真正的意義不該只是比附五四，緬懷當年之勇，並家珍細數運動遺產，而應該是提出一個現實的也是歷史的問題：保釣運動為何無法在台灣形成一個有持續性的思想運動？這樣提問的設想是將保釣以一個思想事件來評價。因此，作為一思想事件的保釣運動，我們應該要質問它如何積極地支持或影響一種持續性的思想運動，在意識與思想上，召喚出一種第三世界的、歷史的、民眾的觀點，反抗帝國主義及其支配意識型態，並幫助形成一種建立在歷史與社會現實上的批判實踐。若謂不需以此目標「苛責」保釣運動，它只是一個單純的突發愛國運動罷了，那麼這樣的保釣縱然無妨紀念，如老兵紀念二戰，但也就沒有太大的討論價值了。

陳映真有可能是對保釣運動提出這樣的質疑的第一人。這是一個讓人驚訝的陳述，前一陣子在我還沒思及這個可能性時，我面對這個陳述的驚訝肯定不比他人少。熟悉陳映真小說的人大概都知道，陳映真的小說雖然都是反映著他所關切的時代現實，但陳映真沒有一篇小

---

4 《海峽》編輯部，〈「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的回顧：訪陳映真〉，《思想的貧困：陳映真作品集6》，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第98-100頁。又例如，陳映真，〈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鳶山：陳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第86頁。

說是在保釣的天空下開展的，甚至也沒有一個小說人物是有保釣背景的，這，或許是因為在保釣運動升爐揚波之際，他正在海陬一島孤對囹圄四壁，入耳的只有無盡濤聲與皂隸喝斥。1975年出獄後，他也不曾為文專論保釣運動，但凡是在他的議論隨筆中偶有涉及保釣運動之處，其評述皆屬高度正面。關於保釣對知識青年初萌社會意識的作用，陳映真更以幾乎是全面肯定的方式描述。他說，保釣運動所帶來的變化是

使年輕的一代，從原本只知引頸「西」望，反轉來看自己的本身、自己的社會、自己的同胞和自己的鄉土。他們喊出了一個口號，「要擁抱這個社會，要愛這個社會」。於是，有了社會調查的運動，到山地、漁村、礦區等去調查當地的實際生活情形，他們也展開了服務運動；青年們帶著一顆赤誠的心，到孤兒院、老人院去慰問。總之，他們開始關心自己校園以外的事物，關心實際的社會生活，當然這些關心也許還欠深入，但從發展的過程說，這是三十年來第一次在台灣的青年字典中有了一個新的詞彙——「社會意識」、「社會良心」、和「社會關心」。<sup>5</sup>

上引之文首發時間是1977年7月，約略同一時期，陳映真發表了出獄後的第一篇創作〈賀大哥〉(1978年3月)。一般來說，陳映真的這篇小說比較沒有受到讀者或批評者的重視，至少遠遠不及與它同時發表的，後來被稱為「華盛頓大樓」系列首篇的〈夜行貨車〉所受到的矚目。對〈賀大哥〉的閱讀掌握，比較常見的是集中在反美、反戰，以及透過賀大哥這個主人公所展現出來的類宗教狀態。<sup>6</sup>但這些解讀因為比較沒

5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中國結：陳映真作品集11》，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第20頁。

6 例如，何慰慈，〈走上成熟的道路：試評陳映真的近期創作〉，收於陳映真，《愛情的

有扣緊在地的歷史脈絡，從而無法探觸到隱藏於小說中的一個可能批判。

今天，在閱讀這篇小說時，如果對70年代的歷史聲音有聞希之念，那我們或許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有意思的解讀，把它讀成陳映真對保釣運動的一個非常獨特的、曲筆的回應。但這個回應卻又讓我們困惑，特別是將它對照於同一作者在同一時期所發表的上述引文，甚或五年、十年後，以雜文或受訪形式，對保釣運動所一貫表達的肯定性話語之時。<sup>7</sup> 我認為，在作為一個思想者的陳映真身上，有一個分野或「分裂」，有一個「文學的陳映真」還有一個「議論文的陳映真」。在最後一節，我將更進一步討論這個分野的意義。下面，我們先一起回顧一下這篇在表面文辭上看來與保釣無關的小說〈賀大哥〉，而我們所要做的是要「以意逆志」，希望能夠摸索到陳映真這篇小說中的一個「志」。<sup>8</sup>

### 三

〈賀大哥〉講的是一個本名叫做麥克·H·邱克的美國青年尋求救贖的精神流浪記。他出身富裕家庭，無政府主義者，參與過60年代的反體制學運，1967年入伍，赴越南戰場，1969年退伍返鄉。在戰爭的虛無、亢奮、焦慮與莫名的殘忍中，也可說是戰爭受害者的小士官邱克，無奈地、半受裹脅地參與了惡名昭彰的「梅萊村事件」，殺過無辜

---

故事：陳映真作品集14》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第216-218頁；以及趙剛，〈青年陳映真：對性、宗教與左翼的反思〉，收於《「陳映真思想與文學」學術會議論文集》，新竹：交通大學，2009，第109-118頁。

7 陳映真，〈中國文學和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鳶山：陳映真作品集8》，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第86頁。以及，同註3。

8 《孟子》〈萬章章句上〉：「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



平民，大概也強暴過婦女。梅萊村事件於69年4月被媒體揭露後，邱克開始發病，並至精神科求診，而精神醫療體制對他的病顯然無策，他離家失蹤。失蹤期間，他至少也到了台灣，以一個全新的名字（Hopper，人稱之「賀大哥」），以一個煥然一新的自我，作出無私的、真誠的、真愛的奉獻，並感動了與他同在一個天主教小兒麻痺復健所從事暑期社會服務的外文系女生小曹，也就是這個故事的報導者「我」。

但不久，賀大哥在台灣의無私奉獻被強制結束了。他的下落被他美國的家人打聽了出來，加上此間情治人員的配合，於是他被押返美國。在「真實身份」被暴力撕露後，賀大哥再度發病。透過醫療體制的專業術語，我們知道賀大哥的這種狀況被稱作「精神性健忘症」。小曹透過當年同學關係，取得並讀到了邱克在美就診時的「治療談話錄音記錄」。在徹夜的閱讀中，小曹理解了殘暴、不人道的帝國體制及其戰爭，所加諸於一個如賀大哥這般的反體制、有理想、有歷史感的青年身上的悲慘命運。她幾乎是以體膚直感這個理性的現代世界中的非理性與荒謬悲哀，以及一個平凡的、有著各種罪、各種病的個體的高貴抗拒。是這種從未曾有過的感動，使小曹「數度流下從未曾流過的那種眼淚」。她通宵達旦地讀完了所有文件，直到「晨光穿過窗簾的薄紗」。但驚奇的是，她此刻的心卻「出乎意想的平靜，就像那從薄紗穿透過來的，有著億萬年的歷史的晨曦一樣的平靜」(3: 125)。<sup>9</sup>於是，她想起了小時候的一個經驗：

曾在一張斑斕的紙板上，精細地畫了一個高瘦、大眼、俊美的童話中的王子。後來，為了紙板另有用途，我把紙板上的畫用橡皮擦去了。這以後，紙板上雖沒有了俊美的武士，而那斑斕卻異樣

9 本文所使用的陳映真小說的版本是《陳映真小說集》1-6，台北：洪範，2001。本文標記小說文本來源於引文之後，(3: 125)表示第3集第125頁。

地比先前顯得尤其的奪目，而同時在那奪目得很的斑斕中，不時在我的凝視裡隱約地出現那俊美的、高挺的王子武士。(3: 125)

對小曹而言，讀完了這些文件後，賀大哥就像那武士一樣地消失了。

然則卻使我向著一片絢燦無比的斑斕開了眼；而那絢燦的斑斕之中，也或者將永遠在我的凝思之中，隱約著賀大哥——或者那叫人心疼的麥克·H·邱克吧。(3: 125)

小曹開了眼了。她得到了一種全新的、朗澈的目光看這個世界。她感到了一種全新的、沛然的力量。於是她發覺她不再自安於一種被體制所安排妥當的快樂女孩狀態。在黨國情治人員的「關切」約談之後，小曹走出了大學辦公大樓：

校園裡遍地煦和的陽光。同學們在操場上，在林蔭的走道上，幸福、快樂地來往著，只是我忽然覺得他們和我已不是同一代的人了。(3: 128)

這裡沒有惆悵或黯然，因為她要開始自主地過她的人生了，她要「明天去登個報，找個英文家教，試著過自食其力的生活」。小曹走出了那因隔膜於歷史與世界，而和樂成一團的大學校園。她的步伐是輕捷的；她所看到的世界也不再那麼索然無趣了。她無語地說：「多麼煦和的陽光啊……」(3: 128)。

小曹終於知道了，對「賀大哥」這個特定美善形象的體會，不類於一種對純潔無瑕崇高的聖者甚或基督的仰慕——如小曹剛開始結識賀大哥時對他的「虔敬的愛的生活」(3: 95)的仰慕。那種仰慕是一種依傍，是一種自我否定的託付。這很清楚地展現於只識得聖者形象的「賀

大哥」，但並不知道那之前的「邱克」時的小曹。她仰慕、愛慕賀大哥，她像一張紙般地被一種前所未聞的「愛」與「信」的力量所潑墨渲染，但她患得，更也患失。小說前頭，小曹在機場一角看到賀大哥被押送回國時，她的心情竟是：

對於我，賀大哥已經從這個世上消失了。從今以後，我必須離開賀大哥，一個人生活，就像蒲公英的種子離開了枯萎的花朵，乘風而去，飛向遼闊無垠的世界。(3: 84)

這裡的心情並不類於志者的昂然，反而是類於轉蓬的飄零。而這都是因為小曹只看到了「賀大哥」的美與善，她只認同那個她自己所缺乏的美與善。小曹並沒有機會整體地、歷史地理解這個「賀大哥」是怎麼一路走來的，而要理解「賀大哥」就要理解那個負著罪、生著病的「邱克」，以及讓他負罪生病的這整個時代。這一個結合了「邱克」與「賀大哥」的那因努力克服罪與病，而益發斑斕的整體形象，反而成為了小曹今後的一個更清晰、更光輝、更有力的支持。

#### 四

以前讀〈賀大哥〉，總是把賀大哥當成唯一主人公，小曹則是一個讓故事得以順遂前進的甘草配角，但我現在則是把小曹看成至少是和賀大哥同等重要的主人公。唯有這樣閱讀，才能把小說從對現代性、越戰與精神醫療體系的外向批判，以及從對賀大哥作為一種極少見的人道主義者甚或聖徒的典型的描述，拉回到一個更在地、更及身的歷史脈絡。這樣一來，小曹的歷史性與典型性才能凸顯出來，而不再只是一個尋常的大學女生而已。我認為，小曹所代表的正是保釣運動的「失敗」，以及在這個失敗當中仍然未滅的一顆火種。

這就要回到歷史。保釣之後三、四年(如非更早)，也就是接近1970年代中期時，那原先由運動所召喚出來的社會意識與社會參與，因為沒有思想與論述的支撐，便退化而為一種僅僅具有直觀人道主義品味外貌的大學社團活動了；在寒暑假期中暫時離開學院、都市或家庭，去到偏遠鄉間表現「愛心」、「同情」、「服務」與「幫助」。這個「愛心」以及「服務」當然無法深廣，但由於其本初之心，卻又是讓人難以苛責，但稍經反思，則又不免讓人不安於這類的「愛心」和體制之間的隱藏共治關係——好比今日的「志工」。吱吱啞啞的愛心的傳播，如果缺少了歷史與社會意識，又其實不免是一種未自省的，從而帶有自利、自欺性質的菁英心理健康保養技術，來了，走了，什麼都沒改變，有時甚至是「騷擾」，然而卻收穫了「自我感覺良好」。

因此，賀大哥的出現，他的聖徒般具有本然熱力的愛及其語言，就立即讓小曹感受到她們「慈惠社」裡的「愛」的淺薄。小曹是這麼想的：

在我們「慈惠社」裡，「愛心」幾乎成了一個冗濫的套語。但是，差不多整個暑假，賀大哥使我重新認識了「美麗」、「幸福」和「愛」等並不罕見的辭語，是有著充滿希望，充滿了鼓舞人們的靈魂的新的含意。(3: 100-101)

一貫深思所有細節的小說家陳映真，在這裡應該是透過「小曹」思考保釣運動對之後青年主體與大學校園的歷史意義問題。而有趣的是，在「文學的陳映真」裡，保釣運動所開展出來的「社會意識」，在短短三五年之間，竟然令人驚訝地失其所為了；在一種常規化、體制化的路徑中，退化為「關懷」、「愛心」與「服務」的格式化活動，服務的內容大同小異，基本上是都會大學生青年文化的套路，且多少參雜了黨國體制的「救國團文化」。對這個「服務」現象，我最近正好讀到排灣族

原住民盲詩人莫那能的口述回憶錄，他回憶起大約1974年左右，在他台東縣達仁鄉山地部落，首度驚遇一群來自台北的淡江大學的山地服務社大學生。他因為自卑或是羞怯或是不知原因為何，看到來「服務」的男女學生們迎面而來，竟躲到樹籬笆後頭，等人家都走過了，才敢出來。<sup>10</sup>後來，因為他們都是年輕人，很快就搞熟了。但作為一個被「服務」的對象，莫那能還是有如下的口述回顧：

我在聽他們[淡江的山地服務隊]做報告跟檢討的時候，還會提醒他們一些錯誤的想法，比如說他們都叫學生唱歌，類似救國團的歌，我說你們浪費時間，你們不用教小朋友唱歌，他們很會唱歌，自己都亂編的，你們還要跟他們學唱歌。你應該跟他們講的是功課或故事，或者外面的世界，這個更有意義。我就跟他們講，服務錯了，歌本來是原住民的專業，你去教他，你自己都五音不全了怎麼教。我還叫他們不要把服務當成當然，很多人把他當成說我是在為你服務，就變成了一種強勢……。<sup>11</sup>

類似這樣的已經體制化的「社會服務」，其實已經找不到當初因保釣運動而萌生的社會意識，也失去了保釣運動作為60年代世界性青年反體制運動的一個(延遲的)有機部分的歷史身份自覺。這從賀大哥的關於越戰、關於無政府主義、關於新左翼的故事，於小曹而言不啻為聞所未聞之事，可見一斑。保釣當初所推開的一扇具有理論性、政治性的「社會意識」窗子，讓人初次窺見帝國主義與現代化意識型態的霸權，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史與中國革命歷程，開始思考知識份子、民眾與社會改造三者之間深刻而複雜的關連，開始反省自我與時代之間的糾葛纏繞……等等，但如今這扇窗子不知何時竟已無痕無聲地被關

10 莫那能，《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經歷》，台北：人間出版社，2010，第92-93頁。

11 前引書，第95頁。

上了。「社會服務」的青年們，走到了一個不復得以念及當初何以有此「服務」初心的境地。如果說，台灣70年代中葉的大學，因為意識型態的控制與歷史的扭曲，而呈現了一種虛偽的安逸平和，學生們「在操場上，在林蔭的走道上，幸福、快樂地來往著」——此中有一道鬼魅的、欺罔的、主體難以自知的精神依附，那麼，學生們的「社會服務」，也不會僅僅因為身體走出大學、走進「社會」，而就得以擺脫那長期的依附。

幸或不幸，因為一個生了時代的病的人的傳記(或，病歷?)，而知道了這個時代的某種被隱蔽的真相、從而知道了某種被隱蔽的自我的小曹，「忽然覺得他們和我已不是同一是代的人了」。小曹因為真正體會到自己與時代所生著的「病」，因此，她才能真切地渴求改變、渴求希望，也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一種雖微弱但無比真實的光輝、力量和美。

相對於大體上是剛健的、開闊的、希望的「議論文陳映真」，「文學的陳映真」所看到的歷史與現實，總是帶著一股綿綿的、深沈的失敗感與病弱感，而卻又總是在這失敗與病弱感中，孤獨地護衛著一縷希望與實踐，而希望愈是脆弱，愈顯其真實，愈顯其不凡。賀大哥並不是一個能帶來彌賽亞的耶穌，而是一個生著時代的病的病耶穌泥菩薩，藉由與病抗衡的意志與行動所顯現的斑斕武士形象(怪異地結合了哈姆雷特與唐吉訶德)，感動了、救贖了小曹。陳映真的〈賀大哥〉讓我想起了魯迅的〈臘葉〉。<sup>12</sup>魯迅不愛青蔥、通紅、淺絳、緋紅的「正常」楓葉，而獨愛那樹上的一片病葉，「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地向人凝視」。魯迅對這片因「被蝕而斑斕的顏色」的愛憐，我認為，既點出了魯迅的美學特徵，也

12 轉引自錢理群編《魯迅入門讀本》，台北：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09，第314-315頁。  
魯迅，〈臘葉〉，《野草》，《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第219頁。

展現了陳映真的美學特徵；唯其病，方見其斑斕。美，因此來自對病的一種認同，認同了自身與病之間的不可分離但又抗拒的關係，而在這個緊繃的關係一體中，展現了主體的「斑斕」。

這樣的一種對病的認同，意味著主體並不曾想像他是站在一個崇高的、絕對的、壯美的、真理的位置，從而以一種站在歷史與現實之外的姿態，指導歷史與現實朝他所認同的位置，一個黃金世界或歷史終點，前進。反而，主體一直自覺他是在發著病的歷史與現實之中，他自己是這個病的一部份，廣大的人民群眾也是這個病的一部份。於是，主體是以自己也是生著這個歷史的病的體會，來抗拒著這個病。這樣的一種體會，一種建立在對構成自身的種種來歷、因緣、過程的體會，好或壞，善或惡，美或醜，一概予以承認，這是「我」，然後再談我如何解救我、超越我。因此，「文學的陳映真」所看到的常常是一個發著病的社會與文化，但恰恰是由於對這個病的接受，而展現了對這個社會與國家的認同情感。無庸贅言，這和當代自由主義者、族群民族主義者，或是簡單國粹派的認識立場大相逕庭。

## 五

鄭鴻生有一個說法，把1960到1975這十五年間稱作「延長了的『台灣的六十年代』」。1960，眾人皆知是自由主義政論雜誌《自由中國》停刊之年。而1975作為一個文化與政治的分期點，則是因為該年《台灣政論》出刊，這個生命雖短但卻具重大象徵意義的刊物，回首看來，是它之後長時期的具有民粹與台獨傾向的黨外政論雜誌運動波濤的頭浪。而之前，在台灣的「長六十年代」的十五年間，則是不存在以狹義政治為宗旨的刊物。但這又切切不可理解為，那是一段死寂靜悄一切偃息的年代，恰恰相反，根據鄭鴻生，那是一段勉強可以用得上「文藝復興」這個詞彙來指稱的年代——至少相對於戰後台灣50年代的整

體肅煞氛圍而言。若對照於那慘白單一的前十年，這一時期的文藝花圃與出版景象堪稱錦簇繁茂，年輕人狼吞虎嚥各種思潮文庫，對長期知識營養不良下的精神體格進行惡補。《文星》雜誌的「中西文化論戰」，也可說是一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小巧化版本，而李敖與殷海光的文章則更是萬千都會學子爭睹展閱的對象。而陳映真直到1968年入獄之前將近十年的小說創作與少許議論文字，更可說是這個「文藝復興」中的另一大重要精神與思想資源，深刻影響了保釣一代青年，島內以及海外。<sup>13</sup>島內的青年或許朦朧感到陳與殷李異趣，但這似乎不重要；對陳映真的小說所呈現出來的台灣當代社會與一般人（特別是青年知識份子）的存在狀況，青年們感到一種說不上來的特殊精神面貌與強大吸引力，但在那時台灣的知識條件下，應該是少有人能以「左右」這一視角來框定他們之間的差別，從而能夠更內在地理解左翼青年陳映真的內心世界。

保釣之後，鄭鴻生觀察到了一個精神或文化現象，那就是在大學校園中、在大學生的情感狀態中，醞釀著一種「要能在此時此地實際做出什麼」的集體感覺或心志狀態。<sup>14</sup>從而，出現了除了先前提到的青年學生社團服務熱潮，還有「唱自己的歌」的校園民歌運動，甚至以及林懷民的現代舞，與侯孝賢等人的新電影……，凡此皆可說是這樣的心志狀態下所出現的文化實踐。鄭鴻生認為，這些戰後台灣屈指可數的一些文化成就，幾乎都是來自這個「長六十年代」的遺緒，而我們今天要對這些遺緒進行溯源的話，陳映真是一個無法視而不見的源泉，而泉眼即是陳映真在68年入獄之前所力行的那種根著於在地的創作實踐。<sup>15</sup>

鄭鴻生所敏銳觀察到的陳映真與這些一般意義上並非「左翼」的文

13 以上主要參考來源同註3，尤其是15-17頁；第23頁。

14 前引文，第24頁。

15 前引文，第42頁。



化實踐之間的關連，是很重要的。這裡嘗試申論兩個要點。首先，對之後70-80年代的在地文化實踐有著真正深刻影響的，是「長六十年代」裡的陳映真，而非殷海光、李敖的西化自由主義論述。陳映真文學在當代歷史中的「文化意義」，須得重新評估。其次，鄭鴻生的歷史觀察讓我們得以從一個新鮮別緻的視角察看一個複雜過程：在當代台灣，一個如此的「共同體」概念（此處不必有褒貶，盡量只是一個「事實」的描述）是如何被打造出來的？我們是否應該至少要回到「長六十年代」來掌握住一個起點；而其中又是經歷了多少的歷史轉折、弔詭，或左右相因的「辯證」。

但鄭鴻生的這篇重要論文所沒有直接處理（似乎也不是它該處理）的問題是：何以這個健康的、反省的、接連中國五四傳統，有具體時空立足點，其中還經過保釣運動磨練淬礪，長達十五年的思想與實踐，最後卻併流到《台灣政論》的「本土的」、親美的、反中的，台獨民粹主義的政治大流中，乃至消失了它自己所經營出來的流路與流向呢？鄭鴻生似乎有些無奈地說，這個現象只能用「辯證思維」來理解。<sup>16</sup>

我們來試看看，對這個問題是否可以有一個稍微更具體的回應。如果，把陳映真的〈賀大哥〉，和鄭鴻生的終結於1975年的「長六十年代」說法，拿到一起把握的話，我們也許可以得到來自陳映真的一點啟發，從而提出這樣的質疑：這個包括保釣運動在內的戰後台灣新生代的「自我實現」，是否從一開始就有了一種思想與歷史意識的偏枯不足，而終其「長六十年代」，並沒有真正克服這個內在缺憾？他們是否並沒有把這個亟求實現的「自我」，在知識與情感的內在層面，聯繫上包含著特別是中國大陸的東亞區域的歷史，乃至於馬克思所謂的「世界歷史的」（world historical）存在。在威權年代，青年們企圖在自己的土

---

16 前引文，第18頁。

地上走上自己的村路山路、服務自己的人民大眾、說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其志可嘉、其情可慕，但是，這些「實踐」由於都是陷入冷戰與兩岸分斷的大語境下，深刻地缺乏那得以引為超越自己的多重他者參照（近當代中國革命、第三世界想像、來自帝國內部的反省、60年代世界性青年狂飆運動、反戰……），以及從而可能播種並培育出來的一種第三世界的、反帝的、人民的、鄉土的在地性，據之以反思並抵抗那浸泡有年的、以美國馬首是瞻的「現代主義」審美情感，或「現代化」道德與政治認同。既然沒有抵抗的資源，那麼只有被吸納到一種以崇美、仇中為根底的「本土」無意識大流之下，只能進行最素樸的（或，童駭的！）、充斥救國團風的「社會服務」，或「校園民歌」。而主體的自覺則是以自己為青春無瑕絕對純潔、以自己為「不同的」菁英，甚或菁英中的菁英，因為竟然願意「奉獻」——這應該就是小曹等的「慈惠社」的狀態。而這樣的缺乏歷史、思想與理論的「自我實現」，其實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去政治化的「政治化」，等待更強的政治感覺雲層來吸收這些不知因何而形成的水滴們。

但回顧這段歷史，卻誰也怨不得。只能說，這是台灣戰後幾十年來在冷戰與兩岸分斷架構下的時也命也。早覺一如陳映真，在白色恐怖的遍地偵防之下，也只能將他超前時代的第三世界觀、一種對民眾的沛然左翼情感，以及他所密受的歷史意識，以極其奧秘的「瓶中信」方式，寫出他的寓言小說，乍明復晦地向我們讀者展現那以幾乎不透明的層膜所包覆住的內底幽暗微光，從而，我們不知所以然地但真誠地感動。五十年來，我們是這樣閱讀大多數的陳映真早期創作，包括他的第一篇小說〈麵攤〉，以為那只是一篇青春期的溫馨人道小品，只是讀來有些頗不鑿柄的情慾細節而已……。我們不可能也不曾依據那些小說展開關於中國革命問題、階級問題、城鄉問題、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異化問題、左翼主體問題、理想與現實的矛盾問題，以及台灣

左翼實踐史的問題的討論。<sup>17</sup> 青年陳映真的文學來自強烈的現實感，也提出了深刻的問題，但是在「長六十年代」中，這些價值率多因文學在客觀語境中的不得不奧秘化而被冰凍一如死火。<sup>18</sup>

由於小說內容的奧秘化，小說創作者的精神狀態與思想方式也跟著被奧秘化，而無法成為一種鮮明的主體形象，成為另類反抗文化的公共資源，在「長六十年代」及其之後，對時代的文化或精神形成某種態度的、方法的干預，反而，是胡適、殷海光與李敖的「現代化的」、「自由主義的」主體形象相對突出。陳映真的「主體形象」或是「態度的、方法的干預」，其實主要是他從魯迅那裡繼承而來的一種精神遺產，而居其核心的則是主體的失敗感與病弱感，將發著病的自我與發著病的自己的歷史與社會緊密地、內在地、有機地聯繫在一塊兒，於是，主體生著和社會一樣的病，或許還病得更深重，於是，主體以一種自救從而救人的態度，和社會與眾人在沒有現成的希望中，一起抵抗絕望。這種魯迅—陳映真的「主體形象」，和昂然的、道德的、自壯的、前進的主流現代主體姿態是大相逕庭的，後者可以是進行「社會服務」的大學生的那種菁英狀態，更可以是那種在90年代後所常見的自認的「道德的弱勢者」在抵抗他們心目中的「邪惡的強勢者」時的那種民粹主義妒恨狀態，也經常可以是一種黨派性的自由派狀態。而這三種狀態是內通的。

因此，我們可以有信心說：小曹若是沒有遇到「賀大哥」（其實，即是整個現當代的病理及對病理的反抗），那麼她也將始終是一個有著一點淺薄愛心的一般大學生而已。而如「小曹」這般還些許關心外在世界但不知所以進的一波波的大學生，進入到80年代下，則成為了所謂

17 請參考趙剛，〈理想的心，慾望的眼：重讀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6期，2009年12月，第377-391頁。

18 見趙剛，〈頹頹於星空與大地之間：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78期，2010年6月，第47-114頁。

的「學運世代」。他們在自詡青春無瑕的自我肯認中，已經準備好了要為這個社會好好「服務服務」了，而其中有一個他(她)們自己想來也許都會赧然一笑的新意涵，就是奪權、掌權。

毫不意外，這個保釣以降展現在大學校園的社會服務風潮，在80年代中期左右，算是正式退隱了，而「台灣」、「政治」與「學運」這三位，總算是一度達到了三根筷子的莊嚴一體了。以「野百合」接續一世代之前的保釣，這大概也可算是保釣的「辯證」吧。

當然，台灣在90年代初所加速形成的右翼的、民粹的台灣「共同體」概念，是如何構成、浮現的，是一個有待開展的問題，牽涉到複雜的歷史考察，本文不擬越位代答。本文如有任何意義，那可能是在以下兩點：首先，本文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以陳映真為核心之一的「長六十年代」所點滴經營出來的一種由下而上的、關切在地的、有實踐傾向的社會凝聚方式，在之後的歷史展開中，被一種右翼的、民粹主義的、認同政治的「共同體」概念所接收或取代？其次，本文企圖在方法的層次上強調，在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努力中，我們不應該放棄對思想的考察。也就是說，儘管對上述問題的回答有很多的可能進路，對關鍵的歷史轉折與事件，我們也應該要賦予注意，但是，作為批判知識界的一份子，我們不應忽視對思想力量的形成或潰散或萎闕的考察，這是我們最應該以及最能夠「介入」的當然所在。這是本文為何將保釣運動作為思想運動來理解的最根本原因。

## 六

到此，本文關於保釣的討論已經算是告一段落了。但關於陳映真，還有些話要說。在先前討論裡，我作了一個區分：「文學的陳映真」與「議論文陳映真」。而這個區分的意義在於：雖然尤以青年時期的作品為然，「文學的陳映真」總是有一種把自己也包括進來分析、

提問與懷疑的傾向。或許，不妨跟隨錢理群借用唐吉訶德與哈姆雷特這兩個典型對五四以來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所進行的分析，<sup>19</sup>我們也可說「文學的陳映真」有一種較「議論文的陳映真」尤為明顯且深刻的哈姆雷特氣質，而這個哈姆雷特氣質在「文學的陳映真」上的展現，又以在這個「長六十年代」之中的創作尤為顯著。在本文，我把這篇雖然發表於1978年，但卻為陳映真1967年〈六月裡的玫瑰花〉之後，度過七年黑獄，出獄後，今夕何夕的第一篇創作〈賀大哥〉，看做是對60年代的自指性的不絕如縷的承襲。<sup>20</sup>反觀同一時期的議論文字，則更是外顯出一種昂然的、批判的、外指的，披堅執銳的戰士姿態了。<sup>21</sup>

〈賀大哥〉之後，陳映真的小說明顯進入到一個真正出獄後的、脫離「長六十年代」的、貼近80年代台灣社會現實的寫作狀態，而我們看到了以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為主題的「華盛頓大樓」系列作品。但即使是在這個「社會現實主義」時期中的陳映真，我們也看到他一貫的懷疑與自我懷疑精神，明滅不絕於他的小說創作中。下面舉一個和保釣運動有關的「鄉土文學」例子。

先前，本文曾指出陳映真，以他身在其中的文學領域為例，對保釣運動有一高度評價，認為它影響了台灣70年代初的現代詩論戰，而70年代下半的鄉土文學論戰其實又是現代詩論戰的延長，云云。以鄉土文學論戰主將之一的身份，陳映真在議論文字（也包括了雜文、訪問）中，對這個論戰的評價也是高度正面的——雖然（或當然）也指出

19 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0 比較地讀〈賀大哥〉（1978）與之前一篇〈六月裡的玫瑰花〉（1967），以及同時的〈夜行貨車〉（1978），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前二者之間的高度連續性，包括以越戰為背景，探討戰爭對人的殘害以及精神醫療體制與現代性的共構關係，等等。這也就是說，〈賀大哥〉與和它相距十一年的〈六月裡的玫瑰花〉要比和它同時的〈夜行貨車〉更為接近。

21 代表性的例子是許南村（陳映真），〈試論陳映真〉，收於《第一件差事》，台北：遠景，1975。

了它的主要限制，例如當他說「鄉土文學論戰並沒有形成一種新的啟蒙運動、新的思想運動，現在回想起來，它應該更進一步對整個戰後冷戰體制進行質疑與批判」。<sup>22</sup>這是1987年6月，陳映真在接受題為「『鄉土文學』論戰十週年的回顧」的訪問時，所作的陳述。就算是有所批評，但我們不應忽視陳映真在訪問中所展現的昂然信心、前進姿態與戰鬥意志，以及對「鄉土文學(論戰)」的整體性肯定。

這樣的關於「鄉土文學」的心情是唯一的嗎？如果這是「議論文的陳映真」的表達，那麼「文學的陳映真」又是如何看待「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小說，而陳映真1982年的中篇小說〈萬商帝君〉，則是他唯一涉及「鄉土文學」的一篇小說。陳映真透過跨國公司經理劉福金在公司行銷會議上的發言，把作者自己所深刻參與，在某種意義上是自我構成的一重要部分的「鄉土文學論戰」及其後，做了無情的懷疑與否定。劉福金在報告他的Rolanto小鐵板爐行銷計畫時，話鋒一轉，突然說出這麼一句無厘頭的話：

「在當前，台灣有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劉福金說，「鄉土成了最流行的時髦語：文學家寫鄉土；畫家畫的是鄉土；攝影家拍攝的，也是鄉土。但是，So far，還沒有人把商品和鄉土聯繫起來，Rolanto就是這個產品。」(4: 156)

早在1982年，當眾人猶以為鄉土文學論戰「勝利」之時，陳映真就已經冷眼預見鄉土文學論戰(或運動)的血淋淋的失敗，因為它將(或，已?)失去它的既定流路與未來流向，進步的鄉土將要湮除自己，併流到那主流的本土民粹主義運動中了。而的確，鄉土文學論戰沒有形成一個思想運動，就像當年保釣沒有形成一個思想運動一般，

---

22 同註3，第102頁。

其後果就是使「反國民黨」乃至「反中國」成為唯一的「理論」或「思想」，而既然所謂「鄉土」，只是反國民黨、反中，而並無其他意義，那麼它當然是不妨與商品共舞了。

因此，我們讀者在「文學的陳映真」上頭，看到了陳映真的某種似乎更「真實」的內在狀況；我們看到了一個孤獨的、懷疑的、質疑的思想者，而他甚至在懷疑著、啃噬著他自己的戰鬥的意義。而或許我們要在這個「文學的陳映真」之旁，理解那爭鬥的、昂然的、論辯著的、有著信心的「議論文陳映真」，以及「《人間》陳映真」吧。我誠然不知道陳映真是否真的只有一種「底色」。那是明亮的溫暖的底色？或是憂悒的冷峻的底色？或者，他的內在竟是這兩種底色的無盡交織，時而乍暖，時而還寒。這或許是陳映真和魯迅的最大差異所在吧！魯迅幾乎是沒有歇息地森黑地懷疑著的……。這中間好像還有一些意思沒有說完，但不妨就暫時停在這裡罷。

在東亞敘述沖繩現代史的可能性  
新崎盛暉著《沖繩戰後史》、《沖繩現代史》的意義\*  
屋嘉比収\*\* (富永悠介、阮欣婷 譯)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Okinawa's Possibility in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ostwar History of Okinawa* &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Okinawa*  
by Arasaki Moriteru  
by YAKABI Osamu  
( translated by TOMINAGA Yusuke & Hsin-Ting JUAN )

---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0年5月29日於沖繩大學舉辦之「在亞細亞質問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語版・韓國版刊行紀念會」。

\*\* 服務單位：沖繩大學法經學部  
通訊地址：日本國沖繩縣那霸市宇國場555番地  
E-mail：yakabi@okinawa-u.ac.jp



## 前言

自從來到戰後50年的1990年代中後期起，以探討戰後東亞課題為主，多位相關者在東京創立了「東亞Project」，透過研究會和國際研討會的方式來連接起東亞的網路。在這樣連接起的東亞網路所舉辦的研討會上，包含我在內的沖繩夥伴們，有機會以有別於日本的範疇下，發表關於沖繩的報告，並與東亞著名且具代表性的今天在座出席的各位老師們，在北京、首爾、台北、東京等各地反覆地進行討論。而這次能夠邀請諸位老師至沖繩召開「在亞細亞質問沖繩現代史」的專題研討會，對沖繩來說非但具劃時代性，且極富重要意義。在此，我想在剛開始時，先深深地向這三位老師、還有為了召開此次研討會盡力幫忙的多數相關人員，致上我深深的感謝。

那麼，今天我所被賦予的題目是，如何從沖繩來思考在亞洲中的沖繩現代史，這個課題由考察這次翻譯成中文和韓文的新崎盛暉著的《沖繩現代史》(日文版的《沖繩戰後史》、《沖繩現代史》〔兩本都是岩波新書〕的合集)來提出問題。所以我以〈在東亞敘述沖繩現代史的可能性：新崎盛暉著《沖繩戰後史》、《沖繩現代史》的意義〉設定為標題，由於時間有限的關係，我將聚焦在以下三點——新崎氏的敘述方法和視點、「脫南入北」的視點，以及民眾運動的展開，來進行報告。

可是在進入正題之前，我想以下面的問題來當作前提，就是「到目前為止沖繩現代史是如何去接受東亞的？」比方說，在學術或研究方面，自1980年代起，開始有近世的東亞冊封朝貢體制的研究、人類學、民俗學的研究交流。但是近代史的話，只有又吉盛清老師的台灣研究，算是先驅性的研究，而說到現代史的話，則是完全沒有研究交流的狀態，是進入2000年代後，在我剛剛提過的東亞網路下，才終於在眾多的東亞研討會中開始討論到，以批判殖民主義的觀點來去探討包含沖繩戰和沖繩戰後史的東亞戰爭和戰後史，現代史的研究交流才

一直延續到今日。

然而，早於學術方面交流的先鋒是呼籲和平與反基地的民眾運動。雖然只是一部分學生的關注，但透過魯迅作品來看50年代的民族解放、對自主獨立的中國革命的期待、60年迫使李承晚上台的韓國學生運動，還有，在沖繩復歸運動過程當中的60年代後期，駐沖美軍基地出發攻打北越所帶來的批判聲浪，讓一般社會也注意到了沖繩的加害者意識。沖繩復歸後，沖繩大學舉辦了關於被日本「強制動員」的朝鮮人軍伕的研討會，還有對80年代後期韓國和台灣的民主化運動的關心，可是只有少部分人擁有這份關心的事實是不能否定的。但對於民眾運動的直接交流帶來了重大轉機的是，97年以來以新崎氏為中心，與和平聯絡會之韓國反基地鬥爭的交流、沖韓民眾聯合的組成，而2000年的反高峰會議的集會等更是造成了重大的契機。

這樣看來，若將90年代後期的交流分開來想，我認為沖繩現代史基本上是接受不了東亞的聲音。造成這樣的狀況是因為在美軍佔領下的沖繩，是以「復歸日本」運動為最主要的課題，也可能與東亞各國到80年代後期為止的民主化過程的政治狀況有很大關係，而當中最主要的原因，誠如多位論者已指出過的，冷戰體制下東亞殖民主義問題被遮掩住的狀況，是形成主要原因的關鍵。

## 一、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的敘述手法與視点的特徵

依據以上的這些原委來想，這次新崎氏的《沖繩現代史》被翻譯成中文和韓文，並以「東亞共有的文本」而被閱讀，其意義極大，在先確認過這點之外，更要進一步地提到新崎氏的獨特敘述手法與視点的特徵，再去思考其所帶來的意義。

新崎氏在《沖繩現代史》的開頭文中指出，奠定了沖繩戰後史的四個主要原因，就是美國的對沖繩政策、日本政府的對沖繩政策、沖繩

人民的鬥爭、日本國民對於沖繩問題的動向。而新崎氏針對各個主要原因的分析，也對應了沖繩戰後史研究的各個分野，例如美政府的政策決定論等等。

其中，新崎氏將自己研究的主題聚焦在分析「以『沖繩人民的鬥爭』為主軸的四個原因的相關關係」並進而敘述。對於新崎氏敘述手法的特徵，思想史家的鹿野政直氏正確地指出說：「不是把鬥爭史放在沖繩戰後史裡頭，而是以鬥爭史成為沖繩戰後史」（出自《鹿野政直思想史論集第三卷》）。換言之，新崎氏不是把人民鬥爭史寫成沖繩戰後史的其中一個領域，而是考慮著四個主要原因的相關關係，並以「人民鬥爭史的手法」來描繪出沖繩戰後史的整體相貌，這個手法，就是新崎氏敘述沖繩戰後史的特徵。

再更進一步地指出，此手法的基礎有(1)由人民、民眾創造歷史／作為變革主體的人民、民眾的想法，(2)變革現實的政治課題的實踐研究／不是去解釋現實，而是去變革現實思想，(3)依據原則而得的批判實證性現實主義的立場等等。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像是美軍基地象徵著沖繩一成不變的結構性差別的現實狀況，新崎氏的研究態度則是將自己的研究課題設定在這樣緊張的現實政治中，持續不斷地考察。我特別要提的是新崎氏的視點是所謂人民、民眾people的視點，絕不是國民nation的視點或敘述。這也是我特別想強調的新崎氏的特徵之一，並非來自國民，而是來自人民·民眾的一貫視點這一點。

然而，19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前期，日本的歷史學會(歷史學研究會)以「人民鬥爭史」為舉辦特集研討會的題目時，「人民鬥爭史」這手法引起當時學會的注目。如同大家所知的，到1970年代為止，日本歷史學上有濃濃的馬克思主義的色彩，而到60年代為止階級鬥爭思想被普遍接受與支持，帶來很大的影響力。當時主導人民鬥爭史的研究者們的願景是，要打破在階級鬥爭史中侷限住勞動者的狹隘階級概念，以及要促進人民概念的豐富化，還有就是在客觀的結構分析下，

要明示出人民主體性的情況，來推測鬥爭的結果。

在70年代前期，人民鬥爭史這個題目在歷史學研究會上開始走向靜默，但其觸角卻是間接地影響了60年代起盛行的民眾史研究、70年代的國家史、社會史研究。然而，到了80年代，比起變革主體，學會將關心轉移到分析其周遭的結構及組織的國民國家論，導致人民鬥爭史的衰退。而有趣的是，雖然在70年代為止在日本的歷史研究上，還殘餘著因現實社會的衝擊提出的研究課題所帶來的緊張關係，但到了80年代後，這樣的緊張關係卻無法持續下去（歷史學研究會編《戰後歷史學を檢証する》）<sup>1</sup>。

就這樣，目前的現狀是，日本歷史學對人民・民衆鬥爭史敘述手法的關心很淡薄，以及對許多研究者的理解來說，人民・民衆鬥爭史被認為是已經落後的研究手法。可是，我覺得這樣的現狀是因為日本社會的政治背景影響下，日本特有的研究狀況，在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是反映出日本社會政治狀況已弛緩的現實。可是，就連單看年表也能清楚地知道，80年代以後的沖繩以及東亞的政治狀況，與日本的現實狀況是明顯不同的。就像基地問題一樣，從東亞直接地承受美國霸權的情況，可看出與沖繩共通的殘酷政治狀況。

而一瞥自80年代到今天為止東亞近現代史的歷史敘述手法，可以發現在民主化後，一口氣從歐美傳來的多樣研究手法所帶來了多彩研究成果的同時，人民・民衆鬥爭史的手法並未被遺棄，反而依舊存在於這套敘述手法的基礎中，這一點是令我印象深刻的，這也能推論出日本的研究狀況反而在東亞中才是屬於不尋常的情況。

當然，造成這樣的背景，是由於面對各個國家亦或社會的政治狀況所反映出的不同現實狀況，這是無庸置疑的。但，我在想，對於新崎氏從60年代中後期起開始寫關於沖繩的文章，便堅持以人民・民衆

---

1 中文譯名：《檢討戰後歷史學》（筆者譯）。

鬥爭史的手法來敘述，就算在80年代的日本研究中被認為是既衰退且又落後的敘述手法，但對於新崎氏的這份堅持，我認為人民·民眾鬥爭史的手法，有再度重新審視的必要。就連現在，不對，應該說正因為是現在，在東亞研究中，人民·民眾鬥爭史的敘述手法應該要成為大家共同的認識，才能帶來更多各式各樣不同的啟發。

## 二、「脫南入北」的視點

接下來，我想要針對新崎氏對於90年代初期沖繩社會的變化而做出的批判性論點「脫南入北」來作進一步思考。「脫南入北」的視點雖然在《沖繩現代史》這本書裡沒有直接的提到，但新崎氏在《沖繩同時代史シリーズ(全十卷)》的第五卷〈「脫北入南」の思想を〉<sup>2</sup>裡，有提到過這個論點。90年代初期的沖繩社會，由於「復歸」日本而被編入日本經濟圈中，政府投下許多補助金，讓沖繩享受表面上的「富裕」。依據當時報紙的報導，沖繩的縣民所得雖然在日本是最低的，但以外匯市場行情來換算的話，就算比法國低，卻是超過義大利和英國的。

新崎氏對這樣的沖繩社會的變化，作出了尖銳的批判，以前的沖繩是日本的「第三世界」，既貧窮卻又平等、寬容的社會，可是在不具生活品質的不安定市場經濟下，因為享受「富裕」而構成了「脫南入北」的關係，產生了沖繩的格差社會，而曾經存在過的多元又寬容的價值觀逐漸衰微。這讓我想起一份有關沖繩自殺率的統計數字，約莫1965年開始，沖繩的自殺率達到日本全國的水準，然後到了90年代便遠遠地超過了全國的自殺比率。新崎氏曾說過：

「在美軍的支配下，不但權利被剝奪，就貧困的物質生活這一點而言，曾經處於南社會的沖繩，是否因復歸而被包含進北社會，導致失

---

2 中文譯名：《沖繩同時代史系列(全十卷)》的第五卷〈「脫北入南」の思想〉(筆者譯)。

去了與南的連帶感以及南方的感性呢」、「為了將來的著想，主體性選擇的課題……讓我不得不深切地感到確立『脫北入南』的視點的必要性」、「沖繩，正因被編入富裕的北方社會，才更應以楔子的身分去重建其價值」。

如同上面所說的，新崎氏對於90年代初期「脫南入北」的沖繩社會的變化，重新點出「脫北入南」思想的必要性。我認為，新崎氏的《「脫北入南」の思想を》中的論點，與今天的出席者的陳光興老師針對台灣作家陳映真的文學作品中的「第三世界」來分析，並呼籲其再發現的必要性的想法（池上善彥譯〈陳映真的第三世界〉），其實是相關的。

按照年序來看新崎氏的著作，便可發現，從90年代初期開始在敘述方面的兩種轉變。第一個轉變，其實嚴密地說起來，是發生在更早以前就有的，就是從《沖繩戰後史》到《沖繩現代史》中的主詞，從「人民」變成「民眾」的敘述變化這一點，是明顯可見的。我有查過「人民」這個詞，在《沖繩戰後史》裡使用了41次，然後這有一半左右是以「沖繩人民的鬥爭」為表現。在同一本書的後半部也有使用到「民眾」、「居民」，但是在《沖繩現代史》中，可以發現大部分的主詞都已變成了「民眾」。我想，這樣的轉變，對應了沖繩社會「復歸」後的多樣變化。雖然，「民眾」這個詞大多出現在「沖繩民衆的鬥爭」的表現中，但我認為，新崎氏對「人民」和「民眾」所代表的意義並沒有感到很大的差別。年輕的世代在解讀「人民」這個詞時，宛如讀出馬克思主義的餘像般而單方面地抗拒，這反而顯示出年輕世代無法去想像當時人們對這個詞所貫注的心情吧。而新崎氏提到的「人民」和「民衆」，是「為訴求和平而鬥爭不懈的人們」的意思。

另外一個轉變是，在新崎氏提出「脫北入南」的思想後，他加深了對韓國的反基地運動和台灣的關心，另外也對愛奴、巴勒斯坦、東帝汶、新疆維吾爾族等少數民族的問題發表了較多的論述這一點。在論述少數民族問題的同時，對於日本社會中，在處理沖繩和愛奴的存在

以及這兩者間的相互理解時，表現出一致又僵直的效率主義，造成這樣堅持己見的封閉狀況，新崎氏表示出「為突破這樣的狀況，該嘗試去重組那曾擁有獨自性歷史文化的多樣構成因素，來建構出一個能被尊重的『包容社會』」(出自第六卷《基地のない世界を》)<sup>3</sup>的必要性。新崎氏的論述，更進一步地展開到以「公正・平等的共生社會」為目標的想法，在2000年的「沖繩民眾和平宣言」中提出的主張如下：

(G8所主張的)經濟繁榮，只是部分的大國以及其中的特權階級的利益追求，而所謂的和平，則不過只是保證這利益的經濟體制與國際秩序的維持，正因如此，「向世界呼籲沖繩的戰略的重要性」的宣示，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和平的發信」。然而，我們所祈求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們對自然環境的珍惜，盡量地將有限的資源和財富公平均分，絕不使用暴力(軍事力量)，互相尊重不同的文化・價值觀・制度來共生，這是沖繩民眾這半世紀以來透過社會體驗所得到的確信。

我在想，新崎氏提倡的從「脫南入北」轉換到「脫北入南」的思想，除了讓我們能重新思考90年代後期以來，東亞來勢洶洶的市場經濟主義所帶來的高度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非人間性，也給予了相當多的啟發。

### 三、沖繩民眾運動的展開

第三個論點，我想以關於沖繩民眾運動的展開來論述。新崎氏將戰後的沖繩民眾運動分成三次浪潮，第一波是1950年代的全島土地鬥爭，第二波是1970年前後的安保・沖繩鬥爭，第三波是1995年以來的

---

3 中文譯名：第六卷《沒有基地的世界》(筆者譯)。

民眾運動。其中，新崎氏指出，尤其到了第三波時，沖繩的民眾將日本、美國客觀化、相對化下，訴求普遍價值的人權·和平·自立·環境。新崎氏另外也指出沖繩大眾運動的特徵是，第一波的全島土地鬥爭以團體共同鬥爭的組織為中心，到了第二波的安保·沖繩鬥爭時，個人參與的市民·住民運動組織與團體共同鬥爭組織以並存型態顯現，然後第三波95年以後的運動，並存的兩者達成了互相完補的關係，將戰後沖繩民眾運動的展開作出分析的同時，新崎氏也對目前正在鬥爭中的邊野古運動作出如下的分析：

邊野古鬥爭，成為「被個體志向的集合支撐的徹底的非暴力行動的鬥爭」。……在這個鬥爭的背景，有統計數字上小數點以下，肉眼看不見的人們之間的連帶。這擴展開來的連帶，遠遠超越了沖繩。在日朝鮮人也有參加。……這種徹底的非暴力主義，也是這次鬥爭的特徵。(出自《沖繩現代史》第221-222頁)<sup>4</sup>

在邊野古鬥爭的特徵裡可看到，非暴力直接行動下，將遵守反建設新基地為原則，但並非當做教條，而根據現實隨機應對的態度。這樣的隨機應對，充分地運用在邊野古運動的展開中，來去和各種他／多的爭論做接合，比方說，跟重視沖繩戰的經驗與記憶、歷史教科書問題、認識東亞歷史等的歷史性視點做接合，還有，像是與為追求真正的富裕，其中也包括重視經濟開發的疑點與批判，而重視自然環境問題的視點的接合等等。這樣的邊野古鬥爭的存在，就如孫歌老師所指出的「沖繩民眾並非單數的，而是『多元的』」(丸川哲史譯《沖繩に内在する東アジア戦後史》)<sup>5</sup>，沖繩民眾運動本身也含有孫氏所指的同樣

4 新崎盛暉(2010)《沖繩現代史》，胡冬竹(譯)，中文版，北京：三聯，第405-406頁。

5 孫歌(2010)〈內在於沖繩的東亞戰後史〉，收錄於同上書，第449-466頁。



內容。95年之後的沖繩民眾運動，不只是追求新崎氏所說的人權・和平・自立・環境的普遍價值，也被期待能從沖繩的民眾運動聯繫到東亞的民眾運動，進而展開。

## 結語

在日本本土雖然也有出版很多日本戰後史，與新崎氏的《沖繩現代史》同時期左右，日本歷史家中村政則氏也出版了論述關於日本戰後史的《戰後史》(岩波新書)。比較這兩者內容，我比較注目的是敘述手法的對照，中村氏於同書裡曾指出，日本的戰後有「已結束的戰後」和「未結束的戰後」，而沖繩基地問題和對亞洲的戰後補償問題即是「未結束的戰後」的部份。依中村氏的論點來想，正如同為解決沖繩基地問題和對亞洲戰後補償問題般，作為新崎氏的著作和實踐性行動的中心是，為了解決日本戰後的「未結束的戰後」的理性作為。這意味著，新崎氏在《沖繩現代史》中的敘述，可以作為有效的論點，來解決沖繩和東亞各國、各地共有的「未結束的戰後」的局勢。

鄭根埴老師指出了沖繩的存在在東亞中的重要性，點出了「以沖繩為方法」的提問。具體來說，就是跨越各個國民國家，將東亞作為對象的視點，以及可以變革現有支配秩序的替代方案，且提出積極的未來之展望構想(池上善彥譯《基地の島・沖繩》)<sup>6</sup>。如同鄭氏所指出的，為了變革東亞現有的支配秩序而構想未來的展望，以及為了今後的東亞「民眾的和平」，我敢確信，新崎氏的《沖繩現代史》中告知了極為重要的論點和暗示。

(編按：屋嘉比収先生於2010年9月30日辭世，台社編委會同仁在此致哀。)

---

6 中文譯名：《基地的島・沖繩》(筆者譯)。

# 冲繩

作為一個研究方法

鄭根埴\* (朴祐譯)

## Okinawa as a Way of Method

by JUNG Keun-Sik (translated by PARK Woo)

---

\* 服務單位：首爾大學社會學系

通訊地址：Gwanak 599, Gwanak-ro, Gwanak-gu, Seoul 151-742, Korea.

E-mail: ksjung@snu.ac.kr

## 一、與沖繩見面：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會議

新崎盛暉的關於沖繩近代—現代史一書翻譯成中文，使更多的中國和台灣讀者瞭解到了沖繩。兩年前在韓國，年輕學者鄭永信把《沖繩現代史》翻譯成韓國語，使更多的韓國讀者瞭解到沖繩。沖繩現代史介紹到東亞地區並不僅僅意味著人們對沖繩的關注程度提高了，還表明市民連帶也發展到了一定程度。

通過這篇文章我將闡述韓國人對沖繩的關心是怎樣形成的，在韓國對沖繩的研究具有何種意義。這篇文章的題目〈沖繩，作為一個研究方法〉本來是學術會議主辦方，沖繩的學者所提示的，對我來說回顧一下我個人的「對沖繩的學習」以及反思目前東亞的局勢符合這個題目。

我第一次訪問沖繩是在1999年11月，參加在沖繩那霸舉行的「第三屆東亞和平人權國際會議」。當時我執教於韓國南部城市光州的全南大學，同時也是那次國際會議韓國委員會事務局長。以前我通過大學的民俗學家只瞭解到沖繩、濟州島，以及韓國南部島嶼的「海洋文化」和著名韓國古代小說《洪吉童傳》裏的主人公最後移居的「栗島國」有可能是現在的沖繩。但是對沖繩現代史我一無所知。之後自從1992年我第一次訪問日本，並且體驗東京地區居民運動和實地考察美軍基地，1995年到1997年研究九州地區區域活性化運動以來，我逐漸的對沖繩產生了興趣。

當時的東亞和平人權國際會議給我提供了更廣闊的認識平台。實地考察地沖繩和平公園和集團虐殺濠的故事讓我重新去想日本帝國主義的皇民化政策和太平洋戰爭，以及戰爭記憶和紀念問題。嘉手納美

---

1 這篇文章是在2010年5月29日，沖繩大學舉行的國際會議上發表的。我想文章的題目是受到從竹內好的〈亞洲：作為一個研究方法〉論和陳光興與白永瑞在《帝國之眼》（創作與批評，2003，pp. 286-287）中所論述的「將亞洲作為方法」的影響。與此類似的用法還有《東亞：作為一個發現》（鄭文吉、白永瑞等編，文學與知性社，2000）。

軍基地提供給我在韓國很難進行研究的駐韓美軍問題的新的視角。新建的首里城通過「守禮」這一字眼讓我聯想到韓國南大門「崇禮門」的「崇禮」，並且聯想到傳統中華秩序和夾在清和薩摩藩之間的琉球王國的兩屬秩序。同時首里城下舊日本軍司令部混合在一起令我產生錯綜複雜的心情。那次國際會議韓國學者關心的是渡嘉敷島和「赤瓦房(屋)」——慰安婦老奶奶的故事。「慰安婦之家」作為從1990年開始的日本軍慰安婦問題真相查明運動的成果，內部展示當時日本軍用過的，在地下室發現的避孕套令我毛骨悚然。

通過那次會議，我榮幸地結識到幾位沖繩的學者和運動家，沖繩代表金城睦律師，沖繩大學新崎盛暉教授，琉球大學高良鐵美教授、高良勉、浦崎成子、知花昌一先生等。此外還結識到台灣和日本的運動家，通過他們我才可以逐漸地瞭解和學習「東亞」。

1997年亞洲發生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席捲亞洲，另一方面，全球範圍的脫冷戰浪潮通過東亞市民社會逐漸地露出頭角。1997年2月，在台灣舉行了首屆「東亞冷戰和國家恐怖主義」為主題的國際學術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位曾是韓國政治犯的徐勝教授和台灣人士一起組織的國際會議。徐勝結束長達19年的監獄生活後1990年7月，<sup>2</sup>訪問台灣認識了原台灣政治犯林書揚，1994年訪問綠島政治犯收容所並開始構想這次國際學術會。<sup>3</sup>這次會議是在紀念台灣「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之際舉行的。韓國的歷史問題研究所和光州、濟州的有關人士參加了會議。並共同探討冷戰初期韓國和台灣出現的國家暴力問題。在這次會議中金城睦律師發表了台灣與沖繩的關係，川滿信一發表了沖繩的言論鎮壓和美軍統治。我本人沒有參加這次會議。

1998年4月，第二次會議在韓國濟州舉行。當時濟州「四三」研究

---

2 徐勝(金京子翻譯)，《徐勝的獄中19年：人的心境是無法被鐵鏈栓綁》，歷史批評社，1999。1994年這本書在日本出版。

3 徐勝編，《東亞の冷戰と國家恐怖主義》，御茶の水書房，2004，pp.5-6。

所為了紀念「四三抗爭」五十週年以及為了將「四三虐殺」問題暴露全社會並幫助真相查明特別法通過議會。1998年初，韓國歷史上首次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金大中大統領政府。這次會議主要討論了東亞冷戰與民眾、冷戰體系的暴力與女性、冷戰體系下的平民虐殺與鎮壓、東亞和平人權運動的展望等。這次會議裏新崎盛暉教授發表了〈沖繩反基地鬥爭與東亞和平創造〉。寫關於「四三抗爭」為題材的小說《火山島》作家，在日朝鮮人金石範作了紀念演講。參加此次會議的人通過了「二十一世紀東亞和平憲章」。這次會議提供了通過國際合作解決區域問題的方法。之後「四三」真相查明運動如虎添翼，結果在1999年末，韓國國會通過了濟州「四三特別法」。這次會議結束後，我擔任了韓國委員會事務局長並開始籌畫1999年在沖繩舉行的會議。會議發表內容在韓國以《東亞和平與人權》為題目出版（歷史批評社，1999）。

第三次會議於1999年11月在那霸舉行，高良鐵美教授組織了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裏前任沖繩知事大田昌秀作了〈向沒有基地的沖繩〉為題的發表。發表集中闡述了東亞冷戰體系的形成與結構，及與日本的關係。此外我部政明、安仁屋政昭、又吉盛清、國場辛太郎、高里鈴代、宇井純等教授在女性和環境運動的角度發表了沖繩編入日本領土的歷史過程。我把此次會議中所發表的內容編輯後在韓國出版了題目為《東亞近代的暴力1：戰爭，冷戰與弱勢群體》（三印，2001）。

我在這本書中寫到「沖繩（通過學術會議）並不僅僅是『那南邊』的一個小小的點，而是直接影響到韓半島和平的地帶。看著那起降的沖繩美軍基地的戰鬥機，我不得不承認東亞這區域單位不僅是一個架空單位，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我們所隨意忽略的『和平』這一單詞並不是一個能隨意忽略的，觀念上的概念。東亞經過殖民地統治，世界大戰，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政治軍事力量和日本的經濟力量相結合成為構成現代世界的一個實體區域單位。沖繩的南邊，和平公園紀念著戰爭的最後階段所犧牲的20萬靈魂和戰爭指揮者。可見東亞

歷史就像一個毫無秩序的線團。那裏還有大概一萬名左右的韓人，找到名字的也不過幾百人，而且還分著南和北。」

這次會議是在沖繩關於「和平紀念資料館」的爭論即將結束的時候舉行的。沖繩的媒體和學者都強烈反對隱瞞或降低戰爭和日本軍殘暴性的展示。當時我正關心關於1980年韓國的光州抗爭的記憶鬥爭與其制度化，所以當時沖繩的情況對我來說很有意義。特別是在洞裏日本軍的槍口朝著良民還是朝著天空直接影響到戰爭的意義，這一件事對我來說意義重大。「虐殺」與「自決」、「虐殺」與「犧牲」之間間隙在2005年韓國「為真實和解過去史整理基本法」中重現。主導這一特別法的是叫「韓國戰爭以後民間虐殺真相查明泛國民委員會」的市民團體。記憶鬥爭通過與抵抗自己的力量協商並轉向制度化時，雙方同意「真實」時，出現「正義」退到「和解」、「虐殺」退到「犧牲」、「清算」退到「整理」的現象。<sup>4</sup>

沖繩會議結束後，為了宣傳將在2000年5月舉行的光州會議我於2000年2月再次訪問沖繩並實地探訪了幾個地方。

2000年5月的會議，一是為了紀念光州抗爭二十週年，二是為了在民主主義下重新去思考東亞冷戰。紀念活動主題是「千年之光5.18」。參加會議的人於5月17日晚手舉火炬追悼20年前犧牲於國家暴力的人，慶祝韓國民主主義的勝利，祝願光州市民抗爭精神對亞洲民主主義發展作貢獻。

這次會議集中探討了東亞與「光州」的關係，東亞的戰爭與反種族滅絕，歷史與記憶，國家暴力與傷痕，南北統一和東亞和平問題。知花昌一發表關於沖繩天皇制問題，高島伸欣發表關於和平紀念資料館展示問題，高良鐵美發表關於沖繩內右傾化現象。這次會議裏意義最大的是台灣和韓國的「長期型囚犯」的會面，以及日軍慰安婦奶奶與日

---

4 鄭根植，2010.05，〈真實查明和和解，進展到哪裡？真實和解委員會活動結算〉，《黃海文化》，67。

本知識份子的會面。韓國的長期型囚犯在獨裁政權下被強迫「轉向」，拒絕「轉向」的非轉向長期型囚犯隨著民主化被釋放。這次會議結束後的6月，南北舉行了首腦會晤，9月，63名願意回北韓的非轉向長期型囚犯送還到北韓。日本知識份子向日本軍慰安婦謝罪並對歷史責任交流了意見。此次會議的內容在韓國以《東亞近代的暴力2：國家，暴力與傷痕》為題目出版（三印，2001）。

同時，自這次會議開始的「韓國戰爭時期良民虐殺真相查明運動」成為設立「韓國戰爭後民間虐殺真相查明泛國民會議」這一市民團體的堅實力量。這一市民團體是由社會運動家、死難者家屬、專家學者組成，五年來堅持立法運動，結果2005年出台了特別法並依此為依據出台臨時政府機構——「為真實和解過去史整理委員會」。

通過上述四次國際會議，不管學術方面，實踐方面也證明瞭國際合作的重要性。韓國的各個城市也爭先要舉辦這一國際會議。2001年韓國全州，舉行重新探討東學革命／清日戰爭的學術會議。2002年2月，日本京都舉辦了第五次會議，會議主題是「東亞冷戰／國家暴力與日本」。主要探討日美安保條約／舊金山強化條約、東亞冷戰與性、韓國戰爭時期日本內部民眾鬥爭。此外還有沖繩和韓國美軍基地問題，在日朝鮮人問題等。宮里政玄教授發表了關於通過舊金山條約第三條解釋沖繩問題，浦崎成子先生發表了關於沖繩內部性暴力問題。

2002年10月，在韓國的麗水舉行了第六屆，也是最後一屆會議。1948年濟州「四三抗爭」時，為了鎮壓「抗爭」所動員的韓國軍的一部分軍人，拒絕服從並在麗水開始武裝抗爭。這一事件當時被命名為「麗順（麗水／順天）叛亂」。大約一萬多市民涉嫌與叛亂軍溝通或合作被虐殺。根據這一事件國家制定「國家保安法」並開始積極的反共政策，韓國也逐漸變成冷戰反共國家。2000年開始，這地區的市民運動團體（麗水地域社會研究所）為了查明事件的真相而努力。並希望國際會議在麗水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虐殺—清算—和解」，主要內容是

「東亞冷戰體系形成與脫殖民化的挫折」、「東亞冷戰形成下美國的作用」、「韓國的過去清算與特別法制定過程」、「戰爭與女性」、「麗水順天事件與良民虐殺」。2000年光州會議時用了「良民虐殺」，但同年秋天開始「民間人虐殺」這一用語代替「良民虐殺」，2002年全面使用這一用語。鳥山淳教授發表〈日本復原運動的挫折〉試圖來說明1950年前後沖繩「脫殖民化運動」。

通過從1997年到2002年的會議，很多人開始瞭解並熟悉「和平」與「人權」，東亞冷戰體系與國家暴力(國家恐怖主義)，以及民主主義。但更重要的是1945年以後斷絕的東亞市民社會開始溝通並意識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存在推動東亞和平的力量。同時鼓勵了東亞周邊或者弱勢群體。韓國學者也能夠接觸到沖繩的核心問題。

但是這些會議的最大不足是中國作為東亞主要國家沒有參加這些會議。2000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朱成山館長參加了光州會議，但此外中方沒有參加。在國際會議舉行過程中也有人提到在中國的南京舉辦國際會議，但很難找到適當的市民團體為由未能實現。

雖然國際會議已結束，但會議的部分成果通過東亞和平人權大學生夏(冬)令營形式延續。日本立命館大學、APU、沖繩琉球大學、韓國全南大學、濟州大學、首爾大學的學生進行互訪交流。大學生通過演講，實地考察，討論增加歷史知識和相互理解。2005年在沖繩，大學生們看著美軍直升機墜落導致被燒的國際大學牆壁討論沖繩美軍基地問題。在韓國，大學生探訪平澤，訪問生活在即將遷移到平澤的美軍基地用地內的居民，通過他們瞭解他們的苦衷。這活動每回參加80-100名學生，為時五天，目前已經舉辦16回。雖然沖繩大學學生現在不參加活動，但韓國釜山的東亞大學學生開始參加，我們正摸索新的交流方式。



## 二、尋找沖繩認同感：「基地之島」與「境界之島」

2004年到2006年，我有機會和韓國的年輕學者開始正式研究沖繩。這一研究的研究者都剛剛拿到博士學位。他們的專業是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女性學。他們並不是沖繩專家但都是關心沖繩的專家，所以和他們進行研究不得不說是一次很大的冒險。1995年，在韓國社會各界開始關心東亞論，2003年可以說是頂點，但是沖繩研究幾乎為零。<sup>5</sup>但是因為有上述幾次國際會議的成果，我們可以開始進行研究。

我們首先參加東亞大學生夏(冬)令營和大學生一起聽講解並學習基本知識，同時做實地考察豐富了相關知識。本來這個研究的題目是「沖繩美軍基地的政治社會學」。但是韓國學者研究沖繩，訪問沖繩後再去反思韓國，通過沖繩想像東亞的這一階段性課題不得不叫我們該研究題目——「沖繩：一個研究方法」。沖繩並不是我們面前的，一個單純的區域，也不是一個單純的比較與研究的物件。它的位置使我們擺脫固有的民族國家(國民國家)境界，去面對一個整體的東亞並研究東亞各個領域的相互關係。換句話說通過長期的歷史變動—即從中華體系到日本帝國體系到戰後東亞冷戰體系—去探索歷史變動的路徑。同時還有跨越現在的東亞秩序尋找並想像未來和平和共同體秩序的意義。目前韓半島依然是冷戰/分斷狀態，所以在韓國很難找到接近美軍基地的方法。所以我們想通過研究沖繩美軍基地問題摸索一個適當的、研究韓國的方法。具體來講，通過研究沖繩美軍基地歷史過程，斟酌駐韓美軍基地的未來。同時通過沖繩編入日本帝國，並在戰後又

5 1995年開始韓國興起東亞論。韓國著名的出版社「文學與知性社」於1995年出版《東亞，問題與視角》開始陸續出版關於東亞的書籍。包括《東亞：作為一個發現》(2000)、《周邊視角中的東亞》(2004)等。還有創作與批評社於2003年出版系列叢書《東亞的批判知性》。叢書包括陳光興、孫歌、崔之元、汪暉、酒井直樹、山寶信等人的思想和論文。

從日本分離的過程去瞭解東亞周邊或邊境問題。我主張「韓國要想為東亞和平與進步作貢獻必須要經過沖繩」。<sup>6</sup>

29名研究者參加的這個研究課題通過三次實地考察和研究，出版了《基地之島，沖繩》和《境界之島，沖繩》兩本書。前者的副題是「現實與運動」，內容包括韓國國內研究沖繩的角度、東亞國際秩序與美軍基地、美軍基地與沖繩區域社會、基地性買賣問題與女性和平運動、反基地運動的國際地平線等五個部分。後者的副題是「記憶與認同感」，內容包括東亞近代史中的琉球與韓國、戰爭經驗與記憶政治、區域文化與空間、沖繩認同感等四個部分。沖繩本地專家學者看來，我們的這些研究成果還微不足道，但作為在韓國進行的第一個研究沖繩的課題，意義還是不小。

此次研究進行之前，韓國國內主要關心領域是軍事<sup>7</sup>但整體來說還很少。東亞和平人權國際會議初期，新崎盛暉教授的《又一個日本，沖繩》一書翻譯成韓國語，人們開始瞭解沖繩。所以我們的研究雖不能拿出來炫耀，但其成果還是短時間內得來的。

我們進行研究時鄭永信2008年翻譯了《沖繩現代史》，此書中還包括了新崎盛暉教授的序言。序言中新崎盛暉教授談到他在1986年和1987年與韓國「太平洋同志會」交流的插曲。「太平洋同志會」是由太平洋戰爭中從韓國慶北鯨山被強制帶到沖繩的人戰後在回家鄉的船上結成的團體。他們希望把死在沖繩的同事的靈魂一起帶走。但很遺憾的是沒有關於他們的研究。

研究沖繩的過程中所得到的另一個成果是，和東京外國語大學中野敏男教授研究組的交流。當時他們已經舉辦了兩次以「東亞與沖繩」為主題的學術會議和「正在進行時，東亞戰爭與戰後」為題目的會議。

---

6 鄭根埴外，2008，《基地之島沖繩》，論衡，p.6。

7 南昌熙、宋永仙，《駐日美軍基地政策變化與對韓半島的影響：沖繩基地調整事例為例》，韓國國防研究，1998。

他們通過這樣的學術會議試圖重新訂立研究沖繩的視角和地平線。他們的成果通過叫《沖繩の占領と日本の復興》(青弓社, 2006)書出版。我們除了和他們的交流外, 波平恒男、屋嘉比收、鳥山淳、若林千代、宮城公子等教授提供了幫助。

還有一個成果是參與過我們這一課題的研究員目前都執教於韓國的主要大學, 如: 首爾大學、中央大學、放送通信大學、翰林大學、光雲大學、延世大學等。所以韓國的研究沖繩的研究者具有很大的潛力。同時以參與我們課題的人類學者為核心, 於2009年11月設立了「琉球—沖繩學會」。開始只有包括11名韓國學者和10名日本以及其他國家學者在內的21名會員, 但其會員正逐漸增加。

### 三、東亞分斷與冷戰體系論

#### (一) 沖繩正如一面鏡子

韓國學術界研究沖繩的動機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為理解沖繩社會本身, 二是相信通過研究沖繩, 更深入地理解韓國與韓半島。沖繩作為一個刺激並誘導對東亞想像力的一面鏡子, 其意義很大。在古代東亞文化中, 鏡子曾是人們參拜的神物; 近代精神分析學中「鏡子」成為一種觀察現實社會的方法。鏡子既反射他人也照射了自己。但是鏡子也分幾個種類。平鏡如實地反映社會現狀, 凸鏡或凹鏡則立體地反映社會現狀與它所包含的背景。凸鏡能將細微的東西放大, 凹鏡能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周圍的背景照得一目了然。對韓國而言, 沖繩是一面凸鏡, 能突出在韓國所看不到的美軍基地的影響力, 同時也是一面凹鏡, 能反射韓國是一個在美國主導的東亞和美日同盟框架內的一部分。所以只能通過沖繩才能理解雖然存在於韓國但難以接近的美軍基地問題。在韓國人們對美軍基地的問題相對遲鈍, 而且這一問題成為社會熱點也有很大難處。這一現實受韓國戰爭中經歷的安保危機, 美

軍基地土地所有權差異，和平運動的滯後發展等因素的影響。

通過對沖繩的研究，可以瞭解到韓國不僅處在韓半島內的分裂格局中，也處在整個東亞冷戰與分斷的體系中。韓國人普遍認為分裂的局面是韓半島固有的問題，是民族內部的問題。然而，在韓國內戰中沖繩曾是特殊的後方基地，現今它又影響著韓半島的安全狀況。因此現在的沖繩對於韓半島來說，仍然具有特殊的意義。

「分斷(分裂)」格局事實上存在於整個東亞。回想 1945-1972年的沖繩與日本，當時日本可以說是處於分裂局面。雖然沖繩內部的「祖國獨立論」與外部的「回歸論」不同於韓國的「共存」或「統一」，但是這些都是反映「後戰爭(非戰爭)」形態的理論用語。「分斷」的概念也適用於中國與台灣的兩岸關係。上個世紀90年代韓國的白樂晴教授在分析現代韓國社會時，運用了《分斷體系論》。在台灣它的譯本備受關注。<sup>8</sup>如果說韓半島，中國，日本都經歷著或經歷過這種「分斷」，那就有必要認真地探討一下「東亞分斷體系」。中國和台灣的分斷以及分斷鞏固華是韓國戰爭的產物，沖繩的美軍基地化跟韓國戰爭又密切關係。

第四，沖繩特別是 1945~ 1972年的沖繩促使我們反思目前韓國內部民族國家與單一民族國家兩個理論之間的關係。我們怎樣定義那時的沖繩呢？它不所屬日本，也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正如大日本和平條約第三條所描述的，沖繩是擁有日本「潛在主權」的，由美國永久佔領的基地。那麼，這裏的「潛在主權」又是什麼？這似乎與現代單一民族國家理論中「絕對主權論」相矛盾，甚至它使我們聯想到「多重主權」的概念。

國民國家論很難說明韓國的現狀。韓國與朝鮮雖然是兩個不同的單一民族國家，雙方不把兩者的關係稱為「國家間」關係。可以說，如今的韓國是未完成的民族國家，也是兩個分斷的民族國家。在西方的

8 白樂晴，1994，《分斷體系變革的學習方法》，創作與批評社；白樂晴，1998，《動搖的分斷體系》，創作與批評社。

國家理論中並不探討「分斷」。這些議論可適用於中國與台灣的关系。1992為止，韓國稱台灣為「自由中國」，但自韓中建交以來，台灣從「自由中國」變成了受中國大陸潛在主權的「台灣地區」。

## (二)東亞冷戰於分裂體系的瓦解

目前的東亞不僅有中國、日本、韓國等主權國家，也有台灣、沖繩等特殊地區。北韓在國際上可稱為一個國家，但韓國不認為北韓是個國家。分析分斷的韓國，兩岸關係與琉日關係後，不難看出東亞不是幾個同質性的國家或地區的組合，而是由幾個「中心」與「周邊」地區構成的。如果把這些國家與地區都歸為東亞地域體系裏，那麼從1945年到現在這個體系已經歷了巨大的變動。

二十世紀前期東亞是日本帝國的時代。十九世紀日本形成國民國家的過程就是日本帝國形成的過程，也是附近地區被殖民化的過程。清日戰爭、俄日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擴張帝國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日本通過中日戰爭擴張其勢力範圍。這一時期日本在沖繩、台灣與韓國等地進行天皇子民化教育。太平洋戰爭使日本實現了「大日本帝國」的美夢。

然而，1945年美軍對沖繩的佔領和日本的戰敗迫使日本從帝國走向單一民族國家，從大日本走向小日本。<sup>9</sup> 台灣、韓國、庫頁島、「滿洲」都陸續解放了。美國用天皇與日本交換了沖繩。中國爆發了內戰，內戰被稱為革命。1949年隨著「革命的勝利」中國成立了新國家。但是內戰並未完全結束，直到1950年中國收復了海南，正準備攻進台灣時，韓國內戰爆發了。

---

9 1951年簽署的對日和平條約第三條中，將奄美、小笠原、沖繩從日本分離。奄美於1953年、小笠原於1968年、沖繩於1972年先後回歸日本。參見新崎盛暉(2005, 鄭永信、宮內秋緒共譯)《沖繩現代史》，論衡，2008，pp.26-27。

韓國以38度線為界一分为二，1948年國家成立，兩地矛盾激化，全面的內戰開始了。通過四次戰線移動最後進入休戰狀態。戰爭過程不僅是國家政權之爭，也擴展到國家對人民的暴力。軍事與物質上的差異鞏固了兩個國家的分割局面。回顧1931年日本侵略滿洲，從1953年韓國戰爭到休戰，東亞經歷的不是15年戰爭，而是23年。東亞從殖民地與帝國的體系過渡到冷戰體系。

東亞冷戰體系是隨著地域間分裂而形成的。美軍佔領了沖繩，韓國與日本。美軍把日本本土與其他地域區分開來，進行管制。1951年9月舊金山強化條約是由大日本和平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組成的。通過這一條約日本獲得了獨立，但是條約排除了韓國，韓日之間戰後事宜調整變模糊了。韓國戰爭後，韓國與朝鮮分斷了；中國與台灣也分裂了，朝鮮與中國形成了同盟關係。這樣形成的東亞冷戰與分斷體系至今經歷了兩次重要的時期。一次是1972年前後（1971-1979），另一次是1990-92年。這兩個時期都為東亞冷戰與分斷體系解體奠定了基礎。現在正處於第二次解體與第三次解體中間，這個時期有些漫長。三次解體時期意味著東亞和平體系的到來。主要包括：朝美建交、朝日建交、韓朝統一等。當然也會出現意想不到的腳本，如1990年的變動。

第二時期1950年代韓國支持沖繩的特殊狀況（國務院1958.1.14;2.4）。韓國戰爭期間日本與韓國雖屬同一陣營，但是考慮到日本並未妥善處理殖民統治的責任與後果，李承晚大統領反對美國與日本形成同盟關係。當時，韓國極力反對形成「以日本為中心的東北亞」政策，也反對沖繩歸入日本領土。到了1965年，韓日間關係才得以緩和，但是兩者的關係還稱不上「同盟（盟友）」。1965年韓日協定是根據當時參與越南戰爭的美國的利益而定的，殖民地問題至今沒有充分解決。韓國人對沖繩並沒有太多瞭解，但是知道沖繩的人一般都有種親切感。這種親切感可能開源與過去曾經歷過同質的被殖民過程。

到了70年代，東亞體系變化很大。主要有1971年的兩次中美會

談，1972年5月沖繩的「回歸」，9月中日兩國建交，1973年1月越南和平協定，還有1979年美中建交。1971年7月與10月周恩來與季辛吉在中美會談中，針對駐韓美軍與韓半島問題達成了具體的協定，但最後沒有公佈。<sup>10</sup>這一時期朴正熙大統領加強中央集權，建立了名為維新體系的權威主義，推行了國家主導的經增長政策。朴正熙政府對沖繩問題的看法不得而知。新崎盛暉教授分析說<sup>11</sup>「60年代『安保改正』強化了以沖繩分離與美軍支配為前提的美日安保體系，1972年沖繩的『回歸』卻強化了以沖繩與日本統一為前提的美日安保體系」。「這種變化對美日關係來說意味著什麼」仍然需要探討。

第二個大變化是全球範圍的「冷戰後期」時代。全球「冷戰後期」1990-92年間，東亞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伴隨德國的統一與西方國家冷戰的結束，朝鮮與韓國在1991年加入聯合國，1992年實行朝鮮與韓國協議。韓國在1990年與俄羅斯建交，1992年陸續與中國、越南建交。這同時帶來了韓國與台灣的「絕交」。對於韓中建交，朝鮮提出了反對，但是中國並未理睬。這一時期的東亞分斷與冷戰體系的瓦解是不對稱的。朝鮮與日本、朝鮮與美國並未恢復正常關係。相反地，朝鮮漸漸被國際社會孤立，朝鮮遇到了危機。1990年代朝鮮為生存在這樣的體系之下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

上個世紀90年代東亞是由反帝連帶，冷戰連帶，發展連帶等許多連帶關係組成的。關於日本的殖民地統治與遺產問題，韓中形成了反帝連帶；在安全問題上，韓日形成了冷戰連帶。在冷戰期的東亞，韓國與日本形成了弱聯繫。兩國都遵照美國的政治軍事秩序形成了強力的合作機構，但是兩國之間仍然有殖民歷史所遺留的問題。在分析韓日連帶問題時，一般群眾之間的連帶也是值得注意的。在美軍基地問題上，韓日間群眾連帶是從1992年開始，韓國與沖繩的群眾連帶是

10 朴勝俊，2010，《韓國與中國100年》，耆婆郎。

11 新崎盛暉，2008，《沖繩現代史》，論衡，p.58。

1997年形成的。<sup>12</sup>

韓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可以分為六個階段。按照友好程度由大到小依次為：全面戰略性同盟>戰略性合作夥伴>戰略性同伴>全面性合作夥伴>相互信賴的全面性同伴>全面性同伴。「全面戰略性同盟」是指有重要軍事同盟關係的國家。韓國只與美國有這樣的關係。與「又遠又近」的日本之間的關係被稱為「未來指向性成熟的同伴關係」。韓日關係實際上接近戰略性同伴關係，過去殖民統治史讓韓國刻意避免如「戰略性」這種描述。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是指在政治、安全、外交、經濟、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全面戰略性同盟與戰略性合作夥伴關係都表示兩國間親密的協作關係，這兩種關係主要區別在是否有軍事結盟。有戰略性同伴關係的國家協力維持兩國的和平，並共同探討國際事宜與對外戰略。與韓國有這種關係的國家包括印度、墨西哥、俄羅斯、歐盟等。

韓中關係和北中關係非常複雜而且美妙。把韓中關係與北中關係聯繫起來，呈現一種耐人尋味的結構。韓國戰爭期間，朝鮮與中國結為「血盟」，但是1992年以後，隨著冷戰結束，韓國的民主政府十年間與中國形成「戰略性同伴」關係。但是經濟發展帶來的利益與安全問題（朝中同盟）相矛盾。朝韓關係惡化時，中國的作用變得很重要，韓朝關係改善時，中國的作用就會減少。

1992年以後，東亞向著和平與進步的反冷戰／反分裂的方向發展。這種局面在2000朝韓首腦會談達到了頂點。但是2001年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改變了對（包括東亞）其他國家的戰略，韓朝關係也沒能達到全面的和平階段。1998年以後的十年間，韓國民主政府積極推進對朝鮮的經濟支援與合作政策，但是朝美關係並無改變。朝鮮的核開發問題使韓國內部針對反分裂與統一的方案形成了不同的意見。韓國內

---

12 參見鄭根植、鄭永信的〈東亞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連帶：韓國，日本，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為例〉，2009年12月那護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文。



形成了兩大對立的立場：一種觀點是如果停止對朝鮮的一切支援，可能會像 1990 年歐洲一樣，韓半島也會迎來冷戰／分裂的中止。與它對立的觀點是為了實現和平共存與未來的和平統一，經濟支援是必不可少的。

#### 四、結語

「戰後冷戰」是西方國家開始的。它能說明以德國為例的歐洲國家的分裂，但是無法充分說明以韓國為主的東亞。東亞的「戰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日本認為是 1945 年，但是對中國或韓國來說，最快也就是 1953 年，沖繩則是從 1945 年到現在。從韓半島與兩岸關係來看，戰後和平並未到來。戰爭一和平二分法與冷戰理論都無法充分說明東亞的情況。韓朝之間包括從 1953 年開始的各種心理戰，還有頻發的局部戰爭與游擊戰(2004 年雙方停止了心理戰，但最近有可能重新開始)。<sup>13</sup>短暫的和平是從 2000 年首腦會談開始，持續了幾年，又因為 2008 年朝鮮的核問題與韓國的保守派而結束。2000 年以後許多人都認為「反冷戰」是東亞發展的必然趨勢。2010 年初，人們還相信韓半島的休戰／分裂體系要轉變為和平體系，但是最近黃海海域發生的韓國海軍艦沉沒事件讓這樣的希望破滅了。對於韓國人來說中國慢慢的成為一百年前具有威脅的敗者並不是合作夥伴。

另外，隨著歐盟的發展與全球新自由主義政策出爐，許多專家認為東亞也要形成韓中日三國聯合的中樞。<sup>14</sup>如果要實現這樣的結構，東亞必須首先解決歷史遺留的問題，還有協調三者之間的利益。這個過

---

13 大田昌秀的沖繩戰下的心理戰研究對韓國戰爭及以後韓半島展開的心理戰研究有很大幫助。大田昌秀，2004，《沖繩戰下的米日心理作用》，岩波書店。

14 韓日東北亞知識份子連帶編，2004，《為了東北亞共同體：亞洲區域統合的夢想與現實》，東亞日報社；和田春樹(李元德譯)，2004，《東北亞共同的家園》，日照閣。

程涉及到未來的東亞是以韓中日三國關係為發展方向，還是以南北共存、沖繩與台灣自治為發展方向的問題。到底哪些是有利於東亞和平發展因素還需要更多的關注。

2010年8月，回顧100年前的韓國強制合併，或所謂叫併吞的強制殖民化，雖然為數不多，但是一些韓國與日本的進步人士正在為迎接真正的新時代準備著。目前，在沖繩島進行的美軍基地遷移與韓半島的統一問題息息相關。但是市民間的連帶並不像市民社會理論所說，已經可以影響整個國際關係的變化。「作為一種方法的沖繩」正是在這樣的角下具有其意義。

#### 參考文獻

- 南昌熙、宋永仙，《駐日美軍基地政策變化與對韓半島的影響：沖繩基地調整事例為例》，韓國國防研究，1998。
- 東亞和平人權韓國委員會（鄭根埴、夏宗文 責任編輯），《東亞近代暴力1：戰爭，冷戰與弱勢群體》，三印，2001。
- 東亞和平人權韓國委員會（鄭根埴、金夏林、金永毅 責任編輯），《東亞近代暴力2：國家暴力與傷痕》，三印，2001。
- 酒井直樹，《國民主義的詩藝》，創作與批評，2003。
- 朴勝俊，《韓國與中國100年》，耆婆郎，2010。
- 徐勝（金京子翻譯），《徐勝的獄中19年：人的心境是無法被鐵鏈栓綁》，歷史批評社，1999。
- 新崎盛暉（2005，鄭永信、宮內秋緒 共譯），《沖繩現代史》，論衡，2008。
- 孫歌，《叫亞洲的思維空間》，創作與批評，2003。
- 山寶信一，《幾個，同時啣個亞洲》，創作與批評，2003。
- 和田春樹（李元德譯），《東北亞共同的家園》，日照閣，2004。
- 汪暉，《想像新的亞洲》，創作與批評，2003。
- 鄭根埴、鄭永信的〈東亞和平運動的發展和連帶：韓國，日本，沖繩的反（美軍）基地運動為例〉，2009年12月那護國際學術會議發表文。
- 鄭文吉、白永瑞 外編，《東亞，問題與視覺》，文學與知性社，1995。
- 鄭文吉、白永瑞 外編，《東亞：作為一個發現》，文學與知性社，2000。
- 鄭文吉、白永瑞 外編，《周邊視角中的東亞》，文學與知性社，2004。

濟州四三研究所編，《東亞和平與人權》，歷史批評社，1999。

陳光興，《帝國之眼》，創作與批評，2003。

崔之元，《中國走向何方》，創作與批評，2003。

韓日東北亞知識份子連帶編，《為了東北亞共同體：亞洲區域統合的夢想與現實》，  
東亞日報社，2004。

徐勝 編，《東亞の冷戦と國家恐怖主義：米日中心の地域秩序の廢絶をめざして》，  
御茶の水書房，2004。

中野敏男 外編，《沖繩の占領と日本の復興》，青弓社，2006。

## 側讀《沖繩現代史》\*

陳光興\*\*

### Reading *Modern History of Okinawa*

by Kuan-Hsing CHEN

---

\* 本文初稿發表於2010年5月29日於沖繩大學舉辦之「在亞細亞質問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語版・韓國版刊行紀念會」。感謝若林千代與岡本由希子的邀約，新崎盛暉先生、仲里效、屋嘉比收、新城郁夫、阿部小涼、田仲康博、鄭根埴、孫歌、白永瑞、胡冬竹、丸川哲史、池上善彥等朋友們的對話與豐富的討論，讓我對「亞洲的沖繩」有了不同的認識。

\*\* 服務單位：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  
通訊地址：300 新竹市大學路1001號  
E-mail: chenkh@mail.nctu.edu.tw

## 一

活了半個世紀，終於有機會透過新崎盛暉的《沖繩現代史》（2010，北京：三聯），開始理解身旁鄰居二次戰後至今的狀況。這樣的延緩當然不是偶然的，活在亞洲／第三世界主導性的知識結構下，我們不是往遙遠的地方瞭望，就是只看自己的肚臍眼，總得有什麼新契機出現，才能讓我們正視早該進入視野、直接關連在一起的歷史經驗。

第一次來到沖繩的契機是在2000年，為了參加亞洲和平運動團體組織的活動，記憶中跟G7在此召開有關，除了會議、論壇之外，還有很難得的機會參訪沖繩戰役的遺跡、紀念館、受難者家屬住家至今的追悼方式，等等，對於戰爭造成沖繩人長期心靈的傷痛有了初步的體會。印象最深的當然是沖繩所孕育出厚實的、崇尚和平的反基地民間團體，閱讀新崎先生的《沖繩現代史》，讓原來片段的直接感受有了更為清晰的歷史軌跡。

2000年之後，慢慢結交到更多沖繩的朋友，無論是在沖繩、東京、首爾、還是台北，在跟他們的來往與交談中，讓我對沖繩有了更多知識情感的認識，總是想把當地的狀況讓外面更多朋友知道，有更多人可以一起來關注、理解沖繩的困境。十年之中做的實在有限，然而沖繩始終沒有從意識中散去，總想能多做些什麼。（心裡一直有一個幻想：如果許多亞洲的朋友們能夠放下身邊日常纏身的瑣事，花上一段時間一起來沖繩幫忙，相信有可能加速沖繩的變化。這樣幻想的基礎在於沖繩的反基地運動有基本的民間共識，如果能夠擴大區域與國際的連帶，基地的撤除不是沒有可能的。這樣的變化或許能成為一種催化劑，創造改變戰後東亞冷戰僵化狀態的新條件，所以沖繩問題是我們所有致力於亞洲連帶的人的共通關切。）

坦白說，作為一個對沖繩歷史沒有研究的人，對這本書基本上只

能抱著學習的態度，很難有深度的看法，所以只能從側面來閱讀，從長期生活在台灣的經驗，提出一些粗淺的反應。

## 二

《沖繩現代史》的作者新崎盛暉，是沖繩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196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後，隨即展開至今50年不斷對沖繩的研究與評論工作，前後出版超過40本書，所有現代沖繩歷史的研究都深受他的著作影響，除此之外，他持續在報刊發表文章參與／介入沖繩與日本社會。從1974年起任教沖繩大學，他在1983到1989、2001到2004年，兩度出任沖繩大學校長。半個世紀中，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他，積極參與沖繩的市民運動，擔任「沖繩和平市民聯絡會」、「絕不允許篡改憲法市民聯絡會」共同代表，並曾任沖繩代表性思想雜誌《返風》（けし風）的編輯代表。2006年日本和平學會授予他「第一屆日本和平學會獎」，被讚譽為「言論活動四十年的民眾伴跑者」，在沖繩與日本的民間與學界有非常高的聲望。

《沖繩現代史》不是一本容易閱讀的書，冷靜與耐力是作者寫作的基調，這個同樣的基調也在呼喚著讀者。新崎先生像是在跟我們以簡報的方式上課，幻燈片、圖表隨著一個一個事件閃過，極其簡要地分析了事件的發生。但是時間不夠，沒法發問，如果是活在未來e-book的世界裡，我猜想在每一個細節的點上，都可以有好多的延伸閱讀，透過電腦滑鼠連結到龐大的資料庫，慢慢告訴年輕讀者有關人民黨的來龍去脈，或是平良幸市辰雄的出身背景，甚至播放著1955年丐幫遊行大隊的記錄短片，特別是極為珍貴的1969年「二・四」鬥爭的反省內容。跟閱讀所有的「通史」一樣，想要更進入沖繩社會的肌理去感受生活主體的精神狀況，而又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是這本書對我這個外來讀者而言不好讀的主要原因，雖然翻譯者胡冬竹已經盡了她最大

的努力，幫讀者做了很多功課，在註腳中提供了很豐富的資訊，對這樣認真的譯者該表示高度的敬意。

就算是極為濃縮，讀者仍很難不被作者穩靜中流動的熱血澎湃所觸動，你清楚地知道作者在歷史的洪流中站在哪裡，你會隨著他在舉島上下的鬥爭中亢奮起來，也深刻感受到運動的分裂讓他扼腕心痛。期待有緣與此書見面的中文讀者，能夠慢慢體會新崎先生對沖繩的深情。

《沖繩現代史》由上下兩部構成，上部由1945年沖繩戰後開啟的美軍統治為起點，以1972年返還日本為終點，書寫的一條主線是「復歸」的思想與運動；下部是1972年至2005年，環繞著隨著內外情勢變動中的基地問題。整體而言，這本書讓我們看到的是60年來，在美國的世界軍事佈局與日本政府聯手下被壓制的沖繩，縱使內部不同力量複雜的盤算，沖繩人並沒有喪失主體性，在與外部的互動中，創造了戰後的歷史。在此過程當中，和平、反基地運動的香火從來沒有停過，雖然力量沒有能夠大到足以撼動國際強權的政治力量，卻不斷地再尋找新的路徑，向前行。

新崎先生在2010年中文版的序言中概括地指出，上部所體現的是統治者(美軍)與被統治的沖繩民眾之間的抗衡，下部看到的變化是美軍把有關基地的責任全部轉由日本政府來中介，政府以經濟利益為誘因收編反基地運動，但是放在世界的格局來看，沖繩「作為美國侵略亞洲的軍事據點這一性質來說，沒有任何改變」。所以說，「貫穿兩個時代，沖繩自始至終是日美同盟軍事上的根本。在這個意義上說，沖繩現代史，就是沖繩民眾與日美同盟鬥爭的歷史」(頁3)。正是在面對中文讀者時，新崎先生總結了他自己對沖繩現代史的看法，而作為中文的讀者，我們要如何把他語重心長的看法連接到自己的認知世界當中？

畢竟，美國對亞洲的侵略迫使我們看到，面對沖繩問題與我們住

在亞洲的人息息相關，不僅是當地人也該是我們共同關切的問題。戰後至今的歷史過程證實，沖繩基地的成立直接關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接踵而至的兩岸分隔，台海兩岸有任何風吹草動，一旦發生戰爭就直接影響到沖繩居民的安危；韓戰的發生與兩韓分斷，以及而後美國的全力投入越戰，還無須論及分擔了日本本土的大量軍事用地，這些都是戰後沖繩史的內在構成。所以沖繩是世界冷戰在亞洲的歷史產物，沖繩問題跟兩韓與兩岸問題一樣，意味著冷戰在亞洲沒有結束，也意味著亞洲思想界必須把這些看似孤立而又有內在聯繫的區塊，放在同一個問題意識中來理解。在這點上，韓國的思想界走在前方，他們90年代就已經提出，韓半島問題必須在區域內的多邊關係中尋求解決（我個人認為沖繩問題與台海問題更是如此），但是能夠有這樣超越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視野的形成，其實不單單只是對於客觀情勢的評估，也預設了提案主體的勇氣與心胸。

### 三

從台灣戰後經驗來讀《沖繩現代史》，很難不被感動的是前仆後繼一波波的民眾力量持續湧現，整體而言運動的韌性與強度是東亞世界民眾史上的資產，我個人認為這種精神不是所謂天生的民族性，而是在歷史過程中的學習。以1969年的「二·四」鬥爭為例，以撤除象徵基地的B52為抗爭焦點，將社會各種力量匯聚起來了，但是日美政府強力介入，強化美軍的鎮壓，雖然導致最後罷工體制分裂（頁190-197），最後居然還是有四萬五千人加入示威遊行；而運動的受挫反而造就反省的契機，不同的組織與個人都以「二·四」鬥爭為媒介，對於背後作為思想核心的復歸運動進行討論。在新崎簡短的分析中，我們看到沖繩的大小媒體發揮公共領域的平台作用，問題甚至深入指向個人自身的認同問題：「比如，在《琉球新報》的特輯〈對我來說本土是什麼〉的



系列報導中，作為高中教員的儀間進，對從受害者的立場告發祖國、向繁榮的祖國要求賠償的聲音越來越多的現象做出批評，主張『我們正應該與暗藏在沖繩的日本——連接著那樣的日本，一刀兩斷』(頁203)。這樣的反省機制在台灣的民主運動經驗中雖然存在，但通常在媒體掌握發言權的會是社會菁英；檢討會在運動團體的組織內部進行，但是團體與團體之間有芥蒂，很少有公開討論的空間。我猜想，沖繩民眾起起伏伏的運動能量能夠歷久不衰，應該與民眾「公開反省」文化的形成有關；能夠不斷認清事實的真相、認清自己心中的限制，才能不斷地調整、前進。這樣的公開反省機制，或許也迫使社運團體與政黨跨出組織本身的利害關係考慮問題。

我們看到不論在復歸或是反基地的核心問題上，所有大規模行動中都似乎出現社會團體與政黨的共同參與。我很想進一步理解沖繩民間社會團體與政黨的合作關係模式，因為在台灣一旦牽扯到政黨，一般社運團體都會很小心。台灣在1987年解嚴後，2000年民進黨上台前，大部分社運團體基本上的基調都是反對國民黨的，此時的民進黨地方政府跟社運團體早已開啟合作關係。到了民進黨上台，許多團體都基本上成為外圍團體，喪失自身的主體性，只有少數群體從90年代起就打出與政黨「等距外交」的原則，藉此保持團體的自主性。總之，運動團體與政黨的合作關係一直是被質疑的。

我們也許是在自己的脈絡中來美化沖繩民眾運動，似乎看到政黨基本上不敢太背離民意，如果真是如此，所反映的不僅是問題的迫切性足以克服常見的黨派性，也是社會有足夠的自主力量來制約政黨本身利益與政黨之間的鬥爭。台灣到目前為止的經驗是，政黨本身的內在邏輯形成彼此之間的惡性競爭，在兩次政權更替中，民間的自主力量在不斷茁壯，也在學習與認識如何與政黨保持距離，但是整體而言，力量沒有成長到足以主導政治的走向。

有關民間自主性團體與政黨政治歷史關係的問題，在東亞範圍內

是值得以相互參照的方式進行比較，我估計沖繩與日本本土的形式會不同，南韓與台灣的強度與深度也會有差異，把中國大陸帶進入討論也會出現不同的圖像。在世界的範圍內，以政黨政治為主導的民主方式已經面臨空前危機，東亞不同社會中是否出現了不同實踐的邏輯，特別是有關黨派反省機制的建立，這該是大家共同關切的議題。

## 四

閱讀《沖繩現代史》難以迴避的是認同問題，而認同永遠是變動的，歷史情勢的變化往往會牽動認同的轉化。復歸運動是本書前半部的主軸，從新崎先生極具張力的敘述中，我們體會到復歸日本是脫離軍事統治的手段，是對早期美軍作為解放軍形象破滅之後的調整。1956年以保衛土地為前導的運動將復歸思想帶入高潮，這或許是沖繩有史以來「主動、自發」向本土認同的大規模運動，以日本民族主義語言為口號。但是到了1960年艾森豪訪沖繩，復歸運動中慢慢出現異質的聲音，新崎以琉大學運代表人物中屋幸吉為例，說明以階級與國際主義來反對民族主義的復歸思想的出現。到了1969年佐藤一尼克森聯合聲明，在確認復歸的同時強化沖繩基地對美日安保的重要性，於是60年代初期復歸思想的情緒暗流浮上檯面，在70年代初期開始擴散(頁 216)。隨著1972年復歸後對種種措施的失望，對於日本的認同不斷表現出高度否定，新崎引用1985年文部省的調查，發現學校在畢業典禮時升起太陽旗的小學僅有6.9%、中學6.6%、高中0%；而齊唱《君之代》的在各級學校都是0%，他指出1960年代太陽旗是復歸運動的象徵，但至此時已完全逆轉。

從台灣戰後逐漸形成的省籍衝突與統獨矛盾經驗來看，民族與族群認同問題是極其複雜也具有爆炸性的，但是又不能閃躲，所以在分析時必須小心對待。作為外人，我們可以感受到沖繩與日本之間的認

同問題更是糾結，很難發言。然而新崎書中也不隱諱地提及，早在1947年沖繩人民黨就提出尋求沖繩民族解放的綱領，「表現沖繩獨立論的志向」(頁35)，我個人曾經閱讀到沖繩有「小國主義論」的提出，現在很希望對「反復歸」到「沖繩獨立」的不同光譜的思想立場能有進一步理解，其中的關鍵牽扯到學理上沖繩歷史定位的問題。戰後東亞區塊的民族獨立運動，基本上與歷史上的東亞「國際關係」重疊，也就是環繞著中華帝國的各個王國脫離朝貢關係成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包括越南、南北韓、日本、中國，而唯一的例外是沖繩。根據新崎先生的看法，沖繩歷史有其特性，它在古代形成的國家是在日本之外，有自己的語言、文化、生活方式，明代時琉球國接受冊封，而1879年的琉球處分，廢藩置縣，「在本質上只是為了確定日本國家領域的軍事，外交政策，琉球內部並不具備與其呼應的成熟條件，完全是在絕對武力恐嚇的背景下強制執行的」(頁23)。所以，歷史的來看，沖繩至今的地位是可以爭議的。

我期待進一步理解沖繩思想界的想法，也相信不容易有一致性的共識。特別是在二次戰後60年代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經驗中，我們看到以民族國家形式所進行的獨立運動也都問題多多，第三世界地區的共像是民族主義下的族群衝突，取代了殖民主義時期的種族歧視，因此許多地方的思想者都在質疑民族國家與殖民主義之間的歷史關係與連續性。在這樣的前提下，沖繩的現實是否能提供新的線索來思考更為寬廣的「自主」與「獨立」的相關問題，而不必然要以民族國家的形式作為想像的路徑。

我直覺的感受是沖繩似乎在走一條不同的路，在這條路上沖繩人已經表現出屬於他自己的主體意識，與台灣的不同在於，這個主體意識的構成中有強烈質疑美日強權的因子，不是以依附換取獨立，同時又具有和平主義的信念，反對窮兵黷武；最重要的是，沖繩尋求自主的道路是在與真實世界的協商關係中進行，沒有用理念的主觀主義去

壓倒妥協的必要性。這樣的路是艱難的，但卻是貼近真實的尊嚴之路。

## 五

《沖繩現代史》對日本戰後史提出極為尖銳的質問：在日本本土，一般的理解是戰後日本民主政治的基礎在於和平憲法，然而這樣的共識面臨的挑戰是：戰後沖繩處於軍事統治之下，根本沒有民主可言，所以沖繩存在的現實就像是人們想要割除的一塊多餘的肉，它的存在破壞了能夠進入戰後美好的自我想像，所以新崎先生說，「沖繩戰後史是映出日本戰後史虛幻結構的一面鏡子」(頁 6)，「沖繩戰後史是挑明日本戰後史矛盾的一把利刃」(頁 6)。其實沖繩的戰後史又何嘗不早已戳破了美國自由民主的氣球，只是軍政府的統治暴行沒有廣為人知，不只鄰近的台灣人至今沒有認識，美國本土的國民更只是把沖繩當成海外九百多個維護國家利益與世界安全的軍事基地之一，閃過了世界史上最為黑暗的一頁。(我一直認為，要迫使美國政府正視沖繩問題，民眾廣泛的理解最為關鍵，做為知識人，我們能做的是跟美國的學術思想界連結，透過教育散播知識。)

沖繩的存在當然不是為了揭穿軍事／帝國主義依然橫行的事實，但是卻逼問出世界現代史中無法規避的問題：民主主義與帝國主義之間到底存在著什麼樣的依存關係？戰後美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民主的象徵，在國內高舉民主旗幟，在沖繩實行反民主的軍事極權，是典型殖民主義的操作。1972年後，軍政府形式上隱藏到美日兩國政府的身後，改由國家站在前台繼續施展權力，而沖繩知事可以通過民主選舉的形式來更替，但是活在同一個島上的基地司令官的任命又有任何民主程序嗎？在自我聲稱是民主國家的內部逐漸形成了選舉式民主，然而一旦跨出國界，在以民族國家為基礎所構成的國際體系中，虛偽的

條約程序遮蔽了弱肉強食。沖繩的現代史因此質疑了這個世界已經進入民主時代的這種虛幻想像，迫使我們認真思考要創造什麼樣的條件，才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建立起相互制衡的民主機制。

在 *Asia as Method: towards Deimperialization* (2010) 一書中我曾經提過，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形成的聯合國，是一個形式主義的創造，其中缺少一個關鍵性的中介，也就是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世界區域，這些區域有其自身的歷史，內部有文化上的親近性，在經濟上是相互依存的有機體。區域性集團的出現，如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South Asian Association、African Union、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European Union，反映的是聯合國體制在設計與實踐上的不足。我個人認為區域性機制的形成，跟聯合國一樣不會是完美的設計，但目前是制衡強權的重要方式，可以被理解為把世界向前推進的一種方式。務實地來看，當民間缺乏能量形成以民眾為基礎的大規模區域連帶時，東亞共同體（乃至於亞洲共同體）該是我們樂觀其成的走向。雖然目前為止最大的危機在於民間團體沒有參與到此過程當中，扮演積極制衡官方的角色，但它一旦形成，會促進民間團體的互動，我們可以想像，如同區域性的工會組織會逐漸出現來促進各地的勞動條件一樣，反基地運動會更有條件跨出民族國家的界限形成區域連線。有了區域性的視角，《沖繩現代史》附錄中的民意調查會跨出沖繩與日本本土的範圍，或許會在韓半島執行，詢問南韓居民對沖繩美軍基地的評價，或許也就會間接促成對美軍基地遍佈韓國境內的反思。沖繩五十年來的反基地運動所累積的深厚經驗，應該會在區域連帶中產生積極的作用，各地之間如果能透過與外界互動的機會去打開、深化內部的自我認識，相信可以出現推動世界繼續前進的動力。

## 六

2010年2月，農曆新年後，為了籌辦年底東亞批判刊物會議，與《創作與批評》的編委李南周、《返風》編委若林千代、《現代思想》主編池上善彥、我個人代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和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以及兩位年輕同事林家瑄與蘇淑芬等人一同來到反共前哨站的軍事基地金門島。兩天之中，到處走走看看，進入身體記憶的是軍事化對峙的遺跡與去軍事化後重建的困難，感受最深的是那些紛紛從外地回到金門島有心做事的朋友們，試圖為自己家鄉的重建來努力，無論如何金門島已經在歷史進程當中形成它自身的主體性，當地的風土人情讓人忘返。用金門來對照沖繩當然是很不恰當的，但是畢竟金門有了先走一步的歷史經驗，給了我們想像未來沖繩去軍事化的身影，期待那個時刻的來臨意味著去軍事化已經是亞洲與世界無法逆轉的大勢。

（2010年5月）

## 後記：

五月底的沖繩行，對我個人有滿大的衝擊，沖繩雖小五臟俱全，思想界與運動界有著讓人欽羨的活力。到沖繩的第二天（5月28日）就碰上歷史上的大事：首相鳩山由紀夫宣佈競選政策跳票，無法使美軍基地撤出，引來大規模遊行抗議。我們這些被思想界找來參與沖繩問題亞洲區域化的外來者，目睹了憤怒、絕望而又繼續堅持的抗議活動。一週後鳩山引咎辭職下台，反應的是安保體制50年下來的固化，不是首相個人的意志力可以扭轉。諷刺的是，歐巴馬的諾貝爾和平獎得奠基在遍佈全球七百多個美軍基地之上，和平的前提是軍事力量！

當然，也因為鳩山的跳票，引來許多關心沖繩前途的人參與了5月29日的公開討論會。

記憶最為深刻的是新城郁夫的報告，他對1966年琉球大學學運領袖中屋幸吉年僅26歲自殺身亡後留下遺稿進行的分析，他以「客死故鄉」來概括中屋的精神狀態，對美日兩股力量如何使沖繩人的主體性為外力所附身，雖然活在家鄉，但是卻跟在家作客一般，產生無法自主的悲涼感，藉此理解青年知識份子結束生命的主因。新城的報告引來韓國朋友鄭根埴的悸動回應，韓半島在殖民時期與戰後美軍的介入經驗，充分體認外力附身、「客死故鄉」的主體狀況。新城與鄭根埴兩人之間「心與心」的對話，逼迫我們重新透視「亡國恨」的痛楚，也似乎找到新的分析語彙，更能貼近對於東亞殖民主體性的把握。

而與歷史學家屋嘉比收私底下的對話，更是發人深省，他說早在1930年代就有此一隱喻：按時序來說，沖繩是大兒子，台灣是次子，朝鮮是三子。當時就有作家藉此反省沖繩與日本的關係，這個殖民時期的說法，至今值得反覆思考其中的深意；沖繩、日本之間糾結、複雜的關係，看來必須多重層次地來解析，不是簡單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殖民關係就能夠充分解釋的。

回台後，沖繩行所刺激的思想不斷在凝聚，除了跟上「分斷文學：陳映真與黃皙暎」這門課的同學們討論之外，6月初在中研院召開的「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Asia」會議、6月中在香港嶺南大學開的「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Studies Crossroads Conference」，以及7月初在首爾聖公會大學的演講，在這些場合中，都利用機會以沖繩的問題意識為核心做報告，希望有更多人能關心美軍基地在亞洲造成的嚴重問題。

沖繩會後，我們跟新崎先生見了面，邀請他2010年11月訪台講學，他欣然允諾，說上次來台參加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會議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該來看看鄰居的變化。期待11月間，新崎先生的

來訪，能夠激起思想界更多對於沖繩的關注。

(2010年7月)

### 參考書目

- 孫歌(2010)，〈內在於沖繩的東亞戰後史〉，收入《沖繩現代史》，頁449-466，北京：三聯書店。
- 新崎盛暉(2010)，《沖繩現代史》，胡冬竹譯，北京：三聯書店。
- 新城郁夫(2010)，〈客死於故鄉——《中屋幸吉遺稿集 名字 站起來走！》中的沖繩反=戰後史〉(胡冬竹譯)，「在亞細亞質問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語版·韓國版刊行記念會」，5月28日準備會，沖繩大學。
- 鄭根埴(2010)，〈沖繩：一個研究方法〉，「在亞細亞質問沖繩現代史——新崎盛暉《沖繩現代史》中語版·韓國版刊行記念會」，5月29日，沖繩大學。
- Kuan-Hsing Chen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 送別溝口雄三先生

(1932-7-30 ~ 2010-7-13)

孫歌\*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izoguchi Yuzo

by SUN Ge

---

服務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通訊地址：北京市建國門內大街5號

E-mail: sungesg@gmail.com

溝口雄三先生走了。他走得過於匆忙，來不及道別，也來不及讓我們為他送行。

接到訃告，是在7月13日的中午時分。我在研究所打開電子郵箱，發現了一封來自東京友人的簡短郵件。他告訴我，溝口先生於當日凌晨突然辭世，沒有任何具體的說明。我在震動的同時，也從這簡短的資訊中體會到了對方所感受的震動，顯然，日本的友人也同樣沒有思想準備——就在一個月之前，我造訪東京時聽說溝口先生身體欠佳，還在跟他商量什麼時候一起去探望合適，那時他說還是先不叨擾為好，讓老先生靜養一下吧。我們都確信溝口先生能夠渡過暫時的困難，重新笑咪咪地回到我們中間——誰能料到事情竟會是這樣！

那天之後的一個星期裏，我陸續收到了來自不同人的訃告。在最初的震動和拒絕這一消息的本能反應過去之後，我漸漸地接受了這個沉痛的事實：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溝口先生了。我幾乎沒有興趣打聽他離去的原因，因為比起這個事實來，他患了什麼病、如何離開人世之類的臨終資訊實在是微不足道了。

我的書桌上還擺著沒有校閱完畢的溝口文集譯稿，三聯書店為了讓讀者更多瞭解溝口先生的著述，計畫推出他著作的譯本和重譯本，出版一套《溝口雄三文集》。台灣的陳光興教授來信說，馬上要出版溝口先生在台灣的講演集，沒有想到出版紀念會也要同時開成悼念追思會了。他同時也轉達了幾位台灣學人的哀悼。北京的幾位朋友在互相商量，要為溝口先生做點什麼，不只一個報刊的編輯立即開始組稿報導此事。還沒有擺脫震驚和悲痛，我飛到韓國去參加會議，接風的晚宴上，韓國的幾位朋友也面色沉重地談起了溝口先生，流露出真摯的哀悼之情。延世大學的中國史學者白永瑞教授提議說，應該搞一個東亞地區的紀念出版計畫。溝口先生的離去，在東亞學人中引起的靜悄悄的震動，並不顯眼卻是真實的、深刻的。

因為溝口先生一直是《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編委會的國際顧問，台

社約我寫一篇悼念的文章，從未寫過悼詞的我，面對電腦感到躊躇。在這個已經沒有了溝口先生的世界上，如何表述懷念與追思呢？

我並非中國思想史學者。對於溝口先生的研究領域，我是門外漢。與溝口先生相識多年，真正與他共事的，只是組織一場長達六年的中國與日本學者的對話活動，這個活動被命名為「知識共同體」。在這六年之中，我和我的朋友們近距離地體會到了一位耿直、執拗的日本知識份子如何頑強地探索日本與東亞鄰國和解的民間途徑，如何以知識的方式為那一場災難性的戰爭承擔責任。從溝口先生那裏，我學習到了在這個魚龍混雜的世界上作為個體如何堅持，如何自律，如何負責任。這位嚴厲正直的長者贏得了我們大家的尊重，就連我的幾位對日本缺少好感的朋友也對他懷有發自內心的親近之情。

作為一個外行，我沒有能力對溝口先生的學術正面進行討論，事實上，我也儘量避免這樣做。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我對溝口先生的敬意卻並非僅僅出自他在組織知識共同體對話過程中的無私投入和巨大的人格感召力。儘管這個過程已經讓我學到了很多，但更讓我折服的是他的作品世界。作為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當我帶著自己研究中的困惑閱讀溝口著作的時候，我跨過了我不熟悉的史料和溝口的對話語境，被溝口獨特的「結構意識」深深地吸引。那是一種幾乎接近於本能的、以經驗研究的方式呈現的理論洞察力，這種洞察力並不憑藉理論表述，而是借助於設定問題、運籌問題的方式暗示著它的存在。或許正是由於這種洞察力的存在，使得我可以跨越外行的閱讀障礙，被溝口的研究所吸引，也使我產生了有別於知識共同體活動時的另一種深深的敬意。同樣出於這種敬意，儘管我不是寫作下面這些內容的合適人選，我仍然甘願不揣淺陋，做一件專業人士決不會做的事情，以外行的方式斗膽談談我所閱讀的溝口學術，以祭奠這位具有創造力的學術前輩。如果本文可以拋磚引玉地引來有專業修養的學者對於溝口學術的闡釋，那將是我最為期待的。

## 一

作為日本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專家，溝口雄三先生一生留下了多彩的業績。他1932年出生於日本名古屋，先後就讀於東京大學文學部和名古屋大學大學院，曾經師從著名漢學家入矢義高。他的處女作《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日文版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出版於1980年，這本並不按照常規寫作因而有些難讀的著作雖然沒有引起他後來著述那麼廣泛的反響，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他關於中國思想史內在機理的結構性思考，他對於思想觀念的歷史性和狀況性解讀，更重要的是，他為思想史研究注入的具有高度人文精神的洞察力，都在這本著作中集中地呈現出來，這些構成溝口學術的基本品質，不是作為結論和觀點，而是作為看問題的視角，作為推進問題的方式，潛在於他整個的分析論述過程。

我和幾位朋友有幸親耳聽到溝口先生講述他寫作這本書的動機和經過。當他還是一個碩士研究生的時候，開始對李卓吾發生了興趣。他閱讀了當時日本漢學界對李卓吾的研究之後，詢問指導教授入矢義高，如果研究李卓吾，應該讀些什麼。入矢的回答是：當然是李卓吾的原著。於是溝口買來了當時能夠買到的李卓吾的原著，開始日以繼夜地攻讀。為了準確地理解李卓吾，他甚至逐字逐句地翻譯了《焚書》。

沉潛於李卓吾的結果，使溝口對日本漢學界前輩的李卓吾研究發生了懷疑。他發現，這些便於理解的李卓吾研究，基本上依靠的是在日本學界通行無阻的西方現代性理論，它們可以很快被讀者接受，卻似乎並不能有效地解釋他在閱讀中所看到的那個李卓吾的思想世界。僅僅從這個樸素的懷疑出發，他開始了自己的學術旅程。

在溝口先生學術生涯的起點上，日本中國學界已經有了相當豐碩的成果。不僅老一代支那學家和東洋學家例如內藤湖南、津田左右吉

等巨匠留下了寶貴的學術資源，而且新興的中國學領域裏也有諸如島田虔次、荒木見悟等上一代中國學大家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對於近代以來的日本中國研究而言，一個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確認中國的「近代」。特別是戰後日本的史學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中國學家大多傾向於認同「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這樣一種時代區分圖式，同時也自覺面對打破亞細亞停滯論的思想課題，試圖找到東亞歷史發展的軌跡。溝口的上一代中國學家為了突破亞細亞停滯論，已經致力於論述中國的歷史獨特性，建立有別於西方的歷史敘述模式；例如島田虔次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不但自覺地拒絕以歐洲概念來理解中國歷史，而且試圖勾勒中國思想史的體系性。溝口在繼承這樣的學術傳統的意義上，通過對島田的下述質疑，繼承並且修正了島田所代表的中國學傳統：

第一，他指出島田雖強調不同於歐洲歷史的中國歷史獨特性，卻缺少通過中國歷史看到歐洲歷史獨特性的眼光。這使得他在追求中國歷史體系性論述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認為其中的思想因素是片斷的、扭曲的、駁雜的。溝口指出，如果立足於中國觀察歐洲歷史的獨特性，那麼後者按照中國的標準也同樣是片斷的、扭曲的和駁雜的。這個溝口在80年代初期未及展開的重要認識論命題，後來以更為簡潔的方式在《作為方法的中國》中被表述為「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這也正是打破在無意識中一直支配著學界的「世界等於西方」的潛規則，建立使東方和西方世界同時構成世界史一部分的結構感覺。

第二，他指出了在島田中國思想史研究中所依賴的概念和思路其實並沒有擺脫西方特徵，甚至依賴的是明治之後日本接受西方思想過程中形成的概念內容。這些認識論的特徵並不僅僅表現在單獨的概念上，更表現在諸種概念之間的關係上。例如對於中國近代解釋中依賴的天理與人欲的對立、外在規範與內在人性自然的對立、社會的公與個人的私的對立等等。正是因為受制於這些來自歐洲市民社會的概念

之間的關係約束力，使得關於中國的歷史論述無法擺脫歐洲式的價值判斷，也由此產生了島田對於李卓吾「童心」說的西方式解讀。

第三，溝口對於日本既定的陽明學評價進行了質疑。在寫作這部著作的時候，他面對的陽明學評價基本是對於朱子學在封建末期的解體進行的重新整合，而這種觀點又進一步導致了認為陽明學在明末清初遭遇挫折、中國思想史就此凍結的結論。

第四，溝口對於思想史研究中把明末清初視為一個終結點，把清朝視為黑暗時代的認識提出了質疑。在大量準確閱讀一手史料的基礎上，他試圖通過尋找明末思想特別是陽明學在清朝的轉型方式等研究，論述明清作為中國前近代歷史中富於變化的轉折時期的內在脈動。對於清代歷史的重新認識，由此也暗含了對於日本中國學傳統中表面化地接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反禮教結論這一「傳統」的挑戰。<sup>1</sup>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把李卓吾作為一個論述的中心點，從這樣一個並未製造有效概念的思想人物入手來討論中國前近代轉折期，並通過他導引出一系列重大的概念，是一個很特別的方式。我不能判斷這個方式的真意何在，也不瞭解中國思想史研究領域如何評價，但是我確實從中感受到了非常多的啟發：把這樣一個並非創造了關鍵概念的思想人物（溝口甚至強調說李卓吾因此很難被稱為思想家）作為討論歷史結構的出發點，除了李卓吾的思考本身對於溝口學術的重要性之外，我覺得這至少意味著溝口學術的結構並不僅僅是一個觀念的結構，它包含了那些糾結不休無法通過邏輯推論加以表述的歷史特質。溝口在學術的起點上就清楚地顯示了，如果思想史不是僅僅依靠概念演繹來寫作的話，它需要謹慎地關注那些混亂乃至混沌的歷史要素，並找到一種有效地處理它們的方式。這種方式，正如後來溝口在自己

---

1 上述溝口的質疑請參照《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序章，中華書局1997，27-48頁。因三聯書店計畫重新校訂此書後重新出版，為避免混亂，在此姑且對舊有譯文不做改動，以下引用全部從舊譯。

的研究中展示的那樣，是不拘泥於概念表面的統一性，而是尋找它們內在的關聯的方式；不言而喻，在今天學界已經習慣於用定義來理解概念的情況下，這樣的操作難度是非常大的。

溝口把李卓吾的「不容已」作為一個關鍵的環節引入了論述。他說，所謂「不容已」，「就是在人情的深層衝動中，在其原初態中，觀察人的自然，在這一點上，把無作意的自然態看作本來性」<sup>2</sup>並強調說，李卓吾與耿定向在對於「不容已」的爭執中表現出來的分歧，並不應視為人的立場與綱常的立場的對立，而應該視為追求生命亦即人的自然實存秩序的不同方式。他指出李卓吾的特殊之處在於他追求「只存在於赤裸裸的人中的自然本來的真實的綱常」<sup>3</sup>耿氏則使四端之心和色欲相近到毫髮之隔的地步，因而走到了綱常的極限。進而，溝口指出：李卓吾「他的異端的自覺，孤絕的自覺，不是由於他脫離了世間法，反而是由於他最真摯地要在世間法中活下去。由於生活於世間法中的矛盾呈現在自己身上，加之自己的創傷的痛覺，他的這個自覺就更加敏銳了吧。」<sup>4</sup>這個悖論的視角，恐怕是溝口執著於李卓吾的最大原因。我猜測，他大概在這個時刻已經預知了自己將要建構的那個中國思想結構內在「基體」的性格了吧。

溝口對李卓吾「不容已」的現世性和無善無跡特性的闡釋，把論述導向了「穿衣吃飯之理」這一以人欲為原點的「形而下」的天理。在第二章《理觀的再生——從「無」向「真」》中，溝口一氣呵成地論述了中國思想史在明代中後期所完成的巨大轉換，以及李卓吾在這個思想轉換中的歷史功能。

溝口指出，陽明學在明末已經不能充分把握這一時代，這是因為里甲專制秩序的崩潰和由此而來的鄉村制度再建的過程，要求著與此

2 同上，79頁。

3 同上，85頁。

4 同上，86頁。

相應的新的思想觀念。李卓吾正是適應了這個時代又超越了這個時代的思想人物。與陽明學說中「滿街皆聖人」中以良知或者定質的善為標準的命題相對，李卓吾的聖人觀則強調善不是定質的，因而無善。這種無善之善是普遍具體存在的「不容已」，它的普遍性不是抽象而來的超越之物，而是體現為個別的當下的、但卻是人人都具有的「不容已」的狀態，這樣的普遍性境界也就是不自以為聖的真聖人狀態，用王龍溪的話說，就是不能以己為是以人為不是，以「有我」來區分我和人，居高臨下地以秩序倫理強加於人。因此，李卓吾才能夠提出「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為公」<sup>5</sup>這樣一個有關於公·私的命題。這個命題與日後黃宗羲對於民之私的討論有著潛在的聯繫。

我不知道溝口出於什麼考慮沒有如同很多儒學研究家那樣僅僅依靠中國思想人物本身的語彙，卻在關鍵的分析中頻繁地使用了「普遍性」這樣一個用語。但是至少可以判斷的是，在他使用這個詞細緻地論述「無善無惡」、「無人無我」、「無聖無邇」這些李卓吾的「真空」觀念的時候，在客觀上他是在使今天學界約定俗成的「普遍性」感覺相對化。溝口在「從無向真」的過程中重新定義「普遍性」這個被學界抽象化和定質化的西方式概念，讓它在王陽明、王龍溪、李卓吾的思辨世界中獲得個別性和「人人性」，並在這形而下的人人性之中一步步地瓦解既定的「超越之理」，建立與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天人分裂」和「個體的自由權利」相對的、包含了欲望的天理，同時也建立以調和為前提的自然法。正因為使用了「普遍性」這個詞，溝口更有效地表達了他的世界史視野：來自西歐的「普遍性」概念只表達了一類闡述近代的思路，它與中國思想史中的「普遍性」相對，也是個別性的。當溝口使用這個詞的時候，他其實也把自己從中國特殊論者或者文化本質主義者中區別出來了。「普遍性」在此並不僅僅是一個概念，它體現著一種視野，這個

---

5 同上，136頁。



視野後來在他的《作為方法的中國》中得到了更多的闡釋。

《理觀的再生——從「無」向「真」》這一章最後有一個附錄，專門討論李卓吾的《童心說》。這是一篇需要謹慎對待的獨立論文，它的難解之處在於溝口並不是把「童心說」簡單地視為與六經、語、孟等「道理」相對抗的對立命題，更不是自由人格的根據。溝口強調說，這個有別於「真心」、「赤子之心」的「童心」固然是李卓吾自家性命的下落之處，但它卻是「胡然而遽失」的，具有轉瞬即逝的特徵，因而只能是一個不定之定點。由此，童心說不可能成為實在的落腳點，更談不上是打倒既成權威的堡壘。正如他對標榜不容己之本心的耿定向嚴厲批判的那樣，有目的地設定「本心」就已是作偽了，「童心」是李卓吾求道的足跡，他借此不斷追問那個「不容己」本心的內容，這不但使他的性命不會得到安歇，而且使他不曾以此為根據立論。

李卓吾的拒絕立論（也就是說他不肯把他的具體主張諸如「穿衣吃飯」等作為思想的落腳點），被溝口作為他區別於其他思想家的基本特質。溝口進一步指出，正是這一「拒絕立論」的思想姿態，使得李卓吾得以代表了明末的現實。他稱這一現實為「混沌的動相」。溝口承認「童心說」之於李卓吾的重要，卻不同意不加任何注釋地把它視為李卓吾思想的核心，這是因為將其視為李卓吾思想的核心會在思維方式上無視「童心說」的「不定之定」這一特性，從而把它確定化，甚至簡化為「主張個體自由」，造成誤讀。溝口的這一堅持，不僅僅是貼近了李卓吾的李卓吾式解讀，更重要的是，它體現了溝口對於中國明末清初這個無法被西方現代性理論簡單肢解的歷史巨大轉變時期的動態觀察和思考。他之所以選擇了李卓吾，正是因為他希望建構切合這個混沌歷史的普遍性敘述。而且似乎問題還不止於此。我所閱讀的溝口著述中貫穿著一種明顯的「得魚忘筌」的態度，他似乎並不太在意自己所提出的那些概念本身是否政治正確，也不太在意自己建構起來的這個關於中國的解釋是否具有「體系性」，他急切地追蹤的是一種對於中國歷史

的有效解釋，這追蹤似乎讓他無法安頓。尤其是在他後期著作中，這種無法安頓的感覺尤其強烈。只是在這篇關於《童心說》的附錄中，我找到了理解溝口這種態度的線索，或許，這正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史家面對歷史時的「不容已」境界吧。

## 二

明末清初中國思想史的巨大轉換，與中國鄉村社會的巨大轉換直接關聯。溝口對李卓吾的細緻解讀，當然並不僅僅是思想認識論的梳理，他關注的是歷史在思想人物的思考中的走向。溝口明確地指出了李卓吾的政治性，特別強調了他的無善無惡並非是對善的否定，而僅僅是對於居高臨下的抽象的「善」的否定，因而是「至善」，只有這種至善才真正能夠存在於民眾之中；而他對欲望的強調也並非鼓吹放縱欲望。正如他晚年嚴苛律己的個人生活所顯示的那樣，他僅僅是在原理上說明社會人所必然具有的欲望的真實性，並試圖在這一種混沌的「理的自用相」上確立政治治理的重點。溝口認為李卓吾的無人無己是一種萬物一體的政治觀，它把聖人、君主引入民眾的混沌之中去，重新闡釋了封建身份制度之下的支配與被支配關係，重新建立了「兵食」與「人人」之私的關係。李卓吾並非近代意義上的反封建政治思想家，但是他卻在封建統治身份秩序的邏輯中嵌入了民眾的人倫物理。李卓吾提供了一種以萬物一體的天觀為背景的公·私關係理解，它不僅不同於西方近代意義上的公私觀念，甚至也相同於他的時代的其他中國思想家。這是因為他的形而下人人的客在性格，通過真正的形而下視角得到了堅持，並通過「胡然而遽失」的方式成為了一個定點。

溝口強調李卓吾思想的這種「不定之定」絕非故弄玄虛，這與他對明清之際具體思想論爭的定位以及明中葉到清中葉三百多年歷史的思想傳承方式的構想直接相關。溝口給出的歷史思想圖譜與眾不同，他

不過分重視思想史中的對立，尤其拒絕強化對立而使其定格為某種觀念，卻強調論爭在歷史脈絡中的走向，以及它的後續歷史效應。正是在這個視野裏，他處理了東林派對李卓吾的批判，強調這個批判表面的對立與內在的一致性，更強調了清代批判李卓吾的思想家們對李卓吾實質上的繼承。

《明末清初的繼承和曲折》這一章非常耐人尋味。溝口把李卓吾去世之後所發生的東林派人士對他的彈劾作為重要的思想史線索，通過東林派對李卓吾毫無理解因而絕非公正的批判，鉤沉一個重要的歷史脈絡：為什麼並未肯定無限制縱欲、而且試圖通過「率性之真，推而擴之，與天下為公」的論述建立新的「公」觀念的李卓吾，會被在大的脈絡裏具有相近思想取向的東林派視為大敵？這中間，除掉顯而易見的一些要素（例如李卓吾的論述有可能引發社會上的思想混亂和道德淪喪、李卓吾未能完成從欲即理的論述向「公」的內涵的論述的真正過渡等等）之外，是否還有更深刻的歷史原因？

溝口指出了這個歷史原因。東林派把李卓吾視為異端，根本的原因在於兩種政治構圖之間的對立。前者是富民主導型的鄉村共同體構想，而後者則是以國家共同體中民的欲望為主體、以里甲制為框架的政治改革構想。但是在這裏，溝口對於兩者的政治邊界又各自進行了一個細緻的甄別。他分析東林派的政治構想時說：「他們不是要突破由於皇帝一元專制的強化而產生的皇帝方面的危機，而是以擁護鄉村、城市的富民的權益為第一義，要突破富民方面的危機。」<sup>6</sup>這個饒有興味的甄別與他對東林派批判李卓吾無善無惡思想的分析相映成趣，體現了溝口特有的分寸感。他在談到顧憲成與馮琦標榜反無善無惡時分析說：這是「為了摘除混雜在無善無惡思想中的李卓吾要素，反過來說就是由於李卓吾要素混雜其中，所以要提出反對無善無惡說，而不是

---

6 同上，223頁。

全般排斥無善無惡派。」<sup>7</sup>由此可見，溝口強調的是東林派人士對於皇權專制危機的漠視和富民危機的重視，他們對抗皇權一元化專制的真正用意不是取消皇權或取代皇權，而是為富民階層打開新的政治空間，也就是建立一種具有富民階層分權性質的「中央集權」體制。這個基本結構與後來的清朝富民之間以及富民與貧民之間的矛盾取代民與皇帝之間的矛盾這一歷史發展走向之間有著潛在的聯繫，溝口也由此解釋了為什麼黃宗羲之後沒有出現第二第三個撰寫新的《明夷待訪錄》以批判皇權專制的黃宗羲；這不意味著中國因此失掉了民本主義，而是由於黃宗羲從一開始就不同於西方的盧梭，他的目標並非是推翻皇權或者維護皇權，而是在皇權體制內強化「自私自利」之民的自主權。因此，事實上第二個第三個黃宗羲出現了，只是由於清朝政府採取了接近於他們需求的政治治理方案，他們便不再把對抗君主作為首要目標，而把關注點轉向了更為突出的「民」內部的衝突與矛盾。這個分析與日後溝口對於辛亥革命性質的論述有著內在關聯，他不認可把辛亥革命定義為一次「不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因為他不能夠接受無視歷史脈絡的邏輯推演。顯然，這一論述的脈絡是無法整合到近代西方的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社會或者市民社會理論中去的。

在分析李卓吾的政治構想時，溝口指出的是，他認為只要使民眾生活充足，民眾就能進行自衛，振興人倫；否則只講人倫就是本末倒置。他的《兵食論》是最先看到了皇帝與民的緊張關係，並試圖找到解決的辦法，因此李卓吾的看法是正視現實而且不免帶有功利性的。他否定了自上而下強加給民的「吾之條理」，但同時也期待能夠順應民意的君主出現；這樣的政治構想固然是舊式的，但是由於它具有真正的民本位的性質，溝口認為他比東林派的政治觀領先了一步。<sup>8</sup>

基於上述分析，溝口提出了一個具有想像力的命題：明末清初三

---

7 同上，212頁。

8 同上，224頁。

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王船山，儘管各自都對李卓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但是他們卻在實質上繼承了李卓吾童心說的理念。<sup>9</sup>也正是在這一視點的延長線上，溝口專門討論了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指出它並非是一個主張民權的文本，而梁啟超、陳天華過於執著於自己的民權思想，把它視為反君主制的民權宣言，這導致了他們無法發現黃宗羲思想在後來的歷史中如何被繼承，反倒為沒有出現第二個第三個黃宗羲而焦躁不安。

在溝口的視野裏，黃宗羲力主民的自私自利，為此甚至發出「向使無君」的呼聲；但是他質疑的是為君之道，並非君的存在本身，換言之，他反君主卻並不反君主制。就制度而言，他反對的是明朝的里甲專制，而非一般性的君主專制。因此，溝口認為黃宗羲代表的是一種體制內的立場，是從君民一元性的專制邁向富民分權性專制的思想。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溝口為明代中葉到清代中葉的中國思想史水脈開掘了一條隱在的通路：這是從陽明學的滿街皆聖人到李卓吾的不容已的民眾觀到東林派的鄉村共同體秩序再整編，再到《明夷待訪錄》的富民分權，這一思想水脈以不斷否定的方式綿延不絕地傳承，構成了中國前近代的「曲折與發展」。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雖然引起了國際漢學界中關注同類問題的專家的重視，卻似乎並不是學術暢銷書。這當然首先是因為它的深度學術性格把大量未受過專業訓練的讀者擋在了門外，但是這原因應該是次要的。我猜想真正的原因在於這本書在事實上構成了對於強大的現行知識模式的挑戰：相對於在西方理論視野的基礎上建構東方歷史圖景的操作方式，溝口的思想史研究並不按照西方式近代的「自我」和「自由意志」的價值體系解釋李卓吾和他的時代，它試圖打造一個對於西方現代性價值體系而言難以理解的學術範式。而同時，它所具有

9 同上，228-229頁。

的打破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歷史思維(這一點通過他討論李卓吾不立論的思想品格以及他的批判者在事實上對他思想的繼承關係等等視角可以充分地感知到)也並不依賴通俗易懂的「反西方」思想模式,在它的論述結構裏,強調中國歷史邏輯的獨特性並非遵照「與西方相對」這一標準,它有時與西方的某些觀念相關或者相對,但更多的時候它並不與其形成對照乃至對峙。深深浸潤於李卓吾思想營養的溝口雄三,雖然有時會談談學界是如何因為西方化而犧牲了中國歷史的內在邏輯,但這談論似乎與他筆下李卓吾的「童心」相似,並非他安身立命之處,只是他求道的足跡而已。應該說,溝口追蹤的是一個更為本色的問題:中國思想到底是如何表現在它的思想家的論述中的?這些論述與同時代的歷史脈動又有什麼關係?

正是在這個難以歸類的視野裏,日後溝口不斷強調的「空著兩手進入歷史」的認識論得以充分地體現。這是一個非常難以通過語言的闡釋得到準確表述的思考過程,或許只有如同溝口一樣曾經沉潛在李卓吾的世界裏的學者,才能體會它最本真的意義。我僅僅從自己從事的日本思想史研究體驗出發,試圖間接地理解這一認識論的重要性:它意味著研究者在進入史料的時候「不帶武器」,也就是不帶既定的觀念、價值觀甚至思路,同時要在這種「空手」的狀態下誠實地面對「史料的反抗」,亦即正視那些與自己的問題意識不相吻合甚至破壞自己問題意識的史料要素,並力求在不斷修改甚至推翻自身問題意識的過程中找到進入那些互相矛盾的史料內部的途徑,並力求建構解釋的結構。借用日本思想史學者丸山真男的話說,這是一種「充滿了辯證法式的緊張」的操作方式:這意味著思想史家在被歷史所制約的同時,主體性地建構歷史對象<sup>10</sup>。在我看來,溝口先生給出了一個表率,他證明了在面對史料的時候「虛懷若谷」和「決不束手就擒」是可以同時做到的。而他

10 丸山真男:〈關於思想史的思想方式〉,《丸山真男集》第九卷,岩波書店1990年,72頁。

做到這一點，卻是因為對於李卓吾的深度沉潛，我相信這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在他進入李卓吾思想世界的同時，他也通過建構李卓吾的思想世界獲得了他自身的視野與方法。

在《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溝口先生涉及了一些他後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關鍵環節。這些環節在其後發展為他的具體研究，並進一步擴展為他對中國思想「基體」的結構性討論。我並沒有閱讀溝口先生的全部著作，況且也缺少必要的專業訓練，因此沒有能力對他的這個結構性討論的意義進行整體的正面論述；我只能限於從我所閱讀到的有限著述中，跟隨著溝口先生在推進問題時表達的思路，推測他的結構意識，並僅止於談談這個結構本身。

### 三

與通常的使用理論表述結構設想並完成體系性論述的方式不同，溝口是用具體的經驗研究推進他的結構性思考的。但與一般經驗研究局限於一點或者泛泛而論地隨自然時間敘述不同，溝口在長時段的歷史時間中挑選了若干個關鍵時刻作為著眼點，並對這些點上的問題進行深入開掘，這些點之間的內在聯繫構成了他所思考的中國思想史的結構，它們相互纏繞、糾結，溝口把這種關係稱之為中國歷史的「基體」，卻基本上不把重點放在對於「基體」的正面論述上。他最下功夫的是深入展開他所開掘的若干問題群，這些問題群透射著中國思想史的關節點，而這些關節點均處在歷史劇烈變動的時期，因此可以說，溝口是在研究這些問題群高度變動的脈絡及其內在動力。可以說，在《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一書中，這些問題群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呈現了。我希望指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李卓吾的「童心」作為思想史的認識論，一直貫穿著溝口關於「基體」構成要素的討論，這個「基體」不僅是動態的，而且具有他筆下的李卓吾在突破明末即成思潮時鏗而不捨

追求真實的特性：溝口指出：李卓吾並非把「穿衣吃飯」「私」等等作為自己立論的確定之陣，並據守這個陣地以展開進一步論述，它們對他而言是終其一生窮盡了所有嘗試之後出現的結果，對他而言，除此之外無路可走。<sup>11</sup>我覺得這個耐人尋味的甄別也是溝口的夫子自道，「基體」既不是他設定的目標，也不是他的「立論」，它不過是他突破學界既定思維模式時上下求索的足跡而已。而且，我相信溝口也是「除此之外無路可走」的。

如果做一個粗略的分類，溝口留下的數量眾多的研究成果大體上可以分為「原理研究」與「經驗研究」這兩部分。前者至少包括了他對於中國儒學發展歷史脈絡的梳理和對中國哲學思想關鍵概念的思想史解讀，後者則包括了他對明清思想乃至民初思想的社會史和思想史解讀，特別是對於這個時期中國社會內在轉型的脈絡進行了深度的闡釋。二者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雖然尚未精細化，但是已經具有明確輪廓的結構性設想——溝口試圖追問的問題是，通過這一結構性設想，是否可以相對有效地解釋中國近現代歷史的基本特質？因此，他的原理研究支撐了經驗研究的思路，而經驗研究又反過來豐富了原理研究的部分，這使他的文字世界構成一個具有緊密內在關聯的有機結構。

《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有兩章篇幅是討論中國思想史中「理」的觀念在清代前期是如何重新確立、朱子的自然法思想是如何演變的。這條線索佔據了後來溝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以及他的相關學術活動的重要位置。溝口著述中最為精彩的一部分是他對中國哲學史中的一些關鍵概念的思想史研究，換言之，他不僅從哲學意義上梳理這些關鍵的觀念，還在思想史意義上討論它們的歷史定位以及傳承關係。這些研究自1987年後陸續發表在雜誌或者合作研究項目的論文集之中，在日本尚未獨立結集出版，中文翻譯也很有限。其大致的範圍是

---

11 參見上書，149頁。



研究中國思想史上的「天」、「理」、「自然」、「道」、「心」等觀念，並進而討論「理氣論」、「天理觀」、「天人合一」等等中國原理的形成過程。溝口原來計畫再補充一兩篇論文並從整體上進行修改之後再結集出版，可是這個計畫永遠無法實現了。

這部分論文我未及全部閱讀，而且也缺少判斷的眼光，在此只舉一篇論文為例。這篇論文是溝口在1990年代初期組織的大型合作研究專案《在亞洲思考》的成果之一，關於這個項目，我曾經在十幾年之前寫過書評，在此不再贅述；<sup>12</sup>需要補充的是，我直到今天重新閱讀溝口的著作之時，才真正意識到這個項目與溝口學術關懷之間的關係：他在最初的處女作中已經明確地顯示了他的思想史研究對於中國前近代時期經濟、社會和自然法的關懷，而這些領域的研究超越了他個人的學術範圍，他需要合作者。雖然這個七卷本的研究合集未必按照他的思想理路結構，其中有些部分甚至與他的視角相齟齬，但是這個集合了當時頂尖學者的團隊的討論和寫作，顯然給溝口其後的研究帶來了不少新的線索。

發表在這個系列論文集第七卷的《中國理氣論的形成》，是一篇高濃度的論文。它試圖梳理中國思想史中「理」和「氣」的哲學觀念在歷史沿革過程中如何發展變化，又如何宋代由朱子完成了從「天譴」到「天理」的轉換，從而產生了「理氣論」的思想史脈絡，對於完全沒有進行過相關研究的我來說，概述這篇論文是沒有意義的，但是我仍然希望可以冒著犯常識性錯誤的危險指出一個基本的問題：這篇論文以具體的研究實例挑戰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通行的規則：哲學命題是具有超越一時一地性的普遍命題。

---

12 參見《求錯集》，三聯書店1998年。今天讀來，當年所寫的三篇書評都是令我汗顏的幼稚之作，其中很多判斷今天看來都是粗疏的、有失準確的。尤其是其中關於溝口先生的評論部分，有些說法流於淺表，應該糾正。但是這些寫於十幾年前的書評也是我探索的「足跡」，它提供了自我反思的媒介。

當年這篇論文引起我極大興趣的原因在於，它讓我感覺到可以把理論(哲學)作為歷史來讀。準確地說，就是把理論命題置於它所由產生的歷史脈絡中來閱讀，而這樣的閱讀結果卻往往與非歷史的理論閱讀結果不同。溝口的這篇論文讓我產生這樣的興趣，倒不只是因為他梳理「理」和「氣」作為哲學概念從秦漢開始的歷史沿革過程時注重了這些概念與其他概念之間的歷史關聯，強調了它們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含義，更主要的是，他拒絕在一般定義的意義上討論這些概念。例如，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朱子為什麼把在此前思想史上被歸入「氣」的範疇的「太極」在自己的理氣論中作為「理」加以對待？他給出了六個理由論述了太極在朱子理氣論中所具有的功能，並認為朱子不過是完成了歷史賦予他的使命而已。這就是「依靠作為客觀法則的自然法則觀重新認識宇宙；從物和人出發主體性地認識宇宙；基於這兩種宇宙認識的新層面重新建構漢代以來『氣的哲學』的宇宙論，這是當時的時代要求。」<sup>13</sup>

溝口進一步指出，「我不能贊成把『理的哲學』的理觀直接視為理氣論先蹤的觀點，我認為理氣論主要是『氣的哲學』的框架通過天觀的轉換，通過自然法則之理重構而成，這樣看比較接近於歷史的事實。不過，這種自然法則之理在誕生過程中，確實也存在著『理的哲學』的理觀的相應影響，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理氣論是以『理的哲學』為媒介對它的揚棄。」<sup>14</sup>

溝口專注於朱子理氣論的歷史特質，在於他希望指出朱子承擔了他那個時代的特性或者說是限定性，因此如果僅僅把朱子這個太極＝理的理氣論視為一般的哲學命題，並以此規定理氣論的性質，那將是片面的。例如，清代的戴震就曾反對過理氣論把太極視為理的規定，但不能因此把戴震視為非理氣論者或者不充分的理氣論者。

13 《在亞洲思考7 世界像的形成》，東京大學出版會1994年。114頁。

14 同上，117頁。

如果從溝口的這個視野建構哲學史或者觀念史，僅在表層意義上依靠概念進行操作的方式就將受到質疑。事實上，任何一個歷史上的思想家都承擔著他同時代史的特性或者說是限定性，何止是朱子和戴震呢。那麼，如果對哲學和理論命題進行這樣的思想史閱讀，那將意味著一種全然不同的閱讀結果：事實上，任何理論的概念在它被抽象為一般性命題之後，都將留下一些「剩餘之物」，而這些剩餘之物，由於它針對了具體的時代課題，具有高度的狀況性格，因而最具有思想的緊張度。當僅僅依賴抽象的手段進行概念史討論的時候，這部分最具有緊張感的「特質」將不得不被捨棄，這也是觀念史討論有時會流於膚淺的原因所在，對於哲學與理論命題進行思想史閱讀，就意味著要同時關注被抽象的部分和被抽象所捨棄的部分，而這種關注方式，必將重新確定抽象的功能——正如溝口在他的處女作中重新界定了「普遍性」的含義一樣。

溝口當然並不否定觀念史和抽象論述的意義，而這與他關注「剩餘之物」的歷史含量也並不矛盾。他只是執著地追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僅僅依靠一般性的理氣論概念無法有效地解釋朱子的理氣論？在一般性的理氣論特質中，朱子究竟組合進了什麼樣的特定歷史要素？

我相信，在我未及閱讀的溝口的其他關於中國哲學思想觀念的論文中，同樣存在著這種性格的追問。對於哲學而言，它過於經驗，對於歷史學而言，它過於理論——我想，這或許就是思想史的位置，只有在這個位置上，我們才能充分把握住那些具有高濃度歷史含量的「剩餘之物」，並因為它的這種「剩餘」的性格，洞察另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方式。

在以思想史方式解讀中國哲學觀念這一著眼點上，有一件事情不可不提。這就是溝口先生在日本推動的一個浩大的學術工程——聯合全日本眾多大學的宋學專家翻譯出版《朱子語類》。這件事情的緣起，是溝口對日本漢學訓讀《朱子語類》的似是而非之處不滿。日本漢學一

直用訓讀的方式避免了對中文典籍的翻譯，但是由於使用了日語的音聲，也就由此對中文典籍進行了日語概念的偷換，使得中文的典籍因此失掉了它本來的準確輪廓變得似是而非。由於沒有《朱子語類》的日文譯本，致使那些不懂中文的日本學者只好通過訓讀來閱讀這套重要的典籍。例如丸山真男寫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時，曾對《朱子語類》下過很大功夫，但是他也不得不憑藉著訓讀來閱讀這一中文典籍。溝口先生找到了《朱子語類》訓讀本中的很多關鍵性的理解錯誤，感覺到了翻譯的迫切性，但是如此巨大的工程，並非可以一蹴而就，他需要組織一個團隊通力配合。早在1987年，溝口便在東京大學的課堂上講讀《朱子語類》，這個講讀在他退休離開東大後被轉移到了他就任的大東文化大學，並發展為包括了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幾所大學的學者和研究生參加的「宋明研究會」。這個研究會每個月活動一次，至今已經堅持了將近20年了。除了把《朱子語類》翻譯為平明的日語之外，還對其中的難解辭彙進行思想內容和語詞上的詮釋，且對不同版本(如朝鮮本和和刻本)進行異同比照，作出注釋。這個過程中，溝口不僅帶領後學積累了《朱子語類》的譯文本身，也培養了出色的翻譯人才。同時，在2005年，溝口先生向散在於全日本各地的宋明思想研究者發出倡議，建議把各自已經積累的零散翻譯成果集結起來，並進一步進行有計劃的分工，形成一個統一的譯本。這個呼籲得到了大家的回應，在溝口牽頭下，一個《朱子語類》譯注刊行委員會成立了。汲古書院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版，計畫共出版50冊，用溝口的話說，這是一個50年的大工程。但是，這個工程決定性地是一個寂寞的事業，出版也需要大量的資助經費，當我聽說溝口甚至為了籌措出版經費而為日本的一些企業家專門開設《論語》講座時，我確實為他的執著而感動了。聽說這個支持了《朱子語類》出版事業的企業家群體在溝口先生去世後也籌備召開了追思會。

《朱子語類》的翻譯讓我從另一面看到了溝口先生的學術面貌，而

且或許是理解他的學術品格的關鍵性一面。這是一種不計個人得失的「求真」品格。這種求真的欲望，促使他在李卓吾身上發現了童心的那種無法安頓的不容已狀態，也進而把他引向了對中國思想史動態的深度解釋。

在上述探討中國思想史中哲學觀念的問題群之外，另一個問題群是中國的「公·私」概念的特性。這是早在探討李卓吾的「無人無我」和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的思想命題時就提出來的一個基本的問題，與天觀、理觀、自然觀等等觀念論的討論既相關聯又相對照的是，關於公·私概念的討論基本上是在一個比較社會學的視野裏展開的。在與日本學者的日本「公私」概念研究進行比照的基礎上，溝口集中地追問的是這樣的一個基本問題：中國的「公」與「私」的概念為什麼既沒有發展成西歐意義上的以自我權利為中心的社會契約關係，也沒有發展為日本那樣的缺少公理而只能以共同體為絕對前提的地域性意識呢？溝口在進行了相當有說服力的分析之後指出：中國的公私結構與西方的結構不同，它們之間並不存在對立關係。他舉黃宗羲的「自私自利」為例，說明他的萬民之私的對立物並不是公，而是皇帝的大私。換言之，黃宗羲高舉「萬民自私自利」的大旗，絕非在標舉個人權利，而是在反對皇帝「一人專私」，他要建立的是可以使萬人之私得到滿足的「公」。換句話說，黃宗羲所主張的私並非是個人之私，它實質上是至今仍然存活於中國社會的對於「公」的理解，是一種由私的連帶集結而成的公，是一種以協調為前提的包容性的公，這種公區別於西方式的理解，它不是以契約為手段、以保證個人權利和自由為目標的，它強調的是公平與公正。同時在另一方面，當「公」被視為「公平」、「公正」的標誌時，作為它在理論上的對立項，中國的「私」觀念在道德上具有了劣勢，這也正是天理觀在社會生活中的面相。溝口尤其比較了日本的公私觀念，指出使用「私」作為日語第一人稱的日本社會，是把公和私作為截然分開的兩個領域進行對待的，在日本的公私觀念中基本不

存在倫理色彩，而且二者之間只具有上下關係，沒有內在聯繫。日本的「公」概念不具有普遍的原理性格，它雖然相對於私而言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但是這個權威僅僅意味著「官府的事務」，而且頂點是天皇，沒有高於天皇的公理，所以對於日本人而言，公的範圍僅僅限於日本國內部的領域。而中國的公最主要的部分與「公理」相連，它與中國的天理觀念等等相關，是高於朝廷和國家的。日本人的私也是領域性的，它是指個人的私密領域，走出這個領域，外部就是公。私和公截然分開，而且私處於受到公掌控的低端位置。問題在於，日本的公和私事實上並沒有被以任何形式連接起來，它既無法以西方的方式使私由契約關係進入公共領域，也非中國式通過私和私的連接介入公共事務乃至構成「公」本身。這就使得日本的私具有強烈的非社會性格。

限於篇幅和能力，我在此不打算展開介紹溝口關於公私研究的具體內容，我想確定的是他的這部分研究在他的中國思想史結構中的位置。很明顯，這部分研究與他上述關於中國哲學概念的研究，同樣屬於他研究中的原理部分，而且溝口正是在中國哲學的天觀和理觀等等視野裏討論公私概念的。但是他似乎明確地把它們分為兩個部分對待，我猜想，這是因為在天理、道、自然等等哲學原理的背景之下，中國的公·私觀念還背負著另外一個重任，這就是解釋中國的所謂「現代性問題」。雖然現代性問題在中國不僅僅是由公·私這一對範疇構成的，但是無疑，追問個體價值這一現代性的重要課題時，繞開中國的公·私範疇則將毫無所獲。當然，這似乎並非溝口真正關心的問題。事實上，在天、理、道、自然等等傳統哲學觀念已經無法直接在當代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直接找到載體的時候，公·私的傳統觀念卻不僅存活在中國的社會生活基本規則之中，也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制度的深層理由——雖然這理由不僅會發生變形，而且有時也會遭到背叛。無論如何，公私觀念的社會史含義，在溝口的中國思想史整體結構中佔據了非常重要的位置，日後當溝口把明末清初開始的中國鄉村結構的

變化作為一個歷史脈絡追尋到辛亥革命時期，再到革命中國的治理特徵之時，它也是溝口闡釋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走向的重要依據。

## 四

「現代性」這個概念在日語裏雖然有相應的對譯辭彙，但是很多日本學者特別是溝口這一代人，似乎更喜歡使用「近代」一詞來表述它。近代這個詞含量很大，它首先是一個歷史過程（這個過程，大致相當於中文裏的「現代化」）的表述，其次才是對這個歷史過程中精神特質的表達。溝口在他的著述裏從未用過現代性這個詞，但是在他使用「近代」一詞的時候，很多情況下他是在論述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亦即中國從前近代走入近代時刻的精神特質。

這麼做，我相信他是不得已的。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那樣，他最終決定放棄使用「近代」這個稱呼。但是當整個學界都把現代性作為一個首要問題的時候，溝口敏銳地覺察到了其中的問題，他顯然並不認為從一開始就放棄關於現代性的討論是明智的。特別是關於中國宋明之後直到當代的思想史研究，由於現代性理論被以西方的方式導入，它的一些基本要素構成了討論的視角，這直接影響到了對於中國歷史的解讀方式；同時，「近代化」作為一個基本的歷史過程，已經在中國和日本社會乃至學界得到了確認，對它的討論也無可回避。但是，溝口對於中國近代的討論，更多的卻是出於某種結構上的質疑，他顯然試圖用自己畢生的研究追問同一個問題：中國這樣走到今天，它的優勢它的劣勢、它的成就它的代價，究竟有什麼樣的內在邏輯？而我們到底應該使用什麼樣的標準去評價這一切？

從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溝口大部分時間埋頭於整理中國傳統社會向近代轉換的內在機理。他關於中國哲學概念和公私觀念等等的討

論主要完成於這個時期，以《中國前近代思想的發展》為代表的明清思想史經驗研究也在這個時期取得了最重要的成果；其後他開始在繼續這個工作的同時轉向對民初和毛澤東中國的研究，這個因為過早離世而中斷了的研究尚在提出設想的階段，但是也已經留下了相當清晰的輪廓。

無論在哪一個時期，溝口都面對一個困境：他的思路基本上沒有同道。儘管他的經驗研究可以在局部意義上得到同行的理解，但是很明顯，很少有人與他共享相近的結構意識。我相信正是這種知識處境，迫使他不得不進行一項似乎非他所長的工作——正面談談他的中國思想史認識論。

《作為方法的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於1989年，是溝口著述中論戰性最強的一本書。雖然他本人日後並不太重視這本著作，但恰恰是這本書影響了很多人，也改變了很多人。我聽一位年輕的日本學人說，他就是因為讀了這本書，改變了原來的研究方向，決定轉而到中國來追尋中國的原理，而且來了就「落地生根」直到今天。

這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如何看待「中國的近代」；第二部分檢討日本中國學「沒有中國」的問題；第三部分論述清末洋務運動的歷史功能問題。貫穿了全書的一個基本的問題意識，則是指出日本知識界乃至日本社會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偏見乃至歧視，並對其進行深度分析。

這本書寫作於1980年代，與晚年的討論相比，它具有很強的過渡性色彩。尤其是對於「近代」一詞的使用，對於溝口來說，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務於論戰需要的。但是，溝口基本的視野和認識，在這個他還不拒絕使用「近代」一詞的時期就已然成型，所以如果細讀文本就可以發現，「近代」（或者現代性）在這部著作中並不構成關鍵字，毋寧說它很像是一個不太順手的工具，是一個得魚之後隨時可以放下的「筌」，而不是立足點或者前提。



什麼是中國的近代？溝口承認中國的近代過程受到了西方的衝擊，並且發生了某些歷史性的變化，但他不認為這個變化可以表達為與「舊社會」的決裂。他做了一個比喻：中國的近代過程是蟒蛇的蛻皮過程，它改變了蟒蛇的面貌，卻不能說蟒蛇不再是蟒蛇。因此，把這個過程看成是中國的再生更準確。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這就是清朝後期關於議會制的討論。溝口指出，議會制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就被介紹到中國，其後經過同治年間張德彝等人的進一步介紹，到光緒年間已經發展成為政治建言。但是無論在哪個時期，議會制都基本上被使用傳統的公私觀念加以解釋，亦即被理解成政事一旦偏私就應以群議廢除它。溝口舉出具體的例證強調這一議會制「中國化」的過程，特別指出它在清末往往被使用中國傳統的地方制度名稱加以討論，例如鄉士、里正、鄉約等等。這個在制度形式上完全來自西方的議會制論述，在內容上卻是傳統中國的，正如上述用語表達的那樣，它顯示了地方分權的趨勢。在此意義上，把西方的衝擊過分誇大為摧毀了中國的傳統帶來了全新的時代，並不符合歷史的複雜狀態，溝口認為近代中國只不過是傳統中國的基體在西方衝擊這一媒介之下改變了形態而已。

正如在明中葉之後的變動時期溝口關注從陽明學的鄉村重建運動到東林派的富民階層分權主張這一歷史脈絡的重要性一樣，他在這本書裏強調了清末時期洋務運動的重要功能。這固然最初與當時學界對於洋務運動的否定性評價、把洋務和變法視為兩個不同質階段的一般性看法直接相對，溝口認為這個觀點代表了典型的非歷史和西方化的歷史觀，因此他試圖對此進行正面的挑戰；但是或許這還不是全部的理由，更重要的是這個討論與他的整體結構意識有關。溝口認為，洋務運動是一場波及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廣泛而深刻的運動，它顯示了中華文明世界在迫於歐洲文明壓力的時候，出於危機意識而攝取異質文明以圖再生的運動。無論它是否成功，它的歷史定位都不

能依靠「體用之說」表述，它是一個有機的文明轉換環節。此書收錄的關於洋務派和「反洋務」的兩篇論文雖然在溝口的中國思想史整體論述框架中並非最重要的關鍵之點，但卻具有某種不可替代的起承轉合作用：在這兩篇論文中，溝口對照地討論了清末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李鴻章和被視為守舊派反洋務的劉錫鴻在歷史轉折期具有深度內在關聯的時代功能：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同樣地推動著清末的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權，完成著在西方勢力入侵時中國傳統社會轉型的構想和行動。值得注意的是，溝口在1980年代為了批評時人概念化地把洋務派視為封建保守的舊勢力和賣國賊所作的洋務派翻案文章，目的並非僅僅在於指出洋務派在歷史上「推進現代化」的功能。因此在文革後中國學界已經開始重新評價洋務運動，日本學人也不再否定性地看待洋務運動時，溝口仍然堅持在書中收錄這兩篇論文，並且尖銳地提出：「中國的洋務派再評價，一言以蔽之是服務於『現代化』的，這也是一種從目前需要返觀歷史而成的近代，不客氣地說，它與過去從革命出發返觀歷史的做法一樣，也是為了滿足現代的時代要求、現代的政治課題，只是切割必要的部分，或者擴大必要的部分，為了現代的需求而重新整合。可以說這是滿足『革命』被『現代化』取代之需要的另外一個被歪曲了的近代。」<sup>15</sup>

《作為方法的中國》不能單獨閱讀。這部著作的認識論獨特性只有在結合了溝口著述中經驗研究的主要成果、尤其是他晚年所初步完成的關於中國思想史整體構想之後才能呈現出來。

這裏我想僅僅談及溝口的兩本重要的後期著作：《中國的衝擊》（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和《中國思想史》（與池田知久、小島毅合著；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中的第三、四章。

《中國的衝擊》收錄了溝口在1990年代中期以後至2002年之間的一

15 〈近代中國圖景沒有被歪曲嗎〉，《作為方法的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1989年，202頁。

些論文，也由三個部分構成：第一部分討論如何從中國的「外部」觀察中國、如何承擔包括戰爭責任在內的歷史責任等問題；第二部分討論中國的「近代」特質；第三部分檢討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觀和「禮教」的歷史功能。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三篇論文：《再考·辛亥革命》、《禮教與革命中國》、《另一個「五·四」》。

《再考·辛亥革命》是溝口有關辛亥革命研究中最早的、也是最簡潔的一篇，它可以視為溝口辛亥革命論的基本問題意識解說。溝口簡明扼要地表述了他不同意把辛亥革命視為「不徹底的反帝、反封建、反殖民地」的資產階級革命的理由，以及如何為辛亥革命時期的地方軍隊亦即後來的軍閥定位等問題。溝口指出，辛亥革命並非是一次不徹底的資產階級革命，它是中國幾千年王朝制度終結、從集權走向分權的劃時代革命。它與其後的中國革命具有內在的歷史連續性，但是卻具有不同的性質；前者旨在地方分權，後者旨在中央集權。在此過程中，如何評價軍閥的歷史功能是一個關鍵問題。如果根據辛亥革命與新中國政權建立之間這38年軍閥阻礙集權國家形成的作用簡單否定其歷史功能，那將有失於視野的偏狹。溝口指出，在辛亥革命各省獨立運動中，新軍（即後來的軍閥）發揮了很大作用，可以說，它只是為了推翻王朝舊體制而登上歷史舞台的。在它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後，由於它自身也是舊體制的產物，這使它成為下一個新體制誕生的障礙。溝口認為，軍閥所具有的這種富於悖論性格的功能，恰恰投射出這一時期中國歷史充滿了陰翳的屈折特質。

這篇簡短的文章後來發展為溝口建基於史料之上的辛亥革命研究。在他的視野裏，辛亥革命並非一個突如其來的反清革命，它是至少從明代末期就清楚地呈現了自己基本輪廓的漫長的社會革命的最終到達點。這個社會革命就是鄉村自治運動。它的社會秩序觀在朱子學中始露端倪，在明中葉通過陽明學把儒教滲透到民間、在清朝則以「禮教」的形式繼續發展，借助於善會、團練、宗族制度等等，構成了特有

的「鄉里空間」。正是這個最初以縣規模形成的網路到清末發展為省規模的組織，於是辛亥革命爆發了。溝口指出了一個意味深長的事實：辛亥革命之際，並不存在取代清朝體制的新的體制構想。它的特質之一就在於僅僅以破壞舊體制為其目標。聯想到早期的《中國前近代思想的演變》中溝口分析東林派政治構想時作出的那個有分寸的判斷——東林派並非旨在突破皇權的危機，而是旨在突破富民層的危機——時，我看到了一條綿長的歷史沿革線索：這個起始於明末的鄉里空間自治結構，在清朝進一步擴大充實，伴隨著省規模自治空間的形成，洋務運動、變法維新等上層的政治改革也在事實上強化了這個結構。最終，辛亥革命為這個歷史運動劃上了完美的句號。但同時這也是另一段歷史的開端：儘管辛亥革命不以建立新的統一體制為自己的目標，但它留下的這個空白卻必須填補，於是在中國大陸出現了多樣的錯綜複雜的新的體制構想，最終，與外來侵略的嚴酷事實相表裏，中國確立了新的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體制。溝口做了一個很有趣的對比，他認為中國很難形成美國那樣的聯邦制，在於兩者在歷史文化各個方面都是正相對照的。中國民族文化的成熟度與向心力都很高，各地經濟差距大因而需要中央的調配；從宋代以來就形成積澱了濃厚傳統、擁有卡利斯馬權威的官僚制，它持續了千年以上，等等，這些要素都使得中國更適應中央集權制。

溝口的這個論述似乎不應該被淺薄地誤讀為他在論證中國「非民主的中央集權」的合理性。事實上，如果沒有冷戰意識形態的大肆炒作，這種膚淺的認識很難立足。但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糾纏，我仍然希望指出一個基本的事實：溝口所說的中央集權，並非西方世界炒作的「獨裁體制」，而是建立在以辛亥革命為頂點的「鄉里空間」基礎之上的現代統一國家體制，它在蛻皮與再生之後，仍然與傳統中國的「基體」一脈相連。

如果把這個關於辛亥革命的長線歷史論述視為一個縱向軸線的

話，溝口還面對另一個課題，即橫向的「西方的衝擊」的問題。這個衝擊首當其衝的是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而中華文明在這個歷史轉折期處於明顯的劣勢。溝口在他的中國思想史結構裏似乎沒有過多地處理這個問題，他只是把這個視野置於他所論述的「鄉里空間」的背景之中。我相信，這是溝口（也是我們）所面對的基本知識處境使然。無論是清末的維新志士還是五四時期的反傳統知識人，無論日本的中國學家還是中國的現、當代學人，幾乎都把這個「劣勢」作為基本的立論出發點，而且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論述幾乎同一個問題：中國是如何擺脫它落後傳統的羈絆，建立新的社會與國家體制的？因此，當溝口論述他的長線歷史觀的時候，他為自己設定的課題還不可能是如何把西方的衝擊有機地結合到中國文化的轉型過程中去（我相信這應該是今後的課題，而不是溝口的工作），他需要清掃的障礙過多，這裏一個重要的視點就是如何清理「五·四遺產」。

在進行了相當數量的族譜研究之後，溝口寫作了《禮教與革命中國》、《另一個「五·四」》。這是兩篇素描式的論文，它們為溝口的結構意識承擔了一個重要的環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禮教、否定傳統的激進意識形態歷史化和相對化。在這個環節上，溝口要做的工作是對「五·四反禮教意識形態」進行歷史分析，指出它是特定歷史時期危機意識的反映，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禮教的歷史狀況本身；同時，這一以西方近代市民社會為衡量指標的禮教批判高度抽象了禮教在幾個世紀中所積澱的歷史內涵，把它簡化為扼殺人性的上下尊卑秩序，卻遮蔽了它實際上所起的相互扶助的歷史功能。

溝口對於禮教實際歷史形態和功能的追問與他90年代初組織的《在亞洲思考》的合作討論有直接關係。在那個合作工程中，以及那個專案結束後日益展開的相關研究中，日本中國學領域裏經濟史、法律史和思想史的優秀學者對於明清兩朝中國鄉村的組織形態和經濟制度有相當深入的分析研討，形成了初具規模的研究基礎。其中例如寺田

浩明關於明清法秩序中鄉約性質的研究、岸本美緒對於明清契約文書的研究，小島毅對於儒教地域性以及鄉里空間秩序的研究，尤其是1997年出版的夫馬進教授綜合了大量史料的《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對溝口的禮教和鄉治研究給予了有力的資料和分析的支援。在這些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溝口提出了對於禮教和禮治的歷史解讀的構想，他認為，這一從明清社會發展而來的鄉里空間的秩序規約，並沒有因為五四時期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家的反禮教思想而消亡，相反，它「相互扶助」的實質，在後來毛澤東的「革命中國」時代構成了從內部規定中國式社會主義性質的要素。

探索禮教與革命中國之間的這種內在聯繫，是溝口結構性討論中國歷史的一個努力。他為此不僅援引改革開放之後中國鄉鎮企業經營模式的調查結果，而且也非常關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那些關鍵的分歧點。他敏銳地在梁漱溟與陳獨秀、毛澤東的分歧中發現了歷史脈動的資訊，並且在《另一個「五·四」》中進行了初步的清理。他在文中分析了梁漱溟關於「作為社會制度的禮」這一論述，指出了對他而言中國革命就是鄉約的全國規模的版本。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他指出儘管梁與毛在中國是否存在階級等等問題上存在著重大的分歧，而且毛路線伴隨著對於傳統宗族制度的破壞，但是毛卻基本上繼承了禮治的秩序理念。因此，梁與毛在建國的問題上，如同兩股茅草那樣，擰成了一股繩。

對於梁漱溟和五·四與禮教關係的個案研究，用溝口的話說，「不是結論，而是提示問題的開始。」<sup>16</sup>顯然，如果說從陽明學到辛亥革命構成中國近代歷史前一頁的話，那麼從軍閥混戰到革命中國的建立和發展這段歷史，就是下一頁篇章。在這一頁裏所包含的內容，當然遠遠多於梁漱溟與陳獨秀、毛澤東的對立，但是溝口的基本設想卻是

---

16 〈另一個「五·四」〉，《中國的衝擊》，東京大學出版會，2004年，198頁。

不容忽視的，他在素描式的論文中所試圖提示的問題，與他的明清思想史研究之間，具有視野上和認識論上深刻的內在關聯——以地方分權的方式建立起來的鄉里空間，在戰亂和建國等等重大的社會和制度變遷之後，究竟轉變為何等形態？生活在中華思想世界的天理觀和公私觀的歷史脈絡中，現代的中國人究竟擁有什麼樣的政治感覺和世界感覺？

《中國思想史》是溝口與兩位學者分工撰寫的大學中國思想史課程教材，該書由四章構成，第一章(池田執筆)《秦漢帝國完成的天下統一》；第二章(小島執筆)《唐宋的變革》；第三章《作為轉換期的明末清初》和第四章《劇烈動盪的清末民國初期》均由溝口執筆。應該說，小島與溝口執筆的三章具有某種連續性，一氣呵成地構成了從唐代到現代中國的以「歷史變動」為視角的、以「鄉里空間」為舞台的思想史敘述。

在這本寫給大學生看的教材中，溝口簡明易懂地闡述了他追尋了一生所建構的中國思想史結構。他選取了兩個關鍵之點：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通過論述歷史上關鍵的「變動環節」來勾勒這個結構。這個以變動為基點的史的敘述容量很大，溝口很注意在其中集中闡釋那些體現中國原理的部分。以他論述第一個環節為例。他指出，十六、十七世紀是世界史上劇烈變動的時期，中國也不例外。但是中國的變動與西歐近代的變化並不類似，它有著自己的軌跡。在明末清初這個歷史變動時刻，中國完成了政治觀的轉換，確立了民的私有意識(而非私有權)，但是這個私有意識並非建立在個人基礎之上，它通常是指家族內的公平共有；這個時期也形成了新的田制論和封建論，為地方自治提供了基礎。溝口在此特別強調了「鄉里空間」這個論述明清之際轉型期開始定型的鄉村自治狀態的概念。在2004年出版《中國的衝擊》時，他在後記中使用的概念是「民間空間」，但是他顯然不滿意這個詞的「非官方」性格，因為他希望勾勒的，是一個「溢出體制和制度之外，或者反過來與體制和制度相勾連的、由官和民的複雜緊張關係所構築

的一種『聯動空間』，「即使冠以『民間』之名，它也未必是與『官』對抗、或者自立於『官』的『民』，而是那種有時與官結合，輔佐官、利用官，或者與官對抗；有時又與官沒有關係，或者想有關係而不得的『民』。」<sup>17</sup>在溝口年輕的合作者小島毅的提議下，《中國思想史》把這個重要的概念確定為「鄉里空間」。在鄉里空間的背景中，溝口強調了這個時期社會秩序觀的轉換，他特別指出了「觀察朱子學·陽明學·禮教」的一貫性視角的問題：「對儒教研究專家而言，朱子學、陽明學、禮教，其命題和存在樣態，用地上看近處的視角去比較，其間各種各樣的差異和對立之點會顯得十分醒目；特別是陽明學和禮教，誰都會把它們視為互相無法融合的油和水的關係吧。但是如果依靠從高空俯瞰的著眼於遠處的視角來看的話，那麼就可以理解，從宋代到元、明代再到清代，這是一個儒教道德從少數為政階層向庶民階層的細部不斷滲透的漫長擴展的過程。」而這個過程，也正是政治秩序的承擔者從為政階層向一般庶民階層不斷擴展的過程。<sup>18</sup>

溝口的這個比喻不是很貼切，因為他高空俯瞰的視角從未停留在高空，它總是透過地面視角的具體分析來有效地捕捉那些含義豐富的經驗對象，這使他的「俯瞰」成功地避免了由演繹而來的空洞抽象，同時也在經驗研究中賦予了他以洞察力和穿透力，成功地避免了就事論事的論述；而這種難得的學術品質，終於使他在晚年決定放棄使用「近代」這個概念。他說，竹內好曾經把中國自身的歷史發展稱為中國「獨特的近代」，這當然也是一種立場；但是在現在的這個時點上，我們不打算這麼做。「理由之一，因為這個過程和歐洲的近代過程大相逕庭，引入近代概念容易使人困惑、導致不必要的混亂。理由之二在於，為了防止這種混亂，需要預先有一個最低限度的共識，承認中國歷史上各種概念及其展開的途徑與歐洲的相應情況是如何不同，遺憾的是，

17 《中國的衝擊·代結語》，248頁。

18 《中國思想史》，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年，169-170頁。



這一共識的成立看上去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與此相關，第三個理由是一種擔心：無論怎樣強調『中國的獨特性』，只要使用了『近代』這一用語，『抵抗的近代』也好，『反擊的近代』也好，其獨特性從一開始就被束縛在與歐洲近代的關聯之中，『獨特』這一語彙本來的實質就會喪失，或者由於『近代』這一定化名義的阻礙，使中國自立的世界圖景的自立性受到損害。<sup>19</sup>

溝口這個問題意識，比較容易理解的表層含義在於，他觀察到大量以「近代」為絕對前提的認識論如何視中國傳統宗族制和儒教倫理為阻礙近代的落後力量，從而忽略了這些傳統能量中所包含的相互扶助、共同求存的部分，而恰恰是這一部分能量使得儒教倫理和宗族制度在形態上被瓦解之後不僅沒有消失，反倒促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形態；因此溝口認為放棄對於「近代」指標的執著，可以更接近中國歷史本身。但是溝口問題意識在這個表層含義之下還有分寸感極強的深層含義，那就是追究中國獨特性並非目的，它充其量不過是「方法」而已。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有必要重新回到《作為方法的中國》。

## 五

溝口先生帶走了一種工作方式。這就是用學術介入思想生產的方式。當今學界比較習慣的是以思想介入學術的方式，也就是把那些面對現實的思想甚至意識形態問題直接帶進學術領域，並用學術的資源去論證它。這種方式在理論領域裏或許是成功的，但是在思想史領域乃至歷史領域裏卻面臨很大的困境，因為它過於具體的思想目標使得它不得不無視「史料的反抗」，有時不得不割裂史料的內在邏輯而出於自己的需求有意無意地誤讀乃至歪曲。換言之，對於思想性的學術研

---

19 同上，142頁。

究而言，「求真」是第二位的，有時甚至是不足道的。

溝口並非「批判知識份子」，甚至也稱不上是「學院左派」。他一生執著於追求的學理之「真」，很難用「立場」去概括。他曾經在《近代中國世界圖景的再檢討》中勉為其難地闡釋過自己的「立場」：「如果被迫不得不回答的話，我只能說，我是立足於基體展開論的。」<sup>20</sup>

這個基體展開論，如上所述，是一個關於中國歷史從古到今的整體構想。簡言之，這是關於一個多民族、多文化文明世界的哲學、思想和社會原理的整體構想，它依靠對歷史關鍵環節的深入把握勾勒出了一些基本輪廓，依靠非凡的歷史想像力建構了有準確史料依據的歷史脈絡，而在這個歷史脈絡中，來自西方的「近代」的衝擊和現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敘述，作為危機認識的媒介被組合進了這一歷史過程，卻不可能構成前提或者結論。與此相對，溝口力圖追尋的，則是傳統中國的儒教倫理和社會制度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環節，以及它們被歷史衝擊和淘洗之後獲得的新的形態。在他的視野裏，從宋代朱子學開始的天理觀等等哲學觀念的轉換、從明末開始的田制改革和鄉村自治運動等等社會形態的變化，構成了綿延至今的中國歷史的潛在流向，在這個脈絡裏，發生了辛亥革命和中國革命，也發生了當今世界上的「中國的衝擊」。我相信，假如溝口先生再活77年，他一定會向更早的歷史時期進行進一步的史料鉤沉，打通從先秦直到明末的思想史和社會史敘述的通路，也會更多地涉及中國多民族文化中與儒教缺少直接關聯的那些部分。

但是溝口的這一基體展開論的構想，卻使得他無法成為書齋裏的學究，他必須磨礪自己的思想工具。這是因為，他面對了大量的認識論困境，而這些困境背後則存在著隱形的思想分歧甚至是學術政治的鬥爭。

---

20 《作為方法的中國》，東京大學出版會，56頁。

細讀《作為方法的中國》可以發現，溝口為自己設定的論敵（必須甄別的是，這裏所說的「論敵」即使是具體人，也不過是以人名為標誌的觀點或視角而已）是高水準的。他從一開始就避開了那些沒有生產性的糾纏乃至攻擊，拒絕回應諸如文化本質主義、中國中心論之類的批評。相反，他毫無客套地批評的論敵，多是在思想上具有建設性的學術觀點。在這個視野裏，溝口學術的思想功能不但起點很高，而且具有多方面的生長可能性，限於篇幅，我只能討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個方面。

第一，如何設定中國研究與西方「近代」的關係。

這是貫穿溝口學術中最為重要的思想認識論。需要澄清的基本問題是，溝口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已經排除了淺層次的「東、西方對抗」模式，亦即直觀地以西方論述套用中國史料的方式和堅持中國傳統特殊性以排他來對抗西方的方式。至於他本人的思考常常被誤認為是後者，他顯然沒有興趣給以回擊。溝口感興趣的思想論爭對手，毋寧說是以竹內好的《何謂近代》所提出的基本問題作為出發點的中國研究，亦即承認西方近代對東方的強大入侵力量，以此為前提討論中國在回應這個強大外力時所產生的自身的原理。對於竹內好的這個視角，溝口並非沒有同感，但是他意識到這個視角在日本的中國學中被具體化的時候，產生了一些潛在的危險。因此，他以西順藏的一些看法為例提出了批評。

西順藏是日本中國哲學研究領域中很有建樹的大家，屬於溝口的前輩學者。他對中國思想的研究，從溝口的視角看來，屬於「超近代」的（顯然，為了尊重西氏的進步立場，溝口刻意回避了「近代的超克」這一容易引起複雜聯想的說法），也就是對抗西歐式近代的立場。西氏對於轉型期中國的基本分析，溝口歸納如下：中國在鴉片戰爭以來從洋務到變法，即從「西用」到「中體」都被改變了，最後只剩下了中國農村，這是從歐洲視角看來屬於古代的、封建的、超古代的、停滯的舊

中國的底層，它的主體「人民」由於缺少西歐近代國民的主體契機，構成了拒絕封建、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制度下階級統治的「否定的主體」，最後由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打造成具有主體思想的人民總體。西順藏在這個「否定的辯證法」前提下肯定了中國革命，例如他解釋文化大革命為「沒有文化的人民創造出文化」，並認為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運動方式是無法被歐洲規定的中國今後的發展走向。<sup>21</sup>

溝口的疑問是，既然要論述中國革命思想的獨自性，既然要否定歐洲的中國停滯論，為什麼不可以從一開始就使用「中國的視角」，非要捨近求遠地使用歐洲的有色眼鏡呢？他尖銳地批評說，這是因為西氏有必要從歐洲式的中國裏找回自我。而這種找回自我的方式是通過對歐洲視角中「落後」部分的正面肯定完成的——例如相對於歐洲「人格自由的原理」，肯定毛澤東的「總體人民的哲學」。溝口指出：「在原理上顛覆個體與總體的關係，就此而言『使歐洲的體系·世界本身』被『中國反過來批判和規定』，這樣說是成立的；但是由於這一反批判·反規定是以歐洲體系和世界『本身』作為基準的，因而這一『反』，從一開始就是被歐洲的體系·世界所規定的。」因而，拒絕接受西方進步史觀的西順藏，由於他使用的方法是正面肯定被西方認定的「落後」的部分，結果反倒因為共有這一邏輯而掉入了進步史觀的陷阱。<sup>22</sup>

溝口對西順藏這一革命哲學的質疑與他對清末民初中國啟蒙知識份子的質疑是有關的。從嚴復到康、梁，從陳獨秀到毛澤東，都以不同的形態共用了這一「落後」的價值判斷並以此為前提論述革命的必要。溝口顯然認為這種意識形態對於正確認識中國的歷史走向是有害的。他認為這種僅僅依靠國民生產總值去衡量文明和歷史並作出價值判斷的做法是有失偏頗的，而且容易產生因追求自己沒有的東西而來的欲求不滿。

21 〈近代中國圖景的再檢討〉，《作為方法的中國》，40-42頁。

22 同上，42-43頁。

溝口的這部分分析當然有失於粗略。他不僅沒有充分肯定西順藏代表的那種「從歐洲式中國裏找回自我」的工作所具有的建設性思想功能，而且也沒有細緻地區分清末變法派人士和毛澤東否定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所具有的社會動員性格與思想史認識論之間的區別。然而指出溝口論戰姿態中的這些缺陷並不具有太大的意義，因為這並非他立論的主軸。恐怕問題的實質在於，當溝口把這些高品質的思想人物為自己論戰對手的時候，他真正的關懷在於一個更為緊迫的思想課題，那就是：僅僅依靠對西方中國想像的批判、對抗或者修正，無法找到中國的原理。這條思路的延長線上，沒有中國原理自由地自我呈現的餘地。

事實上，溝口在自己的研究中遇到的真正阻力就在這裏。他發現進入西方思想體系內部建構反西方的敘事策略，與按照西方的思想體系解釋和改造自己歷史的策略一樣，都不能真正與中國原理相遇。當西方被潛在地規定為「世界」的時候，中國的特殊就只能是西方前提下的特殊，那些超出了西方原因因而無法解釋的中國「經驗」，就不可能作為原理被認知，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只能被分解為一些碎片再被重新組裝，它的衡量標準只能來自西方。

我想這就是溝口過於嚴厲地批評西順藏，並過於嚴厲地質疑五四一代反傳統知識人的原因。而不能不看到，當今學界主流依然沿用著這種被溝口否定的思維方式，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中國圖景。

但是問題還有另外一面，溝口是否因此而拒絕西方的思想資源？

我想答案應該是否定的。溝口不僅不拒絕西方的思想資源，而且甚至認為西方的有些普遍性價值是必須得到承認的。溝口拒絕的是以西方思想為依據的前提和框架，而不是它的歷史和思想資源。但是，正如溝口並不拒絕使用「自由」、「普遍性」等觀念，但卻堅持要在中國的歷史語境裏對其重新定義、而且也不把這些觀念作為前提一樣，他對於西方的態度服從於世界史的視野。

溝口世界史的視野，就是「以中國為方法，以世界為目的」，這是《作為方法的中國》最核心的命題。把中國特殊化，同樣也通過這樣的媒介把歐洲特殊化，在這樣的集合多元特殊化的前題下結構「世界」圖景，這樣的多元化才是真正的文化相對主義。

文化相對主義在現實的知識圖景中呈現是相當困難的。溝口指出的那個基本的知識狀況在今天也沒有根本改觀。他多次指出，西方人以自己為參照系論證東方的特殊性，卻從未想過以東方為參照系論證自己的特殊性。我們常常說的所謂「知識霸權」，並非總是劍拔弩張的，在學術領域裏，迫使溝口過激地批判反西方知識霸權知識模式的危機感，不正是來自於他對這種「正確認識」與西方霸權的潛在共謀關係的警惕嗎？

第二，建立歷史學的眼光和視野。

歷史學從來就不是遠離現實的「淨土」，毋寧說這是思想性最強、緊張度最高的一個學科領域。在此我不打算論及歷史學與現實政治的關係以及歷史學作為國家之學的歷史沿革，我僅僅想結合溝口的思想史研究探討他的歷史眼光所具有的思想內涵。

溝口是一個有著強烈現實關懷的知識份子。從他留下的部分討論現實問題的文字看，從他發起並推進知識共同體討論時顯示的歷史責任感看，他不但對日本社會歧視亞洲鄰國、恃強凌弱的潛在社會心理深惡痛絕，而且對於曾經發生過的侵略戰爭有著發自內心的反省和承擔。但是他沒有選擇做社會活動家，也沒有選擇當批判知識份子，他選擇了中國思想史。

溝口的中國思想史研究打破了我既定的思想史意象。可以說，他把自己的全部現實關懷都轉化成了在中國思想史領域裏「求真」的動力，而且始終不允許這些現實關懷直接假學術之名以行。這個被嚴格遵守的分寸感覺構成了溝口學術中思想含量的底線：溝口學術的思想性和現實關懷體現為他學術認識論的針對性，而非現實問題的針對

性。但是，恰恰是這種思想性與現實關懷的「間接性」，使得他的思想鋒芒反倒具有了超越時空的能量。

溝口關於歷史認識論的正面理論論述非常有限，而且很明顯，這不是他所擅長的工作。這部分工作中完成度最高的是寫於2002年的《歷史認識的意圖與客觀性》一文。這篇論文提出的幾個問題是值得玩味的。

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一個歷史學理論的老問題，就是所謂歷史研究的主觀與客觀兩者之間的關係。溝口也認同歷史的客觀性並不等於記錄的客觀性這一判斷，而且也同意英國歷史學家卡爾的如下判斷：歷史學家必須準確把握存在於自己之外的客觀事實，同時對這些事實進行選擇和組合，從而使其成為歷史事實。但是，溝口不能滿足於這個理論上的調和，他基於自己的研究實踐，指出了進一步的問題所在：這裏面還有一個歷史學家的意圖問題。如果說歷史學是關於事實的學問，是客觀實證的科學，還必須包含一個根本性的追問，即事實是根據某種意圖被選擇的，它的選擇標準是什麼？而決定了該標準的敘述意圖又是什麼？在此意義上，溝口不能同意使用客觀(事實)與主觀(意圖)二分法的粗疏框架來裁斷歷史學。

其次，溝口提出了什麼是歷史學家的意圖這一問題。他一方面指出了歷史學界普遍存在的旁觀、觀察這一正統教義，它使得歷史學家滿足於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史料，而並不追究時間本身「質的變化」。這樣的歷史學家記錄的是歷史的「風景」，他並非沒有意圖，但是他的意圖從屬於已經給定的自然時間之流，是先在的前提。而歷史學家除了記錄這些風景之外，還需要有一種可以突破給定的「意圖」的自由精神，這就是歷史家之「眼」，就是歷史家的歷史感覺。為了給這種難以定位的歷史感覺定位，溝口確定了它的對立面。這就是不同層次的「被給定的意圖」。它們可以是沒有歷史感覺的排列史料的「觀察意圖」，可以是被先行規定的某一領域某一專業的主題限定；可以是某些意識形

態目標，等等。溝口認為，歷史學家必須在有別於這樣的意圖的意義上確立自己的意圖，他以自己的研究現身說法：「與世界上的偏見、歧視、歪曲進行戰鬥……這些偏見等等並不僅僅止於人種、民族歧視這樣的政治和社會感覺，在知識層面也偽裝成各種各樣的形狀，滲透到人們的知性中去，直至血肉化到當事人不把偏見視為偏見的程度。特別是亞洲研究領域，依靠西方視點結構歷史圖譜的偏見，已經固定化到了教科書的層面，偏見的再生產毫無障礙地大行其道。」<sup>23</sup>

溝口通過自身經驗提出的這個「意圖」，恐怕說成是「原動力」更為準確。在這個原動力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提出的歷史學家的意圖則是透過「歷史風景」追尋歷史的動力，呈現動力的歷史。這正是對他自身作為歷史學研究原動力的「意圖」的具體化，因為中國歷史一向被偏見解釋為缺少內在動力的、停滯的被動的過程；但是他能夠確認的自己作為歷史學家的意圖，也就到這個程度為止，而在這個層面上，他的「意圖」並不能直接構成他歷史論述的觀點，這是值得注意的。

第三，溝口提出了具有歷史感覺的歷史學家必須擁有放棄所有意圖、在史料的大海裡中遊弋，並從中發現歷史動力的能力。溝口在自己的研究實踐中已經證明，這種放棄所有意圖是一個什麼樣的摸索過程。他在各種已經被主流歷史學固定了位置的史料中沉潛，探尋史料中流動著的脈搏，並且追蹤著這一脈動找到了歷史轉變期那些關鍵的環節。溝口思想史的歷史時間是有品質的、非均質的，正是在這些高濃度的歷史時間裏，溝口提煉出了「歷史的動力」，建構了「動力的歷史」。

對於歷史的動力，溝口有一個很準確的解釋：「所謂『動力』就是在眾多的事實與事實的關係之間歸納性地浮現出來的虛構性的映射，無論哪一種先在的框架對此都是無濟於事的。」<sup>24</sup>同時，正是這種動

23 《中國的衝擊》，225頁。

24 同上，215頁。



力，決定了歷史的風貌，也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第四，溝口強調歷史的動力雖然是歷史家建構的結果，但這建構並非隨心所欲，它不過是呈現歷史「本來狀態」而已。這個所謂歷史的「本來狀態」，並不是外在於歷史家的客觀存在之物，而是更高層次的「歷史的虛構」。這裏所說的歷史的虛構至少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它一定要通過歷史家的歷史感覺才能呈現，一個是它具有高度的流動性，並不具備確定不變的形態。但是只有經由了在史料之海中不帶任何先入之見的摸索之後，歷史學家才能把握這種內在於歷史的「虛構」。溝口反覆強調說，這種本來狀態是歷史家在深入沉潛在史料之海之後「自行浮現」出來的。但是這種自行浮現的歷史動力，只有在長時段的歷史視野裏和具體歷史事件背後那種不可視的連續脈動中才能呈現，它不可能出現在任何先在的觀念框架和狹窄的課題意識裏。

我希望在溝口提出的上述四個問題之外，再補充一個他本人沒有正面論述的問題，這就是思想史研究中分析和價值判斷的區別。溝口的研究由於集中呈現中國歷史的內在動力，往往會被人認為缺少對中國的批判精神。我相信這與對史學研究的通俗理解有關。溝口從未美化中國歷史，也從未美化禮教，他對歷史動力的正面分析並不等於他對其進行肯定性評價，在今天這個思想性分析過少而價值判斷過多的時代裏，反倒是這個基本的知識立場，決定了溝口是以學術的方式介入思想，而不是相反，以思想的方式使用學術。然而溝口的革命性卻是深刻的。他在學術領域中試圖解決的那些認識論問題，關乎我們看待歷史和看待世界的基本前提，甚至關乎我們從事知識生產的知性本能。

溝口曾經說過，李卓吾走在他的時代前面。我相信這也是溝口雄三的命運。他領先於我們這個時代一步，我們看得見卻無法趕上。也許有一天世界史翻轉現有的格局，知識人不得不重新尋找精神營養，那時我們才能理解，過早失掉了溝口先生，對我們意味著什麼。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稿約

- 一、本刊是一份立足在民間社會，具有自我批判意識，以台灣社會之特殊而具體的問題意識為主體，以徹底挖掘問題根本並追求倫理實踐之基進的學術刊物。我們歡迎一切從現實出發的研究成果、調查報告及批判討論來豐富這個論壇。
- 二、本刊以台灣社會之研究為主，但我們並不以此自限，舉凡一切能開闊我們研究視野、啟發我們研究活力的稿件均歡迎。
- 三、本刊除一般論文外，研究與討論的短篇及書評(所評論之書與台灣研究相關者優先採用)，以及學術研究調查報告，也是我們需要的。
- 四、本刊為了鼓勵批判性、反思性、分析性以及以反對一切壓迫形式作為問題意識的碩博士論文發表，將規劃一塊園地，提供進步新生廣泛發聲的空間。歡迎這類碩博士論文改寫成4-5000字的短文(或者長篇摘要)，主要包括問題發問的脈絡、相關理論的對話與引用、經驗證據的使用與分析，以及對於台灣現實或者理論知識的意涵。我們將擇優刊登。
- 五、來稿請橫式書寫，並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地址，投稿一般論文必須包含中英文標題與摘要，請將電子檔案寄到編委會的信箱中。本刊於收到稿件的一週內，會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作者以表示收到投稿，若投稿者超過一週仍未接到回覆，敬請再次來信確認。所有稿件，將於收稿後三個月內奉覆採用與否。
- 六、來稿必須在文後專列「參考書目」，中、日文先，西方語文及其它語文於後。
- 七、本刊所採用正式論文的稿件一概暫不付酬，於出版後酌贈本刊當期兩本及電子檔案(pdf格式)。
- 八、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登後，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煩請作者於論文獲本刊評審程序接受後，交付定稿時，隨稿件繳交已簽名之著作權讓與書，格式附件於後。)
- 九、台社季刊編務業已電子化，來稿不必再寄紙本，請將電子檔 email 至台社季刊編委會信箱 [taishe.editor@gmail.com](mailto:taishe.editor@gmail.com)。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進步新聲」徵稿

台社為了鼓勵具有進步性，包括具有批判性、反思性、分析性以及反對一切壓迫形式作為問題意識的碩博士論文發表，將在每期期刊中畫出一塊園地，供新生代進步的聲音能夠更廣泛的發聲。

歡迎這類碩博士論文改寫成4-5000字的短文(或者長篇摘要)，主要包括問題發問的脈絡、相關理論的對話與引用、經驗證據的使用與分析，以及對於台灣現實或者理論知識的意涵。我們將擇優刊登。

來稿請橫式書寫，必須包含中英文標題與摘要，並附上作者的中英文姓名、服務單位、地址，請將電子檔案寄到編委會的信箱中。本刊於收到稿件的一週內，會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作者以表示收到投稿，若投稿者超過一週仍未接到回覆，敬請再次來信確認。所有稿件，將於收稿後三個月內奉覆採用與否。

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在投稿文章經本刊登後，其著作財產權即讓與給台灣社會研究季刊，但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並保有本著作未來自行集結出版、教學等個人使用之權利。(煩請作者於論文獲本刊評審程序接受後，交付定稿時，隨稿件繳交已簽名之著作權讓與書，格式附件於後。)

台社季刊編務業已電子化，來稿不必再寄紙本，請將電子檔 email 至台社季刊編委會信箱 [taishe.editor@gmail.com](mailto:taishe.editor@gmail.com)。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品目錄

### 台灣社會研究叢刊

- 01 馬克·薛爾頓(Mark Selden)，《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1991
- 02 夏鑄九，《理論建築：朝向空間實踐的理論建構》，1992
- 03 夏鑄九，《空間，歷史與社會：論文選 1987-1992》，1993
- 04 王振寰，《資本，勞工，與國家機器：台灣的政治與社會轉型》，1993
- 05 馮建三，《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析論 1990 年代台灣廣電媒體的若干變遷》，1995
- 06 趙剛，《告別妒恨：民主危機與出路的探索》，1998
- 07 恩斯脫·曼德爾(Ernest Mandel)著，張乃烈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簡論》，1998
- 08 朱元鴻，《我們活在不同的世界：社會學框作筆記》，2000
- 09 夏曉鵬，《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2002
- 10 瞿宛文，《經濟成長的機制：以台灣石化業與自行車業為例》，2002
- 11 瞿宛文，《全球化下的台灣經濟》，2003
- 12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2006
- 13 夏曉鵬、陳信行與黃德北編，《跨界流離：全球化下的移民與移工》(上、下)，2008
- 14 甯應斌，《賣淫的倫理學探究》，2009

### 台社論壇叢書

- 01 馮建三編，《戰爭沒有發生？2003 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2003
- 02 陳光興、李朝津編，《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2005
- 03 趙剛，《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2005
- 04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2005
- 05 賀照田，《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2006
- 06 陳光興編，《批判連帶：2005 亞洲華人文化論壇》，2005
- 07 鄭鴻生，《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2006
- 08 陳光興、蘇淑冠編，《當前知識狀況：2007 亞洲華人文化論壇》，2007
- 09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2008
- 10 丘延亮，《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2008
- 11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2009
- 12 錢理群編，《魯迅入門讀本》(上、下)，2009
- 13 張大業編，《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2010
- 14 陳光興、孫歌與劉雅芳編，《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2010
- 15 白永瑞、陳光興編，《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2010

### 台社讀本叢書

- 01 徐進鈺、陳光興編，《異議：台社思想讀本》(上、下)，2008
- 02 魏玠、馮建三編，《示威就是傳播：台社傳媒讀本》，2008
- 03 丘延亮編，《運動作為社會自我教習：台社社會運動讀本》(上、下)，2008
- 04 黃麗玲編，《流動與根著：台社都市與區域讀本》，2008
- 05 朱偉誠編，《批判的性政治：台社性／別與同志讀本》，2008
- 06 陳光興編，《超克「現代」：台社後／殖民讀本》(上、下)，2010
- 07 夏曉鵬編，《騷動流移：台社移民／工讀本》，2008
- 08 陳信行編，《工人開基祖：台社勞工研究讀本》，2010

##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出版品代售處

紫藤廬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16巷1號	02-2363-9459
唐山出版社	台北市羅斯福三段333巷9號B1	02-2363-3072
三民書局(復興北路店)	台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02-2500-6600
三民書局(重慶南路店)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02-2361-7511
台大法學院圖書部	台北市徐州路21號	02-2394-9278
政大書城(師大店)	台北市師大路74號	02-2364-0066
政大書城(台大店)	台北市羅斯福三段301號B1	02-3365-3118
巨流政大書城	台北市指南路二段64號集英樓2樓	02-2938-1106
中央研究院四分溪書坊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學術活動中心 B1	02-2652-1876
東吳大學校本部學連圖書	台北市臨溪路70號 活動中心1樓	02-8861-4738
清華大學水木書苑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101號	03-571-6800
上下游文化(原東海書苑)	台中市中港路二段60-3號1樓	04-2313-4143
中正大學圖書文具部	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大學路168號	05-272-3362
中山大學圖書文具部	高雄市鼓山區西子灣蓮海路70號	07-525-0930
木心書屋	花蓮市和平路663號電	03-833-8774

# <http://intermargins.net>

國 際 邊 緣

針對政治 經濟

建立T灣 新銳文化

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聲的邊緣網站

一個批判主流觀點與主流言論的網站



■連載——出会いと言葉 第4回

「言語」の置き換え／西江雅之

■連載——ヴィータ・テクニカ 第11回

テクネーとしての自己 上 告白／牧人司祭権力の両義性／楢垣立哉

■連載——日本を問い直す 第27回

語り伝えるべきものは何か／川田順造

■連載——家族・性・市場 第57回

「社会モデル」・序／立岩真也

特集＝ドラッカー マネジメントの思想

【ドラッカー再読】

コンサルタントの条件／ピーター・F・ドラッカー [聞き手＝ジョン・F・ギボンズ] (訳＝井坂康志)

今なぜドラッカーが読まれるのか／上田惇生

政府、政治、経済、社会にかんするドラッカー理論

／アーメン・チョパニャン＋ジャン・エムブレムサバグ (訳＝山家歩)

【ドラッカーとは誰か】

耳を澄まし続ける人／マーシャル・マクルーハン＋バリントン・ネヴィット (訳＝井坂康志)

脱「昨日の世界」の哲学 ウィーン、フランクフルトの時代／井坂康志

【マネジメントの思想】

ドラッカーの先見／リチャード・スミス (訳＝長原豊)

市場と国家、そして株式会社

ドラッカーとボランニエの経済社会批判／ダニエル・イマーヴァール (訳＝吉田昌幸)

『マネジメント』の人間主義的功罪／中山智香子

【マネジメントの言説】

ドラッカーの働き方に関する言説と働く場の実態 ‘時代を超える’ 経営イデオロギー



／伊原亮司  
『もしドラ』のストーリーテリングとマネジメントの社会学／精神分析学／櫻村愛子

**【多様化する労働の中で】**

「マネジメント」とその世界を読む レギュラシオン・アプローチの展開を視点にして  
／江口友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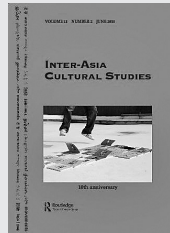
**【経営という統治】**

柔らかな捕縛 経営者を経営する／アラン・マッキンレイ+ケン・スターキー（訳＝  
長原豊）

**■研究手帖**

ファストファッションと労働／柴田努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Volume 11 Number 2 June 2010  
10th anniversary



**Editorial introduction**

Kuan-Hsing CHEN and CHUA Beng Huat

**In Memoriam**

**'Before Masao and after Masao': remembering and celebrating the life and work of Masao Miyoshi (1928-2009)**

Rob WILSON

**Essays**

**Inter-Asian banality and education**

Meaghan MORRIS

**Getting to know you or the formation of inter-Asian identities**

Firdous AZIM

**Shifting the geographies of knowledge: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elani BUDIANTA

**Asia, inter-Asia, and movement: decolonization into the future**

MUTO Ichiyo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decolonial-turn**

Leo CHING

**U.S. ethnic studies and Third Worldism, forty years later**

Colleen LYE

**Locating inter-Asian dialogues**

Mary E. JOHN

**The concept of 'Asia' in modern China: some reflections starting with the 2007 Shanghai conference**

WANG Xiaoming (Translated by Petrus LIU)

**Engendering an East Asia pop culture research community**

CHUA Beng Huat

**Non-quintessential inter-ness in Asia cultural studies**

KIM Soyoung

**Learning Asia: celebration of the 10th *IACS* anniversary**

Yoshihiko Ikegami

**Reading *IACS* in a season of discontent: an appreciation**

Gail Hershatter

**Continents of cultural studies – unite in diversity! Comparing Asi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Johan Fornäs

**A critical comment on the *IACS* journal**

Paul Willemen

**Querying queer cultural politics: partial, composite, contaminated English**

Amie Parry

**Why culture matters: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of feminist politics**

Tejaswini Niranjana

**Region, cultural studies, friends**

Tani E. Barlow

**On 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ies of cultural studies**

Lawrence Grossberg

**Action in Madagascar: the World Bank, Ravalomanana and leadership**

Stephen Muecke

**Expecting more open space as an inter-Asia critical review: reflecting over the changed context of cultural politics**

Cho Hee Yeon

**From area studies toward transnational studies**

Naoki Sakai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of cultural studies in Japan**

Yoshimi Shunya (Translated by David C. Buist)

**Visual Essay**

Retrospective looks

**In and out of *Inter-Asia*: a quick and painless procedure**

Mon WONG

**Politics/melancholy in Asia**

Shengxun ZHENG

**Re-familiarization with (East-)Asia**

Emma Chun-Yu LIU

**Living with tensions: notes on the Inter-Asia movement**

Kuan-Hsing CHEN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 chronology (1997-2009)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Founded: February 1988

No. 79, September, 2010

**Publisher**

Yu ZHOU

**President**

Hsiao-chuan HSIA (Shih Hsin University)

**Editor**

Frank T. Y. W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ecutive Editor**

Chih-chieh TSAI

**Assistant Editor**

Rui-hua LIAO

**Editorial Board**

BAIK Youngseo (Yonsei University, Seoul)

Chris BERRY (University of London Goldsmiths, UK)

Kang CHAO (Tunghai University)

Wan-wen CHU (Academia Sinica)

Chien-san F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Gail HERSHATT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 USA)

Chu-joe HSIA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siao-chuan HSIA (Shih Hsin University)

You-tian HSI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HUI, Po-keung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MARUKAWA Tetsushi (Meiji University, Tokyo)

QUAH Sy Re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SUN G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WANG Hui (Tsing Hua University, Beijing)

Jing WANG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Frank T. Y. W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dvisors**

Chung-hsin CHEN

Hsin-hsing CHEN (Shih Hsin University)

Kuan-hsing CHEN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Yi-mao CHEN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 USA)

Hong-sheng CHENG (Writer)

Sechin Yeong-shyang CHIEN (Academia Sinica)

Fred Y. L. CHIU (Academia Sinica)

Wei-cheng CH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i-fei D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HE Zhao-tia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Josephine C. J. HO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inn-yuh HSU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Wen-hsiung HSU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Liling HUA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suen-chyi JENG (The Information Center of Labor Education)

Marshall JOHN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 USA)

Chiu-chun LEE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Jung-wu LEE

Shang-Jen LI (Academia Sinica)

Bruce Y. H. LIA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in-ju LIN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Zhen-hwei LU (Tamkang University)

Yin-bin NING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Jenn-hwan W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i WEI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Chih-chung Y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Advisors**

Perry ANDERSON, CHUA Beng Huat, Arif DIRLIK, HAMASHITA Takeshi, MIZOGUCHI Yuzo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provides a focus for theoretical, appl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work,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perspectives regarding studies on Taiwan.

**Subscriptions**

Annual subscription price: to institutions, NT\$1800 in Taiwan, and US\$300 (air mail) elsewhere; to individuals, NT\$1000 in Taiwan and US\$90 (air mail) elsewhere. Inquiries and orders to: Tonsan Publications Inc, Basement, #9, Lane 333, Roosevelt Road, Section 3, Taipei, Taiwan. Postal transfer 0587838-5. Tel: 886-2-2363-3072, Fax: 886-2-2363-9735. Overseas order payment can be made by a check in US\$ (made payable to: swift code: HNBKWTWP118, A/C No: 118100101281, Beneficiary: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ISSN 1021952-8

NT\$250



9 771021 952005

## FROM THE EDITOR

### ARTICLES

#### **Failure in the Campaign for Social Security**

A Historical Review from Labor Standards Act to Labor Pension Act

#### **Beyond Modularizatio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of Taiwanese ODM Manufacturers in  
ICT Industry

#### **Total War and Local Culture**

Discourses on the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Revival of Taiwanese  
Culture, and Professors of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of  
Taipei Imperial University

#### **Modern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The Moral Horizon of Narrating China from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 **Native Nostalgia and Western Retro**

Historical Imaginations in Taiwan's Popular Media

#### **The Effects of Social Structural Positions on Ethnic Differences of Higher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Taiwan**

### OBITUARY

####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izoguchi Yuzo**